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 大全

主编 / [英]阿诺德·托因比

轴心国的初期 胜利



出版说明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原为英国伦敦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又译皇家国际事务学会，通称查培姆大厦）负责编纂的《国际事务概览·战时编》（1939—1946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主编为英国史学界权威阿诺德·托因比，主要编写人员均为英美著名学者。战时编共十一卷，按专题编写：《1939年3月的世界》，《大战前夕，1939年》，《轴心国的初期胜利》，《希特勒的欧洲》，《美国、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和冲突，1941—1946年》，《战时中东》，《大战和中立国》，《1942—1946年的远东》，《欧洲的重组》，《四国对德国和奥地利的管制，1945—1946年》和《1945—1950年的中东》。

这套二战史大全的特点是内容丰富，资料翔实，注释详尽，文字流畅，叙事生动。书内引用了大量政府文件、会议记录、档案材料以及当年国际政坛上的国家首脑、重要人物的私人笔记、个人回忆录等第一手资料，立论皆有根据。丛书不仅介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过程中两大军事营垒的军事态势、实力消长、战争进展的情况，还详细叙述了战争期间、战前和战后一段时间内各主要国家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涉及当时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情况。全书堪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百科全书，是各军政机关、大专院校、学术机构和有关研究人员了解、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必备参考书。

这套丛书的中译本自1978年起由我社组织翻译陆续出版，到1990年出齐。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1945—1995年），我社特以精装本形式重印全书，以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

1995年4月

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

第一编陆海空战概况 1939 年 9 月至 1941 年 12 月
詹姆斯·马歇尔-康沃尔爵士将军

第一章德国征服波兰 1939年9月1日至30日

希特勒第一次试验他的闪电战术就很走运。德国可用的兵力，在数量上只略胜于受他们之害的波兰人，因为德军在留下三十四个师作为西线后方掩护之后，在东线只能动用五十二个师（包括九个装甲师），而波兰人却能动用四十个步兵师和十个骑兵师（部分骑马，部分机械化）以抵抗德军。但是希特勒在六个月之前夺取了捷克斯洛伐克，得以在北起马祖里湖区南至斯洛伐克的喀尔巴阡山边界这一巨大的月牙形战线上部署兵力，能够对波兰抵抗力量的核心——华沙展开一个巨大的、集中的钳形运动，从南北两线包抄由维斯瓦河、那累夫河和桑河所形成的主要自然防线。

德国陆军除了这一外线的战略优势以外，在战术训练方面达到的标准，也远远超过波兰军队，无论陆军或空军拥有的装备都比它们的对手更现代化，效率高得多。最重要的是，德国武装部队通过俯冲轰炸机、装甲部队和步兵支援部队在战场上密切的战术合作，其火力和行动的灵活性是空前的。这一非凡的战斗训练已于1937年至1938年在西班牙战场上试过，并且迅速地被德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OKW）杰出的训练人员所利用。最后一点是，空军的数量也胜过波兰，超过四与一之比（三千架对七百架）。

此外，波兰人作了两件愚不可及的蠢事，也可说是由于胆小怕事，而给希特勒帮了大忙。第一，他们为了向整个20世纪，特别是为了向他们勉强结成同盟的国家证明，他们不想对强邻挑衅，从而不顾德军加紧战备，迟迟不完成自己的动员工作，直至失去最后的时机。这样他们就完全把战术上的主动权拱手交给了德国人。第二，他们把动员好的大量军队密集在西部边界，欲保卫波兰西里西亚和加利西亚的煤、铁和石油资源以及华沙南面和西南的工业中心，结果是大失所望。

在这种形势下，波兰人唯一的希望是向西北或西南迅速出击，以切断调来包围他们的德军的一翼。但是这一计划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9月1日黎明，甚至在德国最后通牒的限期尚未到期的时候，德国空军就进行了沉重无情的袭击。德国人对于波兰的各项军事部署和位置了如指掌，依靠这种知识的指导，进行突然空袭，使波兰的司令部、飞机场和后方设备大多被炸毁或瘫痪。

进行了这种打击之后，德军便从各条战线集中目标前进。冯·勃劳希契将军统率两个集团军群计五个集团军，北翼由冯·包克指挥（两个集团军共十七个师），南翼由冯·伦斯德指挥（三个集团军共三十五个师），这一部署包括一百五十万人。

这些军队在八天之内实际上已经到达目的地，波兰野战军大部分在华沙以西被包围；一星期后，伦斯德的军队即到达布格河。

声势最为值赫的大概是德国第十集团军（冯·赖歇瑙）的挺进。它冲过波兰西里西亚的工业区，在拉多姆以西使六万波兰军队陷于困境，最后到9月8日深入华沙市郊，切断波兹南地区波军的大部分。

可是，波兰军队虽然在数量上大大不如德军，而且实际上得不到任何空中支援，然而进行了英勇的回击，这从德国人承认伤亡四万人就可以证明。

战败了的波兰人还将受到更为阴险的致命打击；9月17日，俄国军队越过波兰东部边界，向西推进，几乎没有遇到抵抗，直到寇松线。于是，除了华沙围城战之外，一切战斗都已停止。18日波兰政府流亡到罗马尼亚。华沙终于在9月30日陷落。

第二章英法的部署 1939年9月3日至11月30日

希特勒在1938年和1939年靠了虚张声势征服捷克斯洛伐克，以及随后用闪电战征服波兰，其主要先决条件，是要确保后方安全不受攻击。在这两次行动中，他的军事顾问都曾警告他说，德国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在这两次行动中，他都直觉地察觉到西方敌人的软弱，他有理由可以冒一下险，而且不用到冬天就可结束波兰的战争，届时他就可从容地把胜利的军队从东线战场调到“西壁”。

法国无意为它的波兰盟国担负起主要的攻势，除非从马其诺防线的西北端到英吉利海峡的那个一百八十英里的缺口能由一支全副装备的英国军队来增援：无可讳言，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在1939年5月19日签订的法波武装部队合作的军事条约中，甘末林将军对法国用来进攻德国的兵力，小心地避不讲定任何明确的数字，但是他答应，在德国进攻波兰的十六天内，法国将以“大部分的兵力”进攻德国。由于波兰军队不到十六天就已经覆灭，法国政府无疑地认为自己可以解除道义上的责任，事实上，9月7日法国第二集团军群（第五集团军、第四集团军和第三集团军）曾谨慎地向前进入德国领土，没有遇到抵抗，一直推进到德国人在劳特堡和特里尔之间的筑垒防线，方才停止。他们在那里按兵不动，继续呆了几个星期，由于要抽出人力物力用于北方防区，才决定于9月30日撤回到马其诺防线后面。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一支包括四个步兵师和一个骑兵师的英国远征军（据说有十万人）于一个月内就在法国登陆，并部署在前方的集中地区。而在1939年，就不可能有同样的成绩。经过二十五年，空军的潜在威胁力量大大加强了；因此，在1914年曾经使用过的登陆港口，即哈佛、第厄普，甚至布洛涅和加来，都非常危险地暴露在空袭下。主要的登陆处不得不朝后转移到诺曼底和布列塔尼半岛上的瑟堡、布雷斯特、南特和圣纳泽尔等港口。结果法国交通线的长度是从前的三倍，供应工作当然就随之而复杂并成倍地增加。经过二十五年，还产生了另一个新的特点：坦克和重型机动运输车辆不仅需要更大吨位的船只装载，还需要更大的船坞设备和起重4重机。一支机械化部队与骑兵不同，在交通线上还需要范围大得多的维修机构，包括有关工场和抢修车等较笨重的设备，并需大大增加维修人员。

所有这些不利条件和种种限制，加上英国必须缩小野战军规模，加强国内防空力量，以致在英国宣战后的第一个月中，只有八万人在法国登陆，其中有许多部署在交通线上，作战兵力只有两个步兵师，没有任何装甲部队。10月3日，英国第一军接防毗连比利时边境上从莫尔德到格鲁森一段的法国防区。直到1939年10月中旬，戈特勋爵的远征军总数才达到两个军（四个步兵师和两个坦克旅）；直到六个月以后，他仅有的一个装甲师才开赴法国。

第三章俄国征服芬兰 1939年11月30日至1940年3月12日

俄国受到希特勒在波兰进行闪电战成功的鼓舞，同时害怕德国随后会渗入独立的波罗的海国家，便在11月30日对芬兰首都发动不宣而战的空袭，紧接着就用大约十五个师的兵力，分成五个散得很开的纵队，沿着整个俄—芬边界向芬兰进军。俄军依靠强大的空军和装甲部队的支援，企图突破所谓“曼纳海姆防线”，就是在芬兰湾和拉多加湖之间的卡累利阿地峡上的防御工事地带（大部分是木造的碉堡）。

芬兰军队只有三个师和一个骑兵旅，人数虽少，然而坚定果敢，在宿将陆军元帅曼纳海姆的指挥下，进行了意想不到的顽强抵抗，除在极北方的佩特萨莫之外，俄国的进犯处处都遭到严重的损失。企图越过卡累利阿边境向西推进的其他一些入侵的纵队，也遇到同样的抵抗。由于缺乏公路和铁路，由于主要的战线部署受到地理上的限制，加上地形上的困难，在此后两个月中，俄国人所有的进攻都失败了。芬兰政府一再向美国和国际联盟呼吁，要求帮助它反对俄国无缘无故的侵略；英国和法国当然对这些呼吁极表同情，甚至要求挪威和瑞典这些在地理上阻隔的国家给予过境运输的方便，以运送志愿兵、军火和飞机去帮助芬兰。然而这些要求遭到挪威和瑞典的拒绝，唯一可以选择的路线，只有绕过北角，到小小的渔港佩特萨莫，而这条路线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德国为了报答俄国在其他方面给予的好处，已对俄国保证中立，否则它倒会帮助芬兰的。因此，俄国人要消耗掉芬兰人的抵抗力，只是时间问题而已。2月1日，俄国人对曼纳海姆防线大举进攻，13日突破了这条防线。不到一个月，在3月12日签订了和约。芬兰实际上失去了自由而向它的强邻投降了。

第四章挪威战役 1940年4月9日至6月10日

当1939—1940年之交的严冬来临时，波的尼亚湾结了冰，德国不能再通过吕勒欧港得到瑞典供应的优质铁矿砂，于是矿砂就从铁路运到挪威大西洋沿岸的不冻港纳尔维克，再通过挪威和丹麦的领海运到德国各港口。这些领海已经被德国军舰恣意滥用了一段时间，2月16日，英国驱逐舰“哥萨克”号在耶辛峡湾进入挪威领海，俘获德国政府的船只“阿尔特马克”号，救出了关在船上的大约三百名英国战俘。4月8日，英国和法国政府宣布以水雷封锁挪威领海，以阻止这种运输。英国驱逐舰在纳尔维克港口外设置了布雷区；同时还作好准备，以使用船·11载运一支小小的远征军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进行干涉。

德国自从3月1日起就在计划的反击已经在进行了。4月9日清晨，德国一支机械化纵队侵入丹麦，几乎兵不血刃就占领了哥本哈根。同时德国海军在4月7日以前已经离开波罗的海和北海基地，挂着英国皇家海军军旗，驶进并占领了奥斯陆、霍尔滕、阿伦达耳、克里斯蒂安桑、埃格松、卑尔根、特隆赫姆和北极圈内的纳尔维克等港口。这些军事行动，得到停泊在挪威港口内一些商船货舱中的武装德军的支援。空降部队也在奥斯陆和斯塔万格的机场降落。挪威陆军、海军和海防部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德国重型巡洋舰“布吕歇尔”号和几艘运输船及较小的船只，在企图进入奥斯陆峡湾时被击沉了；然而德国的攻势锐不可当，于是小小的挪威野战军在骁勇的总司令奥托·鲁盖将军率领下撤退到来那萨湖源头的防线，掩护北至卑尔根和特隆赫姆的内陆交通。

地理条件使英法两国要立刻进行任何援助都很困难，但是在英国皇家海军4月13日摧毁了纳尔维克港内的德国驱逐舰队以后，一支小规模英法远征军于4月15日在纳尔维克附近的哈尔斯塔登陆。16日和17日，另一支英法部队在特隆赫姆以北的纳姆索斯登陆。18日，英国本土军的一旅没有实战经验的新军在罗姆斯达尔峡湾口的翁达尔内斯登陆，并向南推进到奥斯陆铁路线上的当博斯和沃塔。这些都是为在特隆赫姆登陆的主要行动计划所作的辅助战。然而，这个主要的作战计划由于缺乏空军掩护，经英国海军部的要求而放弃了，4月24日，有一个大胆的计划，准备在翁达尔内斯以南的冰冻的莱斯亚斯科格湖上筑一个机场，供一个中队战斗机使用，可是由于德国的空中优势而被挫败了，两星期以后（5月2日和3日），在纳姆索斯和翁达尔内斯的小支部队遭空袭而受到相当大的损失以后，只好撤退。撤退的决定是于4月27日在伦敦作出的。在哈康国王和挪威政府官员于4月29日在莫耳德登上英国巡洋舰“格拉斯哥”号前往挪威北部的特朗瑟以后，倒霉的挪威军队只好听天由命，被迫于5月4日向德国人投降。纳尔维克后来于5月28日为一支由英、法、挪威和波兰分遣队组成的联军所占领，但是那时盟军正胶着在佛兰德作殊死战，把部队留在北极圈内不是其目的，因为在这夏季不夜的几个月中，部队的给养线经常暴露在以陆地为基地的飞机空袭之下。盟军于6月8日从纳尔维克撤退，两天以后，驻扎在挪威北部的挪威部队放弃了战斗。

第五章德国的西线攻势和法兰西之战 1940年5月10日至6月25日

德国人一等到波兰被瓜分，与苏俄的分赃已有适当安排之后，马上把大部分兵力调往西线。1939年10月9日，希特勒发布了最早的入侵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的命令，这有双重目的：歼灭法英军队，在佛兰德和法国北部获得足够的土地，以便对英国进行有效的海空战争，同时在易受攻击的鲁尔区前面形成一条防御地带。只等装甲兵团集中和气候适宜，这一攻击就立即开始。到1939年11月初，最高统帅部在西线总共已集中了一百四十个师，其中有十个是装甲师，只留下约二十个师驻守波兰和监视苏联边境。由二十个师组成的南线的C集团军群（冯·莱布将军），面对阿尔萨斯—洛林前线的马其诺防线，而主要战斗部队（一百二十个师，包括全部十个装甲师），则都集中在面对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边境的三个集团军群（B集团军群由冯·包克指挥，A集团军群由冯·伦斯德指挥，装甲集团军群由冯·克莱斯特指挥）。整个军队又置于冯·勃劳希契指挥之下。

有证据表明，希特勒原来打算及早在1月中旬动手，1月10日，有一架德国飞机在比利时默兹河畔的默舍朗迫降，机上有一个参谋，携带着入侵荷兰、比利时的作战命令，显然打算在几天内就入侵。攻击没有立刻开始，可能由于这一过早的泄密，也可能由于德国的将领们劝告希特勒推迟进攻，等待土地和气候条件更为合适时再说。在挪威战役于5月的第一周中结束以后，好戏终于上演，象在波兰战役以前一样，战略主动权掌握在德国人手中。

盟军方面的条件十分困难。面临意大利和瑞士边境山峦起伏的南线防区，由第三集团军群（贝松将军）的五个师防守。中线由第二集团军群（普雷特拉将军）的第五集团军、第四集团军和第三集团军（二十六个师，守卫要8塞的驻军在外）守卫马其诺防线，而第一集团军群（比约特将军）的二十八个法国师和九个英国师则扼守着从蒙梅迪到英吉利海峡面向比利时边境一带。统帅部的后备军有二十一个师（十八个步兵师和三个装甲师），广泛地分散在瓦兹河与汝拉山脉之间。全部军队置于指挥东北战线的乔治将军的统率之下。比约特将军的集团军群包括防守沿海地区、拥有七个师的第七集团军（吉罗将军）；还有戈特勋爵率领的英国远征军，包括三个军（九个师），从阿尔芒蒂埃尔以北拉开到莫尔德堡，在那里与有六个师的第一集团军（布兰查德将军）会合；再往南是拥有八个师的第九集团军（科拉普将军），防守从特雷隆到蓬塔巴的默兹河地区，以及拥有七个师的第二集团军（亨茨格将军）防守蓬塔巴到隆克翁正西一线，从隆克翁以东开始就是马其诺防线的工事了。在这一百八十英里长的北线防区的前面，就是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等中立国的缓冲地区。比利时能够集合二十个步兵师和两个骑兵师；荷兰已动员了十个师，但是这些军队都没有打运动战的实际经验，而这两个国家，无论是它们之间，或是与法国或英国之间均无共同防务计划。总起来说，德国调动了一百四十个机动师，来对付盟国总共八十九个师，如果低地国家受到攻击，盟军的兵力将增至一百二十一个师，计：法国八十一个师，英国九个师，比利时二十二个师，荷兰十个师。然而盟军却分布在自地中海到英吉利海峡七百五十英里的漫长战线上。对付德国的十个装甲师，法国只能拿出三个装甲师和三个轻机械化师。英国唯一的一个装甲师不曾在法国登陆。空军方面，盟军在数量上处于类似的劣势；德国拥有三千二百架飞机，而英法只有二千架。

盟军总司令甘末林将军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显然德国人会毫无顾忌

地侵犯荷兰和比利时的中立，而且事实上，1940年1月在德国飞机上缴获的文件证明，他们无时不想这样干。但是比利时人和荷兰人却都极力希望避免给予德国人任何借口来采取这样的侵略行动，以致他们直到最后一分钟还拒绝与盟国进行任何方式的合作，甚至不让盟国知道他们自己的防御计划。

在和平时期没有将马其诺防线延伸到蒙梅迪西北以掩护毗连比利时的边境，但是却利用冬季进行僵持战的几个月，在这地区筑了一条应急防线，这主要是由于英国远征军的努力。盟军在这条防线后面能够比较安全地等着德国装甲部队来袭击。但是，这样做的话，就要让不久便会向英法求救的比利时和荷兰去听天由命了。不仅如此，这样做还意味着丢掉荷兰境内的马斯河下游，比利时境内的艾伯特运河和埃斯科（斯凯尔特）河一带重要的反坦克屏障，另外还要增加大约三十个师的兵力。因此，1940年3月，法英司令部决定采用一个以“D计划”著称的计划，又叫迪勒河计划，就是，等到德国侵犯荷兰或比利时，或同时侵犯两国的中立时，英法就立即迅速进军，先到埃斯科河下游，再到它右岸的支流迪勒河。作为“D计划”的扩展，甘末林将军设想了一个“布雷达计划”，以法国第七集团军继续挺进，深入荷兰领土，与荷兰军队会师。然而甘末林的这些从准备就绪的防线出击的计划，没有一项得到他的直属部下、指挥东北战线并将负责执行这些计划的乔治将军的同意。

德军在5月9—10日的午夜以后不久，对荷兰和比利时发动了闪电战。在黎明之前，伞兵和滑翔部队先后在荷兰降落，占领了所有重要的机场，以及累克河、伐耳河和马斯河（默兹河）上在战略上极为重要的桥梁。荷兰的空军象波兰的空军一样，在自己的机场上就被搞得失去了战斗力，整个指挥系统由于所有的司令部都受到密集的轰炸而瓦解。荷兰人试图勇敢地抵挡住这一个接连一个的打击，但是德国装甲部队在盖那佩与文洛之间渡过马斯河，迅速粉碎了全部抵抗，到5月14日，整个荷兰都遭到了蹂躏。据说仅在鹿特丹一处，在5月14日的一次野蛮空袭中，就有大约三万平民死亡，第二大荷兰军队就投降了。

对比利时也采取了类似的战术。5月11日，德国滑翔部队以特殊大胆的行动，使得埃本·埃马尔要塞失去了战斗力，这个要塞在艾伯特运河与马斯河汇合处附近，是比利时防御工事的枢纽。同一天，德军成功地渡过了艾伯特运河，开过去一个装甲师，这个师打到汤格雷斯，迂回比利时的主要防线。比利时军队不得不退至迪勒河一线，英国第二军这时正守着这条战线上卢万至瓦弗的一段。在北方，法国第七集团军正从安特卫普朝北向荷兰进军，但因德军向南继续深入而受阻。在英国远征军的南面是第一集团军，由法国骑兵部队掩护，骑兵部队正受到默兹河东面的冯·克莱斯特强大的装甲部队的攻击。

5月13日和14日，发生了最大的灾难。克莱斯特的两个装甲军，在迫使法国骑兵部队在色当与那慕尔之间沿着整个默兹河战线后撤以后，以对桥梁密集俯冲轰炸为掩护，在色当南面渡过默兹河建立起桥头堡，完全冲垮了法国第九集团军。南方的装甲军（古德里安），由三个装甲师组成，继续向默兹河以西深入，冲进了法国境内。

5月16日，正在协调英、法、比军行动步骤的比约特将军，命令部队从迪勒河一线撤至埃斯科河一线，因为德军在深入那慕尔以南之后，正迂回迪勒河。这次调动到5月19日完成，没有受到敌军的严重干扰。

到6月17日，法国防线的缺口长度总共达到六十英里，德国装甲部队正在逼近圣康坦，从而威胁法国第一、第七集团军和英国远征军的后方交通。指挥第七集团军的吉罗将军于18日被俘。

5月19日，保罗·雷诺（3月中旬起任总理）令七十三岁的魏刚将军接替了甘末林将军。然而这时法国的军队组织已经十分混乱，后备军既不能调动去填补由于第九集团军被打垮而出现的缺口，也不能调动去侧击长驱直入松姆河流域和英吉利海峡沿岸的克莱斯特的五个装甲师。5月20日，德军已经到达阿布维尔，在那里筑了一个防御性的桥头堡，布洛涅于5月25日，加来于26—27日先后陷落。5月21日，指挥第一集团军群的比约特将军因车祸受伤，两天后去世。

古德里安的装甲军，在摩托师的紧密支援下，5月23日已经到达英吉利海峡，切断了英国远征军以及与英军协同作战的法、比部队向南的交通。盟军在北方的几支军队就这样整个被隔绝在英吉利海峡沿岸格拉夫林和纽波特之间以敦刻尔克为中心的日益缩小的三角地带。

为了防止这一合围造成的灾难，魏刚计划了一次反攻，由英国远征军和法国第一集团军在阿拉斯—杜埃防区向南突击，以配合松姆河以南的法英部队向北的进攻。这一计划的确是挽救局势的最后希望，但是，德军对在佛11兰德被隔绝的盟军和对崩溃了的松姆河陈线继续施加压力，使这一计划无法实施。5月24日和25日，比利时军队在德军的一再攻击下继续后撤，终于在加来投降后二十四小时，于5月27—28日午夜投降。担任比军总司令的利奥波德国王，认为继续战斗已无希望，在27日早晨就已作出了这个决定，可是遗憾的是，未曾及时通知法英盟军，致使盟军左翼失去掩护。

到了这个时候，魏刚的联合反攻计划显然已经行不通了，5月26日，戈特勋爵和市兰查德将军决定撤退到沿海的利斯河这道反坦克的屏障后面。英国皇家海军开始进行准备。从英吉利海峡沿岸撤退所有能从包围圈中营救出来随盟军。比利时军队投降后，在东北翼留下一个宽广的缺口，迫使盟军进一步缩小防卫圈。

多亏英国皇家海军和皇家空军竭尽全力，从5月29日到6月4日，有三十三万八千多名盟军从敦刻尔克的海滩上撤退到英国，——所有的港口设施早就失去了效用。德国统帅部未能充分利用这一情况。仅以炮击和空袭加强其攻势。

盟军这场灾难的主要原因。除了愚蠢的成略思想——而且这种思想事先没有和各有关方面取得一致——这种不利因素之外，可能要归咎于装甲部队和反坦克武器力量的薄弱。即使在甘末林决定向比利时、荷兰进军之前，也没有足够的总后备军力集中在盟军战线上明显的薄弱环节——马其诺防线西北英、法两军接合点的后方。尽管大量德国装甲部队集中在阿登防区的对面已有六个月之久，但是法国总参谋部却坚持己见，认为这不过是虚张声势，还认为默兹河流域丛林茂密而且陡峭的地形，抵挡得住装甲部队的进攻。可是，德国装甲部队在困难的处境下能够灵活应付，以及他们为达到目的所采取的冷酷无情手段，堪称典范。

当时，在松姆河的南面，法军拼命想堵住德军入侵的浪潮，然而徒劳无益。魏刚将军给他的部队发出一连串的命令，激励他们战斗到底，寸土不让。但是没有及时制订出协调一致的计划，把部队有组织地撤退到一道可以防守得住的战线上，也没有集中调动任何部队，以便发动有效的反攻。在默

兹河畔被打垮了的第九集团军的残余人员，匆匆地重编成新的第十集团军，其中并入了留在松姆河南面的少数英国部队和一些负责交通的梯队。这支军队运用不当，6月7—9日，以隆美尔的第七装甲师打先锋的德国第十五装甲军，从亚眠向鲁昂狼打猛冲，就把这支军队杀得晕头转向，把它驱赶到塞纳河后边去了。法国的第九军，包括英国的第五十一师（苏格兰高地师），被牵制在勒阿弗尔以北沿海，最后不得不于6月12月在圣瓦莱里投降。更东面一些，发生了新的灾难。有两支德国装甲军在6月9日突破了在雷代耳和苏瓦松之间的法国第四和第六集团军扼守的埃纳河防线。6月11日，兰斯陷落，同日，德军到达马恩河畔的带埃里堡。

6月10日法国政府从巴黎撤到图尔，6月14日又撤退到波尔多。魏刚将军设想出最后一个战略计划，就是以第六、第七两个集团军据守卢瓦尔河，形成主要防线，而命令被切断联系的第十集团军和支援的英国部队向西撤至布列塔尼半岛——所谓“布列塔尼阵地”。然而，这个计划显然是行不通的。

德军于6月14日兵不血刃开进巴黎；马其诺防线已经被迂回过去，而且部分已被突破；6月15日，德国第六集团军在特鲁瓦和桑之间突破法国第六集团军的阵线，第二天渡过卢瓦尔河上游。17日，迪戎市陷落。

法军在德军的无情压力之下继续向南和向西撤退，6月16日，雷诺辞职，由贝当元帅接替。6月17日，贝当要求停战，第二天，留在法国的英军从瑟堡和圣纳泽尔撤退。

6月10日，意大利对法国宣战，这个打击更加瓦解了法国的士气。6月22日，法国代表在贡比涅刚近的勒通德斯和希特勒签订停战条约。与此同时，意大利军队已进兵攻打法国的阿尔卑斯山边境。法国军队坚守阵地，打退了每一次进攻，重创意军，但是这时的战局已毫无希望，6月24日，法国与意大利签订停战条约。德法停战条约于6月25日生效，贝当元帅把他的政府迁至维希。

拿破仑的理论是使大部队由于灵活机动而成倍增加其威力，而希特勒的装甲部队和俯冲轰炸机则赋予这个理论以二十世纪的内容。他巧妙地发挥这一思想，在不13到四十天的时间内粉碎了法国在军事方面唯我独尊的神话，同时暴露了轻信马其诺防线是大错而特错。

第六章不列颠之战 1940年8月8日至10月31日

法国的陷落，给希特勒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怎样才能最好地消灭英帝国的战斗力。为了腾出手来与俄国进行不可避免的较量，这是必不可少的序曲。

7月16日，他发布了入侵英国的代号叫做“海狮行动”的军事指令。作为预备的步骤，发动了一次空中攻势，旨在摧毁英国皇家空军的战斗机指挥部。

希特勒和戈林完全可以对这次战斗的结果怀有信心。在8月的第一个星期，德国空军当局集中的作战飞机，计有一千三百六十一架轰炸机，一千三百零八架战斗机，而英国皇家空军能够与之对抗的至多不过四百七十一架轰炸机和七百十四架战斗机。同时，英国的防空力量虽然正在进行巨大的、不断加强的努力，但还是不充分的。在德国空军能够袭击到的范围内，有大量易受空袭的地点，这就必须大大分散可用的资源，而当伦敦开始变成主要目标时，只配备了九十二门炮防守这座城市。

德国的空中攻势从8月8日开始，并继续加强，直到10月5日，这时德国空军显然已无法压倒英国皇家空军，而把入侵英国的计划放弃了。空袭的目标对准护航船队、海港、飞机场和兵工厂，特别是伦敦的各个码头。在后阶段和在11月间，德国的空袭多半限于在夜间轰炸主要的工业中心，如伦敦、南安普敦、普利茅斯、利物浦、伯明翰、考文垂和布里斯托尔。

英国多亏有效的雷达系统和优良的战斗机与飞行员，使德国人不能达到决定性的结果，到10月底，德国损失的飞机达一千七百多架，相比之下，英国只损失九百十五架。到11月底，英国平民在敌人的空袭中丧生的近一万九千人。

德国空军既然未能攻破英国的空中防线，就放弃了“海狮行动”，这个计划是要用十三个师的兵力在英吉利海峡沿岸的海特与沃信之间登陆入侵英国。到9月中旬，要进行这样规模的两栖作战，季节已经太迟，10月12日，这个计划终于取消了。

这样，英国就获得了喘息的机会，用以重新训练和装备从敦刻尔克海滩上救回来的战士，并在英国的国土上创立了一个以戴高乐将军为领导的法国抵抗运动的核心。

第七章第一次和第二次利比亚战役 1940年6月至1941年4月

墨索里尼在1940年6月10日参战时，认识到德国在西线准会得到决定性的胜利，认识到没有什么会阻止他把整个东北非洲，包括埃及、苏丹、乌干达、肯尼亚和英属索马里并入意大利帝国。大约二十一万五千名意军在巴尔波元帅的统率下已集中在利比亚和的黎波里塔尼亚，还存奥斯塔公爵统率的二十二万军队在意属东非。夹在这两支令人生畏的军队之间，韦维尔将军（中东总司令）能够使用的兵力只有约五万五千人，而且其中有许多在埃及和巴勒斯坦负有维持内部治安的责任，不能调动，因此他只能依靠一个英国装甲师、一个英国步兵师和一个印度步兵师主动作战，直到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及最后从南非调来新的军队为止。意大利在飞机数量上同样占极大的优势。

必须记住，埃及王国在大战期间自始至终是中立国，虽然这对盟国有某些好处，不过对于在中东作战的英军的交通安全来说，在某些方面也有害处。

韦维尔在兵力上虽处于劣势，但是这并没有阻止他在西部沙漠采取积极防御。这一防务以设在默萨马特鲁港的铁路终点站的一个掘壕据守的营地为基地，默萨马特鲁港位于地中海沿岸，在亚历山大港以西二百英里。从这个营地出发，韦维尔的快速机动部队越过意属利比亚边境，进行了多次大胆而成功的袭击。从苏丹越过阿比西尼亚边境，也采取了同样的主动出击的战术。

到7月半，格拉齐亚尼元帅（巴尔波死后接任驻利比亚的司令官）已调动了两个师以上的兵力到毗连埃及的边境。两个月以后，强大的意大利军队侵入埃及，沿着海岸进到边境以内纵深达五十英里的西迪巴拉尼，掘了一连串的壕沟扎下营地。英国的轻装部队退回到默萨马特鲁港。

在苏丹—阿比西尼亚边境上，从7月到11月在卡萨拉和加拉巴特两地进行了多次相当激烈的散兵战。

在这期间，英国本土和各自治领的增援部队开始到达埃及，格拉齐亚尼的按兵不动，鼓起了韦维尔的勇气，15使他在10月份计划在大战中最大胆而成功的战役之12月9日黎明，奥康纳中将指挥的包括一个英国装甲师和一个印度步兵师的西部沙漠军，经过七十英里神不知鬼不觉的向敌军逼近的行军，通过空旷开阔的沙漠，突破一连串彼此孤立的用壕沟围起的意大利营地，把这些营地一个接一个占领了。奇袭完全成功，两天之内，把西迪巴拉尼及其南面的几个地方全部攻下，俘虏意军三万八千多人，缴获大炮四百门、坦克五十辆。参加这次战役的英国全部武装力量有三万一千人、一百二十门大炮、二百七十五辆坦克，英军阵亡一百三十三人。

一个澳大利亚师和一个新西兰旅这时已来增援西部沙漠军，于是英军大胆地继续进军。1月4日和22日，先后攻占有重兵把守的巴尔迪亚和托卜鲁克两个设防港口，共俘虏敌军七万五千名，缴获大炮七百门。英军的这些胜利使得意大利在昔兰尼加的兵力减少到只有一个步兵师和一个装甲大队，这支军队撤退到德尔纳—默希利一线，控制了绿山山区和通向沿海基地班加西的公路。1月30日，意军有进一步撤退的迹象，奥康纳将军命令第七装甲师穿过绿山以南开阔的沙漠，阻击敌人撤退。从2月4日到5日，这支装甲部队行军二十九小时，通过一百五十英里的茫茫沙漠，于2月5日晚上在班加西以南八十英里的贝达·福姆截住了意大利第十集团军的残部。接着是一场大战，但是意军向南的退路已完全被切断，到7日早晨，贝尔贡佐利将军带了二万军队、一百二十辆坦克和一百九十门大炮投降。第一次利比亚战役结

束了。

但是，这一成功的战役，结局却是不幸的。意大利第十集团军在昔兰尼加的覆灭，给韦维尔的西部沙漠军打开了通向的黎波里之路。韦维尔要不是在这个当口奉令带着一支大规模的分遣队转移到希腊去，无疑是要加紧西进的。希特勒立刻来援救战败的意大利人；将一个德国装甲师和一个摩托化师的非洲兵团，以及一支类似编制的意大利分遣队，交由隆美尔中将指挥，2月半在的黎波里登陆，开赴昔兰尼加边境。这不是临时的增援。希特勒在1月份早就决定插手利比亚，非洲兵团的官兵是经过挑选的，而且迅速地接受了沙漠战的战术和技术训练。

3月底，改由尼姆中将指挥的西部沙漠军，包括一个装甲师和一个澳大利亚步兵师，在昔兰尼加整编，并广泛地分散在奥格拉、班加西和托卜鲁克之间。隆美尔于3月31日进行奇袭，迅速冲过绿山南面的沙漠，正如两个月以前奥康纳将军的装甲部队所干的那样。溃退的英国装甲部队被追上，三个将级军官被俘（包括奥康纳将军和尼姆将军），澳大利亚第九师被迫退入托卜鲁克，该城于4月11日被围。隆美尔把西部沙漠军（除了驻防托卜鲁克的孤军以外）赶出了昔兰尼加之后，进军到埃及边境的塞卢姆。

第八章解放阿比西尼亚 1941年1月至5月

韦维尔将军在开始西迪巴拉尼攻势之前，把他在苏丹和东非的两个司令官（普拉特少将和坎宁安中将）召集到开罗，指令他们对大大处于优势的驻在意属东非的二十二万敌军发动进攻。12月12日，紧接西迪巴拉尼战斗之后，韦维尔把印度第四师从西部沙漠调到莎丹，和印度第五师会合。普拉特将军将鼓动阿比西尼亚起义，他将从喀土穆方面向东进军去收复厄立特里亚边境上在7月间被意大利占领的卡萨拉，而坎宁安将军则率领南非第一师和非洲第十一、第十二师从肯尼亚侵入意属索马里亚。

1941年1月中旬，意大利军队撤出卡萨拉向东退却。普拉特立刻进军，至1月31日在阿戈达特打败敌军，并追击到敌方固守的克仑峡谷。

向南一千英里，坎宁安于1月24日自肯尼亚东北部进军，攻克基斯马尤，2月18日渡过朱巴河。意军仓皇北撤，坎宁安于2月25日占领摩加迪沙，发现那里有大量石油储备，之后，他又紧紧追击敌军到阿比西尼亚境内，于3月25日到达更北一千英里的哈拉尔。坎宁安由此挥军向西，渡过阿瓦什河险峻的峡谷，于4月4日进占亚的斯亚贝巴，俘虏五万多人。

同时，在厄立特里亚的普拉特，于3月3日攻占克仑的坚强防地，4月1日占领阿斯马拉。4月4日，他占领红海边上的马萨瓦港。奥斯塔公爵带着残余部队退至安巴·阿拉吉丛山，然而坎宁安和普拉特自南北两面进军夹攻，逼得他于5月18日投降。

第九章巴尔干战役和德军占领克里特岛 1940年10月28日至1941年5月31日

1940年10月28日，驻在阿尔巴尼亚的意大利军队无故挑衅，侵占了希腊的埃皮鲁斯省，同时向雅典的希腊政府发出了最后通牒。意大利部队在各个地点都被击退，希腊军队进行反击，深入到阿尔巴尼亚领土。希腊政府要求英国政府实践它在1939年4月作出的保证，但是，英国除了派遣一个军事代表团和几中队皇家空军以外，暂时无法提供什么实际的援助。11月1日，英国地中海舰队应希腊政府的请求，进占苏达湾，这是克里特岛最佳的停泊处。11月11日，英国海军飞机攻击在塔兰托港湾的意大利战斗舰队，使三艘战列舰和一艘巡洋舰失去战斗力。

希腊军队在阿尔巴尼亚边境证明自己显然比意大利侵略者高明，11月22日，希军攻占科尔察。到12月底，沿整个前线，希军把意军赶到离边境三十英里，意军伤亡三万人。由于阿尔巴尼亚自然条件很差和交通困难，战事终于停下。

墨索里尼在无故进攻希腊之前，并没有非常周密地和他的轴心国伙伴商量过，可是他的这一行动，却吸引了希特勒对巴尔干战场的注意力。在1940年10月和11月间，德国和平占领了匈牙利和罗马尼亚，部分是为了先发制人以防止俄国作任何进一步的侵犯，部分是为了控制油井的产品。1941年的头几个月，德国对保加利亚如法炮制，后者在2月间被德国军队渗入以后，于3月1日就加入了三国公约。然后德国对南斯拉夫施加政治压力，南斯拉夫的摄政保罗亲王于3月24日加入三国公约。可是三天以后，发生了一次军队哗变，否定了这一行动，4月6日，占领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的德军同时侵入南斯拉夫和希腊，并对贝尔格莱德发动了猛烈的空袭。

希腊政府焦虑地注视着德国先后渗入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因为希腊有十四个师正在阿尔巴尼亚牵制意大利的二十八个师，这时大部分都处于被德军迂回包围的威胁中。2月8日，希腊政府要求英国帮助，于是英国命令当时已经占领德尔纳和班加西的韦维尔将军，派一支远征军到希腊。从盟军在中东可动用的兵力中，匆匆组织了一支五万八千人的军队，其中包括三个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师，一个英国装甲旅和一个波兰旅，于3月7日开始在比雷埃夫斯登陆。整个这支军队从3月4日到4月24日，由英国地中海舰队从埃及各港口经地中海运送，没有损失一个人。

然而这支援兵太少了，而且到得也太晚，灾难未能避免。

在2月间开始出现德国对希腊的威胁时，英、希两国的总参谋部曾考虑在希腊北部有三条防线可供选择。第一条防线是沿着罗多彼山脊的希腊—保加利亚边界的防线。第二条是掩护萨洛尼卡的斯特鲁马河防线；第三条防线是奥林匹斯山以北的阿利亚克蒙河。韦维尔赞成据守第三条防线，或者说是后卫防线，因为这条防线短得多，和可以使用的兵力更相称；而且这条防线还不易于受到德军通过希腊—塞尔维亚边境的莫纳斯提尔隘口进行迂回袭击。不幸的是，希军总司令帕帕戈斯将军出于政治上的理由，坚决主张以在马其顿可动用的不多几个希腊师据守前方的“梅塔克萨斯防线”。在这几个师的后面，有部署在瓦尔达尔河流域以西山区的另外三个希腊师和威尔逊将军（后为威尔逊勋爵陆军元帅）指挥的英国军队。

指挥德国第十二集团军的陆军元帅利斯特利用了希腊这一兵力分散的形

势。他于4月6日进军，沿斯特鲁马河流域而下，在鲁佩尔山口突破希腊防线，两天后打到萨洛尼卡。同时装甲部队从老塞尔维亚突入莫纳斯提尔隘口的一些山关，攻进希腊北部，迫使盟军后撤到阿利亚克蒙河一线。威尔逊将军的左翼被包抄。他决定把部队更向南撤退一百英里至塞尔莫皮莱山口，但是这一撤退暴露了驻在埃波鲁斯和阿尔巴尼亚的面对意军的希军右翼，4月21日，这支希军被迫投降。英军除了尽快从希腊撤出，别无他法。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任务。因为，4月7日，一艘停泊在比雷埃夫斯港口的弹药船遭到空袭，发生毁灭性的爆炸，已使这个港口无法再使用，于是部队只好在敌人频繁的空袭下通过狭窄的山口南撤。4月26日，一支德国部队在科林思地峡空降，占领了科林思运河上唯一的一座桥梁，而使英军撤退更加困难。英军不得不在夜里从雅典东西两面没有掩蔽的海滩，诸如拉夫蒂港和梅加腊，或者从希腊南部一些小港，诸如卡拉马塔和纳夫普利翁上船。英国海军通过这些途径，从4月24日到5月11日，撤走了大约四万三千名官兵。德军于4月27日进占雅典。

从希腊撤退的一部分军队调到克里特岛，英国有一小支部队已于1940年11月1日在该岛登陆，1941年4月30日，该岛的防务交由指挥新西兰师的弗赖伯格少将负责。岛上已经建造了三个飞机场，彼此相距八十到一百英里，而且超出了从埃及来支援的战斗机航程范围，因此受到希腊本土德国空军战斗机和驻扎在多德卡尼斯群岛的意大利空军战斗机的袭击。于是在5月19日，英国把所有的飞机都从克里特岛撤出。

德国人已经计划好在克里特岛空降，5月20日早晨予以执行。当天有七千多名德军乘降落伞和滑翔机着陆，大部分降落在该岛西端附近的马莱梅机场周围。接着两个晚上，德国人试图从海上登陆，但被英国皇家海军击退，受到严重损失。到26日，已有大约二万名德军空降着陆，三个机场全部落入德国人手中。27日，弗赖伯格鉴于制空权完全为敌人所掌握，决定撤退他的部队，从5月28日到6月1日，二万八千名守军中有一万四千多人撤退到埃及。

第十章德军入侵俄国 1941年6月22日至12月5日

希特勒在1940年12月就决定发动一次征服俄国的战役，这次战役的作战计划代号为“巴巴罗萨”，到1941年2月底已拟订好，不过他的那些军事指挥官对之仍然有点怀疑。这个计划的主要目标是到达列宁格勒—莫斯科—伏尔加下游一线，这样，德国除了能控制波罗的海和黑海外，还能得到乌克兰的谷地，顿涅茨盆地的煤和锰，以及高加索的油田。希特勒由于在波兰、法国和巴尔干国家运用闪电战术得手，深信如在初夏发动攻击，在俄罗斯的冬天来到之前就能达到目的。希特勒原来打算在5月15日开始进攻，但是由于英国对希腊的干涉，使进攻推迟到6月22日。

这次进攻采取了和1939年9月对波兰成功地使用的战略战术大致相同。但是1941年6月22日进攻时所使用的兵力在数量上比那次超过一倍以上（那次是五十二个师，这次是一百三十个师）；除了冯·包克陆军元帅和冯·伦斯德陆军元帅指挥的两个集团军群以外，又新加了一个北方集团军群，由里特尔·冯·莱布陆军元帅指挥，20直指波罗的海沿岸诸省和列宁格勒。这一年早些时候占领罗马尼亚直到普鲁特河一线后，使南方集团军群（冯·伦斯德）能够迂回绕过喀尔巴阡山这道屏障。每一集团军群都配有大队的飞机支援。

面对这一大群令人可畏的集团军，俄国人最初只能调动约一百个师的兵力，也组成了三个集团军群，由伏罗希洛夫元帅、铁木辛哥元帅和布琼尼元帅指挥。对付二千七百架到三千架德国飞机，俄国人只能出动约一千五百架飞机投入空战。

一开始，德军的进攻是按照计划进行的，特别是在北方战区。一星期之内，冯·莱布占领了里加，冯·包克占领了明斯克。到7月中旬，冯·包克已经推进五百英里，正在逼近斯摩棱斯克。南方的进军速度稍慢。冯·伦斯德的军队自西面和西南向基辅集中进攻，遇到猛烈的抵抗一直到8月中旬才抵达敖德萨和尼古拉耶夫。俄国人没有重犯波兰人把大量军队部署在前线的错误。由于缺乏良好的公路和必须变换俄国铁路系统的轨距，也耽误了德国的供应部队和火车。9月上半月，展开了这一战役的主要战斗。中央集团军群的古德里安装甲集团军，与南方集团军群的冯·克莱斯特装甲集团军在洛克维查会师，完成了对基辅的包围。于是俄国人放弃了第聂伯河战线，到10月底，冯·伦斯德已到达了塔甘罗格—哈尔科夫—库尔斯克一线。

在极北方，冯·莱布在9月中旬就进入到可以进击列宁格勒的距离之内，但是，要攻入这个城市的一切企图都失败了。中路的战斗则更加激烈。从7月中旬到10月初，冯·包克一直被阻在斯摩棱斯克。经过大大的增援后，他倾全力向莫斯科发动猛攻，到10月15日已进至离这个首都不到六十五英里的莫扎伊斯克。德军虽作了巨大的努力，想南北夹击吃掉莫斯科，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从莫扎伊斯克前进一步。朱可夫元帅这时指挥着莫斯科前线，因为基辅失陷以后，铁木辛哥元帅已接替布琼尼在南方战区的职务去了。在南方战区，冯·曼施泰因在11月初就已攻占彼列科普地峡，侵入克里米亚；22日，冯·克莱斯特的装甲集团军占领顿河沿岸的罗斯托夫。但是在这里，德军的攻势又成了强弩之末。俄国人留有充分的后备军，以保持他们一千英里长的战线完整无损，11月20日，俄国的冬季就来到了，比通常要早三个星期。到了12月5日，德国人的攻势显然已以双方僵持而告终，主要目标没有达到，尽管他们已占领了大片苏联领土，红军仅仅被俘损失的人数就达一百

万以上。

第二编瓜分东北欧 1939 年 9 月至 1940 年 8 月

第一章 21 波兰 V·M·托因比

第一节 德国和苏联瓜分波兰

1939年8月23日在莫斯科签字的德苏互不侵犯条约0附带有秘密附属议定书，记载了里宾特洛甫和他的东道主就德苏在东欧势力范围的分界线问题举行“绝密会谈”的结果。议定书对于分属于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的地区万一发生“领土和政治变动”时作好准备。在波罗的海国家方面，立陶宛的北方边界将是两个势力范围的分界线，这就是说：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分给俄国，而立陶宛分给德国。双方同意（据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说，这是他主动提出的）维尔纽斯应被认为是立陶宛的一部分；在议定书的条文中，双方承认“立陶宛在维尔纽斯地方的利益”，虽然这片地方的界线没有划定。在波兰，分界线大致是沿着“纳雷夫河、维斯杜拉河和桑河一线”。

22 里宾特洛甫和俄国的领导人还讨论了在根据协议瓜分波兰以后，保持残存的波兰国家的问题。德国人在征服波兰以后，有一段时期继续打着这个主意，在这一阶段，斯大林似乎也赞成有这种可能性。8月间在莫斯科会谈时，对于“保持一个独立的波兰就双方的利益来说是否需要，以及这个国家的边界该如何划定”这个问题，没有作出结论。议定书中是这样说的，这个问题“只是在政治情况进一步发展过程中才能明确规定”，不过两国政府表明了它们的意图，无论如何要以“友好的谅解”来解决这一问题。

当代的西方观察家在评述1939年波兰被瓜分时，既不知道8月23日有一个秘密议定书，也忘记了希特勒在他那本成为纳粹德国圣经的书中发表的对付俄国的长远计划，他们总认为，由于波兰有很大一部分领土，包括某些最有价值的财富，落入俄国人手中，因而纳粹一定大为不安和不满。事实上，根据战后公布的德国外交文件来看，德国政府与苏联政府达成交易后，主要关心的似乎倒是怕俄国人不去分他们的那份赃物，而使德国人处于尴尬的地位。德军开始进入波兰两天以后，里宾特洛甫就已开始催促俄国人在他们的一边进军了。里宾特洛甫在9月3日晚间发给驻莫斯科的德国大使舒伦堡的一份“特急电”和“绝密电”中，指示他立刻和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讨论俄国介入的问题。

我们确切指望〔里宾特洛甫说〕在几个星期内决定性地打败波兰军队。然后我们要以军事占领来保住在莫斯科时规定为德国利益范围的那部分领土。然而，为了军事上的理由，我们自然也不得不对当时驻在属于俄国利益范围的波兰领土上的波兰武装力量继续采取行动。

因此舒伦堡追问，“要俄国军队在适当的时候采取行动，去对付在其利益范围内的波兰军队并占领这块地方，苏联是否并不认为是可取的”。照里宾特洛甫的意见，这不仅是为了让德国人安心，而且也是“符合莫斯科协议的意义和苏联利益的”。

23 舒伦堡日益急迫地追问苏联政府的意图，莫洛托夫避而不作出肯定的答复，拖延了十天。9月5日，莫洛托夫认为“具体行动”的时间还没有来到，“操之过急”，可能“促进对手的团结”。9日，他提出希望在几天之内行动，但是第二天又收回了这句话，他解释说，苏联政府“对于德国在军事上的意想不到的迅速成就，感到十分惊讶”，并预告舒伦堡说，红军可能再需要两三个星期才能完成准备工作。14日，莫洛托夫转告舒伦堡说，红军的准备工作比预期的要快，不过他又说，他的政府出于政治上的原因，想等

到华沙陷落后再说。里宾特洛甫在 15 日答复说，预计不出几天，就可占领华沙。他欢迎苏联政府表示“将在军事上插手，并且现在就打算开始军事行动”。这样可以免得德国人“必须一直追到俄国边境去消灭波军残部”，还可以防止在德国势力范围以东的地区出现政治真空的危险——在这些地区，德国人“无意进行任何政治的或行政的活动”。16 日，舒伦堡按照里宾特洛甫的指示，明确要求苏联政府“现在就定一个开始出兵的日期和时刻”，对此莫洛托夫回答说，“即将”进行干涉。到 17 日凌晨 2 时，斯大林才当着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的面，正式通知舒伦堡，红军四小时后将“沿着波洛茨克到卡美涅茨一波多尔斯基全线”（即从俄国、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交界点到罗马尼亚边境）开出国境。苏联政府对于保证采取军事行动之所以抱犹豫态度，似乎不仅由于需要时间去完成准备工作（如果这的确不革是一个借口的话），而且也由于想找一个体面的借口去进行干涉。9 月 10 日，莫洛托夫告诉舒伦堡说，苏联政府已打算乘德国继续进军的机会，宣布波兰正在土崩瓦解，因此苏联必须援救受到德国“威胁”的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这种说法可以使苏联的干涉在群众面前师出有名，同时使苏联不暴露出侵略者的形象。

俄国人想借口德国威胁在波兰的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作为他们干涉的动机，这种主意德国政府自然是不喜欢的。“指定这样一种动机 [里宾特洛甫 9 月 15 日打电报给舒伦堡说]，要实行起来的确是完全不可能的。这将直接违反德国的本意，德国的本意仅仅限于谋求尽人皆知的与德国生死攸关的利益。”反过来，里宾特洛甫建议，为了“在政治上支持苏联出兵”，发表一个德苏联合公报，声明：鉴于以前那种形式的波兰政府已经垮台，德国政府和苏联政府认为，在那些与它们的利益当然有关的地区恢复和平与秩序，乃是它们共同的责任。9 月 16 日，舒伦堡把这一电文交给莫洛托夫，莫洛托夫毫不让步。他告诉德国大使，苏联政府打算采取这样的方针：等到波兰国家不复存在，因而同波兰缔结的一切协定也归于无效，那时第三方面的国家可能会利用出现的混乱局面，浑水摸鱼；苏联政府乃认为有责任进行干预，以保护它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同胞”。莫洛托夫承认，“苏联政府提出的理由，含有刺激德国人感情的口气”，但是他要求，“鉴于苏联政府的困难处境”，德国人不要对这点小事介意。苏联政府“不幸实在看不出有可能找到其他任何理由，因为苏联以前从来没有为它居住在波兰的少数民族同胞的困境操心，目前的干涉，对外界总得找个借口，以言之成理”。莫洛托夫说，苏联政府打算等红军一出国境，就立刻利用这些理由在广播中和报刊上做文章（事实上，苏联政府已经在开始制造理由了，9 月 14 日的《真理报》和 15 日的《消息报》上，都有文章痛斥波兰人压迫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苏联政府还将发同样内容的照会 25 给波兰大使和全体驻莫斯科的外交使节。

德国政府不能阻止苏联政府对本国人民作它所要作的宣传，9 月 17 日早晨，莫洛托夫通过广播告诉俄国人民，红军已经进入波兰，莫洛托夫的广播同以及当天在全国各地召开的会议上的发言和决议，其基调都是“援救我们被压迫的同胞”。不过舒伦堡还是使苏联政府对它给波兰大使的照会作了某些修改。17 日凌晨，斯大林在接见德国大使时，宣读了这一照会的草稿，当大使提出三点异议时，“斯大林非常愿意修改其内容，这才使这份照会似乎能令人满意了。”这份修改过的照会于当天递交波兰大使，并分发给所有其他各国的外交使节。另一方面，德国政府接受了斯大林提出的联合公报的草

稿，这份公报于 18 日晚间在德俄两国的电台上广播，内容如下：

为了防止对于德苏军队各自在波兰作战的目的产生种种无稽的谣言，德国政府和苏联政府声明，德苏军队的活动并不含有任何违反德苏两国利益的目的或违反德苏两国缔结的互不侵犯条约的精神和条文的目的。相反，德苏军队的目的，是要在波兰恢复由于波兰国家的瓦解而遭到破坏的和平与秩序，同时帮助波兰人民创造新的政治生活条件。

苏联政府认识到，如果等到德军继续前进，一直前进到使居住在波兰东部诸省的乌克兰人与白俄罗斯人感到需要俄国的保护时，苏联政府再向本国人民和全世界证明自己的军事干涉是师出有名，工作固然要容易做一些，不过苏联政府又担心，德军一旦越过 8 月 23 日划定的德俄两国势力范围的分界线以后，德国的军事领导人不愿意从已占领的俄国一侧的土地上撤退。俄国人出兵以前，在舒伦堡与莫洛托夫的会谈中，这个问题已提出过不止一次，德国人欲消除俄国人的疑虑，一再保证，他们将严格按照在莫斯科达成的交易行事。然而，俄国人还是不相信。18 日，当舒伦堡在和斯大林讨论发表一项联合公报时，斯大林说：“多少有点突然，在苏联方面，还有某些怀疑，不知道德国统帅部届时是否会把军队……撤退到已经商定的一线（皮萨河—纳雷夫河—维斯杜拉河—桑河）。”舒伦堡提到他已经对莫洛托夫作过保证，并且指出，德军撤退到商定的界线是符合德国利益的，“因为这样做可以把部队用于西线”。斯大林回答说，他并不怀疑德国政府是有信用的，不过“凡是军人都不愿放弃已占领的土地，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于是德国大使馆武官“插嘴说，德国军队完全按照元首的命令行事”。在这次会见以后，舒伦堡请求里宾特洛甫，“有鉴于斯大林出名的猜疑态度”，授权他“再发表一个这种性质的声明，以消除斯大林最后的疑虑”。19 日，里宾特洛甫指示舒伦堡通知斯大林，说德国外交部长已“明确命令”他告知斯大林，由元首授权在莫斯科达成的协议“当然要予以遵守”，这些协议被认为是“德苏之间新的友好关系的奠基石”。

结果，俄国对于德国可能不遵守协议的怀疑证明是没有根据的。在俄国开始出兵的两三天内，在比亚威斯 27 托克的一次会议上协调了德俄两国的军事行动，凡是德国部队在某些地区已经越过 8 月 23 日议定书所规定的分界线，深入一百五十英里或一百五十英里以上的，立刻开始撤退到四条河流的分界线。

9 月 17 日清晨，俄国以大批装备精良的部队开始侵入波兰，几乎不曾遇到什么抵抗，在一个星期之内挺进了大约一百五十英里——差不多到了寇松线。驻在东部各省的波军在 9 月的第三周中溃不成军，俄国人的进攻完全出乎波军的意外。俄国人散发的传单上印有德军进攻范围的地图，以涣散波军的士气，入侵者还造谣说，他们是来打德国人，而不是来打波兰人的。最重要的是，他们能指靠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大力合作，这些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波兰东部各省的人口口中形成多数。

因此，从军事观点来看，俄国人的任务很轻松，但是在他们那条线的最北面一段，政治形势错综复杂，使他们不得不谨慎行动。我们已经知道，8 月 23 日的秘密议定书对维尔纽斯地区没有划定德苏利益范围的分界线。9 月 16 日，俄国入侵波兰的前夕，莫洛托夫急切地询问舒伦堡，“是否已和立陶宛就维尔纽斯地区，特别是谁将去占领这个城市的问题，达成某种协议”。他说，苏联政府“绝对要避免和立陶宛冲突”。德国人对这一询问如何回答，

没有资料可查。但在 9 月 18 日，俄国军队进入了维尔纽斯城。

9 月 19 日，科夫诺的半官方广播声称维尔纽斯是立陶宛合法的首都，同一天，莫洛托夫与立陶宛公使会晤以后，在莫斯科发表了一项声明，说苏联的目标只是占领波兰统辖的白俄罗斯部分和乌克兰部分。苏联政府亟欲避免与立陶宛冲突，其原因不久就清楚了。9 月 19 日，舒伦堡得到通知说，苏联政府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可以“和德国政府共同明确地建立波兰的地方组织了”，并且希望立刻就此问题在莫斯科进行谈判。斯大林不再想赞成“残余波兰的存在了”，他建议，波兰领土应绝对沿 8 月 23 日规定的分界线划分。23 日，里宾特洛甫接受邀请参加第二次莫斯科会议，表示沿着四条河流来划分的办法，“大体上”符合他的政府的观点。然后斯大林更加明确地摊了牌。他于 9 月 25 日晚上接见舒伦堡时，提出建议，要德国放弃对立陶宛的要求，以换取卢布林省以及整个华沙省一直东至布格河的领土，以此作为讨论的基础。他暗示，残余的波兰国家的存在，将来可能在德苏两国之间产生摩擦。如果德国接受他的建议，苏联将“立刻根据 8 月 23 日的议定书解决波罗的海国家的问题，希望在这件事上德国政府慨然给予支持”。

里宾特洛甫第二次访问莫斯科从 9 月 27 日晚上一直待到 29 日中午。这次会议缔结的德苏“边界和友好条约”，签署的日期是 9 月 28 日，但是里宾特洛甫和莫洛托夫实际上是在 29 日上午五时签字的。

条约规定：在“以前的波兰国家领土之内”，德苏双方的“各自国家利益”的分界线将在所附议定书中详细说明，双方承认这一分界线是确定不变的；这一解决办法应被认为是德俄两国人民之间“友好关系向前发展的坚实基础”；不容许“第三方面的任何干涉”。在一项秘密议定书中，苏联政府保证，对于要从其辖区内迁移走的德侨或德国血统的人将不加阻挠，而德国政府则对其辖区内的乌克兰人或白俄罗斯人，也承担同样的义务。此外还有两个秘密议定书，一个规定各方都必须镇压任何影响对方领土的波兰人的骚乱，另一个是按照 9 月 25 日斯大林的建议，修改 8 月 23 日秘密议定书的条款，将立陶宛与卢布林省以及华沙省的一部分交换。与此同时，必然还作出了规定，或者达成了谅解，认为（苏瓦乌基那小块地区）（在东普鲁士与立陶宛之间）也应该从俄国改划到瓜分波兰的分界线的德国一侧，因为议定书还规定，一旦苏联政府“在立陶宛领土上采取特别措施以维护其利益”时，就应该在先前的立陶宛—波兰边界线的最西北一段上，稍微作一点对德国有利的调整，就是把原先为波兰领土的苏瓦乌基那小块地区扩大一些。最后，两国外长签署了一项声明，目的在按照德国政府的意图去说服西方国家接受在波兰的既成事实。

9 月 28 日双方在莫斯科同意的分界线，自立陶宛—波兰边界的南端起，向西延至奥古斯托夫以北的东普鲁士边界（从而把苏瓦乌基那小块地区改划入分界线的德国一侧）。然后分界线沿东普鲁士边界到皮萨河，再沿皮萨河和纳雷夫河到奥斯特罗伦卡，然后向东南延伸至努尔与布格河相会合。再沿布格河向东南，直到克里斯特诺波尔，由此转向西，到达普热米什耳以北的桑河，然后沿着蜿蜒曲折的桑河延伸至斯洛伐克与喀尔巴阡山的卢西尼亚交界的地方。

新的瓜分线的最南面一段和 8 月 23 日所划的那条线是一样的。因此苏联政府保有了利沃夫及其制糖和 30 纺织工业，以及大约百分之八十的油用，包括德罗霍贝什和博雷斯拉夫的油井，这是两次大战之间波兰产油最多的地

方。沿桑河来划分，还使俄国与匈牙利有了一个共同的边界（匈牙利这时占领了喀尔巴阡—卢西尼亚），并可以防止德国和罗马尼亚建立直接的联系。更北面一些，这条线向东移，使德国控制了几乎整个维斯杜拉河流域，也控制了整个华沙（根据 8 月 23 日的协议，俄国可以占领维斯杜拉河东岸的普腊加郊区）。在苏瓦乌基地区突出部分）德国获得了若干有价值的农田。

从民族学上说，9 月 28 日的分界线比 8 月 23 日的分界线合理一些。又有大片纯粹或者主要由波兰人居住的地区（包括约有三百万波兰居民的卢布林省）归于德国，而差不多所有白俄罗斯人或乌克兰人占多数的地区还是归于俄国。第二次的分界线——第一次也是这样——与波兰人在居民中占多数的那些地区的东边界线（即寇松线）有显然的不同，不同之处在于，修改后的分界线，仍然把纳雷夫河上游左岸以东波兰人居住的地区划给了俄国。按照英周砌估计，俄国占有寇松线以西的土地，约有八千平方英里。

占领苏瓦乌基地区突出部分的俄国军队已经在 10 月的第一个星期内撤退，10 月 14 日，德国最高统帅部宣布，划归德国的全部领土已由德国军队占领。在这期间，10 月 4 日签订了一份议定书，规定为划定地面界线而成立一个德苏委员会。委员会立即开始工作，分界工作在 1940 年 2 月底完成。分界线全长九百英里，其中有三分之二是沿着河流的，而在“旱地”上，则用界桩明确标出一条十五英尺宽的分界地带。有些地方的分界线要经过原始森林，就用电锯在林间开出一条道路。据报纸报道，在河流和界桩后面，分界线的两边立刻开始筑起了防御工事。

31

第二节 苏联把占领的土地并入版图

1939 年 9 月 28 日的德苏协议规定了德苏两国在波兰占领区的分界线，在该协议签字后五个星期内，德国把占领的大部分土地并入德国的版图，俄国则把占领的全部土地并入俄国的版图。德国占领区内的行政机构在本丛书另一卷中加以叙述；这里只是简略地叙述两次大战之间波兰东部各省的几百万居民变成苏联公民的过程。

根据 1939 年 9 月 28 日德苏协议划归苏联的波兰各省，由占领当局组成两大行政区：西乌克兰（大致相当于东加利西亚和沃林）和西白俄罗斯（包括普里皮亚特沼地，格罗德诺整个省，以及维尔纽斯地区中没有交给立陶宛的那些部分）。

当红军于 1939 年 9 月 17 日开始侵入波兰时，铁木辛哥将军是南方战区的最高指挥员，北方是科瓦列夫将军。最初，由军事委员会管理占领区，但尽快地在每个区建立起临时行政机构，南方的行政中心是利沃夫，北方是比亚威斯托克。这些临时行政机构的成员包括当地居民和红军军官以及俄国的政治委员。城市成立了工人纠察队，农村成立了村苏维埃和保卫委员会。

10 月 7 日，临时行政机构发出公告，号召人民选举国民议会。成立了委员会来进行必要的准备工作和监督实际选举。在西乌克兰，选举委员会的委员绝大多数是利沃夫市和利沃夫地区推举的，但是也有两个委员是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派来的；而在西白俄罗斯，选举委员会成员之一是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

选举定在 10 月 22 日举行，在选举前的两个星期内展开了宣传运动。苏联两个占领区的宣传工作，遵循了完全一样的方针，其目的是要获得人们对四点要求的支持，这四点作为居民的“要求”提出和通知全体候选人 32

的。四点要求是：（1）在以前的波兰领土上建立苏维埃政权；（2）西乌克兰并入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西白俄罗斯并入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3）没收大地产；（4）银行和大工业收归国有。

选举程序是按苏联的模式进行的：就是，十八岁以上的居民普遍有选举权，无记名投票，总而言之是有名无实的。然而选出的代表与居民的比例大约是一比五千，在苏联则是一比三十万。实际上，象在苏联一样，每一个选区只能有一个候选人，因此主要关心的是对候选人的提名，而不是实际的选举。

在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候选人大多数是农民，产业工人和知识分子寥寥可数。不出所料，波兰人在两个地区都是极少数；波兰血统的候选人，在乌克兰占百分之二十七，在白俄罗斯占百分之十三。在候选人中，俄罗斯人的百分比很小。

根据苏联官方数字，在选举那一天（1939年10月22日），西马克兰选出一千四百九十五名候选人，西白俄罗斯选出九百二十七名候选人；在西乌克兰，大约四百五十万选民中据说有百分之九十二点八三投了票，而在西白俄罗斯的数字，则是二百五十多万选民中有百分之九十六点七投了票。在乌克兰有四十万张票，在白俄罗斯差不多有二十五万张票，是反对候选人的，换句话说就是无效的：在乌克兰有十一个区必须进行第二次选举，因为那里的候选人未能得到绝对多数的选票。据说反对票数目最多的是比亚威斯托克省，这个省在苏联占领区中波兰人口比例最大，这似乎表明俄国报纸声称选举是自由和“民主”的说法，并非完全虚构。

10月22日选出了两个占领区的国民议会，10月26日到30日，两个国民议会分别在利沃夫和比亚威斯托克召开议会，按照人们的期望和根据选举运动的“要求”通过了四项宣言，这样就决定了它们所代表的地方应当并入苏联。最后一幕戏于11月1日在莫斯科上演，西乌克兰的四十三名代表和西白俄罗斯的四十名代表出席了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五次（特别）会议，会议通过一项法令，批准两个占领区并入苏联，立即生效。新并入的地区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代表，以及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两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最高苏维埃的代表，到以后在1940年3月24日选举时产生。

第三节 波兰流亡政府

1939年9月1日德军开始迅速攻入波兰和德国空军对华沙狂轰滥炸后，波兰政府已无法再留在首都，到了9月的第一个周末，莫希齐茨基总统和他的阁僚们已迁到了卢布林。他们在那个城市只作了短暂的停留，后来又在普里皮亚特沼地中的卢茨克稍稍耽搁，于9月14日到达毗连罗马尼亚边界的扎列斯基。9月17日早晨，总统听到红军越过俄波边界，就决定离开波兰。17日晚上，他和那些仍然留在国内的部长们从库特越过国境到了罗马尼亚。

大多数派驻波兰的外交代表，包括英法大使，都跟着波兰政府在波兰转移，在总统离开波兰后几个小时以内，也都出了波兰国境。9月18日，波兰驻伦敦和巴黎的大使在一份正式指控苏联侵略的照会中，声言保留政府“呼吁盟国根据有效的条约而承担起义务”的权利。19日，英国政府就时局发表了一个官方声明，宣称“根据苏联政府提出的理由”，不能认为苏联的进攻“是有理的”。不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能“丝毫改变政府的决心，在全国的全力支持下，去履行对波兰的义务，全力以赴，进行战争，直到达到目的为止”。9月20日，首相在下院重复了这一声明，同一天，法国政府作了

不很明确的公开保证，表示继续支持波兰。

9月17日，莫希齐茨基总统在越过国境以前，发表了一项声明，宣布“为了保护共和国的象征和保护宪法权力的泉源”，他已决定离开波兰，并且宣布他将在某个可以保证政府行使主权的地区建立行政中心，政府从那里可以关注共和国的利益。在这一阶段，莫希齐茨基总统显然打算把政府迁到巴黎。他们这时正以难民的身分进入罗马尼亚，总统希望罗马尼亚政府能尊重它与波兰的同盟，准许他偕同阁僚们从罗马尼亚离境。

然而罗马尼亚政府立刻受到德国的强大压力，要它拘留波兰领导人，波兰的西方盟国也提出相反的建议，但毫无效果。9月20日，布加勒斯特宣布，将照德国的要求把斯米格莱-雷兹拘留在罗马尼亚直到战争结束。同时罗马尼亚公安当局宣布，只有不是政府官员的平民难民才能获准离开罗马尼亚。莫希齐茨基进入罗马尼亚不到一个星期，就放弃了在法国重建政府的希望，并决定，必须采取其他措施以保证维持波兰共和国的主权。

1935年4月23日的波兰共和国宪法规定，如果发生战争，总统应当指定一个继承人，一旦总统亡故或者无法行使职权时，继承人便当立刻就职。看来，当德国一进攻波兰，莫希齐茨基总统就执行了这一条规定，指定已经名列波兰第二号人物的斯米格莱-雷兹元帅为继承人。然而，当时这一指定不能发生效力，因为斯米格莱-雷兹象莫希齐茨基一样，也无法执行国家元首的职责。

9月29日，在巴黎出版的波兰官方报纸《波兰箴言报》发布一项命令，根据宪法，指定这时在巴黎的波兰参议院前任议长瓦迪斯瓦夫·拉奇基那维奇为莫希齐茨基的继承人，并宣布莫希齐茨基自9月30日起辞职。这项命令有莫希齐茨基的签字，日期是1939年9月17日，签署的地点在库特。鉴于各种情况，特别是上述莫希齐茨基9月17日的文告，看来德国人断言那个命令倒填日期，断言莫希齐茨基到罗马尼亚政治避难之前并没有把政权交出，这些判断大概是正确的。

9月30日，拉奇基那维奇在巴黎的波兰大使馆宣誓就任波兰共和国总统，并立即任命了一个新政府。西科斯基将军同意担任总理。各部部长的人选，目的在使内阁能代表各种不同的政治见解和各阶层的人民。新政权立刻获得了波兰的西方盟国的正式承认，也获得了华盛顿的正式承认，美国国务卿10月2日宣布，美国政府打算同巴黎的波兰政府保持外交关系。10月底，波兰政府决定从巴黎迁到昂热，并宣布曾在华沙派驻外交使节的各国政府（当然除开德苏政府）都将派使节到昂热。

12月间，总统下令成立国民参议会，以对政府提出的问题发表意见。参议员的名额限定二十四人，从各政党内遴选。帕戴赖夫斯基不顾年事已高，还是接受邀请，主持了参议会。参议会的第一次会议在1940年1月23日举行。

波兰流亡政府在成立后的最初几个星期内，公开地否认与战前在华沙实行的政策有关系。在10月和11月的第一个星期内，它发布了一系列命令，宣布凡因反对政府而被判刑的波兰政治领袖一律完全恢复名誉；宣布解除斯米格莱-雷兹的波兰武装部队总司令兼军队总监的职务，任命西科斯基担任此职，宣布解散1935年9月选出的议会上下两院。11月底，拉奇基那维奇对波兰人民广播，答应战后新波兰将尊重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实行社会改革；

几个星期以后，政府公布了西科尔斯基 1940 年 1 月 3 日在内阁会议上作出的声明，宣称波兰战前的政权已遭到全国一致的谴责，它的劣迹无疑乃是波兰战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波兰流亡政府一面这样煞费苦心表明它和过去决裂的立场，一面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以维护波兰共和国的主权和保护它的利益。为了这一目的，它正式抗议德 37 国和苏联并吞波兰领土，它也进行准备，使波兰武装部队能在陆上、海上、空中参加对德作战。

他们在发布命令指定拉奇基那维奇为总统的那天（9 月 29 日），就发表了第一个公开声明，声言保留波兰国家的权利。那大驻伯尔尼的波兰公使发表了一项声明，宣称波兰政府不承认占领波兰领土的国家采取完全不属行政需要的任何行动。9 月 30 日，又向所有与波兰有外交关系的各国政府递交了一份反对 9 月 28 日德苏边界协定的抗议书。10 月间，波兰政府向国际联盟抗议德苏瓜分波兰的安排；向国际联盟及其成员国政府提出抗议，反对把维尔纽斯交给立陶宛；又向法国、英国和美国等政府抗议，反对根据 1939 年 10 月 8 日希特勒的命令把波兰西部各省并入德国。当在俄国占领的土地上举行选举，以及在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国民议会表决把这两个地区并入苏联时，波兰流亡政府又发表声明，声言保留波兰的权利。法英政府没有和波兰政府联合起来抗议 1921 年被波兰勒索去的土地回到苏联手，但是它们同意支持波兰政府的主张，即 1939 年 10 月 8 日德国的命令不能取消波兰国家对其西部各省的权利。1940 年 4 月 17 日，英、法和波兰政府在伦敦和巴黎发表宣言，呼吁“世界上有良心的人正式并公开地抗议德国政府及其代理人在波兰占领区的行为”，宣言除了指出他们对人和对财产犯下的罪行以外，强调德国违反 1907 年的第四次海牙国际公约，当战争还在德国和三个盟国间进行时，德国就把波兰共和国的领土并入德帝国的版图。

在新政权成立之前，已采取一些初步的步骤，在波兰 38 国外重建波兰军队。驻巴黎的波兰大使卢卡谢维奇 9 月 25 日发出命令，号召所有侨居法国或路过法国的适龄的波兰男公民服兵役。两个星期以后，听说住在比利时的波兰侨民即将前往法国参军，在 10 月底前，侨居英国的波兰公民也要应召去法国服兵役。西科尔斯基在 10 月初宣称，重建波兰军队是其政府的首要任务，他将在加拿大安排一次征兵运动。1940 年 1 月 4 日，西科尔斯基和达拉第就在法国重建波兰军队签订了一项协议。协议规定组织几个波兰师（包括炮兵和摩托部队），作为一支独立的军队，由西科尔斯基指挥，在盟军中享有一定的地位。2 月中旬又签订了一项法波补充协议，规定重建波兰空军。

同时，1939 年 11 月 25 日西科尔斯基在伦敦进行正式访问时，就波兰军舰与英国海军合作问题与英国政府缔结协定。三艘驱逐舰（波兰的小规模海军中最新式的军舰）在 8 月底战争开始以前奉派到英国海域；潜水艇“奥泽尔”号在冒险从塔林脱逃以后，于 10 月 14 日也到了英国。到 1940 年 5 月初，可使用的波兰海军人员超过了逃出的舰艇的需要，英国给了一艘驱逐舰供波兰军官和水兵使用。

1940 年 6 月的第三个星期，法国濒于沦陷，波兰流亡政府从昂热迁到伦敦。拉奇基那维奇总统于 6 月 20 日到达英国。他受到国家元首的礼遇，到达时英王前去迎接。根据西科尔斯基和丘吉尔达成的一项协议，把数千名波兰士兵由英国军舰运至英国，使波兰军队能再次重建。这一次是在英国土地上重建军队，继续投入对德战斗。

附录 :关于苏管区和德管区之间人口迁移的俄德 39 协定 1939 年 9 月 28 日、11 月 3 日、1940 年 9 月 5 日

阿诺德·托因比

1939 年 8 月 23 日的德苏协定，把东欧划分成德苏势力范围，其早期后果之一，就是德国和苏联及三个波罗的海国家（这时处在苏联势力之下）谈判订立协定，把在苏联势力范围内的德意志少数民族，迁移到德国势力范围去。在德国和波罗的海国家之间为此目的而达成的协定中，迁移必然是单方面的，因为在德国势力范围内没有波罗的海国家的少数民族可用来交换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的德意志少数民族。德国和波罗的海国家之间签订的这些协定及其后果，将在本卷的另一章中阐述。在 1939 年 9 月 28 日、1939 年 11 月 3 日和 1940 年 9 月 5 日签署的有关德苏协定中，不但规定把苏联势力范围内的德意志少数民族迁移到德国势力范围之内，而且也让德国势力范围内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少数民族有权迁移（换句话说，就是注定要被驱逐）到苏联势力范围内。1939 年 9 月 28 日德苏协定的条文，适用于双方“管辖下”的地区，根据 1939 年 11 月 3 日的协定，这些条文，不仅适用于两次大战期间的波兰领土，而且也适用于两次大战期间的苏联领土，后来又根据 1940 年 9 月 5 日的协定，也适用于在两次大战期间属于罗马尼亚领土而于 1940 年 6 月并入苏联以后的北布科维纳和比萨拉比亚。

德国和波罗的海国家之间的协定，其制订和实施无疑都是出于德国的主动，可以推断，德苏协定也是德国提议的。这些都是德国方面的积极行动，它们看来象是一种证据——值得注意的是，这是此类事情中唯一的证据——表明希特勒在 1939 年 8 月 23 日与苏联谈判德苏两强如何瓜分东欧时，是抱有诚意的。在苏联管辖区散居的德意志人是一支潜伏的第五纵队，正是第三帝国从其居住在德国境外一些地方的德意志少数民族所组织起 40 来或将组织起来的那种类型的第五纵队。在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等国居住的德意志少数民族，在把这些国家并入希特勒欧洲的政治策略上起了关键的作用。希特勒本来可以同样利用在南蒂罗耳的奥地利德意志少数民族，但是为了获得法西斯意大利的友谊而付出一部分必要的代价，他有意放弃了这一做法。关于这一点，他曾以协议的形式向墨索里尼表示了他的诚意，让南蒂罗耳人自由选择，或是迁到勃伦纳以北，或是留在祖传的家园被无情地取消国籍。可以预料，希特勒这时要撤出散居在苏联东欧势力范围内的德意志人，一定对斯大林作了相应的保证，说他打算象尊重意德勃伦纳分界线那样忠实地尊重 1939 年 9 月 28 日签订的俄德在东欧的分界线。然而在协定将要签订时，斯大林也象希特勒本人一样肯定地知道，希特勒所有这一桩接一桩的侵略行动，其最终目的是要为德意志第三帝国在东方谋求一个广阔的“生存空间”，如果希特勒的计划得逞，这个“生存空间”会远远超越已划定的分界线，把苏联的心脏挖出来。怎样解释希特勒的最终目标与当时行动之间这一明显的矛盾呢？

最可能的解释似乎是这样：希特勒一实现他在东方获得“生存空间”的第一步计划时，他就发觉，他受到缺乏人力的牵制，甚至不能开拓他已征服的东方领土的最中心地区。希特勒曾借口德国人是一个“缺乏空间的民族”，来说明第三帝国通过武力，把领土扩张到德意志人在人口中占多数的中欧东部边缘之外的地区是正当的。希特勒提出，要深入广阔的斯拉夫人地区筑起

一道道德意志人口的堤防。然而，等到德国对这种侵略进行试验时，却发现，在大战前夕的第三帝国的疆界之内，德国的人口甚至连这类堤防中的第一道亦即最近的一道也筑不起来。从苏联势力范围“遣返”的散居在外的德意志人，希特勒需要把他们移居在瓦尔塔地区——一条狭长地带，沿着瓦尔塔河与内茨河，这个地带将要变成一条连接东普鲁士和德国本土的“德国走廊”，从而把“波兰走廊”与维斯瓦 41 河中上游流域的波兰本土隔离开来。其用意是要把一小块一小块相连接的波兰领土，用德意志人聚居的地带围住加以警戒，作为使这些波兰领土德国化的第一步。

由于希特勒和苏联以及波罗的海三国订立协定的结果而离乡背井的人，按照被征服国家的人口来衡量，数目是小的，但是按照个人遭受的苦难来衡量，数目是大的。从波罗的海国家迁出的德意志人的数字，将在本书另一处提及。除波罗的海国家外，要弄清德国管辖区和苏联管辖区之间交换的人数，是比较困难的。从这个地区迁出的德意志人的数字，有一种估计是：从沃林迁出六万四千五百五十四人，从加利西亚迁出五万五千四百四十人，从比亚韦斯托克迁出八千零五十三人，从北布科维纳迁出四万二千四百四十一人，从比萨拉比亚迁出九万三千五百四十八人。如果在这些数字之外，再加上按照德国估计根据协定从波罗的海国家迁回的德意志人为十二万人，则蒙受希特勒之害的东方德意志族人共计约四十万人。

1941 年 6 月 22 日，希特勒在进犯苏联的前夜，为他 4 这一行动作辩解的广播中谈到，迁移的德意志人数字是五十万人，并把他们描绘成 1939 年 8 月 23 日德苏协定的受害者。

我自己曾经要求签订的这个条约的后果……的确非常严重，特别是对于住在有关国家的德意志人。远远超过五十万德意志男女，他们都是小农、手艺人、工人，几乎一夜之间就被逼离开他们原来的家园，为了逃避一个新政权，这个政权一开始就以无限的苦难并迟早要把他们灭绝来威胁他们。……成千的德意志人不见了。永远无法知道他们的命运如何，更不用说他们的下落了。这一切我都保持沉默，因为我不得不这样做。

对这份辩解的评语是“罪犯辩解，欲盖弥彰”。

第二章波罗的海国家亚历山大·埃尔金

第一节时间表

德国人在侵犯波兰以后，立即对苏联政府施加压力，要它在其利益范围内的土地上对波兰采取行动，这一利益范围，按照1939年8月23日苏德协定附属秘密议定书的规定，一旦作领土和政治的调整时将划归苏联。采取这一行动的必要性，莫斯科虽然承认，但是最初是犹豫的。它甚至承认自己对德国迅速得手感到震惊。可是，到了9月中旬，莫斯科终于下了决心，9月17日，红军越过苏联边界进入波兰。

一天后，塔斯社的一条新闻谈到波兰的潜艇在当地“统治集团帮助下”——这是一句不祥的话——进入波罗的海国家港口避难。还说有一艘潜艇，由于爱沙尼亚当局的疏忽，在塔林失踪。因此，苏联将根据德军在波兰的进展来决定自己在波罗的海国家的行动速度。

秘密议定书规定，立陶宛的北部边界将作为划分苏德在波罗的海地区势力范围的分界线，正如舒伦堡的伙伴希尔格所说，彼得大帝血战二十年想夺取的地方，大笔一挥就到了苏联手。议定书还规定，关于维持一个独立的波兰问题，将根据以后政局的发展来决定。这样，立陶宛就将纳入德国范围。然而，议定书明白地承认立陶宛对维尔纽斯地区的权利。

当苏联政府开始行动的时候，德国是准备遵守这些规定的，但正如上文所述，苏联政府重新考虑后，认为从它的观点看来，关于立陶宛的规定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苏联重新考虑的内容，在9月25日斯大林接见舒伦堡时有所透露，他在谈话中说到，假如德国同意，并“慨然予以支持”的话，他将波罗的海国家立刻采取行动。在这一点上，斯大林建议把立陶宛从德国范围划入苏联范围，作为报答，他拟将波兰境内的分界线改划，把德国控制的地区扩展到通称的寇松线。对此德国表示同意。9月28日，莫洛托夫和里宾特洛甫签署了边界和友好条约新的秘密议定书，其中对8月23日的议定书作了适当修改。

斯大林在9月25日接见舒伦堡时，谈到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但未提到芬兰，自然，芬兰问题是一件更为棘手的事。而一旦准备就绪，苏联的行动便节节进展，当10月5日轮到芬兰时，第一阶段已接近结束。

第二节苏联—波罗的海国家的莫斯科条约

1939年9月至10月

莫斯科的第一个目标是诱使波罗的海三国与苏联缔结互助条约，为它提供新的海军基地、陆军基地和飞机44场。莫斯科已分别在9月28日、10月5日、10月10日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三国签订了这类条约。

（一）苏联—爱沙尼亚条约

爱沙尼亚外交部长卡尔·瑟尔泰曾两次访问莫斯科。第一次，他带着商业部的一个高级官员于9月22日动身，表面上是去签订一项贸易协定，并参观农业展览馆。9月26日，他一回国便提出报告，说苏联政府要求缔结一项互助条约，根据该条约，俄国将在帕尔迪斯基港取得一个海军基地——原来曾要求在塔林建立基地——并在爱沙尼亚的一些岛屿上建造飞机场。如果爱沙尼亚政府拒绝缔约，正如莫洛托夫警告瑟尔泰那样，苏联将“通过其他方式”迫使爱沙尼亚答应这些要求。9月27日，瑟尔泰再次动身去莫斯科。

当塔林方面正在商量对策的时候，苏联飞机已在爱沙尼亚上空大飞特飞，苏联军队沿着苏爱边境集结的谣言甚嚣尘上。爱沙尼亚政府考虑到自己

已面临立即遭受进攻的威胁，于是指示瑟尔泰在原则上接受缔约的建议，但必须设法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建立的军事基地，只有当缔约的双方中有一方卷入战争时才能使用。原来同第三方面缔结过互不侵犯条约而承担的义务，在双方执行拟议订立的这个条约时应不予考虑。

这项条约于9月28日缔结，那天正是莫洛托夫与里宾特洛甫签署新的俄德边界和友好条约的日子。苏联—爱沙尼亚条约中有一条措词很明确：双方的主权、经济制度和政治体制不得因实施本条约而受到破坏。然而在45其他方面，瑟尔泰无力执行指示。条约的条文是否逐条经过认真讨论也值得怀疑，因为里宾特洛甫的访问一定忙坏了苏联的高级官员。

条约规定，万一遭到欧洲一个大国侵略或以侵略相威胁时，双方保证互相支援。苏联应以“优惠条件”向爱沙尼亚军队提供作战物资。萨烈马岛、希乌马岛、帕尔迪斯基港的海军基地和飞机场应以“合理价格租给”苏联使用。根据防务需要，苏联有权在这些地方驻扎人数受到严格限制的部队。一项秘密议定书规定，“为了预防和使缔约双方产生卷入当前欧洲正在进行的战争的任何企图”，授权苏联于“战争期间”在基地和机场保持二万五千名军队。议定书还规定，在帕尔迪斯基基地建造期间，苏联海军可以使用塔林港口，为期两年。

同时，双方还签订了一项贸易协定，规定把两国的贸易额增加三倍。

（二）苏联—拉脱维亚条约

接着轮到了拉脱维亚。10月1日，拉脱维亚政府接到邀请，要它派代表赴莫斯科进行“磋商”。第二天，外交部长威廉斯·门特斯就到了那里。10月5日，他和苏联签订了一项互助条约。

这次，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都参加了谈判。在两次会谈中——总共只花了四个半小时——他们解释了所建议的条款以及为什么他们必须坚持其要求的理由，而门特斯则试图要对方作出某些让步。在第一次会谈后，他已毫不怀疑，这些建议的实质只能被看作“象是对付保护国的”。

条约规定，拉脱维亚将把利耶帕亚和温次匹尔斯的海空军基地出租给苏联。此外，同意苏联有权在温次匹尔斯与皮特拉格斯之间建立一个基地，以保护伊尔46别海峡。这样，里加湾的入口就处于苏联控制之下。根据一项秘密议定书，在整个战争期间，允许苏联政府在这些基地驻扎的军队，人数固定为三万。其他条文与苏联—爱沙尼亚条约完全相同。例如：万一遭到欧洲任何一个大国的侵略或以侵略相威胁时，双方有保证互相支援的义务；并明确保证，不得干预对方的主权或其经济制度和政治体制。

根据贸易协定，拉脱维亚与苏联的贸易额将增加两倍，莫斯科同意增加经过拉脱维亚各港口的苏联货运；拉脱维亚获得经过苏联领土运输货物的权利。

门特斯使对方作了某些小小的修改。原先，苏联政府曾要求有权利在里加保持一支警卫部队，并要求在拉脱维亚驻扎一支数目稍多的苏联军队。没有什么其他的让步。莫洛托夫坚持原来的要求，而门特斯则抗辩说，这项条约不应使拉脱维亚人看来似乎是强人所难，成为加在他们国家头上的枷锁，成为他们自由生存的一种威胁。这时，斯大林——据门特斯报告——正在记什么，涂涂画画，踱来踱去，时而又从书架上取下几本书和几张报纸。

（三）苏联—立陶宛条约

立陶宛的情况有些特殊。它与苏联之间没有共同边界。它与波兰关系之坏是众所周知的。从 1920 年到 1938 年，两国之间不仅没有外交关系，甚至铁路交通也中断了。自 1920 年泽利戈夫斯基将军发动政变以来，维尔纽斯地区一直是两国之间的主要争端，苏联这时根据 1939 年 8 月 23 日俄德秘密议定书，声称这个地区属于其利益范围。1938 年 3 月，在波兰军队立刻入侵的威胁下，立陶宛政府同意重新开放立陶宛波兰边界，并与华沙重建外交关系。另外，与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不同，立陶宛与德国的关系一直不好。1939 年 3 月，立陶宛屈服于德国最后通牒的压力，把梅梅尔地区（克来彼达）归还德国。此后，它也没有象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于 1939 年 5 月 31 日所做的那样，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1939 年 9 月 18 日，苏联军队开进维尔纽斯。莫洛托夫就此事向立陶宛驻莫斯科公使保证，在立陶宛国土上将不会发生军事行动。事实上，苏联政府此时已准备向德国要求，把立陶宛并入它自己的利益范围，这一要求已写进 9 月 28 日苏德协定附属议定书中。此项交易的一部分内容是：当苏联为了保护其利益“在立陶宛领土上采取特别措施”时，立陶宛西南部一条狭长地带，被规定为更正常的边界线而“划归”德国。

苏联政府的计划，正如莫洛托夫在 10 月 3 日立陶宛外交部长乌尔布希斯到达莫斯科前几小时对舒伦堡所说的，是把维尔纽斯地区给立陶宛，同时暗示立陶宛必须把这条狭长地带割让给德国。这一建议引起了舒伦堡的警惕，他在 10 月 3 日向德国外交部报告时评论说：“这样，就使我们看起来象是抢夺立陶宛领土的‘强盗’，而苏联政府倒象是施主了。”第二天，他接到指示，要他要求莫洛托夫不要与立陶宛人谈判割让这块狭长地带的问题。但这一指示下达得太迟了。与此同时，莫洛托夫出于对德国的“忠诚”，已把此事同乌尔布希斯谈过，后者听了感到“惊愕和忧愁”，因为立陶宛许多知名人士的家就在这块有争议的土地上。

斯大林要求德国人“暂”不坚持要立陶宛割让这块领土。既然这样，里宾特洛甫就要求莫斯科秘密交换信件，进一步肯定：“万一苏联派出军队进驻立陶宛”，将不占领这块领土；而且，苏德协定有关这一部分的实施日期，应由德国政府选定。关于这两点，莫洛托夫在 10 月 8 日致舒伦堡的信中作了肯定答复。

于是，维尔纽斯市及其周围地区，就根据莫洛托夫和乌尔布希斯 10 月 10 日签署的互助条约“转让”给了立陶宛。苏联军队在这一日期之前已从维尔纽斯撤走。10 月 28 日，立陶宛军队开进了这个怀念已久的古城。当时流亡在外的波兰政府提出了抗议。对它来说，维尔纽斯依然是一个波兰城市，有着许多波兰民族的古迹和传统。至于建议把立陶宛领土转让给德国一事，德国驻考那斯公使告诉立陶宛政府，德国政府还来不及考虑到修改边界问题。

苏联—立陶宛条约使苏联有权在立陶宛保持一支不超过两万人的军队，军队驻防的具体地点没有规定。条约规定，在一旦遇到对立陶宛构成侵略威胁，或通过立陶宛领土对苏联构成侵略威胁时，双方再共同协商。这项条约的期限为十五年，不同于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条约的期限为十年。在其他方面，这一条约和上述两个条约完全相同。同样，也包括一项商业协定，期望大幅度增加缔约双方之间的贸易额。

第三节 苏联政府的意图

10月下半月，红军和俄国空军在这三个国家驻扎下来，从而对东普鲁士与芬兰湾之间波罗的海沿岸有效的陆、海军控制得到了保证。列宁格勒往南的通道，在十月革命以后曾一度受到尤登尼奇将军和别尔蒙特—阿瓦洛夫的白俄军队的威胁，这时排除了潜在的侵略。有谣言说，正在计划建造一道针对东普鲁士的“马其诺防线”——援引当时的术语。

苏联的行动首先是根据战略考虑确定的。这与1939年夏天斯大林对英、法政府的要求是一致的，而据丘吉尔回忆，高尔察克海军上将的白俄政府在1920年也曾坚决认为，在波罗的海国家的基地对于保卫俄国首都是必需的。苏联在此事发生后不久，伏罗希洛夫元帅在庆祝11月革命节的集会上对武装部队的讲话中声称，俄国军队驻在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是为了这些国家的安全，也是为了苏联的安全，而不是去干涉波罗的海国家的内政。

当时莫斯科的政治意图究竟是什么？舒伦堡于1939年10月3日发出的一份电报中，在谈到把立陶宛的那条狭长地带转让给德国一事时，建议这一行动应推迟到“苏联实际并吞了立陶宛之后……；关于立陶宛的安排，原先是根据这个主意作出的”。舒伦堡的话是很有意思的。但是，把波罗的海国家并入苏联的主意，是否就是苏联统治者当时的主要考虑，值得怀疑。看来，更可能的是他们考虑到军事方面。固然，莫洛托夫与门特斯谈判时提到了彼得大帝。但是，以其“惊人的军事知识和记忆数字的本领”而给门特斯留下印象的斯大林，考虑得更周到，话也说得更为直言不讳。他在谈到英国“企图”把瑞典卷入战争时，就预言战争将是长期的，而且牵涉面甚广，尽管此时正是闪电战在波兰迅速得到成功的日子。考虑到自己国家的形势，他说：“在国家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始终存在差别。”接下来，他的话变得更为清楚明确。他说，德国进攻波罗的海国家是可能的。在历史的进程中，“一个意想不到的变化发生了，但是不能因此而恃无恐。我们必须及时作好准备。谁要是无所准备，就得为此付出代价。”

此时苏联政府心目中的头等大事，看来是安全，而不是扩张。然而，由于考虑到与德国新建的友谊，苏联把它在波罗的海地区的行动暂时解释为防备英国可能采取行动的对策，同时仍然强调尊重波罗的海国家的主权。莫洛托夫在10月31日的讲话中说：“所有……关于波罗的海国家将实行苏维埃化的胡言乱语，只能有利于我们的共同敌人，有利于一切反苏的煽动者。”

可是，这种新的友谊并未驱散莫斯科的疑虑。德国向芬兰湾和波罗的海沿岸派出几艘海军舰艇以控制商船运输的计划，引起了极大的关注。根据与德国达成的谅解，这一地区划入苏联的利益范围，苏联在这里有着重要的战略利益。此外，这一军事行动也可以认为是德国亲芬兰的表示。莫洛托夫要求德国，把针对商船运输的战事——尽管这场战事是合乎需要的——限制在波罗的海瑞典海岸的一边。柏林答应照办。

因而，直到那时为止，波罗的海国家还没有明显的要被并入苏联的威胁。但是时代的症候是清楚明白的。纳粹德国与苏联之间的冲突，象老虎钳一样把波罗的海国家夹在中间。寄托于苏德协定而幸存的希望，就和这个协定本身一样虚幻。当这一时刻终于降临到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头上时，它们在1939年5月31日与德国缔结的条约便全然失效。当苏联对它们提出要求时，它们没有从德国得到丝毫支援。至于立陶宛，德国作了一个软弱无力的表示。但是，波罗的海各国政府的代表必须去莫斯科，在莫斯科决定了波罗的海国家的命运。（立陶宛外交部长乌尔布希斯谈起在莫斯科的经历时说）讨论是

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没有任何牵制和约束。只是在讨论快结束时，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表现出有些不耐烦。拉脱维亚总理门特斯讲到他自己在莫斯科的会谈时说：“既没有草率从事，也没有威胁恫吓。”可是，除了签字，也别无选择。

第四节波罗的海国家的德意志人迁返德国

然而、直到 1940 年 5 月德国在西欧取得的胜利使苏联政府改变其政策以前，看来俄国满足于在要害地点保持军队和控制波罗的海国家的对外关系。苏联驻军的生活与当地居民完全隔绝。他们纪律严明，不干涉内政。立陶宛总统斯梅托纳和拉脱维亚总统乌尔马尼斯两人都是强烈反共的，他们坚守自己的岗位。共产党的活动也没有得到鼓励。在这期间，三国得以和德国进行数额 51 相当可观的贸易，从而取代了过去对西欧的出口。

在德国人方面，他们忠实履行了与俄国人达成的协定。尽管对苏联未来的计划忧心忡忡的波罗的海国家的代表们在威廉街偶尔也能找到一些愿意听他们诉苦的人，但他们的忧虑不得有损德国与克里姆林宫的友谊。在德苏这种关系上的一个痛处——德意志少数民族的命运问题上，已达成了谅解。他们将同波兰苏联占领区的德意志人一样，“返回”德国。

这些德意志人在波罗的海地区住了已有大约七百年之久。自从十八世纪初爱沙兰和利夫兰并入俄罗斯帝国以来，他们为沙皇政府提供了干练的军人、行政官员和外交官员。但他们仍同德国保持着联系。德国人把他们当作德国在东方势力的“堡垒”而同其夺取“东方空间”的雄心壮志联系在一起。自 1917 年俄国革命以来，这些人在俄国当然不再起作用了，而在波罗的海国家独立后，随着领导阶层中非德意志血统的人士不断增加，这些德意志人也不再起作用了。二十年前进行的土改的结果，他们当中的大地主被剥夺了土地。其中有些人移居德国，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就是其中的一个。但是城市中的德意志人中产阶级，依然在工商业以及从事脑力劳动和受过专门训练的职业中保持重要的地位，在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尤其如此。

波罗的海国家德意志人的离乡背井，这时符合纳粹政策的模式，而且是迫使其符合的，纳粹的政策是主张用这种迁移人口的办法来解决少数民族问题。1939 年 10 月 6 日，希特勒声称：“在我们的时代，在民族一体化和种族优越的思想已经获得胜利的今天，希望有可能简单地同化这个优等民族的成员，只是空想而已。”德国驻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代表立刻接到指示，要他们通知这些国家的政府，全体德意志族人民和德国侨民受到德国的特别保护，所在国政府应立即采取措施保护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必须运用一切手段为他们尽快返回德国提供便利。接运他们的船只已经派出。为了保护这一行动，海军舰艇已在但泽升火待命。

莫斯科对德国政府发动的这场“慌张”的移民运动感到吃惊，它觉得这将“危及”苏联在波罗的海地区的行动。可是柏林否认这一撤退举动与苏联采取的措施有任何关系。里宾特洛甫申辩说，撤退工作毫不“慌张”，而是“十分平静、井井有条”地进行的。他说，德国采取这一行动，并不是出于担心俄国人可能对德意志人有所举动，而是因为需要对占领区内荒废的田园、商店或车间补充人员，以及希望消除与莫斯科发生潜在冲突的因素，因为当地居民对这些德意志人的态度，有时含有敌意。莫洛托夫听了这一解释以后——据舒伦堡报告——显得“多少放了点心”。

按照德国政府与波罗的海三国谈判达成的协定，居住在爱沙尼亚、拉脱

维亚，稍后还有居住在立陶宛的德意志人将被取消所在国的国籍，并应于1939年12月15日前离开其家园。他们可以随身带走属于个人的物品，但其他财产——公债和股票、不动产、商业资财、资本等等——则由一家专门设立的德国公司——移民信托股份公司接收，将来由这家公司偿还。到这时遣送的人数已超过十万。其中大多数重新定居在瓦尔培地区，战后，这块地方重又划归波兰。

第五节波罗的海国家并入苏联

1940年初夏，正当德国征服西欧大陆之际，莫斯科突然改变其政策，决定把苏联的边界推进到波罗的海沿岸。53 南方的边界也同时推进到多瑙河口。苏联的工业和农业已置于战备体制之下。德国方面没有认真反对的表示。苏德条约依然在开花结果，但一方面克里姆林宫却在进行准备，以防万一德国突然侵犯。

波罗的海地区的事是在立陶宛开的头。早一年秋天，立陶宛比爱沙尼亚或是拉脱维亚更加热烈地欢迎过苏联军队。5月28日，俄国人指控说，红军战士遭到了秘密绑架，声称其中有一人被枪杀了。立陶宛建议组成混合委员会进行调查，遭到拒绝。因此，考纳斯主动下令进行令案调查。许多人被捕了；在有些情况下，立陶宛居民从苏联军队驻扎的地区被遣送到其他地方。但是，这样做还不够。立陶宛总理梅尔基斯不得不到莫斯科去见莫洛托夫。莫洛托夫历数波罗的海三国参谋长频繁会晤以及三国政治家多次会商的事实，断言波罗的海国家之间有一个秘密军事同盟。梅尔基斯坚决否认此事。在他看来，谈话的口气是要说明他应当发表一个声明，以消除对方的疑虑。为此，他在6月12日回国后，就发表了一个声明。

接着，暴风雨袭来了。6月14日梅尔基斯和外交部长乌尔布希斯再次去莫斯科，这次是去接受一份最后通牒，其要求为：第一，立陶宛内政部长斯库恰斯和保安警察总监波韦拉伊特斯由于同这些事件有牵连，应当交付审判；第二，应当建立一个能够并且愿意履行互助条约的新政府；最后，应当允许苏联军队进驻该国各个重要中心，其数量足以保证条约受到尊重。限期第二天上午10时以前作出答复。答复如期收到。几小时后，立陶宛政府辞职。苏联坦克已在隆隆声中开过边界。根据斯梅托纳总统的命令，立陶宛军队向德国寻求避难所。许多政治家和高级官员包括总统本人也采取了同样行动。避难的立陶宛军队获准进入德国，同时被解除了武装。政治家则由里宾特洛甫授命秘密警察殷勤接待。此外，德国人把这些逃亡的情况也告诉了莫斯科。莫洛托夫讥讽说，这显然由于边界防守不严。如果对方要求的话，他54 的政府愿意帮助立陶宛政府执行这项防守任务。无疑，莫斯科是提供了这一帮助。

两天以后，苏联向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提出了类似的要求。最后通牒的内容援引了同立陶宛总理梅尔基斯的谈话，作为消息的来源，这些消息使苏联政府相信，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军事同盟是针对苏联的，这个同盟没有受到谴责，而且立陶宛也加入了这个同盟。最后通牒硬说1939年12月和1940年3月波罗的海三国的政治家曾两次举行秘密会议，说三国参谋总部之间接触频繁，说这个军事同盟有一种专门的机关刊物《波罗的海评论》正在塔林发行。最后通牒声称，这些活动违背了三国与苏联缔结的互助条约，因为按照条约规定，缔约各国不得参加任何针对苏联的联盟。

苏联给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驻莫斯科公使的照会指望在六小时内答复。在递交照会以前并未通过外交途径交换意见，但是爱沙尼亚人和拉脱维亚人知道，苏联即将提出要求。苏联军队集结的报告已从边界发来。他们匆匆考虑之后，接受了苏联的条款。苏联军队开进来了；苏联军舰停泊在里加港外。

为了指导当地居民实现苏联要求他们进行的改革，莫斯科派出了特使分赴三国首都。杰卡诺佐夫，当时的副外交人民委员，奉命去考纳斯；不久以前曾被任命为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的维辛斯基出访里加；而日丹诺夫，三人中最重要的一个，则赴塔林。选择地位这么高的苏联党和政府官员前去，表明了他们任务的重要性。

他们的任务执行了几个星期。在他们的指导下，组成了新政府。爱沙尼亚总统帕埃茨和拉脱维亚总统乌尔马尼斯起初都拒绝批准新上台的政府，但由于共产党组织了骚乱，而被迫同意了。三个新政府都由中间人士和一些社会党人以及许多亲苏的知识分子组成。诗人约翰内斯·瓦雷斯-巴巴勒斯成了爱沙尼亚的新总理；细菌学家、拉脱维亚-苏联文化交流协会副主席奥古斯特·基尔亨斯泰因斯教授担任拉脱维亚的新总理；乌斯塔斯·帕拉埃茨基斯是立陶宛政府的新首脑，副总理是斯拉夫语文学教授、立陶宛-苏联文化交流协会副主席克雷韦-米茨凯维奇乌斯。三个政府中都没有共产党人。但多年来在波罗的海国家处于非法地位的共产党很快就得到了合法地位，不久以后，就有一些共产党人担任了政府的重要职务。有秩序的亲苏游行受到了鼓励；占领工厂的企图受到了压制——这种事在俄国已经完全过时了。宣布了对政治犯实行大赦。报刊、广播和通讯事业都受苏联控制。

当时，波罗的海三个国家已处于全面的军事占领之下。塔斯社于6月22日发布的一份公报中承认，苏联这时有十八个师到二十个师的军队驻扎在波罗的海国家。这三个国家的军队正在苏联指导下进行整编。

八个月以前，苏德两国政府就已经达成协议，俄国军队进入立陶宛时，不得占领立陶宛西南部毗邻苏瓦乌基地区的一条狭长地带，按照1939年9月28日俄德秘密议定书规定，这一地带已划归德国，移交的日期应由德国决定。这时，在7月间，俄国人硬要德国政府对1939年9月28日双方商定的协议重行考虑。斯大林承认有义务把这条狭长地带让给德国，但他宣称，要做成这笔交易“极端困难，很不方便”。德国人问，准备用什么来交换，俄国人在8月13日答复说，愿意用金钱补偿。9月6日，德国人在原则上接受了这一主张；但是，直到1941年1月10日，才达成一项协定，解决的办法是：德国放弃对立陶宛这条狭长地带的权利，补偿费为七百五十万美元或三千一百五十万马克，总额的八分之七以黄金支付。

在此期间，1940年夏季，波罗的海三国的议会都被解散，宣布进行新的选举。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政府宣布废除它们之间的军事协定，立陶宛政府也作出相应的声明。对苏联的友谊被列在政纲的首位，但苏维埃化以及与俄国合并的活动仍未公开化。施政纲领集中在彻底地进行社会改革和经济改革。

选举在1940年7月14日和15日举行。选举法规定了普遍、平等、直接、无记名以及按人数比例选代表投票的方法。可是，只允许有一份候选人——“劳动人民联盟”——的名单。这个组织是专门为此而在波罗的海国家分别建立的，由共产党、一些附属团体以及几个非政治性组织的成员组成的。报刊和全部印刷机构都受政府控制。对参加投票的选民施加了压力。反对派组

织起先是受到干涉，接下来就遭到镇压。许多人被逮捕。根据官方报道，拥护“联盟”的候选人分别在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全部投下的选票中占百分之九十二点二、百分之九十七点六和百分之九十二点九。

57 一星期以后，于 7 月 22 日，新召集的三国议会，表示响应选举以后国内立即发起的一项运动，庄严宣布将采用苏联的制度——虽然不实行农业集体化——并表示愿意和苏联合并。1940 年 7 月 23 日《泰晤士报》的一则电讯评论道：“充其量只能说，如果要人们在俄国和德国之间进行选择，多数人可能选择俄国，而且，自然这是以不对他们的家庭生活和风俗习惯实行全盘布尔什维克化为前提的。”可是，它们并入苏联的结果就会如此；从此，三国就要忍受它们不得不经历的改革所必然带来的痛苦了。

波罗的海国家驻柏林、伦敦和华盛顿的代表们，按照他们原先接到的旧政府的指示，指斥他们议会的活动是非法的，声明这些选举是在威胁之下，在外国占领军在场的情况下举行的，不能看作是人民意志的真实反映。德国外交部拒绝接受这些照会。美国代理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宣称，美国政府反对苏联侵犯波罗的海各共和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美国驻波罗的海三国首都的代表们——虽非全体工作人员——离开了那里。美国政府继续承认波罗的海三国驻华盛顿的代表。波罗的海三国在英国和美国的财产被“冻结”，挂三国国旗的船只被扣留。苏联政府对此立即提出抗议。

8 月 1 日，最高苏维埃召开特别会议，讨论波罗的海三国新议会要求并入苏联的申请。会议也讨论了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的合并问题。会议开始时，莫洛托夫强调苏联政府采取的步骤是必要的，因为，“特别在当前 58 国际形势所造成的情况下”，统治波罗的海国家的一些资产阶级集团的政策，使得根据互助条约进行合作成为不可能。而在提出申请的那几个代表团方面，则声称在它们的国家里资产阶级政权已被推翻，因此不可能再成为“通向英帝国主义者的跳板”了。8 月 1 日，立陶宛被接纳加入苏联；8 月 5 日，拉脱维亚加入；8 月 8 日，爱沙尼亚加入。它们成为苏联的第十四、第十五和第十六个加盟共和国。

1939 年战争爆发时，波罗的海国家的政府根据国际法，发表声明，宣布中立。但是事实上，在苏德协定缔结以后，它们的国家就不再能继续成为真空地带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讨论他们自己的打算时，都提到俄国过去对波罗的海地区的主权，这种考虑对他们的政策产生过影响。然而，威胁三个共和国独立的真正因素，是德国在西方胜利进军的步伐。在莫斯科看来，这些国家在战略上对于苏联的防御太重要了，不能让它们继续成为独立国家。波罗的海国家在两次大战之间保持独立的一段时候，在政治上——用丘吉尔的话来说——是“欧洲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前哨”。这些国家的全部观点，正同它们实际的做法一样，使得将它们并入苏联一事不易为西方民主国家所接受。当斯大林硬要艾登（在 1941 年 12 月访问莫斯科期间）立刻承认波罗的海国家的新形势时，丘吉尔的话说得再激烈也没有了，他在电报中说：“这些边界是凭着可耻地与希特勒勾结的侵略行动而获得的。违反波罗的海国家人民的意愿使它们转属苏俄，这将违背我们进行这场战争的一切原则，并将玷污我们的事业。”可是三个月以后，由于事态发展的压力，经过重新考虑以后，产生了另一些想法，并随之而怀疑“这一道义的立场是否确实能保持下去”。丘吉尔在给罗斯福的一封信中议论道，大西洋宪章应该被解释为不否认苏联有权保有它在受到德国进攻时所占有的边界。美国政府不同意这个

观点。因此，苏联并吞波罗的海国家所造成的形势，成为战时盟国关系以及战后谈判解决办法时的一个障碍。

59 第三章芬兰亚历山大·埃尔金

第一节应邀去克里姆林宫

10月5日，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刚刚六个星期，莫洛托夫就通过芬兰驻莫斯科公使于尔耶-科斯基宁男爵，要求芬兰外交部长埃尔科或芬兰政府派出的一个特命全权代表立即去莫斯科，根据国际形势中产生的变化就某些政治问题交换意见。

在莫斯科看来，这些变化的确是有深远影响的。德国在波兰的战役已经结束，这场战役森然可怖地显示了德国的力量。看不出西方对此有任何认真的对策。红军开进了波兰，苏德边界和友好条约缔结了。关于蒙古边界的纠纷，已和日本作了停战的安排。苏联政府预料有一场旷日持久、日益扩大的战争，正在加紧推行原定的各项计划——用丘吉尔的话来说——“以堵塞自西方进入苏联的条条道路”。在克里姆林宫内，正在和土耳其外交部长讨论土耳其中立问题。针对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的外交攻势正在顺利展开。接下来，就轮到芬兰了。苏联在芬兰的目标，系出于防务考虑，首先在于把芬兰湾和拉多加湖之间的卡累利阿地峡上的边界向西北推进大约三十到四十英里，并拆除“曼纳海姆防线”的工事。采取这样的措施，就能使列宁格勒处于苏芬边境芬兰方面远射程大炮的火力之外，而当时的边界离列宁格勒毗邻边境的郊区仅约二十英里。其次，苏联政府打算在芬兰湾入口的北侧（芬兰一侧）建立一个海军基地，并要芬兰割让通向列宁格勒水道上的某些岛屿。这样——加上苏联政府由于同爱沙尼亚订立互助条约而取得的芬兰湾南侧的海军基地——将使苏联完全控制芬兰湾，从而大大加强列宁格勒的防务。再则，苏联政府希望能将北冰洋上的雷巴契半岛割让给它。最后，它想要芬兰加紧负起既有的对苏联。60 承担的条约义务，以防止芬兰卷入任何敌对的联盟。

当然，苏联领导人害怕的倒不是芬兰的进攻。他们已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亲眼看到波罗的海对于保卫俄国抵抗德国的重要性。战后，在1913年，德国军队曾在汉科登陆，去帮助曼纳海姆的军队对付芬兰和俄国的赤卫队；在1919年，英国指挥的联军也曾占领过俄国北方唯一的不冻港摩尔曼斯克以及从该地通往列宁格勒的铁路线。《泰晤士报》当时（1919年4月17日）写道：“芬兰是开启彼得格勒的钥匙，而彼得格勒又是开启莫斯科的钥匙。”这些后已经深深地印入了苏联人的脑际。往后，在1925年，缔结“波罗的海洛迎诺公约”的计划以及缔结波兰与波罗的海国家军事同盟的计划曾使莫斯科惶惶不安。再近一些，当希特勒德国与苏联之间的对抗达到高潮时，传说芬德之间已就德国可能进攻俄国一事达成谅解的谣言，再次引起俄国的猜疑，后来只是由于芬兰外交部长霍耳斯提访问莫斯科，才使这种猜疑减少了一些。尽管芬兰已拒绝和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但它也坚决拒绝了苏联要它保证在自己的领土上反击敌人进攻的建议——也许再加上英国对芬兰拒绝此建议而作出的某些反应——在1939年夏天使苏联更加忧心忡忡。过去产生的恐惧，助长了现在的忧虑。10月7日，芬兰内阁决定委派尤霍·库斯蒂·巴锡基维为首席谈判代表，他以前担任过保守党政府的首相，精通俄语，并十分了解俄国人。赫尔辛基政府实际上知道，苏联的要求必定会影响芬兰国家安全的基本形势，在接受邀请时表现出令人惊叹的坚定不移、毫不让步的气

概。另一方面，莫斯科明显地表现得盛气凌人，急于求成，对芬兰外交部长没有亲自去克里姆林宫也表示不满。芬兰政府好象为了强调自己的决心，加紧进行动员和加强其他防务措施，包括在主要城市赫尔辛基、维堡、图尔库、泰姆佩雷以及边境地区实行疏散。

芬兰领导人能够估计出苏联所提要求的大概范围。因为，不久前芬兰政府和苏联的一些密使之间曾多次举行秘密谈判：首先是和苏联驻赫尔辛基公使馆秘书鲍里斯·亚尔采夫，然后又和当时苏联驻罗马的大使鲍里斯·斯泰恩，此外，还在莫斯科和李维诺夫（当时的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及对外贸易人民委员米高扬举行了会谈。在这些商谈过程中，苏联政府直截了当地提到德国侵略的危险，要求分担芬兰防务的权利，特别是在阿兰群岛、霍格兰以及芬兰湾内其他岛屿。这些要求遭到了拒绝。

跟以往一样，此刻芬兰内阁下定决心，在考虑苏联的安全时，既不能丝毫有损芬兰的国防，也不能危害芬兰绝对中立的政策。军事指挥部，陆军元帅曼纳海姆就是其代表人物。”不过，当红军还在向波兰进军的路上时，芬兰人就得到明白的保证：莫斯科将尊重他们的中立。所以，有些芬兰人认为，假如芬兰能得到一些支持，似乎还有和解的机会。

他们能否指望柏林的支持呢？早在苏德协定签订时，德国驻赫尔辛基公使就奉命向熟悉的芬兰人士保证，德苏两国间的谅解并没有以牺牲芬兰作为代价。然而，63事实上德苏协定附属秘密议定书已明确规定，一旦原属波罗的海国家的地区在领土和政治上重新调整时，芬兰应划入苏联势力范围。这一点，芬兰人自然是不知道的，许多人甚至还觉得这个条约是稳定芬苏关系的一个因素。在里宾特洛甫第二次访问莫斯科并于9月28日在那里签署了边界和友好条约之后，柏林告诉芬兰人，说他们的国家处于德国利益范围的界线以东。此刻从德国得到援助的希望几乎全部落空了，虽然从长远的观点看，德国是否能容忍苏联侵入波罗的海地区，排斥西方国家，称王称霸，还成问题。

战前，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与西方国家，特别与英国有紧密的联系。在芬兰的经济生活中，英国占主要地位。此外，芬兰由于迅速清偿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债务，在美国享有很高的信誉。在英国和美国，芬兰都被看作斯堪的纳维亚共同体的一员，该共同体由于其民主的传统及其在国际关系中的高尚行为而赢得了尊敬和援助。甚至在战时，丹麦、挪威、瑞典依然是西方盟国重要的贸易伙伴。1939年9月17日在哥本哈根召开的北欧外长会议重申了各国在战时保持中立和愿意相互支持。苏联政府如果侵犯这个共同体的一个成员国的独立和完整，那就进一步恶化了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它究竟准备把这种关系恶化到何种程度呢？

过去几周年发生的事情虽然来势迅猛，令人不知所措，但是它们还没有暴露出苏德合作的全部内容和莫斯科要达到其目的的断然决心，也没有暴露出西方势力在波罗的海地区衰落的真正程度。因而看来芬兰领导人在考虑这些问题时，在探索他们所提出的问题的答案时，在权衡被卷入冲突的危险时，依然遵循着这样一个世界上的国家生活和国际生活赖以存在的概念，这个世界却在1939年9月1日就已烟消云散了。

第二节 谈判

10月11日巴锡基维到达莫斯科。接着，芬兰财政部长韦纳·坦内尔前去和他会合。坦内尔以社会民主党领袖的身分，代表议会中的第一大党。两

位代表中巴锡基 64 维较为温和。苏联方面由斯大林进行谈判，莫洛托夫和波将金（副外交人民委员）做他的助手。

尽管莫洛托夫表示出种种希望，但是芬兰代表团的权力仍然受到了严格限制，在谈判期间，代表们不得不两度返回赫尔辛基重新请示。每一次，他们都受权作出一些新的、不是十分重大的让步。看来，芬兰人似乎牢记着以赛亚的话：“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例上加例，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从巴锡基维到达莫斯科那天起，到 11 月 13 日谈判破裂止，只举行了八次会谈。可是，真正的危机，是在 10 月 31 日莫洛托夫发言后才发展起来的。

政治问题从来没有放在显著地位。固然，在开始时，苏联代表确曾征询芬兰政府是否乐意签订一项类似前两周内苏联与波罗的海国家缔结的那种互助条约，但在巴锡基维说明这样一项条约将与芬兰绝对中立的政策有抵触之后，苏联领导人就不再坚持了。俄国另外只提了一项政治建议，就是要在 1932 年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内增加一个新条款——芬兰人认为这是多余的——规定缔约双方不得参加任何直接或间接敌视对方的集团或同盟。芬兰政府愿意就此事进一步作出保证，而且，还准备接受经过重新改写的该条约的第二款，以明确保证芬兰遵守中立国的一般权利，拒绝向任何进犯苏联的侵略者提供支持。这一建议为苏联接受了。至于其他方面，苏联政府始终“根据军事观点”——用巴锡基维的话来说——来对待有关的问题。

至于芬兰湾内的岛屿问题，由于苏联要求对方割让 65 霍格兰而出现了严重的困难。芬兰代表在接到新的指示之后，是准备讨论做出一些安排，以“适当考虑双方的利益”，可是，在 10 月 23 日，他们拒绝了全部割让该岛的建议。莫洛托夫在 10 月 31 日的发言中说，他关于该岛的建议“显然没有遭到”芬兰方面的“任何异议”，企图以此迫使芬兰代表表态，可是枉费心机。对此，芬兰人说到底只答应割让霍格兰的南部。斯大林拒绝了，理由是这意味着“有两个主人——那可不行”。

关于其他岛屿的问题达成了协议。谈判开始时，苏联政府要求除霍格兰之外，还要芬兰割让谢伊斯卡里、拉万萨里和蒂塔尔萨里等岛屿，以交换苏维埃卡累利阿的列波拉和波拉湖地区。10 月 23 日芬兰在一份备忘录中答应了这一要求，另外还把佩宁萨里岛奉送给苏联政府。

此外，苏联要求芬兰割让雷巴契半岛西部地区及其濒临北冰洋的不冻海岸，看来也可望达成协议。至少，在谈判的后阶段，芬兰政府甚至已准备割让南方的普曼基峡湾，尽管这样做将使佩特萨莫处于苏联大炮射程之内。

谈判的真正障碍是苏联的另外两项要求，其一，要求租借汉科港三十年，以及要求苏联海军舰只有权在毗邻的拉波希亚湾停泊；其二，要求芬兰割让卡累利阿地峡上从布约科到列波拉一线以南的领土以及布约科岛。无疑，正是这些要求使巴锡基维感到问题“如此影响深远，令人震惊”，而在 10 月 16 日返回赫尔辛基磋商对策。

对芬兰人来说，卡累利阿地峡有如大门的门闩，乃是他们的塞尔莫皮莱。更改 1623 年施吕泽尔贝格条约划定的边界线，将使曼纳海姆元帅领导的国防委员会在前几年集中那么多精力部署的地峡防御体系落个一场空。而且，这会使俄国危险地接近供应芬兰南方电力的伊马特腊发电站。另一方面，如果割让汉科，它将使 66 苏联在芬兰土地上占有一个桥头堡，能很方便地从爱沙尼亚海岸的苏联基地获得供应和支援。

但对俄国人来说，这些问题也是至关重要的。

〔斯大林对芬兰代表说〕我们无法把列宁格勒搬家，所以只能移动边界。如今两者间的距离只有三十二公里。我曾问过里宾特洛甫，德国为何入侵波兰？他的解释是：他们要让波兰边界离柏林更远些。入侵前，柏林和波森之间的距离是二百公里。……我们要求从贵国边界到列宁格勒的距离为七十公里。我们要的是二千七百平方公里的土地，而愿意给你们土地却超过五千五百平方公里。还有哪个大国肯这么做呢？没有。只有我们才这样傻。

在汉科建立基地，对他同样重要。“我们必须做到能在入口处封闭芬兰湾”，他说，“……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帕尔吉斯基港（爱沙尼亚），我们还需要对岸的汉科，以防止敌方舰队进入芬兰湾。因为，一旦敌方舰队进入芬兰湾，列宁格勒就无法防守了。”

不过，为了继续谈判，仍作了再一努力。芬兰政府在10月23日的反建议中表示，愿意割让卡累利阿地峡上一块通称库奥卡拉岬的地方。对照苏联的要求，这是一个小小的让步。但是，他们拒绝苏联在汉科建立基地，因为“这和无条件中立不相容”；如果建立这样一个基地，则驻在基地上的苏联军队“也可能用来进攻芬兰”，同时，这个基地将成为“双方争执不休和不必要地引起不愉快的根源”。

苏联领导人立即声明：芬兰的建议不能接受。在汉科问题上，他们建议缩减保卫该基地的苏联部队的原定人数，并在欧战期间限制对该基地的给养。但是在他们看来，建立该基地仍是保障列宁格勒安全的“一个绝对必需的最低条件”。他们说，为列宁格勒考虑，也要求将边界线北移至布约科岛，虽然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又一次表示，愿意对原来的要求作某些修改。当芬兰代表问到，谁可能进攻列宁格勒时，斯大林提到法国和英国，但是也提到了德国。接着，他又说，目前他们和德国的关系是好的。但这个世界上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变化。而当巴锡67基维肯定地说，芬兰想要始终置身于武装冲突之外时，斯大林反驳道，他能理解这一愿望，但他要巴锡基维相信，这是不可能的——大国不会让它这样做。

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讨论的共同基础已不复存在。10月26日，巴锡基维和坦内尔又回到赫尔辛基。第二轮谈判告吹了。

在此期间，事态的发展表明，芬兰可寄予希望获得援助的，只剩下一些对莫斯科不能产生什么影响的方面了，而且，苏联领导人对外交抗议并不在乎。加里宁主席在回答罗斯福总统表示希望芬兰的独立与和平能维持下去的电报时提醒对方说，苏联政府是自愿承认芬兰的独立的，而谈判的目的也是为了巩固相互之间的安全以加强合作。莫洛托夫讽刺他说，芬兰在对苏关系中所处的地位，毕竟要比菲律宾或古巴在对美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好一些。在莫斯科的谈判开始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外交代表力图会见莫洛托夫，但是没有见到，只好留下一纸照会，表示他们政府对维护北欧集团成员国芬兰的中立地位的关怀。10月16日芬兰的代表们第一次回到赫尔辛基以后，卡利奥总统和埃尔科前往斯德哥尔摩参加了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首脑会议。会议收到罗斯福总统代表美利坚合众国和其他美洲国家发出的支援电报。然而这次会议的公报却表明，芬兰不能指望从斯堪的纳维亚各国政府获得任何重要援助。甚至瑞典已同意提供的贷款，也以不得公布作为条件。更令人失望的，是芬兰探询德国态度所得的结果。在收到的答复中，仅仅断言德国对苏联的要求一无所知，并肯定苏联的要求影响不大，以及预祝谈判取得可喜的结果。

“我们必须让芬兰自己与俄国人达成协议。我们建议，一有可能就和平解决”，这段话是魏茨泽克从10月6日布吕歇尔自赫尔辛基报告芬兰人已被召到莫斯科的一份电报中摘录的。这段话也可用来对瑞典讲。十天后的希特勒在一次接见频频去柏林的瑞典探险家斯文·海定时说，无论芬兰，无论瑞典，都没有任何理由担心俄国和芬兰之间会发生严重冲突。“我相信这一点，因为就我所知，俄国对芬兰的要求是有节制的。”在以后的几个月中，这一严格遵照1939年8月23日苏德附加秘密议定书规定的政策始终十分认真地贯彻着，这不仅有掏德国的威信，而且也牺牲了芬兰对德国的粮食、木材、铜、钼等宝贵物资的出口。

英国官方的态度是十分谨慎而含蓄的。在此阶段，伦敦方面感到，不应采取任何行动来减弱莫斯科意识到德国危险的感觉——如果莫斯科的确意识到这种危险的话——或者损害与苏联继续合作的些微的可能性。如果象有人曾经建议的那样，英国果真向莫斯科提出抗议，其语气必然是含糊而克制的。

总而言之，芬兰政府只要以现实的态度估量一下外国是否可能作出有效的支持，当时就不会对苏联固执己见，实际上等于是拒绝苏联主要的要求了。

可是，发生的情况就是这样。它是在芬兰内阁经过同议会党团协商表明政府获得一致支持之后发生的。无论外国援助的可能性如何，他们觉得苏联的要求必须予以拒绝，因为这些要求对芬兰国家存在的基本条件构成了威胁。

于是，在10月31日通过了致苏联政府的照会，毫不含糊地声明，芬兰政府“不能同意外国在芬兰领土上驻扎66军队或以任何形式利用芬兰领土作为海军基地。这些行动与芬兰的主权及其国际地位和严格中立的态度是不相容的”。

同一天，10月31日，莫洛托夫在最高苏维埃作了一次发言，陈述了这样的论点：既然德国与波兰之间的战争已经结束，所以德国正在力求和平，但是英法却一心想继续打欧战，并尽量把许多中立国家拖入战争。正是后面这一点（莫洛托夫在一星期后的另一次发言中，附带对这一点又作了详细阐述），给苏芬谈判增添了一种“特点”——直到那时为止，谈判只涉及苏联的安全，特别是列宁格勒的安全。按照莫洛托夫的说法，之所以产生这种“特点”，主要应归因于芬兰国内有着大量“外来影响”在起作用。甚至罗斯福总统的电报，也被说成“难以与美国的中立政策自圆其说”。另一方面，苏联的建议只限于“必不可少的最低要求”，而且符合芬兰安全的利益。当欧洲的中心正在掀起一场使举世感到震惊和为全球造成危险的战争时，苏联被迫采取“认真的措施”以加强自己的安全。它希望芬兰不要阻挠达成拟议的协定，假如芬兰要阻挠的话，那末它的行动——讲到这里莫洛托夫用威胁的语调说——“势必对芬兰造成严重损害”。大体上说，莫洛托夫关于谈判的叙述，相当温和，没有谩骂。他讲得清清楚楚，苏联对安全的要求必须得到满足，但是没有证据说明苏联要危害芬兰国家的存在。

莫洛托夫讲话中直接与苏芬谈判有关的一段话具有两方面的作用。第一，他的讲话是一个强有力的、蓄谋已久的企图，目的在使芬兰得不到它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西欧或者美国可能得到的支持。第二，由于莫洛托夫透露了谈判中的争端，苏联政府此后将公开提出它的要求70的实际内容。

这一讲话发表后的第二天，芬兰外交部在一份公报中抱怨道，莫洛托夫公开说明苏联的观点，已经造成了新的局面。公报否认存在外国影响和外国

干涉的说法。针对莫洛托夫提出的苏联政府可能被迫采取“认真措施”的警告，公报尖锐地表示要取消对互不侵犯条约承担的义务。埃尔科在 11 月 1 日的讲话中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原有的协定不能得到遵守，怎么能够肯定新的条约将得到尊重呢？这并不是说要促使莫斯科考虑作更大的让步。此外，当时正在去莫斯科路上的芬兰代表，听到莫洛托夫的讲话。就在列宁格勒停下来了。他们接到指示，要他们继续前进，并递交芬兰内阁于 10 月 31 日通过的一份不妥协的照会。在这变化无常、犹豫不决的关头，在这不得不根据片面印象而不是根据事实作出判断的时刻，芬兰政府所制订的政策是感情用事的——由于祖国有遭到危险的威胁而激发出来的感情——但毕竟是感情用事的。从此以后，谈判就在层层加深的疑虑和敌意的阴云中进行。

达成协议的真正可能性是不存在的。斯大林——象一个与巴锡基维和但内尔接触频繁的记者所说——还是被建立汉科基地的计划“完全迷住了”。据说，莫洛托夫是用这样的话来结束巴锡基维和坦内尔回到莫斯科后的第一次会谈的，他说，现在该轮到军方来说话了。但是，苏联领导人针对芬兰人提出的不得在他们的领土上建立外国基地的说法，提出了两项可供选择的新建议。第一项是基地不建在汉科，而建在附近的一群岛屿上。关于 71 这一点，当芬兰代表请示时，赫尔辛基方面答复道，“我们不能同意在汉科建立军事基地的理由，同样也适用于所说的这些岛屿”。即使割让的话，这些岛屿还是要保留在芬兰领海以内。第二项建议是关于出售汉科附近的领土，这样，事实上汉科就将变成苏联的领土。芬兰再次作了否定的答复。

莫斯科的最后一次会谈是在 11 月 9 日举行的。几天之后，赫尔辛基批准芬兰代表回国。他们在 11 月 13 日的告别信中相当含糊地表示，希望在将来某个时候谈判能获得成功。这时候，苏联对芬兰的宣传攻势正在全力进行。更有甚者，苏联报刊已开始把芬兰统治阶级的“战争贩子”态度与据说亲苏的人民群众的态度进行了对比。这是苏联出于防务的需要，论调起了不祥的变化。另一方面，在芬兰，人们听到代表团返回的消息后，比较镇静，甚至开始出现松了一口气的情绪，直至卡延德总理感到不得不向全国发出警告，要警惕虚假的安全感，为此他被骂做“小丑”、“虚声恫吓的稻草人”、“白痴”、“傀儡”，这些全都出自同一期的《真理报》。

11 月 26 日下午 3 时 45 分，不可避免的边界事件发生了。当天晚上 9 点钟，莫洛托夫递交于尔耶-科斯基 72 号一份照会，抗议说：苏联一侧离边境数英里的麦尼拉附近的苏联军队，遭到来自芬兰领土的“挑衅性”炮击。有十三人伤亡，其中死亡四人。他要求驻在卡累利阿地峡的芬兰军队撤离边界十三至十七英里。次日下午 1 时，芬兰政府作了答复，声称炮击来自苏联领土，同时，表示愿意和对方一起撤军，并对这一事件共同进行调查。四小时后，莫洛托夫宣布，由于芬兰政府“拒绝”撤退军队，废除苏芬互不侵犯条约。11 月 29 日，苏联报纸报道了工厂集会，抗议芬兰政府和“一帮帮由资本家武装起来的贪得无厌的芬兰宦农的无礼挑衅”。就在当天晚上，于尔耶-科斯基宁收到由波将金转交的莫洛托夫的一份简短照会，宣布与芬兰断绝关系，理由是芬兰正在边境各个地点继续发动进攻。

在 11 月 29 日的一次广播中，莫洛托夫宣称，从这时起红军将防患于未然，制止芬兰的进一步挑衅，同时，他的政府已作出重要的决定以捍卫苏联的安全。苏联政府无意损害芬兰的独立或侵犯芬兰的领土。实际上，如果芬兰人的态度不那么僵硬的话，苏联政府还将善意地考虑卡累利阿人民和他们

的芬兰亲属团聚的问题。他说，“无论芬兰建立什么样的政权”，它都有权决定国内政策和对 73 外关系。但是，苏联的安全决不能听凭心怀叵测的芬兰政府任意摆布，这个政府实际上已经陷入了“对帝国主义者承担反苏义务”的境地。莫洛托夫在结束讲话时说，这些问题可以在与芬兰人民友好合作的情况下解决。这样，他是企图使得即将采取的军事行动具有内战的性质。苏维埃化的幽灵再次出现在芬兰上空。

为了减轻德国可能存在的任何忧虑，斯大林亲自出马对莫洛托夫的讲话特地作了补充。他在对《真理报》编者的讲话中，重申并扩充了莫洛托夫 10 月 31 日讲话中的论点：法国和英国应对这场战争负责，正是它们，既拒绝了德国的和平建议，又拒绝了苏联为和平所作的努力。看来，苏联政府似乎正在更加靠拢柏林。苏德协定还没有得到完美的结果。而时间紧迫，最主要的是冬季即将来临。

11 月 30 日拂晓，莫洛托夫广播后才几个小时，苏联军队就越过了边界，苏联飞机轰炸了赫尔辛基、维普里以及芬兰其他城市。入侵开始了。

第三节 冬季战争

1939 年 11 月 30 日至 1940 年 3 月 12 日

冬季战争持续了整整一百天以上。红军向卡累利阿地峡以及沿拉多加湖与北冰洋之间的苏芬边境分五路推进。由于地形和严冬的酷寒、苏联最高统帅部和从事政治战有关当局的错误估计以及苏军装备上的缺点，使得及时动员起来的芬兰军队处于有利的地位。虽然如此，事实上（事实偏偏能决定斗争的胜负）芬兰毕竟是一个只有三百五十万人口的小国，而要与苏联的全部力量对抗。

芬兰的抵抗是出色的。它立即赢得了全世界的钦佩。同时，芬兰政府竭尽全力使外国的同情变成实际 74 的援助。可是，等到它的努力开始有希望取得实质性的结果，即等到组成一支法英远征军的时候，芬兰人却已经在寻求向敌人屈服的体面条件了。原因是：西方优柔寡断，行动迟缓；瑞典在德网压力下制造障碍；而苏联最高统帅部觉察到自己的错误后，则以更为巧妙的方法来干。

战争爆发后，苏联政府立即在边界附近芬兰境内的泰里约基建立了一个以奥托·维拉·库西宁为酋的“芬兰人民政府”，库西宁是在莫斯科共产国际工作多年的芬兰共产党员。克里姆林宫把这个“政府”称为芬兰唯一合法的政府，企图根据这个站不住脚的、无法使人信服的借口来证明苏联并未与芬兰开战。正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行的政治战中所采取的其他某些措施一样，这个为芬兰成立的“人民政府”也是一次失败。它的军队，所谓的“人民军队”，在战争中不起作用。而且，尽管莫斯科承认了这个“政府”，并按照与波罗的海国家缔结的条约那样，与这个“政府”缔结了一项友好互助条约，可是这个“政府”的活动从来也没能动摇过芬兰人民的团结和决心。当苏联与赫尔辛基政府媾和的时刻到来时，这个 75“人民政府”——正如 1940 年 3 月 29 日莫洛托夫在最高苏维埃作报告时所说——在通过提供意见和表示赞成等方法帮助了苏联政府以后，适合时宜地决定自动解散了。

12 月 10 日，芬兰议会发出严正呼吁，要求其他国家支援芬兰的斗争。再早一些，在 12 月 3 日，芬兰政府便援引国际联盟盟约第十一条和第十五条，要求国际联盟进行干预。芬兰政府的代表霍耳斯提在国联大会上说：“我们已无法按照国际上作出的决定保护芬兰人民免遭侵略者的子弹、炸弹、榴霰

弹和毒气的伤害。”

国联大会和国联理事会迅速在 12 月 14 日通过决议，谴责苏联为侵略者，因为苏联的行动表明它已把自己置于国联之外。决议还建议国联的成员国以及非成员国尽自己能力所及向芬兰提供援助。这样，理事会中剩下的三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的苏联就被逐出了国际联盟。另一方面，芬兰却被选进理事会，填补瑞典的空缺。

国联理事会——根据盟约第十六条第四款，有权处理开除事宜——中有七个国家对决议投赞成票（比利时、玻利维亚、多米尼加共和国、埃及、法国、南非联邦和联合王国），两国弃权（中国和芬兰），希腊和南斯拉夫对决议中有关把苏联开除出国际联盟这部分未投票。国联大会则一致通过决议，但有十个代表团——包括波罗的海国家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弃权或有某些保留意见。南美洲的一些会员国站在最坚决地支持措辞强硬的决议的国家之列，其中——正如苏联报纸一语道破的那样——有九个国家与苏联并无外交关系。确实，中立国的勇气看来与它们同冲突地区的距离是成正比例的。

苏联政府自始至终拒绝出席会议。它对被开除出国际联盟“处之泰然”。它决定充分利用苏德协定带来的有利条件。在它看来，国际联盟是完全受英国和法国支配和控制的。因此，国联的行动不会大大改变原有的权力关系。培斯社评论道，国际联盟“已由某种‘和平工具’变成了真正的战争工具，变成了英、法军事集团的武器”。

这是国联采取的最后一个人政治措施。对处于战争状态的欧洲，它的做法似乎有些不现实。它是在瑞士政府坚决要求不得讨论在西方进行的战争，也不得对之采取行动的前提下，来讨论在芬兰进行的这场战争的。这时代表团纷纷回去了。秘书处的成员各自参加了本国的战争工作。国联大厦宽敞的大厅和走廊里一片寂静。

对苏联的义愤，对芬兰的同情，也许在英国、法国、瑞典和美国最力强烈，但在意大利、匈牙利、西班牙，甚至在德国，亲芬的情绪也颇为高涨。可是德国当局立即采取措施禁止对芬兰表示同情，并停止经由德国向芬兰转运任何战争物资。此外，经过希特勒批准，下达了这样的指示：德国轮船应向波的尼亚湾内的苏联潜艇秘密供应燃料和食品。

英国、法国、瑞典为芬兰在冬季战役中的抵抗送去的 77 武器固然重要，但是却无法决定这场战争的胜负。来自美国的援助主要是贷款，而此项贷款只限于购买民用物资。遇上了选举年，尽管罗斯福总统十分明确地对芬兰表示同情，华盛顿政府却不准备将其支援超出这个范围。其他国家在物质上的援助规模也不大。供应的物资要付现款，运到芬兰平均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武器运到以后，还得训练军队使用这些新武器，所以，在冬季战争期间，大批装备根本就没有用上。再说外国志愿部队，它总共只有大约一万一千五百人，其意义主要是精神上的。大多数志愿军直到战役结束也未能作战。丘吉尔在回顾往事时判断说：“事实上，他们什么有用的事也没做。”这句话可能是大苛刻了。但是，尽管在这年年底和次年年初之交取得了辉煌的战绩，芬兰最高统帅部仍然认为，最后只有英国和法国的武装干预才能救芬兰。

对于那些独裁者的为所欲为，人们是太习以为常了。尽管英国和法国的舆论界普遍感到愤怒，为之激动，但是最初也只好无可奈何地眼望着苏联入

侵。然而，苏联受挫和芬兰持久抵抗的消息传来后，舆论转变了风向，越来越强烈地赞成提供积极的军事援助。尽管有人提出了警告，⁷⁸可是舆论界似乎从未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提出这样要求的必然结果，这就是，由于干预芬兰的事，很可能使盟国陷入与德苏联合力量交战的境地。民间要求干涉得到了官方的响应。在法国，当苏联入侵刚刚开始，这种情况就出现了。而英国政府则自从苏德协定签订以后，对待苏联一向审慎，所以跟得比较慢。

大战中的这一扑朔迷离，情况错综复杂到几乎自相矛盾的时期——这时西方盟国与苏联之间发生战争的危险是如此现实——所牵连到的更广的方面，不属于本章叙述的范围。西方盟国采取的态度是由下列因素造成的：反苏情绪；对苏德勾结和国内的共产党活动（就法国来说还有军队中的共产党活动）感到愤慨；法国由于西线战场无所作为而感到灰心丧气；以及对德苏力量的严重低估。与此同时，也有某些较为现实和具体的考虑，支持盟国在芬兰采取行动。由于挪威可能被卷入，而瑞典肯定会卷入，所以进行干预就将开辟一个反对德国的新战场，这个战场类似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马其顿战线。切断瑞典对德国铁矿砂的供应就容易实现。只要芬兰领土上的冲突在继续，德国就将丧失它原来可能从苏联得到的供应，特别是石油的供应。对芬兰事件进行干预，再配合进攻高加索油田，可望制止苏联在东南欧采取行动。但是，现在只要回顾一下，事情就很明白，就是把所有这些考虑到的事合在一起，与采取一项政策，使这两个西欧国⁷⁹家同时与德苏作战而必遭毁灭的后果相比，那就无足轻重了。

这些计划很慢才考虑成熟，事态发展表明，要使芬兰免于战败，行动实在太慢了。12月19日，最高作战会议第一次讨论派军队去芬兰的可能性。建议由达拉第提出，但是没有得到英国人的支持，他们担心与莫斯科的关系破裂。不过，到1月中旬，盟国进行干预的原则总算被接受了，经过专家们研究，决定在摩尔曼斯克、佩特萨莫或纳尔维克登陆。直到2月5日，最高作战会议才批准派一支部队经挪威和瑞典前往援助芬兰人“并附带控制那利瓦勒矿区”的计划。涉料到德国要干涉，不得不分出一部分兵力去支援瑞典对抗德国。丘吉尔说，“纳尔维克及其越过山区通向瑞典铁矿的铁路，即使撇开其战略上的意义不谈，也有一种新的感情上的意义。”因此，在摩尔曼斯克或佩特萨莫登陆的主张被放弃了，而且，在回顾往事时，人们对这个未能实施的计划在军事上是否稳妥也表示了怀疑。1940年2月初利德尔-哈特上尉就写道：“轻骑旅突击的办法，用在小战术上已经够蠢，用在大战战略上就更糟不可言了。”

柏林觉察到盟国援芬计划中包含着对德国造成的危险。1月间，德国海军参谋部从最高统帅部接到一项研究任务，根据的“前提是，如果英国在挪威地区立住了脚，将在军事战略上造成一种使德国无法容忍的局面，对德国来说，防止出现这种局面的唯一办法，就是抢在英国之前行动，首先占领挪威”。不管怎样，要是英国的这个计划成³⁰功，结果反将使德国立刻把战争扩大到丹麦和瑞典。同样，苏联对盟国在挪威和瑞典的意图，也有所猜疑。

与盟国计划有关的是它们打算直接或是通过芬兰要求挪威和瑞典让它们的军队过境。很难理解，它们怎么能指望这两个国家会同意这样的计划，这个计划的结果之一将是切断瑞典对德国的铁矿砂供应，因而可以肯定会引起德国采取反措施。“如果挪威和瑞典拒绝——这看来是可能的——那该怎么

办？”丘吉尔写道，“这个问题从来也没有得到过正视。”要取得它们的同意，的确很少希望。两国政府准备让非官方的援助以及志愿兵去芬兰，面对国内舆论，它们舍此还有什么办法？让志愿兵和属于芬兰政府的武器过境也获容许。可是，让英国或法国的武装部队和物资过境，那就根本办不到。

关于这点，挪威政府和瑞典政府向德国人作了坚决保证。此外，1940年1月11日和12日，两国国王分别发表声明，强调两国对当时的冲突所持的中立立场；1月19日，丹麦议会也通过了一项类似的政策声明。2月间，当盟国的计划开始具体形成时，三国又重复了上述声明。在瑞典，2月16日汉逊首相直接指出不允许外国军队过境；2月19日国王谈到这样做要冒严重的危险，不仅会卷入与俄国的武装冲突，而且还会卷入大国之间的战争，并谈到必须继续保持中立。

“阿尔特马克”号事件进一步加强了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置身于冲突之外的决心。可是，一个更为重要的理由却是在斯德哥尔摩获悉，芬兰正谋求与苏联媾和。

在苏芬战争初期，赫尔辛基就已经通过瑞典和美国试图与莫斯科恢复接触，可是徒劳无益。事实上，对芬兰来说，它绝不是要在战胜和战败之间作出选择。芬兰能够指望的最好结果，乃是进行一场能够顶住敌人的战斗，直到莫斯科由于外来的压力而自愿降低要求。芬兰的政策方针之一，就是对苏联政府施加这种压力；另一个方针是设法与莫斯科直接谈判。

1月间，芬兰人再度试探与莫斯科媾和的可能，这次是通过柏林进行的，俱毫无结果。一面又在斯德哥尔摩通过官方和非官方的渠道同时进行试探。1月29日，苏联政府通过斯德哥尔摩转告对方，它在原则上并不排除与“赖提—坦内尔政府”达成一项协议。它预先通知芬兰政府，它迫切要求得到的东西，范围更为广泛了，问赫尔辛基打算作何让步。这样，恢复谈判的第一个障碍——

“库西宁政府”的存在——被排除了。

芬兰人在2月2日的答复中建议，“原来在莫斯科谈判得出的结果”应作为重新谈判的起点。另外，为了满足列宁格勒安全的需要，他们愿意在交换的基础上割让卡累利阿地峡上以前从未特别提到过的一部分领土。至于苏联在汉科地区建立基地一事，则只字未提。相反地，赫尔辛基建议通过国际协定实现芬兰湾的中立化。2月5日，苏联政府拒绝以这些条件作为谈判基础，这一天正是盟国最高作战会议决定派出远征军的日子。

此后大约有两个星期，在外交战线上没有再发生什么事情。莫斯科大概正在等待它的新军事攻势的结果；而赫尔辛基则正心神不定地盼望盟国的计划能够实现，这样，即使不能有更多好处，至少能加强它对莫斯科讨价还价的地位，也许还能促使斯德哥尔摩和奥斯陆采取更积极的援助方式。

2月20日前后，第二阶段开始了。苏联政府把它的条件通知斯德哥尔摩和伦敦，这些条件中包括租借汉科，割让卡累利阿的更多土地，包括维普里、索尔塔瓦拉、凯基萨尔米等城市。这些要求对芬兰政府来说是太苛刻了。可是时间紧迫，苏军在苏马取得胜利后，已突破曼纳海姆防线，直指维普里。盟国的计划虽然大体上已经清楚，但是远征军的确切规模，最重要的是这支军队到达芬兰的日期，还不可知。第一支分遣队在3月底以前几乎毫无指望能到达。要求瑞典、挪威允许军队过境问题也仍然没有解决。不仅如此，瑞典政府甚至十分明白地表示，芬兰不能指望瑞典同意盟国军队过境，或者

指望瑞典对这场冲突进行武装干涉。瑞典政府认为，进行干涉不仅会导致瑞典与苏联开战，而且——瑞典首相汉逊强调，他已受到柏林的警告——还将使它卷入大国之间的战争。另一方面，如果盟国军队企图强行过境（汉逊有一次对坦内尔说），瑞典将站在苏联一边与芬兰作战。尽管苏联提出的条件难以接受，但汉逊仍敦促芬兰政府与莫斯科媾和，同时表示，在这件事之后，芬兰可望得到瑞典的经济援助。

芬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曼纳海姆元帅的意见也是如此。2月28日，他在总司令部对总理和政府的其他四位成员陈述了自己的主张，必须立刻，即在军队被击溃以前，就缔结和约。如果军队一垮，就将失去与俄国人讨论媾和条件的任何机会。他自称说服了部长们，但是他必须首先说服他自己手下的将领们，因为他们中间除了一人以外，直到那时还都认为必须继续战斗。

据曼纳海姆元帅说，芬兰政府在2月29日作出了进行谈判的决定，但是这一决定并未立即付诸实行。芬兰进一步征求伦敦和巴黎的意见，主要希望它们作出有利的答复，可使苏联的要求变得温和些。3月1日，芬兰问英国和法国政府，第一支五万人的分遣队是否能在3月份登陆，一百架轰炸机是否能立即运出。达拉第未和伦敦磋商就都答应了；而英国似乎只同意马上提供五十架轰炸机。进一步的有关远征军的消息不断传到赫尔辛基，这些消息是相当矛盾的，直到3月7日，部队的组成方式以及到达芬兰的日期才有了确切的消息：第一支分遣队——一个英法混合师——可望在3月底以前经纳尔维克到达芬兰，第二支分遣队——三个英国师——84日有把握可通过铁路运输，立即就可赶到。巴黎和伦敦方面都催促芬兰政府正式提出求援的呼吁，并坚持必须立即提出。但军队过境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的端倪。

与此同时，通过斯德哥尔摩与莫斯科进行的间接接触仍在继续。芬兰人这时不仅愿意割让芬兰湾东面的岛屿，而且也愿意割让汉科以及卡累利阿地峡上红军已经到达的地带。然而，他们希望保住维普里和包括索尔塔瓦拉在内的拉多加湖西北的地区。芬兰为争取德国对此支持而作了最后的尝试，但是也失败了。3月4日，希特勒对正在访问他的斯文·海定说，“唯一的出路，不是寻找第三方面调停，而是芬兰与俄国之间直接解决。”第二天，3月5日，芬兰人获悉，苏联政府一心想要芬兰割让维普里和索尔塔瓦拉，而且坚持必须接受其要求，和谈必须立即在莫斯科开始。此时，维普里的失陷已迫在眉睫，芬兰最高统帅部正在把最后的一点后备军十四个营的兵力投入战斗。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在3月6日决定派出全权使节赴莫斯科，然而同时，又请求西方国家再放宽八天期限，好让芬兰正式要求它们援助。

西方盟国规定3月12日为芬兰发出求援呼吁的最后期限。3月11日，芬兰在紧急关头再向斯德哥尔摩询问，是否可让远征军过境，但再次遭到对方断然拒绝。

而且，3月9日曼纳海姆已明确地劝告政府求和，因为卡累利阿地峡的形势已无法防守，而外国的援军至少也须几周才能到达，何况也无济于事。

苏联政府机敏地拒绝了芬兰的停战建议。芬兰总理赖提遵照苏联政府的要求，当战斗还在继续的时候就率领代表团飞往敌方的首都去谈判和平了，这在现代史上也许还是第一次。单单这种局面就使真正的谈判很难进行。大概是芬兰不想介入大国战争的愿望，使得苏联乐意与之媾和。可是，一旦芬兰的全权代表到了莫斯科，公开派出一支盟国军队（曾先后遭到瑞典和德

国的反对)的前景已不能阻止苏联领导人把他们认为确保国家安全所需要的那些条件强加给芬兰人。因为在此期间,芬兰正面临被击溃、被毁灭的威胁,而莫斯科则恰当地估量了这一形势。这样,由于芬兰的两种政策路线交织在一起,而芬兰政府又面对着莫斯科提出的“要么接受,要么拒绝”以及伦敦、巴黎规定的最后期限,盟国干预的计划(不久前还被认为是芬兰政府在谈判桌上唯一的王牌),其价值就减少了。因此,3月11日,得到议会支持的芬兰政府只好通知它派往莫斯科的代表团,迫于军事形势,接受苏方条件。和约于3月12日凌晨签订。

第二天,战斗停止。但是,年迈而笃信宗教的芬兰总统屈厄斯提·卡利奥在签署授予特使全权签订和约的委任书时,却发出了《圣经》中的诅咒:“让我这只被迫签字的手枯萎了吧。”

就在3月12日这同一天,张伯伦的内阁决定重新实行派一支远征军在纳尔维克、特隆赫姆、卑尔根和斯塔万格登陆的方寒、作为援助芬兰计划的一部分。

第四节 1940年3月12日的和约 86

莫斯科谈判进行了五天。谈判进行的真相是保密的。在会谈过程中,苏方的条件甚至比原来更苛刻了。因为的,而俄芬停战协定购签字,”则使唯一有可能劝说斯堪的纳维亚各国收府或人民去冒险不守中立的理由消失了”(德里:《挪成肢役》,第14页)。以后的情况将在本书的另一部分加以叙述(几下文,原著第117—118页)。

除了芬兰湾的防备和列宁格勒的安全以外,这时苏联又进一步提出要保障它西部唯一的不冻港摩尔曼斯克及其通往列宁格勒铁路线的安全,作为新的目标。

根据这一和约,芬兰丧失了整个卡累利阿地峡。这里的边境线向西北方向移后了大约七十英里。芬兰被迫把维普里及与其毗连的海湾中的岛屿割让给苏联。拉多加湖及其沿湖地区,包括凯基萨尔米和索尔塔瓦拉等市镇,这时已全部划进苏联疆界。芬兰湾内的某些芬兰岛屿,包括霍格兰、蒂塔尔萨里、拉万萨里、佩宁萨里和谢伊斯卡里等岛,也都割给苏联。根据俄芬边界线必须远离列宁格勒—摩尔曼斯克铁路线的精神,芬兰还失去了距离该铁路线最近的梅尔卡湖和库奥拉湖以东的一些领土,以使苏联与科拉半岛之间的交通得到更好的保护。此外,芬兰还给予苏联过境权,以便于苏联与瑞典之间的货运。

而且为了这一目的,芬兰承担义务参加横贯芬兰腰部地带的铁路建筑,以连结苏联境内的坎达拉克沙和芬兰境内克米湖畔的铁路终点站。挪威与苏联之间货运、客运在佩特萨莫地区以及横越该地区的过境权也确定了下来。事实上,这就意味着苏联这时已直达挪威边境,并已巩固了它在那条狭窄而至为重要的通向北冰洋的不冻港的地位。另外,雷巴契半岛和斯雷德尼半岛上沿北冰洋海岸的边界线也进行了调整。

濒临芬兰湾的芬兰海岸上的汉科角和周围海域以及海域内的岛屿租给苏联政府,租期三十年,每年租费为八百万芬兰马克,“以供建立能保卫芬兰湾入口免遭入侵的海军基地。”

最后,条约规定,双方应恢复经济关系,并商订一项新的商务协定。

和约没有条款说要索取战争赔款或强行规定苏军占87领芬兰领土。红军将撤离佩特萨莫地区及其蕴藏丰富的镍矿区。这可能是由于该地区有英国的

利益——蒙德镍公司的开采权。另一方面，芬兰工业中最重要的部分，包括木材、造纸和纸浆工业，部分分布在卡累利阿地峡。因此，割让的地方估计相当于芬兰百分之十至十四的最好的土地和经济资源。此外，塞马运河在维普里的进出口这时也落入了苏联手中，因而，俄国人就控制了芬兰东部的全部水道和湖泊网。居住在割让地区的大约有五十万人，约占芬兰人口的百分之十，据说在和约缔结后就迁出了。

条约并未给予苏联权力来对芬兰内部事务施加任何影响，或干预芬兰的防务或武装力量。苏联政府在这方面的克制，推测起来大概由于苏联怕被卷入已与英法处于对抗地位的欧战。

第五节 芬兰与莫斯科和约

推测莫斯科和约能否使苏芬关系有一个持久的基础，这样做是毫无意义的。克里姆林宫原来对芬兰的要求，就是打算加强苏联在欧洲主要冲突中的战略地位，条约的签订使它在芬兰湾以及波罗的海中心占有支配的地位。在陆地上，这项条约也为苏联西北部各口岸的防务提供了便利。

所以，从军事观点来看，苏联表示满意是有道理的。

但在政治上，随着欧战的演变，莫斯科不知芬兰将起何种作用的疑虑并未消除。固然，德国严格信守与克里姆林宫协议的条件，把苏芬冲突看作只是苏联自己的事情。固然，西方企图干预这场冲突的计划已经落空，挪威和瑞典的中立暂时也制止了欧战向北蔓延。但是有迹象表明，88 斯堪的纳维亚依然处于盟国战略范围以内，从而也就是处于德国要对之采取反措施的范围以内。这符合苏联领导人的根深蒂固的信念：战争不可避免地要扩大。因此，他们必然担心，芬兰人对于靖和条件的怨愤，以及挪威和瑞典在整个冬季战争中如此强烈地流露出来的亲芬情绪，当西方盟国把战争扩展到北方时，可能成为极易利用的因素。莫斯科必然考虑到了这种前景，所以在和约实施以后，接下来就是防止芬兰和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结成一个哪怕是纯粹防御性的同盟。

在芬兰，刚刚经受了这场严峻的考验，战败的悲痛，对苏联未来意图的重重疑虑，交织在一起。可是，几个星期以后，原来对德国在这场冲突中所持态度的愤慨，对盟国蹉跎不决和延误战机感到的失望，以及对瑞典拒不在这场斗争中发挥更积极作用激起的恼怒，统统开始被一种新的认识听取代：如果芬兰想要生存下去，就不能单枪匹马地去干。果然，和约签订之后不久，芬兰就得到了挪威和瑞典的保证，表示要重新考虑缔结共同防御条约的问题。在这变化无常的时期，一个国家要重整旗鼓，首要的关键之一就是防务问题。

因此，芬兰人虽然忙于重建家园和安置卡累利阿难民，仍然毫不迟延地开始重建国防。重整地方政权；从国外购买装备；修建了新的兵营、道路和运输线路。沿海 89 地区，在瑞典人的指导和财政援助下，修建了新的防御工事。芬兰民族的意志没有破灭，一旦需要，芬兰人随时准备再拿起武器，为祖国的独立而战。

1940 年 3 月 14 日，挪威议会深孚众望的议长查尔斯·汉布罗在议会中评论这个和约的条款时说，芬兰新的东部边界只能看作是临时的边界，必须重行调整。莫洛托夫坚决认为，汉布罗的讲话，还有“瑞典活动家”的某些声明，以及“芬兰国内也在大事渲染的东部边界问题”，都表明了拟议中的芬兰与挪威和瑞典结盟的真实目的是要对苏联进行报复。芬兰人举出的种种

理由是说明：芬兰的意图是尊重其义务；这个同盟将纯粹是防御性的；如果芬兰企图报复，瑞典和挪威并不是恰当的盟友。但是所有这些理由全都不起作用。莫洛托夫依然不信。他说，芬兰与挪威、瑞典之间的“所谓防御同盟，是完全违反和约的”。德国入侵丹麦和挪威，使这场争论暂时搁置，但苏联并未因此放松警戒。在这一年中，莫洛托夫曾两次重提此事。第一次在9月，他谈到他听说芬兰与瑞典已经结成秘密同盟；第二次在12月，那时苏联驻瑞典公使柯伦泰夫人向他报告说，有一项协议正在商谈中，该协议的含义是要使芬兰的对外政策听命于斯德哥尔摩。

1940年4月北欧战争的发展趋势使莫斯科解除了与西方盟国立即发生冲突的忧虑，可是也在恶化苏德90关系上起了作用。早在1939年10月底，德国海军舰艇出现在芬兰湾，就使得苏联政府忧心忡忡，根据苏联的要求，柏林同意把德国从事经济战的军事行动限制在更西面的水域。这时丹麦和挪威已处于德国占领之下，因此保持瑞典领土的完整就成了苏联急切关心的事了。

1940年初夏，德国在西欧节节胜利，在莫斯科看来，这是一个警告，苏联政府要不失时机地摘取苏德合作的最后一批果实，并要举国作好准备抵制德国的攻击。苏联在向德国表示祝贺，在发表公报消除疑虑的同时，把边界线迅速推向波罗的海沿岸，推向多瑙河口，而把国内的工农业置于战备体制之下。

苏联政府认识到，苏联友谊的价值，对于取得这些胜利的德国来说，已经大大下降。前途困难重重，这也反映在芬兰的局势中。有时风平浪静，如在阿兰群岛的地位问题上德国依然是俄国的忠实朋友；有时，摩擦局限在政府机构或外交往来的范围内，如在挪威峡湾建筑防御工事的问题或佩特萨莫的镍矿问题；有时，局势造成两国严重不和，如因芬德军队过境协定而产生的问题。紧张91始终存在，苏德关系日趋恶化。

这一时期的苏芬关系，必须根据上述形势来估量。6月27日，即苏联政府向罗马尼亚政府发出最后通牒的第二天，莫洛托夫着手与巴锡基维解决阿兰群岛的问题。他断言芬兰已在阿兰群岛设防。而苏联政府认为，如在该群岛设防，必须根据一项正式协议和苏联联合进行。此外，苏联政府还要求有权掌握防务情况。⁽¹¹⁾莫洛托夫承认，这些要求超出了和约规定的义务。他把这些问题以92及苏联希望参加开发佩特萨莫镍矿⁽¹²⁾的要求与芬兰迫切需要缔结贸易协定的问题⁽¹³⁾联系在一起讨论。苏联的要求是如此坚决，致使芬兰政府在缔结正式协定以前，就开始撤走了阿兰群岛上的部队和军备。⁽¹⁴⁾在谈判过程中，芬兰人争辩道，1921年缔结的旧公约为他们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若无各签约国的同意，不能更改。可是莫洛托夫不同意“向全欧洲遍发照会”，他要求芬兰在按照该公约采取任何措施时都要与苏联磋商。芬兰人固执地维护自己的主张。莫洛托夫恼羞成怒，称他们为无可理喻的人。

他又说。至于跟德国人打交道，根据经验，“就是大事情也只要几天就能解决”。10月11日，协定签字了。它规定芬兰必须使阿兰群岛非军事化，并且将来也不再设防，不能把它供给别国军队使用。苏联驻阿兰群岛的领事馆将监督这些规定的执行情况。

这样，尽管莫斯科取得了预期的结果，但是问题的解决却拖延了很久。在另一个具有重要军事意义的问题上，即苏联与汉科之间的陆上交通问题，

在苏联人看来，芬兰人依然是顽固不化的谈判者。而要在两国之间建立一般的和平友好关系，借助于这种关系，使一些悬而未决的政治和经济问题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和谐地解决，这个任务甚至更难完成。事实上，苏联的外交在这方面明显地碰了壁。芬兰人对俄国意图原有的怀疑，他们反对苏联对政府的概念。以及他们由于俄国入侵和随后芬兰的败北而感到的悲痛，这些都是无法消除的。而要消除他们对苏联政府是否愿意遵守和约的疑虑，也同样办不到。莫斯科非但不给芬兰怀有这种情绪的重要人物进行安抚，反而采取一项更为简单、但从长远来看是难以收效的政策。苏联政府通过报纸和外交行动支持“芬苏和平友好协会”这样一类的“同路人”。

这一政策招致芬兰舆论更大的对抗。从苏联的观点来说，更危险的是这种情况为芬兰和德国重修旧好铺平了道路，因为芬兰人感到，自法国瓦解之后，不再有希望从英国得到支援了。这就在莫斯科的对外政策中最敏感的一点即苏德关系上产生了反响。

甚至在缔结和约时，芬兰公众对德国普遍感到十分痛心的时刻，一些有权势的芬兰人士仍然认为德国能够使芬兰与莫斯科保持均势，并继续希望德国愿意这样做。继坦内尔之后任外交部长的维廷教授也抱有这种看法，他力图使德国能够取得更深一步的谅解。他的努力很快就得到舆论的支持，这种舆论随着德国在西线的节节胜利，“以排山倒海之势”转向亲德。

德国外交部对待这一提议非常谨慎。德国驻赫尔辛基公使布吕歇尔告诉维廷，秘密的（“暗中的”）合作将受到欢迎，但在表面上德国的态度只能依然是冷淡的。可是，在柏林的其他部门，却活动得更为起劲。戈林的密使费尔特延斯中校瞒着驻赫尔辛基的德国大使馆，伪装成贸易代表，于8月18日到达赫尔辛基，去问曼纳海姆，芬兰是否准备让休假的德国军事人员过境，是否准备让德国的军需供应过境，往返挪威北部。而芬兰方面以后则可从德国获得武器。曼纳海姆元帅在与政府磋商之后，于8月19日作了肯定的答复。德芬之间的谈判，起初纯粹是在部队代表之间进行的，后来达成一项为德军过境提供方便的协议，于9月22日签字。早一天，德国的第一批军队已经运到瓦萨。

这些谈判顶先没有通知莫斯科。在柏林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谈起这个协议以后，莫洛托夫就援引苏德协定第三条和第四条，于9月27日向驻莫斯科的德国代办蒂佩尔斯基希提出抗议。克里姆林宫知道，这时芬兰已为德国的渗透敞开了大门。

到秋天，芬德关系已成为德国和苏联之间的一个重要问题。它是1940年11月希特勒和莫洛托夫会谈时讨论的主要议题之一。那时，用魏茨泽克的话来说，希特勒“已把保护伞牢牢地罩住了芬兰”（hat seinen Regenschirmkraftig über Finnland gehalten）。

第四章 1939年秋季希特勒的“和平攻势”阿诺德·托因比

到9月的第三周，德苏两国对东北欧的瓜分事实上已经完成。就在德军与红军在波兰国土上会师的那天，波兰对这两个侵略国最后的有效抵抗在这一地带已被击溃。波兰既已经覆灭，当时依然幸存的东北欧国家就统统只好任凭苏联和德国摆布了。波罗的海三国是不设防的小国，只要何时夺取它们方便，随时都可以把它们置于苏联统治之下，就象后来很快做到的那样。至于芬兰，结果证明，苏联不经过战斗就不能使它就范，尽管如此，芬兰在“冬季战争”中由于得不到西方的有效支援，最终被迫接受苏联政府的条件，这一结局早在1939年9月底以前就已在意料之中。

因此，在这一阶段，希特勒在东北欧的直接战略目标已经达到。波兰已从欧洲的政治地图上被抹掉，这完全符合希特勒直到那时为止的策略，而在这个当口，他却需要把和平的触角伸向他的对手，已被消灭的波兰的两个西欧盟国法国和英国。

我们可以肯定，对波兰闪电战的胜利，在希特勒心目中是一个得意的杰作。在慕尼黑时，他固然由于吓唬得英、法和他勾结起来使捷克斯洛伐克听他摆布而自鸣得意，但这种得意的心情，也许因为对这场不够劲的胜利感到失望而有所冲淡，因为在这场胜利中他的吸血的愿望没有得到满足。这一贪欲在对波兰的战役中如愿以偿。在作战中，德国武装部队的新式装备和战术之高明得到了辉煌的证明。德国机械化部队在摧毁波兰军队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威力和速度，使全世界不寒而栗。波军虽然英勇，终因武器陈旧这一致命弱点而无济于事。对波作战无疑无疑是希特勒和德军参谋总部一致的意见。将领们和希特勒都肯定这一局部战争必然胜利，但是将领们是凭他们的专门军事知识来判断的，而希特勒却凭他那不可思议的直觉。美中不足的是，对波兰的袭击带来了一个不想有的、讨厌的结果：和英、法处于战争状态。希特勒可能比德军参谋总部更轻率地冒险把德军的机动兵力都投入了波兰战役。而使第三帝国面临只有最薄弱的兵力守卫西壁的险境。但是，希特勒曾根据法国和英国的作战心理作了估计，推测这两个西欧盟国当德军精锐在东线作战的时候，不敢趁机正面进攻西壁；而德军参谋总部则大概是从理论上而不是从个人感情上根据德国在波兰作战时西线双方潜力的对比来进行估计的。在这一点上，事实两次证明希特勒的大胆比德军参谋总部的小心要正确。可是，在波兰被消灭后德国应付西欧对手时下一步该如何行动这个问题上，希特勒和他的将领们的看法却又完全一致。他们都希望能诱使英、法接受东北欧的既成事实，尽管在这一点上，他们又是根据不同的考虑而这样决定的。

德国的将领们之所以希望与英、法媾和，是因为他们正确地认识到，对西欧的袭击若与这时已胜利结束的对波兰的袭击相比，乃是一项严峻得多的军事任务。而希特勒面对在西线有可能遭遇一场积极的进攻战这件事，态度却要沉着得多，在这一点上，从短时期来看，由于不久以后在1940年春季和初夏德国进攻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低地国家和法国取得了惊人的胜利，再次证明他是正确的。不过，尽管希特勒为他的军事直觉这最后一次的闪现所鼓舞，他在1939年秋季仍然为了自己独特的理由也想同英、法媾和。在原则上，他反对德国在两条战线上作战。这一直是他指控德皇威廉二世使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到失败的主要罪状之一。德国进攻波兰，激起了英国和法国对德国宣战，这样，希特勒就违反了自己的政治军事原则；同时，尽管他正

确地预见到英法的战争行动将不过是“虚张声势”，尽管他迅速地结束了波兰战事，从而把自己从开头一段短时期内从事两线作战的困境中解脱了出来，他却别有理由——不是理论上的，而是实际上的——希望这时能与两个西欧对手媾和。希特勒的手法，正如丘吉尔所识破并指出的那样，是“一个一个地”对付他的受害者，而在任何时候，都尽可能地使自己腾出一只手来，以便玩弄花招，随机应变。投机取巧乃是他的天性；这时他如果能与法、英媾和，他就能腾出双手来，对看来最有希望成功的下一个目标采取行动。东南欧可能落入他的罗网，那时西欧国家和苏联会袖手旁观，虽然感到不安，但是犹豫不决。接着，在希特勒认为最适宜的时机，在西欧国家默许之下，也许甚至在它们心照不宣的赞同之下，可能对苏联发动进攻。最后，也许兵不血刃就能使法国和英国与一个横跨西壁和乌拉尔山脉这整个空间的德国巨人谈判，求得一个政治解决办法，这个办法尽管表面温和，但是久而久之，将使英法听任这一庞大的第三帝国摆布。

可能正是出于这些主要的考虑，使希特勒在1939年秋季发动了这场“和平攻势”。他的将领们，还有人民，固然也都渴望和平，但这一事实对他的影响可能并不太大。他认为自己比将领们高明；同时，他自信能够驾驭德国人民，也正因为他是一个真正能蛊惑人心的煽动家，知道与群众的关系是自己的生命线，因而对于他们的情绪很敏感。另一方面，在法国，不仅公众，而且接近政权中心的有影响的阶层，也都渴望和平。这种情况，希特勒了解得清清楚楚，这大概是他希望这场即将对西方展开的宣传攻势能象不久前对东方的军事攻势取得同样成功的主要根据之一。在法国，失败主义情绪弥漫全国，这一点为波兰战事结束后十二个月之内的一场军事考验所证实。不过，正因为法国当时的情绪如此消沉，如此漠然，以致除了在军事上惨败以外，没有什么能使法国政府完全改变它公开宣布过的政策，即与英国结成同盟，把战争进行到底，直到推翻纳粹政权，恢复东北欧的原状。

这是希特勒在1939年秋天的第一个失算。第二个失算是他没有意识到这样的变化：1939年3月15日占领布拉格已经激怒了张伯伦和他在唐宁街的内阁同僚，以及英国人民。固然，从那时起直到战争爆发，张伯伦和他的同僚曾有迹象表明渴望恢复他们原先的绥靖政策。但这些现象都是靠不住的；而且，无论在希特勒袭击波兰以前，还是在他胜利结束这一战争之后，即使英国政府再度想要向希特勒让步，看来任何这类行动，无疑只能导致其下台。英国政府一次又一次和希特勒达成的“最后”解决办法，都由于希特勒方面突然发动新的侵略而迅速完蛋。自从1939年3月15日起，英国人民对于一直生活在这种反复无常的状况中感到了厌恶和腻烦。这时他们既已鼓起勇气要和希特勒打一仗，他们就下定决心，除非和约的条款有可能得到贯彻，就不再和德国议和；他们的这一决心就是要坚持战斗，直到彻底打垮纳粹政权。希特勒还没有认识到这种决心的力量，就是英国人民自己也还没有正视它的全部含义。此刻，他们的情绪仍然是被动应付的。他们坚决反对任何进一步的绥靖做法，不过还没有准备好作出巨大的努力，这种努力乃是主动地谋求胜利所需要的。然而在英国，不论政府也好，人民也好，情绪都不是失败主义的，与法国当时普遍存在的情绪不同，这是希特勒的秋季和平运动触上的第二个暗礁。他的第三个失算是他希望——尽管这也许只是他的一线希望——谋求罗斯福总统从中斡旋，以使法国和英国接受德国的条件，这些条件假如不是由美国提出，就极少有可能被英法接受。但是间接从德国方面传

出的消息说，华盛顿政府并不愿意向伦敦和巴黎提出这样一项和平解决办法，这个办法将使纳粹政权继续在德国执政，并承认德国夺取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征服波兰。

这就是希特勒在 1939 年秋季的“和平建议”及其遭到英法拒绝的政治背景和心理背景。

当德国对波兰的军事进攻将要以德国在局部战争中的完全胜利告终的迹象刚刚变得明显时，德国在政治上的花招就已准备就绪了。早在 1939 年 9 月 9 日，戈林在柏林一家兵工厂讲话时就谈了下述几点意见，以后希特勒对之又加以发挥，这些意见是：两次大战之间的那个波兰决不允许复国；希特勒这时希望和平；该由张伯伦来决定何去何从；德国对法国并无要求。法国人是否意识到他们正在被英国当作走卒，受其愚弄？戈林开了头，接着希特勒本人 9 月 19 日在但泽发表的一次讲话中说：

德国的要求是有限的，但也是不让步的。……我没有对英国和法国作战的目的。……波兰决不能按照凡尔赛和约规定的形式复国。这一点不仅要由德国，而且也要由俄 99 国来保证。……当英国宣称战争将继续三年的时候，我只能对法国士兵表示同情。

在对方的首相和总理中，达拉第首先作了答复。9 月 22 日，他在广播中拒绝希特勒的建议时郑重地宣称，德国企图离间英国与法国的关系，离间法国人彼此之间的关系，这是决不能得逞的；同时他又郑重地赞扬了英国的备战努力。根据以后发生的事情来看，他这样做也许是很重要的。9 月 28 日，德国政府和俄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宣称已“最终解决了波兰国家解体后所引起的问题”，并“从而为东欧的持久和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鉴于这种情况，两国政府共同表示相信，结束德国和两个西欧国家之间的战争状态，将真正地有利于各国人民。10 月 3 日，张伯伦在英国下院阐明，这一声明显然含有下述两点内容，“暗示建议媾和，如果该建议遭到拒绝，结果就是几乎不加掩饰地进行威胁”。

〔他继续说下去〕没有任何威胁能迫使我国或法国背弃我们为之进行这场战斗的目标。……德国现政府的任何空口保证我们都不能接受。……如果……建议提出来，我们一定要根据我刚才讲的话对之进行审查和考验。

10 月 4 日，达拉第在巴黎国民议会外交委员会说了与早一天张伯伦同样意思的话。

10 月 6 日，希特勒重复了他的和平建议，这次是在柏林的国会大厦。他重申，关于允许两次大战之间的波兰复国一事，他连听也不要听；尽管他在列举德国在东北欧的目标时，提到要建立一个新的“波兰国家，其组成和管理，既要防止它再度变成反德活动的温床，又要防止它再度成为反对德国和俄国的阴谋中心”。他还重申了其他意见。他说：他丝毫不反对法国；他也愿意与英国达成谅解。他希望德国原来的殖民地能归还给德国，但这一要求不是最后通牒。“在西方继续维持目前现状是不可思议的……让那些视战争为更好解决办法的人来拒绝我 100 伸出的手吧！”他说，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德国决不象它在 1918 年时那样投降。10 月 10 日，希特勒在体育宫开始 1939—1940 年度的冬赈运动时强调了最后这一点。

10 月 10 日，达拉第通过广播对希特勒在德国国会大厦的演说作了答复。这位法国总理这次又郑重地赞扬了英国的备战努力，并嘲笑了德国离间两个西欧盟国的企图。10 月 12 日，张伯伦经过与法国政府及各自治领政府磋商

以后，在下院宣布断然拒绝希特勒的建议。张伯伦正确地阐明了希特勒提议“建立他所谓的欧洲安全的稳定因素”，实际上就是要别人“承认他的征服”，并“承认他对被征服国家为所欲为的权利”，张伯伦声称，“要英国接受任何这样的基础是办不到的。”

德国总理演说中的建议是含糊的、不明确的，而且也未含有改正对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错误做法的迹象。……因此，其结果是清楚的。德国政府必须用明确的行动，并对他们打算履行的诺言作出有效的保证，来为他们希望和平的诚意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否则我们一定把自己的责任进行到底。现在要由德国来作出抉择了。

如果把张伯伦在这个场合让德国人民抉择的内容分析一下，那就是，要么由德国人自己来废黜希特勒，要么眼看着由英国和法国用武力来废黜他；因为，事情很明显，只要希特勒继续执政，他就既不会放弃已经非法攫取的领土，也不会保证——除了重复他那破了产的诺言——将来不再坚持同样的方针。在希特勒方面，他要求英国和法国默认他直到此时为止从事侵略的全部成果，以交换他那些已成为口头禅的甜言蜜语，而事实总是证明这些甜言蜜语比希特勒在其中吐出这些话的空气还要轻浮。两个西欧国家与德国之间的鸿沟是如此之宽，以致除非通过战争的烈火，没有使之弥合的希望。的确，此时双方都认识到，德苏两国的消灭波兰和瓜分东北欧，并不意味着战争已经结束。东北欧的战争状态，将由西欧和大西洋地区的战争状态继续下去。这破灭了希特勒的幻想，而希特勒对这一新的前景所作出的反应，反过来又将使英国和法国的幻想遭到破灭。但在这时，英法政府却仍在设想着不大可能发生的事，认为它们不需要采取大规模的、积极的军事行动，单靠进行封锁缓慢地施加压力，就能逐步地使德国就范。而希特勒则别有打算，这些打算在 1940 年春季和初夏将使他的对手大吃一惊。

第三编 法国崩溃以前的西欧

第一章 丹麦：德国入侵以前的政治情况 艾格尼丝·H·希克斯

战争爆发时，丹麦的情况在好些重要方面都与挪威不同。丹麦没有天然的屏障来抵挡德国，它已同德国缔结了一项互不侵犯条约；它深刻意识到，万一遭到它南面那个邻邦的进攻时，不能指望西方国家的帮助。1937年春天，艾登就已对丹麦首相托尔瓦尔德·斯陶宁和外交大臣彼得·蒙克说过这样的话。因此，在评价战争初期丹麦对德国的态度及其总的外交政策时，必须考虑到这些事实，尤其要考虑英国的警告对丹麦领导人必然产生的影响。他们知道丹麦将是孤立的。丘吉尔在1940年初的声明，进一步证实了英国的态度。他在伦敦同斯堪的纳维亚记者谈话时，对丹麦人说：

我不能责怪丹麦。别的国家至少还有一条沟壑，可以隔着沟壑与老虎相抗；而丹麦靠德国实在太近了，简直没法帮助它。总之，我不愿给丹麦任何保证。……丹麦与德国订有条约——可是我不怀疑，一旦时机适宜，德国人将毫不踌躇地侵犯丹麦。

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之间的关系在文化和经济方面虽然一直是密切的，可是丹麦也不能指望从北面的一些邻邦得到军事上的援助。1937年3月在隆德举行的会议上，瑞典曾提议缔结一项共同防务协定，把三个国家联合起来，但被斯陶宁拒绝了，理由是丹麦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事实是，丹麦不能流露出它在害怕。

1939年8月底，丹麦、挪威、瑞典和芬兰的外交部长同意，万一发生大的战事，四国将保持中立。1939年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时，它们正式发表了这样的声明，在9月3日英、法成为德国的交战国时，它们再次发表了这样的声明。四个国家与冰岛于1938年5月27日缔结的中立条约内规定的条款将生效。

当时执政的社会民主党政府首相斯陶宁是个“善良的丹麦人”；外交大臣蒙克是个和平主义者。这两个人都极不适合在严重的国际危机中领导国家。斯陶宁于9月初曾劝说反对党在咨询的基础上与政府合作，但未成功。

丹麦议会于9月1日开会，就作出种种安排，保证国防力量足以捍卫国家中立的问题，听取汇报。采取的措施是微不足道的——事实上主要只是短期征集一年或二年期限的新兵。参谋总部在战前要求的加强防御工事的措施从未着手，封锁道路、炸毁桥梁等准备工作也未进行。实际上，丹麦的一个军事评论家米凯尔森上校说得不无道理，他说丹麦在1940年4月9日的命运，乃是“往日的疏忽大意和缺乏坚强意志的结果。……丹麦人自哄自地养成了一种无忧无虑的心情，换句话说，他们有这个政府是自作自受。”1945年，在调查造成德国于4月9日占领丹麦事件的法庭上，蒙克供称，当时的兵力足以捍卫丹麦的中立。一旦遭到公然进犯，增加兵力也不会有效地改善丹麦的境况。不过，还是采取了另外一些措施。12月间，议会设立了一个委员会，与国防大臣阿尔辛·安德森商讨军事措施，并使他与四个主要政党的代表保持接触。然而，战后的调查证明，这位大臣并不总是把三军参谋长向他提出的增加国防力量的要求通知该委员会，这些要求于1939年4月开始提出，随着丹麦处境的日益危险而越发迫切。这些要求从来没有得到过同意，可是陆军部于1939年9月6日发布的命令也没有被撤销。这道命令说，“一旦丹麦领土遭到直接进攻，而进攻的故意是明显无疑的，那就必须以一切可资利用的手段来进行抵抗，而无需再下达任何命令，但一面应适当注意当时的情况。”

9月4日，丹麦初次尝到近处发生战事的滋味。一架英国飞机在埃斯堡扔了一枚炸弹。9月底，“文迪阿”号被德国击沉。这两件事都没有怎样使人担忧，10月3日，首相要全国放心，说“没有发愁的理由。丹麦的中立得到了承认，我们同所有强国都友好相处。”不过，他也承认，将要日益感到战争的影响。尤其是供应的情况，除非保证经常有物资运到，否则只能维持一段有限的时间。因此，不仅从战略和军事观点，而且从供应观点来看，丹麦也是软弱的。所以，9月19日斯堪的纳维亚各国首相和外交大臣在哥本哈根会晤，重申斯堪的纳维亚的中立，并强调他们有权保持传统的贸易关系，包括同各交战国的贸易关系，以确保供应。

直至1940年4月9日，同所有交战国的这些关系继续保持得相当令人满意。固然，英国的煤停止进口了，不得不进口劣质的德国煤来代替，而丹麦向英国的出口，由于德国的威胁，也在10月间全部停顿了。不过，到10月底，这些出口又有所恢复，虽然能够看到，某些出口已经转向了德国。丹麦从英国的进口也有下降的趋势，部分是由于德国的压力，而大半则由于海上的战斗所造成的。

事实上，丹麦在1939年秋季已与德国达成谅解，认为向英国正常的农产品出口应当继续下去，以保证丹麦可从英国进口主要的商品，但是丹麦政府对于上述所有这些事情仅限于官样文章地提提抗议，每当丹麦有船在交战国的战斗中遭到损失，不论是德国还是西方国家造成的，丹麦在提出抗议时总是唯恐对待两者的态度有所轩轻。丹麦甚至参加奥斯陆公约国家、意大利和日本，共同抗议英国的一项决定：没收一切从德国运出的货物，而不问载货船只的国别。丹麦竭力抚慰德国而不去刺激德国，妄想盟国会体谅它的困难处境和全然无依无靠的情况。

1939年10月，丹麦不得不表明它对俄芬冲突的态度。虽然它和芬兰没有共同的边界，因而它对芬兰的命运关心的程度不能与挪威和瑞典相提并论，可是它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共同关注着这场冲突。丹麦参加了通过外交途径来帮助芬兰的努力，但也参加了10月18日的斯德哥尔摩会议，在这次会上芬兰总统被告知，万一他的国家遭到俄国进攻，则不能指望从其斯堪的纳维亚邻国得到军事援助。当瑞典和挪威的志愿兵开始参加芬兰军队时，丹麦的青年也参加了，虽然数目较少。还有相当数量的丹麦青年志愿到芬兰工作，以把芬兰青年替换下来去参军。

1939年余下的一段时间内，德国继续对丹麦进行威胁，直至那年年底丹麦对德国的要求已顺从到这样地步，使德国无需预计会遇到任何认真的抵抗。1940年元旦，丹麦首相在一篇广播演说中具体表明了他的政府的失败主义态度，这篇演说后来以“Hvadkandet inde?”（有何用处？）而著称。可是，它在全国造成了混乱，并且招致议会在几个星期以后进行了一些反击。它也使丹麦人更感到“通敌的意识”，虽然，可叹的是，这只有对共产党人来说是如此。人们对共产党人由于俄德同盟而亲德的态度备感愤慨，以致解除了共产党人在工会中的职务。

对于丹麦纳粹党员和其他地下纳粹组织的活动（主要是在日德兰南部），没有采取措施加以禁止，而议会中的纳粹党议员如弗里茨·克卢森和丹麦的德意志少数民族代表延斯·莫勒博士这类人，则公开地进行亲德活动。

1940年1月19日，丹麦议会一致通过一项决议，这是斯陶宁的元旦广

播的结果。决议说：“如果我们受到攻击，不管攻击我们的是谁，我们都要使用手中的防御手段。”可是，后来并没有采取行动来执行这项决议，也没有作过进一步的防御准备。

德国可能对丹麦采取行动，最早得到消息的是丹麦海军司令部。1月8日，丹麦驻柏林海军武官寇尔森上校向国内告急，说德国“将向丹麦施加压力”，迫使丹麦允许德国在北日德兰修建空军基地。但丹麦海军部并不把这个消息看作为进攻的预兆，因此就没有把这个消息转告参谋总部或外交部，不过国防大臣似乎得到过通知。2月13日，寇尔森上校再度发出警告，但是这次也未给蒙克知道，而且事实上仍是置之不理。德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这时倒确实是在研究入侵丹麦和挪威的问题。

到2月底，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外交大臣在哥本哈根会晤，决定要求德国政府签订一项协定，以保护中立国到英国的航运。德国人同瑞典人定下了会谈的确切日期，但到时间临近时，他们未作解释就取消了会晤。丹麦人则从未得到德国外交部的答复。在德国人取消与瑞典人会晤的同时，确凿有据地流传着德国调动军队和把船只集中在施维讷缪德附近的消息，丹麦驻柏林公使馆得到了十分确切的情报，证明人们担心德国正在发动的攻击可能计对着丹麦是有道理的。这使丹麦驻柏林公使馆馆员发出了一系列的私人信件、电话通讯和电报警告，其中大多数是由赫卢夫·萨黑公使发出的，最早的一封信是从1940年4月1日开始，使人遗憾的是，这封信竟被蒙克的一个部下毁掉了。对于这封信，蒙克根本没有采取行动，但是4月4日，他同首相和国王讨论了驻柏林公使馆发来的进一步消息。4月5日，又在内阁会议上作了报告；但是内阁拒绝采取外交大臣提议的任何预防措施，认为萨黑的报告尚未确切到足以有理由这样做。在建议采取的这些措施中，有把防守部队的某些成员重征入伍和组织联合政府等几项。按照丹麦政府的要求，外交部的奥托·卡尔·莫赫尔司长与瑞典和挪威两国公使进行了接触，以弄清他们政府的看法。他们各自向他保证，本国政府认为从柏林来的消息言过其实。可是，瑞典公使汉密尔顿男爵的这个说法，与他的使馆在同一天通知丹麦海军当局德国即将对丹麦采取军事行动这件事，两者之间不一致得离奇。

丹麦人并没有就这些传闻同柏林的外交部交涉，其原因部分是由于丹麦前任外交大臣埃里克·斯卡韦尼乌斯坚信，他能从德国驻哥本哈根公使冯·伦特-芬克口中套出真话。但是冯·伦特-芬克那时对所提到的进攻似乎毫不知情。4月5日、6日、7日，从萨黑处接到更多的消息。萨黑的情报并没有唤起丹麦当局采取任何行动，只是阿克塞尔亲王因另外有事必须到柏林，不顾萨黑的忧虑，趁机拜会了戈林（但他是无法从戈林那里得到任何有用的消息的）。可是丹麦驻柏林公使馆的两个高级官员却自行决定，要引起公众注意迫在眉睫的危险。

他们把两个知名而又受到信任的丹麦记者亚科布·克罗尼卡和黑尔格·克努森召到使馆，要求这两个记者向各自的报馆发出“令人焦虑的急电”。于是，在4月5日、7日、8日的《国民日报》和4月6日、8日的《贝林时报》上，出现了震动人心的文章。《国民日报》在第一版上以头号通栏标题登出了它的记者报道的要点。但是，这些警告已经为时过晚，已收不到任何实际的效果了。

4月8日星期一清晨，冯·伦特-芬克通知莫赫尔，英国在挪威领海布雷。

这个消息，连同看到德国军舰沿着丹麦海岸北驶和据报德国军队从伦茨堡开向丹麦边境的事，在当天上午一起及时报告了内阁。但《国民日报》报馆的又一次警告，说亚科布·克罗尼卡认为德国可能“在两小时以内”采取“行动”，却没有被提到。参谋总部提出要把军队更朝边界调动的要求被置之不理，但是得到了国王的同意，使所有的军队进入战争状态（h JesteAlilrnberedskab）。

下午，冯·伦特一芬克提出了一个他称为“私人的”、非正式的建议。他拜会了蒙克，并要求，鉴于英国布雷造成的严重局势，如果丹麦由于英国行动的结果而受到“影响”，它应“表示谅解”。蒙克拒绝把此事提交其政府，因为他想不出有什么理由丹麦的中立要受到侵犯，但如果108受到任何侵犯，丹麦肯定将予以反击。甚至可能发生额外征兵的问题。德国公使警告蒙克说，这样做将是最最不幸的，并很可能为柏林方面误解。于是就为冯·伦特一芬克与斯陶宁安排在第二天进行一次会晤。在当天晚些时候举行的外国使节的例会上，法国公使正式通知了布雷的事，但英国公使未接到要他发表声明的指示。蒙克要求他们转告法国和英国政府，丹麦政府对侵犯挪威中立的事深为关切。他说，“盟国的行动已大大地危及挪威和瑞典的局势，而丹麦本身现在似乎较少受到直接威胁。”所有的公使显然都与蒙克有同样的看法，认为丹麦不致立刻有危险。

4月8日傍晚，冯·伦特一芬克催促蒙克答复当天上午向他提出的“问题”。蒙克和莫赫尔都记不起他曾提过什么问题。原来是，德国公使曾提出，英国布雷的后果，可能把丹麦卷进去，希望丹麦对此有正式的答复；他也希望再度得到保证，丹麦不会进一步征兵。于是蒙克立刻为此草拟了一个声明，用电话通知冯·伦特一芬克。他向这位公使保证，一旦遇到任何困难，丹麦政府将“本着历来解决丹麦与德国之间的复杂问题时同样的友好精神，努力予以消除。”

当天深晚，莫赫尔发现萨黑又有一份报告发到部里等着他，报告指出，从施维纳德出发的德国舰队可能开往纳尔维克，并警告丹麦政府没有理由乐观。德国对挪威的行动是否对德国有利，德国人自己会决定，不管丹麦政府怎样想法。蒙克和莫赫尔认为这封电报没有特别重要之处，因而未采取行动，尽管这封电报还有附言，说瑞典驻柏林公使推断，德国的计划是“完全或局部占领丹麦和挪威”。

4月9日凌晨4时，冯·伦特一芬克要求在二十分钟之内同丹麦外交大臣在他的家中会面。蒙克报告了首相，斯陶宁又通知了防守部队的一些领导。冯·伦特一芬克递给德国政府一份照会，宣告德军正在越过边界，在沿109岸若干地点登陆。他敦促对方不准丹麦军队抵抗，说这样做只能造成流血，他要求对方立即答复表明丹麦的态度，威胁说德国战斗机马上就要飞到哥本哈根准备攻击。外交大臣抗议这种侵犯丹麦中立的行为，并要求有时间向国王和首相报告。这一点得到了德国公使的让步，但是他强调事情非常紧急。

与此同时，陆军部和海军部已得到报告，说入侵已经开始，并已在哥本哈根本身有登陆情况。凌晨5时刚过，斯陶宁、蒙克和国防大臣暨三军参谋长觐见了国王。他们一致认为不可能进行有效的抵抗，尽管普里奥尔将军（陆军参谋长）极力主张应当继续抵抗下去。可是其余在场的人争论说，这样做结果不会有什么两样。丹麦政府仍然需要与德国政府达成和平解决，但是，

在那种情况下，条件就不那么有利了。会议在清晨 6 时结束，国王同意作出停止抵抗的决定。于是通知冯·伦特-芬克，说已下令防守军队停止战斗。边境的守军曾英勇地进行抵抗，损失了許多人。

在这次会后，大臣们又碰了一次头，决定在下午召开议会，并邀请反对党参加政府。这个邀请被接受了。

第二章挪威：德国入侵以前的政治情况艾格尼丝·H·希克斯

1939年时，除了瑞典之外，挪威是欧洲唯一的从1814年以来享有持续的和平，即享有四个世代多的和平的国家。因此，当战争在1939年爆发时，挪威对自身的防卫毫无准备。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整个时期，挪威政府奉行的政策旨在把用于国防的费用和人力控制在最低限度，因为挪威爱好和平的传统具有一种真正的道德上的标准。政府和人民都幻想世界正逐渐变得更加太平，把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正日益过时。他们幻想，国际间争端的和平解决，已经很好地得到条约的保证，而110国际联盟这个国际性的组织也已经成立，它将进一步保证以和平的方法解决国际间的纠纷。因此，在挪威人的心目中，战争的危险即使没有完全消除，也是大大地减少了。不过，对于推行一种能提供更为有效的国防的政策，在挪威也不是没有支持者。有两个私人团体，挪威防务协会(Norges Forsvarsforening)和挪威海防协会(Foreningen for Norges Sjøforsvar)就做了大量工作，传播有关防务的知识，唤起民众对此关心；可是它们的会员人数很少。可以说，所有的政党对挪威国防的削弱都负有责任，这是由1927年和1933年的两项立法所造成的，后一项立法的条款并且是在不顾军方激烈而断然反对的情况下执行的。不过，在确定哪一方面应负多少责任时，必须记住，从1927年起，工党就是最强大的一个政党，它的影响是任何执政的政府所不能忽视的。

这就是工党在1935年3月上台时的情形。首相约翰·尼加德斯沃尔德是赞成和平主义的，而外交大臣哈夫丹·科特教授和国防大臣弗雷德里克·蒙森则是道道地地的和平主义者。反对科特的人担心，他是一个学者，他的外交政策可能不切实际，但是后来证明，这种担心是没有根据的。科特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例如在意大利与埃塞俄比亚的冲突中，他非常不情愿以任何方式使挪威承担义务，虽然他没有做过任何一件事可被说成是不履行国际联盟盟约规定的义务。根据这种外交政策，挪威是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中第一个（结果也是唯一的国家）批准与英国在1938年12月订立的海军条约，这个条约被看作是普遍同意限制海军军备的一种准备。

在挪威同其斯堪的纳维亚邻国的关系上。科特的政策为一种极端审慎和拒绝同它们讨论军事问题的立场所支配。他的理由是军事上的合作将导致挪威防御力量的加强，而在科特看来，这就等于重整军备，他对此坚决反对。因此，难怪在开战以前不久，希特勒问挪威是否感到受威胁，并表示要同挪威缔结互不侵犯条约时，得到111的答复都是“不”。科特认为（挪威议会也有同样看法）

这样一个条约在平时固然没有必要，在战时也没有价值，而且，它还可能给人这样的印象，以为挪威比其他国家对德国更友好。这将是挪威人民所不能容忍的，他们虽然渴望继续置身于战争之外，可是内心却向着盟国。挪威政府之所以拒绝英、法两国于1939年初要求挪威组织“和平阵线”的某些非正式建议，正与这种想保持中立的愿望相一致。挪威议会议长CJ·汉布罗认为，这样的保证不值得想望，他的理由是，“单从一个方面得到保证的中立，一旦发生情况，就不再成为中立了”。

于是，直到1939年夏天，挪威政府在大多数人民的支持下，对所有的外国一直保持着正确的态度。挪威已使自己免除了按照国际联盟盟约规定的参加制裁的义务，它置身于一切欧洲国家集团之外，但是它同斯堪的纳维亚邻国在军事之外的其他领域订有合作的计划。挪威的工党政府主要是和平主义

的，但是有迹象表明，这个党正在分裂，因为有些党员认识到，德国事态的演变可能威胁挪威的民主制度。不幸的是，还没有等到这种感觉能够具体变成有效的行动，挪威就遭受了战祸。挪威人奉行反对防卫的政策为时已经过久，从而无法迅速改变自己的态度。而且，在资产阶级政党中，仍对德国有些同情，对德国的想法有些欣赏，有几家右翼的报纸正在发表这类观点。同时，多年来的忽视所造成的后果，也不能一下子弥补过来。防务全然不足，甚至没有统一的指挥。防务计划由一个以文官为首的国防部掌管。

固然，国防委员会在1934年就已成立，但是直到1937年方始召集会议，到1939年9月1日才再度开会。民防的情况是可怜的。措施仅限于消极的防空，例如建造一些避弹所等。除了奥斯陆、卑尔根和四五个较大的城市以外，其他城市均无积极的防空设施。战后挪威议会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调查当时的政府对挪威防务不足所应的责任，据报告，科特、尼加德斯沃尔德和国防大臣都112有责任。整个政府也逃脱不了责任，因为它有议会中大多数议员的支持。这大批的议员并不是因为政府的国防政策软弱才支持政府，而是无视其国防政策软弱而仍然支持政府的。

就供应情况来说，采取的措施是比较有效的。1938年3月国王下谕成立了一个应急委员会(Kriseutvalg)来保障国内供应，并经议会表决，拨款一千五百万克朗作为经费。这个委员会一直维持到1939年秋季为一个新成立的供应部所代替。由于对议会原来批准拨款时的决定任意作了解释，到1939年6月30日已购买了价值一千万克朗的货物，并继续进行购买。已有的粮食供应预计足以应付三个月至九个月，人造肥料的供应可应付一年至两年半。石油的供应估计足以应付两个月的消费，但是石油在1939年9月被征发供防务之用，并立刻实行了定量配给。

哈康国王在1939年9月1日正式宣布挪威中立，挪威又是参加9月1日和3日的斯堪的纳维亚中立宣言的一方。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之间就中立而产生的问题继续不时地进行磋商。德国立刻向挪威保证，只要它坚持严格中立的政策，它的中立就将受到尊重。英国在9月22日也作出了同样的诺言，“只要德国尊重挪威的中立”。挪威的“中立警备部队”于9月1日征集。10月19日，这支部队在挪威北部有所加强，主要是因为俄一芬战争的缘故。

内阁立刻作了一些变动。有两个主要的变动，一是免除了首相在政府部门的兼职，一是成立了以特吕格韦·赖伊为领导的供应部。12月间，国防大臣蒙森因健康不佳引退，由伯奇·扬伯格上校接任。任命一个军人执掌此职，是鉴于国际局势的严重，希望使防务问题脱离党派的政治竞争。可是，任命扬伯格后来证明是一个错误，因为他不能胜任，但是他的任命却麻痹了政府，使之产生了毫无根据的安全感。1940年1月初，曾提出成立联合政府的建议，但由于首相强烈反对而遭否决。于是工党政府继续执政直到遭受入侵。

113 尽管各交战国曾作过保证，但挪威的地理位置还是使它很快就开始受到海上战事的影响。德国人击沉挪威的船只，而英国人则限制挪威的对外贸易。可是，挪威继续同这两个交战国保持着商业上的关系——虽然这种关系在日益减弱，并且以招致德国方面和法一英方面的不满为代价。德国警告挪威和其他中立国家不要听从英国的要求，为英国封锁德国提供方便；德国抗议挪威全国船主协会同英国签订合约，把半数的挪威商船租给盟国。而盟国则对瑞典北部的铁矿砂通过挪威的领海运往德国日益表示恼怒。

1939年9月19日，丘吉尔作出了第一次尝试，企图使德国不能得到瑞典供应的铁矿砂，他向白厅的同僚们提出了一个建议，要在挪威领海内的航道上布雷，从而把运载矿砂的船只逼入公海。他完全懂得：这个行动会遭到反对，而且德国可能对挪威进行报复，但是他认为，出于战争的需要，英国非采取这样的行动不可。这一次他的建议没有被采纳；可是他在11月27日重新提出这个问题，12月16日传阅了一份有关此事的备忘录，内阁在22日对此事予以考虑。在这期间，盟国的报纸刊登了德国在挪威沿岸击沉一些盟国船只的消息；但是后来知道，只有一条船实际上是被一艘在挪威领海内活动的德国潜艇击沉的。1940年1月6日，挪威政府得到正式通知，“英国政府正在采取适当措施以阻止德国船只在挪威领海内行驶和进行贸易活动”，为此，英国海军有必要不时“进入挪威领海并采取行动”。应科特的请求，哈康国王就此事向乔治国王说项，使这一决定撤销了。可是，英国政府对德国通过挪威领海从瑞典运输矿砂一事仍继续关注，因此科特作了尝试，企图说服瑞典把一部分运输从北海之滨的挪威港口纳尔维克转移到波罗的海之滨的瑞典港口律勒欧，但是没有成功，可以料到，主要是由于这种转移可能对瑞典与盟国的关系产生有害的影响。1940年1月底，英国建议挪威自己在其领海内布雷，挪威政府答应予以考虑。但是这个建议直到3月20日才交给国防部，3月的下半月，科特向英国政府并向盟国的报界提出，还是把这件事搁置起来对盟国有利，因为运至英国的矿砂增加了，而运往德国的矿砂则减少了。同时，俄—芬战争（1939年11月30日至1940年3月12日）已使挪威以及瑞典面临着局部被盟国军队占领的危险，盟军在支援芬兰的途中，顺便会控制纳尔维克和瑞典铁矿区。

在此期间，还有一些小的侵犯挪威中立的行为发生，如交战国的飞机飞越挪威领土。这类事件发生以后，只要能辨认出非法侵入的飞机的国籍，挪威总是立即向进犯国提出抗议。德国政府通常予以否认，而英国人（在芬兰战事还有俄国人）通常则承认侵入并道歉。交战国军舰进入挪威领海，可能产生更严重的后果；不过，在这个阶段，这种事情难得发生。美国商船“弗林特市”号被德国海军俘获，是比较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国际法中对如何释放被交战国在中立国领海内俘获的中立国船只，没有任何条款规定，在这种情况下，挪威人允许这条船沿着挪威海岸继续航行。可是，当它的德国船长将船在豪格松停泊时，法律上的地位就改变了，挪威当局立刻放掉了这条船，把船上的德国军官和押送该船的船员扣留了起来。德国人提出强烈抗议并加威胁，但是当柏林方面知道挪威人企图行使国际法赋予他们的权利时，抗议就渐渐地平息了。挪威在这件事上采取的行动，提高了挪威政府的威望；但是在别的事上，尤其在德国海军辅助晚“韦斯特瓦尔德”号的事件上，挪威对德国却表现了不必要的顺从。在战争的这个阶段，影响挪威中立的最重要的海军行动，是英国海军于1940年2月16日采取的，当时驱逐舰“哥萨克”号驶入那辛峡湾，并强行靠拢德国的海军舰艇“阿尔特马克”号（它是“斯比伯爵”号的辅助舰）。海军上校（后为爵士）菲利普·维安率领的一支队伍强登敌舰，打败了德国船员，救出了被“斯比伯爵”号俘虏而藏在“阿尔特马克”号上的二百九十九名英国战俘。在战斗中放了儿枪，打死了四个德国人。

按照这件事的是非曲直而论，英国的行动无疑是值得同情的，而英国政府也有可以争辩的法律依据。挪威白皮书声称挪威人允许“阿尔特马克”号

驶入挪威的“外部”

领海是有理由的，不过批评了舰队司令——他得到外交委员会的支持——让这条船通过卑尔根军港。但是另一方面，就在这同一份白皮书中，他决定对“英国的破坏中立”不予抵抗，却得到称许，理由是“一个中立国如其中立受到侵犯，按照国际法它并无义务使用武力来对付显然占优势的兵力”，而且，“我们急于要避免，由于那辛峡湾之战的直接结果，挪威被卷入德国的一方作战”。科特在挪威议会中所作的一次说明中，声称抵抗将是没有意义的。这项声明同科特给英国和德国外交官的通知是矛盾的，通知说，“不论发生什么情况”，挪威今后将“开火”。但是，英国政府和德国政府这时终于感到，挪威没有能力，也许甚至不愿意，捍卫它的中立，这样，德国对挪威的威胁就开始包含着不祥的凶兆。希特勒这时明确地决定入侵挪威，而英国人则决定在挪威领海内的航道布雷，希望借此挑动德国进攻挪威，从而为盟国的军队不以侵略者而以救星的身分在挪威登陆开辟道路。这时科特通过华盛顿方面迫切要求盟国对挪威处境的危险表现更多的谅解；可是盟国对挪威的口气也变了，英国的政治家们这时再三声称，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不应保持中立，而应为自身设想，参加到西欧国家一边来。

挪威从战争一开始就被卷入了海战，但它的中立政策却直到俄国进攻芬兰时才在军事—政治方面经受了第一次严重的考验。挪威人民的心情虽然都向着芬兰，但是在负责的政治岗位上，却没有人准备按这种心情行事。尤其是首相，他利用了自己的全部权力来保持最严格的中立，而科特则心甘情愿地执行了这项政策。此外，德国驻奥斯陆公使布罗尔再三警告挪威政府，说任何给予芬兰军事援助的正式行动将导致德国的报复。因此，政府不理议会中以J·L·莫温凯尔和汉布罗为首的在群众中得到广泛支持的少数人的意见，即要求执行一项与群情相一致的政策。尽管态度这样谨慎小心，苏联政府在1月6日还是对挪威报纸上的反俄宣传提出了抗议。

挪威政府的答复是坚定而庄严的，认为这一指摘不正确而予以拒绝，强调了挪威保持中立的坚定决心。就官方来说，俄国政府对这个答复是满意的，但是非官方的莫斯科广播在1月15日却说这个答复不能令人满意。因此，局势从未让挪威忘记过，它这条国家之舟正在惊涛骇浪中航行；但是这并没有阻止挪威人在中立条例的范围内就自己能力所及给予芬兰全力帮助。科特于12月14日在日内瓦说，虽然同瑞典给芬兰的帮助相比，挪威的帮助似乎很少，“但是，在挪威，我们以前确实从来没有募集到象帮助芬兰这样大量的金钱和东西。”此外，当盟国在1939年12月底照会挪威（和瑞典），要求提供方便，以通过斯堪的纳维亚领土运送战争物资给芬兰，这两个国家都给予了方便，认为这样做并不构成对中立的侵犯。另一方面，当盟国在3月2日要求瑞典和挪威，万一芬兰呼吁盟国给予军事援助时，准许盟国军队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过境，这一要求却在3月2日和3月4日先后为117瑞典和挪威拒绝。只有一次，能够看到科特稍微放宽了他对中立的严格概念，那是当他参加考虑在1940年3月12日俄芬和约缔结以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与芬兰之间建立防务同盟的可能性的时候；但当苏联政府表明，这样的条约将被看作芬兰方面破坏和约时，这个建议就被撤销了。

在“阿尔特马克”号事件以后一星期，挪威同交战国的贸易谈判在奥斯陆达到了紧要关头。德挪协定——

它得到英国代表们的赞成——于2月23日签字，而英—挪协定却直到3

月 11 日方才办妥，因为它需要得到英国各自治领的同意。1940 年 4 月 2 日，张伯伦在下院提到贸易情况时，着重指出“我们缔结的所有战时贸易协定中，都有条款规定中立国自己国内的产品可出口到德国。”我们将要看到，他没有明确提到矿砂的运输，因为实际上这是瑞典的出口，但是科特认为，根据中立的条例并考虑到挪威在 1939 年 9 月 1 日给德国的保证，挪威必须准许并保护在它领海内的“和平运输”。可是，英国加紧了对这条运输线的控制，英国的军舰有时还侵入挪威的领海。

与此同时，在盟国原先的计划（与它们梦想给予芬兰援助以对付苏联有关）由于芬兰停止抵抗而遭受挫折和不值得再考虑以后，德国和盟国正在分别制订时间相同而内容类似的对付挪威的计划。

3 月 21 日雷诺一当上法国内阁总理，就立刻开始催促英国政府再次采取侵入斯堪的纳维亚的政策。

这时决定，开始用原来的方法，就是在航道上布雷把敌人的船只赶出挪威领海的方法……来解决从纳尔维克以南运输铁矿砂这个老问题。在这以后，再在挪威领海内设下布雷区，不预先通知挪威政府。预料随后德国可能对柳威领土采取反措施；而盟国接着就可得到挪威的同意占领纳尔维克和南部的三个港口。……关于瑞典，前景 118 不那么清楚，但是希望形势将使在纳尔维克登陆的部队能以卫护瑞典反抗侵略的战士的身分——不论是真实的还是假设的——抵达矿区。

另一方面，德国人一直在加速推行占领挪威的计划。他们的行动原来打算在 3 月 20 日开始；英国的计划在 3 月 28 日得到最高作战会议的同意，要求在 4 月 1 日或 2 日向挪威和瑞典发出“辩解”的照会，接着在 4 月 5 日布雷。由于波罗的海的冰封久久不化，使德国人把日期推迟到 4 月 9 日，而英国的日期，也由于法国反对英国一项与此有关的在莱茵河布雷的计划而延迟了几天。英国给挪威和瑞典政府的照会于 4 月 5 日递交，那时在这两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首都，报纸已经对预料中的盟国的意图加以非难。布雷应当接着在 4 月 8 日进行。于是，就出现了德国海军和英、法海军同时集中到挪威去执行各自的计划的情况。不过，德国的计划是要在 4 月 9 日肢晓以前同时对许多不同的地点进行一系列决定性的打击，而英国的计划则是“一连串有条件的登陆，并且只是在证明德国对布雷相应地作出敌意的反应时方才进行，而在那种情况下也要隔一天至四天半以后再进行”。

当挪威遭到 1940 年 4 月的危机时，它只动员了一小部分防守力量。它没有布雷，沿海的要塞只有一部分配备了兵力，陆军只有一小部分处于备战状态。尽管 4 月以前事态的演变令人不安，可是挪威的防务措施自始至终保持着一种“中立警戒”的性质。科特认为——莫温凯尔、汉布罗和科特有同样的看法——局势没有 1914—

1918 年时那么危险，汉布罗还认为，盟国的空中优势和德国的石油匮乏，将使德国无法采取任何有效的行动。

因此政府无意屈服于它的军事顾问们要求加强挪威战备的压力，特别是因为，按照挪威白皮书所说，汉布罗、莫温凯尔、延斯·洪德塞德在那时也施加了一些压力，要求限制军事部署。不过，这种说法为汉布罗所否认。国防大臣——按照陆军司令官洛克将军的说法——通常把这种事情让内阁的其他阁员或让外交政治司去决定，同时，军界对政治形势和军事政治形势的情报也掌握得不够。海军司令官迪埃森将军在战后说，他当时认为敌军很

不可能在挪威登陆，因此没有建议全部动用沿海要塞，甚至准备把这些要塞的大部分驻军复员回家。挪威议会在战后成立的调查委员会认为，就缺乏主动性而言，迪埃森将军比洛克将军应负更大的责任，因为领海显然比陆上防区更处在危险区域内。4月9日，科特在议会于哈马尔召开的会议上所作的声明，确凿地证明了他当时对防务情况没有感到任何忧虑。

战后对外交部档案所作的调查，发现当时有许多警告说明德国对挪威的军事行动正迫在眉睫。“四月九日政府”在伦敦的成员否认知道这些警告。但是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在4月5日至8日间，奥斯陆从挪威驻柏林公使馆连续接到了关于局势的权威报告，科特、扬伯格上校以及陆军和海军司令官都知道这些报告，但是政府的其他成员并未得到通知。第一个汇报局势严重的警告是挪威驻柏林公使阿尔内·谢尔在3月29日发出的。警告的措词一般，指出危险来自法国和英国而不是来自德国。4月3日，就是盟国向挪威政府预告英国海军将在挪威领海布雷前五天的时候，当时驻伦敦的挪威公使埃里克·科尔班电告，他从工党的一个主要党员菲利普·诺埃尔-贝克处获得确切消息，英国人正准备对德国在挪威领海内的铁矿砂运输采取直接行动。4月1日以及4月4日又有警告，这次指出德国打算侵略。这些警告同发到丹麦的警告是一致的，实际上都是根据同样的情报。但是，直到4月5日，方才提到挪威本身肯定正在受到德国的威胁。在那一天，奥斯陆收到从哥本哈根、柏林、斯德哥尔摩发出的警告，哥本哈根发来的警告是根据丹麦政府从其驻柏林公使萨黑处收到的情报。4月4日，在议会外事委员会的会议上，曾提出要科特就这些“谣言”在柏林采取措施，科特拒不接受。他指出，这些谣言不是没有根据，从而不成其为危险的信号，便是确有其事。假使确有事，他也不会得到对方的答复。在战后受到质问时，他解释说，1939年12月和1940年也流传过这类谣言，但是后来没有成为事实。他不愿把这些新的谣言看得更严重。他不承认曾经从瑞典方面接到警告，特别是一则据称由瑞典国防参谋部电告挪威参谋总部的消息。

4月7日，挪威驻哥本哈根公使奥占斯特·埃斯马尔希发出了明确的警告，称德国将立即对挪威采取行动；德国舰队已经出发，向西驶去，显然开往一个比较远的地点。科特确信它是开往大西洋。奥斯陆方面之所以有无视这些警告的倾向，一个原因是政府和外事委员会当时都全神贯注地在考虑英国布雷可能造成的后果。不过，在4月8日下午3时，挪威驻伦敦公使馆在电话报告中宣读了一份紧急电报稿，报告德国舰队显然在向纳尔维克调动，科特立即把这个消息转告了海军部。消息说，当天上午曾在北海挪威海岸外发现德国舰艇，正在向北行驶，“非常可疑是企图对纳尔维克采取行动，能在午夜以前抵达纳尔维克”。几个小时后，传来了更为严重的消息。扬伯格上校在秘密会议上向议会报告说，据克里斯蒂安桑的指挥官报告，从“里约热内卢”号（当天上午在利勒散港外中了鱼雷）轮船上来了约一百名身穿绿灰色制服的德国人；他们承认船上有马匹和枪炮，并说听到谣言，他们是“应挪威政府的请求”前往卑尔根去帮助挪威人的。但这位国防大臣认为这件事只是另一次侵犯中立的行为，而不是即将发动攻击的警告。他也不理会参谋总长哈特莱达尔上校在4月5日、6日和8日再三敦促他考虑局势的严重性和挪威在南方兵力薄弱的情况。4月8日，哈特莱达尔上校的这些请求得到了洛克将军的支持，这两位军官出席了当天外事委员会的会议。哈特莱达尔在晚上催促扬伯格对他已提出的许多建议作出答复，扬伯格告诉他，将于

次日上午给回音。当天晚上确是对事态进行了讨论，并起草了总动员的建议。扬伯格指出，动员工作需要三天时间，因此政府提出折衷方案，决定在厄斯特福尔动员两个营，这样可以调集得快一些。尼加德斯沃尔德曾明确地征询过国防大臣的意见，问他对这种不符合哈特莱达尔建议的做法是否有理由，并在得到保证两营兵力将足够使用以后，这个决定被采纳了。

4月8日午夜，海军参谋部报告，奥斯陆峡湾外有外国舰艇，正试图夺取防御工事，外事委员会召集会议，并于4月9日凌晨1时30分举行了会议，全体委员出席。这时接到报告，德国的进攻正向卑尔根扩展，于是政府决定动员军队。清晨5时，拒绝了由布罗尔递交的德国最后通牒，并决定总动员。在国王不在场的情况下，这个决定并不是正式的或书面的，但是认为，扬伯格上校应通知所有的军事当局。洛克将军后来证明，直到凌晨2时30分他才能同扬伯格通电话，说服扬伯格重新采纳他自己的动员建议，直到清晨4时至6时之间总动员的命令方始发出。国防大臣一直到最后都固执地企图把这个命令保持秘密，而保持秘密自然会大大延误它生效的时间。战后的调查委员会发现，总动员命令根本没有发出过，因为已经查明总动员工作肯定从未开始过，而参谋总部既然这样迫切地要求有这个决定，那就毫无理由认为，如果接到这样一道命令，它居然会不执行。对于这一事关重大的疑点，文件记录本身并未予以澄清。调查委员会对哈特莱达尔上校面临严重困难时的主动积极性深为赞许。他努力由自己负责来扩大动员令的范围。由于令人遗憾的疏忽，在德国人进入奥斯陆以前，没有把挪威广播电台破坏掉，尽管官员们曾要求下令加以破坏。结果使吉斯林（挪威纳粹党的党魁）和德国人能把电台接收，并在4月9日下午用以宣布成立吉斯林政府，撤销动员令122和召回在海外的挪威船只。

第三章 荷兰：德国进犯以前的政治情况 汉弗莱·希金斯

第一节 荷兰的中立的国策

1939年9月3日的时候，荷兰的情况同其他国家相比，是非常简单的：不论在欧洲还是在东印度群岛或西印度群岛，它都没有任何政治纠葛。实际上，过去一百年的和平历史，加上依靠它的“不言而喻的中立”，使荷兰不仅不谋求与别的国家结盟和得到它们的保证，而且还加以拒绝。

是一个强制维护集体安全的问题的话。荷兰的政策是，坚定地中立和“保持适当规模的国家武装，从而不给任何人以任何可以避免的引诱来向其侵犯”。

当英、法对德宣战，而荷兰发现自己“进退两难，成为两大劲敌竞相奉承的目标”时，它不仅由于曾经出过力企图防止战争而赢得了威望，而且得到了德国政府和英国政府的保证——英国直截了当，德国则含糊其词——说它的中立将得到尊重；荷兰自己也在9月1日发表了中立声明。地面部队已在8月28日开始动员，海123军处于警戒状态，到8月底，国内广大地区已为引入的洪水淹没。9月1日，宣布了战争状态。中立的政策即将受到考验：采用不过于讨好某一方的办法，例如当荷兰的权利受到侵犯时提出措词足够严厉的抗议，是否能使另一方失去进行报复（这种报复甚至可能发展到入侵）的任何借口。这犹待分晓。同样，荷兰拒绝同它潜在的盟国就荷兰本身或这些盟国万一受到进攻时应当采取的措施举行军事参谋会谈。在荷兰，人们普遍认为，万一果然遭到进攻，这种进攻将是来自德国方面。但是荷兰采取谨慎态度，决不公开流露出害怕德国进攻的心情，同时，对待交战双方的确也应当不分轩轻，一视同仁；另一方面，人们也在希望，荷兰在交了一百年的好运以后，“奇迹还会再度出现”。

荷兰人民，总的说来，也是坚决支持中立政策的，鉴于他们以享有发表见解的自由而自豪，这是对十六世纪124的褊狭不容异说的反作用，同时他们认为，由于党派的众多和由于这些党派在政治上和宗教上的争论加剧了彼此不和的程度，而有必要在国会选举时采用比例代表制，因此他们在中立政策问题上实际的意见一致，就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第二节 共产党和国家社会党

荷兰共产党是由1909年脱离社会民主工党的一些反对派所成立，它于1919年加入第三国际。共产党在国内从未有过多大势力，它在第二院的一百个席位中占得席位最多的时候是在1933年，共四席；1937年时，它只有三席。德一苏互不侵犯条约在8月21日公布后，使荷兰的共产党员和整个欧洲的共产党员一样，大吃一惊，在战争开始时，他们由于党的路线的这种改变而不知所措，无从发言。直到遭受侵略以后，他们才抬起头来，参加了抵抗运动，正象共产党人在其他许多国家所做的那样。

由于荷兰人的容易分裂的性格，在荷兰产生过好几个国家社会主义团体。其中最强大而结果也是最成功的是国家社会主义运动（NSB），于1931年由安通·米塞创立，希望能对经济萧条所造成的人心不满加以利用。

这个团体反对党派制的政府以及社会党人和大主教徒的国际主义，而赞成极权主义的领导。它在荷兰没有扎下深根，因为它被人看作是外来的，是德国式的，尽管它避而不提偏激的反犹学说，并对女王和奥伦治王室装出一副“虚假的爱国姿态”，但是未能因此而克服上述的不利因素。它于1935年在荷兰的欧洲领土上达到了全盛的时期；随后又在荷属东印度达到了顶

峰。在占领初荷兰政府认为这些著作有通敌的倾向，败坏荷兰的士气，为德国服务。1947年，他因叛国罪受审，判处一年徒刑（因年迈而免刑）和二万盾罚款。德·格尔本人对此事的说法，见《调查委员会》，2B，第256页以后。

兰德希尔，第196页。

《概览，1939—1946年：希特勒的欧洲》，第498页以后。

虽然1939年5月29日在列日举行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会议上，米塞在要求同德国建立更密切关系的同时，曾攻击了荷兰政府的亲犹政策（《人民观察家报》，1939年5月31日）。

兰德希尔，第129—130页。

期，德国人并没有要米塞来管理国家——尽管他拥有一个现成的组织——因为国家社会主义运动“通常是不能胜任工作和一直是不得人心的”。虽然荷兰并没有实现伸斯麦的预言：“荷兰正在把自己归并给德国”，但在1940年时，荷兰不足九百万的人口中，德侨却有五万名之多，其中有许多人住在鹿特丹。然而，并没有听说他们对德国侵略者提供过帮助。

第三节希特勒执拗的侵略意图

荷兰的遭劫是无可避免的。荷兰人自己在1936年3月7日以后所做的事，对他们毫无帮助；而他们力所能及的极少的几件事，却又放着不去做。他们不愿同其他任何国家，甚至同比利时，举行未雨绸缪的军事参谋会谈；

当战争开始时，他们戴上了一副遮眼罩，既不向东方也不向西方去看看有什么威胁或安慰，而是靠着那根已经折损的中立芦杆，结果在1940年5月10日把自己的手戳破。希特勒早已决定，如果他同法国和英国交战的话，就将入侵荷兰。只有一种情况可能会阻止这样做，那就是，德国陆军总司令部的成员普遍希望，在西方采取守势来进行战争，推迟德国在那里的进攻，以争取时间来举行可能导致和平的“外交上的政治会谈”，以更新德国的装备，肃清纳粹体系，或使对抗部队积聚力量。

但是，不论德国陆军总司令部的方针如何，事情总是要希特勒说了算才算数的。

第四节从战争爆发至1939年11月12日的惊恐

荷兰同英、法、德的关系，有一个时期同海上战争行动引起的事件有关，它是同荷兰密切相关的。

三个交战国都公布了禁运货单（法国和英国的单子相同）；荷兰政府对此正式提出了抗议。它还抗议英国的“黑名单”（它坚持说，这份名单把中立国归入敌人一类，并以“宣布……对中立国强制执行联合抵制的办法，来惩罚这些中立国同交战国的合法贸易”），抗议荷兰船只受到英国检查机关的长时间留难；抗议荷兰船上的人被带走；抗议邮件被耽误。英国的这些措施是使荷兰经常感到不满的原因，尤其在这些措施因为对德国的海上布雷政策进行报复而变本加厉以后；直到临近德国127入侵时，英、荷之间才最后达成了暂时解决办法。9月6日，德国政府向所有的中立国——特别是针对低地国家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发表声明。声明说，这些国家同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如有任何单方面的改变，损及德国的利益，都将被德国政府认为是破坏中立。德国在海上的实力远逊于英国，只有在波罗的海除外，在那里，装运木材开往荷兰的船只被德国海军留难的时间长得异乎寻常。到了11月中旬，荷兰因水雷和潜水艇而遭受的损失开始急剧增加。荷兰抱怨交战国的另

一个原因，是由于新闻检查制度和缺少空运而不能从伦敦和巴黎得到及时的消息，但德国的宣传却很活跃。

9月26日，荷兰有谣言说，波兰的战役业已结束，俄—德共同瓜分波兰的协定也已实施，希特勒回到柏林后将要提出“和平建议”，这是许多人所预料到的，但并不指望这一建议会被对方接受。到时候希特勒就将去西线，在那里发动攻势。德国军队大量集中在莱茵兰，似乎预示将有一次攻势。这并不需要采取防守战略，因为西壁防线按理已足够坚固，只需要适量的驻军就足以遏制任何进攻。10月6日，希特勒发表了预料中的演说，他说，这是 he 向盟国的最后一次建议。由于这篇演说的实质似乎是在表明德国旨在统治中欧，也许希特勒是打算表示愿意同西欧国家进行和谈。总之，对于这篇演说，荷兰外交大臣范·克勒芬斯是这样来理解的。荷兰报纸则认为，希特勒的“和平攻势”很少有希望得出什么结果。希特勒几乎没有表现出愿意让步的样子。的确，可能作出让步的唯一迹象，只是他着重地保证，将成立一个新的波兰国家。荷兰方面觉得，盟国这时应当宣布它们的作战目的，但是驻在伦敦的一个荷兰记者解释说，英国当时不能这样做，它正在为保存自己而战斗。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曾经有过一些试图恢复欧洲和平的计划，其中有一些计划打动了荷兰。9月26日，在希特勒同瑞典人比尔格·达勒鲁斯会见时，戈林建议德国和英国的代表在荷兰会晤，以探索缔结协定的可能性。

于是准备要求威廉明娜女王正式邀请两国的代表讨论停战。10月1日，冯·巴本（德国驻土耳其大使）从安卡拉来电，说荷兰驻该地公使P·C·非塞尔博士同他谈论过由比利时和荷兰两国国王充当调停人，安排媾和的可能性，他还说，荷兰政府一定试探过英国政府，看它是否准备谈判。在冯·巴本的同封电报中，还概述了英国驻安卡拉大使和荷兰公使10月3日就这一问题商谈的要点。

尽管范·克勒芬斯在企图弄清盟国从希特勒的演说中是否看出有任何媾和的可能性时，并没有得到鼓励，但是他仍向威廉明娜女王提出，应当重新提出荷兰在8月间提出的斡旋建议。比利时国王访问了海牙，11月7日，两国国王向英国国王、法国总统、德国总理提议，利用129他们的斡旋来为公正的和平奠定合理而牢固的基础。

教皇以及挪威和瑞典政府一听到这个建议，立刻热烈地表示支持荷兰人认为该建议加强了低地国家在道义上的地位，但并不指望因此得到多少实际效果。11月12日来自英、法两国的电报答复实际是说，必须由德国首先采取行动；里宾特洛甫在15日给荷兰和比利时驻柏林代表的口头答复是（德国驻海牙公使冯·策希在11日曾说过，德国政府将“仔细研究”这个建议，从而稍微解除了荷兰的忧虑）；“在英、法两国政府粗暴地拒绝采取和平行动……后，德国政府也只得认为事情就此作罢”。荷兰和比利时的建议之突如其来，使这两国的人民感到意外。由于有报道说德国军队在荷兰边境集中，由于德国报纸警告比利时不要与荷兰缔结同盟，并警告荷兰不要向英国的封锁措施屈服，加剧了他们的紧张。

在荷兰，已经投票通过了一笔新的、为数一亿盾的特别防务拨款；引入洪水的区域内的工事在加紧建造；海牙的守军增加了一倍；石油和糖实行了配给；大城市中采取了预防空袭的措施：荷兰的十一个省份中有八个省的部分地区在11月1日已宣布戒严。据报道，应变措施已经完成，只有乌得勒支

以西要引水淹没的广阔的“洪水防线”

际外，这一着要到最后才执行。

这时又发生了两件事，正好被德国人用来加强他们的神经战。11月8日，当希特勒正在慕尼黑的贝格勃劳凯勒酒馆向纳粹党发表一年一度的演说时，有人企图暗杀他。有一个名叫埃尔泽的共产党员（他显然没有同谋130者）极其巧妙地放了一颗炸弹，但这颗炸弹在希特勒离去后二十分钟才爆炸。11月9日下午，有两个英国陆军军官R·H·史蒂文斯少校和佩恩·贝斯特上尉（当时他们正在荷兰工作，告诉荷兰谍报局，他们同德国反对希特勒的人们有来往）偕同荷兰谍报局的参谋军官克洛普中尉驱车前往距离荷德边界线只有几码远的文洛，去同他们信以为真的反希特勒人士进行第五次会晤。克洛普的头部服的人绑架到德国。德国的一则新闻公报承认——甚至自吹自擂——这件事是德国特工人员干的。在这以前，荷兰人一直没有理由谴责德国政府。这时荷兰政府立刻要求德国作出解释，并建议把这件事提交给某个国际司法机构；但是在这一点上，荷兰没有得到德国政府任何满意的答复。德国各报奉令把有关上述这两件事的报道131刊登在头版并列的两栏内，以便使头脑简单或粗心大意的读者也可能联想到，英国保密局应对谋害希特勒负责；有些报纸甚至直截了当地谴责英国应负责任。

根据冯·策希11月7日关于和平建议的报告中所说的情况，以及过了11月12日还没有发生人们担心的侵略以后，荷兰普遍存在一种稍微安定的情绪。这一点由容克黑尔·德·格尔首相在11月13日的广播中流露了出来，他在广播中谈到，中立的荷兰的动员状态虽然决不是形式的或象征性的，但是荷兰这时并不比战争开始以来的任何一个时候更危险；他又说，毫无理由地担心害怕和轻信无稽谣言，就是不相信上帝。德国人对于斡旋的建议所作的答复，被人们普遍认为是断然的拒绝；但是也有一些人认为门还没有关上，其中有几个人还因下述报道而鼓起了信心，报道说，意大利和西班牙在11月13日向德国政府表明，它们对于保全比利时和荷兰感到关切。到该月中旬，局势又趋于平静。

11月危机过去不久，冯·策希（他是一个坚决反对纳粹的人，急欲竭尽所能来帮助荷兰人）向荷兰外交部秘书长斯瑙克·许尔格龙耶至少作了两次试探，看看如果德国人进军时只通过林堡，荷兰人是否会默许。荷兰的中立仅仅是“形式上的”呢？还是将有武力作后盾？冯·策希得到了一个由范·克勒芬斯签署的否定答复。冯·策希的这种接触是否代表官方，似乎并不清楚。关于冯·策希的这一行动，没有报告过荷兰内阁。11月20日，德国下达132“战争行动第八号指令”（由凯特尔签署），命令进入备战状态，指出“荷兰军队的态度无从预测”。

第五节海上战争和俄芬战争对荷兰的影响

从1939年11月起，荷兰开始真正受到了海上战争的严重影响。18日，一艘大型荷兰客轮“西蒙·博利瓦尔”号就在哈里奇以东“森克”号灯船附近被磁性水雷炸沉。

荷兰政府询问德国政府曾否在那个区域布雷；同时也小心地向英国政府询问了这个问题。11月23日，油船“斯利德雷赫特”号在爱尔兰以西被一艘潜水艇拦住，在全体船员被赶上救生艇后，船被鱼雷击沉。三十一名船员中，生还的只有五人。这样的事不断发生。荷兰人激烈地抱怨海上不再通行无阻，并对他们所说的“英国措施的残酷性”大为震惊。这些措施是为了报

复德国在海上进行战争而实行的，由英国首相在 11 月 21 日宣布（法国人接着在 22 日宣布），内容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采取的措施类似，规定从德国运出的或德国人拥有的出口货物将在公海上被没收。11 月 23 日，荷兰驻伦敦公使拜会了英国外交部，以作出安排，在英国可能采取任何措施时，保留荷兰根据国际法应有的一切权利；同内阁的命令公布在 1939 年 11 月 28 日的《伦敦公报》（London Gazette）上，从 12 月 4 日起生效。

时，据 11 月 25 日从哥本哈根发来的报告说，德国估计了这些报复措施可能产生的后果后决定，“德国对企图穿越北海的中立国船只将不给予特别照顾”。在中立国家反对英国措施的抗议中，荷兰人强调了这些措施将使荷兰的货物托运人和代理商遭受困难和沉重损失，并且正 133 在考虑派出船队时由一艘装有扫雷设备的船领航，以防水雷，并由中立国的军舰护航，以防被英国人拦阻或受德国人袭击；但是荷兰人后来理解到，这样的护航一定会把自己卷入战争；有两个星期德国的报纸不那么咄咄逼人，但在月底又攻击荷兰人屈服于英国的措施。荷兰报纸表示，对于不预先通知就在商船行驶的航线沿途布雷一事，要确定谁应当负责，固然是困难的，但是根据常识推断，这不可能由英国人负责；认为英国的报复行动对荷兰的打击很沉重，而要达成协议大概还需很长时间；而且荷兰人无法指望能强迫英国人或德国人这样做。与此同时，荷兰的船只必须继续出海。大多数荷兰报纸都对英国和对德国表示了同样的愤慨；但是有一家报纸说，英国虽然知道它的报复措施破坏了国际法的条文，不过它对中立国家一直相当关怀，并且可能准备作一些让步；另一家报纸则直言不讳地把英国的措施与德国的措施加以区别；它指出，英国造成的是金钱的损失，而德国造成的却是人命的损失，联系这一点，这家报纸还提到了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残暴行为。

当荷兰政府正在考虑就封锁事重新向英国交涉，而对于组织护航的事还没有作出任何决定时，英国的经济作战部就德国指责盟国扣留出口货物为非法一事发表了声明；而德国发给外国各报代表的声明，则对中立国家（其中显然针对荷兰，它是唯一被点名的国家）在英、法采取报复措施以后还不武装它们的商船或将商船组织起来加以护航表示惊讶（当英国人武装了他们的商船来对付潜水艇时，德国人曾利用这点作为任意布雷的借口，并为此事谩骂英国人达两个月之久）。塞西尔勋爵在接见 134 个荷兰记者时指出，如果要求国际联盟来处理英、德冲突的话，中立国家可能不得不采取一些步骤，结果它们所付代价要比英国采取报复措施所付代价还要大。1939 年 12 月 30 日，《泰晤士报》登载了该报驻荷兰记者的一篇长文，回顾了海上发生战事以后荷兰的情况。他说，荷兰人告诉他，荷兰前有恶魔，后有大海，而“你就是大海”；这篇文章的要点是，荷兰不顾英国的管制和德国的破坏，正在继续努力经营它的运输业。

1939 年 11 月 30 日俄国入侵芬兰，芬兰向国际联盟的呼吁，在荷兰激起了广泛的同情，不过荷兰人觉得，芬兰按理是无法指望别的国家根据国联盟约第十六条条文自发地采取行动的。荷兰政府的看法是，国际联盟当时没有威信，荷兰政府说，荷兰不会参加对一个被指明为侵略者的国家所采取的任何制裁行动，尽管荷兰可能在最终查明谁是侵略者的过程中进行合作。荷兰担心，德国与盟国之间的战事继续下去，最后只可能对俄国一个国家有利。当芬兰战败时，荷兰人认为这是“盟国让它由命运摆布”。

第六节 1940 年 1 月的惊恐

1940年新年伊始，荷兰是比较平静的。科林和德·格尔在1月1日和3日发表了广播讲话，科林以私人的身分讲话，同往常一样，讲得比较坦率，他说荷兰正在“进入一个极其危险的时期”，说中立国家已经在吃苦头。他要求在“当前的动荡时期”保持警惕和信心。1月6日，从海牙发出正式警告，说任何损害荷兰完整的侵略都将遭到荷兰全力以赴的武装抵抗。但是，直到1月10日，害怕入侵、害怕也许不久就要遭到入侵的心理，才又在荷兰滋长起来。这一天，德国下令伞兵和滑翔机空降部队占领那慕尔以南默兹河上的两个渡口，由于传送命令的一架飞机在默兹河畔的默舍朗附近被迫降，命令落到了比135利时人手中。这个行动计划是预定在1月7日于西线发动总攻击的一个组成部分。比利时政府没有把这些文件的原本给任何外国政府看过，但是它把文件的内容通知了英国、法国和荷兰的军事当局，并且立即增加了军事预防措施。荷兰军队的休假也因此取消了，14日，内阁召开了特别会议；但是这次会议的召开据说是因为欧洲总的局势有不祥的征兆，而不是因为接到任何报告说荷兰有新的危险，也不是因为泄露了蓄意针对荷兰的计划。甚至到了这个时候，不论比利时还是荷兰仍然不愿接受盟国的预先帮助。当德国了解到上述命令可能已被截获时，它似乎无可避免地面临着这样的抉择，要么把进攻的日期提前，以便在盟国采取对策之前行动，要么改变计划，这就需要时间。恶劣的天气替德国人解决了这个难题，进攻终于推迟了。

到1月16日，虽然德国人在莱茵河以南临近荷德边界的地区增加了几个师，并在那个地区加紧修筑公路，使得荷兰人惶恐不安，但是低地国家的紧张情绪已放松了一些。伦敦方面认为，这种局面可能是德国故意制造出来的；而德国则指责盟国引起了这场惊恐。可是荷兰人说，他们的戒备并不是英国人和法国人促成的：对于国际局势的报道，他们是惯于按照报道本身有无价值而加以判断的。从1月23日起，荷兰军队恢复了惯常的休假。

1月20日，当时任第一海军大臣的丘吉尔发表了一篇广播演说，这篇演说大大地激怒了荷兰人。丘吉尔说，中立的小国家在战争中正在首当其冲；它们的处境是可怜的，而且还要更糟。它们现在一面向德国卑躬屈膝，一面却认为盟国将会胜利。它们唯一的安全在于依靠英国和法国的护航。如果它们按照国际联盟公约履行它们的职责，并同英、法两个大国站在一边的话，结果将会怎样呢？荷兰作出的答复是，荷兰的责任无需丘吉尔来规定。荷兰将保持其中立，即使德国的失败将更明显。丘吉尔正企图把一些中立的小国推上前线。而美国、意大利、日本又怎样呢？一些大国只要对自己有利就蓄意无视国际联盟，而对作为国际联盟成员国的中立小国家提出要求，那是不合理的。

荷兰政府想要全部保持民主制度，但是军事当局对政府的职责却有不同的概念，这种意见上的分歧由于总司令I·H·雷因代尔斯将军在1940年2月5日辞职而变得更明显。他曾想对平民的生活实行更严格的军事管制，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戒严。

荷兰人的思想被一些相互矛盾的宣传弄糊涂了。例如，2月中旬到达荷兰的一批德国商人，似乎正在企图散布这样的想法，即德国非常希望恢复正常的贸易，与此同时，德国的官方宣传却在谈论“即将作出的决定”。可是，荷兰似乎已在这场“古怪的战争”中稳坐不动，如果在它的船只接连沉没，间谍活动闹得人心惶惶，越过它领空的外国飞机数目日益增加和外国对它的

船只进行空袭的同时，它还足够镇静自若的话。

阿姆斯特丹方面报道了德国一个新的企图，想强迫中立国家不要屈服于英国禁运管制制度；荷兰政府答复说，它非但不曾劝告其国民屈服，甚至还保留了禁止他们这样做的权利。3月3日，德国当局发表了一个公然进行威胁的声明，说任何一艘中立国的船只，只要停靠过英国的港口或是接受了英国禁运管制的条件，就要被击沉。

3月30日，丘吉尔再度以战争为题发表广播演说。他137说，欧洲许多小国正被威逼向德国提供物资，这种做法可能使战争延长，从而给许多国家带来严重的后果。英国对那些不幸而同德国为邻的中立国家最为同情，但是如果这些国家由于自己的懦弱而助长了侵略者的势力，那就不对了。他认为，这些中立国随时会遭到钢铁和火力排山倒海般的袭击。荷兰人认为在这篇演说中，对中立国的责备是温和的，并且对它们的困境表示谅解。丘吉尔的论点可以归纳为两个问题：中立国家在道义上是否有义务参加封锁以向德国挑战？它们的自取灭亡又是否能保证盟国的胜利？张伯伦就加紧封锁发表的一篇演说，荷兰人理解为中立国必须把它们同德国的合法贸易置于英国和法国的监督之下；但是，如果这样做了，它们就将间接地偏袒盟国，结果破坏了自己的中立。

第七节 1940年4月9日至5月9日

4月9日，丹麦和挪威遭到了德国的入侵。荷兰内阁召集了会议，并宣布，除了某些小的例外，停止一切军队休假，这不是因为荷兰担心会有什么新的危险，而是为了表示有坚定的决心来捍卫自己的中立。据报道，荷兰人民确信，荷兰早已准备好应付任何事变，确信政府的政策和军事上的准备都无需任何明显的调整。沿着边界线和在海防工事内的军事单位，日夜严阵以待。科林说，没有人能怀疑荷兰的态度，甚至实力远胜于它的敌军也将发现它不好对付。4月12日，荷兰报纸上登出了一则反对散布谣言和从事投机的警告。政府接着说，它既充分注意到外部的安全，也充分注意到内部的安全。它为了有吉斯林的先例而担心，正在告诫荷兰的国家社会党人（人们有些担心，政府对这些人的活动警惕不够）。4月15日，官方的一个声明说，荷兰人不会被交战国在他们四周散布的战争谣言弄糊涂。可是，荷兰虽然表示了这种138不可动摇的信心，卖国贼在挪威所起的作用仍然是荷兰人的主要话题，人人都在怀疑身边的某人是失败主义者或卖国贼。在现代历史上，荷兰先前还从来没有过这样一种怀疑的气氛（这时在比利时正有数千外侨被拘留）。

4月19日，全国实行戒严，从而使军事当局凌驾于非军事当局之上，德·格·格·格号召人们保持安静和信心，他援用了沉默的威廉的策略，“任凭波涛汹涌，依然镇定自若”，他说，荷兰不存在同任何一个交战国就可能受到另一方攻击的事举行任何秘密会谈的问题。从27日起，总司令宣布暂停出版自由，对所有报纸实行严格的军事检查；

人们有些吃不准，全面的军事干涉将达到何种程度，不过他们相信，这些措施将会有节制地实行。从4月9日起暂停的军队休假又恢复了。荷兰人对里宾特洛甫27日广播的反应是，在他为侵略挪威所作的辩解中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这样做，更加看不出侵略丹麦又有什么理由；

他们决心使火药保持干燥，使土地保持潮湿。

5月4日，荷兰政府突然接到报告，说荷兰可能在几天内遭到入侵；这

个报告在第二天从另一方面得到了证实，虽然对于确切的日期没有进一步的说明。这个情报没有转告盟国，以免德国人可能听到风声，而指责荷兰破坏中立；同时人们怀疑，盟国即使接到这样的临时通知，又能给予什么帮助呢。5月7日，休假取消，正在休假的人毫无例外被召回。没有讲明理由，只是说这139个决定是由于“国际局势进一步的动荡”；不过荷兰人已经习以为常地听到“狼来了”的叫嚷，看到在前几个月内采取过这么多相同的措施，所以他们在当天和后一天都镇定如常，尽管官方继续保持缄默。紧张的情绪甚至似乎放松了一些，这可能是由于英国外交大臣的一篇讲话，其中说到盟国的军队已从挪威撤出，以便在别处开展行动。这件事，以及法国和英国的军舰向地中海调动，似乎表明欧洲西北部可能将安定一个时期。同时，在荷兰，这时已有五十万人武装起来，并且正在采取最后的戒备措施。阿姆斯特丹的斯希普霍尔机场从5月10日起向所有的外国飞机（实际是德国飞机）关闭，何时开放，另行通知，被指控为间谍的人每天都有被逮捕的。

第八节 1940年5月10日的突然袭击

德国在5月10日凌晨4时开始进攻，事先没有警告。这个消息立刻用电话传到了伦敦和巴黎，荷兰人长时期以来曾一直拒绝就援助事作任何准备，甚至拒绝为此举行初步商谈，这时却来寻求援助，并且立刻得到140了援助，于是荷兰就加入了盟国。当天早晨6时15分，里宾特洛甫交给荷兰驻柏林公使一份长长的备忘录；

戈培尔在7时广播；大约同时，德国驻海牙公使冯·策希向范·克勒芬斯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后者是从内阁会议上离席来接受的；那天早晨，里宾特洛甫向德国和外国报馆的代表发布了一项声明。

德国为进攻低地国家辩解的主要论点如下：盟国旨在扩大战争：它们占领斯堪的纳维亚的计划已被挫败。它们的舰队调往地中海是要花招；它们真正的目标是鲁尔，德国政府已证实，英、法两国企图取道比利时进攻德国。德国先前尊重荷兰和比利时的中立，是以这些国家遵守严格的中立为条件的；已经有许多实例说明了它们不守中立的态度：它们的报纸怀有故意，领导人物在公开场合发言时同样怀有敌意；两个国家的参谋总部的高级官员曾实际帮助过英国保密局，以图引起革命和推翻元141首；荷兰和比利时只有在东部边界设防，只有在那里动员兵力（显然是在同英、法两国参谋总部取得完全一致的情况下作出的部署）；荷兰对英国飞机几乎每天侵犯其领空只进行极其软弱的抗议；此外还有其他不守中立的证据。（上述）里宾特洛甫的备忘录，在其附件中附有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1940年5月4日的一份报告《煞费笔墨，强词夺理），举例说明了荷兰和比利时的“片面的中立”，以及德国内政部1940年3月29日的一份报告，罗列了据说英国保密局在“荷兰和比利时怂恿下”进行活动的详细情节。

荷兰和比利时驻柏林的公使在5月10日试图把抗议入侵他们国家的照会交给德国外交部，但遭到拒绝。威廉明娜女王本人在同一天发表了一个声明，“对这一史无前例的背信弃义和破坏文明国家之间一切正当关系的行为提出愤怒抗议。”

战争的进程使得女王以离开本国为是，5月12日，她借同王室到了英国。13日，她用无线电话通过纽约发表了告荷兰人民书，说政府已迁到英国，留在荷兰人手142中的荷兰领土，不论在欧洲境内还是在欧洲境外，都仍然是一个主权国家。总司令可从军事观点出发采取一切必要的和正当的措施；各

地方当局要竭力为居民办事，尤其要为维持治安出力。她在向全世界发表的声明中，说明了她离开荷兰的理由，她说事情已变得很清楚，侵略者的首要目标是俘获王室和政府成员，从而使这个国家丧失一切领导和依法组成的权力机构。

政府方面，外交大臣和殖民大臣在德国开始入侵的当天飞到英国，到5月14日凌晨，内阁其余成员也到了英国。他们得到了广泛的应急权力，能立刻开始工作，把斗争继续下去。

附录：沙斯少校关于1940年5月9日柏林事件的证词

1940年5月9日星期四午后，我同奥斯特进行了最后一次接触。晚上7时我去找他。我几乎每天都去找他。当时他告诉我，此刻真正是一切都完了，他说，在西线发动侵略的命令已经下达，希特勒已抵西线。不过他也对我说：“仍然存在一种可能性，即事情将会推迟。这样的事我们经历过三次了。因此让我们再等一等吧。9时半是关键时刻。如果到9时半命令还没有撤销，那就‘最后决定了’。”然后奥斯特和我在市里一起吃了饭。自然，这多少有点丧宴的味道：我们又仔细回顾了一下我们做过的事情。他还告诉我，丹麦的事发生以后，曾发动过一次大规模的调查，因为发现有些消息走漏了。但是虽然发动了调查，却没有怀疑到我本人，而是怀疑比利时的143武官，因为他们认为他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中的天主教人士有联系。这时奥斯特说：“所以我们的事干得挺不错。直到目前他们还没有弄清事情的底细。”等我们在市里一起吃了饭，到9时半我就跟他一起去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我等在外面的黑暗处，隔了二十分钟奥斯特出来，说：“老兄，现在真是一切都完了。命令没有撤销。那头蠢猪已到西线去了——现在真正是一切都完了。希望我们在这场战争以后再能见面”，以及诸如此类的话。谈话在同样的情绪下继续下去，然后我就赶回我的使馆，同时要比利时武官在使馆里碰头。他正等在那里，我告诉了他这个消息以后，他就急忙赶回他的使馆去报告。我则拿起电话机，关照接海牙的陆军部。这种时刻自然是令人永远难忘的，因为在等待接通电话的那二十分钟内，我们简直紧张得要命。二十分钟后，电话接通了，按电话的幸而是一个我熟悉的军官波斯特·于伊泰尔韦尔中尉——现为上尉；我同他的谈话大意如下：我说：“波斯特，听得出我的声音吗，嗯？我是沙斯，在柏林。我只有一件事告诉你。明天一早，在拂晓时：要顶住！〔Houdjetaai！〕请你复述一遍吧！自然你是听得懂的罗。”他复述了一遍，最后他说：“那么210号信收到了吗？”我复述了一遍，并说：“是，210号信收到了。”这是我们在最后时刻商量好的一个密码代号。“200号信”表示入侵，而最后的两位数字则将指明入侵的日期。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就是“210号信收到”。当晚的事并未就此结束，不过无论如何我的报告总算传达到了。过了一个半小时，范·德·普拉斯赫上校打电话给我（范·德·普拉斯赫上校是国外情报处的领导人）。他在电话里多少有点怀疑他说：“我听说你那里情况不妙，尊夫人要动手术。真糟糕！所有的大夫你都请教过了吗？”由于这是我再度公开地受到责难，听到这些话我非常生气，于是除了别的话以外，我说：“喂，我不明白，你干嘛在这种时候还要跟我纠缠。你现在是知道的嘛！除了动手术，目前已别无办法。我已经同所有的大夫谈过了。明天早晨就要动手，在拂晓时。”说完我就把电话听筒扔回到挂钩上。……

这样，我在柏林的武官任务就结束了。我已经干完了我的事。我回到旅

馆里，拿了牙刷和睡衣裤到使馆去睡觉，因为公使不希望我再离开使馆。第二天早晨 5 时 14 分半，公使砰砰地敲我的门，说：“现在气球真正升起来了。我得去见冯·里宾特洛甫。”于是他就找冯·里宾特洛甫去了，我们则打开了收音机。这时我们听到了正在入侵的消息。

第四章比利时：德国进犯以前的政治情况康斯坦斯·霍华德

第一节比利时中立的背景

到 1936 年，纳粹德国的迅速重整军备已使许多身居要职的比利时人确信，可能发生法—德战争，而他们自己避免卷入的唯一希望，在于奉行一种更加独立的政策。比利时不再能依靠国际联盟的保护，而它作为这个联盟的一员所承担的义务，却可能把它卷入战争。洛迦诺公约规定要承担的军事义务是沉重的。

利奥波德国王及其军事顾问们认识到，要对一次进犯作任何认真的抵抗，就必须加强比利时的军队，而这种政策在国内却很少有人支持。1936 年 1 月提出的延长义务兵役年限的议案，在国内遭到了广泛的批评，于 2 月底被议会否决。反对的意见既来自社会党，也来自佛兰芒人的各政党，它们不准备支持任何加强比利时军队的措施，唯恐这样做将在战争中增进法国的利益，而不能促进比利时的安全。它们深为怀疑 1920 年的法—比军事协定，这个协定仍然有效，虽然其中有些条款已经过时了。3 月 6 日，比利时政府得到法国的同意，废除这个协定。参谋人员之间的会谈将继续下去，以履行两国根据洛迦诺公约而达成的协定。

第二天，德国的武装部队违反洛迦诺公约开进了莱茵兰。

英、法两国未能相应地采取任何有效的行动，以坚定比利时领导人奉行独立政策来寻求安全的决心。不能指望人民阵线领导的法国或鲍尔温时代具有和平主义思想的英国会得到比利时人的信任。看来英国和法国要么未曾觉察到，要么是没有力量来对付德国重新侵略的日益增长的威胁。

1936 年 10 月 14 日，利奥波德国王在一篇致内阁的讲话中，阐明了比利时外交政策的新方向。利奥波德强调重新武装的必要，他说：“我国的军事政策，正象其所赖以制订的我国外交政策一样，目的绝不是依靠同别国结盟，以便好歹打一场胜仗，而是必须使战争不在我国领土上进行。”比利时将拒绝一切联盟，奉行一种“纯然为比利时所独有”的政策。1936 年 7 月 20 日，外交大臣保罗·亨利·斯巴克在一篇关于外交政策的讲话中，就援引过这样的说法。

为了执行这个为国王及其大臣们所赞同、并且得到绝大多数比利时人支持的独立和中立的政策，他们设法解除了自己根据洛迦诺公约而承担的义务。经过长期谈判后，法国政府和英国政府在 1937 年 4 月 24 日发表声明，解除了比利时对两国承担的义务，并注意到了它要抵抗侵略的决心。同时英、法两国政府宣布，它们对比利时领土完整所作的保证仍具有约束力。

六个月以后，德国政府宣布，它也愿意尊重比利时的不受侵犯和领土完整，但在有德国卷入的一场武装冲突中，比利时不得配合任何针对德国的军事行动，其中包括允许法国或英国军队取道比利时进军。如果比利时遭到进攻或入侵，德国将给予帮助。唯有行将灭亡的国际联盟所规定的一些国际义务对比利时仍有约束力，而且这些义务也正在取消的过程中。1936 年 7 月 23 日，奥斯陆公约国家曾在哥本哈根宣布，它们不认为按照国际联盟盟约第十六条对破坏盟约者采取制裁的方法是必须执行的。比利时解除了根据洛迦诺公约承担的义务以后，1937 年 4 月 29 日，斯巴克在议会中声明，将不允许国际联盟一个成员国的武装部队根据第十六条过境，若事先得到比利时同意，由国际联盟几个成员国采取联合行动，则不在此限。他又说，缔结军事协定的时代已经结束。同法国进行的参谋人员会谈中止了。1937 年 12 月 2

日，首相告诉议会，在国联盟约修改以前，比利时对盟约只接受这样的解释，即在它自己拥有全部主权的情况下所作的解释。在 1938 年慕尼黑危机时期，比利时正式 146 声明，如果发生战争，它将保持中立，不允许任何国家的军队有过境的权利。

法国人不大愿意同意比利时不再承担大陆上的国际义务，每一次都是经过长期的外交斗争以后方才得到他们的默认。1938 年春天，比利时人表示，如果法国为保卫捷克斯洛伐克而作战，比利时不同意法国军队过境，当时法国驻布鲁塞尔大使曾设法对此决定施加影响，他向三个主要政党的领袖指出，如果比利时不同意让外国军队过境，法国必将取消对比利时的保证。比利时固然害怕招怨西方民主国家，但更怕招怨德国，而且还相信，民主国家将来无论如何是会被迫出来帮助它的。

1939 年 3 月德国占领布拉格时，比利时正在经受一场竞选运动的痛苦。党派的争斗、历任联合内阁走马灯式地更迭，造成政府不稳定，利奥波德国王告诫了他的大臣们，并谈到可能采取更集权的方针进行广泛的行政改革。

德国并吞捷克斯洛伐克，在比利时造成的直接结果是党派之争减弱了。竞选演说的语气比较有了节制。分离主义和种族派别活动的倾向受到了普遍的谴责，强调国家统一的重要性。捷克斯洛伐克的命运唤醒了佛兰芒人和瓦隆人，使他们认识到内证的危险，认识到必需成立联合阵线。4 月 2 日选举的结果，莱昂·德格雷尔领导的法西斯式雷克斯党的党员几乎全部落选。

1939 年的春天和夏天，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加强比利时的地位。通过了一些议案，在财政和国防方面授予政府更大的权力，并提供资金以加强国家的防务。另外还采取措施以控制对外宣传和监视居住在比利时的外国人。有些人以间谍罪被捕。3 月间，把储备的黄金运往伦敦和纽约，这一措施遭到纳粹政府的批评，认为是破坏了比利时的中立地位。

捷克斯洛伐克其余部分之被吞并，使比利时的民众 147 认识到自己的危险，从而对比利时人在恢复国内团结和加强国防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另一方面，这件事也加强了比利时政府的决心，要以完全中立的政策来寻求安全，避免采取任何行动，如果这个行动可能被德国人认为是比利时人参加共同阵线反对德国的佐证的话。例如，比利时拒绝支持罗斯福 4 月 14 日的呼吁，他要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用和平手段解决争端，并且向他保证，他们两人不会进攻他特别指明的三十一个国家。当德国反唇相讥，询问各个国家是否感到遭受威胁时，比利时同其他中立的小国一样，小心地回答说，没有。

比利时国王和政府对于英国政府关于建立一个反轴心国集团的为时已晚的努力表示冷淡。虽然英国抵抗进一步侵略的决心这时已很明朗，但是比利时人深信，英、法两国面对着一个重新武装起来和侵略成性的德国，在军事上是没有准备的。英国政府在 1 月至 6 月曾通过其驻布鲁塞尔大使多次建议举行军事会谈，都被坚决拒绝。除了这些秘密的外交接触以外，在国外报刊和在一部分比利时报刊上，公开赞成缔结一项军事协定。6 月 8 日，首相皮埃洛公开地重申了比利时坚持其独立政策的意向。他说，军事同盟给比利时的的好处，将不足以抵补因此而冒的风险。比利时人也不准备考虑恢复参谋人员的会谈。在他们的政策中，绝对不得模棱两可。7 月 19 日法国总统勒布伦对利奥波德国王的访问，并不比先前英国的几次建议更有效果；在此后的几天内，德国在外交上进行了威胁，目的在使比利时政府忠于其公开表明态度。

当比利时人始终希望中立和独立的政策可能使他们避免卷入一场新的欧洲战争时，事情已经相当明显，如果发生这样一场战争，他们不被卷入的机会是很少的。因此一直到战争爆发，比利时经常同奥斯陆集团的其他中立小国一起向主要的大国呼吁，要求相互协商来解决彼此之间的争执。

第二节比利时的政策 1939年9月至1940年4月

（一）武装中立

中立国家好心的然而没有结果的和平呼吁，在希特勒野心勃勃的滚滚浊流中象枯枝败叶一样被冲走了。9月1日，德国侵入波兰，到9月3日，英国和法国已同德国处于战争状态。比利时国王和政府立刻采取行动，来贯彻1936年制定的中立政策。

9月3日，政府发表了一个中立声明，规定比利时国家遵守严格而不偏不倚的中立。4日，国王依照宪法条款担任了军队统帅，宪法规定，在战争时期或即将有战争危险时，国王既是国家的元首，又是军队的总司令。

一个民族联合政府组成了，其中包括社会党人，他们先前曾经拒绝在1939年4月的皮埃洛年阁中任职。重新组成的政府有十八名成员，其中除了三个主要政党的成员以外，还包括两名无党派人士，即国防大臣德尼将军和财政大臣卡米耶·居特。斯巴克接管了以前由首相兼管的外交部。新成立了一个情报部，来管理各类新闻报道和指示。在议院中，普遍赞同奉行中立政策，赞同立足于为保卫国家独立而维持一支军队所必须作出的牺牲。当政府成员决心尽可能使他们的国家不介入战争时，他们大多数都不怎么怀疑，这场大灾难应归咎于德国，只有一小撮共产党员除外，他们鹦鹉学舌，硬是说德苏协定是和平的保证。议会投票通过了一笔二百万法郎的应急拨款，两院都以绝大多数通过了一项在非常时期授予国王及其大臣们特别统治权力的议案。

公众对盟国的同情和对德国重新侵略而激起的义愤在报刊上相当公开地表露了出来，尽管国王在9月4日向人民广播，恳求他们在行动和言论上——不论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都要恪守中立。9月7日，皮埃洛敦促人们为了国家的利益而克制自己，在10月26日参议院外交政策委员会举行的秘密会议上，斯巴克极其强调地谈到了政府保持完全中立的决心。第二天，他警告民众说，守中立是负有义务的。他说，少数不负责任的人希望比利时偏袒某一方，正在危害比利时的和平。

与此同时，比利时正在采取措施加强国防。在1938年9月慕尼黑危机期间，作过部分动员。那时曾把好几个年度应征的士兵召集了起来，使十二个步兵师处于战备状态。在这种场合得到的教训，使比利时采用了一种比较灵活的制度，把动员工作分成从A到E五个连续的阶段。在8月25日至9月3日之间，已经颁布了几道命令，把动员工作进行到C阶段。

波兰战败以后，德军迅速调往西线，在莱茵河左岸毗连比利时和荷兰的边境上集中了五十个师的兵力。为了对付这种威胁，比军司令部被迫召集了更多的后备军，从而很快就使军队几乎处于战时编制。比利时军队在战争爆发时曾部署在东、西边境以进行守卫，这时集中到了面临德国的东部边境上。除了动员和训练军队以外，总司令部还加紧防线和防御工事的构筑。比利时的防务包括安特卫普、列日、那慕尔和其他战略据点有重兵把守的要塞。用以连结各防守据点的工事，有碉堡、带刺铁丝网、铁路以及利用洪水来扩展

和加深原有洪水防线的设施。

比利时的计划规定了一道从安特卫普沿着艾伯特运河和默兹河到列日和那慕尔的主要防线，以及从安特卫普经过卢万和瓦弗到那慕尔的第二道国内防线。1939年8月间决定在这道靠里面的防线上开始动工，可是一个月以后战争爆发时，必要的防务建设仍然是纸上谈兵。有待决定的问题是，将在东北方进行的最初的抵抗，是沿着艾伯特运河呢，还是在靠里面的安特卫普—那慕尔一线，后者的位置是法、英两国在应邀前来支援时最容易到达的。在战争爆发后，比利时发出了指示以推进靠里面一道防线的施工，但是这个工程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完成。而且，扼守这道防线将意味着放弃大片比利时领土。9月29日，国王的副官和军事顾问范·奥韦尔施特雷滕将军建议国王选择艾伯特运河设防，接着就向总司令部发出了大意如此的指示。

在战争爆发后，英、法两国再度进行努力，劝说比利时国王同意举行参谋人员会谈，以协调盟国军队和比利时军队的战略。英、法表示，要是不这样做，一旦德国侵入时，就不能给予有效的帮助。国王及其顾问们不愿意采纳盟国的建议，他们认为，这些建议将危害他们的中立，使他们丧失掉继续不介入战争的机会。国王不相信比利时即将遭到入侵；直到那时为止从比利时驻柏林大使达维尼翁子爵那里接到的报告，助长了国王的这种看法。他们认为，举行参谋人员会谈，徒然给德国人以侵略比利时的借口，因为德国人通过他们的谍报机关，或者甚至由于盟国方面有意走漏风声，必然会发觉正在进行会谈活动。国王及其顾问们深信，盟国急于想把比利时纳入其行动范围。

9月29日，国王在一份拒绝英国迫切要求举行参谋人员会谈的照会中，说比利时人为了进行一场有力的抵抗而作的准备，将使盟国在必要时来得及进入阵地。

虽然利奥波德仍坚定地拒不同意举行参谋人员会谈，但在9月底，比利时却开始同法国就两国的计划在口头上交换了情报。经过初步交换情报，以及随后继续交换的情报，均表明比利时人渴望法国人和英国人能在安特卫普—列日一线进行支援，而法国人只愿意在靠里面的安特卫普—那慕尔一线给予支援。他们坚持以这条防线加速施工作为支援的条件。

与此同时，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使比利时能调整其经济生活，以适应战时大陆情况。8月28日、29日、31日和9月5日，政府颁布了一批非经特许不得出口或过境转运的商品清单。9月间，派遣代表前往伦敦、巴黎、柏林和海牙去讨论贸易问题，尤其是食品和原料的供应问题。151 由于比利时的进口物资，包括从比属刚果输入的物资，有百分之二十一用海轮装运的，因此，除非它能同中立国的货源作好安排，否则特别容易受到盟国的压力。由乔治·德尼（前任首相和当时的财政大臣）率领的一个代表团奉派前往美国，谋求美国的同情和支持。在这以前，当德·利尼亲王于1939年4月负有特殊使命派往美国时，就曾作过努力，希望美国答应，一旦发生战事，将帮助向比利时供应粮食。美国当时作出的反应，曾使利奥波德国王认为，对于中立国家抵制英国政府要求的努力，美国将只能给予微弱的支持。

由于比利时的对外贸易主要是和盟国进行的，因此它甚至比其他某些中立国家更有可能执行经济独立的政策。而且，与盟国和解，也将使比利时经济生活的通常渠道少遭破坏。比利时同德国的贸易，规模要小得多；

但是它从德国最重要的进口是煤和焦炭，这就使德国人在谈判时操有胜

券。

在同英国人进行了初步商谈以后，比利时的一个代表团于10月3日到达伦敦，12月11日，与英、法两国达成了一项战时贸易协定。由于比利时人同情盟国，也由于比利时同它们有主要的贸易关系，因而比较容易达成协定。这项协定包含两类商品：一类是比利时政府完全禁止出口的商品，另一类是出口额限制到战前水平的商品。要对第三类商品达成一项协定却困难得多，这类商品是指那些经过加工后并按盟国规定的条件再出口到交战国和中立国的商品。盟国要求减少这类商品的出口，尤其是羊毛的出口，此事激起了德国人要报之以中断煤的供应来相威胁，英国政府采取了对策，禁止比利时政府拥有的羊毛在英国销售。1940年3月1日，比利时终于同英、法两国签订了一项包含一切类别商品的协定。

（二）第一次“警报”1939年11月

在1939年10月底以前，对于德国的意图日益感到惊恐是有理由的。德国军队在毗连比利时和荷兰的边境上不断增加兵力，德国报刊猛烈抨击中立国家，指责它们偏袒盟国，指责它们面对英国的封锁措施未能组成一个坚定的阵线，德国飞机飞越比利时领空的次数增加，这些都是危险的信号。比利时驻柏林大使达维尼翁和武官戈塔尔斯报告，他们得到情报，比利时即将遭到入侵；他们说，有关法国、荷兰、比利时的计划和地图正在调集并分发给部队。与此同时，德国人却重复保证说，比利时和荷兰对于德军在它们的东部边境集中一事没有什么可害怕的。德国人说，这纯然是防御性的，而且是被迫采取的，因为法军在法比边界集中而比军又同时改变部署，这时几乎完全是针对德国的。在10月26日的电报中，达维尼翁进而说，意大利人已告诉柏林方面，德国如侵入比利时，意大利将感到遗憾。他又说，比利时表现亲近盟国的情绪；使德国的政界怀疑，比利时是否将继续保持中立。

第二天，10月27日，利奥波德国王向美国发表广播演说，重申比利时决心遵守它的中立声明，同样也下定决心在遭到进攻时进行抵抗。同一天，斯巴克发表演说（上面曾提到过），警告比利时人不要不负责任地发表意见。10月30日，范·奥威尔施特雷滕奉国王命向德国武官帕彭海姆保证，比利时决不容忍外国军队进入，除非是应邀而来。

11月3日，德国驻布鲁塞尔大使冯·比洛-施万特告诉国王的秘书卡佩尔伯爵，由于希特勒的和平建议已为盟国所拒绝，因而发生一场全力以赴的大战的时刻正在迅速临近。在随之而来的激烈斗争中，中立国家将要受害。第二天早晨，冯·比洛见到了国王本人，并告诉他，德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确信，盟国正在准备侵入比利时，而最高统帅部不愿让对方先予占领。军事行动即将开始：只有国王维护和平而对这种行动进行干涉，才能挽救这一局面。外交部政治司司长皮埃尔·范·聚伊朗男爵也听到冯·比洛提出的要比利时采取和平行动的建议，并同斯巴克就此进行了讨论。两人都认为，这样的接触是毫无用处的，——甚至是不合适的，因为德国发起的这个和平行动，对比利时来说，是徒然招怨英、法。

与此同时，11月6日，荷兰的威廉明娜女王致函利奥波德国王，邀请她同她一起进行斡旋，以阻止故事扩大。

由于局势严重——荷兰人认为荷兰即将遭到入侵——女王还在信中附了她建议采取措施的文本。斯巴克对此并不热心。他认为，这样性质的建议，

应当由政府通过通常的外交途径送出，另一方面，他对所建议的措施也不满意。他提出了修正意见，但是威廉明娜女王说，她不准备接受这些修正意见；她还说，如果需要，她将单独行动。利奥波德则急欲和女王一同行动，理由是“这是君主的事”，他决定立刻去海牙，并在当天晚上由斯巴克和范·奥韦尔施特雷滕陪同到了那里。荷、比两国的国王和外交大臣就信件文本一直商谈到次日凌晨。

第二天，11月7日，范·奥韦尔施特雷滕会晤了荷兰总司令雷因代尔斯将军，但是没有就一旦荷兰遭到入侵或两国同时遭到入侵时相互支援的事作出决定。雷因代尔斯说，他不认为荷兰可能遭到入侵。荷兰人仍然希望，他们的中立可能再度受到尊重，他们不愿意加入参谋人员的会谈，认为加入会谈可能使自己遭到损害，尽管雷因代尔斯个人认为，应很好地规劝比利时人同法国人和英国人作出某些安排。

与此同时，调停建议的文本终于得到了荷、比两国国王及其大臣们的同意，并在11月7日送给了德、英、法三国。比利时人则切望这个建议保密，不料当晚就彼荷兰人公布出来，并且招致了比利时报刊的批评。11日，德国驻布鲁塞尔和海牙的使节口头通知对方，建议收到，这似乎使人们有理由抱有希望，但是，在英、法的答复于12日公布以后（这些答复被里宾特洛甫斥为“蛮横无理”而不予考虑），德国政府拒绝继续考虑此事。尽管如此，这两54个中立国仍在继续努力。在利奥波德国王的建议下，由斯巴克和范·克勒芬斯于11月12日在布雷达起草了第二封信，并于14日交给里宾特洛甫，后者“注意”到这件事，但是显然是打算置之不理。与此同时，国王在8日亲自向意大利国王、佛朗哥和其他国家首脑呼吁，要求他们支持比一荷措施。意大利国王对出面向希特勒进行调停曾经抱有一些希望。

在发生危机的日子里，比利时政府曾建议召回一切休假的军人，并建议与盟军参谋总部建立联络。正如上述，尽管利奥波德不愿由于举行定期的参谋人员会谈而放弃自己的独立行动或危及比利时的中立，但比利时驻巴黎武官德尔瓦厄却奉命同甘末林就比、法两国的军事部署交换情报，以便一旦需要，盟国能前去支援比利时。

利奥波德国王也赞同那个负有特殊使命曾在10月底从英国到比利时去见他的英国海军上将罗杰·凯斯爵士的意见，即由范·奥韦尔施特雷滕向英国驻布鲁塞尔武官提供情报。范·奥韦尔施特雷滕和其他的人认为，这是德国的策略，想把比利时吓唬得向法、英求援，从而为德国进行干涉找借口。惶恐的情绪渐渐地平静了下来，当12月初荷兰人建议再发动和平攻势时（这次把意大利国王和罗斯福总统也列为联合签名人），斯巴克认为应予反对。害怕立刻遭到入侵的心情消失了，尽管驻柏林武官报告了德国打算入侵的日期。当年的时令和罕有的大雨，使德国的进攻受阻。

（三）第二次“警报”1940年1月

1940年1月初，害怕德国立刻进攻的心情又产生了。

齐亚诺委托皮德蒙特公主转交一封信，告诫她的弟兄155利奥波德说，危险比11月间更严重，而且这一次意大利的抗议将被置之不理。齐亚诺向比利时驻罗马大使也发出了类似的警告。1月10日，一个意外而富有戏剧性的机会，证实了比利时人最害怕的事。一架德国飞机在林堡省默兹河畔的默舍朗附近迫降。机上一个名叫莱因伯格的德国空军少校参谋，两次企图烧毁随身携带的机密文件。第二次当他正在受审时，他设法把文件扔进了熊熊的

炉火中，这一次几乎达到目的。但是，文件只有部分被烧毁，残留的部分仍足以看出这是发给德国空军的详细指示，要夺取那慕尔以南默兹河上的几个渡口，作为在西方发动总攻的第一步。

这些文件的内容立刻被告知了英、法两国驻布鲁塞尔的武官（虽然没有让他们看文件的原本，也没有告诉他们文件从何而来），并要求他们向法、英两国的参谋长报告。1月13日午夜，斯巴克召见了英、法大使，说比利时政府认为比利时可能在下一个星期天即15日遭到进攻，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将要求盟国履行1937年的诺言，立即给予援助。

利奥波德在向盟国发出呼吁前，却急欲得到英、法两国的保证：捍卫比利时的战后地位：他在13日要求凯斯将军从英国政府得到如下保证：不单独媾和；保持或恢复比利时和比属刚果的完整；给予比利时必要的财政援助，以恢复其地位。英国的答复于1月15日由凯斯递交国王，利奥波德认为这个答复是完全无法接受的。英国人说，他们不能作出明确的保证，这些保证也许是他们在战争结束时无法履行的。不过，他们保证竭力使比利时保持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条件是英国军队应立刻获准进入比利时。与此同时，英国大使在同斯巴克会晤时，也要求对方立即作出决定。这使国王大为恼火，他在整个这段时期表明，他喜欢把谈判权掌握在他自己及其私人顾问手156中。他阻挡大臣们采取行动，只是勉强而迟缓地把情况告诉他们（例如有关缴获文件和有关国王在伦敦和巴黎采取的措施）。究竟是利奥波德在回想起大臣们在11月危机中的态度时，害怕他们会彼吓得一时冲动而立刻把盟国召进来呢，还是仅仅认为自己能把事情处理得更好，这一点不得而知。这段插曲说明了国王与他的大臣们缺少密切的合作，在遭到入侵后，当利奥波德主动指挥军事行动时，这种情况变得非常严重。

法国人则说，他们愿意无保留地同意比利时人的要求，如果比利时的边界能立刻向法国军队开放。他们已经作好必要的军事部署，以对比时进行支援。达拉第说，如果比利时拒绝他们立刻进入，法国就不得不撤退驻在毗连比利时边境上的毫无掩护的军队。他警告比利时政府说，如果再发生紧急情况，就不能指望法国作类似的进军了。他要求立即给予答复。国王及其大臣们都主张拒绝盟国预防性进驻比利时的要求。因而1月13日夜曾由参谋长范·登·贝尔根将军发布的撤除南部边界路障以让盟国军队进入的指示，到15日又由范·奥韦尔施特雷滕经国王批准下令撤销。政府拒绝法国要求的照会也于同日发出。除了别的考虑以外，政府希望，德国会放弃侵略计划，如果它知道这些计划已经被人发觉的话。

在柏林，达维尼翁于1月15日和17日同魏茨泽克会见了两次。他的使命是要求对方解释德国一些显然是侵略性的行动，同时通知魏茨泽克，除非比利时遭到进攻，否则决不向英国或法国求援。当魏茨泽克反唇相讥，埋怨比利时的防御措施的反德性质时，达维尼翁指出，从迫降的飞机信使手中缴获的德国文件具有重大意义，证明比利时采取这些防御措施是有道理的。魏茨泽克157认为这件事不值一提，他只是偶然听报界谈起过。事实上，他已从德国驻布鲁塞尔大使馆接到一份有关此事的详细报告，报告中提到莱因伯格少校承认未能把文件统统烧毁。德国人虽然在正式场合对这件事轻描淡写，实际上却很为难，因为他们无从确定，自己的进攻计划到底泄露了多少。据说希特勒对于这一挫折大发雷霆；不过，进攻终究推迟了，同时，又在制订新的进攻方案。

（四）盟国要求预防性进驻遭到拒绝

1940年4月9日丹麦和挪威遭到入侵以后，比利时政府又接到盟国的要求，催促立刻同意让它们的军队开进比利时，其根据是它们有理由认为，德国即将进攻荷兰和比利时。盟国迫切希望，在斯堪的纳维亚已经发生的情况不要在低地国家重演，它们认为，要使它们的支援发挥效用，就必须在德国发动进攻以前让它们的军队进入指定的阵地。甘末林也认为，这样做有好处，将缩短盟国的战线。在4月9日的盟国最高作战会议上，法、英两国领导人一致同意，迫切要求让他们的军队预防性进驻比利时。

可是，尽管没有任何可能，比利时人却仍然抱着希望，认为他们的国家能免于战祸。同时，他们也没有失去希望，认为如果发生必须求援的情况，也许能说服盟国把军队一直推进到艾怕特运河。此外，有许多人认为，在德国入侵以前就同意盟国进驻，将使国家的统一受到危害。另一些人认为，比利时在道义上负有责任，在对待各交战国的关系上保持从战争一爆发时就已采取的中立立场。4月10日，内阁发布声明，重申了比利时的政策，反复说明政府一致决心坚持中立政策。斯巴克4月16日在参议院的发言和皮埃洛19日的发言，再度重申了这种决心。皮埃洛在发言中还谈到了政府已采取措158施，维持国内治安。3月，两院通过了保卫国家制度的议案，其中包含对付外国宣传和其他颠覆活动的措施。皮埃洛说，管理外国人的条例，其中包括这样一些措施，如防止其秘密潜入，和把国内的外侨分成几类，有的给予完全自由，有的将被拘留或驱逐。他说，已有几千人被拘留。新的拘留营正在建造。侦探的力量已经加强，主要的交通中心正在派人守卫。

从欧洲战争爆发至荷兰和比利时遭到入侵的这几个月里，这两国的政府之间保持了频繁的接触，但是没有缔结采取一致军事行动的协定，也没有彼此作出任何保证，一旦遭到进攻时相互支援。斯巴克在1939年12月19日的发言中表明了比利时的立场，他说，比利时希望保持自由行动的权利，要它发表声明，表明倘若荷兰遭到进攻，比利时将采取什么态度，那是不可能的。不过比利时人深信，荷兰如遭进攻，比利时势必卷入战争，因为他们知道，一旦发生这样的进攻，盟国为了援助荷兰，在军事上有必要立刻进入比利时。雷诺在谈到4月9日最高作战会议上就这一点达成的协定时，说比利时人已通知法国人，只有在德国侵入荷兰这一未必可能出现的前提下，他们才会邀请盟国进入比利时。

第三节比利时遭到入侵和十八天的战役

将近1940年4月底时，有迹象表明，德国在西方的进攻将不会推迟很久了。比利时外交部获悉，比利时的德侨正在把财产转移到瑞士。从驻在柏林的达维尼翁和戈塔尔斯那里，从梵蒂冈通过罗马教皇的使节及通过皮德蒙特亲王和公主转交给利奥波德国王的信件中，都得到了即将遭到入侵的警告。荷兰人也已接到了类似的令人惊恐的消息。

5月8日，戈塔尔斯从柏林发出报告，说德军总司令部已向部队下达进攻的命令。9日，外交部获悉德国驻布鲁塞尔大使正在烧毁文件，当晚9时，戈塔尔斯报告，翌159日发动进攻。

9—10日夜里，在布鲁塞尔值夜的文武领导官员连续不断地接到报告，说听到了部队向毗连荷兰和比利时的边界进军的声音，有大批飞机飞越荷兰领土，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的边界受到了侵犯。清早5时17分，在等着听

消息的大臣们听到了比利时边界受到侵犯的消息几分钟后，警报器的尖啸声预告德国将对比利时首都进行空袭。比利时立刻向它的保证者英、法两国发出了呼吁。

进入全面戒备状态的命令，已在午夜下达到军队。10日凌晨，国王在接见了皮埃洛、斯巴克、德尼等几位主要大臣以后，离开首都前往布雷恩东克大本营，执行他作为比利时军队总司令的任务。

上午8时30分，德国大使来到外交部递交一份照会，声称为了在盟国侵入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以前先发制人，德国政府“被迫”用武力来“保证”它们的中立。德国政府还建议，比利时为自身的利益着想，应当停止一切抵抗，并宣布，如果这样，德国将保证比利时在欧洲和在殖民地的领土完整。德国威胁说，比利时如果继续抵抗，将冒国土被蹂躏和丧失独立的危险。斯巴克抗议说，面临德国罪恶的、无理的侵略，比利时决心保卫自己，国王在同天的告国民书中，宣布他已成为军队首脑，要求大家与盟国协力抵抗，他说，盟国的军队正在兼程赶来支援比利时。

德国人在5月9—10日夜里最初一次奇袭中，采用大胆的滑翔机和降落伞战术，得以完整无损地夺取了艾们特运河上的三座桥梁，使新建的埃本·埃马尔炮台失去战斗能力。德国的装甲纵队涌过这样打开的缺口，威胁了运河一线整个阵地。在11—12日夜里，比利时军队奉令向安特卫普—那慕尔—吉韦一线撤退，在这条防线上，英、法军队已经按照原先同意的计划进入了阵地（分配给比军的防区从安特卫普延伸到卢万）。

12日，利奥波德在卡斯托会见了英、法的指挥官和达拉第。这次会谈的结果是，同意由法国的比约特将军——160他指挥着第一集团军群在英吉利海峡与马其诺防线靠近隆维的一端之间作战——负责协调在比利时和荷兰的盟国军队的行动。

当比利时和盟国的军队正在拼命组织安特卫普—那慕尔一线的防务时——它们曾经希望在撤退途中能够在这条防线上站住脚，长久抵抗下去——战局的向南发展却迅速地使它们的阵地防守不住。由于德军13—14日在色当和在更北的两个地点强渡默兹河，德国的装甲纵队到15日已在盟国的阵线上打开了一个宽五十英里、纵深约六十英里的缺口，这就迫使缺口以北的军队必须继续撤退。比利时军队奉令在16—17日夜里配合英国远征军一同撤退到斯凯尔特河。

15日和16日的消息同样糟糕。法国的第九集团军被德军主力插入打垮后，实际上丧失了战斗力。在它北面的第一集团军的防线已被突破。匆匆投入荷兰去支援荷兰人的第七集团军，已被击回安特卫普。15日，荷兰军队宣布投降。布鲁塞尔越来越风声鹤唳，它从战事一爆发，就立刻宣布为不设防的城市。难民源源涌入该市，到处流传着伞兵着陆的谣言。

在这个时刻，利奥波德同他的大臣们对比利时执行的政策开始出现严重的意见分歧。在这以前，他们之间的意见不一致，只涉及一些做法，而不涉及根本目标。在战争爆发前和在这场“古怪的战争”期间，大家一致同意，比利时必须奉行独立和中立的政策，只有在遭到进攻时，才能参加战争，在5月15日和16日利奥波德和大臣们举行的会议上，第一次显出了意见分歧，结果导致国王及其军队投降，而大臣们则出走到国外继续斗争。在这些会议上，国王要大臣们注意局势的严重性和盟国战败的可能性。他认为德军的突

破非常可能把比利时军队和英国远征军同法军的主力部队分割开来，结果会造成比利时孤军作战和最后投降。这个前景使大臣们毛骨悚然，他们坚决主张，必须不惜任何代价，使比军不被牵制在本国领土上并且不与盟国军队分割开来。无论如何，必须使政 161 府和尽可能多的军队向南撤退，逃到自由的国土上。他们认为，如果比利时把自己的命运与盟国的命运分隔开来，那末它未来的独立和繁荣就要受到危害。此外，他们对于利奥波德有充分理由害怕盟国在大陆上战败这一点，并不抱有同感。他们与国王不同，相信法国有意志也有能力把这场斗争继续下去，直到获得胜利为止。

5月16日，政府在首都被敌人占领以前不久，离开了布鲁塞尔前往奥斯坦德，18日，又迁往法国。只有皮埃洛、斯巴克、德尼和范·德尔·波尔滕（内政大臣）除外，他们留在比利时的国王大本营附近。

在随后的几次会议上，大臣们一面继续提出建议——其中有许多是行不通的——要求把比利时军队迅速向南撤退，他们甚至更加迫切要求国王同意，不让自己被俘，而是及时丢下军队，和政府一同逃往法国。

利奥波德拒绝作出保证：他说，他的行动将由事态的演变来决定。指挥官的职责是要和军队呆在一起，如果必要的话，直到投降。他认为，他的首要责任是保卫国土完整。何况，由于德军推进迅速，盟军总司令部未能以足够的速度和力量作出反应来防止盟军的瓦解，即使比军总司令部愿意把军队从比利时领土上撤退，是否能做到这一点也成疑问。比利时军队没有坦克，只有很少的飞机，其装备和训练，只能在准备好的阵地上打防御战。由于不断的撤退，由于放弃了安特卫普—那慕尔一线准备好的防御阵地而迟守到后方没有准备好的阵地，军心已经动摇。部队的行动受到了逃难人群的阻碍，尽管大臣们发出为时已晚的呼吁，要居民留在家中，他们仍象潮水般地涌往通向南方和西方的一切道路上。军队的补给仓库和军火仓库已被撤退的部队丢弃或毁坏。

法军总司令甘未林在5月19日由魏刚将军接替以前所下的最后一道命令，是要北方各集团军朝南向松姆河总撤退；第二天，英国远征军司令戈特勋爵接到命令，要作出相应的行动。英国参谋总长埃德蒙·艾思赛德爵士奉派到比利时向戈特下达此项命令，并询问比利时62军队能否一起行动。范·奥韦尔施特雷眯说，要比利时军队参加向南的进攻行动是不可能的，它的作用只能是作一次防御性的行动，即守住阵地，好让法国人和英国人腾出手来发动进攻。

20日，利奥波德通过凯斯送了一封信给丘吉尔，信中说，他担心英国向南进攻，结果必然造成比利时军队的孤立和投降。

21日，魏刚去伊普尔，讨论如何从南北双方同时发动进攻，来实现切断或者至少遏制德军强行推进的计划。

上一天，即20日，德国人已打到阿布维尔，并挥戈北上。

在伊普尔的会谈中，最后同意应由英、法部队承担向南的进攻，而比军则退到利斯河，以后可能再退到伊塞河，为盟军提供掩护。比利时人同意延长自己的防线，好让英国军队腾出手来进攻。

魏刚的计划绝无成功的希望，到25日，要阻止德军挺进或使南方与北方各集团军之间恢复联系，已没有任何可能。比约特将军在伊普尔会谈后返回他的司令部途中因车祸殒命，两天以后布兰查德将军才受命接替。通讯工具大量缺乏。军队之间的配合，一向就有缺点，这时已变得几乎没有配合可

言。比利时军队在利斯河正遭到猛攻，国王曾决定在这里作最后的抵抗。防线已被突破，在比军右翼与英军左翼之间，有被打开缺口的危险。

5月25日，国王与大臣们在维南达埃尔堡最后一次会见。大臣们于凌晨3时30分就到达军队大本营，视察了情况以后，他们显然意识到，再过一两天军队就将无法继续抵抗了。他们于清晨5时到达维南达埃尔，要求觐见国王。在这次戏剧性的、情绪激动的会晤中，终于到了必须作出抉择的重要关头。大臣们说，他们打算立刻离开本国，并说，国王有责任和他们一同走，到国外去继续斗争。利奥波德回答说，他已决定留下来和军队在一起。

大臣们说，如果利奥波德国下，作为国家元首，他的地163位将使投降不但具有军事而且具有政治的色彩。他们说，他如果不听政府的劝告而留在比利时，那他要国内即将发生的纷争负责，他将来不可能起任何重要的作用，因为他将落到恰恰那样的地位，或被当作战俘押往德国。国王此举将被盟国看作是背叛了他们的事业，这个事业是从比利时向其保证者呼吁时起，就在道义上对之负有责任的。但是如果国王离开比利时，就可以利用在法国集结的战争力量，和盟国政府一同在军事和政治方面继续行使他作为国家元首的职能。

利奥波德却坚信法国不久就要投降，坚信即使英国继续单独作战，也将限于海上战争和殖民地的战争。他说，在这样一场战争中，比利时是没有地位的。他给大臣们看了他写给英王乔治六世的一封信，信中说明了他作出的决定和无法在国外继续战斗的理由。他还说，比利时的抵抗能力已经消耗殆尽，比利时的军队已经无法再朝后退。他认为，他能为人民和国家服务的最好方法，就是和他们一起留在比利时。

大臣们尽了一切努力都未能说服利奥波德和他们一同去国外，在国外担任比利时政府的首脑，于是大臣们重申，他们决心要走，对于国王不听他们一致的劝告而采取的决定，他们将被迫违不执行。他们在离开前，再度询问，军队的投降是否不可避免。国王说，是的。他们又问，那未能拖延多久呢？国王回答说，至多二十四小时。

大臣们离去后，利奥波德于当天，即于5月25日向军队发布一道命令，要求军队继续保持坚韧不拔的精神，并宣布他决心与军队共存亡。上一天，德国人在比利时的各条战线上散发传单，告诉士兵们继续抵抗是无用的，因为他们的领袖们正打算抛弃他们。

利奥波德所断言的不可避免和即将出现的投降推迟了两天。5月26日，比利时人再度要求英国司令官攻击德军侧翼。戈特正在准备向敦刻尔克总撤退，因而无法给予这种支援，他建议比军马上撤退到伊塞河。利奥波德回答说，军队已无法再撤退。沿着整条战线都在激战，164后备力量已经耗尽，如果企图脱离接触，结果将使那些仍然相互接应的部队完全瓦解。同一天中午，利奥波德发了一份照会给法国使团团团长，通知魏刚局势严重，几乎已经无法再抵抗下去了。

到5月27日，比利时的防线已被突破了几处，在德国的猛烈空袭之下，比军的抵抗正在瓦解，因为比利时人对此是无法招架的。在比利时尚未沦陷的小块土地上，挤满了从沦陷区逃出来的难民。那天早上，国王告诉凯斯，他将被迫投降。凯斯发了一封大意如此的信给戈特，可是未能送到。刚过中午，国王和参谋长同意派遣密位到德军司令部要求停战，并且立刻把此事通知了法、英使团团团长。法国使团团团长尚蓬将军认为，由于北方各集团军组成

了一个共同的集团，因此只有经过一致同意才能开始进行谈判。英、法使团能够同英国陆军部和魏刚将军接触，但是无法同战场上的法、英指挥官（布兰查德和戈特）联系，因为不知道他们当时在何处。比利时的密使在下午 5 时离开比军总司令部，至夜间 11 时返回，带回德国的答复，要求比军无条件地放下武器。利奥波德决定接受德国的条件，并建议在凌晨 4 时停火。

28 日凌晨 3 时，接到魏刚的信，信中把盟国与比军的投降分割开来。下午，德军来到，控制了国王的大本营布鲁日宫，这时最后的一些军旗正被匆忙地转移到安全的地方。第二天，德国的将领赖歇瑙来到，寒暄了一番，并答应宽待比利时军队，夜间利奥波德被德国人带到他在拉埃康的王宫，在那里一直呆到 1944 年夏天盟军在法国登陆后又被迁往德国。

随着国王和军队的投降以及比利时本土被占领，这 65 出戏的第一幕演完了。可是，从国外却继续对德国进行抵抗。大臣们于 5 月 25 日在维南达埃尔与国王作了最后一次争论激烈的会晤以后，在敦刻尔克上船，到了伦敦，后来又前往巴黎。他们到达伦敦时见到哈利法克斯勋爵，告诉他比利时军队即将投降，国王已决定留在比利时。他们仍然希望在最后时刻国王也许会被说服，重新考虑他的决定。然而，英王乔治六世和丘吉尔通过凯斯给利奥波德国王的信以及比利时大臣们在 27 日给他的信所作的最后呼吁，都未能打动他。

26 日，比利时的大臣们在巴黎重聚，第二天，他们和比利时众、参两院的议长一致决定继续与盟国并肩战斗，并呼吁全体比利时人对祖国的命运抱有信心和继续忠于共同的事业。会后，发表了一个大意如此的公报。

当天即 27 日晚间，雷诺（这时担任法国总理）告诉比利时的大臣们，他们的国王没有预先通知英、法方面，就向德国人派出了全权代表。第二天，雷诺在向法国人民的广播中猛烈地抨击了比利时国王和军队，把盟国遭受灾难的责任归咎于比利时。于是法国人民就迁怒于比利时人，这时在法国的比利时难民有二百万人。比利时的大臣们不知道投降的条件，他们急于保护难民，对于可能与法国盟友决裂的前景感到惊惶，觉得唯一可行的是说明他们自己和比利时人民与国王的行动无关。皮埃洛在当天晚些时候广播的演说中，把全部责任推在利奥波德身上。他指出，国王由于投降，这时已受到外国的控制，不再能进行统治。文武官员可不必再履行他们在效忠宣誓时所规定的义务。根据宪法的条款，权力将由现政府继续掌握。新的军队将从住在法、英两国的适龄比利时人中招募。

皮埃洛严厉的言词反映了比利时大臣们需要与其盟国和解，也反映了他们不能断定利奥波德打算执行怎样的政策来应付德国。他们于 25 日离开维南达埃尔时，确信国王打算另外任命一个政府以代替他们，来同德国议和。当时国王对大臣们提出的问题所作的答复，使这种推测显得可信。当时大臣们问他，如果他留在比利时，他认为自己能起什么作用，还问他是否要有一个政府。国王回答说：“当然罗，我又不是一个独裁者。”国王还认为，如果现在的政府在法国继续战斗下去，那就不再是国王的政府，而是和国王分庭抗礼了。大臣们离去后，利奥波德立刻就他在宪法上的权力问题向检察长埃瓦·德·泰米库尔征询意见。检察长告诉他，要同德国达成任何协定而其条件超过仅仅使军队投降时，国王必须得到一个大臣的副署。他还裁定，要任命新的大臣，需有一个现任大臣的签名。由于没有现任大臣留在比利时，国王要求驻在巴黎的皮埃洛政府给他一份正式副署好的空白委任状，好让他

任命大臣。大臣们在 4 月 26 日讨论了国王的这个要求，一致加以拒绝。

国王后来否认他曾打算和德国人谈判或在德国占领下成立一个能在比利时行使职权的政府。可是证据说明，他在投降时确曾设想过这样一种可能。利奥波德坚信法国人不久就要投降，即使英国人继续斗争，德国也将统治大陆。在这种情况下，他很可能考虑到，只有接受不可避免的命运和同征服者达成某种协定，才能使比利时的利益和前途得到最好的保证。

5 月 31 日，流落在法国的比利时议员在利摩日开会，并通过决议，表明他们与政府完全团结一致。决议的措词严厉地批评了利奥波德的投降，在通过这项决议以前进行的辩论中，许多议员甚至提议废黜国王。5 月 28 日，比属刚果总督发表广播讲话，申明这个殖民地和政府团结一致。

与在法国的比利时人的反应形成对照，比利时国内大多数居民的直接反应，是赞成国王而反对政府的。他们同情与他们留在在一起的国王，而批评大臣们抛开了国家，并且似乎是在支持法国激烈攻击他们的国王和国家。在英国，对比利时投降的批评不象法国那么偏激。丘吉尔于 5 月 28 日在下院宣布比利时军队投降时，要求英国人民暂时不要对比利时国王的行为作出判断，尽管一个星期以后，出于同法国团结的需要，他的措词要严厉得多。

比利时政府希望并预期能与法国协力坚持同德国斗争，但是这种期望注定不久就要落空。在法国投降时弥漫于波尔多的瓦解和失望的气氛中，比利时政府只得承认，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以法国为榜样。这个决定受到了新任法国外交部长保罗·博杜安的影响，他在 6 月 18 日告诉皮埃洛，法国准备缔约停战，它无法在非洲继续斗争下去。他认为，英国很快就将效法法国，向德国人求和。大臣们试图同留在比利时的国王联系，目的是要派两个人回国，讨论采取何种步骤同德国展开和谈。利奥波德通过他的内阁长官弗雷德里克回答说，他身为战俘，无权过问政治。弗雷德里克还说，他个人认为，皮埃洛及其同僚们还是不回比利时为妙。比利时政府作了一切努力，要同德国政府接触，以商谈条件，都被置之不理。1940 年 7 月 20 日，德国驻比利时当局颁布命令，禁止皮埃洛政府的成员回比利时。

7 月，已被授与特权担任比属各殖民地行政大臣的德·弗勒肖韦尔和财政大臣居特由政府派往伦敦，就比利时的财政和殖民利益与英国政府磋商。与此同时，其余的大臣留在法国。他们既被德国政府置之不理，又受到利奥波德的冷遇，最后维希政府还在德国的压力下停止供给他们经费，他们的处境每况愈下。8 月 20 日，在法国的比利时政府解放，皮埃洛和斯巴克离开法国前往西班牙。他们在 10 月得以到伦敦与德·弗勒肖韦尔和居特重聚，组成比利时流亡政府，继续与英国并肩战斗。

第五章（上篇）法国的政治背景 1939年9月3日至1940年5月10日

菲利普·莱恩少校

第一节 1939年9月的国内政治形势

（一）政府

向纳粹德国宣战的那届法国政府，是激进社会党领袖爱德华·达拉第于1938年4月10日作为一个“国防政府”向国家提出的，1939年9月3日，政府成员如下：总理兼国防部长爱德华·达拉第副总理兼协调部长卡米耶·肖当外交乔治·博内司法保罗·马尔尚多内政亚尔培·萨罗

空军居伊·拉·尚布尔财政保罗·雷诺海军塞扎尔·康平希商船路易·德·夏普德莱恩教育让·泽农业亨利·克耶殖民乔治·芒代尔抚恤奥古斯特·尚普蒂埃·德·里贝斯商业费尔南·冈坦交通朱尔·朱利安卫生马克·吕卡尔劳工夏尔·波马雷市政工程阿纳托尔·德·蒙齐政府成员主要来自激进社会党，该党被称为“最善于判断一般法国人将支持什么——如有必要，在壕沟里作战”。这个党代表小自耕农和城市中层社会的下层——169 如小自由职业者和政府雇员及大多数零售店主。在这些人中间，希望平等的心情胜过要求自由的本能，这一点经常表现为妒忌别人的地位或优点，以致安德烈·西格弗里德说，此党几乎总是自发地支持小的反对大的。

达拉第的政府必须应付这样一个国民议会，它是1936年5月在反对法西斯分子于该年2月发劝巷战的怒潮中选举出来的，在全部六百十八个席位中，社会党占一百五十五席，激进社会党和激进共和党集团占一百十六席。参议院的情形恰恰相反，它是1938年在人民阵线瓦解后选出的，为达拉第提供了几乎绝对的多数。可是，不论国民议会还是参议院，都没有被要求对政府处理国事进行非常严格的监督，这是因为，当政府首脑在1938年4月提出他的国防内阁时，曾被授予特别“全权”，这种“全权”到战争爆发时已展期过两次；而1938年7月11日的“战时国家组织法”，在宣战的当天就生效，根据第三十六条规定，批准和扩大了政府首脑的管理权限。这些条文授权总理，只要他认为必要，就可单凭法令进行统治，而把议会批准的手续留到以后更方便的时候再办理。

爱德华·达拉第这个将要行使这些全权的人，他的性格并不使人担心这些权力会被滥用。这位“不得已而实行独裁的人”，其突出的品质是聪明正直，道德高尚，牢固地扎根于农民的淡泊寡欲，但受到了自我怀疑的戕害。他是普罗旺斯的一个面包师傅的儿子，当过学校校长，得过大学学位，这个学位兼有牛津大学的文学士和剑桥大学的荣誉历史学位的荣誉，他在巴黎政界混了二十年以后，仍然不脱农民本色，具有农民的质朴的性格和粗鲁的举止。他有直觉，但他只是对于辨别各种思想而不是对于如何识人有直觉；他也不乏议会中常见的那种机敏灵巧。

可是，除了这些才干之外，他没有强烈的意志和坚定的信念：有些政论家在看到他那粗壮的脖子和强健有力的双肩时，说他是一头公牛，其实，能够恰当地象征他的，并不是公牛，而是一个把着犁在耕作，双脚沾满法国大地的泥土而步履沉重的庄稼汉。担任副总理兼协调部长来辅佐达拉第的卡米耶·肖 170 当，属于职业政客的类型，他的指导方针是时局需要什么政权，他就在这个政权下面混下去，并维护他在巴黎银行界和商界的许多朋友的利益。这位天生的“息事宁人者”和中庸之道者在这届内阁中的任务，就是平息批评，让他的头领腾出身来独力对付怀疑的恶魔。

在外交部，勤勉而非常干练可是生来就不爽直的律师乔治·博内，他为人颇似肖当，但是有点不象肖当那样轻快活泼；他的绥靖政策的破产是公认的，因此在宣战以后的十天之内，当总理未能说服赫里欧（国民议会的议长，激进社会党员）担任外交部长之后，自己就兼任了这个职务，此后经常每天在外交部办公四小时。博内留在内阁中，代替马尔尚多任司法部长。与此同时（9月13日），另有三起更动：里奥、德尔博斯、贝斯分别代替德·夏普德莱恩、泽、尚普蒂埃·德·里贝斯担任了商船、教育、抚恤部长。另外成立了一个军备部，由多特里主持。

尽管协调部长作了种种努力，达拉第的内阁仍然不是一支统一的队伍；在任何原则的问题或紧急的事件上（尤其在对外政策上），这个内阁往往分裂成两个相当稳定不变的阵容：雷诺（财政）、芒代尔（殖民）、萨罗（内政）、德尔博斯（教育）、康平希（海军）、拉·尚布尔（空军）、多特里（军备）认为，应把同英国密切合作坚决进行战争放在首位，其他一切考虑次之；其余的人，特别是波马雷（劳工）和德·蒙齐（市政工程），则拥护肖当的妥协方案或博内的希望，认为通过墨索里尼这个“诚实掮客”的斡旋，可把德国人收买过来。

在坚定的爱国者——后来通称主战派——中间，有两个人是突出的。雷诺这个人，我们将在谈到他于1940年3月组成的政府时较全面地加以研究；至于乔治·芒代尔这位精明强干、体力充沛、见识广博的殖民部长，只要顺便提一下就行了。他原名路易-乔治·罗特希尔德-171芒代尔，在“德雷菲斯案件”中初进政界时，决定改姓他母亲的姓而不姓父亲的姓，不是没有理由的。他和克列孟梭相处多年，最初是在《震旦报》当记者的时候。后来，在内政部当过一个小差使以后，当克列孟梭在1906年组成他的第一任政府时，担任了“特别秘书处主任”。他是1917年的战时内阁的秘书，后来又成为1934年弗朗丹主管的部里的一名属员。

（二）反对派：赖伐尔和通敌的种子

政府在宣战时得到了社会党和以路易·马兰为首的一部分右翼国民共和党员的支持。真正的反对势力（除了后来发展起来的共产党以外）来自赖伐尔和他的友人，来自其他某些未参加党派，或是在性格、职业或思想上超越了党派界限的个人。赖伐尔的实际经历，以间接的方法证明了“利器得有巧匠使”这个道理作为施政方针的荒谬性，没有哪个天才的讽刺作家，能够想出一个比这件事更妙的例子。在拉·封丹的许多同胞看来，这个丑小鸭的故事中一定寓有发人深省的意义。他不知怎样长成了一个酷似秃鹫的人物，并且将被要求代表法国，以与德国鹰相颉颃。他十二岁时失去母亲，他想读大学，但这个志向受到父亲的阻挠，只得偷偷地实现，他成了政客和律师（又是一个大富翁），多次担任部长，三次任内阁总理（并非象他在受审时小心地向高等法院法官说的那样，仅仅两次）：他培养“神志清醒的人们的惶惶不安的心理”〔即对共产主义的恐惧〕，最后又鼓吹同敌人合作——尽管这样，他仍然不学无术，不仅对其他国家的地理、历史之类，甚至对法文的句法（如他在巴黎律师界的同行所知道的）以及法国的法律也愚昧无知。

赖伐尔同亲德的政策真正地发生关系，始于国家社会主义得势之时，当时他受到费尔南·德·布里农伯爵的影响，布里农是法国方面的策动者（与他对等的是奥托·阿贝茨），在法德委员会的幕后活动，为两国的社会和知识界的修好而努力。到1933年底，赖伐尔已服膺了布里农及其友人的观

点，即法国同德国合作对欧洲的和平是必不可少的，从此他就未动摇过。

1936年以后，反对这种亲德政策的倾向，突出地表现在国民议会中共产党席位的激增。在这个国家里，农民占了总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八，而农民中有百分之六十是耕种自己的土地，自耕农中又有百分之八十七除了自己家里人外，不雇用劳工，因此，从表面上看，共产党在这里发动革命的危险性是很小的。但是，在大工业家中有许多人离开乡间虽然只有一代人的时间，却已经不了解农民，而只是根据他们在自己办的大工厂里所熟悉的那几十万有组织的雇员来判断农民，认为法国（即他们自己）从内部受到了威胁，因而宁愿冒着惊人的风险去同经常来自外界的威胁妥协。然而，对于这种情况，由于“神志清醒的人们惶惶不安的心理”而引起的种种活动该负多少责任，社会党人在终于得势以后仍然空谈理论无所作为又该负多少责任，毕竟是要由一般的法国人而不是由那些从未自愿地尝过“生活的痛苦”的人们来断定的。但显而易见的是，无论哪一方面，都有些缺少民族自卫的本能。另外还有一件事看来也是确凿无疑的：这就是，从来不曾有过共产党发动政变的严重危险，按照任何清醒的估计，都将认为，在1938年4月至1940年6月之间的任何时候（甚至在1938年11月发动总罢工未遂时），遏制共产党势力的扩大，远不象防范德国那样具有迫切的需要。

第二节达拉第政府的外交政策

法国的战略姿态是采取守势，从客观和主观意义上看，大多数居民都显著地缺少对抗的精神：因此，法国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只能是（除了不屈服以外），尽量使战事远离法国边界，以便在最好的情况下可能和平解决，而在最坏的情况下也能在边界遭到侵犯之前进行更好的准备。根据这点，其次的目标就是保持和扩大同英国的联盟，并在无法劝使其他国家接受结盟的全部内容时，使之保守中立（如果可能的话保守友好的中立）。美国的善意是毋庸置疑的，它不久就将提供主要的供应线。罗马尼亚位于德俄之间，局势极不稳定，不能寄予多大希望（象卡利内斯库在1939年9月21日被铁卫团暗杀一事所表明的那样）；但是在土耳其，却作出了一个可喜的开端，173谈判的结果，在1939年10月签订了英—法—土联合条约。西班牙不仅宣布决意不卷入这场争斗，而且还保证，不会停止供应制造炸药必不可少的黄铁矿砂。

在中立的国家中，最成问题的是意大利。要是它决定在德国已经发动的这场战争中站在德国的一边进行干涉，将是对法国的一大威胁；假如它有机会能限制战争范围的话，它显然是个调解人；只要它认为同法国保持良好关系对自己有利，它就可能成为法国的供应来源。据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一个委员保罗·邦库尔说，在战争的头几个月中，法国对意大利全神贯注，这一点在议会的辩论中居于支配地位（应当看到，参议院甚至比国民议会更不想打一场真枪实弹的战争）。法、英两国舰队联合起来在地中海所占的无可争辩的优势，以及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亚和西班牙进行冒险后军事力量大大损耗的情况，使意大利陷于这样一种处境，在法国人看来，如果对之施加足够的压力，可以指望它迅即让步。由于苏联通过1939年8月23日同德国缔结的协定而含蓄地使1935年5月的法—苏互助条约归于无效，因此法国比以往更需要意大利真正而有效的中立。盟国从意大利的中立所得到的好处，将是更有效地封锁德国，长驱直入东地中海和巴尔干地区，并有可能把更多的德国兵力吸引到那里另打一场“边缘战役”，侥幸的话，这条东南战线甚至可

能严重地威胁到德国的石油供应。

至于如何向意大利施加压力的问题，法国普遍的看法是，不必向意大利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它更加明确地表明立场。由于排除了任何形式的强制行动，因而认为在经济上打交道最可能收效，1939年9月中旬，法、意两国在圣·雷莫开始会谈，最后签订了一项秘密协定，缔约的结果是，意大利后来供给了法国大量炸药、反坦克地雷，甚至还有飞机。此外，在战争已开始后，仍作出种种努力，使英、法海军的封锁方式，能尽量减少意大利海运遭遇到的不便。

在这个极其重要的对意关系问题上，当时法国的政策同英国的政策没有多大差别；但是尽管如此，不可否认的是，无论在一般的法国人民中间，还是在1939年9月1日至1940年6月30日之间先后执政的三届法国政府中的任何一届政府，都存在着若干程度的仇英情绪。在某种意义上，自从拿破仑时代以来——如果时间不是更久远的话——法国人本来就有仇英的情绪；虽然赖伐尔在刑事法庭的被告席上把这种情绪斥之为“一时的感情冲动”，但是他在不那么公开的言论中，却称之为法国内部政治生活中一个永久性的因素。英吉利海峡两岸的人都未能看到，即使俄、德两国本质上都是侵略者，但是就盟国来说，仍以集中全力首先击败德国为上策，因为德国是更加迫近的危险敌人。由于未能看清这种情况，因而仇视英国的情绪就越发强烈了。英国因为地理上的缘故，受到这种错误估计的影响较小，但是这一点反而加深了法国人一贯对英国人的虚伪所抱的怀疑。即使不能说仇英的情绪对法国在军事上确实战败有重要的关系，可是这种情绪肯定在贝当元帅的政府利用战败做文章上大起作用。

法国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候所奉行的实际外交政策，都是由于两种观点互相牵制的结果，一种观点着眼于可能发生的事，另一种则着眼于希望发生的事：前一种观点是外交部常任官员们的现实主义，他们对法国利益的观念不因政府的更迭和舆论的向背而变动（可是他们并不能因此而在种种办法施尽后，最后仍不向政府和舆论屈服）；后一种观点是内阁中的大多数人和政府首脑比较短视的权宜之计，这些人的地位直接地取决于他们怎样投合国民的心理。常任官员们认为，主要的敌人是德国，因此必须同俄国友好，反之，达拉第及其同僚们却知道，人民无意打仗，因此他们首先急于千方百计地避免同德国冲突。在这两种情况下，都需要同英国结盟，不论英国的行动和动机多么令人可疑。

第三节 头三个月战争中的法国

175 博内在回忆录中写道，9月4日，在战争行动开始以后几小时内，他和波兰大使谈妥了互助条约，而为了履行这个条约，在此之前就已宣战。的确，纯粹形式上的“战争行动”，于9月3日已在法国开始，但是那时波兰有组织的抵抗实际上却已结束了。

在战争的开头两个星期内，迫切需要做的事是向焦虑的法国民众隐瞒这样的事实，即法国本身还没有作好战争的准备，却已经和一个注定要失败的波兰结成同盟参加了战争。因此，法国驻波兰大使向世界各国报界驻华沙代表保证说，波兰在波尼亚托夫斯基、科希秋什科或毕苏茨基时代所面临的只是暴虐的统治，而这次却有法国和英帝国无穷无尽的资源为后盾；与此同时，在巴黎，法国情报部正在对波兰军队的规模加以吹嘘，认为波军的战术虽然已经过时，然而英勇善战，产生出一种精神上的效果，而与其实际的简陋装

备形成可笑的对照，情报部一面又指出，德国人还不曾打赢过一场决定性的战斗。在战争第三个星期的开头，当苏联军队已经冲过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波兰东部边界全线，与德军在历史上有名的要冲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会师时，《时报》仍然硬说，波兰人的抵抗还不能肯定已被击溃。

俄国人入侵波兰，在法国引起人们对苏联这一行动的含义作了许多推测，它使法国恢复了这样的希望，认为德国这时也许会倾其全力对付苏联，好让法国再推迟行动。

这件事也使法国共产党的党员对这场战争的态度起了变化，并随之而使法国其他各方面对法国共产党的方针也起了变化。法国总工会花了一个月功夫仔细研究了8月23日莫斯科协定的含义以后，在9月25日发表了一件议事记录，认为这个协定背叛了工人，并且宣布，以后不可能同赞成这个协定的共产党员合作。因此，在第二天，达拉第得以顺从右派的吵吵嚷嚷，颁布法令解散了共产党。社会党领袖勃鲁姆提醒他，这样做在国外产生的后果，将给人这样的印象，以为几十万法国工人全是不爱国的。但是，达拉第对勃鲁姆的活充耳不闻。

17610月6日，希特勒在德国国会的演说中，要求象墨索里尼在德国入侵波兰前夕所建议的那样，举行一次会议，并且着重指出，他并不向法国要求殖民地，也无任何其他要求；实际上，他是在劝说法国同英国的堂吉诃德式的顽固不化一刀两断。尽管法国国内存在着反英的情绪，但是法国报界仍然异口同声地对这篇演说嗤之以鼻。这时尚无迹象表明德国军队在从波兰前线大批调回，以暗示即将在西方发动猛攻；而且要开始进攻，当年已为时太晚。这篇演说中不含有威胁，也没有提到与苏联缔结军事同盟，这件事正是巴黎某些方面的人所害怕的。法国得出的结论是，鉴于苏联在战略上的巨大收获，尤其（象这时正变得很明显的）在波罗的海地区的收获，希特勒不再那么确信他有能力把战争限制在局部地区，而是需要喘息的时间，好让他在同法、英两国拼个你死我活之前，补充粮食和军火的储备来对付封锁。

10月6日，达拉第在参议院外事委员会发表的一则临时声明中，对希特勒作了答复，他提到，全面的声明要等同英国磋商后才能作出。他说，盟国作战的目的，在于结束象德国对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那样的侵略，并结束每隔六个月就需要进行一次动员的情况：他说，和平只能在尊重诺言的基础上重新建立，必须对法国的安全和一切民族都有生存和自由的权利提出可靠的保证；他说，法国在同意和德国开始会谈以前，先要知道明确的细节和得到真正的让步。在张伯伦10月12日发表演说干脆拒绝了希特勒的和平建议以前不久，达拉第在10月10日的一次广播演说中，告诉法国国民和德国总理，法国政府坚定不移地决心证明自己无愧于其军民克服困难赢得公正和平的愿望。他指出，英国远征军携带了装备，正在法国领土上迅速进入阵地，英国飞行员经常活跃在前线，两个盟国的海军共同控制了海上。他谈到法国军队在上个月曾进军到德国在萨尔的领土，这些军队并无意识形态上的幻觉或兴师问罪的幻觉，而是知道自己正在为了实践已经立下的誓言而战，这乃是西方177的自由传统的精髓。他在描绘法国军队的这种心理状态时，把它同德国的那些亦民亦兵的人们的心情作了对比，他说，这个德国，“在征服了许多地方以后，却不得不对面包、肉类、奶类、糖以及许多其他商品实行配给来开始这场战争”，它不但不能使其人民免于这类匮乏，反而把更多的责任强加在他们头上，使他们在民族问题上感到内疚。

这一外交上的遭遇战，通过再度把道德标准放在首要地位，提出了什么是法国明确的“战争目标”问题，这个问题后来在冬季的几个内又经过详细的讨论，而罗马教皇在1939年10月27日传阅的《教皇最高通谕》中，也通过强调要尊重条约这一点，为商讨这个问题提供了有力的基础。与此同时，军备的问题，在这个“两次侵犯的间隙”——如这位总理所说的——也使法国政府花费了许多时间。

达拉第本人在重新武装的问题上所负的责任，也许比其他任何法国人要大。在法国，即使就一个国有化工业来说，要使其能适应军备上巨大扩充的需要，也还需要加以改组，但这项改组的工作却迟迟直到成立了一个军备部方才真正开始，而军备部的成立，则是法国已处于战争状态十天以后的事。新的部长拉乌尔·多特里是一个第一流的工程师，惯于从事大规模的经营。他又是一个保守分子和天主教徒，他的坦率正直的性格和爱国的热忱博得了所有党派的公认。可是，他那种有条不紊的作风和按部就班的做法，在早些日子虽然极为可贵，但要应付1939年秋季的紧急情况，却是过于从容，缓不济急了。政府先前已接到许多警告说，到1939年1月以后，法国军备工业将达到饱和点，除非改变原定计划，否则无178法接受新的定货。然而直到任命多特里的時候，还没有开始向国外（在美国）大规模购货，而且甚至在那时，仍是着重购买原材料和机床，从美国的进口中，这些东西逐渐占到百分之八十，可是在需要几千架飞机的情况下，定货却只有几百架。甚至在原有的工厂只要采用某种提高效率的方法就能大大增加产量时，这位部长还是宁愿造新厂。这样做是冒着使法国丧失独立的危险来保护法国的工业。

第四节 法国对俄国入侵芬兰的反应

正如本卷其他部分已经叙述过的那样，苏联于1939年11月30日沿着芬兰的整个陆地边界发动了全面进攻，而且开始轰炸赫尔辛基。这件事立刻对法国的舆论产生了影响。11月30日，在这消息公布以前，达拉第已到国民议会去要求在紧急时期扩大总理的全部权力。

他唱的老调是，自从9月1日以来，法国已经并且还在积聚军备和加强防务，在这背后，法国正在建立戴高乐（任雷诺及其友人这些主战派的军事顾问）所要求的快速“机动部队”，达拉第还说，如果德国破坏了这场“古怪的战争”在实际上休战的状态，法国将以牙还牙予以回击，可是法国决不要在西线主动挑起战争——这场战争将不是单靠军事行动所能决定胜负的。但是苏联在其同盟者攻打波兰以后紧接着就无缘无故地进攻芬兰一事，吓坏了全体法国人，使他们完全警觉起来，并且使他们在权衡了可能发生的种种新情况后，暂时取得了近乎一致的意见。内阁以内和内阁以外的主战派，都认为这种局势为切断德国必不可少的瑞典铁矿砂供应提供了机会，而且，如果同时能在斯堪的纳维亚获得基地的话，甚至还可威胁柏林。极右派看到自己怀疑同俄国结盟的价值得到了证实，他们希望把这场战事变成一场意识形态上的讨伐，并有可能说服意大利参加。左派（自然不包括共产党在内）急于表白，他们对侵略者的态度不因阶级而异，他们同其他任何爱国者一样是现实主义者，本着这种精神，他们施展其全部影响使苏联受到国际联盟的谴责，此179后又使法国对芬兰的援助收到效果。因此，对达拉第说来——他执政十八个月以来，除了同德国作战这件事以外，在国内为了应付批评他的人而一直打着防守战——这真是一次天赐的良机，能在作战努力的背后统一舆论，同时又使战事不在身旁发生，直到慢条斯理的法国重新武装的计划赶

上战略形势的需要为止。

法国对德宣战书中写明的理想主义的动机，是“保卫波兰和捍卫国际联盟的原则”，蒙蔽了许多法国人的耳目，使之看不到真实的情况，即法国（同英国一样）已预料到自己不可避免要遭受进攻，正在采取公开的防御措施。坚持这种态度，就使芬兰的情况看来酷似波兰的情况，实际上却不同，但是这样做的作用，却是重新展开长期以来在最终同俄国结盟的价值这个问题上产生的争论，使反对这种同盟的人能利用下述强有力的理由：“这个野蛮的国家不仅道德十分败坏，而且衰老无力；因此，作为一个盟国，它是没有价值的，但作为一个敌国，它却很可能吸引住距离我们较近的另一个敌国的注意，直到后者满足了征服的欲望为止；然后我们就可能共同建立起大欧洲的新秩序。”

在这个阶段，同英国结盟的可靠性从来不成其为问题；但是，人们问道，既然俄国已经拒绝了美国在芬兰问题上进行调停的建议，假如法国把俄国当作敌国，这对美国的舆论将起什么样的影响呢？这样做会使美国的支援增加呢，还是减少呢？

如果单纯从战略观点来估计，那么承认俄国对芬兰的进攻并没有危害到法国，甚至也没有威胁要危害法国，如果单从这场进攻为法国提供了对德国采取更有效的行动的可能性这一点来加以判断，那么，就应当优先考虑利用由此而造成的局面，加紧封锁德国和对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施加最大的外交压力，来切断瑞典的铁矿砂供应。法国人相信，在这样做时他们能指望得到美国政府和民主党的赞同。在法国，人们普遍认为，如果采取这种政策，俄国由于已经牢牢地保住了它的西北边界，或许会再发表一个中立声明，然后集中力量对付匈牙利和罗马尼亚，这样将使法国的主要敌人德国的注意力更加分散。

可是，如果目光看得远些，那就得承认，俄国人就其本身来说，是潜在的直接敌人，由于他们同德国结成同盟，因而又是事实上的间接敌人，这样，在盟国面前就摆着两条路：或是坚持不懈地消灭那个距离较近和更加不共戴天的伙伴，或是抓住这时出现的机会，打击其中那个较弱的伙伴，以拆散他们的合伙关系。如果象雷诺建议的那样，走第一条路，就有可能去袭击油田和铁矿（只要盟国力所能及，就同时进行）；但是轰炸高加索的油田，在这个阶段却不应进行，而对芬兰的援助数量虽大，也不应公开予以承认（正象先前对西班牙内战两方给予的援助不曾公开承认一样）。这样苏联就不会为了威信的缘故而被迫立刻宣战；然而，法国如表现出明明白白的主动性，那么可望削弱美国国内反对美国政府支持盟国的政策的那股势力，因为共和党已经在对俄国入侵芬兰大为愤慨了。

其他象弗朗丹那样的金融政治家和象魏刚（他已于12月初从中东到巴黎）那样的军人政治家，他们的目光仅限于成立一个经济学家眼中的欧洲联邦，或者发动一场欧洲精神的天主教进军，向亚洲那些反对基督的邪教异端进行讨伐，他们认为，坚决作出努力，直接对付苏联，有可能赢得德国人的尊敬，有可能使德国武装部队转而反对俄国，并且，在意大利的支持下，还有可能使盟国在西方获致光荣的停战。假如决定采取这种政策，那么可能给予芬兰的任何援助就都应当公开地运出去，但是更为重要的战线却在中东，因为瑞典的铁矿砂对于德国的战时经济固然必不可少，但高加索的石油却是除了供应德国战争机器的需要之外，甚至对俄国平时的经济也是必不可少的

——俄国的集体农庄制度完全依靠石油。因此，应当一面对芬兰提供十分迅速和大量的援助，以把局面从牵制那里的苏军转而击败苏军，并为防止俄国在中东先发制人，一面加速实行轰炸高加索油田和在萨洛尼卡登陆的计划。他们认为，这样的一种主动行动，不会得不到美国两党的最大支持，以及南美各共和国，当然还有意大利的支持。

在12月19日于伦敦举行的最高作战会议上，甘末林将军对于波罗的海成线并不热心，尽管他在次日派了一个军事联络官到曼纳海姆陆军元帅的总司令部去。在法国国民议会的对外关系委员会中，表面上看不出有这样的疑虑。12月21日，它宣布赞成给予芬兰一切援助——尤其是逐渐过时的武器和弹药，甚至还有装甲车和飞181机——只要交货的技术困难能够解决就行（第一批货物事实上于20日就已发出）。22日，达拉第向国民议会阐明了他的政策。最重要的是，政府必须使法国人少流血，必须拒绝任何发动有计划的、尤其是时机未成熟的攻势的建议。人们在看到法、德这两支世界上最强大的陆军相对峙，各自呆在工事里无所举动，不禁大惑不解，而“古怪的战争”这个新名词，恰好表现出他们的这种心情。但是他们能抱怨吗？在1914年12月间，法国的伤亡人数共达四十五万人之多；而这次，截至11月30日，总共才伤亡了一千四百三十三人。同时，甚至在国际联盟于12月14日作出决议开除俄国盟籍以前，对俄国宣战的问题，或者至少同俄国断绝外交关系的问题，就已在法国报纸上广泛地展开了详细的讨论。

到1940年1月初，两种轮廓鲜明的思想表现了出来。第一种思想由亨利·德·凯里利在《时代报》上作了概括：“不要去同俄国较量；一场战争已经够我们打的了。”

这种看法得到了莱翁·勃鲁姆的支持，他在社会党办的《人民报》上提醒人们，德国仍然是主要的敌人。另一种思想的代表者是路易·马兰（右翼共和联盟的领袖）以及外交界的喉舌《费加罗报》与钢铁业巨头和政府高级官员实上早在1940年2月就遭到了搜查。

的喉舌《时报》（弗朗丹当时正为该报撰稿），强调对俄国开战在战略上和外交上的好处，认为俄国是“一个泥足巨人，是蛮横残暴而不是真正强大”。1月8日，《时报》向老牌的主战派乔治·芒代尔呼吁，要他承认“我国至高无上的安全要求我们同俄国绝交”，承认“我们这样做是为了我们的殖民地”。《时报》在第二天的社论中把雷诺的话重复了一遍，要求拿出更大的“劲头”，它说：“封锁摩尔曼斯克只会好处，这样做将有助于芬兰作出的决定转向182正义和正确的一面，而海军在黑海上的行动，则使敖德萨受到盟国炮火的威胁，这将鼓励罗马尼亚在比萨拉比亚遭到任何攻击时坚决不让步。”

由极右派发起的这个援助芬兰的要求，得到了中央党（弗朗丹）的赞同，在曼纳海姆防线开始受到攻击时，进而获得了激进社会党的同意，2月上半月在勃鲁姆与一个从前线回来的英国社会党代表团会晤后，又得到了社会党的支持，最后到2月中旬，又由法国总工会建议其会员加以采纳。1940年2月5日，在巴黎的一次最高作战会议上，达拉第曾表示了这样的看法，认为应当给予芬兰最大的援助，如果必要的话，还要劝说斯堪的纳维亚诸国通力合作。这一点得到了赞同，但是计划未能实现，直到这场冬季战争在3月间由于芬兰投降而告结束时，盟国之间对这个问题仍未作出最后决定。随着俄国的胜利，由于它的侵略而造成的情况，即需要采取措施以使不同政见的法

国人趋于一致，这种情况业已消失，此后有许多年未再出现过。

第五节达拉第政府的垮台

芬一苏和约在 1940 年 3 月 12 日的签订，事实上给予达拉第致命的一击，结束了他对法国政府的不稳定的领导。3 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内，在法国国民议会中就人力使用问题经过冗长的辩论以后，政府曾获得一致的信任投票。在冬季，人们曾猛烈抨击从农庄和工厂抽出大批人力而结果却让这些人在前线或兵营中闲着无事可做的政策，并且日益提出要求，对于那些并非全部时间都在接受军事训练或者从事紧急军事任务的人，至少应当让他们回去春耕和春播，至于熟练的技术工人，则应让他们回到工厂去生产军火和军需物资。军备部长（多特里）一开头曾受到责备，因为他过多地征用了农村劳动力在兵工厂工作，但是他能证明军备工业中的工人，来自农村的 183 至多只占四分之一，而且这门工业本身严重缺乏熟练工人。于是批评又转向臃肿不灵的战时政府，因为它除了政府各部门的工作人员（这些人由于“特殊的原因”而免于应征）以外，还从生产岗位上雇用了过多的人员。此外，也对军队进行指责：说在征用家畜以供应部队食用和在征用马匹的工作中，有混乱和贪污的现象；并说有过多的青年人在基地上担任着舒适的职位，而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却在前线。将近 2 月底时，达拉第以国防部长的身分采取措施以稍稍平息这类怨言。军队指挥官接到命令，将每次至多三十天的特别农忙假制度扩大实施到所有的军队（正在受训的部队除外），准假者可达部队人数的百分之五十，同时使所有年龄在四十五岁至四十九岁之间的农业工人免服军役。属于前方部队中的第二类预备役的军人，也将由后方年纪较轻的人代替。

这些措施使政府得以答复那些批评它的人，并在 3 月份第一周内，在国民议会中得到了他们的信任票；但在 3 月 12 日，国民议会要求就芬兰问题进行辩论，这件事肯定地意味着，政府由于盟国未能进行干涉，必将遭到猛烈的抨击。达拉第告诉国民议会说，法国将参加盟国的远征军，张伯伦在 11 日已宣布即将派远征军去芬兰，这样，达拉第就得以使这场辩论延期到芬一苏谈判见分晓后再进行。可是，在 3 月 13 日，即芬兰投降的第二天，达拉第却发现自己面临着一个以赖伐尔为首的、非难他的参议院，赖伐尔自从四年前实际上弃政从商以来，第一次预兆不祥地行动起来了。芬兰防务的土崩瓦解，再度猛烈地掀起了一场极其重要的战略上的争论，即究竟应把德国还是俄国当作主要的敌人。达拉第看到自己这时要对付的是政治花招而不是真正的舆论动向，就敏锐地坚持，一切质询，无论是芬兰问题，或是对战争的总的指导原则，均应在当时当地提出，不得休会，以免他的政敌借机集聚力量。随即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激进社会党几乎占绝对多数的势力，表现在参议院以二百三十六票对 184 零票宣布信任政府对战争的总的指导原则，但同时也强烈要求它更有力地进行战争。不过，也有六十票弃权，这暗示了相当程度的无言的不信任。

国民议会的议员们想当然地认为，在参议院 3 月 13 日投票以后，总理将会着手在内阁中进行一些更动，这些更动至少足以使他不再兼挑国防部和外交部的重担，让他能腾出身来倾全力于总的政策指导。人们认为，倘若先前有一个专职的外交部长，法国在芬兰的严重外交失败可能避免，而在法国这时面临的新局面中，任命一个专职的外交部长，比以往更有必要。人们可能期望的另一个变化，是任命一个情报部长：人们普遍批评检查制度在执行中

的专横顽固，尤其在对待报界方面，尽管不久以前总理曾亲自过问此事，保证有政治评论的自由，但是他长期来迟迟不任命一个能由议会召去质询的部长，却进一步激怒了这些人民的代表。此外，人们还责备他在 12 日的国民议会会议上避而不向议员们坦白说明芬兰局势的真正严重性，责备他从而实际上用欺诈的手段使有关芬兰问题的辩论体会。在他们看来，他在拒绝了国民议会要求进行辩论的建议之后，却同意在参议院展开辩论，这对他们不啻是在伤害之外又加侮辱。

因此，当国民议会在 3 月 19 日开会时，达拉第所面临的乃是一个愤怒的会场。经过一次连续（没有间断）将近十二个小时的秘密会议（一直开到 20 日凌晨），激进党的一项表示信任政府的决议以二百三十九票对一票通过，但是有三百票弃权，其中包括社会党集团、弗朗丹的所谓“中央党”（左翼共和党）的全部议员以及路易·马兰的共和联盟的大约四分之一的议员。这一次的警告可 185 不能再置之不理了，按照国民议会和参议院的两位议长的劝告，达拉第在当天即 3 月 20 日向共和国总统递交了他本人及其内阁的辞呈。

第六节 雷诺政府的组成

谁来接替达拉第当政府首脑，这一点是没有多少疑问的。保罗·雷诺在报界的朋友们一直在领导这场运动，要求以更大的“劲头”来领导战争，这批才子们好久以来一直戏称他为“太子”。雷诺同出身于外省的达拉第迥然不同，“没有什么能深深地打动他，正象没有什么能打动那些生在巴黎的人一样”。他的头脑生来就灵活，又在“工艺学校”受过严格的理性主义训练，他坚信只要具有足够的知识和精力，一切问题都能迎刃而解；或者，更确切地说，凡是能够按照逻辑解决的事，就也能够能够在物质和社会的领域内得到解决。他这种本质上的乐观精神，以及他爱好当众发挥其出色的雄辩口才的习惯，使他的同伴们目眩神迷，也吸引住了其他的“工艺学校的人”，但是在一些不是那么聪明机智的人看来，雷诺却只不过是镁光照明弹发出的一道寒光罢了；而且，毫无疑问的是，人们通常对他是羡慕而不是喜欢，甚至也不是尊敬，连那些最最拥护他的人，往往也是从他同自己事业的关系来考虑怎样对待他，而不是把他当作一位受人爱戴的领袖或者决定法国命运的人。对于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雷诺早就在其中察觉出逻辑上的缺点，并且立刻臆测到其可悲的后果。

雷诺原先是代表他在下阿尔卑斯的故乡的议员，这时是巴黎布尔斯选区的代表。他在 1935 年 12 月底由于反对霍尔—赖伐尔计划和拥护集体安全的政策而脱离了弗朗丹的左翼共和党以后，到这时已有好些时候保持着自由身分，去潜心研究财政金融问题和在国民议会中充当戴高乐军事理论的代言人。由于这些原因，他既受到左翼，尤其是保罗·富尔领导下的和平主义派别的怀疑，又（同芒代尔一起）由于反对慕尼黑协定的立场，而受到路易·马兰的右翼共和联盟的怀疑，这种立场自然而然也引起了激进社会党及其主席达拉第的不快。在这样不利的条件下，他很可能在挑选部长人选时，单单根据他们的能力，根据他们是否已经受过考验忠于他，或者估计会忠于他，来决定取舍。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宁可沿用党派政治的惯常做法（他在这方面丝毫不内行），并且企图象达拉第在 1934 年那样，把内阁组成得象是议会 186 的一个缩影。他能够组成内阁，要大大感谢莱翁·勃鲁姆的宽宏大量，后者本人虽然不愿担任职务以免激怒右翼，可是却让六个追随者参加

内阁(有三人担任部长),并且答应在国民议会中给予全力支持。至于路易·马兰的共和联盟,雷诺只给了它一个海军部副部长的职位。

批评达拉第的人们先前曾要求成立一个小型的、紧密团结的战时内阁,这个内阁通过经常举行会议,至少应能象一个工作过度的总理——他兼任两个部长,有脱离内阁和国民议会的倾向——同样迅速地作出决定。为了满足这个要求,雷诺在提出他的新班子时(他急欲尽可能讨好很多方面,把人数从十八名扩充到三十五名),宣布其中有八人将作为战时核心内阁每周开会三次,此外,各部之间的经济委员会每周开会一次。为了响应进一步的要求,应有更大的洞察力来处理外交事务,新总理决定把这个部长职位留给他自己兼任;与此同时,又说服德·蒙齐留任市政工程部长。最后,达拉第本人也未经多少劝说就留任国防部长。

人们看到,雷诺在3月22日向国民议会提出这份内阁名单时,神态紧张而不自然,一反常态,在过去,他在那里经常是骄横自负,盛气凌人的。他这时六十二岁,第一次以政府首脑的身分出现。他的简洁练达的内阁声明,能言善辩,人们注意到,这一点得力于高乃依,而不是得力于国民议会所喜欢的那种更热情、更有个人特色、更流畅奔放的文体。雷诺说,法国进行的是总体战。敌人“从苏联的背叛中得到了帮助”,正在把斗争推向一切能够料想得到的方面,在打击的同时,还伴之以可憎的恶魔般的破坏。因此,法国也要全力以赴孤注一掷:战胜就挽救了一切,而屈服就失去了一切。在结束演说时,他说,他的政府的目的,是“激励、集中、指导法国的全部精力于战争并获得胜利;镇压一切可能来自任何方面的叛国行为”。他说,法国人将由于知道有“本国和帝国的巨大资源”而获得勇气;他们将坚定地密切注意他们的“令人钦佩的盟国”;他们的思想将“念念于法国的永恒的天才”。议会很不耐烦地听取了这个声明。尽管雷诺提到“苏联的背叛”,但是他吸收社会党党员入阁一事仍然受到了右翼的指责,说他又在走向人民阵线的老路:为了报复,右翼就联合大多数激进社会党党员,指控雷诺串通勃鲁姆推翻了达拉第(顺便提一下,达拉第同意参加新内阁的事,他自己一派的人事先并不知情)。对于这种“预先制造好的危机”的说法,勃鲁姆以雄辩的言词愤怒地予以驳斥,可是他的话虽然驳倒了对方的论点,却丝毫未能使那些持有这种论点的人平息怒气。事实是,随着抗议的信件从各个选区纷至沓来——在这些信中(尤其在农村选区的来信中),激进党领袖的个人威望仍然很高——国民议会正在开始后悔它迁怒于达拉第的做法不对:事实上,对于芬兰的瓦解,法国国内当时的反应根本不象巴黎报界的夸大宣传和一些打着如意算盘的小集团曾经设想的那样混乱。事情变得很清楚,雷诺内阁只有达拉第支持,才能维持下去,但也不会维持得更久。至少,右翼人士的悔恨,流露了他们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愤怒心情之几乎轻浮的冲动:他们先前的批评,实质上是反对法国未能做到向苏俄宣战。

在答辩时,雷诺为他的内阁的规模(激进党进行批评的主要目标)辩护,提到了今后要求内阁处理的工作是繁重的。他宣布将继续执行前任的政策,努力使法国人少牺牲(这时有些人鼓掌);他作出保证,要在法、英阵营内,把那些使两国的经济,也许甚至还有财政分割开来的障碍一个一个地排除掉,希望其他国家有可能聚集在这个合作核心的周围。他解释说,这是因为有必要使这些国家看到一幅新欧洲的美景,而不仅仅是恢复战争以前的原状。

在投信任票时，新政府以二百六十八票赞成、一百五十八票反对和一百一十一票弃权（共和联盟和激进社会党）获得通过：这就是说，实际上只有一票多数。雷诺立刻召集内阁会议，要求全体阁员，尤其是十名激进社会党阁员表明立场。这批人退出了会场，达拉第（在内阁投票时，他由于出席参议院欢迎他的仪式而未在场）极力主张他们全体辞职。但是肖当、康平希、克耶、拉穆勒指出，这样做将意味着同社会党决裂，到下次选举时将造成灾难；于是他们决定留任，但在两星期内阐明立场。雷诺得到这个消息后，决定坚持干下去；在国民议会下次于4月2日开会以前，他还有整整九天的时间可以活动。

在议会中得到的这次险胜，此刻必须在外交领域内取得更加引人瞩目的成就来加以巩固。雷诺的第一个行动具有双重的目的：一是恢复张伯伦的计划（1939年12月被法国人认为时机尚未成熟而搁置了起来），这个计划要求法、英两国政府发表一个联合声明，说明任何一方不得单独议和；二是采用赞扬、鼓励的办法，来恢复英国第一海军大臣（丘吉尔）从9月以来一直极力主张的计划，在挪威领海内敷设水雷，以制止其继续被德国船只滥用。因此，应雷诺的要求，最高作战会议于1940年3月28日在伦敦开会。雷诺并不向英国首相讳言，对他个人来说，完成这些任务以使法国的反对党哑口无言，是何等的重要；他得以对这第一个步骤深为满意地回到了巴黎。最高作战会议已决定正式对运送铁矿砂的航线布雷，并使法、英军队作好准备，假使德国进行回击，就占领纳尔维克；会议发表的公报以一篇联合声明作结束，大意是两个盟国均不得单独谋和或签订和约，声明中包含有一个协议，规定对于德国可能直接或通过第三者向它们提出的任何和平建议，都要预先经过共同讨论，在此基础上执行对安全的“明确保证”，以对付一个战败的德国，声明中还保证在战后继续维持这个同盟，使之成为重建欧洲的核心。这样，雷诺由于此时已使英、法之间的关系除了12月间单纯在财政金融上的团结以外，又进而在政治上得到了加强，因此就能实现3月22日他在国民议会中演说时所作的预言。这一切在他回国后都作了充分的宣传。

不幸的是，雷诺虽然由于掌握了总的战争形势而得以深深地打动最高作战会议这样一个机构，但是他在着手对原有的各项计划的制订者展开批评以前，却没有花189功夫去详尽了解这些计划的细节，因此，当他要求这些人拿出更大的劲头时，甘末林就不厌其烦地大谈其细节问题，而达拉第则报之以愠怒或嘲讽。事实上，雷诺从一开始就下决心要以魏刚来代替甘末林，但是如果不同达拉第争吵并从而失去激进社会党的选票，他就无法作出这一更动；因为达拉第支持甘末林，并且决意不放弃他由于担任国防部长而在内阁中所占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

这个内阁实际上有两个首领，其中那个挂名的首领虽然总的说来在大多数问题上做得正确的，但是却未能使同僚们对他的诚意或对他的见识和判断的正确可靠产生任何的信任。

不过，内阁之外的情况却证明了雷诺最初的估计是正确的。虽然在挪威领海内的航道上布雷以后，德国人紧跟着就侵入了丹麦和挪威（4月8—9日），但是已经决定由英国方面，尤其是英国海军予以反击，4月13日获悉，英国军舰已强渡纳尔维克峡湾，这时控制了那个港口。法国方面认为，西方的战线又可免于开辟，战争仍保持在一定的距离之外，法国人的生命正在被

保全下来，同时由于没有进行陆战不需供应大量军备，故而重整军备的工作直到那时为止也能够继续进行下去，不曾中断。4月4日，激进社会党在国民议会中的执行委员会已批准了雷诺的政策，而在纳尔维克传来了消息（报道得比实际的情况更乐观）以后，雷诺在这一群反对党中间所得到的成功，又于16日、17日、18日在参议院和19日在国民议会的秘密会议上重复了几次。雷诺已经成功地投身进去；

这时，他又在努力利用挪威做他后盾重新团结法兰西民族，正如先前达拉第曾经努力利用芬兰为他自己起到同样的作用一样，他准备提供同样多的人力和物资，把这一仗打赢。

但是，事情逐渐变得明显起来，由于一开始时对于是否要冒着风险去侵犯中立国家的权利或者采取任何其他的进攻行动犹豫不决，这就等于宣告盟国将在斯堪的纳维亚失败，正如它们在芬兰已经失败了一样。对挪威领海内航道上布雷的事延误了过久，而对德国人必然会产生反应也未充分准备好如何予以回击。当盟国终于发觉到德国的目标有多么大时，它们就暂时放弃了夺取并守住纳尔维克的企图，而赞成在特隆赫姆采取规模更大的行动计划。到了月底，这个企图也不得不放弃。随着盟国军队开始从挪威撤退，英国议会和公众舆论长期以来隐而不露的不安心情，先是表现在投不信任票上，后来，在5月10日荷兰和比利时遭受入侵的消息传来后，又表现在完全抛弃了张伯伦内阁。在同一天，法国也因内阁危机而处在痛苦之中。上一天晚间，雷诺曾向阁僚们提议解除甘末林的法国陆军总司令和盟国陆军最高统帅的职务，达拉第拒不同意，于是雷诺就向共和国总统提出他的政府辞职。经过决定，这件事应保守秘密至新政府组成，到10日，在听到德国行动的消息后，雷诺撤回了辞呈，并暂时打消了更换甘末林的念头。因此，当战争终于打到西线时，正在领导法国的那个人却是一个远不能孚众望的总理，他对自己内阁的阁员不怎么信任，同时也不能得到他们——尤其是他的国防部长——的信任；而正在指挥法国武装部队的人则是一个穷于应付、军费支绌的最高统帅，他的防务计划在新闻记者中是无人不知的，最重要的是，法国进行抵抗的斗志，正在被萎靡消沉、冷嘲热讽、自欺自哄的反对党逐渐地消磨掉，这批人认为，似将来临的这场灾难，看来并不象是一次极其艰苦的考验，而象是一种解脱自己和履行诺言的方法。

第五章（下篇）法国的覆灭 艾尔弗雷德·科班

第一节 法兰西战役

1940年5月10日，德国人侵入了低地国家，于是盟军总司令部准备已久的进兵比利时的计划就付诸实施。这一天法国政治舞台上也发生了变化。雷诺抓住这个机会改组了他的政府。他采用这种方法来代替辞职和组织一个新内阁，就避免了必须谋求议会对这次变动的批准：议会已表现出要拒绝批准——这种做法在法国战败以后达到顶点。社会党对于政府罗致了右翼政党的党员是有些不满的，但是任命路易·马兰和伊巴内加雷为国务部长，却使雷诺得以在5月10日晚间通过无线电广播宣布：“这是一个聚首一堂的时刻。”可是，这样开始的一种政治倾向，后来却发展得大大地超过了雷诺当时的预料。

德军的主要攻势出人意料地在默兹河展开。5月13日，德军在三处渡过了该河，15日，当荷兰军队宣布投降时，法国第九集团军的残部全面撤退。到16日，德国的装甲纵队几乎已推进到拉昂；在瓦兹河以南，有组织的抵抗已经土崩瓦解，巴黎门户洞开，无可防御德国坦克的进攻。巴黎的卫戍司令埃兰将军极力主张政府撤离该城，但是雷诺的决心阻止了这项建议被采纳。可是外交部却开始在烧毁机密档案，外交部的院子里升起了不样的烟柱，这自然是不会振奋巴黎人的士气的。

其实，德国人并不打算立刻向巴黎进军，而是把装甲纵队转向西北攻打亚眠，几乎全部包围了在北方的各支盟军。5月19日，甘末林尝试着第一次对战争的打法进行了干预，但是没有效果。他以总司令的身分采取行动，这是最后一次了，因为军事上的惨败使雷诺能够作出人事上的变动，这是他当上内阁总理以来，一直想要着手做的。5月18日，雷诺再次改组了他的政府，终于把达拉第排挤出国防部，虽然作为一种安抚的手段，并且为了顺从激进社会党的要求，而把外交部给了达拉第。雷诺自己接管了国防部，接着就立刻要求甘末林辞职，并任命已从叙利亚召回的魏刚为陆、海、空三军总司令。先前在克列孟梭手下担任过秘书的芒代尔——他以继承了他上司的铁腕作风而具有声望——当了内政部长，同时为了进一步加强政府的力量，又把贝当从西班牙召回，担任内阁副总理和雷诺的首席军事顾问。雷诺在要求这些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人物在这样危急时期中担任领导，首先想到的是需要重振国民的士气。在这点上，效果是令人满意的。报纸上发表了赞歌，称颂贝当和魏刚的赫赫盛名。正如有一个刊物所说的，对于雷诺—芒代尔—魏刚—贝当这个阵容，人们报之以“突然的信任”。另一个重要的变动是解除了国防部和外交部秘书长的职务。外交部的秘书长亚历克西·莱热由法国驻梵蒂冈大使弗朗索瓦·夏尔—鲁接替，后者是一位很受尊敬的、年长的外交家，在政治上同右翼有关系。

当魏刚在5月20日上午9时接任指挥时，战局已经陷于绝望，他似乎已得出结论，早则在5月25日就必然战败。由于指挥换人而产生的延误，增加了盟国军队在战略上的混乱；而法、英两国军队之间的联络失灵，则加深了法国人中间日益滋长的疑心（魏刚也有这种疑心），以为他们的盟友正在打算在危难中丢下他们不顾。5月24日，雷诺被说服发电报给丘吉尔，要求英国方面忠于执行总司令的命令。其实，哪一些命令是上一级的指挥部发出的，哪一些不是它发出的，这一点根本无关紧要。

因为，从一开始，形势的发展就总是远远超过了这些命令中所估计的情

况，致使其中所作的指示几乎总是落后于形势，因而在指示还未发出之前，就已无法执行了。如果把通讯设备失灵这一点也考虑进去，那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英国人对法国统帅失去了信任，为什么法国人认为，英国人是接到了伦敦的指示，故意拒不执行命令，以便在法国人可能遭遇到的任何情况下拯救英国军队。

比利时军队在 5 月 27—28 日投降后，加速了这场战事的无可避免的结束。英、法两国的分歧在报纸上一直未透露过，可是比利时的停战，却在法国掀起了一股痛斥利奥波德国王的怒潮。甚至拥护君主制度的《法国行动报》，也把这位国王的行动说成是“露骨的、公然的背叛”，并把文章的标题叫做“国王骑士及其犯下重罪的子民”。被困在比利时的英、法军队打算突围到南方，这个企图失败了，此时除了从海上退却外，已无路可逃。魏刚和他的将领们都不愿意向驻在比利时的法军下令，要他们到敦刻尔克上船。几天以来，英国人一直在为万一发生这种情况制订计划，还必须指出，当他们在单方面进行准备时，法国人——按照魏刚的话——却在慌慌忙忙地临时设法应付局面。这些事实，再加上两国军队的实际分布情况，使得在撤退（从 5 月 29 日开始，至 6 月 4 日结束）的开头几天内，从敦刻尔克撤出的英、法军队的人数相差悬殊。在 5 月 31 日于巴黎举行的最高作战会议上，雷诺和魏刚指出，二十二万英军中已有十五万多人撤出，而二十万法军中已撤出的只有一万五千人。这件事在当时很使法国怀恨在心，而仇视英国的法国宣传家们之所以能使敦刻尔克这个字眼在法国人耳中听起来同英国人听起来意义大不相同，这也是原因之一。到最后，法军有将近十四万人撤出，在这次行动中法国损失了两艘驱逐舰、五艘鱼雷艇和许多小船。随着敦刻尔克撤退，北方的战事结束了。在两个星期多一点的时间内，比利时二十二个师、英国九个师和法国三十多个师，连同几乎全部的装备，在战斗中都被消灭了。法国军队剩下的是一条沿着松姆河和埃纳河延伸到马其诺防线西端的临时构筑、工事单薄的防线。

这些事自然在法国内阁中产生了反应。当作战会议于 5 月 25 日召开会议时，魏刚报告说，必须正视北方各个集团军全军覆没的可能性。共和国总统勒布伦问，法国是否有权考虑一项可行的媾和建议，雷诺回答说，如果提出这样的建议，法国政府将有义务同英国政府商量。贝当要大家注意到两国之间出的力是不相等的，他宣称，任何一方承担的义务，应与其在军事斗争中所作的贡献相称。显然，政府的有些领导成员正在转而考虑不得不放弃这场战争的可能性。雷诺后来说，他在 6 月 5 日第三次改组政府，是要减少政府成员中希望停战的人数。另外的一些动机在当时也许更明显。激进社会党在政府中虽然仍有以国务部长肖当为首的一些代表，但已不再有力量反对达拉第免职。因此雷诺就得以把他同达拉第的长期斗争告一结束，把外交部也象国防部一样由他自己接管了过去。战时内阁的成员从十一人减至八人，这时包括雷诺、贝当、肖当、路易·马兰、伊巴内加雷、芒代尔、莫内、多特里。一个更为重要的发展，是任命了一些并非议员的专家。财政部的秘书长布蒂耶——他被雷诺当作“自己人”——成了这些人在政治上的领袖。报纸编辑让·普鲁沃斯特主管情报部。雷诺的情妇德·波尔特夫人的好友，以受意大利人欢迎而知名的博杜安。当了外交部副部长和作战会议的副秘书长；由于预言将来要打机械化战争而遭到总司令部厌恶的戴高乐，则被任命为陆军部和国防部副部长。这些人在政治上都是右翼人士。社会党人对于把这么

许多并非议员的人罗致入政府感到遗憾，可是《法国行动报》（1940年6月6日和8日）却为了同样的原因而兴高采烈，尽管它更希望成立一个以贝当为首的军事政府。另一家右翼报纸《争论报》（1940年6月9日）也在要求成立“一个具有战斗精神的政府”。虽然雷诺不是有意识地违背议会制政府的原则，但是他在6月5日进行的改组，正象5月10日的改组一样，却是导致在维希成立一个非议会制政府道路上迈出的一步，这一步也许是无可避免的。

在雷诺改组政府的同一天，德国人在松姆河—埃纳河一线展开了攻势，两天之内就突破了防线。6月9日，法国内阁作出了离开巴黎的决定。人们普遍认为，法国军队已不再能认真地抵抗下去，而由于意大利在6月10日参战，更为这种看法提供了证据。原来希望通过一种让步政策——德·蒙齐一直极力鼓吹这种政策——也许能使墨索里尼保持中立，而意大利一参战，就使这种希望终于化成了泡影。达拉第在担任外交部长期间，曾起草过一个向意大利让步的计划，可是雷诺坚持要同英国政府磋商，而英国政府却并不赞成这个建议。齐亚诺告诉195法国大使说，法国唯有在军事上获胜，才能使墨索里尼继续保持中立；法国在军事上既然失败，自然加速了意大利的参战。

法国政府离开巴黎以后，名义上设在图尔。实际上政府各部是在一种无法形容的混乱状态中分散在都兰省的各地，彼此之间靠信使沿着被难民堵塞的道路联络消息。德国人渡过了马恩河以后，有包围巴黎之势。为了不使人命遭到无谓的伤亡和文物古迹遭到破坏，魏刚（象他后来所说的）在6月11日命令埃兰将军把他的军队撤出巴黎，留下当茨将军和两个警察局长维持治安。13日，公布了雷诺在6月10日给罗斯福的信，信中表明法国将“在巴黎前面、在巴黎后面……在各省、在北非，如果必要的话在美洲”作战。同一天，宣布巴黎为不设防的城市，6月14日，德国军队列成堂堂的阵容开进了巴黎。

6月11日，即迁到图尔后的一天，丘吉尔、雷诺和他们的首席军事顾问在布里阿尔附近的米居厄堡召开了最高作战会议。丘吉尔极力主张，如果有组织的军队被打垮了，法国应当进行游击战争。贝当回答说，这样做意味着要使整个法国都受到蹂躏。他说，法国没有作好准备采取对方建议的那种抵抗方式，这一点由会议仍在进行时就传来的消息所证实，消息说，法国南方的一些地方当局由于害怕报复，曾抗议英国飞机从那里起飞去轰炸意大利，又说，居民已把马车和货车拉到机场去，不让使用机场。对于英国提出的轰炸德国城市的建议，法国人自然一直是反对的，6月11日，法国空军的首脑维耶曼又亲自要求推迟已经计划好的对意大利海岸进行海上和空中袭击，因为这样做有引起意大利对法国进行报复的危险。雷诺同英国人举行会议后回到了图尔，6月12日下午5时30分，内阁在康热开会，会上魏刚要求停止敌对行动。他宣布，部队已经疲惫不堪，有组织的抵抗即将垮掉，这场战争是输定了。在随后进行讨论时，支持魏刚的只有贝当，也许另外还有一个部长让·普鲁沃斯特。在此后的五大中，法国内阁的讨论主要是停战问题。

要在法国继续这场战争，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撤196退到一块预先进选好的地方，作为桥头堡来扼守。建立“布列塔尼阵地”的念头吸引了雷诺，他在5月31日指示过魏刚，要他对于建立这样一个阵地的可能性进行初步调查。总司令照办了，尽管他认为这种想法是不能实现的。在他看来，雷诺是把信心寄托在纯粹象征性的姿态上。雷诺在6月8日同新任陆军部副部长戴

高乐讨论了这个计划，在 6 月 11 日于布里阿尔举行的最高作战会议上，丘吉尔极力主张把这个计划付诸实行。这位英国首相的脑海中回忆起了托雷斯韦德拉斯的防线——可是这段对历史往事的幻想对法国人却未必有吸引力。于是英国在法国西部集结了一支军队，其指挥官阿兰·布鲁克爵士将军（后为阿兰·布鲁克勋爵陆军元帅）于 6 月 14 日在布里阿尔同魏刚和乔治将军会晤，安排布列塔尼的防务。

但不论是英国的将军们还是法国的将军们，对执行这个计划都毫无信心。6 月 14 日很晚的时候，英国政府下令撤退留在法国西部的英国军队。于是连建立布列塔尼阵地的念头也打消了。

德国人在法国大获全胜，那是无可否认的。这时似乎是一个恰当的时刻，来检查一下造成法国战败的原因。

贝当表达出了许多人，尤其是上层社会的观点，他在 5 月 26 日给雷诺的信中，已经提出了这样的看法，这后来成为维希政府的正式解释，即战败是民主制政府的软弱无能，首先是人民阵线的罪恶勾当的后果。他不愿让人们把战败的责任加在法国军队头上。可是，不管谁该负责，无疑的是，军队被投进了毫无准备的战斗，并且不得不承受着在装备上完全胜过自己的敌方装甲部队的沉重压力。此外，总司令部的官僚作风，又使任何迅速适应新式打法的措施无法执行。甘末林对军队的部署和战役计划有严重的错误；一旦德国人突破了防线，其作战的速度和新的、意想不到的进攻方法，就削弱了法国军队的士气，尽管到处都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和出现了许多英勇战斗的场面。魏刚在谈到他接任指挥的时候，写道：“在军队的上层，普遍的情况是一片混乱，而在下层，1914 年曾 197 使他们能够顶住开头几个星期的灾难的那股坚韧不拔的气概，似乎已经荡然无存。”甘末林在 5 月 18 日的一份报告中，提到了军纪松懈、抢劫行为和一击即溃的风气。可是，所有这种种不良的表现，是战败的结果，而不是战败的原因。而且，正当各支军队在无用地拚命抵挡德国装甲纵队挺进的时候，又受到了一群群难民的阻碍，难民中各种年龄、各种阶层都有，他们被吓得失去了理智，惊慌失措，争先恐后地沿着各条道路向西逃命。法国的舆论也同法国的军队一样，对于这种新式的战争是没有思想准备的。严格的检查制度禁止发表对盟国的军事优势和必然胜利抱有怀疑的任何看法。事实上，报纸已经造成了一种以愚昧无知、自鸣得意、盲目乐观为主的心情。甚至在战斗高潮时，报纸上仍然满篇荒谬的乐观报道。什么“敌军在全线受阻止步不前”、“敌军损失惨重”，报纸上关于 6 月 8 日战斗的报道就是这样写的，而空军部则报道：“法国空军已重创敌军坦克。”

参阅马克·布洛赫：《莫名其妙的战败》(Marc Bloch :L 'Etrange Defaite)，巴黎，弗朗·蒂勒尔出版社，1946 年版，第 77 页。

魏刚：《角色》，第 40—41 页。

雷诺：《混战方酣》，第 467 页。

与此同时，在法国的政治活动中也有着具有重要意义的和平主义和失败主义的因素，尽管他们还不能畅所欲言地在报上发表观点。乔治·博内和“慕尼黑派”等着看到他们反对打仗的意见将被证明是正确的。赖伐尔、保罗·富尔和社会党内一部分和平主义者，以及各种法西斯和亲德的团体，纷纷忙于策划阴谋；而共产党虽处于半取缔状态，也在要求成立一个谋求和平的政府，

并竭力破坏国家的防务。政府所采取的唯一有效的行动是对付共产党人。在芒代尔当了内政部长后，这种行动加强了。在整个法国逮捕了几百名共产党员；其中有四人被指控破坏飞机工厂，而在5月27日由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另一方面，在芒代尔的领导下，对右翼反对势力也第一次采取了行动。6月6日，一些臭名昭著的亲德分子如罗贝尔·法布尔-吕斯、塞佩勒·德·戈比诺、勒斯卡（亲德的《处处有我》的编辑）、阿兰，朗布罗和蒂埃里·德·吕德尔都被逮捕了。亨利·德·凯里利于6月7日在《时代报》上断言，这个“希特勒分子的匪巢”先前之所以能够免受制裁，正是纳粹主义在法国大肆破坏的明证。将近5月底时，芒代尔又把北方一些省失职的省长、警察局长和198其他官员撤职，可惜为时已经太晚，使他在内政部的铁腕作风只收到象征性的效果。但是，历史学家决不能夸大法国内部敌人的势力。法国军队并不是被他们打败的。俗语说，只有在雄壮的猛兽被打死时，阴险的鬣狗才敢出头露面。

第二节 停战

法国内阁面临的实际问题，是怎样使在法国的战斗结束，和该不该从北非把这一仗打下去。这是雷诺一贯坚持的行动方针。魏刚和贝当的看法则不同。英、法关系的不断恶化，对他们的态度起了重要的——尽管还不是决定性的——影响。上文已经提到，魏刚由于认为英国方面缺乏合作，也许甚至言而无信而忿忿不平，同时也提到，两国的关系由于敦刻尔克撤退而趋于紧张。7月4日，贝当告诉布利特（美国驻法大使），他认为英国人准备坐观法国为了支持他们而打到底，然后自己去同希特勒妥协媾和；当时，贝当还表示，英国没有公平地分担战争的牺牲。这并不仅仅是他个人的看法。确实，正如丘吉尔痛心意识到的那样，“到目前为止惨遭屠杀的人中有十分之九，受苦受难的人中有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法国人”。丘吉尔在布里阿尔时，拒绝把留作保卫本土之用的英国空军的最后二十五个战斗机中队投入法兰西战役，这件事更加深了法军总司令部的怨气。

在魏刚的头脑中，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他一心想着国内的治安有危险。在贝当受审时，魏刚硬说，他之要求停战是有严格的军事上的理由为根据的。自然，要求在法国停止战斗的军事理由肯定是难以驳斥的。但是，现在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当时不断萦绕在他脑际的，却是出现无政府状态的威胁。已被取缔的共产党在当时究竟拥有多少实力难以估计，但是至少在国内存在这样一支潜力难测的第五纵队，使得许多在作战的将领不时要回过头来防备内在的敌人。如果法国在战败时留下的是一支土崩瓦解、士气沮丧的军队，那么人们不必有多少历史的想象力，就能料到1871年的巴黎公社将会重演。需要保有一支军队来维持国内的治安，是魏刚经常提出的论据。他再三催促缔结一项停战协定。博杜安写道，魏刚早在5月26日就极力主张政府留在巴黎，效法古罗马元老院议员接待高卢侵略者坐在贵宾席上的先例，以防止在首都爆发革命运动的危险。6月13日，魏刚向内阁报告了一个耸人听闻的消息，说共产党的领袖莫里斯·多列士在共产党于巴黎起事后已在爱丽舍宫就职。芒代尔同巴黎警察局长通了电话，才证明这个报道是不确实的。尽管如此，这位总司令，凭着他在军界的崇高威望，

他那善于作出决定并把这些决定清楚地阐述出来的本领，他的专横武断的作风，他的辛辣无情，冷嘲热讽的口才和他蔑视一切政客的态度，仍然处

于强有力的地位来坚持他的观点。另外，在停战的要求背后，还有一个理由也必须提一下，那就是法国军队和逃难的平民被挺进的德军追逐得在法国东奔西窜的悲惨景象。不仅人们的生命，而且法兰西文明的整个结构，似乎都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博杜安的思想感情，无疑是表达了人们普遍的看法，他写道，法国不是波兰：精神上的、道德上的、智力上的价值构成了这座巧妙地平衡着的大厦，它一旦遭到全面入侵，就将被彻底毁灭。

如果魏刚与贝当能使他们的观点在内阁中得到足够的支持，显然法国将放弃这场斗争，而政府也不会撤退到北非去继续这场战事。鉴于雷诺代表法国承担着不单独媾和的义务，因此内阁于6月12日在康热商讨以后，显然就产生了立刻与英国举行会议的必要。6月13日，丘吉尔由其他英国代表陪同，再度来到图尔与雷诺会谈，陪同雷诺的是博杜安。法国总理要求对方承认，法国固然要“保持三个月以前缔结的庄严协定中所含蓄表示的那种团结”，但也有权单独媾和，丘吉尔答复时，表示英国不愿同意举行停战谈判，于是决定，由雷诺再向罗斯福求200援。难以认为，这个决定的用意不是企图争取时间。英国的大臣们返回伦敦，雷诺则回到设在康热的内阁，在那里他发现同僚们因为没有机会同英国人协商而愤愤不平，并且怀疑他和芒代尔在搞阴谋，撇开他们来解决这个问题。

贝当先前一直让魏刚去积极行动，这时自己也介入。

应当指出，人们曾经指责这两人串通了搞“阴谋”，其实那是没有什么根据的。魏刚担任过福煦的参谋长，与贝当由于长期的、激烈的角逐而对立；甚至在停战以后，两人也没有真正地精诚合作过。魏刚自己后来声明过，在整个法兰西战役中，除了有雷诺在场时，他从未单独见过贝当。当然，贝当是难得主动采取行动的。可是也没有理由认为，这时候他是受了魏刚的唆使。他带了一份声明到内阁去宣读，主张政府必须留在法国以从事重建国家的工作，主张停战是法国能够存在下去的必要条件。贝当说，他自己无论如何也不愿离开祖国，而是要留下来为国家分担困难和痛苦。正如魏刚摆脱不了害怕突然出现无政府状态的念头一样，贝当已在考虑的，主要是复兴法国的工作。两个人都没有想到继续进行抵抗的可能性。鉴于法国当时的军事形势，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显然他们两人都没有根据纳粹主义所造成的，甚至也许没有根据法国大革命所造成的新的情况来考虑问题。在十八世纪时，打仗惯常是“国王们的游戏”，玩的时候所下的赌注是有限的，比赛者都是同一个欧洲王室的成员，因此各人既是为了表示开明的自身利益，又是出于家族之情的天性，在打败对方后，总是克制着自己，不把王室中的那个堂兄或堂弟搞得倾家荡产。但是法国大革命一来，就再也没有人这样做了。无论是贝当还是魏刚，都把战争仅仅看作是军事上的角力。而在目前的这场角力中，法国既已完全被击败，因此为了恢复和平，自然就得相应地付出高昂的代价。但是他们似乎没有想到，一个停战协定，不论条文订得多么严密，都不会让法国放手按照自己的方式去从事复兴国家的工作。纳粹政策的势头先前并非由于军事行动而开始兴起，也没有由于军事行动而停下来，这一点贝当和魏刚似乎也从未估计在内。在贝当宣读了他的最后结论以后，其他一些部长发言支持他，201可是雷诺在内阁中仍然拥有足够的后盾，来阻止立刻作出要求停战的决定。不过，大家同意，在德军继续推进的情况下，把政府迁往波尔多。

6月14日，政府迁到了波尔多。在这个省会中，将要上演这出悲剧中的

最后一幕。政府各部竭尽所能将其机构安置在各种各样的办公室内和学校中，周围是一群群吵吵闹闹的难民，他们挤满了房屋和街道，使波尔多的入口比平时增加了许多倍。所有党派的政客都麇集到那里，等着瞧最后的一幕戏。赖伐尔看到时机将近成熟，就出头露面，在他的朋友、新社会党党员、波尔多市市长马尔凯设在都城旅社的官署中为他自己弄到一隅之地。他的身边聚集了一批与他观点相同的同僚，包括贝热里、博内、皮埃特里、斯卡皮尼、德·蒙齐、戴阿、蒙蒂尼等人。其中有许多人在战前是属于法一德小组的。他们先是在都城旅社，后来改在附近的一个大厅内举行会议和协调行动。贝当的办公室也在同一幢房屋内。但是，主要的决定权仍操在总司令和总理手中。魏刚和雷诺这时都同意在法国的战斗必须结束，可是对于怎样结束，两人的意见大相径庭。6月15日，在波尔多第一次举行了内阁会议。

雷诺建议魏刚以总司令的身分，下令停火以结束在法国的战斗，因为这样做将比举行停战谈判能更快地止住屠杀。魏刚严词拒绝，因为投降将使军队蒙受耻辱。据布蒂埃说，魏刚声称，他所以呆在那里，就是为了捍卫军队的荣誉。他声称，他不会让政府推卸掉责任。他和贝当有同样的看法，认为战败的责任在于那些搞政治的人，是他们使法国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参加了战争，因此他们必须自己承担起求和的责任。他后来说过，他巴望雷诺要求他辞职，可是很显然，正如雷诺后来表明的那样，要是魏刚辞职，随后贝当也可能辞职，这将会彻底地瓦解法国还剩下的一点斗志。死胡同已经走到了尽头。

在这个当口，肖当介入了进来，他建议（这个建议得到了弗罗萨尔的支持）政府向德国人询问他们同意停战202的条件，然后，假如这些条件证明无法接受，就撤出法国，继续战斗。肖当的理由是，询问停战的条件并不一定就是接受这些条件。这种好象有理的、与众不同的理由，似乎为这个没有希望打破的僵局提供了一个办法。内阁的辩论这时变得混乱起来，有关的报道是互相矛盾的。但是，看来没有什么疑问的是，这是一个关键性的行动，它破坏了在内阁中占多数的赞成继续抵抗的人们的结合。雷诺激动地向勒布伦提出辞职，但遭拒绝。于是他撤回辞呈，答应向英国询问他们同意让法国举行停战谈判的条件，他认为，采取这样一项步骤，就不会对这个争端预先作出结论了。

与此同时，继续接到了德军到处挺进的报告。零落分散的法国军队必须努力守住战线，可是随着法军的撤退，战线变得越来越长。越来越多的、潮水般的难民正在涌向法国南部，6月16日，德国人宣布突破了马其诺防线。这是决定命运的一天。开始是国民会议议长赫里欧和参议院议长让纳内派了代表去见雷诺，强烈要求他把政府迁往北非。代表们向内阁也提了同样的建议，然后就退出了。贝当读了他的一封信，说倘使不谈判停战，他就提出辞职，借以加速解决这个争端。雷诺宣读了罗斯福对他最近在6月14日求援的呼吁所作的答复，这位美国总统通知他，无法提供军事援助。于是这时唯一需要的，就是等待英国的答复了。英国的答复很快就来了。

英国驻法大使罗纳德·坎贝尔爵士递交了一份英国政府发来的电报，同意法国举行停战谈判，条件是法国舰队要先开往英国港口。第二封电报重申了这个条件，并且说，英国政府希望其盟国接到了停战条件以后，能够同它商量。在这两封电报以后，英国政府接着又发出一份照会，要求两国之间完全团结，坎贝尔在把这份照会递交给夏尔-鲁时，收回了两封电报。这个行动

把问题完全搞混了，后来并且造成了许多自相矛盾和互相指责的情况，203因为它使人们无从确定，英国是否同意过法国停战，如果同意的话，又附有哪些条件。

当雷诺在当天（6月16日）下午5时再次与他的内阁成员碰头时，他报告说，英国政府一面拒不同意法国停战，一面提出要同法国团结。他是否谈起已被收回的那两封电报的内容——电报中同意法国停战，条件是要法国把舰队开往英国港口，并要法国把对方提出的停战条件事先告诉英国——这一点在目前是有些争论的。无论如何，尽管英国大使在6月17日把两封电报还给了夏尔-鲁，但是这个要求团结的建议，其用意显然在于勾销两封电报的内容。这个建议产生的效果，与希望达到的效果适得其反；它使法国的部长们极为愤慨，为原来就已很强烈的反英情绪火上加油。这种情绪并非仅仅来自右翼。在政治天平的另一端，秘密刊行的《人道报》在6月17日问道，法国人是否要继续被屠杀下去，好让住在英国的四千万人去剥削海外的四亿人。

在雷诺于6月16日向内阁报告了英国和美国的答复以后，肖当重新提出了他的建议，认为应当去问德国人，他们同意停战的条件是什么。贝当一派的压力，这时由于肖当及其支持者的压力而得到了加强。没有进行投票表决。雷诺后来说过，他记下一张名单，内阁中有十三人赞成肖当的建议，反对的只有六人。他认为内阁中的大多数人已经抛弃了他，勒布伦后来也说过同样的话。

但是其他的证人却宣称，雷诺仍能控制微弱的多数来反对停战，这种意见看来较有根据。不过单单计算人数，对于估计形势是不会有多少帮助的。贝当的盛名在精神上的感召力，魏刚的固执的压力，还有内阁外面在都城旅社中那一批人的层出不穷的阴谋诡计，这一切都是必须204加以考虑的。雷诺本人则已经饱经了长期的、无法忍受的过度紧张。无论是他的性格，还是他在政治上的后盾，都足以应付他已经挑起重担。要说他在精神上已经垮掉，并且故意把责任推卸到政敌的肩上，那是不公平的，尽管事实上这的确是他的行动的结果。

后来，雷诺把要求贝当组阁的责任归咎于勒布伦，赫里欧支持雷诺的论点，认为雷诺并未提议过要贝当继任。

可是雷诺在说明为什么他认为贝当比肖当更可取时，承认他同总统提到过这位元帅。在贝当受审时，雷诺说，这是因为他当时对贝当仍然存有幻想。总之，贝当显然是恰当的人选，雷诺承认这件事，那是无可非议的。更加值得注意的是，雷诺面对这样强大的势力（据说德·波尔特夫人也在经常对他施加压力），竟能如此顽强地抵制了停战的政策。当然，带头极力主张停战的人中间，多数是雷诺引进政府的，这个责任应该由他本人承担，但是在当时的政治情况下，他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议会中多数是左翼；但是共产党正在竭尽全力反对这场“帝国主义的战争”，来支持苏联与纳粹德国结盟的政策；社会党对这场战争的支持，由于富尔及其和平主义追随者的反对而削弱了；激进社会党的领袖达拉第是雷诺的死对头，而这个党本身的团结一向就不牢靠，这时更在瓦解；同时，在这个关头，左翼在议会中的多数已成为政府非常不稳固的基础。因此，难怪雷诺会转向右翼去寻求支持，会把这样的一些人——他们认为，这场战争实际上无非是人民阵线的罪恶和愚蠢行为的最终和最不幸的后果——

引进了他的内阁，因而会替别人改变他自己的政策铺平了道路。

贝当这时被要求出任法国政府的首脑，要他在下述运动中当一个挂名的领袖，那是再理想也没有了，这个运动的目的在于补救左翼干下的坏事，首先是使战争告一结束，作为必要的第一步。他和他的顾问们已经准备好了他们的政府。这个政府包括了一些与贝当观点相同，认为必须停战的议员，包括了肖当这个典型的激进社会党党棍当副总理。可是，对停战的最强有力的支持，却是来自陆、海军军官，来自高级官员。由于新内阁中包括了205达尔朗、亨茨格这样一些武将和布蒂埃、佩鲁通这样一些文官，因此，与议会制政府背道而驰的倾向仍继续存在。

博杜安主持了外交部。赖伐尔大失所望，他一直在幕后孜孜钻营，谋取此职。赖伐尔之被排斥，是夏尔-鲁干的事，后者通过魏刚向贝当强调指出，鉴于赖伐尔的众所周知的仇英心理，任命他是不受欢迎的，甚至是危险的。贝当觉得很为难，从而露出他曾对赖伐尔许过愿，但是面对着夏尔-鲁以辞职相威胁，贝当让了步，提出让赖伐尔改任掌玺部长。可是赖伐尔除了当外交部长外，不愿接受任何职务，他的朋友马尔凯和他一起没有参加政府。

新政府在6月16—17日的午夜12时30分所采取的的第一个行动，是要求西班牙大使转交一份照会给德国人，问他们要什么条件才答应停战。接着又在6月17日向全国广播，在广播中贝当宣布，必须停止战争行动，并谋求与德国象军人与军人之间那样达成体面的和平。贝当的措词——“必须停止战斗”——自然而然地被理解为一个停火的号令；它完全瓦解了军队的斗志，使德国人轻而易举地大批包围和俘虏了更多的法军。向纳粹领袖们去要求体面的和平，这看来可能缺乏一种现实感。然而，这番话出自贝当的口中，却没有理由认为它不是诚恳的。

这是造成此后两年幻想的一个适时的序曲。博杜安力图弥补贝当的演说所造成的损害，后来又广播了一个说明，指出战事尚未结束，只有体面的条件才能接受；可是德国人却不急于提出任何条件，无论是体面的也罢，不体面的也罢，而是继续向前推进。6月18日，他们占领了贝尔福、科耳马尔、迪戎和勒克勒佐，法国政府通过广播宣布，所有人口在两万以上的城镇都不设防。

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尚待作出决定，那就是，是否要把政府迁往北非，是否要在那个根据地同英国肩并肩地继续战斗下去，这个问题尚未解决。但是，法国的军事领袖们认为，法国在军事上首屈一指，那是不言而喻的，他们不相信，不可一世的法国参谋总部既已战败，却还会有任何其他国家——其中肯定包括英国——能获成功。

魏刚不相信，法属北非能提供有效的抵抗来对付德国人。此外，贝当和魏刚部已表明过态度不离开祖国，而206是要留下来同人民共患难。人家向魏刚举出荷兰女王的例子，魏刚回答说，不能把君主和总理相提并论：第三共和国成立七十年来，已经有过一百多个总理了。魏刚的主导思想是清楚的：对君主的效忠，也许能使社会结构甚至在外国占领下存在下去，但是一个受人怀疑的共和政权，一旦政府迁走，就得不到人民这样的效忠了。戴高乐在6月8日同魏刚会晤时，表示过这样的看法，认为法国本土即使战败，法兰西帝国仍然存在，魏刚答复说，回守头去重提帝国的往事，那是傻话。6月19日，内阁决定迁往佩皮尼昂，从而再次延缓了这个争端的解决，一面提出了一项折衷方案，建议把政府一分为二，一部分迁往北非，总统、国民议会

和参议院的负责人员、内阁副总理随同前往，其余人员在贝当领导下被授予特殊的应变权利留在法国。6月19日下午2时，勒布伦正要出发前往佩皮尼扬这个去非洲的中途站的时候，迁移的事推迟了，据说是由于贝当的顾问阿利贝的干涉。

这时发生了“马赛”号事件。为迁往北非作准备工作的达尔朗，通知内政部长波马雷说，他在波尔多有一条船“马赛”号，已经准备就绪，好让那些想要离开的人上船。

赫里欧和让纳内后来在7月10日午后的议会会议上为他们那些搭乘“马赛”号离去的同僚辩护时，坚决认为达尔朗的安排具有官方性质，赖伐尔承认，他们的说法是正确的。

时终于下令，要整个政府留在法国。

与此同时，法国停战谈判的全权代表已被指定，6月21日，亨茨格将军、勒吕克将军、贝尔热雷将军和莱昂·诺埃尔到贡比涅，在一节火车车厢里得到了希特勒和他部下的接见，1918年的停战条约，就是在这节车厢里签订的。德国方面提出的条件用电报通知了波尔多。法国方面的答复是，要求对方作一些让步，特别是不要占领巴黎和让法国的舰队停泊在北非诸港。6月22日，德国方面拒绝了第一项要求，声称第二项要求是细节问题，应留给停战委员会去解决，并拒绝作任何让步。

述如下。在阿尔卑斯山区，法军的三个师曾成功地守住208阵地，抵御了在数量上远远胜过自己的意大利军队，并使敌军遭受了很大的伤亡。6月23日，意军占领了芒通的一部分，第二天，法国同意大利的停战条约就签字了。

在法国，停火于6月24—25日夜间生效，不过，马其诺防线上的一些孤立的据点，却直到6月30日才投降。根据同德国停战协定的条款，法国被划分为占领区和非占领区，法国的军队将彼遣散和解除武装，海军将在德国的控制下复员，占领区的一切武器、军火、设施、机器和军需品将完整无缺地移交给德国人。法国政府担保不让法国人继续对德国作战。法国将支付占领军的费用。侨居在法国的德国人，凡是德国指名索讨的，都将移交给德国方面。德国战俘将被释放，原有的法国战俘在缔结和约以前，将继续由德国看管。这些条款，尤其是与法国战俘和占领费用有关的条款，只是在假定战事实际上已经结束的情况下，方才会被法国方面接受的。但是这些条款却使德国人拥有了一种手段，可对法国几乎无限制地施加压力。法国同意大利停战协定的条款，除了在细节上作了必要的改动以外，大体是相同的。

第三节 英法关系

停战协定缔结时的形势，必然使英、法之间的关系紧张起来。英国大使坎贝尔抱怨说，博杜安在6月21日夜间接见他时，态度粗暴无礼。坎贝尔接到指示，叫他不要被德国人俘获。这就必需有一艘英国鱼雷艇供他用来离开纪尤德省，才能不被围困得无法逃脱，他之所以和下属在6月23日夜间仓卒离去，大概是由于上述原因，但是从此英国在波尔多就没有了代表，这是很不幸的。这样的做法没有减少以后的日子里出现的困难和误解。戴高乐于6月18日从伦敦广播，呼吁法国人不要放弃斗争，他显然受到英国政府的利用，从而使波尔多方面大为不满。6月23日，丘吉尔发表声明，谴责停战协定的条款，并允诺在英国战胜以后恢复法国的崇高和自由。几天以前，首相在下院曾宣布，英国的援助至少已履行了在战争开始前209与法国达成的协

定。这使伦敦方面和波尔多方面展开了一系列长距离的攻击。在这个过程中，贝当、博杜安和情报部长普鲁沃斯特对丘吉尔进行了回击。早在停战以前，反对同英国结盟的情绪——罗纳德·坎贝尔爵士在6月15日向夏尔-鲁称之为“反英的浪潮”——就已滋长起来。赖伐尔从1936年的事件发生以后，对英国人一直耿耿于怀，这时充当了反英情绪的代言人，极力主张与之完全决裂；但是新上台的法国政府还没有准备这样做。

英、法之间的主要争执在于法国舰队的前途。英国大使递交两封电报以后又将其收回一事所造成的混乱，上文已经谈到过。难以设想，任何有理智的人会期待法国人把自己的舰队交给英国人手中。英国在此后几天内施加压力要求这支舰队开往英国港口一事，并不一定含有这个意思。困难在于，如果不是这个意思，那就意味着，法国必须继续战斗下去，至少用它的舰队继续战斗下去。

雷诺在6月16日已拒绝了要法国舰队开往英国港口的建议，理由是这将使突尼斯受到意大利的攻击，显然他始终考虑着从北非继续进行抵抗时这支舰队将起的作用。

6月19日，两个英国密使——海军大臣A·V·亚历山大和第一海务大臣、海军上将达德利·庞德爵士——去波尔多讨论法国舰队的前途问题，达尔朗向他们保证，无论如何不会让它落到德国人手中：舰队若不留在法国人手中，就是毁掉。的确，这一决定权是掌握在达尔朗手中。这位精明强干、雄心勃勃的军官，很有理由因为建立了法国从十八世纪以来最强大的海军而自豪，他决意不把它交付给任何人。自然，他和法国海军军官们一样，也具有传统的仇英心理，有时并在谈话中无意地流露出来。他也和法国的海军界一样，对于1935年的英—德海军协定怀有强烈的、可以理解的不满情绪。法国政府的全体成员都意识到，显而易见如果放弃掉舰队，就是放弃掉法国在讨价还价时的最好的筹码。在英国的压力之下——由于美国也提出了强烈的抗议，更加强了这股压力——内阁在6月18日作出决定，不把舰队交给德国人，不问这样拒绝后会有什么后果。同一天，尚未造好的“让·巴尔”号和“黎塞留”号冒险从圣纳泽尔和布雷斯特逃到北非。

另一方面，根据停战协定第八条，命令法国海军集中在舰只平时停泊的地点，也就是说三分之二的舰只应集中在布雷斯特、瑟堡、洛里昂，在德国和意大利的控制下，听候遣散和解除武装，这一点似乎证实了英国最最害怕的事。美国也对这些条件感到惊恐。萨姆纳·韦尔斯告诉法国驻华盛顿大使说，停战协定的条款显然把整个法国舰队都交给了德国。事实上，达尔朗正在采取的预防措施，不仅瞒着英国和美国政府，甚至也瞒着法国政府的大多数成员。魏刚写道：“一切有关海军的事都由海军上将达尔朗全部保守秘密，他在处理这些事务时，只同国家元首直接联系。”6月29日和7月1日，英国海军部接连收到了达尔朗的信件，保证“舰队若不是留在法国手中，就是毁掉”。达尔朗是否可靠，仍然不得而知，但是贝当政府已经表现出仇英的心理。因此英国政府对于法国的保证感到不放心。丘吉尔认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法国舰队落入德国人手中，他采取了称之谓“可恶的决定”，使用武力以达到这个目的，英国人这时感到法国那个缔结停战协定的政府已完全不能信任，我们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理解这个决定。

停泊在英国各港口的法国舰艇于7月3日被夺走。

海军上将詹姆斯·萨默维尔爵士指挥一支令人生畏的海军，在米尔斯克

比尔沿海摆开了阵势，米尔斯克比尔的海军基地上，在海军上将让苏指挥下，集中了数量最多的法国舰只，其中包括两艘主力舰、两艘新造的巡洋战舰和一艘运载水上飞机的航空母舰，在奥兰，也有几艘巡洋舰、驱逐舰和潜水艇。萨默维尔根据英国政府的指示，向让苏发出最后通牒，提供四点让他选择，或是参加英国舰 211 队继续战斗，或是连同业已减少的官兵开到英国的一个港口，或是连同业已减少的官兵开到法属西印度群岛或美国的一个港口，最后，或是把船弄沉。这两位海军上将从 7 月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开始会谈，继续了一整天。

让苏在没有接到法国命令的情况下拒绝采取行动。他表示愿意就地解除武装，但不幸的是，英国舰队并没有足够的力量能看守住这个军港，正如“斯特拉斯堡”号后来逃到土伦一事所表明的那样。下午快到 6 时，萨默维尔向泊在米尔斯克比尔的舰艇开了火，法国的舰只除了“斯特拉斯堡”号以外，都打得失去了战斗力，并死伤了许多人。在亚历山大，谈判进行了好几天。法国停泊在这个港口的船只很少有逃走的可能。尽管达尔朗一再下令给那里的法国海军上将戈德弗鲁瓦，要他杀出一条生路，但是后者仍在 7 月 7 日同英国的海军上将安德鲁·坎宁安爵士达成了协议，规定法国舰艇就地解除武装，但仍归法国人控制。最后说一下，已经开到达喀尔的“黎塞留”号，遭到攻击而失去了战斗力，另外，英、美两国的军舰又对罗贝尔海军上将指挥下驻扎在马提尼克的法国舰艇进行了监视。

在法国，这些事情自然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停战协定签订以前举行的关于舰队问题的谈判，公众是不知道的，而达尔朗在 6 月 26 日的议事记录中，曾宣告停战协定并不丢脸，说对方已同意给予法国海军和空军较优的待遇。此外，英国提出的四个条件中最不令人厌恶的那个条件，即要舰艇开往法属西印度群岛或美国这一点，在 7 月 15 日以前，法国似乎也不知道。但是，即使所有这些事实都已经被人们知道了，法国的舆论对于不久以前的盟友竟对自己进行这样的攻击，也难以善罢甘休。这件事意味着，赞成投向德国的人们得到了胜利。法国海军军官中传统的反英情绪自然加强了，海军将领们在适 212 当的时候将成为保卫维希政权的主要堡垒之一。法国的舆论也许是饱经患难，麻木过度，对于这次新的打击已无法作出强烈的反应。在政府圈子里，仇英派的势力已经达到了顶点而无可再发展了。赖伐尔和达尔朗虽然极力主张进行军事报复，俱是博杜安和一些比较稳健的人却表现出自我克制的精神，最后法国的行动仅限于把法国大使夏尔·科尔班从伦敦召回。于是英、法两国在战争中进行合作的前途，就将取决于戴高乐将军，他在 6 月 17 日获悉法国即将要求停战以后，已飞到英国，举起法国继续抵抗的旗帜。

第六章意大利：从不交战到介入战争凯瑟琳·达夫

第一节意大利在 1939 年 9 月的态度

9 月 1 日下午，意大利内阁通过了一项动议，阐明已经宣布的军事措施的预防性质，并申明意大利将决不首先采取军事行动。从一开始就讲明白，意大利不是中立，而是不交战。法西斯党本来以为，希特勒会避免在 1942 年底以前打一场全面的战争，在萨尔斯堡会谈粉碎了这种幻想以后，墨索里尼经过两个星期的犹豫，终于推托说，意大利尚未准备就绪；希特勒接受了他的决定，双方并且同意，应由意大利给予德国除作战以外的其他几种形式的援助。可是，这个最后一分钟的权宜之计，仍然没有解决墨索里尼的主要困难，在这种困境中，他的国家在经济上和军事上的软弱地位，以及他的同胞不愿打仗的心情，是同他的居心叵测的个人野心，他的忧虑，以及他对自己的足智多谋过于自负的态度是相互矛盾的，后面的几个因素，曾促使他与德国缔结了同盟，这时又使他越来越强烈地倾向于，只要看来可行，就尽早地介入战争。自从 1937 年 9 月访问希特勒以后，墨索里尼就一直深深地意识到德国的力量；盟国凭其下降的人口出生率和松懈的组织，在战斗精神或经久耐战方面是否能够证明是纳粹的对手，他对此必然要产生怀疑。他密切地注视着法国人厌战的迹象和英法协约中出现的裂痕，他十分期望能看到，波兰战役结束后，西方国家部分地由于绝对没有能力从陆地上进攻德国的缘故，立刻会谈判议 213 和。至于德国人，他还不相信他们有能力强攻马其诺防线；他也很可以自我安慰（象齐亚诺报道的那样），当欧洲的那些巨人们在厮杀得你死我活时，意大利仍能自由自在地建立自己的力量。

但是，同墨索里尼的忧虑相比，这只能算是一个小小的安慰，他忧虑的是，如果议和的谈判在往后几个月内再不开始，如果意大利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始终保持不交战，它就将丧失掉自己在和会上的地位，丧失掉最后的机会，再也不能对西方国家和在东南欧实现自己的要求，再也不能永远树立起自己的大国地位了。意大利也决不能跟德国疏远到这样的地步，以致危及与德国进行合作和要德国重新提出保证的政策，这项政策是在 1936 年以后逐渐形成的，一部分用意在于限制德国的势力扩张得越过勃伦纳山口或向的里雅斯特扩张。意大利的地位处于互相交战的欧洲列强中间，根据墨索里尼的看法，它无法既保持绝对的中立，又不把自己的地位贬低到象一个大型的瑞士那样，结果降格为欧洲政治足球联赛的乙级队（据说他在 1940 年 1 月曾同内阁这样说过）。可是，甚至墨索里尼也认识到，意大利介入战争的时间，越迟越好。

它必须要打的仗，越短越好；它能抓紧越多的时间来武装自己，它的介入能使局势发生变化和使战争结束的机会就越多。介入，只有站在德国的一边，这不只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政策上的完全改变，而且也太危险了：因为，假如在西线继续进行围城战，而英法两国却不做任何事来帮助意大利，那么它就要落到波兰那样的下场。事实上，畏惧德国的心理，在墨索里尼的考虑中显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即使如此，这位最不现实的“现实主义者”，仍然继续不很认真地考虑着在地中海或巴尔干进行一场“并行”的战争，就象 1937 年 11 月间当英法忙于同意大利交战时，希特勒提议占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一样。

苏联入侵波兰，使意大利的处境更加复杂。在官方的鼓励下，作了一些

努力（例如在博塔伊的《法西斯评论》中），把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和苏联的共产主义看作几种殊途同归的思想体系，或是把苏维埃主义叫做“斯拉夫式的法西斯主义”，但是，法西斯的统治集团，一旦同 214 公众的舆论协调一致以后，就坚决地倾向于反共。此外，俄国进军东欧，威胁了意大利在多瑙河和巴尔干的势力范围，而德国采取的对策，则可能证明是把毛病越医越糟。一个持久的德苏协约，将不会有助于使德意轴心在德国得人心，相反，却可能贬低这个轴心在纳粹党眼中的价值，结果会使意大利再度成为欧洲的“单干户”。

其他一些更加出于个人的考虑，也对墨索里尼的心理起了影响。他过去经常鼓励意大利人挺而走险，1937 年 9 月，他在五月广场曾向德国的民众保证，法西斯主义将同其盟友并肩进军，战斗到底，他在不久以前还引用过但丁在蔑视那些罚入地狱的人们时所说的话，认为这些人由于摒弃了采取行动的机会而“*adiospiacentiedainemicisui*”，然而这时却被迫断然拒绝介入，袖手旁观，让希特勒去独力作战，这样，自己究竟算在扮演什么角色呢？使他更加痛苦的是，他不久就发现，尽管希特勒几次作了声明，德国人仍在指责意大利背信弃义地背弃盟友，而且还不是第一次叛离了。齐亚诺描述，墨索里尼被德国人取得的胜利深深地地震动了，对德国时而不满，时而怀疑，他渴望自己在东南方进行冒险；他一会儿准备宣布中立，一会儿又准备同希特勒讨论介入的事。齐亚诺说，墨索里尼的特点是，每逢他觉得自己面临僵局，或者需要在两种祸害中作出选择时，他就要发泄一通好战的情绪，不过，甚至在这种场合，齐亚诺可能也有些言过其实。齐亚诺自称，他曾希望发生一场长期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意大利将隔几年再介入，也许站在盟国的一边介入，以反对德国和俄国，这使人们有时得到这样的印象，认为他之所以在《日记》中记下上述内容，是由于他希望，如果发生这样一场战争，他已早有准备，好用这些内容来证明自己是正确的，并取悦于人。

第二节 内政

（一）政治和军事

在宣告不交战的时候，是非常强调以下各点的：强调意大利的行动自由；强调它决心只考虑自身的利益；强调在对德国承担的义务方面是问心无愧的；强调它为防止战争和在公正地修订凡尔赛和约的基础上达成一项和约所作的努力；以及强调它在稳定地中海和巴尔干的局势方面所起的影响。墨索里尼在 9 月 23 日向波伦亚的法西斯党高级干部讲话时，宣称意大利将武装自己，准备应付任何挑战，并将支持任何恢复和平的努力；宣称与此同时他的同胞必须沉默、警惕、勤勉，并要克制，不要在船的航向问题上与领航员纠缠。虽然，他在 9 月 30 日向热那亚的法西斯党高级干部发表的一篇“非正式”讲话中，反复地谈到意大利在地中海“受监禁”的情况和战争的可能性，然而他坚决主张，意大利需要经过长期的准备才能打仗。

大多数意大利人都以极其宽慰的心情接受了不交战的方针，并十分希望能够立刻得到繁荣和持久的和平。可是，政治形势却使墨索里尼有些担心。不久以前的紧急情况，尤其是部分的动员，已使一般民众中普遍流露出惊恐和不满情绪，尽管这种情绪只是暂时很剧烈，同时，对于法西斯党内的亲德派别，仍然需要加以约束，遏制其强行加快介入战争的步骤。据说，法西斯党的书记阿基莱·斯塔拉切、陆军部副大臣阿尔贝尔托帕里亚尼将军、大众文化部大臣迪诺·阿尔菲那里，在 9 月 3 日或 9 月 3 日以后不久，确实企图

迫使这位领袖反对齐亚诺。因此，在秋天，当墨索里尼象以往一样痛斥谩骂“反法西斯主义的犹太的、共济会的、媚外的残余”时，却把政府的控制稍微放松了一些，同时也准备好，一俟发生紧急情况，就重新再加紧控制。

10月31日的“换防”，是意大利内阁在1935年1月以后第一次普遍的改组，使即将离任的大臣中有六人蝉联原职，即：齐亚诺（外交）；保罗·塔翁·迪·雷韦尔（财政）；多梅尼科·卡瓦尼亚里（海军）；迪诺·格朗迪（司法）；朱泽培·博塔伊（教育）。其他的人中间，帕里亚尼将军和空军副大臣朱泽培·瓦莱将军，由乌巴尔多·索杜将军和弗朗切斯科·普里科洛将军接替；阿尔菲那里（大众文化）

由阿莱桑德罗·帕沃利尼接替；费利切·瓜尔尼埃里（外贸和通货）由拉法埃洛·里卡迪接替。从1931年以来就担任党的书记的斯塔拉切，调任法西斯民团参谋长，民团这时正在编入正规军（改编的确切日期是1940年3月）。

继任他的埃托雷·穆蒂——一个由于勋章而不是由于才216智而引人瞩目的飞行员——是受到齐亚诺保护和资助的人之一，齐亚诺本想通过他来间接地控制党，但是这个希望不久就落了空。在冬季的时候，党的统治集团内有了许多新的任命，再加行政上的变动，把党更严密地置于执行委员会的控制之下。党员的人数在1939年10月为二百六十三万三千五百十四人，从1932年以来，几乎全部是从各个青年团体中吸收的，在1939年12月间，扩大向退役军人和参加过阜姆战役的军人开放，据报道，到次年3月底为止，已有七十四万多人申请入党。

内阁改组以后，允许有稍微多一点公开表达意见的自由，反犹的法律执行得比较宽大，报纸上开始比较全面和更客观地报道国际形势和国内困难的消息，虽然还没有达到把优先采用德国方面的材料一反而为优先采用盟国的材料。评论外交事务的文章仍然罕见，而且语调是克制的，只是偶尔有几篇授意写的文章，以对意大利有特殊利害关系的内容为主题。

墨索里尼曾对他的陆军部和空军部的副大臣表示不满，因为这两人谄媚地向他作出许多保证，结果却办不到，他改组了总司令部，留任巴多里奥元帅为参谋总长，把帕里亚尼的权力分给索杜将军和鲁道弗·格拉齐亚尼元帅，由索杜担任副大臣，格拉齐亚尼担任陆军参谋长，这一搭配后来证明是最不协调的。仿佛要弥补失去的时间似的，在9月底以前，就拨给三军一笔一百七十四亿七千六百万里拉的款项。10月间，把在危机时期征召服役的四个年度的士兵复员了两个年度，从12月1日起，又批准了第三个年度的士兵的假期，使实际入伍的人数减少到八十六万六千人；但是，与此同时，陆军却补充了没有军衔的军官和技术人员，并继续推行它的那项有迫切需要的炮兵计划。海军有许多潜水艇和“伊姆佩罗”号主力舰下水，并且能够在意大利参战以前再造好两艘主力舰——“维托里奥·威尼托”号将于1940年4月建成，“利特里奥”号于5月建成。制订了计划，要使飞机生产成倍增长。与此同时，又非常优先地考虑了巩固北方边界（勃伦纳山口和东北方通往德国的各个隘口也不例外），构筑“利特里奥的阿尔卑斯壁垒”。

（二）经济

法西斯政府的经济政策比以往甚至更积极地致力于开发本国的资源和工业，诸如褐煤、铝、水力发电、造船、炼油、冶金、化学制品、人造纤维。未来的产钢计划每年要增加二百五十万吨至四百万吨，在战争爆发以后，这

个数字又提高为约五百万吨；与此同时，又拨出了大宗款项（似乎要强调政府的和平意图），用于公共工程（由利比亚和阿尔巴尼亚共同参与），用于开垦荒地和一项范围有限的在西两里岛实行土地改革的计划，用于在罗马建筑住房，用于举办墨索里尼切望举办的 1942 年展览会；而 10 月 28 日波梅齐亚新城的落成典礼，则标志了开垦蓬廷沼泽地的大功告成。

意大利政府在渴望建立起谷类、油料作物、肉类、木材、纤维素、棉花、橡胶、铜、石油、废钢和其他进口商品的供应时，完全改变了先前依靠限制进口来节约使用日益减少的外汇储备的政策。例如，意大利在战争的头六个月中就从美国进口了价值五千二百七十七万美元的货物，几乎相当于 1938 年全年进口总值的六分之五。一面又作出努力去夺取英、法、德已撤出的巴尔干和拉丁美洲市场。意大利政府缔结了一系列协定，以增加意大利同法因、巴西、保加利亚、芬兰、荷兰、葡萄牙、罗马尼亚、西班牙、瑞典、土耳其和南斯拉夫的贸易。它同匈牙利和南斯拉夫订立了三边结算协定，并开始以美国棉花供应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按照意大利人的看法，纺织品出口最方便，但是，对方十分需要的却是工程材料、机器、船只和战争物资。同希腊所订的一项六亿里拉的飞机合同，只是因为意大利外贸与通货部坚持全部要以可流通的货币支付，而不同意部分以实物支付，才在最后一分钟告吹了。荷兰及大多数斯堪的纳维亚和巴尔干国家都在购买，或试图要购买意大利的船只和飞机，直到意军总司令部乃至一般的百姓都开始抱怨，说拨作出口的东西太多了。还有人建议，在某些情况下，为了支付意大利 218 进口的货款，意大利的承包商应到出口这些货物的国家去承包公共工程。后来在 1940 年 8 月，果然同罗马尼亚签订了一项这种性质的协定。

运输也提供了盈利的机会。意大利在横渡大西洋的航运中享有特权的地位，许多流落在西半球束手无策的旅行者，都是出了应急票价，坐意大利的班船被遣返回国的。货运的收入也赚到了可以自由流通的货币，尽管因为需要保留舱位供给意大利自己进口货物的缘故，这笔收入是有限的。1939 年 9 月，意大利大陆航空公司（LATI）

新开辟了到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的航线，两个月后，又开辟了横渡南大西洋至里约热内卢的航线。意大利的铁路和港口，也由于中立国的船运从北方的各港口转移到地中海而得到了好处。

但是，尽管为意大利的商品索取了高价，尽管定出了许多办法来鼓励出口商人，乃至最后答应他们除津贴外另发百分之二十奖金，尽管从汇款中和从隐藏在国外的资金财产中竭尽所能地榨取了外汇，意大利银行的储备仍然从 1939 年 1 月 1 日的三十六亿三千四百万里拉减少到 1940 年 3 月 31 日的二十六亿零一百万里拉。当年的国际收支差额预计显然将有四十亿里拉的赤字，但是甚至在那时，仍然向国外订购了大宗货物。

在国内，意大利人起先吃到的苦头，主要是由于生活费用的上涨，而不是由于 9 月间实行的对消费品的不十分严格的限制，不是由于从 2 月份起实行的对咖啡和糖的定量供应，也不是由于真正的商品匮乏，除了新年期间缺煤以外。政府似乎在煞费苦心地平息不满的情绪。它不仅试图控制物价和镇压投机活动，而且扩大了对工人家属的社会福利津贴的范围，最后并下令增加工资，从 3 月起，从事农业、商业、工业的工人工资增加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五，从 4 月 1 日起，政府雇员的工资增加百分之十。政府的开支达到了空前的数目，预算从 1930—1931 年度起就从来平衡过。1939—1940 年度，

出现了将近六十亿里拉的赤字，1940—1941 年度估计也有同样的赤字，常规预算以外的开支还不计在内，在 1939—1940 年度，这笔开支总数达二百亿里拉。为了弥补亏空，政府征收 219 了资本税和非常不得人心的营业税，发行了面值一百六十亿里拉的五厘息的财政公债，并向意大利银行求援。总的经济景象是活动不稳定和紧张程度增加，意味深长的是，证券交易所的繁荣在 1939 年 11 月底达到了顶点，此后证券的价格就趋向于下跌。

第三节 介于盟国和德国之间的意大利

从一开始，英、法两国政府就极其重视使意大利不参战，并且如果可能的话，诱使它走向真正的中立。张伯伦仍然希望（象他在 9 月 13 日写给不久以前担任驻伦敦大使的格朗迪伯爵的信中所说的那样）意大利人民、意大利国王和意大利教会发挥其影响。据说，有些年纪较轻的法国军事领袖曾要法国向意大利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意大利宣布是站在盟国一边，还是使其舰队保持中立。

可是，法国的内阁和总司令部的做法却不同。在 1939 年 8 月 23 日的作战会议上，甘末林和达尔朗极力主张，必须使意大利保持绝对的中立，甘末林指出，在当年的那个时候，要对意大利发动决定性的进攻是不可能的。来自意大利的威胁，在盟国的战略上留下了痕迹，这种痕迹表现在下面几点上：决定不攻打西壁防线；欧战一开始时英国的航运暂时改道不走地中海；法国在阿尔卑斯山区驻扎了十个法国师的兵力，在北非驻扎了十四个师，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却只分别驻扎了九个师和四个师。

意大利的不交战，使得法国方面能把这些军队调走一些，但是意大利在 1940 年 4 月和 5 月间走向交战前的状态，以及盟国随之而需要保留一些军舰，尤其是用于地中海的驱逐舰，据说曾经起了作用，使英国决定不攻打特隆赫姆峡湾，也使盟国决定撤离纳尔维克。

盟国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方式讨好意大利。英、法两国政府表示了欣赏墨索里尼为和平而作的努力，希望进一步合作；它们答应避免发生可能妨碍相互关系的事件；它们甚至宣称毫无意图要强迫他决定赞成这一方或那一方。它们提出，意大利可以扮演一个它乐意担任的角色，成为一个“伟大而友好的国家”，成为欧洲理事会的一个理事国，成为一支在巴尔干与德、俄两国抗衡的力量，在那里，不经意大利的同意，盟国将决不动用魏刚的近东军团。盟国一面又在经济上予以诱导；它们在北非实行的一些反对意大利的措施（诸如征用汽车和限制使用银行存款），在齐亚诺于 9 月 5 日发出怨言以后，立刻就取消了。可是，在突尼斯、苏伊士、吉布提等问题上，却没有作出让步；是否要就这些问题举行谈判，完全由意大利来决定；这就难怪，对于盟国的这些友好的表示，意大利有这样的反应，即齐亚诺在同弗朗索瓦-蓬塞的谈话中，曾将其简洁地概括为：战胜就是最好的宣传。

另一方面，几个月来，德国人除了要得到意大利的一些好感外，很少在它身上浪费时间或精力。固然，希特勒 9 月 3 日致墨索里尼的信一开头就以庄重的语调宣称，命运终于将把他们两个国家结合在一起；接着又感谢墨索里尼在过去给予的支持，并恳求他在将来继续给予支持。但是，象希特勒 9 月 1 日在德国国会演说和 18 日在但泽演说时给予这位意大利“领袖”的那种公开的恭维，只不过是表面应酬，而且在但泽演说时他提到德国作出重大牺牲放弃了对南方的领土要求，却又把这些恭维话的味道冲淡了。希特勒也从没有采纳墨索里尼的建议，公布 9 月 1 日的电报，否认有什么要求意大利支

援的需要。

意大利在 1939 年 8 月使自己不受与德国结盟的约束这一行动，更加不受纳粹党人的欢迎，因为他们认为（应当指出，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意大利人已预先告诉英国人，德国人将要干什么，从而鼓励英国人最后承担义务与波兰结成同盟；而在纳粹党人的眼中，意大利的主要价值却是在外交上起一种平衡的作用，以产生与上述情况恰恰相反的效果。希特勒对他和墨索里尼的私交所存在的浪漫幻想仍未减少，对于轴心国的“遭受破坏”，他归罪于齐亚诺和意大利驻柏林的大使阿托利科，归罪于意大利的将领，归罪于萨伏依王室，他怀疑后者一直是意大利与英国通讯联络的渠道。至于意大利人民对轴心国的态度，他从来没有抱过幻想。希特勒对意大利的参战究竟重视到什么程度，有关的证据是零碎分散而又有点相互矛盾的。据雷德尔海军上将说（他本人极力赞成意大利参战），希特勒是希望意大利介入战争的，因为，既然德国在自己的造船计划尚未完成以前便进行了战争，而意大利的海军却拥有许多潜水艇，这就会特别有用。然而，在其他时候，希特勒却会怀疑，甚至他的亲密伙伴墨索里尼也可能只打算同法国作战，而到了需要集中所有这些非常宝贵的潜水艇未对付英国的时候，他却可能单独缔结和约。希特勒也认识到，意大利不能应付一场长期的战争，如果它保持不交战的活，德国的资源反而可以消耗得少些；同时，要想意大利在德国发动西线攻势得胜以前就参战，未免期望过高，虽然，在西线战役的后期，意大利的帮助可能是有用的。不过，由于希特勒希望在 1939 年 10 月中或 11 月发动这次攻势，因此相隔的时间大概不会长久。同时，意大利已同意在毗连法国的边界上集结军队，派工人到德国，并在宣传工作上给予帮助。希特勒还指望利用意大利作为一支遏制南斯拉夫的力量，并将利用它对巴尔干的野心，一面煽动它反对盟国，一面阻挠盟国自己接近巴尔干诸国，而他自己却仍然能完全不受约束，何时想挫败意大利的这些野心，何时就可以这样做。

与此同时，墨索里尼仿佛急于要充分利用剩余下来的玩弄花招的机会似的，在整个 9 月间一直企图召开一次由意大利主持的全体会议。法西斯党对国内和国外的宣传，反复建议用这种方法来结束这一场被称为无意义的斗争，并抢在西线战事发生之前采取行动。意大利并向英、法两国政府进行了更直接的接触，但是没有得到反应。墨索里尼并不灰心，他在 21 日以在《意大利人民报》发表社论的方式，答复了张伯伦在 9 月 13 日给格朗迪的信，建议在“合法的”国境线之内“重建”波兰（上一年他也曾为捷克斯洛伐克的事建议过大体相同的解决办法）。并警告民主国家的领袖，对于正面攻击西壁防线，他们本国的同胞可能另有自己的看法。他在 9 月 23 日向波伦亚的法西斯党高级干部演说时论证说，盟国既然默许俄国侵略波兰，在道义上就没有理由继续同德国作战，而且，尽管英、法报纸上半官方地拒绝了他的建议，尽管德、苏瓜分了波兰，意大利在 9 月底仍然鼓吹妥协和解。

下一个提议来自德国方面。里宾特洛甫对于自己在 9 月的早些时候第二次去莫斯科一事，一直对意大利人瞞得紧紧的，以致他们只是从报上才开始知道德—苏协定的条款；可是，他一回到柏林，就突然提议立即举行希特勒—墨索里尼会谈或里宾特洛甫—齐亚诺会谈。墨索里尼认为派齐亚诺去比较不失面子。齐亚诺到柏林时，受到了对方，尤其是里宾特洛甫有些冷淡的、屈尊俯就的接待，里宾特洛甫这时正十分沉湎在对苏联的热情中。

在他们于 10 月 1 日会谈时，希特勒详细地评论了军事形势。他大谈

特谈德国势不可当，一定战胜，他暗示，马其诺防线并非坚不可摧。他对意大利不参战表示遗憾，希望它能介入，但是并不着急（据齐亚诺说）。他详细他讲了他同苏联和解的永久性和彼此因和解而获得的利益，详细他说明了他即将提出的“和平建议”，但是他既没有邀请意大利参与此事，也没有邀请它参与德、苏弃嫌修好的事。

可是，柏林方面在齐亚诺到达的当天向外国报界发表的公报，却象 8 月间已在萨尔斯堡所做过的那样，力图从轴心国的团结中获取政治资本。举行一次七国会议的谣言，在柏林也在罗马流传了一两天，劳合·乔治 10 月 3 日在英国下院提到此事时，也不无赞同之意，但接着英、法两国却预先通知意大利政府，希特勒的建议除非能符合盟国的作战宗旨，否则决无被接受的可能。总之，同意大利当初宣称自己决不首先采取军事行动时的劲头相比，在这个阶段中进行的所有这些和平试探，都是含糊的和半心半意的。

第四节同欧洲各中立国的关系

墨索里尼在这个时期的另一个计划，是由意大利组织和领导一个由中立国组成的经济和政治集团，其中包括巴尔干国家，也许还包括西班牙在内。早在 9 月初，就已发出暗示；到该月晚些时候，据悉德国方面对这个计划不会反对。希特勒于 10 月 1 日在柏林会见齐亚诺时，认为这个计划是对盟国宣传的一种反击而予以欢迎，接着又表示要意大利担任盟主，来领导濒临地中海和亚得里亚海的所有巴尔干国家——这个定义如果是暗指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不包括在意大利的势力范围之内的话，就标志着德国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要求。

（一）西班牙 224

德国方面在 10 月 1 日齐亚诺访问柏林之际发表的公报中，赞许地提到了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合作，的确，这种合作将使德国有宝贵的机会来避开封锁。与此同时，意大利的发言人重提旧事，企图不但组成一个“竖”的轴心，而且创立一个“横”的轴心，他们直截了当地强烈要求西班牙联合行动起来反对马克思主义，恢复和平，使地中海成为一个拉丁人的海，一面又煽动西班牙觊觎直布罗陀和非洲的野心。

但是，佛朗哥将军仍一如既往，没有被引诱参加同盟。甚至经济上的合作也进展得很缓慢。1940 年 3 月 28 日，签订了一项空运协定，但是主要的谈判却在英国人完成了他们与西班牙的谈判以后又拖拉了将近三个月，使意大利人大为恼怒。这些协定终于在 5 月 8 日签订，内容包括贸易和支付，意大利参与西班牙在经济上的改建（这项工作从未获得多少成果），由于内战而冻结的商业债款以及国民党政府本身欠意大利的内战债务等项。

最后这一项非常可能是拖延谈判的主要原因。意大利这时同意对方只还五十亿里拉（合五千五百五十五万英镑），从 1942 年起分二十五期偿还，尽管据说实际的债务是七十亿，尽管墨索里尼先前曾特别下过决心，要把意大利花掉的钱全部收回。据说，意大利原先的计划，是要求债款的三分之一以外汇偿还，三分之一以原料偿还，另有三分之一转为长期借款，以四厘半的利率计息。

（二）巴尔干诸国

在地中海的另一端，东南欧的报纸上登出了大批提到中立国集团的文章。同时，意大利政府的政策有了明确的改变，也是显而易见的。意大利政府这时热烈地鼓励罗马尼亚顶住苏联的压力（与德国当时的态度显然不同），

并在与希腊和土耳其有关的问题上，暂时大大地收敛了咄咄逼人的气焰。据说，意大利已减少了在多德卡尼斯群岛的驻军，而它对 1939 年 10 月 19 日的英—

法—土条约的反应，也不象人们可能预料的那样直言无讳地表示反对。法国保证，这个新条约并非针对意大利，同 1928 年 5 月 30 日的意—土条约也不矛盾，这一点可能对意大利的态度产生了影响，同时，这个条约作为防御苏联的一道屏障对意大利所起的积极作用，也可能得到了它的欣赏。它在这时作出了一些友好的姿态，其中包括允许土耳其船只在罗得岛停靠。11 月初，土耳其的报纸暗示，将与意大利就互不侵犯的事举行谈判，但是同时也要求意大利明确地证明其善意，作为言归于好的必要条件。

存在于意大利和希腊之间的紧张关系也缓和了下来，这是由于得到希腊首相兼外交大臣梅塔克萨斯将军不遗余力的帮助，据说他在意大利宣布不交战状态后，几乎立刻便同意大利接触。墨索里尼把他的驻雅典公使格拉齐召回国去述职，9 月 11 日，他向格拉齐口授了一份照会，申明他允诺，意大利即使参加战争，也决不会攻击希腊；宣布将下令要意大利军队从希腊—阿尔巴尼亚边界后撤二十公里的距离；他并不排除有可能谈判一项协定，以取代 1929 年 5 月 23 日的友好条约，这个条约将于 9 月 30 日满期。9 月 15 日，商谈在雅典开始。20 日，两国政府发表了内容完全相同的声明，宣布撤回它们的军队，详述了两国的友谊和相互的信任，这将继续促进两国的关系。梅塔克萨斯想要保持中立的愿望，加上希腊对土耳其承担的义务，妨碍了缔结一项新的、长期的希—意条约，但是不久就达成协议，发表一个临时声明，宣称双方将维持 1923 年条约中所规定的友好合作原则。由此而发出的照会，其日期是 9 月 30 日，但是直到 10 月 28 日方才互换，11 月 3 日公布。9 月 30 日，梅塔克萨斯告诉意大利驻雅典公使，他正在把新近动员的希腊军队复员，并指示希腊报纸对意大利采用友好的语气。墨索里尼仿佛要进一步证实意大利方面友好谅解的意向，把那个众所周知的反对希腊的古佐尼将军从阿尔巴尼亚军区召回；又指示继任他的杰洛索将军，制订单纯对付南斯拉夫的计划。

墨索里尼和齐亚诺确实毫不放弃把克罗地亚变为另一个阿尔巴尼亚的希望。他们认为，德国人无论怎样不愿意，对此事也只好装聋作哑，而盟国由于看到又一道防御德国的屏障树立起来，则可能予以默认。9 月初，墨索里尼给齐亚诺十万瑞士法郎，对这项计划进行宣传，当年晚些时候，意大利受到指责，说它在达尔马提亚煽动工潮并向达尔马提亚和斯洛文尼亚私运武器。最后，在 1940 年 1 月 23 日，齐亚诺同主张克罗地亚独立的领袖安特·帕韦利奇会晤，以策划主要的阴谋。

意大利要建立一个巴尔干集团的计划，除了要调解组成巴尔干协约国各成员国与保加利亚和匈牙利之间的纠纷这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以外，还有其本身的特殊困难。意大利对于希腊、罗马尼亚、土耳其同西方国家的关系是怀疑的，而意大利自己的意图同样也受到巴尔干于各国政府的怀疑。此外，还有如何在主要交战国之一的主持下，把各个中立国家组合起来的难题。到 11 月初，意大利政府显然正在对这个集团失去兴趣；当罗马尼亚政府要求它带头组织这个集团时，它竟拒绝这样做。

第五节 意大利、苏联和东欧

重点这时转移到了意大利如何保护一个个东欧国家来对付苏联的问题。

意大利同苏联的关系在秋季已经 227 恶化了；确实，齐亚诺自称他曾不遗余力使这种关系恶化，部分原因是他希望造成同德国的不和。报纸上，尤其是在反德的《帕达诺邮报》上，不时发表怀有故意的文章，其中引人注目的一个例子是流露出墨索里尼对 11 月 6 日的共产国际宣言中某些对意大利的贬词感到不快。可是，德国人却经常不断地在向意大利人证明，他们自己同俄国保持良好关系是有道理的，并且试图通过在罗马进行宣传，来促进意—苏关系的改善。根据里宾特洛甫的报告，到早春时墨索里尼已愿意同俄国言归于好，而舒伦堡（德国驻莫斯科大使）则推测，莫洛托夫可能也欢迎紧张局势得到缓和。

不久以后，公众对于苏联进攻芬兰所表现的真正的义愤，在示威游行中得到了半官方的支持，身穿制服的法西斯党员也参加了游行，这个场合给人以方便，既发泄反俄的感情，又发泄主张干涉和反对德国的感情。新任的苏联大使戈列尔金原定在 12 月 12 日呈递国书，但在 11 日就离开了罗马，齐亚诺也在 28 日召回了意大利驻莫斯科的大使奥古斯托·罗索。报纸上和广播中的敌对行动，继续了几个星期，直到新年。1939 年 2 月 7 日订立的结算协定，彼此心照不宣地继续执行了下去，但是把这个协定展期的谈判，却迟迟不举行，而芬—苏战争一开始，俄国供应意大利的石油也减少了。

齐亚诺在 12 月 16 日向法西斯议院演说时，斩钉截铁地抛弃了组织任何形式的中立国集团的念头，但是（也许因为苏联在芬兰吃败仗而胆壮起来）他重申意大利希望看到东欧维持秩序与和平。不过，要把这些愿望化成实际的行动，可不那么容易。姑且不说意大利作为一个武装的保护者在对付德国或俄国时究竟具有多少价值，另外还存在一个怎样能使意大利的援助到达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问题。在写作本文的时候，还找不出证据来说明南斯拉夫官方对此事的态度，但是，据说克罗地亚的领袖马切克曾告诉意大利政府，他的同胞不会让意大利军队过境。

意大利支援芬兰的经过，把德—意—苏关系中的一 228 些古怪的、错综复杂的倾向暴露了出来。甚至在芬兰公使于 12 月 8 日要求意大利输送武器和派遣特种军队以前，就有大约二十五架芬兰已经定购的意大利飞机运到了赫尔辛基。隔了几天，在据说莫洛托夫就德国供应芬兰武器事向舒伦堡交涉以后不久（他的有些情报就是从齐亚诺本人那里得来的），德国人开始在萨斯尼茨扣押意大利运送的武器，罗马方面发出了怨言，结果只是把这些武器运回意大利，再取道法国发往芬兰。有许多意大利人自愿去芬兰参军，到那里去的大概有三百五十人之多，他们发现自己正同来自法国的反法西斯同胞在并肩服役。不妨附带提一下，意大利政府本身在 12 月间提过正式抗议，认为派遣德国技术专家帮助红军，将在意大利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从而把这种充满矛盾的局面推到了顶点。

齐亚诺 12 月 16 日提到巴尔干以后，产生了反响。24 日，法国驻罗马大使弗朗索瓦-蓬塞暗示，有可能达成一项法—意协定，在巴尔干进行干涉以对付德国或俄国，同时意大利作出保证，允许其动用（上文曾提到过的）魏刚的近东军团。他还说，盟国承认意大利在巴尔干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齐亚诺虽然小心翼翼不使自己承担义务，却比 9 月间的反应好。大约在这个时候，卡罗尔国王派遣安东尼斯库元帅来询问，如果俄国人侵略罗马尼亚，意大利政府将怎么办，一面要求意大利政府劝告布达佩斯方面采取节制的态度，否则来自匈牙利的威胁，将迫使罗马尼亚向俄国屈服。齐亚诺在 12 月

26日再次同安东尼斯库会见时，答应如果罗马尼亚奋起抵抗俄国的进攻，意大利将全力给予援助；他还同意向匈牙利交涉，如果罗马尼亚能够出一份力来实现谅解的话。据说，齐亚诺在1940年1月10日曾给予罗马尼亚公使甚至更为有力的保证。

齐亚诺安排了同匈牙利外交大臣恰基于1940年1月22—27日在威尼斯会见，并发现恰基十分愿意保证不向罗马尼亚进攻，但是在特兰西瓦尼亚问题上却依旧不肯让步。在谈及一旦苏联发动进攻，意大利就派遣军队到匈牙利这一问题时，齐亚诺坦率地表明，除非过境的问题能够解决，否则无法派兵。对于克罗地亚究竟应该受意大利控制还是受匈牙利控制，齐亚诺和恰基的看法也不一致。在此后两个月左右的时间里，这出由意大利来保护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滑稽戏继续以人们熟悉的方式演下去，甚至提出进一步的建议，要成立一个意—匈王朝的联盟。意大利一面告诫匈牙利不要挑起冲突，一面向罗马尼亚人派出空军教官，并为他们建造军舰。罗马尼亚政府充分利用了意大利人的友谊。卡罗尔国王在1941年3月7日的演说中大谈特谈这种友谊，青年领袖西代罗维奇在访问罗马以后，甚至在罗马尼亚参议院中宣布，墨索里尼已答应给予支持，来反对不管哪一个敌人，但这句话在官方的记录中被删掉了。与此同时，罗马尼亚政府与意大利却在石油问题上拼命讨价还价，并削减了供应的数量。

第六节 1939—1940年之交

到1939年底，纳粹—法西斯党的团结似乎下降到最低点。固然，意大利一直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违反中立的原则为德国效劳。齐亚诺承认，他经常在一些次要的要求上让步，据说是希望这样做了以后，一旦关键的时刻来到，他就能对最大的要求加以抵制。德国得到意大利的帮助而避开了盟国的封锁；斯蒂法尼通讯社经常向中立国的报界，特别是向西班牙和东南欧的报界，提供有倾向性的资料；在波尔萨诺强迫降落的德国飞行员都被追返回国。但是，意大利政府拒绝提供有关盟国护航的情报，对于德国方面再三要求它允许把德国的潜水艇调往地中海，也不予同意。它还指示驻柏林的大使馆（应当指出，这是值得赞扬的），对波兰人和犹太人要尽量放手给予签证和发给入境许可证，发给波兰人的签证，直到1940年5月20日方才中止。意大利没有撤销对波兰流亡政府的承认，意大利的领事官员甚至在12月30日里宾特洛甫要求他们撤走时，仍继续留在波兰，直到最后，在里宾特洛甫于1940年3月去罗马后，意大利政府接到通知，限一星期内将它留在各领事馆和驻华沙大使馆的所有官员撤走。德国人在波兰的暴行使意大利人毛骨悚然。墨索里尼本人看到一份报告后也大为震惊，他命令把这份报告私下传给法国和美国的报界。

德国政府方面，则在齐亚诺访问柏林之后，对意大利冷淡了几个星期。德国人对自己的外交和军事计划的讳莫如深，越来越令人费解。在希特勒于1939年10月6日在德国国会发表的演说中，意大利只受到几句恭维。

德国的舆论仍然瞧不起意大利，而里宾特洛甫、戈林和其他人则继续不断地激怒意大利人，硬说正是意大利人避不参战，使英国参了战。意大利被断然地指责为过分偏袒盟国，而意大利对芬兰的态度、对南蒂罗尔公民投票的态度、对经济事务的态度，都助长了彼此的摩擦。12月间，德国又重新向意大利表示友好。纳粹党劳工阵线的领导人莱博士奉派到罗马，发给他的指示中要他说明的此行的理由，大致和希特勒在10月1日所说的理由相同（可

是齐亚诺却从他口中套出许多惊人的消息，涉及德国对俄国和对低地国家的意图)。国家元首党卫队队长希姆莱在 12 月 21 日同墨索里尼的会晤，可能更有效果，但是不久以后，墨索里尼出乎意料地获得一个不愉快的消息，说有一个普菲茨纳教授——布拉格的副市长 231 长——在一次公开的讲演中，曾要求把的里雅斯特、进入地中海的通道和整个波河流域划归德国。他的第一个反应，是命令齐亚诺把他所知道的一星半点有关德国侵略比利时和荷兰的计划告诉这两国政府，并把有关这次讲演（讲演中也提到了苏联）的报告抄一份送给苏联驻巴黎的大使馆。

尽管同德国有这些纠葛，墨索里尼不改初衷，依然不愿与盟国合作。对于英国仍在向他作出的任何友好的表示，甚至对于英国在 10 月间事实上承认阿尔巴尼亚并入意大利，他都无动于衷。当丘吉尔在 11 月 12 日的广播中提到意大利同英、法两国在地中海的伙伴关系时，墨索里尼的代言人加伊达（《意大利日报》的编辑）加以反驳，他说意大利要求的是“平等待遇”而非伙伴关系，并提醒丘吉尔，“法西斯意大利的政策是由一个人独自制订的”。意大利同法国的关系，在官方虽陷入僵局，在半官方却密切得远远超过了有利于法国作战努力的程度。赖伐尔和法国的几个部长如德·蒙齐、弗朗丹、博仕安都参加了这件事，而意大利的宣传和阴谋则对有些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些人由于害怕布尔什维主义的缘故，不把自己的精力用于同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作战。在 3 月 25 日雷诺与意大利驻巴黎大使瓜里利亚谈话这样一个正式的场合中，竟然暗示，意大利的真正敌人是英国而不是法国。但是另一方面，法国人与那些有势力的、被认为是反对介入战争的意大利人士的接触，似乎产生了不幸的结果，促使法国人去轻信意大利的意图。

遭到封锁以后，墨索里尼又有新的理由来埋怨盟国。另外，在他看来，盟国在走向全面胜利的路上丝毫没有取得进展，而他认为，盟国唯有取得进展，才有可能鼓励意大利同德国分道扬镳。因此，这就毫不令人奇怪，在这时发表的两个说明意大利政策的最主要的文件，即 12 月 7 日的最高会议公报和齐亚诺于 16 日在法西斯议院的演说，都重申了意大利的武装不交战的立场和愿意充当调停人的态度；重新说明了意大利对巴尔干的政策；并且着重地强调了意大利有权保卫自己的海、陆、空交通的自由。同时值得注意的是，齐亚诺在直言不讳地批评德国于 1939 年夏季对其盟国的态度时，突然停住不说下去，对这个同盟本身的价值未作批评。

意大利的国王和王后在 12 月 21 日对梵蒂冈的访问，以及教皇在 28 日对意大利政府的回访，使人们希望教皇、国王和墨索里尼也许会联合起来为和平而努力；没有什么将比这个消息更受意大利人民欢迎的了。不过，罗马方面的下一个和平行动却是墨索里尼独自采取的。他发给希特勒一篇新年贺词，祝他们两国人民同心协力实现其目标，其后，又在 1 月 3 日的一封长信中，向希特勒提出了虽很中肯但非对方需要的忠告。他在信中警告希特勒，美国决不会听任西欧的民主国家完全被征服，他甚至不敢断定，如果不付出与所要达到的目标根本不相称的重大牺牲，是否能迫使这些国家屈服；事实上（墨索里尼暗示），所有交跋的国家经过这场斗争之后可能都成了战败者：德、苏的缔结协定和德国对待波兰人的态度，正在为盟国向意大利和西班牙展开的宣传帮忙，墨索里尼劝告希特勒，不要为了攫取一个马上就要自己落下的果实，而拿他已经赢得的一切胜利去冒险，劝他不要再把波兰人当奴隶，而是要在德国人的主持下成立一个波兰国家，劝他放弃对西方的一切要求，

并劝他否认有在西线发动进攻的任何意图。这样，盟国就没有理由继续战争了。墨索里尼特别恳求希特勒不要抛弃掉已经高举了二十年的反对犹太人和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旗帜，要希特勒只到俄国去寻找他的生存空间。他答应希特勒，一等到他的军事支援能为德国减轻负担而不是增加负担时，就立刻给予这种支援，但是，他也强调了意大利作为一个非交战国所起的作用，以及它无力进行长期战争的情况。

墨索里尼的信并没有消除掉齐亚诺 12 月 16 日的演 233 说在德国所造成的不满。希特勒接到此信时表面上虽然平心静气，私底下却对他这位朋友的胆小怕事严同谴责。纳粹党的领袖们似乎真正地怀疑墨索里尼在与盟国勾结起来行动；甚至怀疑他被战争物资的订货合同引诱得脱离了轴心国，或是由于嫉妒和畏惧苏联而被逼走。希特勒答应给墨索里尼的复信拖延了很久，但是在此期间，他本人和戈林、里宾特洛甫，甚至还有戈培尔，分别盘问和教训了意大利的外交官员。他们轮流地试图诱使这些官员作出一些让步，同意介入战争；他们再度向这些官员保证德国对俄国的态度（甚至到了坚持说这种合作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的地步）；他们坚决认为，盟国决心要毁灭德国，而使和平谈判无法举行；他们夸口说，他们的春季攻势将横扫法国一直打到阿尔卑斯山；他们指责意大利在 1939 年 8 月畏怯退缩，指责它以武器供给盟国。在纳粹党的领袖中，对意大利最怀疑也最仇视的似乎是戈林。到 2 月底，德国人除了表现出渴望知道意大利的意图以外，还突然开始以不同的程度公开暗示，意大利实际上应当介入；显然他们担心，由于萨姆纳·韦尔斯的出访而可能产生的任何一种由美国提出的和平行动，墨索里尼都会紧紧附和。他们暗示，意大利和德国应当预先商定，对这样一种行动将作出怎样的反应，并且暗示，必须在柏林作出最后决定；尽管甚至到这时候，另有一些德国外交官员和军人仍然希望，萨姆纳·韦尔斯使团可能导致意大利、美国和梵蒂冈方面成功地采取行动。

里宾特洛甫的担心是没有根据的。萨姆纳·韦尔斯在 2 月 28 日同齐亚诺和墨索里尼会谈的结果，是墨索里尼对韦尔斯所提出的缔结一项通商条约的建议，稍稍作出有意接受的样子，但是墨索里尼坚决支持希特勒在 1939 年 10 月提出的媾和条件，并且说，意大利的要求必须得到满足。他也使萨姆纳·韦尔斯毫不怀疑他对英国 234 人的怨恨之情。的确，在过去的一两个月里，意大利使得自己不仅在德国的眼中，而且也在西方国家的眼中，变得越来越可疑。在它的一些反对西方国家的姿态中，包括内阁在 1940 年 1 月 20—23 日批准各项军事措施；报纸上刊登主张收复失地和反对法国的文章；穆蒂将军（这时担任法西斯党的书记）在 1 月 17 日对法西斯官员发表演说；以及墨索里尼在黑衫队成立周年纪念日发表演说。对此，无论是英国大使洛雷因以及弗朗索瓦-蓬塞提出的正式抗议，还是哈利法克斯另外发给齐亚诺的私人信，都没有收到任何效果；到 3 月初，丘吉尔下令与法国共同制定计划，在地中海重新集结军舰，尽管他还没有肯定地料到会在那里出事。

第七节对封锁的反应以及同各交战国的经济关系

经济上的倾轧是意大利同盟国疏远的原因之一。从一开始，意大利政府似乎便表明，如果要它在东南欧和地中海作为一支稳定局势的力量，那就必须给它某种形式的经济援助。盟国给予它的一种鼓励，便是向意大利的厂商

大批订货。1939年9月12日签订的圣雷莫协定，是瞒着德国的，为法国在意大利购买机床、炸药、飞机、飞机发动机以及纺织品、军装、长统靴开了方便之门。9月20日，齐亚诺同意举行意—法商务谈判。英国政府则购买了各种各样的军用设备，包括军眼、长统靴和毯子。两个盟国开头都以原料来支付定货的款项。

1939年10月27日的英—意协定，规定设立一个联合常务委员会，来考虑进行经济合作的方法。

德国政府对意大利运货给盟国屡次提出抗议。在235此期间，意—德之间的贸易本身却进行得不十分顺利。从9月份的第一个星期起，德国的政策是把那些对德国自己的作战努力极为重要的产品停止向意大利出口，并利用意大利的中立地位（这种地位是由盟国在制订封锁政策时经过仔细考虑后予以承认的），要它换船转运这时因受到封锁而不能从其他中立国家进口的重要原料。德国外交部经济处的克洛迪乌斯，立刻被派到罗马去执行这些政策。意大利人曾提出过抗议，认为他们的船只只在通过封锁线时要遭受到危险，可是，在压力之下，他们只好答应合作。这种安排必然是不公平的，但是，对意大利更为严重不利的却是，德国交付的煤减少了。⁽¹⁰⁾意大利每年需要进口的煤为一千二百万吨至一千三百万吨，⁽¹¹⁾在1935—1936年度以前，英国是它的主要供应者，而在1938年间，它从德国和奥地利进口了七百万吨，从波兰进口了一百六十万吨，从捷克斯洛伐克进口了五十四万吨。其中只有二百五十万吨是陆运的；总之，能用这种方法来运输的数量，受到了通过阿尔卑斯山区铁路运输能力的限制，在战时，更由于提供所需车皮数有困难而受到限制。（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数量多得出乎意外的煤，居然从德国经过瑞士运到了意大利。）因此，供应意大利的煤主要靠海运，而海运这时却似乎受到了盟国封锁的威胁。里宾特洛甫在11月27日曾指示马肯森向意大利人建议用海军为运煤船护航，但是由于战略上的原因又匆匆撤销了这个指示。不管怎样，意大利人是不愿意拿他们的船去冒风险的，不料结果竟会得到盟国同意，让他们用自己的货轮到鹿特丹去装运德国的煤，直到1910年2月底此项让步由于英—意贸易谈判破裂而被撤销为止。

236德国人在1940年1—2月间借每年举行谈判以延长贸易协定期限的机会，要求意大利供应更多的铜、大麻、水银，甚至还有铁路车辆和机动车辆。他们还想把意大利排挤出巴尔干市场，并想代表那些刚刚自愿返回德国的南蒂罗尔人要求大笔的赔偿。当意大利的谈判代表仅此一次提出某些异议时，墨索里尼亲自出面干涉，要他们同意供给三千五百吨铜（当时意大利人自己连煮菜锅子也在进行登记，以备征收废铜之用），并且下令征收一千五百吨大麻。2月24日，商务协定在罗马签订（“第四号秘密议定书”），着重指出德国有艰巨的任务，如果可能的话，应在1940年向意大利供应煤一千二百万吨。

第八节 墨索里尼使意大利承担了介入战争的义务 1940年3月至4月

事情这时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3月10日，里宾特洛甫以两天前的通知到了罗马，带去了对方期待已久的希特勒给墨索里尼1月3日去信的复信。希特勒表明他决心同西方国家打到底，坚持要意大利站在德国一边。里宾特洛甫在10日同墨索里尼和齐亚诺会谈时，详尽地阐述了他的主子的理由，对煤的禁运表示愤慨，并答应每月通过陆运向意大利供应一百万吨德国煤，主

要用德国的卡车装运。他还暗示了其他经济上的好处。

他详细地谈论不可能同德国和意大利的不共戴天的敌人——英、法、美三国的财阀——谈判和平；他说，希特勒自豪他讲过，要在秋季以前打败法军，并把英国人赶出法国。

墨索里尼对这些议论的反应是引人注目的。里宾特洛甫本来只希望能劝阻墨索里尼不要从保守友好的中立转而同民主国家合作，但是连他也感到意外的是，谈到未了，墨索里尼突然承认，希特勒可能完全是正确的，并 237 安排在次日下午再度会见，好让他有时间考虑这些问题。在这第二次会见时，墨索里尼谈到介入战争的问题，把介入的时间从早先历次声明中含糊其词的“日后”，大大地提前到“年内”，因为他谈到，要在 4 月份征召海军后备役军人十五万名，5 月份把常备军增加到二百万人，谈到要号召他本国同胞采取现实主义态度，以争取公众的舆论（不久以后，一等到德国的进攻发给他信号，他就把所有这些计划付诸实施）。使里宾特洛甫显然感到宽慰和满意的是，墨索里尼表明，意大利不是在德国胜利前进的时候介入，便是在它受到很大压力的时候介入（后面这种可能性自然“完全是假设的”）。墨索里尼流露出，他想打一场“并行的战争”来解决意大利自身的问题，一面再三说，他打算除了那些不能用于战争的原料之外，什么也不卖给英国。他为里宾特洛甫在两次会谈中谈到俄国的话大大地改变了初衷，甚至表示愿同俄国恢复关系，只要苏联政府否认对巴尔干有企图就行；他默认德国的观点，觉得芬、苏情和及日、苏言归干好是合乎需要的。为了再接再厉地扩大这次意料不到的成功，里宾特洛甫当下就安排了墨索里尼与希特勒再度在勃伦纳山口会见，并且暗示，甚至在德国发动攻势以前，意大利通过采取一种更加咄咄逼人的态度，也有可能把盟国的军队从西线引开。

里宾特洛甫在 3 月 11 日对梵蒂冈的访问却不那么成功。当时谣传，他曾请求教皇支持德国的一项和平建议，但是现在似乎并无证据能说明这一点。从报道这次会见的各种消息中，显然可以看出，在讨论国家社会主义同天主教会的关系时，教皇对天主教徒在德国和波兰受到的待遇表示不满，而国务卿马利奥内红衣主教的批评则更开门见山，使里宾特洛甫几乎在会见的中途退席。

勃伦纳山口的会见起初打算在 3 月 19 日以后举行，238 但在里宾特洛甫回到柏林后，却提前到 18 日。正象齐亚诺先前那样，墨索里尼也被希特勒玩弄军事统计数字哄骗得目眩神迷，他答应，一俟德国的进攻造成一个有利的形势，意大利就立刻介入战争。如果德国人推进得不十分迅速，那么他不到关键的时刻就不采取行动。希特勒接受了这个建议，但是附带也警告对方，不要过早地采取行动。会谈的记录没有透露出任何有关入侵斯堪的纳维亚和低地国家的秘密。保罗·施密特（德国外交部的正式译员）只说起，有过一些不是专门提出的建议，谈到在联合作战时的战略问题，其中也许包括在贝尔福隘口的作战计划。

尽管意大利政府力图给人这样的印象，表示它的态度仍然不变，但是在罗马和勃伦纳的会谈确实标志了一个真正的转折点。墨索里尼先前固然考虑过介入战争的可能性，但是当着里宾特洛甫或希特勒的面，他却从来没有这样明确地表过态。显然，在 1940 年 1 月和 2 月这段时间内，他变得越来越紧张，他在等待着，不是德国发动进攻，就是希特勒对他自己提出的放弃这场进攻的建议作出一些反应。德国人的故意越来越叫人害怕；意大利驻柏林武

官的一份报告，详细地谈到了德国人蔑视“意大利的第二次背叛”，谈到了德国军队热衷于向南进军，但是这份报告产生的效果，可能正同顶料相反。与此同时，盟国的经济压力也使墨索里尼左右为难；他不是必须冒经济崩溃的危险，就是必须向盟国让步，从而立刻引起德国反对，在遇到这种局面时，他总是被迫起而反抗，而不是低头屈服。这件事也许给人们一些暗示来了解他的心情，了解为什么萨姆纳·韦尔斯在2月26日感觉到，墨索里尼正由于某些巨大的烦恼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都受着折磨，而在韦尔斯于3月16日再度访问威尼斯宫时，却不再有这种感觉的缘故了。

不过，墨索里尼仍然假装认为意大利保留着一些行动的自由，他把自己比作一个同意被绞死的人，但是得有条件，要由他自己来选择吊在哪一棵树上被绞死。他甚至想到再度努力劝使希特勒放弃春季攻势。他在3月23日31日的秘密备忘录中慎重地主张，要想通过谈判取得和平，或是盟国要想发动进攻，固然都办不到，而德国要想发动进攻，也未必可能，备忘录建议，意大利的介入战争（尽管是必要的），应当在国家的荣誉所容许的范围内尽量延迟。备忘录也详述了意大利进行一次并行的战争的好处。

法西斯党想假装同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的会谈并未改变意大利的态度，但是不久就因事态发展而真相大白。

“轴心”这个字眼在报纸上绝迹了六个月以后，又重新出现。备战的工作继续进行着，包括国内动员法的颁布，这条法令使政府对平民和对财产的所有权拥有了更广泛的权力。这一趋势并不因为盟国方面新采取了一系列的友好表示而被制止。3月15日，英国财政部的E·W·普莱费尔奉派到罗马，提出了新的经济建议，要把一切战争物资的贸易都排除在外。25日，雷诺（刚接任总理后）专门安排同意大利驻巴黎的大使作了一次会见，告诉后者，意大利在欧洲扩张势力肯定也有利于法国。3月27日，弗朗索瓦-蓬塞作了一个非官方的暗示，说法国可能割让吉布提。但是墨索里尼却象迳流一样，“对这些事概不关心”。当意大利驻伦敦大使馆的法律顾问丁利从张伯伦处带来另一封表示亲善的信件时（齐亚诺说，“这是那些……从一开始就注定得不到答复的信件之一”），墨索里尼关照齐亚诺回答说，意大利将只同意传达那些切实可行的和平建议，否则它就将站在德国一边。

第九节 介入战争：事态的演变使步伐加快 1940年4月至6月

4月9日，墨索里尼一觉醒来，发现德国已在夜间采取了断然的行动。虽然德国军队这次不光采地渡过斯堪的纳维亚领海，事先没有征得墨索里尼的同意，甚至都没有通知他，但是这位“领袖”开头对希特勒的突然袭击仍然非常热心；不过，他迟至11日才答复希特勒（也许他想等着看看，德国人是否能在斯堪的纳维亚站得住脚）。在这封信上以及接着在4月18日和5月2日的两封信上，他大大地表示了一番祝贺，并详述他自己的备战工作进展迅速，以及意大利对盟国的敌意增长。他在4月26日打电话给希特勒，建议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守住纳240尔维克，并建议到该月月底前暂时放松宣传战，这些建议可能反映出他是在怀疑这场仗究竟能打赢到什么程度；但是总的来说，在挪威战役期间，意大利政府的态度变得不再是不交战，而是处于交战前的状态，“交战前”这个字眼在5月8日的一份官方文件中确曾出现过。

重新动员的工作在3月初已经开始，其中包括把冬季休假的三十万人召回，到4月份又进了一步，征召了海军后备役军人，并为陆军征召了更多的

士兵，不过，这仍然不是总动员。军队得到了八十亿里拉的追加拨款，半数用于 1939—1940 年度，半数用于 1940—1941 年度。墨索里尼这时候主要关心的似乎是制造舆论。4 月 21 日，他自己在威尼斯广场向群众演说，并向法西斯党的高级干部讲话，以及 19 日《意大利人民报》发表用意明显的社论之前和之后，都得到了他的尉级军官的支持，在报刊和广播中加强了宣传。法西斯的宣传除了提出一些关于“帝国的命运”、“打破牢笼”、“封锁的窒息”等夸张的口号以外，明显地着重于“正视现实的态度”。它着重宣传了盟国的虚弱，也同样尖锐地提出，是盟国使意大利的雄心壮志受到了挫折。它提醒意大利人：一个伟大的国家要敢于在一场重组欧洲的斗争面前，不是袖手旁观；和事佬除了被斗争的双方狠狠地揍一顿，还能指望有什么更好的下场呢；没有哪个国家单靠标榜中立就能使自己不成为战场。齐亚诺的代言人安萨多（里窝那《电讯报》

的编辑）在 4 月 14 日对军队的广播中甚至宣称，意大利应当“自己吹起号角”，而不要有朝一日在一个晴朗的早晨醒来发现自己已象挪威那样遭到入侵，他在 21 日又宣称，不管别人怎样许诺，意大利唯独依靠军事实力方能跻身于战胜者之列，而战败者则将沦落到中国苦力那样的地步。

1939 年 8 月间支持中立的法西斯领袖们，这时一个个改变立场，加入这一宣传行列，格朗迪（前任驻伦敦大使）于 4 月 27 日在议院发言，博塔伊（教育大臣）在《法西斯评论》的 5 月号上发表文章，齐亚诺本人于 5 月 19 日先后在克雷莫纳（同那个以亲德而闻名的法里纳契一起）

和在米兰的讲话。据齐亚诺自己说，直到 5 月 13 日，他才完全放弃了意大利或许仍能置身于战争之外的希望。

他的《日记》中充满了反德的情绪和对介入战争的忧虑。241 他当时并不讳言自己抱有这种观点，据说墨索里尼曾警告过他，因为这个缘故，他的地位是不牢靠的。至于说要他自动地提出辞呈，这样的事（正象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在法西斯的意大利简直从未有过。因此，在那年早些时候，当巴尔波元帅和意大利国王暗示，他们准备同他一起采取某些行动以阻止介入战争时，齐亚诺就装聋作哑，充耳不闻。

不知是否因为在这件事上没有得到反应的缘故，国王远远不象人们曾经期待他的那样卖力地去防止战争。

他始终对德国有怀疑，也意识到意大利在军事上的软弱，尽管他对发动一场战争以牺牲法国来扩张领土并无顾忌。但是，除了对意大利军队的最高指挥权这个纯粹属于内政问题以外，他是没有能力或是不愿采取行动的。而在这个问题上，虽然意大利一参战，墨索里尼就实现了取得这个指挥权的夙愿，但是国王保留的特权，仍然比原先打算给他的为多。

墨索里尼显然认识到教皇是一个更加难以对付的敌手，教皇在冬季时经常明确地发表他的观点。4 月 10 日，意大利驻梵蒂冈大使指责《罗马观察家报》过多地为和平祈祷和说教。教皇在 4 月 24 日致墨索里尼一封私人信件，为和平辩护，受到了冷遇，5 月 13 日，梵蒂冈又因天主教的报纸以突出的地位登载了教皇发给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三国君主的电文而遭到抗议。庇护教皇回答说，哪怕关集中营也吓他不倒，但是在那个月的晚些时候，他却是在墨索里尼手下遭到了一次丢人的挫折，当时《罗马观察家报》受到法西斯歹徒的阻挠不让发售，只是在它不再刊登引起争论的有关战争的文章以后，方才得到了保护。

4月间，墨索里尼似乎一直在考虑于1940年8月或9月，甚至晚到1941年春天参战。但是在5月13日，他第一次讲到要在一个月之内宣战，18日，他在特伦特向党的高级干部“秘密地”作了一次显然是处于交战前状态的讲话。到这个时候，动员的速度已经加快了——虽然仍旧不引人注目——宣传战也已经加强了。由于这时官方提出遭到了封锁，以及向盟国举行了示威，更为这次宣传战增添了力量。暴徒袭击了盟国的侨民，包括英国大使在内。主张收复失地的人在口号中加上了科西嘉和马耳他，偶尔还加上了达尔马提亚和希腊；他们也没有忘记提出西班牙对丹吉尔和直布罗陀的要求。

墨索里尼仍然没有放弃在东南欧进行一场并行的战争的念头，继续同帕韦利奇策划在克罗地亚煽动叛乱。

在格拉齐亚尼报告了意大利军队可能无限期地被阻挡在南斯拉夫西部以后，墨索里尼想取得成功的希望暂时破灭了，但是在德国于5月10日进攻低地国家时，他最初的反应之一便是把克罗地亚起事的日子定在6月初。齐亚诺建议速战，免得克罗地亚人投向德日。可是在月底以前，就变得必须把军队从东线调往西线，并作出决定，意大利通过在全面战争中取得胜利，能够得到它在克罗地亚所需要的一切，因此，在5月29日作出了尊重南斯拉夫中立的保证。

从4月中旬起，这场神经战就进行得如此紧张，以致南斯拉夫下令进行了部分动员，人们并且担心，希腊和土耳其也有可能卷入，不过这种担心后来没有成为事实。盟国最高会议在4月23日讨论了巴尔干的局势；英国的海运从5月1日起改道不走地中海；据说盟国曾经警告意大利政府，无论以什么借口把意大利军队调动到巴尔干地区，都将被认为是不友好的行动。与此同时，德国人虽然利用巴尔干的恐慌在宣传上获得了胜利，并使人们不去注意德国自己的计划而去注意别的方面，却劝墨索里尼不要在巴尔干冒险行动，以免影响到苏联。墨索里尼在1940年5月30日和6月2日的信中否认了有任何侵略意图，并提出要为此发表一个公开声明，后来果然于6月10日在威尼斯宫发表演说时这样做了。

德闷的宣传预示了德、意、苏三国在巴尔干地区的合作，但是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在3月间那样热情建议的意—苏和解，却进展得很慢。意大利报纸对苏联的敌意减少了一些，但态度决不是友好的；商务谈判在3月间中止了；莫洛托夫3月31日的讲话在意大利反应不佳，直到6月8日，双方才商定，要意、苏两国的大使返回各自的任所。

轴心国关系一个新的阶段开始，给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提供了明显的机会，得以在4月底要求意大利把阿托利科从意大利驻柏林大使馆召回。他的继任者迪诺·阿尔菲那里自上一秋天被免去宣传部的职务以后，一直担任意大利驻梵蒂冈的代表，他对于官场礼仪的浮华和虚荣比对国家的政策更感兴趣，这种人决不会使他在5月18日向之呈交国书的那个政府感到任何不便。

在德国人中间，指望意大利会参战的人不多，满意地期待意大利人做战斗伙伴的人就更少了。甚至在纳粹党的领袖中间也是如此，悲观的人认为德国在胜利的进程结束以前，还是先查明同盟者（不问他人品如何）是否可靠为妙，而比较敢作敢为和乐观的人则根本不愿让意大利分赃。据说，有一些同希特勒非常接近的陆军军官和文官认为，意大利还是继续作为一个非交战国更有些用。阿尔菲那里说，德国方面为要意大利介入战争，同他只进行过

一次官方或半官方的接触，出面的是戈林。

在勃伦纳会谈中，希特勒似乎对合作提出过一个明确的建议：即意军应有几个师参加横渡上莱茵河的攻势，从那里突破贝尔福隘口进入罗纳河流域。据一个德国参谋军官说，德国陆军总司令部（陆总）已开始制订计划，但是从罗马方面却没有再听到什么下文，意军参谋总部在遇到询问时，不承认知道此事；据格拉齐亚尼说，意大利人也拟订过计划，但是被墨索里尼突然放弃了，若不是遭到巴多里奥的反对，就是因为德国人一定要意大利的分遣部队成为德国集团军群的一个部分，而不仅仅是由于要直接受德军最高统帅部指挥的缘故。

里宾特洛甫答应给意大利经济利益的诺言兑了现，244 于 3 月 13 日签订一项协议，增加了德国向意大利出口的煤，根据意大利官方的数字，从 4 月初到 7 月底这段时间内，交付的数量至少有四百十五万吨。就在勃伦纳会见的第二天，戈林又答应每月给意大利可以装备三个炮兵连的八八毫米口径的炮，并表示愿意把尚可使用的七五毫米的斯科达炮全部免费奉送。墨索里尼虽然早就恳求德国人供给这些炮，可是对于这个提议开头却加以拒绝，宣称意大利自己已能制造高质量的九十毫米的炮（真正的困难似乎是陆军副大臣索杖不愿让德国的炮手随炮同来）。在两天之内，墨索里尼改变了两次主意，最后接受了戈林的建议，甚至还要求，在必要的时候，对方应再提供可以装备一百个炮兵连的八八毫米的炮给意大利使用。德国人曾答应在 3 月初交付第一批三个炮兵连的炮，但是无论这批炮也罢，还是盼望已久的机床也罢（为了交付这些机床，戈林在 3 月 28 日又下了新的命令），都没有交到；因为挪威战役使德国人有了借口，要征集大炮和机床供他们自己使用。意大利人不论要从德国弄到什么战争物资都困难得要命，对于德国人开恩答应供给的任何东西，他们都必须用黄金支付。

当德国人认为不妨如此小气地对待意大利的时候，盟国仍然希望，通过对意大利进行大量的诱导工作，也许能扭转局势。普莱费尔逗留在罗马直到 5 月底，讨论了一项结算协定，其内容将包括向意大利造船厂的定货。保管案卷的法官同时又是英一意联合常务委员会主席的威尔弗里德·格林爵士在将近月底时也到了罗马，并且似乎在原则上达成协议，解除了对大部分意大利对外贸易的禁运管制，条件是意大利方面保证不把某些商品重新出口到德国。

盟国方面，尤其是法国，还在试用别的绥靖方法。法国国民议会外交委员会和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在 4 月 21 日召开联席会议以后发表了公报，声明法国依然愿意同意大利谈判。第二天，雷诺在法国政界中的亲意派不断施加压力下，发给墨索里尼一封私人信，建议他们应在两国之间爆发一场你死我活的冲突以前讨论那些悬而未决的问题，认为这两个国家的政体虽然不同，却能共处得十分融洽。雷诺对这次邀请尽量保守秘密，唯恐彼说成是 245 软弱的表现，但是果然不出所料，墨索里尼不仅拒绝了这次邀请，而且立即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希特勒。

丘吉尔在 5 月 16 日向墨索里尼发出的呼吁，明白地宣示了英国决心打到底，这封信比雷诺的信更受到罗马方面的重视；但是在复信时，墨索里尼只是举出了一些使两国处于敌对阵营的原因，如：对意大利在进攻阿比西尼亚期间受到的经济制裁记忆犹新，意大利在地中海“受奴役”的状态，以及意

大利对德国承担的义务。丘吉尔这一次以及其他几次想使墨索里尼不参战的努力，虽然几乎没有成功的希望，但是考虑到西线的危急局势，他仍在为此尽可能长久地坚持努力，一面更加注意想出点子，等到意大利一介入战争，就迅雷不及掩耳地狠狠予以打击。不过，直至5月25日，哈利法克斯仍告诉意大利大使（格朗迪的继任者巴斯蒂亚尼尼），对于就意大利利益或就可能为获致公正、持久和平的基础而举行谈判的任何建议，盟国都将加以考虑。

法国政府准备比英国政府更迈进一大步。它之所以这样做，其一部分原因固然是它在绝望地捞取救命稻草——不问这根稻草多么容易断掉——但是一部分原因也是某些法国政界人士对于法西斯意大利作为一个友邦的价值，对于劝阻意大利不要变成一个积极反法的敌国的可能性，抱有无法纠正的幻想。例如，赖伐尔仿佛没有觉察到墨索里尼自从意—阿战争以来就已讨厌他，仍然认为由他亲自介入也许能起作用。当时担任法国市政工程部长的德·蒙齐则认为，在直布罗陀的非军事化也许能使意大利满足的一线希望还存在时候，法国却犹豫着不去催促英国这样做，简直是荒谬可笑的。下述情况也助长了法国人的幻想，意大利驻巴黎大使瓜里利亚的温和态度，他与德·蒙齐过往甚密；经常与法国外交部和赖伐尔接触的意大利各界“消息灵通”人士说话的语气；驻罗马武官帕里佐将军一些稳定人心的报告，他在5月18日传达了从巴多里奥本人那里得来的消息，大意是说，由于不存在意大利介入战争的眼前危险，因此甘末林可以放手集中全力同德国作战。甚至迟至6月3日，帕里佐还报告说，意大利人即使参战，也不会阿尔卑斯山区、科西嘉或突尼斯发动进攻。

246 法国通过巴黎大主教絮阿尔红衣主教和教皇在5月17日晚间又同墨索里尼进行了一次接触；另一方面，罗斯福应英法两国根据法国的建议而提出的请求，在5月26日表示，愿把意大利的条件转告盟国。作了种种努力，劝说英国政府同意把直布罗陀、马耳他和苏伊士运河交给国际共管，作为它献给敌方的一份贡品；但是，当雷诺在5月26日访问伦敦时，英国政府却表示至多只能讨论意大利在地中海的要求，条件是墨索里尼要帮助达成一项和约，以保证法、英两国的独立和公平地解决欧洲的一切问题。

5月27日晚间，在已经知道比利时即将投降时，法国内阁讨论了最后一些劝诱墨索里尼的方法。会议以后，达拉第（5月19日以后曾任外交部长）在一些亲意的同僚怂恿之下，起草了给弗朗索瓦—蓬塞的指示，表示愿意把法属索马里兰和吉布提—亚的斯亚贝巴铁路给予意大利，调整突尼斯—利比亚边界线，割让法属赤道非洲毗连利比亚的一大片土地，并对规定突尼斯意侨地位的法令予以广泛的修改。当时正担任外交部秘书长的夏尔—鲁，劝达拉第采用稍为稳健一点的草案，他和雷诺都坚决主张，要同英国政府磋商。于是，法国就向英国提出由英、法两国作出一些让步的建议，这个建议不象原先的法国草案那样把进入贝宁湾的通路让给意大利，但是丘吉尔根本不愿这样做。丘吉尔认为，这个建议并不会使墨索里尼满足，而一旦提出以后，却再也收不回了。丘吉尔还认为，何况这也不是邀请意大利来出面调停的时候，因为希特勒太过于自信他将大获全胜，决不会接受调停，同时，与意大利接近，还将对盟国的士气产生危险的后果。

可是，甚至在这以后，法国政府在5月31日仍向意大利发出了照会，建议举行直接谈判，并且表明，法国在仍然忠于它的盟约和义务的同时，愿意“竭诚欢迎”任何有助于处理地中海纠纷的解决办法。这个方法是在德·蒙

齐 247 和肖当（当时任副总理）的怂恿之下制订的，在德·蒙齐为这份照会所拟的草稿中，法国表示愿意“支持”任何解决地中海问题的办法，这个办法（如德·蒙齐在他的回忆录中所承认的）是暗指既要法国也要英国作出让步。英国政府否认同这个建议有关系，而墨索里尼则不屑给予任何答复。

墨索里尼在 5 月 15 日对特伦特的法西斯党高级干部说：“历史以武装的摩托化部队风驰电掣的速度在前进。……时辰一到，我们就进军。”到那个月月月底时，意大利军队已经进入战时状态，并以进行防空演习来隐隐地作了一个开端。到 26 日，墨索里尼接到希特勒的又一封来信和戈林的建议（他建议意大利在德国向巴黎发动进攻的同时介入战争），受到鼓舞，下定决心在 6 月的下半月进军；到 28 日，他在听到比利时投降以后，就把进军的日期提前到 6 月 10 日，同一天，齐亚诺突然中断了同英国就封锁问题而进行的谈判，他告诉洛雷因，两国已处于交战的前夕。第二天早晨，墨索里尼召集了他的三军参谋长，告诉他们，他打算在 6 月 5 日或者 5 日以后宣战。

他认为，再拖延下去会使德国觉得意大利是在等到万事大吉以后再介入；而且，“乘一个人正要跌倒时给他一拳，这种事我们也做不惯”。与此同时，他担任了最高统帅，感到十分称心满意，尽管国王还没有正式授权给他。在威尼斯宫的这次会议的记录中，除了记载三军参谋长在有关新的司令部的组成的一些枝节问题上发表的意见外，没有提到他们有什么其他的评论。

5 月 30 日，墨索里尼向希特勒宣布了他的决定；但是希特勒劝他再稍等几天，以防法国飞机由于调到意大利前线而得以幸免在法国北部被消灭。于是墨索里尼提议 6 月 10 日。到 2 日晚间，希特勒又希望改在 5 日，可是墨索里尼这时却说，军队的调动要到 10 日才能完成，因此，在 10 日下午，才把意大利的宣战书交给了弗朗索瓦-蓬塞和洛雷因，墨索里尼象惯常一样，在威尼斯宫发表了演说。他告诉国民们，“骰子已经掷下，我们决心破釜沉舟”，在这篇演讲中，他引述说，为了取得进入大洋的通道，为了扩充领土，为了忠于对德国的义务，为了给意大利、给欧洲和给全世界建立一代人的公正的和平，正是这些动机，迫使意大利参加了一场（墨索里尼宣称）它曾不遗余力想予以防止的战争。

墨索里尼在 1938 年 9 月以调停者的身分从慕尼黑返回意大利时，赢得了他一生经历中所受到的最盛大、最自发的热烈欢迎。相形之下，当他在 1940 年 6 月宣战时，公众却比较地无动于衷。宣传工作未能反复地灌输仇恨盟国的思想；意大利人虽然对于遭到封锁有些不满，但是仍旧对盟国的侨民表示同情，尽管彼此之间存在着交战状态。另一方面，德国的节节胜利，在意大利人的头脑中产生了一种宿命论的信念，认为德国是无所不能的，认为只有与它联成轴心的政策，才是意大利所能奉行的唯一稳妥的政策。此外，他们还有渴望在商业和领土方面分享胜利果实的念头，以及自我安慰的幻想，认为这场战争不久就将由于西方国家的投降而告结束。同时，在意大利，也象显而易见地在这时的法国那样，人们似乎普遍认为，一到在军事实力上经过较量决定胜负以后，战败的一方立即就将求和，并将在合理的条件下得到和平。这是十八世纪时西方人对战争的一般的看法，在那时候，为了称霸世界而打仗，为了宗教和思想意识而打仗，在玩耍“国王们的游戏”的规则中，是没有地位的。但在十九世纪时，却有一些意大利人以比较英勇的气概参加了战争。加里波迪在 1849 年罗马失陷以后，对战友们说：“除了流泪、流汗、

流血和苦干，我没有别的可以贡献。”丘吉尔的最最鼓舞的警句之一，就是借用了这句话。然而在 1940 年 6 月时，在加里波迪的活着的这一代子孙中，大多数人却未能预见到，类似十九世纪中叶意大利复国运动那样的英国的复兴运动，这时即将在丘吉尔的加里波迪式的领导下被唤起。于是，这个法西斯政权就开始在列强中间进行它最后的一次冒险，象寓言中的那个瓦坛子一样，夹在一些大铁锅中间在激流中翻翻滚滚地被冲走了。

第四编英国和英联邦 1939 年 9 月至 1941 年 12 月

第一章 249 联合王国的国内战线阿诺德·托因比

第一节 绪言

1941年12月以前，联合王国的国内战线的历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中关键的一章。1941年12月，由于日本袭击珍珠港，美国作为交战国参战，这就使意大利、德国和日本的失败成为不可避免。从那时起，可以肯定他说，这三个侵略国势将战败。但是人们所以能肯定他说，从1941年12月起这三国的败势已成定局，乃是因为德国在此以前没有能够赢得它在1939年9月所发动的战争。如果在1940年6月法国覆灭后，英国接着也完蛋的话，那么，德国至少能在日本袭击珍珠港一年多以前就会赢得这场战争。这三个侵略国便可以放手大干，按照自己选择的合适的时间表“一个一个地”对付苏联和美国。在这种形势下，它们有希望把全世界征服。可是，1940年6月25日以后，英国人民却下定决心，继续同德国作战，这个行动使德国在1941年6月进攻苏联给自己带来了最终命运，又使日本在1941年12月进攻美国给德日两国都带来了致命的后果。因为，由于英国坚定不移地继续同德国作战，使德国和日本后来采取了这两个侵略行动，结果导致盟国组成了一个大同盟，这个同盟联合起来的力量绝对超过这三个侵略国相加起来的力量。故而，英国人民于1940年6月作出的继续作战的决心，以及他们在其后十八个月里不畏敌我力量悬殊，不惧艰难困苦而坚持作战到底的那股顽强的毅力，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行动，这对造成意大利、德国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来说，比其他任何行动更为重要。

英国人的这种决心至少有两点是惊人的。就是说，50 这看来似乎违反了“理性与常情”，也与从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纪念日至1940年4月8—9日夜德国入侵丹麦和挪威这二十一年半时间内英国人民的精神相违背的。除在戴高乐领导下决心继续同德国作战的极少数法国人以外，大部分法国人对他们的盟友英国并不步法国后尘屈膝投降的做法，感到诧异和难堪。而德国人则深信，要是英国人这时还是那样愚蠢得出奇，不肯承认自己已被打败的话，那么，第三帝国将以压倒优势的兵力，在1940年的作战季节结束之前，继法国之后征服英国。英国人民曾一再表示不愿意再卷入一场大战；而如今他们却敢于泰然地面临战争，而且这场战争对于平民来说，十之八九将比三十年战争结束以来在西方世界所发生过的任何战争更为可怕。

从表面上看来，英国人的心理的确好象在1940年4月9日到6月25日这七十八天里已经起了彻底的变化。但是，这种现象至少有一部分是出于别人的错觉，而事实上，英国人在那十一个星期里如此鲜明地表现出来的这种气质，必然是长期存在，有其更深远的渊源。就是这些人民，过去曾经面临过几次类似的危机，在看来濒于绝境时表现出同样的大无畏的精神。例如，在1918年3月，又如从1805年奥斯特里支战役到1812年法军撤离莫斯科的七年中，英国曾经看到自己在大陆上的盟国一个接一个被显然是所向无敌的法军征服。从1918年到1945年，联合王国人民的心理的历史，自然是值得专业分析家研究的一个题材，但也是一个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学家不可忽视的题材，如果他想要使读者理解这次战争的过程和后果的话。

第二节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里英国人对战争与和平的看法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同一个实力与自己相当的强国进行的最后

一次战争是克里米亚战争。参加那次战争的全是职业军队，而且战场是在遥远的海外。到 1914 年，绝大多数英国人逐渐希望，他们再也不会看到自己的国家卷入另一次大战，哪怕是一种老式的有限战争。除对极少数人之外，对所有的其他人说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犹如晴天霹雳；而且这场出人意料的战争是新式的战争，或者也许可以说是一场作战方式已经老得被人遗忘了的战争。这是一场有关国家存亡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所有适龄的男人都被征召入伍，成批地牺牲了，这是一次使人毛骨悚然的经历，它同生活在二十世纪第二个十年里的那一代人在战前所想象的世界的性质是完全不相容的。

在这一代里，以西欧人民为一方和以东欧、中欧人民为另一方之间，对战争与和平的看法，存在着极大的差别。

在西欧，英国人这时虽然变得爱好和平，但是也不是西欧民族中最不爱好打仗的民族。他们习惯于长期作战的状态——在印度的西北边境，英国和印度的职业军队一直在进行着战争。在十九世纪的末了几年英国在南非对西欧血统的两个地区的人民进行了不光彩的战争，老一辈对此记忆犹新；那些听到过自己的父亲或祖父谈起参加克里米亚战争的亲身经历的人，仍然有健在的。当时，瑞士人仍能回忆到的唯一战争是 1847 年的那次短暂的内战；瑞典人和挪威人则由于从 1814 年以来一直未发生过战争，因此他们对什么战争部没有印象。丹麦人于 1864 年，法国人于 1870—1871 年虽然分别被中欧的敌国击败，遭到过入侵，但是结果都没有重新激起他们的军国主义情绪。丹麦人对北石勒苏益格的丧失，法国人对阿尔萨斯—洛林的丧失虽然都不甘心，但是这两个西欧国家的人民都不希望再同德国进行战争，以收复失地和解放他们的被征服的同胞。1914 年 8 月时，如果能让法国人自由选择的话，他们会选择放弃废除 1871 年法德和约中有关领土条款的机会，作为谋求和平的代价；在 1919 年的巴黎和会上，丹麦人坚决拒绝了一切对他们有诱惑力的做法，以免使德国具有忿忿不平和进行报复的任何正当的理由。他们也不肯从德国收回丹麦于 1864 年割让给普鲁士和奥地利的任何一部分领土，居住在这些领土上的大多数居民这时也未声称要通过一次公正的公民自由投票重新归属丹麦。

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年代里，中欧和东欧 252 各族人民对战争与和平问题却抱着截然不同的看法。

例如，波兰人虽然在 1830 年和 1863 年两次武装起义失败，遭受了种种苦难，但他们并未被吓倒，仍然希望再发生战争，视为可能谋得政治上解放的一种手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们当然地获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代价是大部分国土（居民大部分是波兰人）遭受蹂躏，他们没有因此显得审慎克制，没有象丹麦人那样，直到此时仍然记取五十多年前一场较小的灾难作为教训而审慎克制。无论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和平解决争端时，还是此后在 1939 年秋天波兰被第五次瓜分，从而再一次从政治地图中消失以前的任何时候，波兰人在决定政策时，从未考虑到在当时不采取什么行动，才能避免最终被卷入另一场战争。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整个时期内，波兰人自始至终甘愿使国家遭受一场严重的灾难，趁着一时有利的形势，坚持要从德国和俄国收回尽可能多的失地。1919—1920 年间，英国劝告他们不听，在同俄国谈判时，他们的领土要求只能限于“寇松线”之内，把波兰人在居民中占多数的地区同波兰人仅仅在那里散居的地区划分开来。劝告他们不能与俄国和德国同时

结怨成为死敌。对于这样的论点，波兰人置若罔闻，丝毫不为所动。他们之所以采取这种鼠目寸光、自取灭亡的政策，是因为他们想象不出有这样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长期的战争和反复的灾难并不是自然界秩序的一个组成部分。波兰人想当然地认为，不管他们冒失鲁莽也罢，谨慎小心也罢，他们总是会不断地被卷入战争的；而且，如果他们有那样的远见，看到有可能发生象过去那样的战败和瓜分，那么他们也可以回顾往事，充满信心，认为既然过去能够在黑暗中重见光明，将来也会如此。

德国人的心理不象波兰人那样简单，因为德国的中产阶级将会同西欧和北美的中产阶级一样受到损失。可是，事实将证明，德国人比英国人或法国人容易被推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给所有的德国人带来了残杀、战败、失望、幻想的破灭、受耻辱和 253 丧失领土等痛苦的经历，而且对德国中产阶级来说，他们甚至后来还遭受了更大的苦难——通货膨胀造成的破产。可是，结果呢，德国人竟然愿意让一个疯狂的独裁者去决定他们的命运，这个独裁者自己确信，德国将在 1939 年实现征服全世界的目标，在 1914 年时，德国曾为了想实现这一目标，结果遭到惨败。在三十年代里，德国人与英国人和法国人之间，在不愿再打仗这一点上，程度是有差别的。这一点对希特勒的打算来说，是很重要的。在巧妙地准备发动一次势不可当的闪电战的时候，希特勒意识到德国人在作战能力方面胜过西方的邻国，因此确信自己一定能够完成他的前辈在 1914 年到 1918 年间未获成功的事业。

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德国人和英国人的心理从表面上看确实是很不相同的，因为从 1918 年 11 月到 1940 年 4 月，英国人的理想是要保持一种“正常状态”——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里，英国人认为，这种“正常状态”的标准，就是联合王国的中产阶级在 1815 年到 1914 年这一百年间曾经过惯了的那种比较幸福的生活状况。如果说，英国中产阶级在这一百年间的生活状况已经使上帝满意地称他们为“文明人”的话，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定被看作是一场可怕的灾难，犹如 1902 年佩莱火山爆发使马提尼克岛上的圣皮埃尔城遭到毁灭，或者象 1912 年“泰坦尼克”号轮船触冰山而沉没那样。在为将来制订计划时，不必预期，因此也不必考虑到这种惨剧会重演。只要任何这样的计划是可以实行或值得想望的，英国就应该打算恢复和保持不受欧洲大陆的混乱所干扰的“正常的”幸福生活，象在 1848 年随后又在 1864 年到 1871 年间非常突出地享有的那种生活。这就意味着，英国要恢复它的“正常的”政策，即在政治和军事方面，对欧洲大陆任何一个国家既不承担义务，也不进行反对。

固然，在 1919 年和平解决争端时，英国成为国际联盟盟约的缔约国，确实承担了一种新型的义务，其范围不仅涉及欧洲，而且还涉及全世界。固然，当美国不愿接受这个盟约，从而使该盟约失去效用时，英国也没有宣布在盟约上的签字作废。可是，这并不能说明英国意志坚决和勇敢大胆，而是可以说明，英国没有对它所承担的盟约义务记在心上。或许，那些还想到有过这么一个盟约的英国人中，大多数都把它看作是一种学究气的习作，旨在取悦少数脱离实际的空想家。而这些空想家本人，则似 254 乎多数都把该盟约当作是一种恩赐给他们的魔法，使他们可以凭空不劳而获，就象一个贪得无厌的银行家，没有黄金作担保就发行纸币，同时却巴望持票人决不会向他兑换

黄金。他们当然不会把国联盟约看作是要他们“流泪、流汗、流血和苦干”来尽的义务，但是，当丘吉尔于1940年5月13日要求他们作出这些可怕的牺牲时，他们毕竟还是非常平静地毅然接受下来，这时候，国联盟约在那些不得已而把它当作宝剑来使用的人们手中，早已变成一根折断的芦秆了。

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里，英国对战争与和平的看法所经受的严峻考验不是它对国联的态度，而是它对法德两国的态度。在英国人同这两个欧陆强国的交往中（他们对此的确是重视的），他们坚持再度采用在十九世纪奉行的那种不承担任何正式义务的政策，这个政策的代价是非常昂贵的，它使法国人感到伤心，同时又听任法国人在德国人心中埋下怨恨的火种，使希特勒能够把它扇成熊熊的火焰。

从1918年11月11日到1940年6月25日，在英法关系的这段历史中，英国采取了一个有决定意义的行动，拒不批准在1919年6月28日答应给法国的保证，这件事发生在美国参议院否决了美国于同一天答应给法国的与之类似并相互有关的保证之后。实际上，这等于是在废除1904年的英法协约，尽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人们毛骨悚然地亲身体验到德国的军事力量时，这个协约已经表明了，为了使法国、同样也使英国能够继续存在下去，它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某些有远见的法国政治家和英国政治家，在1904年和1904年以后，在当时还无法估计其大小的德国威胁面前，为了消除他们两国之间的矛盾，曾经互相作了让步，但是，甚至这些政治家，也不曾认识到，德国的实力究竟有多么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人们才看到了德国威胁的严重程度；大战以后，英国的政治家对法国人当时痛心意识到的那种现实状况，实在没有理由熟视无睹。英国不肯批准战后对法国的保证，这给英法关系一个狠狠的打击，使两国的关系从此没有恢复过来；从那时起，这两个曾经在1914年到1918年间依靠这一协约共同得到拯救的伙伴，步调就越来越不一致，直到1940年6月终于悲惨地分道扬镳为止。

对于这种指责，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里，英国政治家们或许会作这样的回答：光是向他们过去的盟邦法国提供军事上的保证，来防止他们过去的敌人德国万一再度发动侵略，只不过是试图解决德国问题方面的一种消极措施。他们或许会提出这样一种积极的解决办法：应使德国与西方国家恢复相互礼让，使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结成伙伴，先是成为平等的，然后成为乐意合作的伙伴。为了收到这一积极的效果，英国人竭力帮助德国去恢复战前的繁荣，使德国与它所进行贸易的一些国家在经济方面能相互得到好处。但是，英国的这种建设性的、有远见的政策，却被法国想要使那个暂时被打败的德国永远贫弱的盲目企图所破坏了，这个企图到头来是注定要失败的。要是英国对此提出任何抗辩的话，法国会回答说，法国对英国的建设性政策之所以进行这一致命的破坏，其责任主要还是在于英国。因此，英国的政治家们理应早已预见到：没有法国的默许和合作，他们就无法帮助德国复兴，他们也无法使法国人欣然支持英国的这一政策，除非他们开始向法国提供军事方面的保证，因为如果没有这种保证，法国将永远不会感觉安全，从而使它对德国采取的行动也永远不会具有必不可少的睿智和大度。英国的政治家们理应还看到：由于他们自己在当初把该做的事情疏忽未做而犯下了错误，结果给了当时的法国总理普安卡雷一个促使法国对德国进行压制的机会，这时他们必须向法国施加事实上比以往任何时候要大得多的政治压力，以阻止法国不致走极端，而使德国人的怨气达到无可消除的地步。事实上，

英国人是为了满足不承担任何义务的妄想而牺牲了一切。

他们不批准对法国的保证，拒不承担义务，他们不肯负起责任去抑制法国，使之不致激怒德国；而当他们最后承担起那个公正无私的 1925 年洛迦诺公约规定的义务时，为时已太晚，无法弥补已经造成的心理上的损失。他们在保持自己行动自由的名义下，那时候已经反躬自责，不得不投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尽管这场灾难正是他们一直要想避免的。

英国在两次大战之间这段时期里失策的严重后果是：法国同中欧和东欧的那些继承哈布斯堡、罗曼诺夫和霍恩佐伦帝国的国家缔结了军事上既不可靠、政治上又预兆不祥的互相保证的条约；法国占领了鲁尔区；意大利进攻阿比西尼亚后，英国要求法国同它联合起来，至少 256 要做到援引国际联盟的盟约一起去对付意大利，却遭到了法国的拒绝；最后，在 1940 年 6 月，法国决心要退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宁愿由希特勒去摆布，也不愿接受丘吉尔在 1940 年 6 月 16 日提出的那个耸人听闻的建议，要英法两国结成一个政治联盟。从那时起一直到维希政权垮台，法国普遍表现出仇英的情绪，这种故意在阿比西尼亚发生危机期间，从法国人对英国的态度中就已有预兆了。这是从 1918 年停战伊始就积累起来的怨气的公开爆发。可是，如果英国是在 1919 年，而不是在二十一年半以后，早就把丘吉尔愿意提供但已为时过迟的那些援助拿出十分之一给法国的话，法国人或许根本不会有这股怨气。

在法英两国的关系日益不愉快和恶化的这种心理背景下，两国人民都不得不正视希特勒领导下德国回到军国主义老路的威胁。在希特勒上台到他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七年中，英国人的意志为一系列令人沮丧的考虑而削弱了，英国与法国的关系越来越疏远，是令人沮丧的原因之一。使英国人感到沮丧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意识到美国人正如英国人一样，一心要维持“正常状态”——所不同的只是美国人用了另一个同义词“正规状态”，而且在实现这同一目标时，比英国人稍有把握。第三个令人忧虑的原因是：他们获悉英国和法国政府——它们是忠实地贯彻其选民的意愿的——已经让纳粹政权统治下的德国在新的军备竞赛中，尤其是在令人惊恐的空军实力方面遥遥领先。第四个令人沮丧的因素是：英国人也象法国人那样，在两次大战之间的这段时期内，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种恐惧的心理，生怕在这一生中免不了要打第二次大战。

在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些西欧国家中，仍然活着的人们对这样一次战争的严峻考验都感到几乎难以忍受。1918 年停战日那天，他们都下定决心，无论是他们自己，还是他们的子孙，都永远不要再有一次这样的战争。科学技术一往无前地发展——尤其是在飞机和炸药方面——促使他们想当然地认为，如果他们果真碰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话，这次战争将比第一次可怕得多。他们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甚至可能使他们和他们在 257 近代的祖先所过的那种生活方式从此一去不复返。这种想法太痛苦了，令人不敢再想下去。人们在感情上不敢往这件事上想下去，因而也不敢往战争上想下去，即使他们在理智上不得不勉强承认，希特勒正在磨刀霍霍，准备战争，看来英德之间结果终于难免重新交战。除了这种恐惧战争的心理使他们感到痛苦以外，还有一种责任感，也使他们感到同样的痛苦；因为，既然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恢复了它传统的孤立主义立场，不愿与欧洲有牵连，英国就只有和它的那个不易相处的伙伴——上次大战中打胜仗的法国——共同把重担挑起来，尽管英国人和法国人都感到，这副担子不是他们合起来的力

量所能胜任，英国甚至还设想，一旦大难当前，两国能够矢志不贰，共同对敌。当德国军国主义疯狂般地卷土重来时，英法两国发觉自己首当其冲，它们知道，如果战争爆发，它们至少将在没有美国参战的情况下，打第一轮战役。这样，保卫西方文明将首先落在这两个西欧国家的肩上，但是它们觉得自己力不从心。同时，由于以下三个原因，它们已经使这个任务比原来困难几倍。第一，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里，它们听任自己的军备（尤其是起决定作用的新空军力量和机械化的地面部队）衰退；第二，让德国在重整军备方面超过自己；第三，当希特勒在军备竞赛方面仍然落后于它们时，它们却一再坐失良机不迫使希特勒摊牌。

1938年9月29日慕尼黑协定签订以前的那一个星期内，或许可以说是英国人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内意气最消沉的日子。英国人知道，战争有可能爆发，而且他们对此毫无准备，所以他们在这些日子痛苦，肯定比他们在1939年9月3日战争真正爆发前的一星期内感到的痛苦还要难受，因为他们那时已经知道战争事实上无可避免，而且自己至少已经为此作了一些准备。当同样的危机再度发生时，人们就不可能再以同样强烈的感情来忍受象上一次危机所带来的那种打击了；在战争即将爆发的时候，英国人所担心的已不是战争可能来临，而是害怕张伯伦或许仍然应付不了当前的明摆着的局面。德军于1939年3月15日入侵并占领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残余部分，这一行动终于使绝大多数英国人明白了希特勒的目标决不是局限于把那些有日耳曼人居住但不属于德国管辖的地区并入第三帝国。当张伯伦于3月17日改变了他对德国的语气，并宣称他打算抵制德国任何进一步的侵略后，英国人的确普遍感到了宽慰。3月31日，张伯伦宣布英法两国给予波兰保证，英国人听到这个消息后很镇静，这说明，英国首相这一次在德国人的“东进”途上亮起了红灯要他们停止前进，用这样的方式来阐明他的立场，从而正确地表达了英国人的意愿。更有意义的是，当英国人于8月21日听到德苏两国将于23日在莫斯科签订互不侵犯协定时，他们都处之泰然。当德国人于9月1日入侵波兰时，英国人普遍担心的，不是害怕英国由于给了波兰保证使自己将与德国交战，而是怀疑英国最后或许不会履行它的保证；9月3日，星期日，上午11时15分，张伯伦宣布，英国这时又一次同德国进入交战状态。他的国民在听到这一消息时，就象3月17日听到他的演说时那样宽慰。

第三节雷声大雨点小的“假战争”

在英国人采取了断然行动同德国再度进入战争状态后，他们发觉自己面临的严酷考验同他们原来所想象的不一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由于战争是突如其来地临到英国人头上，故而在欧洲大陆上的英国远征军马上就投入了既迅速又激动人心的重要军事行动；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英国人在战争爆发之前的几个月和几年里就已经感到战争的压力，故而战争的第一阶段对他们来说是被动的。确实，这一次英国人没有预料到自己必须参加作战以防止德国立刻入侵法国，因为他们盲目地相信法国人认为马其诺防线牢不可破的想法，而没有考虑到，这一防御工事系统在法国与比利时边界的东南端就终止了，只要希特勒德同的参谋总部认为在军事上有利，它将会象旧德帝国那样，毫不踌躇地入侵比利时。英国人原来估计，这次德国将立刻从空中袭击英国本土，当德国并未进行这种空袭时，英国人的心情便由紧张而归于平静。大批儿童已从伦敦和其他大城市疏散，造成了家庭的分离。在白

昼越来越短的季节里，实行灯火管制以后，整个英国岛屿就象被一幅黑幕覆盖着。然而，这些事虽然使英国人不愉快地想到自己是处于战争状态，但是，他们仍然由于自己未能参加实际战斗而心有不安。259 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那样，德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也是行动迅速。这一次，他们的初期战役捷报频传，取得了完全的成功，在危急的时候，并没有受到象马恩战役那样的挫败。但是，这一次，德国的第一个目标不是取道比利时去进攻法国，而是进攻波兰，在德国机械化部队横扫和肢解波兰的四个星期中，驻在西线的英法两国军队却没有做一件事去营救波兰。在西线，唯一的军事行动是双方的巡逻兵在马其诺防线与齐格菲防线之间的无人地带偶然发生的冲突。姑且不论甘末林将军之避而不向齐格菲防线发动正面的强攻去达到突破的目的，在军事上是否明智，但是法英两国军队这样毫不光彩地按兵不动，终归对这两国的士气带来了很坏的影响。当又有一个小国遭到第三帝国的进攻和蹂躏时，这些西方强国再度不肯把这个受害者从德国的虎口中救出来。如果它们同德国在名义上交战后还是那样软弱无能的话，倒不如干脆同德国在名义上保持和平为妙。这些看法既是势所难免，又会使人丧失斗志。

这种扑朔迷离、不战不和的奇怪状态，使西欧人民又想恢复“正常状态”，这对希特勒是有利的。如果西欧人民能够采用这样的方式同德国再度作战而无需立刻就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去进行战斗的话，那么他们为什么不能设想出一种比较没有痛苦的方法在这第二次战争中再去战胜德国呢？难道西方盟国就不能利用那条被认为是坚不可摧的盾牌似的马其诺防线，赢得时间把“封锁”的螺丝一点一点地拧紧，最后迫使德国屈服呢？封锁已成为西方国家的一张王牌，因为它们看不出自己手中还有其他这类的好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一阶段，英国人存心视而不见这种令人不快的真情实况，即德国在这次战争中不象上次战争中那样，没有受到包围，因为这次俄国是它的帮凶，所以德国这时可以在欧亚大陆，朝东一直可以到达太平洋之滨的海参崴港，去取得一切的资源。英国人也故意对这一必然会发生的状况视而不见，即如果第三帝国发觉自己被人掐住脖子慢慢闷死的话，希特勒决不会甘心失败，他一定会在马其诺防线与沿海地区之间的缺口，用其威力强大的战争机器，朝其西方敌手猛扑过去，这种战争机器在他进攻波兰时已使用过，收到了非常大的效果。

的确，在“假战争”时期，英法两国争取胜利的意愿，就 260 是想要不劳而获地达到目的。1939 年 10 月 6 日，希特勒曾经提出媾和的建议，但是英法两国都没有作出反应。两国这时似乎都想当然地认为，德国征服波兰一事不容宽恕，一定要予以纠正，而且，不仅如此，战争也一定要打下去，直到把希特勒本人打倒为止。可是，这些非常难以达到的战争目的，却缺少相应的决心或努力去使其实现。在英国，人们仍然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大战”，这就意味着，当时正在打的这场战争将是一场比较小的战争，仿佛任何一场以德国为敌手和以打败德国为目的的战争，在结束之前都不可能被视为是一场大战。在这一阶段，当英国人获悉，德国在战争爆发后，对衣着和食品立即实行了严格的配给制度时，他们把此事看作是德国的虚弱而不看作是德国决心争取胜利的象征。在英国，“照常”进行和平时期的工作是受人欢迎的；而民间的备战工作则遭到人们的冷眼，因为它令人厌恶地提醒大家想起自己的国家并不是处于和平状态，尽管暂时还没有什么主动的军事行动。战争刚爆发的几天里，公众的怒气就集中在那个新成立的战时情报部上，这个部的

九百九十九名工作人员成了令人烦恼的现实状况的象征，公众都不愿理会它。无疑，这只不过是神经紧张的一种轻微的症状。在法国，当1940年春天来临时，开始出现了一种比较严重的症状。到1940年2月，法国政府已经对许多经过军事部门检查过的信件表示担心，这些信件是在家里的农妇写给她们在马其诺防线服役的庄稼汉丈夫的，她们在信中气冲冲地责问，既然没有战斗，为什么要他们浪费时间，拿着枪在那里闲呆着，而农忙季节将到，田里正迫切需要劳动力。法日士兵本身对自己不作战而闲着的情况也觉得越来越难以忍受，这也帮助说明了，为什么在法国有人要求于顶第一次俄芬战争。法国同德国已经交战，这时又想要同苏联作战，而在几个月以后，法国单同德国一个国家进行了不到七个星期的真正的战斗就告崩溃，回顾当时它还要求同俄国同时交战，看来实在奇怪。整个这一件事——它在本书中的另一处也作了叙述——说明了，在法国覆灭以前的那个阶段里，无论是法国还是英国，对于如何指导作战都是愚蠢无能的。

甚至在1935年当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亚时，又如在1936年当德国还没有重新武装好就再度占领了莱茵兰261时，英法这两个国家都不肯出兵进行干预。但结果呢，在几个月以前，两国却为了德国侵犯波兰而同那个已经重新武装好的德国开了战，一面不无理由地吓得瑟瑟发抖；它们不去进攻驻在法一德前线的力量比较薄弱的德国守军来协助波兰，而是让德国去征服波兰。然而这时在德国一举消灭波兰，从而证明它已经恢复了军事力量之后，法英两国却故意在招致同时与苏联交战的危险，这样做就使德俄两国的政治协议转化为一致反对西欧国家的军事同盟。在这一阶段，英法两国似乎在沉着地考虑把俄国巨人推上战场，站在敌人一方，来为那个已经恢复了精力的德国大力士助威，英法的这种沉着镇静既是自相矛盾，又是徒劳无益的。而且它们的这种政策（要是这也可以称为一种政策的话）既贯彻不力，其目的也是邪恶的。

显而易见，如果法英两国想使自己对芬兰的军事援助能够起到任何效果的话，那么，就一定要在芬兰军队还能够英勇地坚持战斗而把俄国人牵制在曼纳海姆防线的那一段短短的时间内，把这些援助送到芬兰，但是，两国在制订计划和准备工作方面，却是拖拖拉拉。不仅计划工作缓慢，准备工作也不充分，简直到了荒唐的地步。英国政府对占领挪威的一些港口这件事，直到3月12日才明确地决定下来，那一天正好是芬兰接受苏联政府提出的条件，同苏联签订和约的日子。英国派遣的五营本土军，将去防守挪威南部的三个港口，去对付德国军队的全部力量，因为这时波兰已被消灭，而西线尚无战事，德军正好腾出手来全力对付英军。

从道义方面说来，法英两国政府，正象意大利政府那样，在制订支援芬兰的计划时，毫无疑问，一部分原因是出于本国人民对芬兰人的同情，这种同情是普遍的，无私的，慷慨的。芬兰是一个小国，正在英勇地抵抗一个强大的邻邦的侵略，同时又是西方世界抵御以苏联为象征的共产主义的前哨，所以有理由得到西方国家的同情。另外，如果盟国政府也考虑到外交理由的话——尤其是在战时，任何一个政府都不致于忽略这件事——那么，联合王国政府会知道援助芬兰不致使自己的信誉受到损害，只要它事先估计到，在帮助芬兰时，自己将得到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道义上的信任，因为美国是非常推崇芬兰人的（虽然美国从未想到为了芬兰而亲自出兵同苏联交262战）。然而不幸的是，西欧盟国援助芬兰的计划一部分是出于种种不那么纯洁的政

治上的考虑。盟国认为，营救芬兰这项正义的事业，可以给它们一个似是而非的藉口去封锁挪威领海内的航道，占领瑞典的铁矿和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新开辟一条对德作战的战线。芬兰可能会以一个小国，同时又是一个斯堪的纳维亚伙伴国家的地位，向挪威和瑞典求援，而挪威和瑞典方面也许会露出一副可怜的样子，不愿为了帮助芬兰而甘冒风险。但是，西方盟国的那种含糊其词的、甚至或许令人不无猜疑的计谋，却使挪威和瑞典两国政府完全有理由拒绝提供盟国正在要求的设备。英法两国既然标榜自己是为了维护小国的安全、领土完整和独立的权利而同德国作战，那么，它们就实在不应该策划把挪威和瑞典这两个小国违背自己的意愿卷入战争，何况这两个小国并没有受到干扰，依然完整无损。法国人切望自己的国家不要成为战区，而指望另外在瑞典开辟一个战场，这种办法也是挺不合适的。最重要的一点是，法英两国政府对于准备派兵到挪威和瑞典登陆的建议，万一遭到抵制，是否要用武力强行占领这两个中立国家的问题，彼此之间既然意见尚不一致，同时也没有获得任何证据，能说明这些登陆的建议将受到抵制——自然，要是挪威和瑞典不准备放弃中立，免得日后招致德国理所当然的报复，它们是会抵制这些建议的——那么，法英政府仍然推行这些在道义上可疑的计划，即使推行的速度慢得象乌电爬行一样，就未免不合适了。

在俄芬战争的紧要关头采取这种笨拙的做法所反映出来的心理状态，也普遍反映在英国的国内战线上。在“假战争”时期，英国民众的心情反映在政府的折衷政策上。食品几乎没有实行配给，衣着就更不必说了。在这个时期，他们听任从海外进口的主要商品的库存量减少，因为他们认为，这次战争不象上次那样，德国潜艇的封锁不会再造成严重威胁，他们认为，英国手中的船舶将足够应付战时的需要。在1940年夏天以前，对进口的控制很不严格，结果，使宝贵的货舱竟被在战时作为奢侈品的进口商品所占据。与此同时，扩大工业生产以及把民用生产转变为军需品生产的工作都进展得非常缓慢。在1940年4月，英国尚有一百多万人失业，在同一时期，联合王263国的军费总额中，只有不到半数来自税收。如果真正预料到这次战争将是在经济 and 财政方面的持久竞赛，而不是象上次大战那样成为国际间一场大决战的话，那么，英国在经济工作中这种敷衍塞责的做法，是不可原谅的。但是，在1940年4月8—9日夜间德国入侵丹麦和挪威之前，英国政府这种因循苟安的行为并没有引起过认真的批评。

在英国下院偶尔表露出不安情绪的同时，英国民意研究所——一个非官方的从事实地调查的机构——曾举办过一系列民意测验，说明直到那时为止，大多数英国人对政府的这种指导战争的方计是满意的。按照1939年12月针对这个问题而单行的民意测验的结果，百分之六十一表示满意，百分之十八表示不满意，百分之十对所争论的问题不表示意见，百分之十一认为应当停止这场战争。至于英国人对张伯伦政府的工作是否满意这种涉及个人的问题几次每月举行的民意测验表明，自从战争开始以来，在1939年开战以来的四个月里，赞成张伯伦的人数增加到百分之六十四到百分之六十八之间，而在开战以前的最后十个月的和平日子里，赞成他的人数只占百分之四十九到百分之五十五之间。1939年12月举行的一次民意测验，询问选民将选择张伯伦还是选择丘吉尔为首相，测验的结果表明：在这个时候，有百分之五十二的人赞成张伯伦，只有百分之三十的人赞成丘吉尔，百分之十八的人对这个问题不表示意见。按照在德国进攻丹麦和挪威前夕所举行的一次民意测

验的结果，在这个时候，假如张们伦引退的话，百分之二十八的人将选择艾登来继任，只有百分之二十五的人将选择丘吉尔来继任。

六十四，1940年1月又下降到百分之五十六。

毫无疑问，这些数字可能偏高偏低，但是还是符合当时居住在英国和在英国工作的人们的主观想法。在1940年4月9日以前，从表面上几乎仍然看不出有任何迹象能表明，一旦英国人的看法起了彻底的变化，他们马上就会发挥出潜在的活力；但是，回顾起来，在“假战争”期间，表示张伯伦声望高低的统计曲线，如民意测验的结果所说明的那样，可以看作是大难当头时将要发出的那股潜 264 在力量的指标。当战争爆发时，这条曲线显著上升，表示了人民对张伯伦最后作出决定要进行抵抗感到宽慰。到了12月和1月，这条曲线又明显地下降，表明了他们对张伯伦感到失望，因为他的立场毕竟不是非常坚定的。这件事说明了，张伯伦在满足英国人自己提出的要求时，并没有把他们心底里真正希望的，但是还没有公开谈出来的东西给他们。

第四节 1940年4月9日至6月25日之间英国人看法的彻底变化

1940年4月9日早晨，当英国公众获悉德国在前一夜已经入侵了丹麦和挪威的消息时，他们就象1939年9月3日听到张伯伦宣布同德国进入交战状态时那样，感到宽慰。他们又一次觉得，问题终于明确了，行动的机会已经来到了。在德国对这两个从不惹是生非、从未向它挑过衅的中立国无缘无故地发动进攻后，人们认为，它的这一行径比它以前对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进犯更为邪恶；这一次，德国是跨海进行侵略的，所以它肯定是在碰运气，完全有可能被英国击退，而且是被英国占绝对优势的兵力所击退。但是，令人不安的是，德国海军居然成功地通过了英国海军的交叉火力网，不仅占领了有斯卡格拉克和奥斯陆峡湾这两个狭窄的海峡所掩护的奥斯陆，而且还占领了大西洋海岸的四个挪威海港，包括极北面的纳尔维克港在内，从瑞典北部的基律纳运来的重要物资铁矿砂，就是在这个港口装船的。但是，也有人想当然地认为，德国人这一轻举妄动，对西方盟国是有利的。以前，德国在陆地上向波兰进行闪电战时，西方盟国无法在那里采取直接的行动来进行干预，而这一次的闪电战是跨海进行的，而且受害的两个国家都是处于西方盟国的兵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所以一看到德国在这次闪电战中所取得的胜利犹如上次在波兰那样迅速、巨大、辉煌，英国人就越发感到沮丧和羞耻。当挪威军队被击败，而英国在挪威的登陆部队狼狈地逃回到船上时，事情已变得很明显，德国参谋总部的这一表面上的轻举妄动实际上是对采用空军力量后，战争的打法会产生彻底变化有正确估计，从而制定了一个合乎科学的作战计划。

如果那一小批政界人士、文职人员以及参与此事的作战部门的人员当时就把全部事实都公开的话，英国公众一定会受到更大的震惊。英国公众尚未意识到，在俄 265 芬战争时，英法两国政府曾经策划把挪威和瑞典与自己一起同时卷入对德国和对苏联的战争。他们更不知道，当上述计谋幸而告吹时，英法两国政府又想出了一个新的计谋，绝对优势作用。

英国民众根本没有疑心到会有上述那些令人震惊的事实，即使这样，他们对本国海上力量未能阻止德国征服挪威这一无可隐瞒的事实已感到震惊。那么，英国那一小批文武官员和政界人士，他们不仅了解全部事实，而且还应当对事情搞到如此地步负责，内心又作何感想呢？

然而，这种丢人的、不可宽恕的海陆军的惨败，至少在政治方面的确产

生了一个有益的影响。西方盟国在挪威的战败，终于使英国人恍然大悟：英国正承担着同德意志第三帝国的挑战，经受严峻的决战考验，这一任务是非常艰难的。英国人的这一震动，反映出张伯伦的信誉顿时扫地。

就在德国快要入侵丹麦和挪威之前，张伯伦在4月4日发表演说时，不幸而说了希特勒“没有赶上班车”这句话，但他未能说明他说这句话的意思而使人们忘记这句话。他的意思是（按他本人5月7日的说明），希特勒在9月3日到次年4月5日之间，已经失掉了一次进攻西方盟国的机会，因为那时他仍然享有在战前的重整军备竞赛中超过盟国的全部优势。从长远观点看来，张伯伦的这个意见可能是正确的——假如说，这七个月里英国在建设皇家空军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对同年夏秋两季的不列颠之战起了决定胜负的作用，从而也使英国、美国和苏联最后有可能把它们的资源汇合起来，给德国以致命打击。可是，就在这一时期，张伯伦本人却没有赶上班车，否则盟国就会卷入同苏联的战争——对于他的国家来说，这倒未尝不是一件幸事。可是，希特勒在接踵而来的几天中将证明，至少在他那昙花一现的旅程的下一阶段中，他已经发奋赶上了班车。这时候人们还不能预见到，希特勒就是在这疯狂的行车途中，五年之后终于从悬崖峭壁上堕入汪洋大海送了命，而且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把这个结局同当时立刻发生的危机联系起来。1940年4月8日到5月7日在斯堪的纳维亚发生的骇人听闻的事件，很快就由于5月10日到6月25日在西欧大陆发生的更为骇人听闻的事件而相形失色。根据5月9日和10日在英国就是否赞成张伯伦当首相的问题举行的一次民意测验，这时只有百分之二十二的人表示赞成，百分之五十八的人不赞成，不超过百分之十的人对这个问题不表态。1940年5月10日，德国人入侵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那天，张伯伦辞职，成立了以丘吉尔为首的联合政府。从那天起，英国人民终于万众一心，充满着信心，在这位领导人的指挥下作战，直到1945年7月26日，即战胜日本之前三十九天，丘吉尔在一次大选中失败而下台为止。

丘吉尔与英国人民之间的这种全心全意的合作，就这样持续了五年零两个半月之久，一直坚持到全面胜利的目标已达到了战胜德国，但还没有完全打垮日本的地步，方才散伙。但是，在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上台之前267的任何一天，有关方面很少有人能够预见到这种合作，甚或连丘吉尔本人也不会想到；即使在1940年4月8—9日夜间希特勒入侵丹麦和挪威之前，也就是丘吉尔奉命组阁之前整整一个月的时候，也不会有很多人能预见到这一点。按照那种不合理的计算年龄时把不足一整岁的部分略去不算的方法，在1940年5月10日时，丘吉尔已经是六十五岁了，在这以前，他的事业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从他在1900年登上政治舞台，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十四年中，他在政界有一个光辉的开端，被目为一位前程无可限量的青年政治家。可是，在1914年的安特卫普远征和1915年的达达尼尔远征中，丘吉尔本人负有一份责任，有损他的令誉；而且，由于这两次军事冒险的失败已成为他的盛名之累，失去的声望更难恢复。许多英国人从丘吉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得出了这样的教训：此公大胆冒险有余而沉着判断不足，他的才华反而足以败事。虽然在随后的十五年中，他仍然在政界身居高位，不失为一个风云人物，可是就在他东山再起之前一个月，也许还有人认为他已经“赶不上班车”了。

丘吉尔的政治生涯的第二章，正是德国魏玛政权统治的时期，这是他真

正最不得意的日子。接下去的第三章，从希特勒开始掌权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丘吉尔在外表上的不得意，是重整旗鼓的必要的前奏曲，引出了较有起色的第四章和胜利的第五章。在 1933 年到 1939 年的七年中，丘吉尔鼓起勇气，激励自己，尽管无人理睬，仍然令人生厌地独自坚持着向那些英国人大声疾呼下去，而这些人则已下定决心充耳不闻，不过，他也开始重新赢得了少数英国人的尊敬和重视，这些人数目虽少，但是在逐步增加。在这个“绥靖”时期，由于英国人不愿意看到自己也许不得不经受另一次世界大战的严峻考验的前景，故而把丘吉尔揭露的情况不当一回事，尽管丘吉尔有文件为证，确凿有据地连续不断揭露了德国在逐渐重整军备，德国在军备竞赛中逐步占得了英法联合力量的上风，以及希特勒蓄意要使德国发动另一次大战。英国人对这些骇人的统计数字，事实和预测都一笔抹煞，认为这些都是想入非非的不适当的夸张，毫无中年政治家应有的明智，而无非是男儿家以战争为乐事的情绪。事实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间的二十六年中，丘吉尔同大部分英国人之间的关系，大体上是不融洽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人对丘吉尔的看法开始转变了。同样是这些人，在这个时刻，他们一方面称赞张伯伦，说他终于正视了严酷的事实，另一方面也称赞了丘吉尔，说他在过去七年中，一直勇敢地坚持揭露这些事实，并且呼吁对此采取果断有效的行动。多亏鲍德温和张伯伦在过去这几年一直不让丘吉尔执政，丘吉尔这时反而在张伯伦战时政府的最高级官员中成为一个显然可以不必对唐宁街因未做该做的事而犯下的一系列过错负责的人，由于这些过错，英国陷入了当前这样一种令人沮丧的处境。这时英国既然已经无可奈何地勉强同意又一次同德国交战，丘吉尔的主战热情就开始成为一种美德，而不是一件坏事了。这次战争一开始，英国人就欢迎他重新担任内阁海军大臣；在“假战争”时期，在所有大臣的演说中，只有他的广播演说能吸引听众，使他们精神振作起来。然而，丘吉尔与英国人民的关系在 1939 年 9 月 3 日到 1940 年 5 月 10 日一段时期内的这种变化，虽说是明显的，但是还没有预兆能说明，英国人与他们的领袖之间的关系将会融洽无间，事实上，这种水乳交融的关系从那时起一直维持到战争末了，用丘吉尔自己的话来说，它使“这段时期”确实成为“他们的最美好的时刻”。

这种看法和目的上的协调一致，表面上看来是突如其来的，因此初想起来又是令人惊奇的——它对世界历史的演变将起决定性的作用，使丘吉尔的主张得以实现。

但是，人们除非研究过 1939 年 3 月 15 日以来英国人的看法的潜在变化，以及直到那时为止的丘吉尔的全部经历，否则他们就难以理解这种看法和目的上的协调一致。

上文已经指出过，英国在生死存亡之际，通过一位伟人之口，说出了举国决心奋战的意志，而在这之前，英国全国人民在 1940 年 5 月 10 日到 6 月 25 日之间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决心，早已在有些不知不觉的状态中形成，否则就很难解释，何以这些豪言壮语会得到听众由衷的完全赞同。丘吉尔就职后，在下院发表的第一次演说中，说出了英国人民的心里话，他于 5 月 13 日（荷兰和比利时正在受到德军蹂躏的一天）说：“除了流泪、流汗、流血和苦干，我没有别的可以贡献。”5 月 28 日（盟军开始从敦刻尔克撤退的前一天），他在下院讲话时又表达了英国人民的看法，他说：“我们已经宣誓过

要保卫这个世界，在这次战争中，随便发生什么事情，都决不能使我们放弃自己的这个职责”，同一天，他在内阁中又说：“当然，不管敦刻尔克将发生什么情况，我们将继续打下去。”6月4日（德军进入敦刻尔克的一天），他再一次表达了全国人民的看法，他说：

我本人完全相信，如果人人都能尽到自己的职责，如果我们没有任何疏忽之处，如果我们就象现在这样，对事情作了最好的安排，我们一定能够再度证明，我们有能力来保卫本土，安然度过战争的风暴，有能力战胜暴政的威胁而继续生存下去，如果必要的话，我们就要长年打下去，如果必要的话，我们独自也要打下去。无论如何，我们就是准备要这样干。这是英王陛下政府的决心，也是每一个政府成员的决心。这是议会和国民的意志。……我们决不可泄气，否则我们就要失败。我们将战斗到底。我们将在法国作战，我们将在海洋上作战，我们将以越来越大的信心和越来越大的实力在空中作战，我们一定要保卫我们的这个岛，不管代价有多么大。我们将在海滩作战，我们将在登陆地带作战，我们将在田野和街巷作战，我们将在山区作战；我们决不投降，即使——我绝对不相信会这样——这个岛或者这个岛的大部分遭到占领和挨饥挨饿的话，到那时候，我们的帝国在海外的部分，由英国舰队武装和保卫起来，一定会坚持战斗，直到在上帝选定的吉日、新世界以它的全部力量挺身而出拯救和解放旧世界为止。

6月18日（即贝当宣布法国已向德国询问其停战条件的第二天），丘吉尔又表达了全国人民的看法，他说：

我毫不低估我们面临的考验的严峻程度，但是我确信，同胞们将会象巴塞罗那的英勇的人们那样，证明自己能够经受这种考验，至少会象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的人民那样，能够经受这种考验，而且能够不顾这种考验，坚持下去。不少事情将有赖于此，每个公民，不分男女，将有机会表现他们民族的最优秀的品质，为他们的事业作出最大的贡献。

7月22日不列颠之战接近第二个星期的末尾时，轮到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讲话了，那是在对希特勒于7月19日在德国国会发表演说时提出的敦促英国投降的建议“漠然置之”以后，哈利法克斯勋爵代表政府和国家宣称：“我们将不停止作战，直到自由得到保证为止”。

在这决定性的时刻，问题已不是在安特卫普对推进270的德军侧翼进行牵制，或派兵在加利波利登陆以迫使土耳其屈服，而是英国为了自身生存必须对当前显然占压倒优势的敌人继续进行生死搏斗。丘吉尔保证，“三军的专家顾问一致认为……有充分理由盼望最后胜利”，但英国人民甚至在尚未听到这句话时，就已经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他的看法。8月20日，德国对英国的民间目标进行了第一次空袭，从而默认已无法打赢这场不列颠之战以后，丘吉尔又一次表达了英国人民的看法，他说：

两年或三年，时间并不算长，即使在我们短暂不定的生涯中也不算长。而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中，就更不算一回事了；当我们在从事世界上最美好的事业，有幸成了整个欧洲自由的唯一捍卫者时，我们切不可因艰苦奋斗度过这些岁月而有所抱怨或厌倦。……通向胜利的道路或许不象我们所估计的那样长。但是我们没有权利去指望这一点。这条道路，长也罢，短也罢，崎岖也罢，平坦也罢，我们一定要走到底。

9月5日（德国对伦敦开始进行夜间狂轰滥炸的前二天），丘吉尔宣称，“在大规模准备国内防务工作的同时，我们毫不迟疑地向中东源源不断地派

护航队和援军”，英国人听了心情万分激动。11月5日（这天罗斯福重新当选美国总统），丘吉尔又报告说，“在我们面临如此逼近和如此险恶的入侵威胁时，我们从来没有停止过向我国驻埃及军队的增援，在我们海运能力几乎已经达到极限的情况之下，我们不仅向那里输送了人员，而且还忍痛从我们这里的部队中调拨出宝贵的武器输送到那里”，这番话使英国人感到同样的激动。

很明显，在这“最美好的时刻”，丘吉尔领导英国人民走上的那条崎岖道路，乃是他们自甘选择的道路。但是，要说他们这时自己愿意走这条道路，倒还容易解释，而要说他们是在领袖丘吉尔号召下愿意走这条道路的，那就271令人费解了。上文已经谈过，英国人民的精神面貌之突然的彻底改变，在一定程度上好象是别人的错觉。实际上，这种突如其来的心理变化，也许是某种精神异常迅速地化成了有意识的行动，这种精神是英国人民久已具有，但是长期抑制未曾流露的，同时，正是由于长期抑制，因此其力量就一直在增强。英国人民对丘吉尔的态度在同时似乎也突然地改变了，这种变化是否也仅仅是他们对他长期以来含而未露的潜在感情的突然爆发呢？或者，在这件事上，是否真正地发生了变化呢？一位亲身经历过这段时期的英国观察家认为，看来，全国人民对丘吉尔的思想感情的转变是真正的，也是可以解释的。可以这样来解释，即由于丘吉尔本人发生了真正的转变，从而引起了全国人民的这种反应。

丘吉尔就象凯撒那样，既是一个伟大的活动家，又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即使他单单从事笔墨生涯，也就足以使他声誉卓著。他的文学作品最能说明他的毕生经历，其中，《我的早年生活》，甚至比《第二次世界大战》

一书本身更能说明1940年至1945年间他一生事业中登峰造极的阶段。这本早年的自传，表明他是属于那种晚熟的人，这些人能够在大多数人早已不再有创造力的年龄，使自己的潜力继续得到发展，终于做到冠绝侪辈，鹤立鸡群。如果说，他一生的经历是符合一般人的正常标准的话，那么，丘吉尔的心理年龄在各个阶段都要比他的实际年龄也许轻五岁、十岁、十五岁或二十岁。这个巨大的差异就是天才的确证。它不仅说明了他在1940年获得成功的原因，而且也说明了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由于自己的行为而遭受挫折的原因。丘吉尔在四十多岁时，行动起来宛如二十多岁的普通人，这一点也同他在六十五岁时仍以四十多岁人的精力来活动一样，完全符合他那罕有的气质。大凡年届六十五岁高龄的人，要是处在丘吉尔在1940年5月10日夜間所处的那种境地，很少有人能体验到象丘吉尔在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叙述的那些感受。一个普通人读到这一著名的篇章时，无不顿时相信这确是完全出自肺腑之言，而且边读边感到自己被领到一位英雄的面前，这位英雄此刻的的确确正在“与命运同时前进”。能以如此沉着坚定的信心，奋起应付这样艰巨的局面，这种魄力是令人敬畏的。现在回顾起来，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位英雄“集‘毕生’精力于这一时刻，经受了这场考验”。丘吉尔的同胞们在二十272年代和三十年代中，曾经由于他成熟得异常缓慢，而也许会错误地把他看成是小时了了，大未必佳，不过，这种看法还是情有可原的。对于这些人来说，幸运的是，在1940年5月这个无论对英国还是对丘吉尔都是命运攸关的时刻，他们凭直觉看到，在自己的运气这样坏到极点时，正是他们的这个领袖的威望达到顶点的时候，而只有在这个领袖的领导下，他们才能反败为胜。

究竟是什么思想和感情，鼓舞了英国人民同他们一致挑选出的那位新领袖协力行动，使他们在吃败仗的时候还能坚决不服输呢？他们明白，决心继续作战就是自找麻烦。不过，丘吉尔所说他自己在1940年5月10日怀有的那种“宽慰的感觉”，他的同胞们肯定也有。究竟是考虑到什么因素，才使他们和丘吉尔一样树立起这种信心呢？

首先，由于感到他们此刻终于有了一个明确的目标，而且感到他们已团结在一起，决心为彻底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所以他们信心倍增。即使命中注定要他们抵抗那些欧洲大陆的征服者直至战死的话，他们也义无反顾。

其次，由于看到自己再一次单独同一个人已经把他们在大陆上的盟国相继征服的强国交战，他们的信心反而加强了。因为在此之前，当英国在1805年到1812年间单独抗拒拿破仑之时，它也经历过这样一个最美好的时刻。这一段英国历史，对一百三十五年以后的英国人来说，还是记忆犹新。这就毫不奇怪，在1940年9月5日，丘吉尔竟敢说，当谁也说不出在这次战争结束之前，希特勒帝国的疆域将会扩展到什么程度时，他坚信，希特勒帝国会象拿破仑帝国一样迅速地消失，而且说不定消失得更快一些。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在英国报刊上发表的许多读者来信中，在同一个题目上却有种种不同的看法。自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对满洲的侵略，直至1940年6月25日法国覆灭，英国人早已感到，要求他们重上战场来制止侵略、保卫全球这样一个任务，不是他们自己单独所能承担的。因此，他们不得不依靠伙伴们的合作，而这些伙伴却比英国更为软弱，意志也更不坚定（部分由于英国的过失）。在6月间，法国作为一个伙伴，非但不能有助于英国，反而变成了一个累赘。这时既然法国已经退出战场，而英国则决定继续独自作战，原来严重阻碍它去全心全意捍卫集体安全的那种传统的岛民意识，此273刻非但不是一种桎梏，反而成为一种动力了。英国人对欧洲大陆的新的主宰者进行抗战以保卫英伦三岛，可能是孤注一掷，成功的希望微乎其微；但是不管结局怎样，此刻他们至少是又一次从事于他们以前曾经获得成功的事业。在这一回合的斗争中，他们除了自己，已经无人可以依靠，他们正在沿着自己审慎地选择好的道路走下去。

他们是否能够免于被打败这样一个眼前的问题，比起他们能否赢得战争这样一个根本的问题来要简单些。要是说，原来在法国覆灭之前，通往胜利之路已经难以辨认，那么，此刻英国军队在欧洲大陆上不再有立足之点，欧陆的资源全已处于德国控制之下，这条胜利之路大概更为模糊不清了。可是，从敦刻尔克顺利撤军这个几乎奇迹般的成就，对英国国民的士气却起了不可估量的振奋作用。这样一支得到上天拯救而免于被歼的军队，肯定将福运亨通。皇家空军在敦刻尔克上空击败了德国空军，这件事是即将在英国上空展开的空战结局的吉兆。由于丘吉尔的预见和决断，有二十五个战斗机中队没有参加法兰西战役，而是留作后备，这在日后英国本土进行空战时是一支不可缺乏的、至少要具备的力量。此外，在以往的斗争中，英国已有先例，依靠本身的努力拯救了自己，并以自己的榜样拯救了欧洲。这个先例使人们产生了乐观的期望，认为假如英国这时能保住自己的领空和领土的话，它不久就会摆脱孤军作战的状态，而且最后有朝一日会看到胜利就在眼前。丘吉尔在1940年6月16日所感到的那种“冷静的自信心的光芒”，从唐宁街发射出来，照遍了整个英伦三岛。

事实上，甚至当英国与外界隔绝的时刻，它也并不是完全孤立无援的，

因为在法兰西之战已告结束，不列颠之战尚未开始之间的这个令人不安的沉寂阶段，由于欧洲大陆上一些流亡政府及其坚持抗战的残余军队来到了岛上，使英国人的士气振奋起来。这些盟国军队的实力此刻虽然很薄弱，这些流亡政府此刻虽然软弱无力，不能在其国内发号施令，但是对英国人来说，只要一看到它们，自己就觉得精神抖擞，信心倍增。这些同伴由于亡了国，已经比英国人不知多吃了多少苦头，然而他们还是象英国

人一样，决心继续作战。这些流亡国外但没有被征服的盟友和英国同生死共患难，这不啻是对英国的抗战决心和 274 英国的战斗力量投了信任票，从而使英国光荣地成为捍卫欧洲民主政治的堡垒。假使这些波兰人、挪威人、荷兰人、比利时人和“战斗的法国人”能显示出这种精神而且能怀有这种信心，他们的英国东道主在道义上就一定要使自己无愧于他们的英勇客人。

最后一点但同样是重要的一点是，法国覆灭之后，美国人由于受到这次灾祸的震动，改变了他们的态度，这使英国人得到了鼓舞。美国人也同英国人一样，感到形势突然变得简单了。美国态度的这一剧变立即开始有利于英国。自从日本于 1931 年 9 月侵略满洲，迄至 1940 年 6 月法国覆灭为止，由于英国政治家知道美国的政策是难以捉摸的，根本无法加以估计，结果使英国的政策一直受到了牵制。只要法英两国还是躲在那条有名无实的铜墙铁壁马其诺防线后面，美国公众以至华盛顿政府首先关心的问题，就是要采取一切可能的预防措施，务使美国不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那样卷入另一次大战。假使英国也象法国那样在 1940 年 6 月投降了希特勒，美国也未始不可能跟着这样做；退一步说，它也可能象苏联一样，在希特勒伺机进攻它之前，不会主动去自找麻烦。但是英国在法国覆灭后仍决心继续对德国作战，终于使美国人明白了，他们为了要保存自己，此刻必须做些什么。他们看到，必须使美国成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才能为英国这个民主政治的堡垒提供必要的手段来坚守下去；同时，他们也看到，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尽一切力量为英国作战提供武器，即使因此而使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在所不惜。

美国人民也象英国人民同样幸运，得到了一位能够应付当时局势的领袖。他们配合罗斯福为争取共同胜利而立下的功劳，不下于英国人民配合丘吉尔所立下的功劳，或者也不下于罗斯福和丘吉尔两人相互配合所立下的功劳。罗斯福于 1940 年 6 月坚信，不论发生什么情况，丘吉尔都会继续作战，正是根据这一信念，他才在那个紧急关头向英国输送了极为宝贵的武器。罗斯福于 1940 年 11 月 5 日又当选为第三任美国总统，正和丘吉尔于同年 5 月 10 日就任英国首相一样，对共同事业说来，都是吉祥之兆。与此同时，罗斯福并没有由于美国政府在大选年容易产生的瘫痪状态而缩手缩脚。当 1940 年大选以前的几个月快要过完的时候，他凭直觉感到这一个大选年同时也是命运攸关的一年，并根据这一直觉采取了行动。回顾起来，他的这个空前大胆的行动是正确的，这一点可由选举的票数来证实，经过这次大选，他连任的期限比包括华盛顿在内的任何一位前任美国总统的任期都长。1940 年 8 月 16 日，罗斯福宣布，他的政府正在同英国政府磋商，在英国领土上获得基地供给美国海军和空军使用；同月 20 日，丘吉尔宣布，在纽芬兰和西印度群岛的这些某地实际上正在交给美国，租期为九十九年。这当然只是计划的部分内容，根据计划，英国将取得一批宝贵的美国驱逐舰，英国人民敏锐地领会了丘吉尔对这笔出色的交易所作的评价，丘吉尔说：

这一发展过程毫无疑问地意味着，英帝国和美国这两个讲英语的民主国

家，势必在相互有利以及对全体有利的某些事务中有所结合。就我本人说来，当展望未来时，我不会对这一过程有什么疑虑不安。即使我想阻挡它，也阻挡不了；没有人能阻挡它。它就象密西西比河一样，总是滚滚前进。让它流吧！让它浩浩荡荡地、不屈不挠地、势不可当而又慈祥地流向更广阔的天地和更美好的日子去吧！

听以在罗斯福再度当选总统，再次受权去执行他的和他的国家的新政策之前，英国人已开始看到以雄厚无比的美国资源来装备自己争取胜利的那种前景。这位总统此时立即采取了行动。他于1940年12月29日发表广播演说时说：“我们必须成为民主国家的大兵工厂”，接着，又在1941年1月6日致国会的咨文中，宣布美国将向各民主国家提供武器。1月10日，罗斯福以“加强美国国防法令”这巧妙确切的题目向国会提出了租借法案。

1941年3月11日，这项法案获得通过，成为法律。

276 因此，在法国覆灭后只不过六个月多一点的时间内，英国人的希望就有了美国的许多法令为可靠的基础而巩固了起来。只要英国人这时能够在“猛烈的空袭”的严峻考验下，继续坚守到在北美的那个“民主国家的兵工厂”

全力投入生产，最后战败的阴影就将开始落在德国的头上。不管德国将来在扩大其征服时可能获得多大的成功，美国和英联邦合在一起的工业生产能力，将不会被德国和在它铁蹄下的欧洲大陆国家赶上。可以肯定说，在德国人控制下的那些国家的生产能力，永远也不可能被德国人充分利用。在那些被征服的国家里，厂家和工人正在被迫为了令人深恶痛绝的战争目的而工作，这个战争的目的，是要把枷锁永远套在他们的脖子上，可以指望，这些人会冒了生命的危险，使自己的工作尽量少为德国的成争目的起作用。相反，在海外那些仍然未被征服的民主国家里，却可以指望厂家和工人全力以赴地“拼命苦干”。一方是决心充分利用现有的条件，使作战潜力的指数上升，另一方是决心“消极怠工”，使作战潜力的指数下降，所以，早在1941年新年伊始，战争的形势就已经开始在转变了。

第五节 1940年6月25日至1941年12月7日期间英国人的坚韧不拔

在战争的这一阶段，联合王国的平民等于都在前线。他们经受着猛烈空袭所带来的空前苦难，即使大多数人连皮肤也没有擦伤，但是他们都被搞得筋疲力尽，对国家的作战努力来说，这比少数人的伤亡，威胁更大。从7月到12月，共有二万三千零二名平民伤亡，对全国人口来说，这只不过是一个很小的百分比，但是这个数目已经超过了同一时期内武装部队的伤亡数字。

疲劳问题之所以严重，是因为增加生产是头等大事；可是，疲劳还只不过是英国人的勇气所要经受的三大严峻考验之一。他们要经受的第二种严峻考验是经常担心暴死。第三种严峻的考验——在英国也是没有经历过的——是既定的社会秩序被破坏了，首先是家庭里妻离子散，而家庭乃是组成社会的细胞。家庭里妻离子散的情况有：对儿童进行预防性疏散；住房被炸毁，不得不到能收容他们的地方去栖身；劳动力全部按地区重新分配；在遥远的海外战场服役的军人与妻子的长期分离。其277中，对家庭最起破坏作用的是，征召已婚妇女参加民工队，使她们离开家庭，离开子女，这是一项严酷的措施，是英国为了取得最后胜利而必须付出的一部分代价。这一措施，希特勒在吃过苦头之后，也不愿如法炮制，因为要付出的代价实在太高了，连

一个蛊惑民心的独裁者都不敢强制执行。

英国人民在个人遭受这些苦难的情况下，表现了他们爱好社交的天赋，他们能够临时凑合成一些社交组织，来部分地弥补战争对他们的生活所造成的破坏。一座警戒空袭的民防哨所，又可以当作俱乐部使用，俱乐部的会员虽然社会经历大不相同，也没有选择会友的条件，却渐渐结成了朋友。那些一夜又一夜躲避在伦敦地下铁道的站台上，或躲避在一两个不使用的隧道里的群众，逐渐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社交组织和社交活动的网，开展业余戏剧演出、宗教礼拜、辩论会、音乐会等等；在战争结束之前，甚至有人担心，唯恐这些夜间的难民，有的人由于实在太喜爱这种反常的有家归不得的自由生活，也许不愿恢复正常，回到家里去做辛苦的家务。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有一个减轻人们痛苦的因素，这就是，同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内的过去历次战争相比较，药物治疗的效果这时有了惊人的提高。当伦敦和其他交战国的许多大城市的下水道和总水管因遭到轰炸而一再被破坏时，当居民由于操劳过度、失去家庭、睡眠不足和粮食定量等等原因在精神上和体质上都变得虚弱时，可以预料，由于瘟疫而造成的死亡一定会使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的那一次流行性感冒所造成的灾害相形见绌，然而，在惊人的困难环境下，公共卫生工作仍然做得那么好，配给的各种食物安排得那么适当，所以在整个战争时期，所有交战国内人民的健康情况一直都出人意外地良好，只有少数地区例外，特别是希腊以及阿纳姆战役后的荷兰北部，那里的人民由于占领国怀有故意，存心惨无人道地对待他们，而被活活饿死。科学应用于社会生活有了很大的发展，英国虽然不是在这方面得到好处的唯一国家，但是这肯定是英国自己的社会状况方面的几个因素之一，这些因素使英国在遭受 1940 年春天和夏天的巨大灾难之后，仍能长期经受严峻考验而坚持下去。

究竟是什么感情和思想鼓舞了英国人，使他们能在十八个月的艰苦考验的时期，在反复经受“小型的猛烈空袭”时期，以及在经过德国导弹武器——通称为 V1 和 V2——的连续光顾后，仍能保持旺盛的士气呢？

对于受到猛烈空袭之害的人们之所以能坚定自己的意志，一种想法是他们意识到，这种狂轰滥炸本身就是德国空军承认自己过去在不列颠之战中失败的自白书。戈林要不是由于代价太大和把握太少的缘故而放弃了以前想在白天吃掉皇家空军以掌握英国上空制空权的这种打算的话，他决不致于把自己的空军力量转而用在那种比较容易进行但是效果也较小的夜间骚扰英国平民的行动方面去。到 1940 年 10 月 31 日的时候，英国空军已经赢得了 1940 年 7 月 10 日开始的不列颠之战的胜利，而英国人民也已明白了这一点。早期在空战方面的胜利，被认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使那些在日后的猛烈空袭中受害的平民都感到，即使他们个人或许会丧失生命、炸残四肢、荡尽财产或者不得睡眠，但是在这第二阶段的空中战役中，国家的生存已经不再有危险了。

在这个阶段，使英国人的士气得到振奋的第二个因素是，自 1940 年 12 月 9 日开始，英军在西部沙漠连续战胜意大利军队，接着，在东非战场又取得同样辉煌的胜利。对于在非洲战败意大利对于这些胜利的重要性，英国公众的估计并不过高。他们十分清楚，他们正在自己锻造或者向人租借的“工具”所要起的“作用”，是在欧洲打败德国，而在任何地区，只要德国人尚未亲自出马，战斗就不会是决定性的，因此，战胜德国的一个小伙伴，对决

定这场战争的结局并不起什么作用。尽管如此，在这种悲观失望的时刻，能在任何地区打败任何敌人总是件好事，英国人民受到了韦维尔将军的鼓舞，韦维尔用实例证明了，德国人不久前一直在使用并取得如此巨大成就的那种机械化部队的新战术，一个英国指挥官也会使用——尽管在当时规模要小一些——并能产生类似的效果，何况，他本人就是这种战术的倡导人之一，德国参谋总部正是从这些人那里，学到这种新的军事诀窍的。可惜，韦维尔将军有机会来运用这种战术的时间很短促，但是他用以取得的辉煌成绩，已经非常及时地使英国人民的精神面貌振作起来，从而对此后战争的发展起了深远的影响。

这些都是促使英国人民这时“拼命苦干”的心理气氛。在工业生产战线上，丘吉尔有欧内斯特·贝文为副手，贝文对最后胜利所作的贡献，甚至可以同丘吉尔相提并论。丘吉尔在他生平的这一阶段，全然超越了党派政治的障碍，而贝文在丘吉尔的联合政府里所起的主要作用，正同首相一样，是作为一种象征，在全国范围内把政党间的分歧暂时搁起，以使全国的力量联合起来。自战争爆发后，工党虽然忠诚地支持张伯伦政府，但是并不对它表示钦佩或信任。而只要工党的代表还未参加政府并担任一些最重要的行政职务，英国就休想联合全国的力量来“拼命苦干”。贝文并非毕生都当议员，他对国际事务一向也不特别关心。1935年的阿比西尼亚危机，才使他意识到国际事务的迫切重要性，后来，又由于他以联合王国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出席了1938年9月在澳大利亚召开的一个讨论英联邦事务的非正式会议——那时正是希特勒硬要英法两国同意他提出的瓜分捷克斯洛伐克的条件，全世界处于战争边缘的当口——他对国际事务就更重视了。贝文本人出身工人，他献身于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在这方面，他不仅获得工人弟兄们的信任和拥护，而且还博得反对他的人们的尊敬，因为他为人忠实、坦率、勇敢、果断，最重要的是他喜欢采用说理和协商的方式，根据一件事本身的是非曲直来说服对方，但是当他看到除了斗争别无他法时，他也决不逡巡畏缩，这是一个性格坚强的人的特点。他五十九岁时由工会活动的场所调到内阁工作，不久就显出他具有政治家的本质。贝文作为丘吉尔政府的劳工与军役大臣，肩负着处理1940年5月22日的联合王国（国防）紧急授权法令中有关动员人力这一棘手问题的重任。经大臣们建议，这项果断的立法措施授权英王在咨询枢密院后，制订这样的国防条例，规定为了保证公共安全、保卫王国、维持公共秩序，或是为了有效地进行英王陛下可能从事的任何战争，或者为了继续提供社会生活所必需的物资或劳力，只要英王认为有必要或需要采取权宜措施时，可要求人民把他们本人、他们的劳力和他们的财产全部交给英王陛下自由处置。

这项法令于一天之内在上、下两院逐级通过，而且为公众所接受，公众不但处之泰然，而且还衷心感到满意。可是，英国政府能获得这些权力是一回事，如何来实际使用这些权力又是一回事。贝文的成就在于，他能尽量采用说服而不采用强制的办法，取得了巨大的、必不可少的效果。在联合王国，也许没有别人能做到这一点。自丘吉880尔而下，贝文的成就是任何一个英国政治家为了赢得胜利所能作出的最伟大的贡献。他能有这样成就，是因为他既能使公众信任他，又能在一系列艰巨的工业谈判中尽人之常情，他巧妙地把这两种特长结合了起来。

至于丘吉尔班子里的其他成员，这里只举了C·R·艾德礼、安东尼·艾

登和赫伯特·莫里森，而没有提到其余的人，希望不要因此而引起不满。

英国历史中的这一章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这一章——在这段时期里英国是独力作战的——结束得很顺利，所以如此，并不是由于英国政府和英国人民作了什么特殊努力，而是由于英国的敌人的行动自取灭亡。1941年6月22日，德国入侵苏联，同年12月7日，日本接着袭击珍珠港，这样一来，英国就不再感到孤独无援，而是成为一个大同盟中的一员了。

1941年6月22日，丘吉尔带头行动起来，其迅速和果断正象他在1940年5月和6月采取行动时那样。那一天，德国人于凌晨四时进犯苏联，丘吉尔在晚间九时就宣布：联合王国政府已经决定，根据凡是抗击纳粹帝国的任何个人或任何国家都将得到英国援助的原则，它将竭尽所能给予俄国和俄国人民以援助。

随着德苏战争的爆发，欧洲大陆再次出现了一个战场，而德国也再度使自己陷入两面夹攻的境地，正象它在1939年9月1日进攻波兰时所预料的那样，这一次向东方的进犯将会导致英法两国同它交战。在那次战争的第一阶段，大陆上的东线在9月底前已经荡然无存，大陆上的西线在1940年5月和6月间在几乎同样短促的时间内也被消灭。这些惨遭蹂躏的经历使英国人民认为，欧洲大陆的任何国家，只要德国想要进攻，就会象波兰和法国一般以同样的速度落到同样的下场。因此，1941年6月22日那天，在英国有不少人无可余何地预料将看到德国的摩托师在六星期之内开进巴库和马格尼托哥尔斯克的可怕景象。但是这些英国旁观者却没有认识到，希特勒的战争机器象拿破仑的一样，只能用在那些面积只有欧洲大陆上的一个半岛这样大小的国家里作战，而在俄国的辽阔无际、荒无人迹的国土上，希特勒的坦克正同拿破仑的步兵一样，如果要想再象过去在欧洲的几次胜利那样，进行决定性的打击来达到最终的目标，就一定要遭挫败。直到1941—1942年之交的那个冬天来到俄德战场以后——尽管这时俄国军队已经损失惨重，而且还作了长途撤退，但是他们仍然存在——英国人民才开始领会到丘吉尔在上一年夏天的作战季节迅即欣然把俄国人当作战友来欢迎的重要意义。

由于德国未能以一个战役来征服俄国，而使那些与俄国人协力作战的英国人感到出乎意外的宽慰。但是，在1941年将近年终的时候，有不少英国人却追忆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人终究在第四个战争年头的战役中打败了俄国人。因此，虽然这次也象上次那样，俄国人没有在第一年内就垮掉，但是他们这时反复取得的这种消极成功，显然并不能保证在最后赢得共同胜利。但是当1941年12月7日日本袭击了美国后，英国人一听到这个几乎难以置信的消息，却很少有人不立刻就认为，日本采取这种自取灭亡的行动，等于宣告德国和它自己最后必败。那天晚上，英国一般的人，例如本章的作者，都能睡得很熟，“不需要寻求什么美梦”，正象丘吉尔在1940年5月10—11日午夜几小时内睡得那样酣畅。

丘吉尔记载自己在那个不朽的時刻的感受时写道，“事实胜于梦想”。而在1941年12月7日这一天，他的想法则是：“我们终于赢得了胜利！……我们的历史不会结束，”

第二章英国的经济背景帕特里夏·哈维

第一节从战争爆发至 1940 年 5 月

(一) 为战争作准备

就战备工作的完成程度而论，英国远远不及它的主要敌手德国。自从纳粹党在德国执政以后，就一直把德国的资源有意识地用来准备未来的战争，到 1939 年 9 月，军事、经济和行政方面的准备工作已经达到非常高的程度。国家的经济已经完全动员起来准备打仗。早在 1936 年，劳动力已感显著缺乏，在国民收入不断增长的同时，国家强行加以控制，以保证将这些增长的收入专门用于战争目的，而不是用于增加人民的消费。在行政方面，战备工作也进行得很好，已经建立起一套经济管制体制，一旦爆发战争，无需经过什么变动就可照旧运转。

英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英国很迟才开始参加重整军备的竞赛，而且甚至在那时候，它的准备工作也是慢条斯理的，这是因为执政者对未来战争抱着一种“有限责任”的观念，并且还希望尽量不要干扰国家的正常经济结构。只是在慕尼黑危机发生后，英国才开始为打总体战作全面准备。英国同德国在作战努力方面的大致差别，可以由以下事实来说明：在 1938 年时，英国的国防开支只占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七，德国则占百分之二十五，在战争爆发的时候，英国大约仍有一百万人失业。再说，到 1939 年夏天的时候，英国还没有采取什么措施，来建立一个能在战时指导全国经济的行政机构。在文职人员方面，也没有一个类似军事方面的参谋长委员会那样的中枢机构，受权去指导全盘的战时经济。英国虽在 1939 年春天已开始把行政机构加以改组——把粮食（列入防务计划）部从贸易部中划出来，在夏天又成立了军需供应部。但是，国内安全部、经济作战部、粮食部、情报部和海运部直到 1939 年 9 月 1 日才成立。除了战时内阁之外，试图要成立的第一批中枢机构，如印花委员会和内阁经济政策委员会，一直拖到 10 月才成立。显然，在人员配备和职权范围这两方面，必然会产生一些困难，而这些困难反过来又造成因循延误和滥用职权的情况。不过，在战争的开头两年里，值得注意的是，行政方面已经有了许许多多改进。

283 只有在一个方面——但是后来证明，这个方面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英国的战备工作或许胜过了德国。

英国是在作长期战争的打算，因此宁愿牺牲眼前的力量，以便为未来蓄积更大的力量。这就是说，它把军备的“深度”比军备的“宽度”看得更为重要。只要英国能顶住德国的初期进攻，它所能支配的潜在资源就可转化为实际的力量，这股力量将远远超过德国的实力。另一方面，希特勒却不肯听从他的军事当局的劝告，仍然坚持要牺牲未来可能有的生产，只求眼前能尽量多生产。他希望以几次闪电战来干掉他的敌人。英国所主张的长期作战的观点虽然在最后证明是正确的，但是，在 1940 年夏天，希特勒的观点却似乎是正确的。

(二) 海外供应的物资

在整个战争时期，英国要保持不断从海外输入物资，自始至终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总的来说，英伦三岛根本不能自给自足，英国人吃的、穿的都须仰仗外界供应，他们如要专门生产那些为坚持一次大型战争所必需具有的武器和设备，也须依靠外面供应的原料。虽然英国在潜在的资源方面远远超过德国控制下的那些国家，但是同德国相比，英国有两个极为不利的条件。

第一，它不得不依靠那些供应它物资的国家的善意，在必要时，得准备好收到货物立即付款；第二，它必须通过危险的海路来运输这些物资。因此，“现金”和“运输”就成了一对孪生的难题。

在英国需要海外供应物资这个问题上面，美国的态度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从潜力方面来说，美国是英国急需的那些物资的最最重要的来源，也是英国最容易得到的物资来源。美国的政策受到中立法的约束，中立法的主要条款规定：禁止向交战国出口武器；撤销对乘坐交战国船只的美国公民的保护；在向交战国出口物资前，必须预先取得支付手段；禁止美国船只进入任何作战区域。

毫无疑问，在战争初期，在这些有关的必要条件中，最重 284 要的是对美国出口的物资的预先付款问题。

美国的决定意味着，在英国形成其政策的过程中，必然要着重估计外汇问题。1939 年初，外汇管理条例草案已经拟订就绪，并且在战争爆发前不久开始生效。外汇管理条例实施以后，英镑区接受了该条例为“战时”所下的定义。英镑区成员国都表示，愿意采用类似联合王国已采用的外汇管理措施，并且还愿意将它们赚得的硬通货委托外汇平衡基金组织保管，该组织将起到一个中心分配者的作用。“英镑区实际上是一个金融联盟，以伦敦为中心，并由伦敦来管理。”英镑区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大大方便了英国从海外输入物资的支付问题，因为这些国家向英国提供的物资中，有许多并不要求立即结清，而是同意赊账。加拿大和法国虽然不是英镑区成员国，但是也愿意同联合王国结成在金融上全面合作的伙伴关系。

另有一些国家介于要求立即付款的美国与英镑区成员国及法国和加拿大之间，它们与英国签订了特殊的协定，同意让英国把英镑收支差额累积起来暂不结清。

外汇管理实施办法的实施，以及同其他国家商谈签订一些协定使这些国家同意联合王国延期付款，这样英国就可望用以下三个主要方法来解决因需要进口物资所引起的财政困难。它可以强制执行严格的进口管理办法；它可以出售国外的投资；它可以努力保持它的出口贸易。

控制进口显然是最能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但是从战争爆发到 1940 年夏天这段时间内，进口管理毫不严格。管理工作的实施范围既不全面，连在那强行实施的有限范围之内，实施得也不大刀阔斧，在 1940 年 6 月之前，有许多奢侈品仍然进口。即使不算这类进口所造成的不良后果，但必需品的价格已在不断上涨，因此这个问题就不得不找别的办法来解决。

一个办法是出售英国所持有的外国证券，美国有关当局在讨论英国的财政困难时，对之相当支持。英国在国外投资的金额估计超过三十亿英镑，但是其中有许多是无法出售的，或者在当时的情况下只能廉价出售。285 在 1940 年初，斯坦普勋爵曾经估计，按照英国准备要打三年仗的计划，出售证券每年只能指望获得大约七千万至八千万英镑。由于英镑区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在战争的第一年里，赤字估计已经达到四亿英镑左右，而且在以后几年里这个数字还有可能再上升，而黄金和外汇储备每年只能指望获得一亿五千万英镑，因此情况看来是很危急的。

看来唯一的办法是扩大英国的出口。但是这也有其种种困难，例如出口许可证的颁发、各军种的需要、海运方面的耽搁与损失，还有要从心底里说

服工人，使他们认识到，在战时，生产奢侈品往往与生产军需品是同样重要的，所有这些困难都为顺利推行这样一种政策带来了阻力。可是，尽管如此，在1940年春天还是开展了一个扩大出口额的运动。但是在这项运动还没有见效时，军事发展已经迫使它停止了。法国的覆灭和联合王国各党联合政府的上台，标志着英国在向海外采购物资方面开始采取一种新的政策。

另一个问题是货物的运输，这个问题在战争刚爆发时似乎不那么紧迫。有关部门根据战前对英国运输设备所作的估计，认为这时可以派用处的设备，将能胜任所需要承担的全部运输任务。这种过分乐观的想法，造成了许多近乎灾难性的后果。在战争爆发的时候，没有哪一个机构能对海运拥有完全的控制权，除战时内阁外，也没有哪一个机构在负责规划如何进口。另外，各有关当局认为船舶的吨数已足够使用，而无视阿瑟·索尔特爵士（后为勋爵）等人的意见，他们认为，应当把那些体积大、在运输中占舱位、贮藏起来也不致有变质之虞的原材料堆存起来。在国内，政府也没有做什么工作去鼓励农业生产各部门，而这些恰恰是最有可能使进口需要物资数量减少的部门。

虽然说，海运危机直到1940—1941年的冬天才出现，但在1940年初就很明显，情况远远不象预料的那样妙。1月间，政府宣布征用全部远洋船舶，并采取了使进口计划更能发挥效力的措施，其一部分原因是由于“运输”和“现购”两方面的要求。在“现购”和“运输”这两种要求之间，也开始出现了困难。由于缺乏美元，必须减少向美国购货，而海运舱位的不足，则影响了运输的数量和时间，产生了更严重的问题。在战争的头九个月里采取286的那些管理政策失败了，这一点表现于，虽然这一时期的输入量比战时任何一个时期都高，但是库存量却听任其急剧减少。

（三）人力问题

人力问题是战时经济的最重要问题之一。它不仅牵涉到建立一支人数多多益善的劳动大军的问题，而且还要做到在各军种、民防和主要工业之间合理分配人力，并在工业方面使人力发挥其最大的作用。

在战争爆发之前，有关武装部队征兵的计划和有关在工业部门保留必要工人的计划已经拟订就绪。征兵工作顺利开展，到1939年底已经有一百多万人应征入伍。1939—1940年的冬天，征兵的速度放慢了，但是到1940年春天又加快了。可是武装部队由于缺乏装备，所以需要的人力还不太多。在战争的头九个月里，尽管有专业人员登记表规定的限制，部队还是从工业部门获得了它所需要的全部劳力。

工业方面的情况有些不同。在战争爆发之前，对于工业劳动力的扩大和再分配方面的组织工作，没有制订过计划。政府的专家们曾经预言，劳动力的需要量将大大增加，但是结果证明，在所说的这段时期内，工业方面吸收劳工的能力很差。1940年4月，仍有一百多万人失业，即使不把暂时失业的人员计算在内，一个久治不愈的失业“硬核”仍然存在。可是，也有一个重要的例外情况。从战争爆发后，对熟练工人越来越需要，但是英国政府没有下过决心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并建立一支熟练工人的后备军，以应付即将来临的更困难的时期。有许多能解决问题的措施，理应在当时就采取，而不必等到后来。可是，英国政府错过了扩大和发展训练中心的机会；由于害怕引起工人闹事，政府不敢强行推广以非熟练工人来顶替部分熟练工人的办法，同时也不敢要求对可以调度的熟练工人强行重新分配。政府只得采取间

接措施和利用经济形势，但是这些办法都未能实现重新分配熟练工人的希望，结果，出现了“偷挖”和普遍囤积熟练工人的现象。

（四）加强财政金融管理

在英国国内，1940年5月以前的一段时期，乃是踌躇狐疑和坐失良机的时期。虽然1939年8月24日的（国防）紧急授权法授与了政府几乎无限的法定权力，但是这些权力并没有被使用过。政府为了害怕引起骚动，不敢贸然采取不得人心的措施，可是，在这个问题上，政府在多数情况下反而落后于公众舆论。政府的工作效率，还因以下几个因素而降低了，如：倾向于把作战努力主要看作是财政金融问题，而不是看作物质资源问题；在当时也缺乏为编制一些稍微精确一点的计划所必需的详细的统计资料。

英国政府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决心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以防止通货膨胀和投机活动。战争爆发后，物价立即上涨，更加强了政府的这一决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政府颁布了物价初步冻结令，到1939年10月，又代之以预先规定最高价格的原则，以弥补设备更新的费用。这些条例是有效的，因为这些条例确实制止了投机活动的泛滥，但是它们不能适用于所有商品，而且，它们的作用是保持利润稳定，而不能防止物价上涨。在战争爆发时，政府曾实行征收百分之六十超额利润税的办法，来全面制止投机活动。后来到1940年5月，这一税率又提高到百分之一百。

在防止通货膨胀和投机活动的过程中，英国政府所碰到的主要困难之一是，在某些情况下，有必要去考虑利润的动机，因为利润可以刺激人们更加卖力。在农业领域，这一点更明显。增加粮食生产，对于解决从海外输入物资的问题来说，显然具有最重大的意义。在1939—1940年的那个冬天，制订农产品价格的政策，既要贴补生产成本的提高，又要允许农民的收入普遍有所增加。可是，由于缺乏远见，政府不能区别各种作物的价值，只是笼统地鼓励生产一切农作物，而没有鼓励生产那些从营养角度来看是最需要的作物。它要求每样东西都出产得多些，²⁸⁸农业生产的水平确实是提高了。“然而，如果把这种经济刺激的政策同样宽大地应用于同作战努力有极其重要关系的所有其他民生部门的话，那么，战时经济非常可能已经变得难以收拾了。”

工资问题是使政府大伤脑筋的问题。工资不仅是生产成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民收入的最大组成部分。而且，工资比利润更有可能转变为商品。鉴于商品越来越缺乏，因此对工资进行严格的限制是合乎需要的，但是，这样做政治上有困难。最有希望能使工资稳定的办法，是把生活费用固定下来。如上所述，政府所采用的物价管理办法，在这方面并不是完全有效。政府仍然相当害怕工人同事，1939年12月6日，财政大臣在一次演说中要求工人合作来使工资保持稳定。工会理事会的秘书长答复说，工人不会同意生活水平有任何降低。1939年10月，煤矿工业首先增加工资，后来其他许多经济部门也同样增加了工资，危险的是，增加工资将成为普遍性的。由于有组织的工人拒绝接受有关工资增加的任何一般性政策，而工业的安定对政府说来又是必要的，因此政府只能依靠开展群众教育运动，只能设法把生活费用的上涨保持在合理的限度之内。为了实现后一目标，1939年11月，政府决定采用“临时”补贴办法，以防止有可能发生的主要食品价格的猛涨。这种“临时”补贴就成为后来的几个战争年头里经济政策的主要武器之一。

到 1940 年 6 月的时候，工资平均已经增加了百分之十左右，而生活费用则上涨了百分之十七。但是，从通货膨胀的观点来看，情况却比这还要不好。因为，工资率或许只有上升百分之十，可是每人的平均收入却已经增加了大约百分之三十。商品供应越来越少，同时，为了吸收游资以及防止用银行提供信贷来筹措战费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政府势必要增加税收。然而在 1939 年 9 月编制的第一个战时预算中，收支虽有了相当大的增加，可是到 1940 年春天的时候，在全部战费中，来自税收的部分仍然远远不到半数。为了吸收游资，1939 年 11 月曾开展一个鼓励国民储蓄和劝购国防公质的运动，但是总的说来，效果是令人失望的。

要把英国的和平时期的经济转变为战时经济，单单采取那些旨在限制购买力的财政措施是不够的。虽然在战争的头九个月里，压力不象后来那么大，但是民用的需要已经在同战争的需要和出口贸易的需要以及储藏物资的需要相竞争了。只有政府对资源进行直接控制，才能保证从民用部门获得必要的物资；但是这种管理工作进展缓慢，一直拖到 1940 年下半年才开始见效。甚至在那些竞争既直接又明显的地方，如在建筑工业和钢铁工业方面，政府的行动也是拖拖拉拉的。1940 年 4 月，曾推行过一种严格的制度，规定要经过特许方可使用钢铁材料，可是这个制度直到 1940 年底才有效地实施。审批建筑执照的正式制度则到同年 10 月才建立起来。在其他方面，如果对资源的竞争一般说来是由于缺乏海运舱位和外汇以及由于储藏物资的需要等原因所造成的话，管理工作的效果甚至还要差。上文已经谈到过，政府缺乏一个周密的进口政策，从而不能使外汇和海运舱位得到充分的利用。供应部总的说来既不负责原材料的采购，也不负责随后的分配工作，以致一直到 1940 年 6 月的时候，仍然由于缺乏物资管理工作而使象铜那样的战略物资仍被用来制造诸如饰物、窗帘挂杆和床架等非急需的商品。

政府踌躇不决的另一个例子是。它迟迟不愿实行粮食配给。虽然在战争发生之前，对汽油、燃料和主要食品立即实行配给的计划已经拟订就绪，但是只有汽油是在战争爆发后一个月内就实行配给的。在整个战争时期，煤气、煤和电力的配给工作自始至终只是部分生效，粮食配给制度的推行则一拖再拖。开始时，那些掌权的人顾虑很多，生怕舆论将对这一措施不满，甚至当这种疑虑已经迅速消除后，政府还是犹豫不决。在战事开始后，有两个月的时间，食品配给一直没有实行，甚至在那以后，也只有对黄油和熏肉这两样当时已经开始缺乏的食品实行配给，至于肉类和食糖，则一直拖到 1939 年 12 月才开始配给。

由于缺乏任何由政府来掌握的全面的管理制度，民用品生产所消耗的物资在国家资源中所占的比例，必然是过高的。生活标准仍然保持在这样的水平，相对于战时经济的要求来说，水平这么高是不合理的。照理说，应当利用战争的这头九个月的时间，把国民经济的力量巩固起来，可是这段时间却被白白地浪费掉了。

（五）盟国间的合作 290

鉴于英国在其自身的经济上未能作好打一场总体战的准备，在战争初期，英法两国试图进行经济合作没有取得什么具体的成果，也就不足为奇了。英国的缺陷前面已经提到过，完全有理由可以说，法国的经济也有许多同样的毛病。

在慕尼黑危机发生前几年，英法两国已经开始进行经济协商，可是在

1939年9月之前，两国几乎没有采取过任何具体措施。在军事方面，双方已同意，当战争一爆发，就重新组成最高作战会议，但是在经济合作方面，却没有制订过类似的具体计划。两国对进行经济战的问题曾作了广泛的讨论，并作了充分的准备，但是在合用两国经济资源的问题，或者在两国军备计划一体化的问题上，却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事实上，协调盟国之间作战努力的计划，一直都只是拟订一些内容有局限的协定，而且，除了达成一个防止竞相争购物资的一般性协议外，别无什么成绩可谈。对于紧要的财政问题，两国财政部保持紧密联系，但是在战争爆发的时候，双方还没有制订出一项联合政策。在同样紧要的海运问题上，法国人不得不勉强承认自己必须依赖英国的船舶，他们确信，英国的船舶吨位将足够满足两国的需要。

不过在法国覆灭前的一段时期，两国也曾取得某些明确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这应当归功于法国经济专家让·莫内，他在很早很早的时候就一直极力主张两国间要进行更密切的经济合作。由于他的努力，成立了一个组织，由负责处理各类具体问题的九个执行委员会和一个协调委员会组成，莫内本人担任协调委员会主席，负责以下工作：协调九个执行委员会的工作；监督盟国驻国外采购代表团的工作；决定谁有权利优先采购的问题。这些委员会虽然在组织上是极好的，但是一无成绩。无论是“总之，在发生激烈的战争之前，英法同盟有一个极好的纸上宪章。可是，这个宪章不起什么大的作用；在它那漂亮的外廓里面，还缺乏明细的筹备规划和英法两国行政官员间相互信任来予以充实。这些东西都英国还是法国都未能提供为制订各项计划所需要的统计资料。海运问题尤其令人恼火。英国对自己的运输力量估计过高，而且在那时，两个国家都没有制订过精确的或切合实际的进口计划。

第二节从法国沦陷到袭击珍珠港

（一）改变对战争的态度

1940年夏季的灾难，使英国完全明白了自己所处的危险境地。毫无疑问，为了国家的生存，它势必要作出巨大的牺牲，而英国人也准备好作出这样的牺牲。5月7日和8日英国下议院的辩论，表明了他们的忧虑，也表明了他们要求更有效和更彻底地去处理国家事务。克莱门特·艾德礼的话流露了一种灰心丧气和坐失良机的情绪，他说：

首相说过，我们必须做某些事情，并为此向我们呼吁过，但是六、七个月过去了，这些应该做的事情仍然未做。由于缺乏一种有效的领导，我们没有把粮食工作组织好，我们也没有把人力组织起来，这种情况正在对国民的士气产生影响，我们还是面对这一事实为好。

第二天，劳合·乔治甚至更激动地表达了这种心情，他说：

“首相……曾发出过呼吁，要求作出牺牲。只要有人领导，只要政府明确指出奋斗的目标，只要全国深信，那些正在领导国家的人都在履行其职责，全国是准备作出一切牺牲的。接着，张伯伦内阁辞职，由温斯顿·丘吉尔为首组成的各党联合政府立刻表明了，它对担当起领导全国的重任是有所准备的。人们不再相信有轻易取胜的可能，也不再认为时间必定有利于英联邦。这种生死存亡的斗争是紧迫而又激烈的。法国沦陷后的一段混乱时期过去后，英国马上可以调度的后备力量就捉襟见肘，可是在短时期内，除了制订出解决当前危机的计划外，也制订了增加未来战斗力量的计划。

政府着手研究如何更有效地指导经济战，并且继续努力去组成更能令人满意的行政机构。人们普遍感到，财政对战时政策的影响太大，他们认为，

财政部门的管理工作可改由内阁所属的各个委员会来行使，这些委员会的主席“应彼看作是一些不是属于政府某部而是超越于各部之上的协调大臣”。四个主要委员会，即生产委员 292 会、经济政策委员会、粮食政策委员会和国内政策委员会的工作，都置于枢密院委员会的监督之下，枢密院委员会先后由张伯伦和约翰·安德森爵士主持。到 1941 年底的时候，有关经济政策的重大决定实际上全是由这个枢密院委员会作出的。丘吉尔于 1942 年 2 月在下议院对它的职责作了如下的说明：

枢密院长主持的这个机构，在某些方面，在处理国内事务时，几乎是与内阁并行的。许多年阁级大臣都是该委员会的正式成员，同时也根据需要，暂时邀请其他的人参加。有许多公事都在日常开会时解决，只有那些意见严重分歧或者极其重要的问题，才由战时内阁处理。

枢密院委员会的工作由于经济情报所扩大而给它帮了大忙。经济情报所后来发展成为中央统计局和经济处。这两个机构后来又经过发展，主要负责为制订精确计划提供必需的统计资料。

（二）美国改变向海外供应物资的政策对英国的影响

1940 年夏天，英国和它的那些盟国都非常迫切地希望美国能供应更多的物资，但是它们手头掌握的支付手段已大为缩减。“从时间的观点来看，财政前景与军事前景是不一致的。如果这次战争将持续三年的话，那么，每年仅仅动用一亿五千万英镑的黄金储备和外汇，或许是一个明智的政策；但是，如果敌人打算在一年内就战胜的话，这样的政策就不妥当了。”既然，当时的军事需要压倒了一切，那么，迄今推行的那种向海外采购的政策就必须抛弃。只有美国才有能力来供应英国的需要，而英国能否作为一种战斗力量继续存在下去，取决于美国政策方面的某些改变。丘吉尔在就任首相后不久，就以私人名义写信给罗斯福总统，要求他给予援助，后来又通过官方正式提出这个要求，他写道：“只要我们能付，我们就继续付美元，但是我有理由相信，当我们不再能付款时，你们仍会照样把物资供给我们的。”以后十九个月的情况是，美国的援助不断增加，最后它自己也参加了这次大战。

1940 年 6 月 10 日，罗斯福在夏洛茨维尔发表的一次演说中，表明美国的政策有了改变，他说：“我们一定要 293 以本国的物质资源去帮助那些反抗暴力的人，同时，我们也一定要利用这些资源并加快利用的速度，使我们自己在美洲大陆能有足够的装备和训练，去应付任何紧急情况 and 担负各种防御工作。”美国不仅把武器和装备，如来福枪、迫击炮和弹药给了英国，在 1940 年 9 月还把五十艘老式驱逐舰供给英国使用，还使本国的资源转而用于提高生产能力，以便将来的军需品生产能有巨大的增加。在整个 1940 年一年中，英国继续支付美国提供物资的贷款，同时用自己的船只或盟国的船只运走这些物资。但是，到该年年底时，英国欠美国的债务已经大大超过了它在美国拥有的财产，而且实际上也远远超过了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欠美国的债务。这个问题由 1941 年 3 月 11 日的租借法解决了。

在上述这段时期内，租借法的具体效果并不大，但是它在心理上所产生的影响却是巨大的。直到日本袭击珍珠港的时候，英国还是以美元来支付美国供应的大部分物资，英国的作战努力继续受到缺乏外汇的困扰。但是，租借法使英国能够预先制订计划，在不必担忧美元问题的情况下重新安排它的进口，并且在不必担忧将来缺乏物资的情况下集中精力去争取眼前最高的产量。例如，在海运方面，从法国崩溃到日本袭击珍珠港的这段时期，英国船

船舶的损失大约相当于英国在 1940 年夏天可使用的船舶总吨数的三分之一，在随后几年内，要是美国未向英国保证提供大量船舶的话，情况发展下去将是不堪设想的。

（三）运输情况日益严重

从法国崩溃到日本袭击珍珠港的这段时期，英国的运输情况的确是严重的。在海上，船舶的损失越来越大，剩下来的船只的使用效率又在剧烈下降，在国内，内陆运输的情况也是同样严重。当时，政府对运输问题却还没有作过通盘考虑，同时，也没有一个机构能使已有的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

294 英国船舶损失的程序已如上述。由于法国的崩溃，大约有总载重量为三百万吨的船舶可供英国使用，但是，这只不过帮助避免了有可能变为灾难性的局面，而不能减轻英国的困难处境。比船舶损失更为严重的问题，是船舶的使用效率降低了。敌人在海上的活动越来越频繁，这意味着，英国要么加强护航制度，从而造成商船在护航队集结的港口耽搁，要么使商船绕道走较为安全的海路。在港口耽搁的现象也是相当严重的，因为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港口都缺乏组织工作和足够的设备，使得船只往往要等待很久，才能卸货或装货。1940 年秋天，联合王国作出决定，尽量把运输工作移往西海岸的各港口，避而不用那些最容易受到德国空军空袭的沿海地区。可是，这一决定更加剧了运输困难的情况。

港口拥挤主要是由于内陆运输系统不健全而造成的。就象海运情况一样，那些在战前负责制订计划的人，一直摆脱不了运输能力过剩的想法。在战时，主要的运输工作显然将不得不由铁路来承担，但是，当战争爆发时，政府并未试图对铁路系统上可能最拥挤的那些地方进行调查，也未估计已有的铁路车辆是否够用。在战争的头九个月里，这种弱点还不显著，但是到 1940 年秋天，就出现了全面的运输危机。这种危机与其说是由于要求运输的数量增加所造成，还不如说是由运输的速度降低所造成，而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遭到大规模的空袭和把车辆调往原来用车较少的西海岸各港口。对已有的车辆不善于充分地安排好集中使用，更大大增加了运输上的困难。运输危机虽然对整个国家经济只带来间接影响，但是它主要直接影响了英国南部的正常供煤，同时也造成港口拥挤，货物积压，因铁路已无能力把这些货物运走。

这个运输危机一直持续到 1941 年春天，其后情况开始好转。昼长夜短，空袭停止，组织工作改善，船只重新驶往东海岸，采取了一些紧急措施来缓和港口的拥挤现象，增添了专用设备，扩大利用了沿海航运，这一切，都有助于减轻铁路运输所受到的压力，到 1941 年夏天的时候，货运量又恢复到 1940 年春天的水平。可是，到那时候情况也很清楚，今后铁路方面受到的压力将非常大，原有的运输体系是不能适应需要的。最需要的是建立更有效的组织，这项工作到 1941 年底已经大部分完成。1941 年 4 月间，成立了一个中央运输委员会，由一些与运输工作有关的主要政党的代表组成，以估计和协调各方面的 295 要求，有必要时，也为如何发挥运输潜力制订计划。在这一行动之后，5 月间又成立了战时运输部，负责总揽一切运输事务，包括国内运输和海外航运。8 月间，政府又为战时运输部任命了一名铁道监督官，从而加强了对铁路的管理。因此，到 1941 年夏天，这个机构第一次能够相当精确地预测出未来的需要，并着手制订能够满足这些要求的必要措施。

（四）新的劳动力政策

1940年5月间各党联合政府的成立，运输工人与一般工人工会的秘书长欧内斯特·贝文被任命为新的劳工大臣，这两件事为劳动政策打开了一个崭新的局面。贝文在就职时要求有全权管理全部劳动力的供应，并被授与了这项权力。当时征兵工作已经在顺利进行，但在非军事方面，还看不到相应的效果。可是，在其后的十二个月里，情况改变了。1940年5月22日，政府授与劳工大臣在征兵和男女劳动力调度方面几乎无限的权力。6月间，颁布了一项限制雇用法令，以防止“偷挖”熟练工人和保存农业和矿业方面的工人，不让他们流入工资较高的军火工业；1941年3月，又颁布了必需品生产法令，限制雇主解雇工人的权利和工人离职的权利，以防止劳动力的流动过多。从那时起到战争结束为止，劳动力管理的主要方针就是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而确立了296下来。

要使现有的劳动力发挥最大的作用，就必须对各界对劳动力的需要以及劳动力的来源有准确的了解。最早对劳动力进行估计的，是人力需要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一个部际委员会，于1940年8月成立，由威廉·贝弗里奇爵士（后为勋爵）主持。但是，在1941年进行劳动力调查时，才第一次真正试图编制劳动力预算。这次调查所提供的资料，使劳动部有可能制订一些确切的计划，并且提前十二个月完成战时内阁规定的劳动力指标。

因此，到1941年底，这个旨在有效地使用劳动力的机构已经全面开展工作。然而，在1940年和1941年期间，劳工大臣并没有滥用其职权。有一个时期，不是劳动力而是其他因素限制了英国战时经济的发展。机床和某些战略物资的供应都不充裕。即使在劳动力本身范围内，在上述这段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内，对劳动力的总的需要继续受到长期缺乏熟练工人的限制。通过推行培训计划、削减不必要的使用人数和普遍地以非熟练工人负担熟练工人的一部分工序等办法，缺乏熟练工人的情况有所改善，但到了1941年下半年，情形一变而为全面地缺乏劳动力。预计到1942年，对劳动力的需要量是巨大的。在这种形势下，劳动管理条例抓紧了。1941年3月起实施的对妇女进行登记和安排的规定，到秋天已将对象扩大到独身的妇女和没有孩子的已婚妇女，到12月又实行了强迫妇女参加部队和民防工作的办法。为了适应部队的需要，征兵年龄降低到十八岁半，男子义务兵役年龄由四十一岁提高到六十一岁，集体预备役制度改为个人预备役制度。到美国参战的时候，英国若按任何其他标准而不是按照它自己后来在战争中所定的标准来衡量，已经达到非常高的动员程度。这既表明了英国人对战争的态度之转变，又表明了劳工部在各级的工作小心谨慎，区别情况不同对待，因而在进行这样动员时并没有引起英国人民的反感或抱怨。

（五）加强对民用品的管理

1940年的灾难清楚地表明了，英国国内非进行激烈的改革不可。必须把更多的国家资源集中到立即要开战的地区，去弥补因英国军队从法国撤退而遭受的损失，并为未来的战斗作准备，这样，民用品在国家资源中所占的比例势必要相应地减少。当前的首要问题是如何使可以利用的资源尽量发挥其作用。

粮食供应首当其冲，需要削减。必须使英国人民有吃的，但必须节约地吃。1940年夏天，一些科学家曾建议一种由黑面包、麦片、油脂、牛奶和蔬菜组成的饮食，这种饮食搭配得既有营养又经济实惠。但是，人们认为，当时的形势还没有严重到需要作这种极端的改变。粮食部的目的是要使国民的

饮食尽量保持接近正常的标准——

这种政策肯定是不合理的，因为这意味着，在整个时期内，小麦的出粉率仍将保持很低。1940年秋天的海运危机带来了相当大的变化，尤其影响到家畜。该年年底以后，饲料实际上已经停止进口，次年2月，国内供应的饲料实行了配给，3月份起，又规定不准用小麦来喂养牲口。许多专家赞成采取大批屠宰牲畜的政策，但是英国政府认为这种政策是不恰当的，另外提出增加耕地二百五十万英亩的要求。总的说来，在整个时期内，“虽然英国的海上交通经常受到袭击，但是它的粮食政策和国内的粮食生产，却能够相当有效地和顺利地适应这样一个岛国的长期的消耗战争”。

1940年夏末，人们一致认为，到那时为止，对民用市场的供应，在国家资源中所占的比例实在太大了，后来，在日本袭击珍珠港之前的十八个月里，所有民用品的供应实际上都受到了限制。民用品的需要量经常被削减，有些物资，例如铝，实际上被禁止使用。几乎所有重要物资的供应和分配都受到控制，尽管这些控制办法本身也常有一些严重缺点，但是总的说来，执行得还是比较有效的。通过不给原材料和劳动力以及征用工厂场地等办法，民用市场的供应间接地受到了限制。除了这些间接的控制办法之外，再辅之以直接的控制办法，例如，限制298批准建造私人房屋的数目和减少国内市场上纺织品、陶器和其他商品的销售量，在战争的头九个月里执行了这些消极的政策，在这以后的一段时期所实施的限制办法，在有些情况下似乎失之过严；那时，政府当局并没有意识到，有些商品，例如深的平底锅子、童车和杯子，实际上都是必需品。1942年，当这些商品的供应已经减少到应有的限额之下时，再要扩大这些工业就困难了。

虽然对民用品市场的供应就这样在不断减少，但是人们的收入仍在增加。要完全避免通货膨胀是不可能的，但是政府决心要把通货膨胀所造成的差距尽量局限于为进行货币刺激所需要的范围之内。由于无法提供更多的商品和服务项目，唯一办法只有限制消费，使人们的收入合理地保持稳定，并且尽量公平地分配生活必需品。这个目的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来实现，即征税、储蓄和实行配给。

在1940年7月丘吉尔政府的第一个预算案中，所得税、附加税、财产税以及酒、啤酒、烟和娱乐的税率都提高了，另外，征收购物税的办法也付诸实施。在1941年4月的预算中，征税又有提高，所得税的“基准”额从八先令六便士提高到十先令。从表面上看来，提高的幅度似乎很大，其实这笔数目只够抵过国内开支与按照1940年税率所收税款之间差额的一半。由于种种原因，再要增加税收将不切合实际，因此在战争后期并没有打算这样做，事情很清楚，通货膨胀所造成的差距，不能光是依靠征税这个方法来消除。自觉的储蓄固然可以有助于减少个人的花费，但是，如果整个政策不是以对购买力直接加以限制为支柱的话，它早就要遭到危险了。

如上所述，在战争的第一年里，只有对主要食品才实行配给，而且这一措施是在供应已经发生困难后政府才勉强采取的。可是，到了法国沦陷后，定量配给终于被看作是推行经济政策的一种主要武器。当时曾经讨论到实行全面配给的计划，但是被认为不切实际而未被采用。

英国政府可望做到的是把定量配给的范围扩大到包括大299多数食品和生活必需品——对这些东西的需要或多或少是固定的——防止这些商品因人

们的货币收入太多而受到冲击。有些东西，例如奢侈品，仍将敞开供应，用来吸收游资，但配给制度的存在，则甚至可能促进个人的储蓄。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粮食部于 1941 年 12 月推行一种对罐头肉类、鱼类和豆类“按计量点”配给的计划。这个计划一试就灵，因此后来又扩大到许多其他食品，这些食品在前一时期已经由于“开后门”而脱销。当这个配给方案还在讨论时，已对服装和鞋类实行了类似的“按计量点”配给办法。原来，到 1940 年 11 月的时候，全国已依靠库存商品来维持，而且这些库存商品却分配得很不合理。同月间，就此事展开了讨论，1941 年 6 月 1 日，贸易大臣宣布了这项计划。

可是，如果工资继续增加的话这些试图制止通货膨胀的措施就没有一个能成功。张伯伦政府对工资问题从来未能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而联合政府，特别是那位新上任的劳工大臣贝文，这时就必须找出一个新的方法。他曾想采取激进的解决办法，把工资标准固定在原有的水平，规定每四个月由全国仲裁法庭审议一次，但是他的企图失败了，于是政府的政策就只得依靠各个工会的节制和责任感，以及依靠对生活费用进行控制了。后一种政策实际上在 1939 年 12 月发放“临时”食物津贴时就已开始实行了，在法国沦陷后的十八个月里，英国政府的政策就是以扩大这些津贴的范围为基础的。服装价格也在迅速上涨，1941 年下半年，政府曾讨论控制服装价格的方案。结果到年终的时候，便推行了一项生产“经济实惠”的服装的计划，可是直到 1942 年春大，还未能按照控制价格生产出数量可观的服装。稳定物价的政策的成功，可从下面这件事来断定：自从这项政策推行后，实际上已不能再以生活费用上涨作为要求增加工资的理由了。可是，尽管有这项稳定物价的政策，到 1941 年将结束的时候，仍然有人提出大幅度增加工资的要求。然而，如果政府对增加工资一概不准，或者取消或限制工会代表劳方集体同资方进行劳资谈判的权利，这样做在政治上将是失策的。其次，也有必要作些变革，以有助于把劳动力转移到那些与作战努力关系最大的工业方面去，同时提高诸如煤矿和农业这些行业的工资，这些行业虽说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工资却很低。鉴于所有这些原因，政府对轻度的通货膨胀宁可抱着鼓励的态度，因为这种轻度的通货膨胀，在必要时是可以用其他方法来制止的。

第三节 结束语 300

因此，到 1941 年底为止，英国的作战努力可以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时期。第一个时期从战争爆发到 1940 年夏天，是一个坐失良机的时期。当时掌握英国政策的那些人认为，时间对他们有利，他们认为，自己能够逐步显现出一种长期的优势，来时过德国和胜过那些可能同德国结盟的国家。他们并没有作过真正的努力去促使英国人民正视自己的严重处境，也没有要求他们为打总体战作必要的牺牲。

1940 年 4 月初，德国入侵挪威和丹麦得逞，这使英国猛然觉悟过来。公众舆论走在政府前面，渴望采取一种更有力的作战行动。以丘吉尔为首相组成的新的各党联合政府，正是全国人民所渴望的那种领导机构。英国人民所面临的，是需要打一场纯粹防御性的战争，然而，他们这时却表现出打“进攻战的气概”。

从联合政府成立到日本袭击珍珠港的这段时期内，英国的战争政策奠定了牢固的基础。错误依然发生，但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政策在慢慢地形成，因此，到 1941 年 12 月，英国的战时动员工作已经达到非常高的程度。而且，

英国不再是孤军作战了。在东欧，俄国军队正在抵抗德国军队全力的进攻，在西方世界，美国终于把它那巨大的工业潜力全部提供给为了对德国作战而结成同盟的国家使用，从经济观点来看，这更加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意义。

第三章英联邦杰弗里·考克斯

第一节英联邦成员国各自作出决定

1939年战争的爆发，对英联邦不仅在军事方面而且在宪法方面，也有其深远的意义。这使当时所有已经获得自治的英联邦国家在主权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受到了一次考验，要决定是否参战。这也可能是一个最最引人注目的考验，看那种主张英联邦的各个自治成员国应有全权决定本国事务的主张能否实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王向德、奥、匈三国一宣战，英帝国（当时是这样称呼301的）的所有组成部分，包括各个自治领，都自然而然地卷入了战争；但在1939年，英王于9月3日向德国宣战时，卷入战争的只有联合王国、印度帝国以及一些殖民地和保护国。各个自治领——那些事实上已经独立的英联邦国家当时仍然通称自治领——则可由它们自由作出选择。

这些国家作出的选择因国而异，各不相同，但正是由于它们的选择各不相同，就越发显出了它们事实上是真的独立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国政府认为，当英王处于战争状态时，他的所有自治领也就处于交战状态，因此它们立刻宣布同德国进入战争状态。在加拿大，政府向议会提交了一项决议案，由议会两院召开会议对这个问题进行辩论，在这个过程中，加拿大保持了一个星期的中立。南非联邦则是经过联邦议会的激烈辩论和投票表决并导致政府改组以后才参战的。爱尔兰自由邦却走极端，宣布中立，它虽然仍是英联邦的一个正式成员国，却在整个大战期间始终保持中立。1926年的鲍尔弗报告中所提出的“自治共同体”的主张，通过上述事实，最有力地证明是可行的。

澳大利亚政府认为，无须由英王另行宣战，对此工党的伊瓦特博士持有异议，他本人曾写过一篇论述君权的论文。他认为，除非经过英王特别指定并由英联邦首相副署，否则总督是不能代表澳大利亚宣战的。两年多以后，对日战争发生时，伊瓦特已经担任外交部长，澳大利亚就是按照这个新的方式向日本宣战的。可是，在1939年时，人们却认为，单由总督高里勋爵宣布澳大利亚同德国进入战争状态也就够了。

在新西兰，当英国向德国发出的最后通牒到期的时候，内阁正在开会，它代表该自治领立即向德国宣战。两天后，议会召集会议，一致通过了要求批准这一行动的动议。在加拿大，麦肯齐·金总理早已宣称，这个问题将由加拿大议会来决定；后来，自治领众议院一致投票决定，建议英王代表加拿大宣战。可是，直到9月10日，方才宣战。麦肯齐·金于9月8日向加拿大众议院讲话时，阐明了加拿大的态度。他说：“本政府今天所采取的行动，是以加拿大作为一个国家的名义而采取的，……是完完全全以一个国家的名义而采取的。今天我们正在采取的行动，以及日后本议会批准通过的那些行动，都是由我国和将要由我国自愿采取的，不是因为我们与英国的关系，处于殖民地或下级的地位，而是因为彼此的地位是平等的。”有许多人曾预料加拿大国内操不同语言的民族之间会发生意见分歧，这时它既已团结一致参战，就证明了以前的估计是错误的。1939年9月以前，在加拿大西部的许多地方，孤立主义与和平主义的思潮很强烈，在魁北克省操法语的加拿大中间，表现得更突出。有几个最主要的法裔加拿大议员，都坚持赞成中立政策，可是其他的人，包括司法部长E·拉波安特在内，却谴责中立不论在宪法上还是在道义上都是错误的。尽管后来魁北克省的省总理莫里斯·杜普莱西斯曾力图利用法裔加拿大人的孤立主义思想，但是中立政策仍然垮掉了，在整个战争时期，简直难得再听到有人提起中立的事。

在南非，由于在 9 月 3 日就任总理的国民党领袖赫佐格将军决心要实行中立政策——虽然他也同意让联合王国继续使用西蒙斯敦的海军基地——结果导致了政府的改组。他的政府中意见分歧，9 月 4 日，他所提出的要求采纳他的政策的动议以六十七票对八十票被否决，在他自己的内阁中也有六名阁员投了反对票。结果，史末资将军提出的要求宣战的修正案获得通过。于是，赫佐格就要求总督解散议会。这个要求遭到了拒绝，理由是，另组一个政府将会获得本届众议院的信任（这个宪法方面的裁决本身就具有重要的意义），接着史末资将军出任南非总理。这个新政府于 9 月 6 日取得众议院的同意而宣战。

至于爱尔兰的决议，已由迪·瓦莱拉于 1938 年 7 月 13 日在众议院讲话时清楚地作了预示，他说：

我认为，在考虑这个防务问题时，我们应当把自己在宪法上所处的地位与将来在事实上可能处于的地位仔细地区分开来。从宪法上来说，我希望各位代表能理解到，我们没有承担义务，我们可以不参战，我们可以保持中立，如果我们想这样做的话。就我所知，在宪法上我们没有不保持中立的义务。我认为，在这方面，我们的地位与加拿大、303 澳大利亚、新西兰或南非毫无区别。这些国家的政府首脑已经非常明确地声称，他们没有承担义务必须参战，也没有预先承担义务必须采取任何行动，除非在当时情况下，议会认为采取这种行动是正确而且可取的。我们的地位就是这样。

当战争临到英国头上时，爱尔兰众议院对中立问题甚至没有举行辩论，认为此事早已决定了；众议院只是批准采取一些紧急措施，用以维护想当然的中立地位。

可是，五年半的战争不单是突出地表明了，那种认为取得自治领地位就等于事实上独立的说法是可靠的；这场战争所起的作用，远远超过了这一点。这几年中的事态发展迫使英联邦有些组成部分的政治地位和宪法地位起了变化，导致了战后的巨大发展，印度、巴基斯坦和锡兰这三个新获得自治的亚洲国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根据 1949 年对联邦关系重新下的定义而成了英联邦的正式成员国。另有两个国家，爱尔兰自由邦和缅甸，以后干脆行使自己的权利退出了英联邦。在其他地区，尤其是在西非，宪法方面的进展也将大大加速。

在战争初期，印度和缅甸在这方面的进展最为重大。

战争的果真爆发，确实突出地显示了这些国家对自身的事务并无全权处理，这就大大促使它们要求至少应有一个正式自治领的地位。这个运动在印度比在缅甸发展得更迅速。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在 1939 年 9 月的时候，缅甸已经自治了两年之久。缅甸内阁虽然在是否宣战的问题上没有发言权，但是全力支持成立一个缅甸国防委员会，以组织该国的作战努力。11 月 7 日，缅甸总督重申，英国政府的意图是尽力帮助缅甸获得它在英联邦应有的地位。尽管随着战争的进展，民族主义的煽动在缅甸有所增加，但是直到日本在远东发动进攻的前夕，这个运动才发展到较大的规模。

在印度，战争的过程将以两种截然不同但都是极其重要的发展方针为标志。一方面，是一个争取独立的激烈 304 的政治运动，不时地爆发为同英国人的公开冲突；另一方面，是为盟国在军事和经济这两方面作出卓越的努力。这就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到战争末期，印度次大陆不仅已能提出完全独立的要求，而且在战争年代里已经获得了武装力量和经济实力去支持印度和巴基

斯坦这两个新的自治领。

第二节军事方面的努力

在战争爆发时，英联邦的军事组织，正如其政治结构一样，也是缺乏固定形式的，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它是同样持久和有效的。每个自治领都对自己的国防军拥有完全的支配权，并且对自身的防务负有主要的责任。唯一重大的例外情况是皇家新西兰海军，它在 1940 年之前是作为英国海军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建立的。另一方面，联合王国不仅负责整个英联邦的所有主要防务，包括海军基地和沿交通线的要塞的维护和守卫工作，而且还根据自己的资源条件，尽量负责协助英联邦各国的防务。例如，联合王国希望，在发生战争时，它将能在南太平洋用海军为保卫通向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航道作出贡献。在战前，各自治领对维护英联邦的安全这一共同任务所作的贡献，实际上是很有局限的。这时，加拿大已经让英国海军自由使用在哈利法克斯和埃斯奎莫尔特的两个基地，南非的重要海军基地西蒙斯敦也已向联合王国的军舰开放。新西兰已有好几年在经济上支援了新加坡的防务建设，1939 年，加拿大派遣了四艘驱逐舰驻扎在太平洋，作为英联邦总的海军计划的一部分。1939 年 4 月，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与联合王国的代表在惠灵顿举行会议后，也一起承担了保卫北至斐济为界的南太平洋地区的责任。

在联合王国本土之外，英联邦的主要军事力量是在印度。在战争爆发时，印度军队有十八万三千人：由海军上将查特非尔德勋爵主持的一个委员会，不久以前打了一份报告，提出一旦发生战事时扩充印度军队并使其现代化的方法。这支军队将发展成为一支人数为前所未有的志愿军，在 1939 年，它为英联邦在中东和远东提供了主要的战略后备力量。同年 4 月，这支后备力量向亚丁派遣了一个特别守备队，同年 6 月，印度军队被派到新加坡和中东去驻防。

即使没有正式的英联邦总的防务计划，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整个时期内，各自治领和联合王国的武装部 305 队之间的协作也已经达到高度的水平。各自治领一直断断续续地参加了负责防务的内阁委员会的讨论——这个委员会仍然使用着帝国国防委员会这个多少会令人误解的名称——并与联合王国的三军首长一直保持着紧密联系。它们在组织、训练和装备方面都采用同一制度。这就使英联邦拥有相当强大的军事潜力即使其大部分还没有被动员起来。

当战争开始时，除南非外，所有在海外的英联邦国家都立即准备派遣远征军，或是到欧洲战场去协同作战，或是去加强其他地区，特别是中东和远东的驻军和后备力量。它们的打算是基于一种信念，认为应当固守欧洲的西线，以使英联邦有充分时间来发展和部署它那非常分散的力量。但无疑的是，在头几个月里，工作肯定未抓紧进行，因此一位研究印度作战努力的史学家康普顿·麦肯齐指责这是一种“有气无力的乐观主义”。主要依靠的是志愿军。联合王国于 1939 年已采用征兵制，同年晚些时候，澳大利亚也跟着这样做，并且还重新制定了为国内防卫所需要的强迫军事训练制度。可是，这些都是例外的情况。加拿大就没有实行征兵制，一部分是由于战争初期还不需要做，一部分是由于这是一个争辩得很激烈的政治问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加拿大于 1917 年在受到讲法语的加拿大人强烈反对的情况下，曾实行过义务兵役制。1939 年，又出现了同样的反对情况，所以直到 1945 年初之前，加拿大并未作过为海外作战而征兵的尝试。然而，志愿报名的还是不

乏其人。虽然在战争爆发时，加拿大的军队只有四千五百人，但是它发展得很快，到 1939 年底，有一个加拿大师的大部分部队已经被运到联合王国。象加拿大一样，英联邦的其他国家也沿用了自愿参军的制度。

到 1940 年初，一个新西兰旅和一个澳大利亚师的大部分部队已经训练好，准备开往中东。在南非，征兵工作和训练工作部进展得相当快，但是，由于缺乏装备，一直到 1941 年 5 月 20 日，南非第一步兵旅才被全面动员起来参加作战。1940 年 7 月，这个旅作为南非师的先头突击部队被调派到东非，最后在攻打阿比西尼亚的战役中起了主要的作用。南非政府的行动自由，受到南非联邦议 306 会在同意宣战时所通过的动议中的第三条的限制。该条要求南非联邦“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保卫它的领土和南非的利益”，但是也要求“政府不得象在上次大战那样向海外派遣军队”。此外，按照国防法令，除保卫南非外，不得要求动用联邦国防军。但是，事情的发展使这些定义有了很大的伸缩性。1940 年以后，由于北非迅速发展成为一个主要的战场，“海外”这个名词所包含的局限性大大地放宽了。这个名词被解释为不指非洲的任何部分，1940 年 2 月，国民义勇军——相当于英国的本土军——作为志愿军队重新组织起来，其任务是在本大陆的任何地方作战。

印度军队打算在三年之内扩展到二百万人，但是这项工作开始时进行得很缓慢。由于装备缺乏，不能大规模征召后备役军人，在头几个月里，有几千名志愿参军的人没有能入伍，政府只得打发他们回家，表示以后有机会时一定再作安排。可是，那些在战争爆发时已经组织和训练好的印度军队，却马上就派了用场。有相当多的兵力留在印度，驻扎在西北国境线上，一个原因是，自从德苏协定签署后，这里就被看作是危险地带，另一个原因是，与当地部族的战斗直到 1940 年已经过了很长时间还在继续。然而，也有两旅印度军队集结在中东，这两个旅后来成为那个赫赫有名的印度第四师的核心。另外，印度军队也被派到新加坡、缅甸和东非，还有一支小规模运输部队被派到法国，及时地参加了 1940 年的战役。

缅甸编为一个独立的战区，这时也着手招募新的军队。它建立了一支辅助作战的缅甸空军和一支皇家海军志愿后备队。在其他殖民地，志愿参军的人也源源而来，有的参加了联合王国的军队，有的参加了当地的部队。

在东非，皇家非洲步枪队的骨干经过扩充成为非洲第十一师和第十二师，基地设在肯尼亚。最后共有十九个非洲部族参加了这些部队。在西非，皇家西非边防军也经过扩充，先后派部队到东非、意属索马里兰和缅甸去作战。在南罗得西亚，成立了第一支单独被派到海外去作战的罗得西亚联队——南罗得西亚装甲部队，另外，还有八千名志愿人员参加了其他部队。塞浦路斯提供了一个驮载运输连，于 1940 年在法国登陆；在英联邦的其他领土上，也建立了许多其他小规模军队；在非洲的一些保护国，有许多出色的新兵参加了非洲辅助工兵部队。307 在海上，英联邦成员国，包括联合王国在内，几乎立即投入了战斗，因为海洋上的战争是说打就打，不能迟延的。皇家加拿大海军在保卫北大西洋的补给线方面起着很大的作用。澳大利亚把它的海军马上交给英国直接指挥。它的舰艇在达喀尔沿海、在地中海和在英属索马里兰沿海的几次战斗中，以及在执行艰难的护航工作中，都起了重要的作用。新西兰的“阿基里斯”号巡洋舰奉命参加了西印度海军舰队，后来又同其他军舰一起组成了一个中队，于 1939 年 12 月将德国的“海军上将斯比伯爵”号袖珍战舰击败，使它狼狈溃逃。战争爆发时，南非没有海军，但

是到 1940 年初，它已经建立起一支拥有十四艘舰艇的海军，可以用来执行扫雷和反击潜艇的任务。这些舰艇在通向特布尔湾和厄加勒斯角的主要航道上清除敌人的布雷区，执行了许多既重要又危险的任务。有几支南非的扫雷队并参加了地中海的英国皇家海军，以支援在北非进行的几个战役。

在空中，英联邦的贡献既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直接的贡献是由各成员国自己的空军作出的，间接的贡献则是海外国家派出志愿人员参加了英国皇家空军。新西兰在 1939 年时正好有一个轰炸机大队在英国，全体官兵在那里待命把飞机飞往新西兰，这时立刻就下令把这些飞机交给英国当局使用。澳大利亚同样也派了一个侦察机中队，驻扎在联合王国供其使用。在南非，南非空军虽然只拥有十七架由容克式客机改装的军用飞机，也协助英国皇家海军守卫着那条绕过好望角的极其重要的海路。到 1940 年 6 月，南非空军已经有了扩充，能够提供两个轰炸机中队和一个战斗机中队到东非作战。这是组成沙漠空军的出色的南非组成部分之核心。加拿大在皇家加拿大空军中提供一个战斗机中队，到 1940 年 5 月，这个中队已准备好到英国去作战。

首先实现英联邦各国武装力量全面联合训练计划的，是建军较迟的空军。这个英联邦空军训练计划于 1939 年拟订，是一个训练联合王国和各自治领空军的宏伟计划。训练学校设在加拿大，那里最适宜用于达到这个目的，因为既有辽阔的空间，又不会受到敌人的空袭。到 1940 年中期，这类训练学校已有二十二所。到 1941 年 12 月，增加到一百五十四所，计划每年培养二万五千名飞行员、侦察员、炮手和无线电报务员。在罗得西亚和东非也建立起类似的、然而规模较小的训练机构。

第三节 经济方面的发展

1939 年 11 月在伦敦召开的一次英联邦部长级的会议，第一次对战时的经济计划进行了讨论。这次会议是由安东尼·艾登主持的，他在战争爆发时成为负责英联邦事务的国务大臣。当时认为，海外英联邦国家的主要任务是供应食品和原材料，而联合王国则将生产大量军火和其他工业品。不过，加拿大从一开始就能够在工业方面作出重要贡献，而澳大利亚和印度两国则拥有宝贵的工业潜力，可以发挥出来为战争服务。但是，首先要加强的是扩大从海外输入初级产品。联合王国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订有长期合同，规定联合王国要购买澳、新两国所有可供出口的剩余主要食品和全部羊毛。加拿大与英国的食品贸易（除小麦和面粉外）在战前是有限制的，这时开始大大增加了食品的供应，尤其是增加了向欧洲输出熏肉和干酪。在联合王国，食品贮存量增加得这样快，因而到 1940 年，甚至要想在英伦三岛找到足够的空地建造冷藏库，也已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

战争对于英联邦经济所产生的最初的影响之一，后来证明也是最持久和最重要的影响之一，就是成立了英镑区，它包括除加拿大以外的所有英联邦国家以及其他许多国家，参加国必须接受有关处理其黄金和美元储备的协议。英镑区是从那种把战时实行的严格的汇兑和管理措施应用于战前年代的正常银行业务的办法发展而来的。根据这种办法，许多国家，包括除加拿大以外的英国所有已经实行自治的自治领，以及联合王国的所有属地、殖民地和保护国，都在伦敦存放了一部分应急储备和多余的银行资金。这些钱都是折合英镑储存的，在 1939 年以前，英镑一向是可以自由兑换的。当战争爆发时，联合王国完全意识到，有必要把它在国外的资产变为动产，把它的美元和黄金收入保存起来，并建立一套外汇管理制度。有一两个在伦敦已有储

备的国家拒绝加入这个体系，可是，一批重要的国家还是遵从战前的做法。与此同时，它们同意把自己赚得的外汇全部存在联合王国。309 由于这一协议而设立了英镑区美元公共基金，以汇集来自通称为英镑区国家的美元收入。

经管这笔公共基金的是联合王国，它起了一个银行的作用，向各有关国家支付它们所需要的美元。加拿大由于其货币和经济与美元有密切关系，没有加入英镑区。南非联邦虽然参加了英镑区，但是有其单独分开的黄金储备。英联邦的所有其他国家，以及某些中东国家，后来都留在这个结合得很紧密的组织内，这个组织以后不仅在筹措战争经费方面，而且在战后的贸易结构方面，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第四节 法国沦陷对军事、经济和政治的影响

法国的沦陷、整个西线的崩溃以及对英伦三岛和对联合王国在中东的基地的直接军事威胁，导致整个英联邦立即加紧作战努力。在 1940 年中期和随后的几个月里，英联邦的所有国家都通过紧急法令，授与政府非常广泛的权力去动员人力和资源。新西兰为了国内外作战的需要而实行了征兵制，加拿大为了国内防务的需要也实行了征兵制。印度下令大力扩充军队。当意大利在 1940 年 6 月参战时，正在海上准备开往中东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援军，即被调往英伦三岛，在 1940 年夏秋两季的危急时期，一直留在那里。这些增援部队同已经调到英国的加拿大部队一起，组成了保卫联合王国的守军中一支强大的力量。印度也继续向中东、新加坡和仰光派遣军队。澳大利亚的三个空军中队也调往新加坡。在东非，来自南非联邦和非洲其他地方的军队集合起来，在阿比西尼亚同意大利人作战。加拿大守备队奉派到冰岛和西印度群岛，加拿大驻英军队的人数也在大大增加。到 1940 年底，加拿大在海外的军队已有五万人，在国内的人数则大大超过十万。加拿大海军有一百五十五艘舰艇在作战，加拿大空军有四个中队在英伦三岛服役。

1940 年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国政府都不得不对付那些迫近它们沿海一带的敌对行动，这是有更大的危险将要来临的预兆。整个 1940 年间，敌人用来劫掠商船的武装快船在南太平洋活动频繁，至少有九艘英国及其自治领的船只被击沉。1940 年底，瑙鲁岛遭到一艘挂着 310 日本旗的敌船炮击，装卸澳、新两国农业必需品肥料和设备被毁。1941 年，由于同日本即将发生冲突的迹象越来越多，应付的措施业已着手准备。同年 2 月，澳大利亚第八师开赴马来亚。10 月，在堤礁的入口和新几内亚的某些地方的沿海布设了水雷区。但是，1941 年 12 月，澳大利亚的“悉尼”号军舰在澳大利亚西部沿海被一艘伪装的德国武装快船击沉，使澳大利亚海军受到了严重的损失。

在工业方面，动员工作也在比较迅速地展开着。联合王国已经不能象在 1939 年那样，被看作是英联邦独一无二的大兵工厂。工业生产必须在英联邦海外的国家中迅速发展起来。英国派了有关键作用的工人和技术人员去管理海外的工厂，许多地区开始拟订扩大生产的计划。

加拿大建立了一个规模相当大的造船工业。印度的工业生产能力强发展得很快，所以到 1941 年底，就能供应本地区武装部队所需要的各类物资总数的大约四分之三。尽管在战前印度所用的烈性炸药必须全部进口，同时也不能全面生产机动车辆、无线电收音机、动力机床或一般机器，而现在却有这样的成就。在南非，有一个名叫 H·J·范·德·比尔博士的头面实业家，受权负责发展工业。到那年年底，南非联邦不仅已经建立起一个规模虽小但很有

用的军火工业，而且还使自己成为一个给所有在中东作战的部队服务的大型维修基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发展了工业，前者开始制造飞机和坦克，后者利用本身有限的工业生产能力和因地制宜地改为生产某些军火。根据英国政府的要求，新西兰在农业生产方面也作了大改革，把它的大部分生产从制造黄油改为制造干酪，并为英国种植了一种新的作物亚麻。

英联邦内部有许多负责制订地区性计划的机构，其中的第一个是 1940 年在印度成立的东方军需物资集体供应委员会。这个机构的任务是对远东各地区所需要的军火进行估计并且组织生产，以满足其需要。

由于英国要支付这些来自海外的物资的货款，从 1940 年起，海外国家在伦敦结存的英镑顺差额日增月长，联合王国的战争债务加多了。1939 年 8 月，英国在帐面上欠这些海外国家达四亿七千六百万英镑；到 1939 年 12 月底，这个数字增加到了五亿五千六百万英镑左右。一年 311 后，又增加到七亿三千三百万英镑，到 1941 年 12 月底，更高达十一亿九千二百万英镑。这个数字大致等于战争结束时负债总额三十亿零五千二百万英镑的三分之一。印度是根据同英国达成的一项协议，作出贡献，该协议规定，印度政府既要支付它为了自身利益而采取的特别防御措施的费用，也要按照它在战前建设军队时的常规继续支付费用，不管建设的这些军队是用在印度国内还是国外。除了这些承诺支付的费用之外，其他措施的费用将由联合王国来支付。到后来，这些费用上涨得非常多，到战争结束时，联合王国已经成了印度的一个大债户。

加拿大是个加元国家，它为了帮助英国而作了一些特殊安排。1941 年 3 月 20 日，加拿大财政部长 J·L·伊尔斯利在加拿大众议院声明，加拿大务必使联合王国在向这个自治领购买物资时不会因为缺乏加元而受到影响。为了这一目的，加拿大当局着手从英国大量赎回加拿大政府公债券及加拿大铁路证券，这一过程使英国获得了大约七百万加元。这样，加拿大就在债务到期之前提前还债，以便联合王国政府能够动用加元外汇。英国的投资者也在加拿大出售其他证券，这又为联合王国争取了一百万加元外汇。另外，在 1942 年初，加拿大又向英国提供了七百万加元的无息贷款。

在印度，1940 年的军事危机除对英国的整个权力结构带来威胁外，还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反响。在战争爆发的前夕，英国议会曾通过一项法令，授与印度总督和他的行政部门最广泛的权力，以应付在印度可能发生的任何困难问题。英国政府希望，事实将证明，不需要使用这些权力，希望英国将能够在政治主张方面得到印度的支持，一起同轴心国作斗争。圣雄甘地对盟国的事业表示了道义上的同情，从而加强了英国的这些希望。但是，这种乐观的日子并不长。1939 年 9 月中旬，国大党执行委员会不仅要求英国就民主政治和帝国主义的问题阐明它从事战争的目的，而且要求英国清楚他说明上述各点将如何应用于印度。总督的答复是，重申英国的政策是要分阶段地引导印度完全取得自治领的地位。他提出的唯一新的内容是，他建议同印度领导人立即进行磋商，讨论那个根据 1935 年法令而提出的联邦方案是否需要在战后加以修改。用甘地的话来说，国大党认为这个答复“令人 312 大失所望”，在那八个有国大党党员担任部长的邦里，部长全部辞职，从而使那些地方的代议制政府垮了台。在整个 1940 年，印度继续提出自治的要求。当穆斯林联盟通过了要求把印度划分为互不相关的穆斯林国和印度国这一方针后，形势变得越来越复杂。1940 年 6 月，由于欧洲局势危急，播迪特·贾瓦哈拉尔·尼

赫鲁反对采用新的不合作运动的计划，同时，国大党执行委员会宣称，它不会完全按照甘地的非暴力思想行事。

1940年8月，不列颠之战正在展开时，印度总督又提出了一个建议。他提议成立一个立宪议会，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建议立即遭到了国大党的拒绝，其他一些团体对这个建议也很冷淡，与此同时，总督还邀请印度政治领袖们参加他的行政委员会和参加他建议成立的军事咨询委员会。

国大党反对这种做法，穆斯林联盟也只是给予部分的支持。10月中旬，国大党批准了甘地的方针，主张不采取群众性的不合作行动，但各个领袖应当反对备战。尼赫鲁因此而在10月间被捕。他被指控煽动联合省的农民而判处徒刑四年。到11月中旬，又有国大党掌权的几个邦的六个前首席部长以及十五个前部长被捕入狱。

南非的政治危机也变得更加严重。1939年底，前总理赫佐格将军和财政部长N·C·黑文格由于失去了他们自己的国民党的支持，而辞去了议会里的职位。虽然史末资将军的政策在1月初已经获得议会两院的完全赞同，但是战局的不断恶化却使极端的国民党人的情绪更加高涨起来。到1940年10月的时候，赫佐格感到信心十足，准备东山再起，又一次公开反对政府及其战争政策。这使他同黑文格争论起来，但是却受到极端派“奥西瓦·布兰德瓦格”的领袖们的欢迎。这个通称O·B·的组织在开始活动时，宗旨是恢复当年乘着牛车长途跋涉的传统，但是不久它的观点就变得更加狂热了。1941年初，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一次O·B·大会上发生了暴动。史末资援用国家安全法进行回击，制止了危害国内治安的一切严重威胁；但是，国民党仍然强烈地反对战争。

1940年，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都举行了大选。在加拿大，麦肯齐·金于3月解散了议会，重新选举众议院。他领导的自由党获得了戏剧般的成功。在新选出的众议院313中，自由党赢得压倒的多数，在整个战争时期，自始至终保持着这个优势。

1910年9月21日，澳大利亚举行了大选。由于执政党和工党在议会中各占三十六席，另有一名无党派人士占着举足轻重的一席，这就在实际造成了一个僵局。R·G·孟席斯总理改组了他的政府，成立了一个有各政党代表参加的军事咨询委员会。一年后，孟席斯辞职，由英联邦的司库阿瑟·W·法登（后为爵士）组阁。可是，不久法登又因在预算案问题上被人指责利用秘密经费去反对共产主义而下台。这样，约翰·柯廷领导的工党政府就上了台，一直执政到战争结束。

1940年初，新西兰总理M·J·萨维奇逝世，由彼得·弗雷泽继任。如同澳大利亚一样，新西兰也成立了一个军事咨询委员会。1940年，又增设了一个联合战时内阁，其中有三名工党领袖和两名国民党领袖，专门负责军事，其他一切问题仍由那个继续在行使职责的通常的内阁去处理。1941年5月1日，新西兰议会授与非同寻常的应付事变的权力，这一届议会的任期也延长到1942年12月1日。

第五节 战争头两年内英联邦的反应

到1940年底的时候，对英伦三岛的进攻已经被挡住了，这就使英国军队有可能转而至少采取一部分攻势。可以进行反攻的地区首先是北非和东非，1940年和1941年的几次大规模战役就是在那里展开的。这个战略因素将给英联邦带来一些间接的然而却是重大的后果，因为立刻可以用来增援这一中东

地区的部队，大部分来自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在西部沙漠、希腊、克里特、叙利亚、伊拉克、阿比西尼亚和波斯等地作战的部队中，联合王国的军队虽占不小的比例，但基本上却是英联邦的军队。这些军队都在联合王国将领——先后有韦维尔和奥金莱克——的指挥下作战，但是，在整个这段时期内，英联邦各国的军队保有其国家独有的特点，每个英联邦国家完全各自负责训练和装备自己的军队。从来没有组成过一支象 1951 年在朝鲜组成的英联邦师那样的部队。可是，英联邦的高级军官所指挥的范围，却超过了他们自己那个自治领的军队。帝国澳大利亚军的指挥官布莱迈少 314 将担任了中东地区的副司令官，新西兰的弗赖伯格将军（后为勋爵）受权指挥驻克里特岛的英国、希腊、澳大利亚、新西兰联军。来自自治领部队的其他军官，则在该地区担任了参谋或专家的职务。

英联邦各国向中东战区派遣的军队所起的重要作用，不可避免地将使英联邦各国政府完全牵连进在那里发生的外交和战略方面的问题。英联邦各国之间通常用来进行磋商的方法得到了加强，一是通过联合王国政府同来访的英联邦各国部长在伦敦进行的直接讨论，二是丘吉尔同其他英联邦成员国总理之间频繁的电报往返。在法国沦陷后发生的第一个直接与自治领有关的大问题，是作出封闭滇缅公路的决定。1940 年 6 月，日本要求英国政府不再让战争物资经由滇缅公路输入中国。英国政府与各自治领商议后，于 7 月 18 日同意了日本的要求，尽管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对这一决议表示担忧。这个绥靖行动只实施了三个月。英国政府原来希望，这样一来，远东问题将可和平解决，但是后来证明，这种希望是毫无根据的，因为在 1940 年 9 月 27 日日本同轴心国签订了一个为期十年的条约，条约承认了日本要求在东亚称霸的权利。

与整个英联邦有关的第二个重大的战略决议是，1941 年春派英国和自治领的军队去保卫希腊。能够远征到希腊去作战的军队，大部分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远征军。由于这次远征显然非常冒险，因此这两个自治领政府的态度是极其重要的，英国同两国进行了充分的磋商。史末资也前往开罗同这时担任外交大臣的艾登和帝国参谋总长迪尔陆军元帅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尽管南非军队没有直接牵涉进去。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最后一致决定向希腊派遣远征军，但是两国政府对派兵的结果都非常担心，并强烈要求，必须预先为撤退这些军队做好充分准备，如果到时候有必要撤军的话。

在这些战争岁月里，史末资陆军元帅（1941 年中，他被授与这一更高的军衔）在英联邦各国的这些磋商中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他与丘吉尔的长期友谊，以及他在 1917 年时担任过帝国战时内阁阁员的经历，使他的看法 315 具有相当的威信。1950 年 9 月 13 日，丘吉尔在英国下院讲话时称赞这位陆军元帅说：

在我们作出一切最重大的决议和最完善的设想的时候，我们总是感到，由于自己的看法能同南非总理不谋而合而坚定起来。固然，他在比勒陀利亚近郊的庄园或在南非总理的官邸“大谷仓”庄园中，肯定也接到了所有有关的电报，但是却一点也没有经过象我们这样在彼此之间并同三军参谋长共同磋商的全部工作过程，而是在数千英里之外，几乎独自处理这些事务，却一再向我们提出他对这些问题的结论和意见，而我们在这里却要通过远为复杂而且全然不同的思考过程，才能在同时得出这样的结论和意见。

需要英联邦各国磋商的问题中，大多数都没有产生任何严重的意见冲突

就得到了解决的，尽管有的问题后来证明确实是棘手的。1941年，在将来如何驻防托卜鲁克的问题上，曾发生过一次这样意见分歧。该年9月，澳大利亚政府急于想把那支曾在保卫这个要塞的战斗中起过极大作用的澳军调回本国，因为这支军队的健康情况这时正使国内的人相当担忧。奥金莱克和丘吉尔都反对这个建议，可是澳大利亚人仍然坚持要求，最后，这支军队还是调防回国。这是澳大利亚与英国之间在军事方面许多争执中的第一件事。

在这件事发生前几个月，澳大利亚政府曾经提过建议，认为英联邦各国进行磋商的方法应予改变，以便适应新的需要。澳大利亚政府建议，各自治领应当在伦敦常驻一个高级部长，这些部长将作为英联邦的战时内阁同联合王国战时内阁的大臣们取得协调。可是，这些建议并没有得到伦敦或其他英联邦国家首都的赞同。丘吉尔指出，英联邦各国的常驻部长并不能赋有随时作出决定的权力，因此这种做法毫无用处。所以，在整个战争时期内，主要是通过电报或者通过各自治领部长之间的相互访问来进行磋商。这个办法证明是有效的。英联邦国家的高级部长在战争期间每年访问伦敦，并在访问期间参加联合王国战时内阁的会议。1941年6月，英国政府也任命了一位常驻内阁大臣为负责中东事务的国务大臣，总部设在开罗。第一任是奥利弗·利特尔顿，他在战争初期曾当过贸易大臣。他以英国内阁阁员的身份而享有威316望，他对1941年在中东发生的军事危机有过重大的影响。利特尔顿后来由一个澳大利亚人R·G·凯西接任，后者曾经是澳大利亚驻华盛顿第一任公使。1941年12月，又作了类似的任命，以达夫·库珀（后为诺里奇勋爵）为常驻远东国务大臣，他在那一年中曾访问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协调抵御日本的防务计划。

战争也使各自治领外交活动的范围显著地扩大了。战前，只有加拿大、南非和爱尔兰自由邦在国外驻有外交使节，而且也只有极少数几个国家的首都驻节。1940年，澳大利亚向美国派驻公使，从而开设了它在国外的第一个使馆。1941年底，新西兰也效法澳大利亚派了公使。1941年，澳大利亚向日本派了公使，向加拿大派了高级专员。加拿大已经在巴黎和华盛顿设有大使馆，这时又同巴西、阿根廷、爱尔兰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战争也进一步加强了加拿大同美国的关系。

1940年8月18日，麦肯齐·金在加拿大—美国边境附近的奥格登斯堡会晤罗斯福总统，两位领袖同意常设一个联合防务委员会，规划北美的防务。1941年初，加拿大和美国又采取进一步措施，使两国防务一体化。有关北美五大湖和圣·劳伦斯河航道和发电工程的规划，终于也达成了协议。1941年4月20日，麦肯齐·金和罗斯福发表了海德公园宣言，这个宣言使加拿大的美元问题大大缓和下来，也使加拿大和美国的生产建设努力结合在一起。另外，还在加拿大新建了七个飞机场，把阿拉斯加与美国连接起来。

加拿大的地面部队仍然留在欧洲和香港待命作战，因此没有参加1941年的中东地面战争，不过加拿大的空军却在中东和欧洲积极作战，而它迅速扩充的海军则忙于护航工作。到1941年底，驻在联合王国的加拿大部队已经增加到一个满员的军、一个坦克旅和一个装甲师。它的海军力量几乎增加了一倍，它的空军也有了很大的扩展。

在印度，1941年也象以前的几个战争年头那样，是既有政治冲突而又作出了卓越的作战努力的一年，这种情况表明了自相矛盾。1941年4月，印度事务大臣L·S·艾默呕经英同议会同意，把下述公告的有效期限延长十二个月。

该公告授权印度各省省长，在他们确信局势的发展已使代议制政府无法再存在下去时，即停止其工作。7 月间，印度总督把他的行政委员会的委员名额扩大，作为 317 一种起平衡作用的姿态，但是，这种措施并不足以使他同印方达成协议。1941 年 12 月 3 日，当日本从东面威胁印度，印度的形势变得越加危急时，政府宣布，决定释放因从事不合作运动而服刑的全体犯人，不问这些人的罪名是正式的还是象征性的。被释放的人中有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他在获释时声称，虽然他对盟国表同情，可是，只要英国不给他的国家自由，他就不考虑给英国帮助。这种态度后来就成了 12 月底时国大党的正式方针，那时国大党宣称，只有一个自由和独立的印度，才能够在全民的基础上担负起保卫国家的工作。可是，这个自由和独立的印度的性质仍然是国大党、穆斯林联盟和其他印度团体之间展开激烈争论的问题。

与此同时，缅甸也出现了强大的民族主义运动的明显迹象。整个 1940 年间，发生了许多民族主义骚动，尽管立法机关和内阁继续全心全意地支持英国政府。但在 1941 年，政局越来越紧张。吴苏总理要求能有机会访问伦敦，目的是向英国政府表示友好，并要求英国阐明对缅甸自治问题的态度。11 月 4 日，他向报界宣称，英国政府不肯保证让缅甸在战后马上获得自治领的地位，而要等到讨论过防务政策和外交政策以后再作决定，使他感到失望。英国内阁对此大为诧异。于是，艾默里代表英国政府重申了英国以前作过的让缅甸逐步取得自治领地位的历次保证，但是不肯为此定出一个日期。在吴苏返回缅甸途中抵达火奴鲁鲁时，日本突然在太平洋发动进攻。在他出国期间任代总理的包吞爵士，全力支持英国对日作战。但在这个时期，英国政府发觉，吴苏在国外访问时曾同日本当局接触，于是就把他扣留起来。

但是，到年底时，缅甸的军事形势的发展完全超出了政治形势的发展。1941 年 12 月 7 日日本参战时，正是英联邦的资源已经到了极为紧张的时刻。在中东方面，由于 11—12 月间在西迪雷泽格周围的那场战役的结果，西部沙漠的战局暂时变得有利于英联邦，可是那里的形势仍然是不稳定的。英国人已在叙利亚集结了一切可以从西部沙漠调出的兵力来保卫其北翼，以防止德军突破高 318 加索后再向他们进攻，这种挺进看来是非常可能的。香港的驻军虽然有加拿大援军去加强，还是处于几乎孤立的状态，至多只能打一场阻滞性的战斗。在马来亚和新加坡，虽然已经集结了相当多的英国军队，但是事实证明，这些兵力仍不足以应付今后的任务。在以后的六个月里，不仅英国在远东的那些属地相继被蹂躏，连印度和澳大利亚都受到入侵的威胁，开罗也将再一次遭到严重危险。因此，英联邦本身将在印度、南太平洋、非洲和欧洲等地区直接受到威胁。但在 1942 年，英联邦击退了所有这些进犯，开始了它那缓慢而又艰苦的走向胜利的反攻进军。

战争头两年内的严峻考验，尤其是在英国和其他英联邦国家没有外援独自作战的那十二个月的特别严峻的考验，对英联邦的影响是难以估计的。英国人民在德国狂轰猛炸之下坚持抗战而赢得的尊敬，以及各国军队在中东战场和在遍及半个世界的海上与空中并肩作故的同志情谊，都是加强英联邦团结的有力因素。可是，这些事情也产生了一种反作用。各自治领的陆、海、空军人员把自己同联合王国的那些著名的陆、海、空军部队的士兵和指挥官相比之下，不但认为自己毫无逊色，而且由于萌发了对自己国家的信心，甚至往往认为自己比那些来自母国的同志和同事还要强一些。在第一次世界大

战时，有许多自治领的部队中都有英国指挥官或参谋人员参加，而这一次则不然，自治领的部队不仅能够在没有英国人协助的情况下作战，而且有时还能够派出军官去指挥联合王国的军队。这种体会加速地增强了英联邦各国对自己国家的信心，使它们越发感到自己的国家已经发展成熟。同样的倾向在经济领域里更加显著。英联邦国家需要改进工业生产，并在许多得不到伦敦方面指导的遥远地区发挥主动积极性，这一切，都加强了它们在经济方面的自给自足和信心。而且，联合王国已经由它们的债权国变成了它们的债户。战争真是一种强烈的催化剂。它对英联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影响将把这个独特的国与国之间的联盟引到一个新的发展方向。

第五编 征服东南欧 1940 年 6 月至 1941 年 6 月 伊丽莎白·威斯克曼

第一章 德国以外交手段迫使罗马尼亚、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参加轴心国集团，以及随之而来的领土易手 1939年8月至1941年3月

前面已经谈过，在慕尼黑协定签订和捷克第一共和国瓦解后，匈牙利对特兰西瓦尼亚的领土要求和保加利亚对多布罗加南部的领土要求比以前更有希望达到，因此两国也就更加咄咄逼人和更加坚决了。另外，由于苏联从来没有承认过俄国已丧失比萨拉比亚省，因此罗马尼亚的东部边界也一直受到威胁。

当年，奥地利人曾认为有可能利用中欧和巴尔干半岛的民族主义混水摸鱼。现有的证据表明了，希特勒有过之无不及。例如，他在同其轴心国盟邦的所有谈判中，都强调了德国对巴尔干半岛的政策之宽宏大量。他还说，德国在东南欧除了谋求经济利益之外并无其他要求，以让意大利在政治方面可自由行动。在同苏联搞好关系时，他也采取了同样的策略。里宾特洛甫和莫洛托夫于1939年8月23—24日签订的秘密补充议定书的第三条说：“关于东南欧，苏联方面强调了它在比萨拉比亚的利益。德国方面声明，它在这些地区的政治方面完全没有利害关系。”他一会儿宣扬极权主义，一会儿又把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区别开来，这种做法自相矛盾得令人难以理解，为什么德国人会认为这样做是值得的。

希特勒于1939年8月12日在伯希特斯加登曾激动地怂恿齐亚诺说，必须把自己背后不可靠的朋友清除掉，正象德国因此而一定要消灭波兰那样，意大利也必须干掉南斯拉夫。但是十一天后，即从第一个莫斯科协定签订的那一天起，他的政策却改变了，这时他坚决主张有必要不惜一切代价来维护巴尔干地区的和平。他从未考虑过找保加利亚的麻烦。对此，他在伯希特斯加登告诉齐亚诺，轴心国可以完全信赖它。“为了这个原因，德国已尽量以武器支援了保加利亚，并将继续这样做下去。”³²⁰ 情况是：捷—南—罗小协约国的崩溃，已经削弱了反对保加利亚的巴尔干协约国：保加利亚王后是意大利国王的女儿；保加利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同德国并肩作战；德俄两国重修旧好，抚慰了保加利亚的泛斯拉夫主义的感情。最后的一点是，保加利亚对罗马尼亚的领土要求并未引起非常复杂的问题，而且，这个要求普遍地被认为相当有道理。

特兰西瓦尼亚问题完全是另一回事。在1938年11月铁卫队领袖科德里亚努逝世之前，希特勒一直是同情罗马尼亚的。他认为，通过建立铁卫队，罗马尼亚人已比马扎尔人组织了一个更好的反民主运动。德意志少数民族在罗马尼亚受到的待遇比在匈牙利好，而罗马尼亚当局为讲德语的居民提供的条件，也比为讲马扎尔语的居民提供的条件有利。最后一点是希特勒不喜欢匈牙利社会中仍然流行的贵族习气。由于墨索里尼自命为支持马扎尔人修改条约的主要靠山，故而特兰西瓦尼亚问题已经不止一次使轴心国的工作不能顺利进行。

战争爆发以来，罗马尼亚在经济上的价值自然而然地上升了，但是在政治上，由于它在9月17日准许那些被打败的波兰领导人在它的国土上避难，因而它在希特勒眼中的价值下降了。由于同波兰有盟约关系，罗马尼亚这样做是它最起码的义务，但是这件事也促使它在外交上作好把比萨拉比亚交给苏联和把多布罗加南部交给保加利亚的准备。可是，如果德国将同意罗马尼亚把这些领土割让的话，那么，倘若它对匈牙利的领土要求仍然置若罔闻，那就未免太会引起反感了。固然，马扎尔人也热情地收容了许多地位较低的

波兰难民；但另一方面，来自匈牙利的粮食供应，即使不象罗马尼亚的汽油那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也是必不可少的，再说，德国军队随时有可能需要使用匈牙利的铁路，因此希特勒不想过于鲁莽从事而与匈牙利结怨。如果说，德国和罗马尼亚在 1939 年春季达成了一项极为令人满意的经济协定，那么，在这之前，匈牙利已经决定支持轴心国的一项政 32] 策，还加入了反共产国际公约，而接着罗马尼亚却接受了法英两国的保证。还应当再指出一点，德国的民情——

不论是真是假——是亲马扎尔人的，因为匈牙利人同样也吃过 1919 年和约的苦头。

匈牙利人对泛德意志主义的野心是熟悉的，同时他们几乎也有种种理由要强烈反对俄国。自从苏联占领波兰南部而与匈牙利接壤以后，匈牙利首相捷列基特别害怕俄国的压力。因此，在 1939—1940 年的那个冬天，当齐亚诺于 12 月 16 日向意大利议院发表演说表明意大利的中立以反布尔什维克主义为原则时，这种中立就使罗马和布达佩斯或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两国甚至还讨论了将圣斯蒂芬王冠授与奥斯培公爵的可能性。1940 年 1 月 6—7 日，齐亚诺在威尼斯会见了匈牙利外相恰基，当时恰基出示了表明匈牙利在领土方面的最高要求和最低要求的两幅地图。最高要求是要占领拥有四百二十万人口的七万八千平方公里的土地，其中一半是罗马尼亚人，百分之十是德意志人。最低要求是要占领拥有二百七十万人口的五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其中马扎尔人和罗马尼亚人在人数上大致是相等的，在任何情况下，匈牙利人都要求占有特兰西瓦尼亚东南角的塞克莱尔兹地区的这三个县。恰基坚决认为，这是要防止在匈牙利发生“箭十字”暴动的最低条件；这个要求比匈牙利在翌年夏天实际获得的领土只稍微多一些。由于匈牙利不想削弱罗马尼亚对抗苏联的力量，恰基表示，如果罗马尼亚人准备对苏联的进攻进行抵抗，他愿意采取友好的中立态度，可是，如果罗马尼亚人不经一战就将领土割让给苏联或保加利亚，那么，匈牙利将自行采取行动。在这以前二周，罗马尼亚人曾向意大利政府呼吁，要求它阻止匈牙利在罗马尼亚背后进行威胁，因为这种做法有可能迫使布加勒斯特屈从俄国同时提出的要求。

罗马尼亚的那些不幸的统治者从一开始就意识到，德俄两国的修好有可能使波兰也使他们本国遭到瓜分的危险。罗马尼亚发觉自己面临双重危险：俄国正对它的东部和北部各省虎视眈眈，而德国则“不动声色地”垂涎 322 着所有其余地方。一旦波兰被击溃后，罗马尼亚人就时刻准备着俄国向他们提出割让比萨拉比亚的要求。象罗马尼亚外相加芬库这样的人心里非常明白，比萨拉比亚问题就是争夺多瑙河河口的问题，它同海峡问题只有一步之差。在罗马尼亚这个多瑙河流入黑海的地方，再善于投机取巧也无法防止希特勒同斯大林发生冲突。

当波将金（当时的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于 1939 年 5 月访问巴尔干时，他采用李维诺夫的态度以笑脸对待巴尔干胁约国，但是 8 月 23 日以后，苏联对罗马尼亚的态度变得冷淡了，并且带着威胁。德国驻布加勒斯特公使馆机敏地利用了这种变化。公使馆的官员说：“只有我们才能保护你们不吃我们的朋友斯大林的亏，同我们交朋友吧，把汽油放出来吧。”这样，就象加芬库所写的那样，俄国人驱使罗马尼亚，而德国人则诱使罗马尼亚参加了轴心国集团。与此同时，英国驻布加勒斯特的公使于 12 月 14 日明白表示了人所共知的事实，即英法对罗马尼亚所作的保证不能用以对付苏联。最后的希望

是寄托在那个谈建立一个中立国联盟的意大利身上，希特勒已经将巴尔干地区的政治事务全权委托给墨索里尼，而这位意大利的领袖则时断时续，不很认真地考虑着消灭南斯拉夫和占领罗马尼亚油田的计划。齐亚诺在同恰基会谈后三天（其实齐亚诺从来没有认真对待过恰基），向罗马尼亚驻罗马的公使保证，意大利准备在罗马尼亚对抗布尔什维主义，就象它曾在西班牙所做的那样。很显然，德国事实上将不会允许这种做法，但是这时正是意大利公然违抗希特勒的那一段短暂的时期。两个月后，当里宾特洛甫于3月10日访问罗马时，他向墨索里尼“解释”说，甚至在巴尔干地区，俄国人也不是一种威胁，因为他们决不会冒扩大战争的危险，如果同罗马尼亚发生冲突，那就会带来这种危险了。在这样情况下，墨索里尼似乎最后屈服于纳粹的魄力，于是罗马尼亚就只得听天由命了。

在以后的几星期中，谣言四起，说德国自己可能抢在俄国之前占领罗马尼亚。1940年4月初，德国参谋总部又一次要求匈牙利让德军自由通过，说是为了占领罗马尼亚的油田。虽然按照齐亚诺所说，德国人曾提出过把特兰西瓦尼亚给匈牙利作为报答，但是匈牙利政府却在考虑，如果意大利肯挺身而出帮它的忙，它还是要进行抵制。它仍然天真地设想有这种可能。后来才知道，德国这次提出的要求原来是为了替入侵丹麦和挪威打“掩护”。

4月和5月间，整个世界都被德军的惊人胜利吓得目瞪口呆，这些胜利以法国的崩溃而达到顶点。罗马尼亚最初恋慕的对象同时又是它最后寄托希望的国家，与其说是英国，还不如说是法国。到5月底的时候，形势表明，法国有可能一败涂地，于是罗马尼亚国王卡罗尔作出决定，这时除了奉承讨好德国之外，别无其他办法。纳粹对巴尔干地区的政策已经由基林格（他后来担任德国驻布加勒斯特公使）在5月13日的一份秘密备忘录中制定好了。他认为，东南欧的反德宣传这时统统可以被根除，因为巴尔干各国政府将不敢再拒绝德国的要求。

在德国发动春季攻势之前，莫洛托夫于1940年3月29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发言时，已经公开地，即使是含糊其词地，提出了比萨拉比亚的问题。6月23日，即法国投降后还不到一星期的时候，他通知德国驻莫斯科大使舒伦堡说，“比萨拉比亚问题的解决不能再拖延下去”。他又说，苏联的领土要求还包括布科维纳，那里有乌克兰族的居民。

提到布科维纳，肯定会引起轩然大波，因为希特勒决局限于比萨拉比亚。

心要把旧哈布斯堡帝国的版图全部加以控制，作为实现他更加理想的计划的一个序曲：他与匈牙利的关系也取决于他的这种决心。希特勒接到舒伦堡的消息后，马上就查问里宾特洛甫，他1939年8月在莫斯科时究竟答应过什么。里宾特洛甫在1940年6月24日的备忘录里回答说，元首曾经“授权我声明，德国对东南欧地区，如果必要的话，甚至对远至君士坦丁堡和海峡那样的地方，都不感兴趣。不过，后面两个地方并没有讨论到”。因此，纳粹领导人事实上已经让俄国人可以肆意并吞他们喜欢的地方，只要德国能从俄国获得物资供应就行；直到那时，苏联一贯是认真地向德国输送物资的。

1940年6月25日，里宾特洛甫用电话通知舒伦堡，在比萨拉比亚，德国关心的只是德意志人，但是“苏联政府对布科维纳的领土要求却是一个新的问题。布科维纳过去是奥地利的一个直辖省，现在是德意志人集居的地方。”舒伦堡在他26日的答复中说：“莫洛托夫反驳说，324布科维纳是统一的乌克兰缺少的最后一个部分。”这种说法不顾匈牙利不久以前获得卢西

尼亚一事，但是同所谓在旧奥地利的一个边远地区密集地聚居着德意志人——其实那里讲德语的大部分是犹太人——的谰言比起来，还没有那么异想天开。事实上，苏联政府同意把不属于乌克兰的布科维纳南部地区留给罗马尼亚；可是，为了一条铁路线的缘故，俄国人再一次伤害了罗马尼亚人的感情，要把新的国境线推进到占摩尔达维亚公国境内的赫尔塔。

苏联于6月26日晚上向罗马尼亚发出最后通牒，限于第二天晚上答复。27日上午，德国人打电话劝告布加勒斯特让步，意大利人这时终于也想同俄国搞好关系，便仿效了德国的做法；德国人还装腔作势为罗马尼亚缓颊，要求苏联延长时间，但是到7月1日，苏军已经把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北部完全占领了。此后，这个因战胜而得意洋洋的希特勒却竭力制止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立即入侵罗马尼亚；匈牙利的纳粹分子宣称，罗马尼亚正在把那里的马扎尔人驱逐出去，以便容纳从比萨拉比亚去的难民，这种情况是不能容忍的。希特勒自从觉得他与俄国的友好关系不可靠以后，一直非常担心巴尔干地区发生战争，因此他总是想防止这类侵略行动。还应当指出，在这期间，苏联不仅鼓励保加利亚提出对多布罗加南部的领土要求，而且还鼓励匈牙利提出对整个特兰西瓦尼亚的领土要求。1940年7月10日，希特勒同齐亚诺一起在慕尼黑接见马扎尔领导人，并向他们说，如他们一定要进攻罗马尼亚的话，他们可以进攻，但是他们自己要冒很大的风险，因为罗马尼亚军队已经配备有德国的优良武器；希特勒另外提出一个办法，表示愿意写信给卡罗尔，命令他进行谈判。但捷列基急切想不让德国作出另一次“裁定”和摆脱那种因此而必然越来越依赖德国的状态，他坚决主张，如果同罗马尼亚人进行谈判，要是谈判失败的话，他一定要有诉诸武力的自由。对此，希特勒不置一词。但是，虽说他似乎表示默许，齐亚诺在他的日记中却说，匈牙利人离开时露出不满情绪。

在这个当口，卡罗尔似乎曾经向希特勒建议过要缔结一个攻守同盟，但是德国元首给了他一封粗鲁的信作为答复（日期是7月15日）；希特勒在信中象他曾向匈牙利人提出的那样，公开表明，卡罗尔还是同其他国家去达成协议为好，因为德国无意干预他们的计划；他又声明，德国是没有利害关系的，如果必要的话，它可以不要罗马尼亚的石油。这个不幸的国王这时只得任凭轴心国的摆布，加芬库的继任人、亲德的马诺伊列斯库同罗马尼亚新首相吉古尔图于7月26日奉派去接受希特勒的各项命令。

这两个罗马尼亚人故意表现得非常狂热，他们希望以思想意识方面的完全服从换取德国的帮助，他们表示愿意实行一党制和一个三年计划，同时还恳求德国提出一个适用于整个欧洲的“全面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办法。对于这些建议，希特勒冷酷无情地回答说，思想意识是次要的，要进行合作，只有真正的利益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

罗马尼亚人恳求全面调整巴尔干的边界，但是也遭到了拒绝。他们表示愿意在1919年从匈牙利那里获得的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中，让出一万四千平方公里，可是，希特勒告诉他们，这一些土地根本不够。德国元首说，罗马尼亚人必须自己去同其他国家谈判，把边界的大调整同人口的交换合起来谈，但是在罗马尼亚的德意志人不在人口交换之列，希特勒要他们留在原地，只要他们的“文化自治”能够得到保证就行。希特勒说，一旦局势稳定下来，他或许会考虑给罗马尼亚某种保证，他相信墨索里尼也将会这样做。次日，马诺伊列斯库在罗马向墨索里尼询问的，不是要墨索里尼作出什么保证，而

是要探听罗马尼亚将来可否指望轴心国支援，当时墨索里尼相当含糊地默许了。

墨索里尼接见罗马尼亚人时，保加利亚代表则于7月27日在伯希特斯加登被接见。希特勒也向他们坚决表示，他在巴尔干的利益纯粹是属于经济性质的。他对保加利亚要求获得多布罗加南部的领土表示赞同；他宣称，什么时候保加利亚、匈牙利和罗马尼亚达成协议，他就给这个国家集团一个保证。

直到8月16日，罗马尼亚和匈牙利两国代表才悻悻地遵照希特勒的指示，在图尔努塞韦林讨论了特兰西瓦尼亚问题。三天后，罗马尼亚人在克拉约瓦会见保加利亚代表，到8月21日，双方同意恢复1912年的边界，协定将从9月下半月起生效。这样，保加利亚又重新获得了富饶的产麦区及多瑙河畔的锡利斯特拉港。在同匈牙利人谈判时，罗马尼亚人试图坚持只进行人口交换，而不进行匈牙利人认为必不可少的边界变动。由于同居住在罗马尼亚的马扎尔人相比，居住在匈牙利的罗马尼亚人为数是微乎其微的，因此匈牙利人在8月24日突然中断了两国之间的谈判。两国军队都动员了起来，局部地区发生了小规模空战；匈牙利人这时确实决定要入侵罗马尼亚。8月26日，齐亚诺记道，里宾特洛甫给他打了好几次电话，指出面临的危机，并建议立即把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两国外相召至维也纳——他说是要告诫他们，不是为他们进行仲裁。齐亚诺也于28日前去维也纳，在这之前，他到伯希特斯加登同希特勒一起进了午餐。德国元首埋怨马扎尔人贪心不足，但是他入侵英国似乎更关心。齐亚诺上一次是在7月20日见到希特勒的，那时他观察到，希特勒对俄国新近抱有一种敌视态度，这位德国元首说，俄国准备尽量利用可能发生的混乱复杂的忙况，“同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勾结在一起”，把它的势力“一直伸展到海峡、爱琴海，甚至到亚得里亚海”。那天晚些时候，齐亚诺飞往维也纳：由于墨索里尼对特兰西瓦尼亚问题没有一定的看法，因此他放手让齐亚诺随着里宾特洛甫行事。

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已经要求轴心国进行仲裁的消息向全世界发表了，这件事正是匈牙利首相最渴望避免的。希特勒已经仓促地决定，为了防止一场巴尔干战争，必须让匈牙利提出的领土要求有大约三分之二得到满足。由于匈牙利人已经拟定好一系列可能实行的国界线，里宾特洛甫的下属就匆匆从中作了一种选择，并削减了匈牙利要求得到的领土。到这时德国代表才知道，马扎尔人始终坚持要求塞克莱尔兹地区的几个县份，可是他们已接到指示，要他们尽量在罗马尼亚（因此就是指伯曾兰）多留下些德意志人，并给罗马尼亚留下图尔达以北的一些地区以供赫尔曼·戈林工厂之用。8月29日，这两个轴心国的外长在维也纳的贝尔费德雷宫先接见了马扎尔领导人。这一次，不是恰基，而是那位特兰西瓦尼亚人捷列基，对正好是他一直非常担心的第二次德国裁定坚决地提出了抗议；里宾特洛甫对他大声呵斥，这个场面被齐亚诺记了下来。接着轮到了马诺伊列斯库。里宾特洛甫威胁他说，俄国即将向罗马尼亚进军，除非罗马尼亚这时听从轴心国的命令，接受轴心国的保护，否则这种入侵将把罗马尼亚完全从地图上抹掉。罗马尼亚政府迟迟地拖延到8月30日凌晨才屈服，尽管如此，仍然可以断言，即使没有受到俄国军队陈兵边境的压力，而轴心国这时也没有向之提供有关边界的保证，罗马尼亚政府也不得不向德国屈服。罗马尼亚能够想得出的唯一对策，是有效地威胁要使普洛耶什蒂的油井陷于瘫痪，但是，希特勒已经直截了当地表示过，他对这些油井丝毫不感兴趣。一看到第二次贝尔费德雷裁定强迫他接

受的边界时，马诺伊列斯库感到浑身瘫软。第二天，齐亚诺同里宾特洛甫却一起去打猎了。

里宾特洛甫和齐亚诺强加于争执双方的边界，给匈牙利带来了四万三千五百九十一平方公里的土地和大约二百五十万人口，其中大约一百万是罗马尼亚人，还有一百多万是马扎尔人。虽然希特勒曾下令，要尽量多留些德意志人在罗马尼亚，结果仍然有大约五万人增加进匈牙利的德意志少数民族中去，此外，还有少数其他民族的居民。这时移交给匈牙利的那些罗马尼亚人，可以在六个月内作出决定，是否要选择回到罗马尼亚去，如果要回去的话，必须在作出决定后一年之内离开；原则上，允许他们带走自己的财产，不过农民实际上如何能做到这一点，就不清楚了。同样，留在罗马尼亚的五十万匈牙利人也可以选择回到匈牙利去；引起争论的人口交换问题，就解决到这个程度。

规定要割让给匈牙利的领土包括马腊木雷希、克里沙纳一半以上的地方和特兰西瓦尼亚不到一半的地方。从人类有史以来，特兰西瓦尼亚从未被瓜分过。如今，它却被一条分界线无情地割开来。这条线从奥拉迪亚马雷（纳吉瓦腊德）以南开始，延伸到克鲁日（科洛什瓦）以内（这样就把一条铁路干线移交给匈牙利），然后沿着锡吉肖阿拉和布拉索夫以北（连同当地的德意志族居民一起），把塞克莱尔兹地区的三个县圈了进去，一直到同特兰西瓦尼亚原来的喀尔巴阡山边界连接为止。这样一来，匈牙利的新的最南端距离普洛耶什蒂就不到五十九英里了。1939年匈牙利并吞卢西尼亚和俄国并吞波兰南部以后，两国有了共同的边界，如今匈牙利获得马腊木雷希后，这条同苏联的共同边界也就比本来长了。

9月2日，曾在奥拉迪亚马雷举行会议的匈罗混合328委员会宣布，匈牙利军队将于9月5日越过原来的边界，并将于9月13日之前完全占领割让的地区；匈牙利人将于9月11日进入特兰西瓦尼亚的首府克鲁日。这简直好象在执行所罗门的判决。有许多马扎尔人和罗马尼亚人将受到损失，至少在特兰西瓦尼亚是如此，因此这就不仅是特兰西瓦尼亚本身一分为二的问题。表面上看来，匈牙利人获得了许多领土。可是，8月30日，即作出裁定的那一天，里宾特洛甫就要匈牙利人签订一个条约，保证让匈牙利的德意志少数民族享有统治民族的特权。这些德意志少数民族此时大约有六十万人；这就是说，要保证这些德意志人有这样程度的自治，使他们能够成立一个国中之国，或者毋宁说，使他们由原来效忠于布达佩斯改为效忠于柏林。

对罗马尼亚人说来，第二次贝尔费德雷裁定只是带来了绝对的损失。据加芬库说，罗马尼亚与匈牙利的新分界线引起了两国如此的恶感，因此为了维持多瑙河流域的安宁，两国需要有一个常设的最高仲裁者。于是，轴心国，更确切他说是德国，便趁此一举控制住布加勒斯特和布达佩斯，同时为了强调说明它的行动不受别国的约束，德国还向罗马尼亚提供了领土安全的保证。这实际上意味着，德国的势力范围是从俄国人的势力到该处为止的普鲁特河和多瑙河下游一线开始的，德国将不再容忍一个外国的任何干涉。对加芬库在1942年所作的这番分析，只有一点点需要补充。那就是，他还不知道，希特勒决不象他自己口口声声所宣称的那样，对巴尔干地区不抱政治目的，相反，至少在7月26日以后，他就一直在打算给那个已被肢解的罗马尼亚一个保证。第二次维也纳裁定意味着，1939年8月23日的莫斯科协定被撕毁了，这恰巧是在该约签订后五十三个星期的时候。

这时德国和俄国在多瑙河下游碰头了；同时，俄国与保加利亚之间虽然仍有多布罗加北部隔着——这块地方仍属罗马尼亚管辖，并且轴心国还向罗马尼亚保证予以保护——但是一场为了控制保加利亚及其黑海沿岸地区以至控制海峡的冷战已经开始了。

3299 月间，俄国人坚决主张自己有权在巴尔干地区取得一席之地，他们不仅要求取消国际多瑙河委员会，尤其要求取消欧洲委员会。前者成立于 1919 年，负责管理布勒伊拉上游的多瑙河航运，后者在 1856 年就已成立，一直管理着多瑙河的各个河口。俄国人建议另行成立一个管理整个多瑙河航道的统一委员会，规定它只能由沿岸各国的代表来组成；象俄国人所强调的那样，这个建议不仅将排除英法两国的势力，也将排除意大利的势力，同时还将使俄国在欧洲的心脏地区获得一个立足点。对此，德国人只同意以后在布加勒斯特召开一次特别会议，并坚决主张，意大利人也应该同德国人、俄国人和罗马尼亚人一起参加这次会议。对于苏联政府的这些要求，德国人立即以两个轴心国和日本于 1940 年 9 月 27 日在柏林签署了三国公约作为答复。里宾特洛甫渴望已久的三国同盟，这时总算实现了。

虽然这一次莫斯科早一天就得到了通知，虽然新约的第五条强调，它并不是针对苏联，但是，条约的绪言中隐含的意思，和它提到要在大东亚和欧洲地区建立一种新体制并在将来把其他国家也吸收入这个体制的说法，只能使俄国人感到不安。从此以后，三国公约的确被用作考验一个国家对德国是否忠诚的试金石，加入这个公约，就好比是为自己投入轴心国的怀抱举行了洗礼的仪式。

由于罗马尼亚在特兰西瓦尼亚丧失了这样一大片领土，国王卡罗尔被迫下台；不能不引人注意的是，当他于 9 月 6 日宣布把王位让给他的儿子米哈伊时，德国的领导人显然感到了宽慰。在以后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内，罗马尼亚的残余部分一直处于混乱状态。铁卫队中，主张亲 330 德高于一切的一派和反对割让领土的另一派之间，势必要自相残杀。那位坚决不妥协的民族主义者若尔加老教授，就是在 11 月底的屠杀中被害的。直到 1941 年 1 月又发生几次动乱以后，安东尼斯库将军作为“元首”的地位才真正地稳定下来。

与此同时，德国党卫队人员在 9 月间到达罗马尼亚。

据说，他们是为了帮助从比萨拉比亚遣返日耳曼人而去的。1940 年 10 月，德国的正规军公然占领了这个国家，特别是普洛耶什蒂这个要害地点。与此同时，德国向保加利亚人保证，他们的中立将受到尊重。10 月 9 日，驻莫斯科的德国大使馆奉命要尽量以随随便便的方式通知莫洛托夫：

罗马尼亚政府根据轴心国给予它的保证，在前一时期曾要求我们能派出一个德国军事代表团去训练罗马尼亚军队。……鉴于我们的利益是要使巴尔干地区的安定和秩序得到维护，同时为了保护我们的石油和谷物利益不受英国方面的侵犯，我们已宣布同意罗马尼亚的要求。对于这种胡言乱语，莫洛托夫一笑置之——他认为，英国还有其他的事要操心——可是，墨索里尼却不象莫洛托夫那样。说实在的，德国占领罗马尼亚激发了他去入侵希腊，虽说他先前在 8 月间轻率地谈到这样的计划时，已经遭到过德国的反对。10 月 15 日，墨索里尼在威尼斯宫召集了军事将领讨论这次作战的计划；进攻日期原定为 10 月 26 日，但是后来被推迟到 28 日。

由于希特勒在 9 月中旬已放弃入侵英国，他曾计划，应由意大利进军到苏伊士，而德国人（不管有无西班牙人参加）则去占领直布罗陀，从而把英

国人进入地中海的两道大门都封起来。与此同时，还要向其余的巴尔干国家表示，只要它们加入三国公约，就保证它们那个地区的和平与新秩序。意大利进攻希腊打乱了德国元首的这些计划，但是这样一来，迫使其他巴尔干国家接受轴心国的枷锁，其意义也就越发显得重要了。一定要对保加利亚施加压力，迫使它步着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后尘服从三国公约，否则它就有可能被俄国所利用。10月15日，墨索里尼开完军事会议，马上就写信给博里斯国王，暗示他，如果保加利亚也参加攻打希腊，此刻就是它终于可以331达到爱琴海的时候。对意大利人来说，保加利亚的合作则他们将起举足轻重的影响，但是博里斯国王回答时非常谨慎，表示不愿参加。他告诉（从罗马去索非亚访问的）安富索说，他害怕土耳其人——可以说，他更害怕的是国内人民的亲俄情绪。他是否完全意识到，希特勒和斯大林已经在他的门口剑拔弩张，一触即发呢？

当希特勒看清了意大利人不但未能在希腊取得闪电式的胜利，反而将使轴心国丢脸时，他就准备亲自出马在巴尔干地区进行军事干涉，这种军事行动势必要导致一场德苏战争。1940年11月12日，在接见莫洛托夫之前，希特勒在他的第十八号秘密指令上签了字。这项指令中有两道命令：一是“如果必要的话，应从保加利亚进军，占领爱琴海北面的那一部分希腊本土”；二是进攻俄国。那天晚上和第二天希特勒接见莫洛托夫时，他除了对俄国要求他明确表态感到恼火外，在给巴尔干的保证这个问题上，也好像与俄国公开地有点龃龉。莫洛托夫抱怨说，轴心国给予罗马尼亚的保证，已经把俄国阻挡在布科维纳南部之外，其实，俄国只是暂时放弃了这个地方；另一方面，莫洛托夫单刀直入地问希特勒，“如果俄国给保加利亚这个靠海峡最近的独立国家一种保证，条件与德国和意大利给罗马尼亚的保证完全相同，德国将怎么办？不过，俄国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想同德国事先取得一致意见的。”希特勒说，既然谈到“条件相同”，那就说明保加利亚已经要求过俄国给予保证，但他并不知道保加利亚有这种要求。无论如何，他必须同意大利商议。

在莫洛托夫离开德国之前，博里斯国王本人恰巧也到了那里（他经常有许多亲戚要拜访）。11月17日，下一个星期日，希特勒在伯格霍夫接见了她，但这件事直到两天后才公布。“国王向元首说明，由于外交政策的种种原因，他不能在三国公约上正式签字，但是元首可以当它有这样一回事办理。”希特勒在新年伊始向他的军事将领讲话时，也是这样说法，而当他于1940年11月20日写信给墨索里尼时，却抱怨，不仅是土耳其方面的压力，而且还有意大利在希腊的挫折，都是造成博里斯犹豫不决的因素。里宾特洛甫则仍然轻率地打算着把俄国本身拉入三国公约，这样就有可能解决博里斯的问题，可是莫洛托夫除了提出其他要求之外，坚持要把签订苏保互助条约作为先决条件，显然，这一点是希特勒绝对不会同意的。博里斯回到保加利亚后，或许同意了她的参谋总部的看法，认为自己不得不屈服。至于他同她的那些无足轻重的大臣们谈了些什么，那就不得而知了。索非亚的决议应当是一个谜，这样才正中希特勒的下怀，鉴于俄国人的态度，也许他宁愿在下星期内前往德国朝拜三国公约的香客行列中没有保加利亚人。

在保加利亚国王访问后的次日，塞拉诺·苏涅尔（西班牙外长）和齐亚诺一起到了伯格霍夫，希特勒把六天前列入他的第十八号秘密指令中的一些主要决议，告诉了齐亚诺：这就是说，他宣称，他打算越过保加利亚进军希腊，虽说这一军事行动在3月中旬以前是不能实现的。

当时元首对希腊和南斯拉夫特别感到兴趣，他向齐亚诺提出，要求意大利支持德国去迫使匈牙利同意尽量让德军运兵的列车过境，以使德军能够在罗马尼亚迅速集结。

他直截了当地谈到马扎尔人有权提出对阜姆的领土要求，以诱使他们同意他的要求，其实，看来匈牙利无论如何是不会进行反抗的。11月20日，恰基签署了一个加入三国公约的议定书，齐亚诺留下来参加了这一次再度维也纳的贝尔费德雷宫举行的仪式。里宾特洛甫欢迎匈牙利是第一个有荣幸被接受参加三国公约的国家。

11月21日，《外交—政治通讯》谈到匈牙利言出有信。另一方面，匈牙利人却得以拒绝签订一项有关统一改革其报刊的附加秘密议定书。对方暗示他们，他们可以自己决定采用什么方式来帮助三国公约国。因此，暂时说来，匈牙利受到的影响主要是经济方面的。除了德国可以使用匈牙利的铁路，以及把1934年2月21日的秘密条约所促进的贸易货额增加以外，希特勒这时对匈牙利的333矾土以及对在匈牙利中部或东部可能发现的任何石油资源都获得了类似垄断的权利，外多瑙河地区的油井当时由美孚石油公司控制。捷列基虽然不愿向三国公约国效忠，但不得不屈从于匈牙利公众的意见，特别是军方的意见。他和恰基都力图（至少在思想上）同南斯拉夫缔结一项能够提供“持久和平和永远友好”的条约——其实这个条约将招致不幸的后果——来抵销最近这一次对德国所作的让步。1940年12月12日，恰基在贝尔格莱德签订了这个条约；两国之间的领土争端（包括匈牙利的最后一次未满足的要求），心照不宣地暂时被搁置起来。在下文我们将看到，这个匈南条约竟然也是德国要求它们缔结的，而且特别适合希特勒的需要。

在此期间，罗马尼亚首领安东尼斯库于11月14日访问罗马后，启程前往柏林，这样罗马尼亚人就可以用不着再一次访问贝尔费德雷宫了。希特勒对他推崇备至，因为他向希特勒坦率地表示，对特兰西瓦尼亚的被分割，他当然是不会永久同意的；希特勒以后每逢谈到他那“狂热的民族主义思想”时，总是怀有钦佩之情。可是，在当时，罗马尼亚人却只得照马扎尔人的榜样去做，于11月23日加入了三国公约；24日，斯洛伐克人也跟着这样做了。德国外交部说：“不指望保加利亚会参加轴心国公约。斯洛伐克是目前这一批中最后一个签字的国家。”

保加利亚显然从两方面都受到非常大的压力。德国的“旅游者”和各种各样的代表团都在那里活动频繁。11月19日，即保加利亚国王从德国回去的那一天，一项以往曾经审议过的反犹太人的法律，又在保加利亚议会重新提出，并于12月21日通过。在这之前，保加利亚首相和外相于11月21日接见了返回土耳其途中的德国驻安卡拉大使冯·巴本。另一方面，博里斯于11月25日接见了索波列夫，后者是俄国出席当时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多瑙河会议的代表。就在这一天之后，即11月26日，英国发表声明，只要保加利亚坚持立场，它就支持保加利亚的领土完整。12月3日，保加利亚外交大臣波波夫发表演说，主张继续保持中立；12月26日，议会外交委员会一致反对前首相特桑科夫主张加入三国公约的提案。334上面讲到过，希特勒已经决定要采取行动，他根本不认为保加利亚有可能进行抵抗，他只是在等待严冬过去后就采取“马里塔行动”，这个行动的内容也包括在外交上使南斯拉夫屈服，这样就有可能击溃希腊，使英国在欧洲大陆上无法再保留据点。他的计划间接地使保加利亚多少有点动摇起来，因为许多保加利亚人都有点

嫉妒地在担心，生怕南斯拉夫抢在自己前面赢得德国人的欢心。

这就有可能损害他们在马其顿扩张的机会，对保加利亚人来说，马其顿正如特兰西瓦尼亚在 1919 年到 1940 年间对马扎尔人来说那样重要。

1941 年 1 月 1 日，保加利亚首相菲洛夫教授离开索非亚到维也纳去“就医”，在那里从 1 月 2 日逗留到 7 日；

里宾特洛甫在参加将于 1 月 8 日到 9 日在上萨尔斯堡举行的德国元首会议之前，秘密地接见了。此后不久，马季斯特拉蒂（当时是意大利驻索非亚公使）就告诉齐亚诺，他认为，保加利亚虽然不肯公开参加轴心国，可是它会听任自己受到侵犯而“不作多大抵抗”。但当墨索里尼和齐亚诺于 1 月 19 日到 20 日访问伯格霍夫时，里宾特洛甫却告诉齐亚诺，“特别由于博里斯国王的优柔寡断的性格而造成的”种种困难，现在都已克服了，他说，大概在 2 月底的时候，保加利亚将加入三国公约。俄国人毫不掩饰他们的懊丧。他们通过塔斯社连续发表了象 1 月 12 日发表的那样的公报，声称，如果德军已经渗透入保加利亚领土，那就大大违反了俄国人的意愿。1 月 17 日，莫洛托夫在提到德军在罗马尼亚集结的情况后，向舒伦堡提出抗议说，苏联政府已经一再“要求德国政府注意，苏联把保加利亚的领土和把海峡看作是它的一个安全区域”，因此，不论有什么外国军队在那些地方出现，都将彼看作是侵犯了俄国的“安全利益”。里宾特洛甫在伯希特斯加登责备了意大利人后，又在 1 月 21 日从富施尔发给苏联一份措词粗鲁的复文，他说，“德国政府 5 自然毫无意图去侵犯苏俄的任何安全利益，即使德国军队通过保加利亚的话，那也丝毫无此意图”。

接下来的情况是可以预料得到的。保加利亚这时的局势扑朔迷离，谣言四起，不是说德国军队已经开到，就是说保一俄条约已经签订了。德国人越来越象是保护者，去保加利亚的德国人越来越多，其中包括陆军元帅李斯特，他于 2 月初到了保加利亚。2 月 8 日，他同保加利亚参谋总部进行会商，保方同意为德军提供粮食和运输工具，以换取德国的保护。保加利亚的将领们要求德国在占领他们的国家十天之前通知他们。会议结束时达成了一项秘密协定，“先进攻希腊，最后进攻土耳其”，罗马尼亚也参加了这个协定，但是保加利亚军队“将不承担进攻上述两个国家的义务”。双方谈到，保加利亚即将加入三国公约，并经双方同意，军事行动将在“伪装”下立即开始。因此，保加利亚就在 1941 年 2 月 17 日同土耳其缔结了一项新的互不侵犯和友好条约，德国的报纸和亲德的报纸都为此事欢呼，十分恰当地称之为德国外交的胜利。

最后，舒伦堡于 2 月 28 日接到指示，要他在当天晚上通知莫洛托夫，保加利亚将于次日加入三国公约。保加利亚的代表、首相兼外交大臣菲洛夫于 3 月 1 日到达维也纳的贝尔费德雷宫向德国作最新的效忠表示时，受到里宾特洛甫的热烈欢迎。与此同时，舒伦堡把保加利亚驻莫斯科公使已经通知了维辛斯基（当时任副外交人民委员）的内容，再通知莫洛托夫，即德国军队将立即从罗马尼亚渡过多瑙河进入保加利亚。俄国人听到这消息后非常恼火，但又无能为力。继“马里塔行动”之后，必然会采取“巴巴罗萨行动”。哪里还有时间去营救海峡呢？

第二次贝尔费德雷裁定和占领保加利亚都说明了德国外交的特点，因为在上文我们已经看到，这两件事都是依靠出其不意地进行威胁与玩弄诡计双

管齐下的传统手法来达到目的的，这种传统手法确是经过希特勒—里宾特洛甫的巧妙运用而登峰造极。每一次，与其说老的问题得到了解决，还不如说新的争论又被制造了出来。³³⁶ 匈牙利和保加利亚暂时仍保留着一种附属于别国的独立地位，但是在德国的敌方看来，这样反使两国遭到的损害更大。当墨索里尼模仿希特勒的做法时，却引起了希腊的反抗，当德国元首自己企图用计谋来智胜南斯拉夫时，尽管那里的塞尔维亚人与克罗地亚人有着世仇，他的外交手腕也还是失败了。

第二章意大利进攻希腊导致南斯拉夫革命和轴心国占领南、希两国

第一节意大利进攻希腊

继意大利占领阿尔巴尼亚后，在1939年4月意大利与希腊的紧张关系缓和下来后几天，伊曼纽尔·格拉齐以意大利外交代表的身份到了雅典。据他所述，希腊首相梅塔克萨斯将军一开始就想尽种种办法帮助他完成使命。在这以后，意大利法西斯分子对科孚的领土野心以及他们对英法两国给与希腊保证一事的不满，不时引起危机，这些间歇性的危机累积起来，自然会产生严重的影响。此外，意大利政府又在阿尔巴尼亚煽动反希腊的沙文主义情绪，希腊政府感到很难使那些来自多德卡尼斯群岛的难民不发牢骚。1939年8月21日，梅塔克萨斯告诉格拉齐：

对这个问题我不想使人认为我好象在采取正式外交措施，但是……他们（指意大利政府当局）应当明白，我们这里在雅典和比雷埃夫斯已经大约有一万名多德卡尼斯人，这些人正在为自己岛屿所遭受的苦难不断悲叹痛哭。不管我们怎样采取行动，不准他们公开表露自己的感情，可是阻止不了他们在希腊居民中间议论此事和散布憎恨意大利的情绪。与此同时，意大利的报纸，有时候是这一家，有时候是那一家，一直不断地刊登文章，说什么科孚是属于意大利的，理由是这个岛屿是威尼斯的属地已达四百年之久。要是根据这一点，那么土耳其也有足够的权利认为整个希腊是属于它的。很显然，这类文章如果给这里的希腊公众读到了，势必会激怒他们。

经过1939年8月一段艰难的时期后，墨索里尼于9月12日草拟了一份旨在和解的照会，表示愿将意大利军队从希腊边境后撤二十公里。梅塔克萨斯作了相应的表示，9月30日，罗马与雅典之间互致了友好信件，并于11月3日予以公布。后来，在意大利又出现过一次侵略情绪的高潮，引起了煽动性的谣言，说意大利将于来年4月对科孚发动进攻，可是，当格拉齐于5月3日和5月6日两次拜会梅塔克萨斯（这时是首相兼外相）以后，关系又有可能缓和下来。

当墨索里尼于1940年6月10日向西方国家宣战时，他同时宣布，意大利不想把它的邻国瑞士、南斯拉夫、希腊、土耳其和埃及卷入战争；这完全要看这些国家是否愿意继续保持和平而定。格拉齐心里很明白，希腊国王和希腊民意总的说来，毫不含糊都是亲英的，但是，他认为，从法律的观点说来，梅塔克萨斯却坚守着最严格的中立。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坚决认为，就象他说自己在当时向意大利政府坚持的那样，在1940年10月28日之前希腊境内从未有过英国的海军或空军基地。他写道：“事实是，希腊最怕同我们发生冲突，因此，它不仅从未想过要攻打我们，它不仅避免了任何形式的挑衅行为，而且甚至在履行中立义务时，如果有什么倾向的话，它也是尽量地倾向于我们的。”格拉齐又说，希腊向英国作过一些小的让步，但是，如果真象德国人公布的法国文件所指出的那样，法国人打算重返萨洛尼卡的话，在希腊却看不出有为此事作准备的任何迹象。

由于墨索里尼向西方国家宣战的时间太迟了，因而无法使任何人相信，法国是被意大利打败的，他所以渴望南斯拉夫或希腊去惹他发火。1940年时担任罗得岛军事长官的德·韦基帮了他的忙，对于他主张的希腊人向英国人提供的援助发了一阵牢骚。希腊驻罗马公使波利提斯在6月18日与齐亚诺的首席私人秘书安富索进行了初步的交锋之后，到7月3日又受到齐亚诺的猛烈抨击，指责希腊帮助英国海军而违反了中立；齐亚诺还就法国的文件中“透

露的情况”对他进行了谴责。7月6日，齐亚诺在即将前往德国之前又接见了波利提斯，很勉强地收下了希腊的复照。他居然有脸告诉波利提斯说：“我已尽了一切努力使战火不蔓延到希腊。可是，我担心，希腊所作的努力并没有这样多。”从这时起，意大利和希腊之间就互相指责，进行着拉锯战。希腊有充分的理由谴责意大利，例如希腊船“奥利安”号于7月12日遭到意大利的袭击，而意大利则毫无理由地抱怨希腊。

338 当齐亚诺7月7日在柏林会晤希特勒时，他的论调还是那样。按照齐亚诺所作这次会谈的记录，希特勒同意这样的看法，认为英国有可能去占领爱奥尼亚群岛，以便将它们变为反对意大利的基地，希特勒声明，他本人明确地赞成意大利采取行动，抢在英国人作出任何这类表示之前。

8月4日，在庆祝梅塔克萨斯掌握独裁政权四周年之际，意大利报刊上登满了向他祝贺的函电和文章。但是到了8月11日，正好一星期之后，意大利法西斯政府却在报纸和电台掀起了一场猛烈的以地拉那对希腊的谴责为主题的宣传攻势。这次攻击以两个月之前发生的一件事作为借口，有一个名叫道特·霍吉亚的奥名昭著的阿尔巴尼亚匪徒死后，忽然被说成是一个被残暴的希腊统治者杀害的民族烈士，说这些残暴的统治者正在压迫察穆里亚地方的那些尚未得到拯救的阿尔巴尼亚人。8月12日，雅典电台指出，有两个阿尔巴尼亚人已经承认谋杀霍吉亚。13日，梅塔克萨斯向德国驻雅典公使埃尔巴赫亲王呼吁，要求柏林制止罗马想入非非。在听到埃尔巴赫转告这次谈话的内容时，格拉齐说，梅塔克萨斯表达他个人对轴心国的同情，但是他又说，只要英国还控制着地中海东部，就无法使希腊站在德一意一边。格拉齐以这种看法（他很尽责地把这种看法向齐亚诺作了汇报）来解释希腊的一艘老式巡洋舰“希腊”号沉没的事，该舰曾于1912年击沉过一艘土耳其船。事情是这样的，8月15日圣母升天节那天，“希腊”号停泊在提诺斯岛；有许多朝圣者和生病人正聚集在那里向一尊圣母像祈祷，相信它有治病的能力，这时出现了一艘神秘的潜艇，向“希腊”号发射了三枚鱼雷（其中两枚未击中目标），把它击沉了，人群顿时惊慌失措，不过除了“希腊”号船员中有人牺牲外，死伤极少。意大利人不承认那艘潜艇是他们的，但是很难令人信服。齐亚诺通知意大利驻柏林大使馆说，意大利与希腊之间的这场危机，由于恰巧可以利用意大利人自己已挑起的一些事端来加以扩大，到9月份或许会发展到严重关头；大使馆向里宾特洛甫转告了这个情况。齐亚诺和他的阿尔巴尼亚朋友亚佐莫尼中将以及子爵普拉斯卡将军都赞成从速动手，因为他们知道希腊人还没有作好准备。不过他们一致认为，如果希腊愿意将察穆里亚和科孚割让的话，这次就放它过门。

339 这时候，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两国的谈判代表正遵照希特勒的意旨，在图尔努塞韦林会谈，因为俄国对比萨拉比亚的领土要求所造成的危机仍在发展。德国元首无论如何不希望巴尔干半岛再有新的战争。8月16日，里宾特洛甫召见意大利驻柏林大使阿尔菲那里，不厌其烦地向他指出，眼下还不是要意大利去鼓励俄国的时候，甚至也不是意大利可以对南斯拉夫准备采取行动的时候，他指出，意大利拟议的对希腊采取冒险行动一事，一定会非常不受希特勒的欢迎。墨索里尼马上服从，就在那一天，他口述了一封表示默允的电报，在下个星期内，意大利的备战工作就停了下来。8月23日，墨索里尼着手草拟了一封忿忿不平的信，于27日递交给希特勒；他在信中反复讲到“希腊同英国的确凿有据的勾结”，讲到希腊和南斯拉夫两国部渴望着一

有机会就在轴心国的背上捅一刀——他声称，这两个国家都几乎完全动员起来了。

据格拉齐说，从这时起，意大利人在雅典受到了抵制。另一方面，梅塔克萨斯政权却在那个爱好自由的希腊国家里变得几乎得人心了。希腊政府禁止报上谈到8月15日的那艘海盗潜艇的国别，并把有关此事的官方调查结果扣压到后来才发表。可是，当募款重建“希腊”号的运动开展时，却得到了全国热烈的响应。尽管里宾特洛甫告诉齐亚诺，他为了轴心国的团结故意冷落希腊驻柏林公使，但是，梅塔克萨斯却或许会认为，至少只要英国的保证未履行，德国将会继续保护他。可是，希腊的这个独裁者同意自8月21日起把希腊军队动员起来，这部分是由于他的驻罗马公使坚持之故。这一点给墨索里尼说对了。从这时起，在希腊—阿尔巴尼亚的边境地区出现了意大利和希腊军队，自上年9月起，这个地区一直是非军事区。

在以后四个星期中，意大利人似乎对希腊不再感兴趣了；8月24日以后，报纸上反希腊的宣传运动也停止了。可是，9月18日，意大利人在阿季罗卡斯斯特罗设立340一个用希腊语广播的秘密电台。第二天，里宾特洛甫到达罗马，由于他倡议的三国公约即将缔结而得意扬扬。在为此而兴高采烈时，他在希腊问题上似乎又一次对意大利变得很慷慨。齐亚诺记载道，德国外长明确地宣称，希腊和南斯拉夫是意大利的利益范围，在那里，意大利可以实施任何它喜欢实施的政策，并将得到德国的全力支持。而如果里宾特洛甫用这样的方式说话，他一定是代表希特勒的意思。

在10月上半月间，希腊人一直忙于向意大利政府提出抗议，谴责意大利飞机不断侵入希腊领空，破坏了它的中立。希腊人对一批又一批的阿尔巴尼亚非正规军被征召入伍并且经常侵犯希腊边境的事，也感到焦虑不安。由于希特勒于9月17日已经放弃了入侵英国的计划，他显然一心一意地想实现他的成立轴心国—西班牙—法国集团和夺取直布罗陀的计划，因此，他在9月28日接见齐亚诺和10月4日在勃伦纳会晤墨索里尼时，都没有时间去讨论巴尔干地区的问题。但是，德国人却有时间去占领罗马尼亚，我们在上艾已经看到，墨索里尼为了对此进行报复，于10月15日在威尼斯宫召集他的军事将领，决定入侵希腊。

到10月23日，意大利的决议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26日，斯蒂法尼通讯社宣称，希腊人已侵入阿尔巴尼亚领土。当天晚上，当格拉齐在举行一次盛大的正式宴会时，他的部下却在把意大利给希腊的最后通牒的密码译成明文，按照指示，格拉齐应于10月28日凌晨3时带着这份通牒去唤醒梅塔克萨斯。最后通牒在列举了一连串捏造的罪名以后，宣称：“意大利政府因此决定向希腊政府提出要求，为了保证希腊的中立和意大利的安全，在目前与英国冲突期间，〔意大利的〕军队有权占领希腊境内的一些战略据点。”格拉齐不得不承认，他对战略据点是指哪些地方“毫无概念”。梅塔克萨斯的话则毫不吞吞吐吐——他说：“当然，这就是说要打仗了。”

由于法西斯党政策的混乱，在10月中旬的时候，驻在阿尔巴尼亚的意大利军队反而减少了，这正是意大利最后定出计划如何对希腊采取行动的时候。巴多里奥和其他意大利军事将领抱怨说，除非保加利亚也一起攻打希腊，否则意大利的军队根本不够用。另一方面，从8月21日以来，希腊一直在进行动员工作，愤慨的心情激励了341他们的高昂士气。不久就很明显，意大利不但不能轻易取胜，相反，希腊英勇地保卫了自己，甚至还打了胜仗，在

12月初，希腊军队不仅把意大利人赶出国境，而且自己进入了阿尔巴尼亚。希腊的战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是自1939年9月1日以来，轴心国第一次遇到对方成功的抵抗。固然，这一次“轴心国”指的是意大利而不是德国，但希腊是一个既小又穷的国家，据认为其实力根本不能同波兰相比。最重大的影响是，意大利在希腊的溃败导致了西班牙继续保持中立；希特勒在以后几年中一直说，这使他得不到直布罗陀，从而使他丧失了最后胜利。同时，希特勒看得非常清楚，巴尔干地区一旦发生战争，就将引起南部斯拉夫人的问题和加速同俄国的冲突。

第二节南斯拉夫与轴心国

1940年11月4日，希特勒在柏林召开了军事会议。在题为《希腊战争》的会议记录中，记载着德国元首说的一段话：

这肯定是意大利人的一次令人遗憾的失策。元首从未委托意大利领袖去采取这种单独行动。看来，意大利在发动进攻时只使用了三个师的兵力，这是根本不够的。

英国人已经占领了克里特岛和利姆诺斯岛。因此英国在地中海东部的战略地位大大地改善了。……元首认为，罗马尼亚的油田将受到利姆诺斯岛英国驻军的威胁。因此，有必要把增援的防空部队以及战斗机和战斗轰炸机立即派往罗马尼亚。

两星期之后，在意大利连连惨败后，11月18日希特勒在伯格霍夫接见了齐亚诺。齐亚诺在《日记》中承认：气氛阴郁可怖，他注意到希特勒不让他开口。齐亚诺那天晚上在萨尔斯堡的一家旅馆里写给墨索里尼的那封信，措辞自然比较谨慎，不象以往那样坦率。他说，中心话题是希腊的局势。德国元首已经决定在罗马尼亚集中兵力，然后通过保加利亚进军希腊，但是，在3月中旬之前，这个计划不可能实现；意大利人要进行准备，从阿尔巴尼亚同时发动进攻。当德国元首开始谈到轴心国对南斯拉夫的政策时，会谈进入高潮，希特勒认为，整个巴尔干的局势将取决于南斯拉夫的态度。他决心要迫使南斯拉夫签署一项类似友好条约的协定，但他得到的消息（通过巴多里奥不久前同德国最高统帅部的头目凯特尔的谈话）却使他认为，墨索里尼不但不肯同南斯拉夫谈判，反而想同他们决裂。齐亚诺这时只能搪塞说，恰巧相反，墨索里尼已经授权他对不久以前南斯拉夫发出的试探予以响应。据齐亚诺说，希特勒大声地问道：“在你看来，墨索里尼是否肯按照这样三点同南斯拉夫签订条约：轴心国对南斯拉夫的边界作出保证；把萨洛尼卡割让给南斯拉夫；南斯拉夫使亚得里亚海非军事化。”齐亚诺没有向墨索里尼请示就回答说，他认为意大利没有理由不同意这些条件。希特勒听了非常高兴。他们要使南斯拉夫同他们站在一起。保加利亚将得到一个出海口，意大利将占有希腊的其余部分，而英国则无论如何要被赶出地中海。在匈牙利于11月20日加入了三国公约以后，齐亚诺在维也纳再度会见希特勒，他通知对方，墨索里尼已经同意。德国元首建议把南斯拉夫的保罗亲王召至德国，并用王位来收买他，此人表面上拥戴他的堂兄弟彼得做国王，但据说亲王的妻子却为她的几个儿子觊觎着王位。

齐亚诺带着希特勒给墨索里尼的一封私人信离开了维也纳；这封信的日期是11月20日，在信中希特勒重申了他当时对西班牙问题已经一再表示过的看法，并且相当简短地复述了他当前在巴尔干的目的。虽然墨索里尼经常呵斥南斯拉夫不配跻身于轴心国之列，虽然他或许宁愿进攻南斯拉夫而不进

攻希腊，但是他却迅速地在 11 月 22 日就作了答复，说他愿意对南斯拉夫连同萨洛尼卡的边界给予保证，条件是：（一）南斯拉夫加入三国公约；（二）南斯拉夫使其亚得里亚海沿岸非军事化；（三）只有在意大利已经对希腊给予沉重打击之后，南斯拉夫才可进行干预。

希特勒对待其他民族的态度，始终同传统怀有泛德意志思想的奥地利人的态度几乎是相同的，因此，他对塞尔维亚人的勇敢无畏虽然不禁怀有一定的钦佩之情，但是，他对塞尔维亚人既英勇豪迈又爱好平等却大为不满，在希特勒的心目中，英勇的气概与平等的思想是不相容的。这也许可以帮助说明，为什么他对南斯拉夫的问题总是暴跳如雷，极度激动。他恨那个国家，因为它也是一 343 个典型的凡尔赛和约国家，常常可以看到，他在寻找机会使斯洛文尼亚重新归顺德国，鼓励克罗地亚人的分裂主义，孤立和贬低塞尔维亚人。他一厢情愿地认为，保罗亲王于 1939 年 6 月访问德国时，曾同意脱离国际联盟，后来当南斯拉夫未能这样做时，他就勃然大怒。这件事也许可以说明 1939 年 8 月 12 日齐亚诺在伯希特斯加登时希特勒的态度，这位德国元首几次三番怂恿意大利去消灭南斯拉夫。

这时，即 1940 年 11 月间，由于希特勒认为重要的是要抑制墨索里尼，他甚至试图阻止意大利人同贝尔格莱德进行谈判，而由他自己去同南斯拉夫人打交道，同时并要求匈牙利人也这样做，而意大利人要想了解个中情况，却比往常更加困难。11 月 27 日，南斯拉夫外交大臣秘密地应召至德国同里宾特洛甫会谈。德国人甚至在同这个虽是友好然而无足轻重的辛卡尔-马科维奇打交道时，显然也只能做到敦促他订立一项互不侵犯条约。12 月 7 日，阿尔菲那里去见里宾特洛甫，苦苦哀求德国给他们任何形式的帮助去对付希腊，这时里宾特洛甫恳切地告诉他，南斯拉夫之所以迟迟不给德国答复，无疑是由于意大利军事上惨败的缘故。他还补充说，在整个谈判过程中，贝尔格莱德对意大利极端敌视。12 月 31 日，希特勒写信告诉墨索里尼，在轴心国取得一些新的军事胜利之前，没有什么可同南斯拉夫谈的，但是，看来它绝对不会加入三国公约。它已经同意的，只有在 1940 年 12 月 12 日同匈牙利签订的一项永久友好条约，但是直到那时为止还未批准。

南斯拉夫的统治者虽然滔滔不绝地大谈南斯拉夫的统一，但这只是一句空话，看来，他们倒是在加剧克罗地亚人与塞尔维亚人之间长期的不和。这两个民族由于对他们的统治者痛心疾首，结果自己探索着去达成一种谅解，它具体地表现为成立了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联合民主抵抗阵线，由克罗地亚人的领袖马切克领导，不过也许可以说，激发成立这个组织的反倒是塞尔维亚人。可是，一项“和解协定”又称 1939 年 8 月 26 日协定的缔结，在当时虽曾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希望，可是到了 1940—1941 年之交的那个冬天，情况却似乎是，与其说它导致了塞尔维亚与克罗地亚的真正和解，还不如说它反而破坏了联合抵抗阵线的成就。因为，“和解协定”是由保罗亲王和他任命的茨维特科维奇与马切克谈判的，而没有与直到那时为止一向同马切克联合在一起的塞尔维亚反对派领袖们商量。根据这个协定，克罗地亚人获得了自治权和相当程度的民主自由，可是塞尔维亚人却仍然听凭贝尔格莱德政府的警方摆布，在斯托亚迪诺维奇垮台以后，警方的手段几乎没有什么改变。而曾经担任过南斯拉夫内政大臣并得到保罗亲王信任的斯洛文尼亚牧师派领袖科罗塞斯博士的影响曾一直被用来防止一切自由化的倾向，因为他觉得自由化的做法对共产主义正是美味可口的东西；总之，他主要关心的

是保护斯洛文尼亚人的利益。

因此，这个“和解协定”在把真正具有民主思想的马切克与不得人心的摄政亲王作为该协定的共同起草人联合起来的同时，似乎也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各个民族中赋予克罗地亚人一种特权的地位。在处理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杂居的波斯尼亚问题时，解决的方式不仅使塞尔维亚人的怒气火上加油，大多数克罗地亚人对许多细节问题也表示不满，克罗地亚的沙文主义极端分子更趁机大肆活动。他们的恐怖主义的乌斯塔沙组织越来越得到轴心国的资助和支持：该组织的领袖安特·帕韦利奇住在意大利，受到意大利的保护，同时他的副手克瓦特尼克则在发展乌斯塔沙组织同德国的关系。

1940年间，马切克不肯承认，克罗地亚农民党再也没有能力控制它的右翼和左翼。……于是，他和他的朋友就想尽种种方法去迁就极右派，把他们留在党内，以便先发制人，削弱与自己势不两立的帕韦利奇那一小股势力。为了这一目的，许多克罗地亚官方发言人发表了煽动性的反对塞尔维亚人的演说，把过去的伤疤统统重新揭开来。贝尔格莱德的民族主义者被激怒了，他们抓住这个机会，印发报纸和小册子对克罗地亚人进行了猛烈的攻击。这些书报虽然被政府当局查禁了，但是人们的怒火却有增无已；在贝尔格莱德市内，传说克罗地亚人要对塞尔维亚人进行专政。克罗地亚的极端分子则利用塞尔维亚人的这些抗议来煽起那里的人们对塞尔维亚人的仇恨。

等等，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轴心国的代理人乌斯塔沙组织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广，克罗地亚人则越来越慌

乱。大多数克罗地亚人仍然忠于马切克，他的理想是建立一个自愿结合的南斯拉夫联邦，但是纳粹党提出的反345对野蛮的贝尔格莱德的口号，却更容易被人们接受。另一方面，塞尔维亚人却越来越恼火。他们不要听克罗地亚农民党反对使用武力的诚意劝告；除了宫廷、警方、银行界和商业界以外，其余的人全部万众一心地深恶痛绝希特勒所主张的一切。老派的抱有泛塞尔维亚思想的军官们忠于同法国结盟的传统，同时，由于禀有塞尔维亚人的气质，他们并没有因为法国土崩瓦解而丧失斗志。有影响的塞尔维亚青年不满当时社会的贪污和压迫，政治上完全倾向于左派。他们中间有极少数人或许是马克思主义者，不过，即使是一个共产主义的俄国，也能投合农民家庭的深厚的泛斯拉夫感情，而他们中间有很多人正是来自农民家庭。在德俄两国蜜月时期，他们被弄得莫名其妙。可是，值得注意的是，一向同情沙俄而从不与苏联打交道的南斯拉夫政府，却于1940年6月，即德俄蜜月结束的那个月，同莫斯科建立了外交关系。从这时起，塞尔维亚的公众情绪越来越对轴心国怀有敌意，其程度或许可以说使保罗亲王和他的顾问们进退两难，既受到轴心国的恐吓威胁，又害怕贝尔格莱德发生暴动。希腊战事当然鼓舞了所有痛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人们，12月中旬科罗塞斯死后，他们前进道路上的一个障碍也去掉了。谣传要在德军到来之前先去进攻保加利亚；无论是在塞尔维亚人中间，还是在一般人中间，始终怀有一种强烈的观念，宁死也不能丧失民族气节，这就是科索沃之战失败和拉扎尔王殉国的古老传统。

保罗亲王及他选中的大臣茨维特科维奇和辛卡尔-马科维奇，都是懦弱、怕事而又不得人心的人。根据确切的消息，1940年10月28日，他们同陆军大臣奈迪奇将军曾秘密地计划同意大利联合，以便攻占萨洛尼卡，但是一星期后，他们放弃了这个主张，这一点从奈迪奇的辞职表现出来。德国前任驻

贝尔格莱德公使哈塞尔——他 16 是保罗亲王的好友，又是一个决不会高估塞尔维亚反对派实力的人——于 11 月到南斯拉夫访问归去后，却在日记中写着：“保罗亲王的处境非常困难，因为他在塞尔维亚同谁也没有真正的联系。他同克罗地亚人是有联系的，但问题是，他将来是否能不被他们无情地出卖。”11 月底当德国重新开始施加压力时，保罗只有采取拖延的办法；德国人以萨洛尼卡作钓饵来诱使南斯拉夫加入三国公约的做法，一定会被大多数塞尔维亚人认为可恶而予以拒绝。1941 年 1 月 19 日，里宾特洛甫在伯格霍夫对齐亚诺承认说，南斯拉夫的公众舆论“基本上是敌视”轴心国的，但是他坚信，这种敌对情绪将不会在政治上或军事上有任何具体的表示。

1941 年 2 月间，轴心国继续向南斯拉夫施加压力。

德国人劝诱茨维特科维奇和辛卡尔—马科维奇于 2 月 14 日到伯希特斯加登拜会希特勒，可是，连德国元首本人也未能收到预期的效果。与此同时，墨索里尼违背德国人的意愿，自顾自继续同贝尔格莱德谈判下去。2 月初。

他似乎已经同意把萨洛尼卡划给南斯拉夫，希望借此给希腊人一个致命的打击。可是，2 月 22 日墨索里尼写信给希特勒，感谢他把德国—南斯拉夫会谈记录给了意大利一份时，却抱怨说，南斯拉夫的敌对态度是不会改变的，要交萨洛尼卡也只能交给真正友好的南斯拉夫。在这个阶段，南斯拉夫批准了它同匈牙利签订的条约（2 月 27 日在布达佩斯签订），德国人劝意大利人要谨慎小心，三思而行。几天以后，3 月 4 日，也就是说在保加利亚被公开占领之后，保罗亲王秘密地访问希特勒，进行了四小时会谈。亲王和他信任的那两位代表，虽然看来是力量弱的一方，但无可否认，他们却步步为营，表现得极其顽

强。结果，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发现，为了要使南斯拉夫加入三国公约，就不得不接受南斯拉夫提出的全部条件：对南斯拉夫连同萨洛尼卡在内的边界作出领土保证（这就牺牲了墨索里尼长期渴望的目的）；轴心国军队不得通过南斯拉夫领土；南斯拉夫免于负担任何特别军费。

最后一点曾引起意外的争端，里宾特洛甫坚称，这只适用于对希腊的战事，但结果仍是里宾特洛甫被迫让步。至 3 月 4 日于南斯拉夫使亚得里亚海非军事化的问题，早已不再提起。不无值得注意的是，那个热烈崇拜轴心国的斯托亚迪诺维奇却在 3 月 19 日被匆匆忙忙地逐出南斯拉夫。

3 月 20 日，德国人通知意大利人，新的谈判已告结束，南斯拉夫将要签字了。可是，那天晚上南斯拉夫内阁开会时，却有三个塞尔维亚族的大臣康斯坦蒂诺维奇、布迪萨夫尔耶维奇和丘布里洛维奇提出辞职，另有五个大臣反对签约。柏林对这个理应是仆从国方面表现的这种罕见的顽强态度既惊又恼，因而在 3 月 22 日向贝尔格莱德发出了最后通牒，南斯拉夫必须于 3 月 25 日加入三国公约，否则它将失去这个唯一的机会。当时，哈塞尔正在德国驻贝尔格莱德的公使馆，他注意到，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似乎都认为不言而喻非得顺从不行，因为只有默从才能获得一个保证来对付意大利。

就在 1941 年 3 月 22 日这一天，在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掀起了风暴。来自四面八方的抗议书开始源源递向保罗亲王。军官协会向他呼吁不要签字；有谣言说，有一些军事领袖已经前去希腊。索科尔青年运动发表了一项声明，说宁愿牺牲一切，不愿丧失荣誉和自由。东正教会的领袖拜会了亲王，警告他要注意全国人民的情绪。可是保罗不无理由地反而更害怕德国人了。3 月 23 日，贝尔格莱德公布了德国作出的三项让步中的两项：（一）当南斯拉

夫加入三国公约时，德国（不是意大利）将保证南斯拉夫的领土完整和主权；（二）在作战期间轴心国决不要求南斯拉夫让它们的军队过境。3月24日，英国驻贝尔格莱德公使向辛卡尔-马科维奇递交了一份抗议照会，但是，就在那一天，茨维特科维奇得以更换掉那些已经辞职的大臣，然后与外交大臣一起启程赴维也纳。据说，由于铁路工人举行的抗议罢工，他们乘坐的火车晚点了。

1941年3月25日，星期二，在一种预兆不祥的阴郁气氛中，举行了加入三国公约的仪式（也是在维也纳的贝尔费德雷宫），参加这个公约的国家，这时已增加到八个。另外德国又递交给南斯拉夫三份照会，其中两份谈到星期日公布的那两项让步，第三份被认为是绝密的，其348内容包括德国和意大利作出的保证，说它们不指望南斯拉夫在军事上合作。这种谅解不受时间或空间的限制；

但如果南斯拉夫愿意在军事方面作出贡献时，它可通知其他两国。茨维特科维奇和里宾特洛甫先后发了言；茨维特科维奇显然很痛苦，里宾特洛甫虽想尽量利用这个机会作宣传，但他显然也很疲乏而且心事重重。希特勒决心要使这个仪式显得隆重而亲自出席，但是据科尔特说，他抱怨道，这个仪式看上去完全象一个葬礼。可是，科尔特在同时却认为，当希特勒在几天后接到从贝尔格莱德发回的消息时，他才真正地感到意外。

3月26日，黑伦从贝尔格莱德发回电报说，局势很紧张，谣传正在策划军事政变的一些青年军官已经获得南斯拉夫空军首领西莫维奇将军的支持。3月24日以后，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不断成为历史上最自发的人民起义之一的地点。贝尔格莱德四郊农村的农民来到了市区，同军官和学生一道反对政府和三国公约。3月26日晚间，茨维特科维奇和辛卡尔-马科维奇回到贝尔格莱德后，马上就被逮捕。那天夜里，负责逮捕他们的军官，其中为首的是一个叫做米尔科维奇的空军人员，占领了一些必须占领的重要地点，推举西莫维奇为指挥，并决定把年轻的国王所宠爱的保罗亲王撵走。那个“不得已而成为南奸的”摄政亲王带着一家已乘火车前往斯洛文尼亚，但是在路上被拦住，押回贝尔格莱德，然后象他自己先前对待斯托亚迪诺维奇那样，被送到希腊去。3月27日这一天是一个令人兴高采烈，的确可以说是欢欣鼓舞的日子。

塞尔维亚人和门的内哥罗人渴望同德国打一仗，他们相信，他们新的统治者也会愿意这样做；同时，他们也估计到，除了一开始能打一场勇猛的阻击战外，以后只能进行防御性的游击战。3月28日，彼得国王在东正教会领袖的主持下宣誓登基，仪式在贝尔格莱德大教堂举行。

新政府渴望至少不要招致德国的加速进攻，而照例地发表了否认改变政策的声明。与此同时，德国旅行社——

“旅游者”的大本营——遭到了群众的袭击，当黑伦在3月28日从教堂回去时，人们朝着他的汽车大声谩骂。根据德国方面的报道，德国大使馆十分清楚，正如它的武官所349报告的那样，事情是针对三国公约而发的。

上文提到过，希特勒于1940年11月在第一次讨论“马里塔”和“巴巴罗萨”这两个行动计划时，曾经决定先打垮希腊，然后再去消灭俄国。可是，在整个冬天，由于意大利人仍然被那些“傲慢的”希腊人牵制着，他只得干瞪着眼看着。正如希特勒经常向墨索里尼和齐亚诺指出的那样，在寒冬把巴尔干的交通封住的时候德国人休想去打希腊，因为那里的公路和铁路不但质

量差而且数量少，多瑙河的情形则尤其糟，河上桥梁不够，河面可能结冰。因此，“马里塔行动”预计要等到4月1日前后才能开始（墨索里尼为了想在上述时间之前打垮希腊，曾经作了几次尝试，最后一次在3月9日，但是，每次都由于仓促从事，准备不足，终告失败）。

在希特勒等待春天来临的时候，他特别担心，当他的军队通过保加利亚进兵时，在他的漫长的右翼战线上那个不友好的南斯拉夫会有所举动，他也一直在担心土耳其，因为在他看来，土耳其的态度在相当程度上将决定于南斯拉夫的态度。当德国元首3月25日在贝尔费德雷宫仪式举行后接见齐亚诺时，他宣称，南斯拉夫的屈服已经影响了土耳其人。很明显，从希特勒的观点看来，如果“马里塔行动”要按原定计划执行的话，3月25日的确是最后的机会。那天他在同齐亚诺谈话时，还是象过去那样，很强调良好天气的重要性，可是他表示非常乐观；他已经获悉，希腊人为了保卫整个色雷斯边境，将把军队分散部署，这就便于德国给以毁灭性的打击。几天之前，德国外长曾要求意大利说明它对希腊的要求。

在希特勒看来，塞尔维亚人正是挑起1914年战争的罪魁祸首，所以当他听到又是这些人胆敢对他的计划不予理睬时，会暴跳如雷、怒不可遏，这是很容易理解的。

更糟糕的是，日本外相松冈（在3月26日）已经到达柏林，希特勒非常重视他的这次访问。希特勒不等收到南斯拉夫政变的详情，甚至在这个消息尚未被证实之前，就于27日召集了军事指挥官，向他们宣布，政变已使南斯拉夫在即将进行的“马里塔行动”中成为一个靠不住的因素，这对“巴巴罗萨行动”来说，更其如此。但不论怎样，此刻发生这种变化总比今后发生变化要好。他下定决心，一俟350必要的准备工作就绪，就要把南斯拉夫完全消灭掉。〔他宣称〕将来既不需要在外交上进行探询，也不需要提交最后通牒。

这要依靠尽快地采取行动。要以适当方式设法把邻国争取到我们一方。必须要向意大利、匈牙利，在一定程度上也向保加利亚要求提供直接的军事支援来对付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的主要任务是掩护我们对付俄国。匈牙利和保加利亚两国公使已经得到了通知。致意大利领袖的电报要在当天就发出。

对南斯拉夫的打击一定不能心慈手软，一定要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去摧毁它的军事力量，这一点在政治上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这样可以使土耳其人胆战心惊，并将有利于随后的希腊战役。还可以这样估计，一旦我们发动了进攻，克罗地亚人将会倒向我方。要保证他们享受适当的政治待遇（以后还有自治的权利）。这场战争一定会非常受到意大利、匈牙利、保加利亚的欢迎，因为

这些国家都可能希望获得领土：意大利想要亚得里亚海沿岸地区，匈牙利想要巴纳特，保加利亚想要马其顿。

这项计划的先决条件是，我们要以最快的速度来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并要使用非常强大的兵力，以便在最短的时间内打垮南斯拉夫。

因此，“巴巴罗萨行动”的开始日期，势必要推迟四个星期。

致墨索里尼的电报到午夜才由黑韦尔发送给驻罗马的德国大使，并且附有命令，限于当天晚间送到，这自然是无法做到的。墨索里尼在3月28日凌晨2时接见马肯森。德国元首的电报的主旨是直言无讳的。他说，眼下意大利人必须放弃一切进攻计划，全神贯注地保卫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边界。

最重要的是，希特勒要求他保密，因为这是出奇制胜的先决条件。据马肯森说，墨索里尼满面春风，精神抖擞，一想到可以不必再受德国保证南斯拉夫领土完整的约束，他就兴高采烈，一小时后便以电话通知柏林，欣然地接受了希特勒的命令；谈到结束的时候，墨索里尼还强调了那个在他卵翼之下的克罗地亚恐怖分子帕韦利奇的重要作用。

3月28日，德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根据希特勒的反塞尔维亚和亲克罗地亚的指示，草拟了一份对南斯拉夫351夫进行宣传的指令。命令要这样宣传，德国军队将不是与克罗地亚人、波斯尼亚人和马其顿人为敌而入侵南斯拉夫，而是保护这些民族免受那些纯粹为英国利益效劳的塞尔维亚沙文主义者的无谓屠杀。非常凑巧，在第二天，即3月29日，设在格拉茨的纳粹党总部就发来了第一份这样内容的电报，说在3月28日，当人们在德意志人聚居的诺维萨德举行示威游行时，有两名德意志人被打伤。这件事发生后，德国的报纸和电台开动起来，对这类可怕的暴行日甚一日地大事渲染，据说在南斯拉夫的德意志少数民族正在受到这种暴行的折磨。简直很难想象，希特勒怎么会认为，别人竟然猜不出他的意图。4月5日，德国驻卢布尔雅那总领事在一次广播中宣称，关于暴行的传说是不确实的，他说，斯洛文尼亚人的行动一直是正当的，甚至是友好的。全世界的人听到这个广播都呆住了。当哈塞尔4月1日在布达佩斯见到黑伦时（他在此前已被召回柏林），黑伦本人也说，事实上反对德国的示威行动动作常少，而且也只是发生在南斯拉夫革命后的头几天。

南斯拉夫的革命是一桩激动人心的壮举。它围绕着贝尔格莱德进行，同时也因为这个国家由不同的民族所组成，而必然使它受到了限制。斯洛文尼亚人虽然已经落入德国和意大利的虎口，但是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却毫不犹豫地跟着塞尔维亚人走。至于克罗地亚人和马其顿人，固然，正如希特勒非常了解的那样，其中有许多人觉得自己憎恨南斯拉夫这个国家甚于憎恨德国，但是，总的说来，克罗地亚人是热爱民主和反对一切形式的独裁政治的；象其他民族一样，克罗地亚人中也有法西斯恐怖分子，这些人已被轴心国的代理人所收买。同时，由于马切克和农民党一直教克罗地亚人要息事宁人，一面也借此来驳斥乌斯塔沙组织的观点，因而当他们面临纳粹的进攻时，就特别脆弱，不堪一击。

西莫维奇的军事政变在政治上带来了混乱的后果。

发动政变的塞尔维亚军官中，有些人从1939年8月以来就对“和解协定”喷有烦言；新年阁的大臣中，有些人也被352认为是深恶痛绝这个协定的。因此，在克罗地亚人看来，虽然一向支持马切克的普里比切维奇领导下的塞尔维亚民主党人在西莫维奇政府中也有其代表，但是克罗地亚人好不容易得来的自治权利仍受到了威胁。3月27日那一天，马切克本人正在克罗地亚，西莫维奇由于不敢为了征求他的意见而耽误时间，就干脆宣布马切克以副首相的身分继续参加政府。西莫维奇也以同样的方法，从茨维特科维奇的内阁中接收了一些能够顺应时势的斯洛文尼亚牧师派阁员，因为新政府看起来必须象是一个民族统一政府。这也许会使那些最兴致勃勃的塞尔维亚理想家灰心丧气。他们原想朝着建立一个南斯拉夫各民族的自由联邦的方向取得真正的进展，可是这时却感到，这次革命好象只不过是一次反对保罗亲王的派别活动。马切克的行动总是迟缓的。他先派科舒蒂奇为代表前去贝尔格莱德提出条件，必须取消中央集权制在萨格勒布的最后一点残余，即贝尔格莱德方

面委派的警察当局，以使克罗地亚得到解放。西莫维奇对此表示同意，4月4日，马切克本人来到首都在新政府就职。应当记得，几年来，纳粹党一直在制造理由反对他这样做，而种种的谣言则更加使他在在这方面踌躇不决。

连一个最小的孩子都能看出，德国马上就要进攻南斯拉夫。南斯拉夫政府知道，情况十分危急，它力图拖延时间，但是我们很难猜测，它自己对此有多少把握。通过空军的关系，西莫维奇以个人名义向戈林发了一份旨在和解的电报。南斯拉夫的新任外交大臣、上了年纪的宁契奇是帕希奇在政治上的信徒；他在二十年代同意大利打交道打得很成功，这时他要求意大利出面调停。克罗地亚人一直因为他亲近意大利而恨他，结果，这一紧急措施不仅毫无效果，而且还对克罗地亚铸下大错。再则，这样做是徒劳的。虽然意大利驻贝尔格莱德公使马梅利看来是在鼓励南斯拉夫，但是墨索里尼却在急不可耐地等待着德国发给他的进军命令。

希特勒在1941年3月27日的军事会议上曾宣称，如果天气好的话，仍有可能在4月1日开始“马里塔行动”。但是，甚至连德国的军事机构对此也未准备就绪，于是在第二天决定，一定要到4月2日或3日才能进攻希腊。到了3月31日，德国最高统帅部又作出决定，“马里塔行动”要到4月5日才开始，届时军队将向尼什方向挺进，同时将以全部可用的力量对南斯拉夫的防空工事和对贝尔格莱德进行空袭。那天，希特勒写信给墨索里尼——这是他情绪最激动的信件之一——说德国即将发动进攻。他写道，他明白，自己将面临一个极其顽强的敌人，这个国家易守难攻，他表示相当担心，因为南斯拉夫拥有德意两国制造的飞机。他还为所以要发动这次新的战争增添了一些理由，说他得到消息，“俄国即将同南斯拉夫签订一项友好条约，也许这项条约甚至已经签订了”。

苏联明确表示，它对德国占领保加利亚表示不满，但是它无力加以阻止；3月间，俄德两国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尽管俄国向德国输出的物资数量在1月和2月份有所减少，相当奇怪地在后来又有了显著的增加。南斯拉夫首任驻莫斯科公使、反德的加弗里洛维奇，在3月中旬之前很少得到克里姆林官的鼓励。当他听到南斯拉夫准备加入三国公约的消息时，他就辞了职，但是在西莫维奇内阁成立后，他又出来工作，担任不管大臣。这时莫洛托夫显然向贝尔格莱德建议订立一项军事协定，南斯拉夫政府因此派遣两名军官赴莫斯科协助加弗里洛维奇进行必要的谈判。4月4日晚上，莫洛托夫通知舒伦堡，他即将同南斯拉夫签订一项条约，可是，虽然看来斯大林本人对向南斯拉夫输送武器的可能性曾表示过有点感兴趣，但是维辛斯基却拒绝考虑缔结军事协定的意见，认为这是出于误解，结果谈判又拖了一天。4月5—6日的夜间，俄国人终于同西莫维奇政府签订了一项协定，根据该协定，“缔约国的任一方如遭到第三国的进攻，另一方保证恪守友好政策”。但是，加弗里洛维奇经过一番苦争才获得的这点成果，甚至连一个同意给予援助的空头保证都没有，还不如1939年法英两国给波兰的那个受到严厉批评的保证。不过，对于一个以斯拉夫人反对德国的感情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南斯拉夫政权来说，这个协定或许在心理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可是，它却使希特勒非常恼火。

1941年4月6日，星期日，清晨5时15分，施图卡式俯冲轰炸机开始摧毁贝尔格莱德，正如德国元首先前354命令的那样，德意两国未经宣战就向南斯拉夫开战。南斯拉夫有这样一线希望，即匈牙利不致于那么快就忘记

恰基于上年 12 月在贝尔格莱德签订过协定，而这个协定在不久前刚批准。为了遵守原则，同时也为了防止匈牙利同德国的利害关系进一步一致起来，捷列基斩钉截铁地反对匈牙利参加进攻南斯拉夫。但是，专门喜欢危言耸听和滥许报酬的希特勒，已于 3 月 27 日又一次通过纳粹的爪牙斯托亚伊向霍尔蒂海军上将递交了一封信，表示如果这位摄政此刻愿意参战的活，德国元首将满足匈牙利的全部要求，并将不顾意大利的反对，给匈牙利在亚得里亚海一个地盘。霍尔蒂热切地予以响应；支持他的有大约半数的阁员以及军事当局，后者于 3 月 30 日已经在同德国人制订必要的计划。在 4 月 1 日于布达佩斯召开的最高国防会议上，捷列基设法在若干问题上使大家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例如，匈牙利军队要等到德军越过萨格勒布以后才行动起来，又如，匈牙利军队将进入巴奇卡，但是将只推进到那条当时处于德国各支军队之间的、以多瑙河和德拉瓦河为界的匈牙利旧边境为止。第二天，捷列基写信告诉他的朋友阿波尔：“处境非常困难，因为如果我们反抗，他们将首先把我们打垮，这样最倒霉，如果我们不进入巴奇卡，德国人自己会在那里安顿下来，如果不把他们打回去的话，他们将在巴奇卡—巴纳特—洪亚德瓦尔——萨克森地区，或许还有巴兰尼亚—托尔诺，建立一个德意志国家。”这时已经有许多传闻，说可能将在多瑙河中游成立这样一个德意志国家，匈牙利自己的西南部从而也有可能丧失掉。因此，捷列基是在作徒劳的挣扎；事实上，他能够信赖的唯一伙伴是巴尔多希，此人即使不能说是奸诈，至少也是软弱的。4 月 2 日与 3 日之间的夜里，捷列基在绝望中自杀了。5 日，希特勒给了霍尔蒂一些指示，内容同他正在向墨索里尼发出的指示相似，指示说，如果匈牙利要比它的盟邦迟四天才能行动的话，实际上它从 4 月 6 日起已处于交战状态了。保加利亚直到 4 月 15 日才同南斯拉夫公开绝交。

南斯拉夫除了精疲力尽的希腊和遥远的英国外，355 别无其他盟国，而英国即使有美国的援助，三年内也未必能返回欧洲大陆。斯洛文尼亚面临着敌人从格拉茨发动进攻的威胁，克罗地亚只有德拉瓦河可作为屏障，塞尔维亚也只有多瑙河可以据守。希特勒所担心的难以对付的国家，只是波斯尼亚、门的内哥罗和马其顿。许多塞尔维亚人和门的内哥罗人早已渴望同希特勒打一仗，斯洛文尼亚人，甚至还有一些克罗地亚人则和他们同仇敌忾。可是，南斯拉夫军队的装备实在糟透了。参谋总部被一些因循守旧的军官控制着，他们嘲笑使用机械化装备就不象军人。其次，南斯拉夫一向是个既小又穷的国家，加上贪污腐败，变得更加贫困。无论在进攻还是防御方面，几乎都没有足够的空军力量（除了一些轴心国制造的飞机外）。的确，从 4 月 6 日早晨开始，出现了越来越可怕的混乱局面。“和解协定”对军队组织所起的影响倒不大，克罗地亚士兵通常仍由塞尔维亚军官在指挥，尽管他们对这些军官既不信任，又害怕或鄙视。响应号召参军的人往往住不到营房或领不到装备。纳粹分子一直在准备通常的破坏手段：甚至在塞尔维亚，他们也有一些塞尔维亚族的法西斯代理人，即廖蒂奇运动的成员，这些人跟斯托亚迪诺维奇关系密切；另外，德意志少数民族也已为进行这项工作而接受了训练。

战争一开始时，在斯洛文尼亚出现过一些激烈的战斗。在克罗地亚，那些在过去两年中一直在扩充力量的乌斯塔沙党徒夺得了许多重要的据点。一般的百姓或许有一种模糊的亲英情绪，但其中也有许多人被纳粹的宣传口号所迷惑，口号说，德国是克罗地亚的朋友；的确，他们没有看到炸弹落在自己家里附近。他们有些人是和平主义者，有许多人则十分自然地是失败主义

者；他们憎恨乌斯塔沙分子，但又害怕他们。当马切克回到了库皮内茨老家，于4月8日向克罗地亚人广播时，他心中所想到的，是不可避免地会有一段在德国卵翼下由乌斯塔沙统治的时期；虽然他号召人民参军，但是他避免使用听上去过于好战的语言。不久，萨格勒布就与贝尔格莱德失去了联络。在德军开到之前，两名英国官员在最后时刻从萨格勒布驾车向南逃跑，在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他们到处受到友好的接待；有一处，士兵们虽然没有接到上级的指示，却作好了战斗的准备，另有一处，乌斯塔沙分子已经占领了俯视图的一些高地，再有一处，已挂出了白旗。到4月10日，星期四那天，克瓦特尼克则以轴心国扶植下的新克罗地亚代理元首的身分在萨格勒布发表广播，而匈牙利人则占领了巴奇卡（伏伊伏丁那）；4月12日，帕韦利奇宣布自己为克罗地亚国的元首，4月15日，德意两国予以承认。

356 在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战斗的情绪依然强烈。可是不久以后，人们就承认这场战争将要打败。南斯拉夫政府尽快地从贝尔格莱德的废墟迁至萨拉热窝附近的帕莱。马切克决定，他本人象以往那样将留在克罗地亚，而委派他的同事克尔恩耶维奇（他于4月7日与马切克一起返回萨格勒布和库皮内茨，恰好在乌斯塔沙政权成立之前逃走）去代表克罗地亚农民党参加内阁。德军于4月13日即复活节那天进入贝尔格莱德。当克尔恩耶维奇在同一天到达帕莱时，大臣们都主张把政府再内迁到门的内哥罗，组织力量抵抗；4月15日，星期二，南斯拉夫政府发表了一项声明，可是它仍然企图把战局的真相掩盖起来。但是到了4月14—15日的夜间，在门的内哥罗的尼克希奇地方终于作出了决定，国王和政府必须趁还可逃脱时从速离开。于是他们就乘了米尔科维奇尚能调度到的飞机飞往雅典。4月17日，奈迪奇带领军队向德国人投降，南斯拉夫也停止了抵抗。那些比较勇敢无畏的军事领导人则把作战物资转移到山区，藏在安全可靠的地方，等待新的风暴到来。西莫维奇政府则直到7月下半月才最后在伦敦成立。

第三节瓜分南斯拉夫

瓜分南斯拉夫，要比用武力征服南斯拉夫困难得多。德国外交部国务秘书魏茨泽克把柏林政界中众所周知的一件事告诉哈塞尔，说从贝尔格莱德发生革命那时起，希特勒就一心一意想把南斯拉夫消灭掉，并且还制订了对于南斯拉夫问题的各种荒唐的“解决办法”。4月初，希特勒对陆军发布了有关瓜分南斯拉夫的暂行指示，这个指示可以概括如下：

萨瓦河以北的斯洛文尼亚将并给德国的斯蒂里亚和卡林西亚两个行政区；由于意大利人已经占领了该地区相当大的一部分土地，希特勒将致信墨索里尼，要求意军撤出。

普雷克穆尔耶和巴奇卡将划归匈牙利人，但巴奇卡地区的德意志居民以后将予迁移。

南斯拉夫所属的巴纳特，以及塞尔维亚，连同博尔的铜矿和煤矿，将置于德国的军事管制之下。

南斯拉夫所属的马其顿将划归保加利亚。

克罗地亚将成为一个独立国。

意大利将决定其余部分的归属，包括波斯尼亚和门的内哥罗在年；有可能使门的内哥罗恢复为一个独立国。

357 陆军，尤其是军备经济局，可以提出更明确的要求。

这个计划似乎是在4月12日，即德军占领贝尔格莱德的前一天，在希特勒的大本营拟订就绪的。一星期后，当齐亚诺应召到慕尼黑教堂去见德国元首时，希特勒提出许许多多作战方案，这时冬季既已过去，这些方案都可执行起来。但是，他不愿意讨论如何分赃的问题。他把这个问题留给里宾特洛甫去处理。里宾特洛甫于4月21日在维也纳会见了齐亚诺，他根本不象在谈判，而只是把希特勒有关斯洛文尼亚的命令交给齐亚诺。这就是说。

意大利可以获得没有并入德国的那些领土。但是，齐亚诺在发给意大利领袖的电报中，却不安地指出，这样，德国的边界就将距离卢布尔雅那还不到三公里了，的确，这条边界将沿着萨瓦河一直伸展到距离萨格勒布只有几英里的地方。德国元首本来准备写一封信对此加以解释，但此刻并无迹象能表明他打算这样做。“里宾特洛甫特别反复地指出，这条边界既然是希特勒斩钉截铁地划定的，那就应当被认为是最后的决定。”7月8日，两国在柏林签署了一项意德协定，批准了这条边界。德国人因此就并吞了斯洛文尼亚大约四分之三的地方，其中大部分被称为下斯蒂里亚，由斯蒂里亚行政区区长管辖。并入那个行政区的，还有沿着卡林西亚边界的一条狭长地带，以及旧奥地利的卡尔尼奥拉地区的一片零碎的地方。意大利人为他们根据5月3日的一道政令而吞并的一部分斯洛文尼亚领土制订了法规：在下斯蒂里亚，斯洛文尼亚文是完全禁止使用的，而在划归意大利的卢布尔雅那省，学校中却仍用斯洛文尼亚文，官方文件则意大利文和斯洛文尼亚文并用。的确，就象齐亚诺在1941年4月29日的日记中所暗示的那样，意大利当局作了不少努力，去消除斯洛文尼亚人的恶感，希望他们能够把意大利人的统治同德国人在萨瓦河以北地区的统治作一对比，这样就会觉得还是意大利好。斯洛文尼亚人是虔信天主教的，当德国人在残酷地迫害斯洛文尼亚教会时，意大利人却很优待教士。

除了获得萨瓦河以北的斯洛文尼亚之外，德国人还想攫取塞尔维亚，以及1919年以前属于匈牙利而后来划归南斯拉夫的一部分巴纳特地方。齐亚诺在4月21日发电报告诉墨索里尼说：“德国政府的意图是要把塞尔维亚35%的地位尽量贬低，以防止它再度成为一个活跃而危险的

耍弄阴谋诡计的中心。有了这样一个看法，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和克罗地亚以牺牲塞尔维亚为代价的领土要求，就或多或少地都会被认可。”希特勒4月19日接见保加利亚国王时，实际上已经答应把整个马其顿划给保加利亚；在同一天，德国人允许保加利亚军队占领马其顿的首府斯科普里（乌斯库布）。由于意大利一直指望能把马其顿的相当一部分地方划给阿尔巴尼亚，所以齐亚诺一听到里宾特洛甫谈起马其顿的事，便大吃一惊。4月22日，里宾特洛甫通知齐亚诺，尽管对博里斯许了愿，但是德国元首还是希望同意意大利人会晤，商议塞尔维亚的科索沃地区的问题。然而，他却又打算把利托滕的突出部分保留给保加利亚，把米特罗维察的突出部分仍留给塞尔维亚，因为在这些地区内有德国经营的矿山。

德国人在原属南斯拉夫的那一部分巴纳特的行政管理，可以依靠那里的为数众多的操德语居民——上文已经提到，先前就传说过，要在这个地区建立一个规模大得多的德意志国家。希特勒拿下塞尔维亚本部，原是为了要挫折塞尔维亚人的锐气，因此他就本着这样的精神进行统治。于是，塞尔维亚人就与波兰人和犹太人遭到同样残酷的虐待；如果有一个德国人在那里被杀死，就要处决一百个塞尔维亚人作为报复。有好几个月之久，德国人找不到

一个塞尔维亚的卖国贼，但是，到 1941 年 8 月 30 日，奈迪奇将军同意担任贝尔格莱德傀儡政府的头子。塞尔维亚和巴纳特部拥有德国人想直接控制的重要经济资源。

除了 4 月 12 日的计划中所提到的那些矿山之外，还有设在克拉古耶瓦茨的一个军火工厂以及在科索符斯卡-米特罗维察的特列普查的几个铅矿，这些厂矿都是位于希特勒曾坚持要据为己有的那个突出部分。把原属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地区分配给保加利亚的事，进一步确定了下来。

至于克罗地亚和门的内哥罗，按照德国的方案，意大利人是可以完全自行作主的。然而，4 月 21 日，里宾特洛甫对于萨伏依王室要为克罗地亚立一个国王的建议却表示不愿意，同时他在齐亚诺对整个达尔马提亚地区的领土要求中，掺入了一些有利于克罗地亚人和马扎尔人的建议。但在第二天，经与希特勒商议后，这位德国外长不再提这些对上述要求加以限制的条件了。对此，人们只能这样推测，德国元首预见到达尔马提亚问题势必引起争端，所以他宁愿让别人去为如何划定边界争吵，然后自己或许再去对之进行修改（后来的确修改了）。到那时为止，德国军队能够在整个巴尔干半岛上坚持控制住一切基本的经济供应和交通，至于阜姆或斯普利特的主权在理论上是否属于意大利，那只是一个极其次要的问题。对于萨伏依王室，希特勒既瞧不起也不信任，如果有朝一日克罗地亚人要求他从其统治下把他们解放出来，那倒是很配他的胃口的。

在这个时刻，齐亚诺在日记中开始对国内，尤其是对参议院为整个达尔马提亚问题大肆叫嚣表示不满。经过法西斯政权多年来的煽动，这些领导人这时后悔自己取得的成就。因为，当齐亚诺于 4 月 25 日在卢布尔雅那会见帕韦利奇，又于 5 月 7 日在蒙法尔科内陪墨索里尼一起会见他时，这位乌斯塔沙领袖指出，达尔马提亚地方几乎没有意大利人，并且坚决主张，如果新成立的克罗地亚马上就丧失掉整个达尔马提亚的话，他自己的地位也将很难保牢。在这个阶段，无论是齐亚诺还是墨索里尼都意识到，把他们自己卵翼下的这个人弄得瘫痪不灵，那将是愚蠢的。固然，整个波斯尼亚和整个黑塞哥维那——尽管这两个地方都杂居着塞尔维亚族和克罗地亚族——这时都划给了克罗地亚，但是，帕韦利奇将发现，如果没有了达尔马提亚，他的那些意大利恩主对待他会比订立“和解协定”时保罗亲王对待马切克还要差。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特别是在斯普利特的问题上——最后一致同意，意大利将占据达尔马提亚沿海从扎拉以北至斯普利特以南的一片地方（这样它就可以直接控制重要的铝土矿）以及一些岛屿（但不包括布拉奇、赫瓦尔和累西纳）；它还获得了更南面的一大片地方，包括科托尔在内，但不包括杜布罗夫尼克。这些地方合成了达尔马提亚省——法西斯分子称之为“历史上的达尔马提亚”——

以扎拉为首府；7 月 11 日，巴斯蒂亚尼尼被任命为该省省长。

与此同时，双方未经多大困难就一致同意——它使维克多·艾曼努尔国王相当满意——把克罗地亚的王位授与他的堂兄弟斯波累托公爵，但加冕典礼实际上却是于 5 月 18 日在罗马举行的。克罗地亚从来没有把这位公爵非常认真地对待过，因此他也无法认真对待自己的这个新王国而去光顾一下，直到墨索里尼垮台和意大利在克罗地亚的势力完蛋为止，他一直留在意大利。他加冕的一天，有三项意大利—克罗地亚协定在罗马签订：一个协定是确认边界；另一个协定是意大利保证克罗地亚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而克罗地

亚则于同时实际上把自己的对外事务交给意大利处理；第三个协定是一项军360事协定。根据最后这个协定，墨索里尼终于可以在亚得里亚海一带为所欲为，因为属于克罗地亚的那一部分达尔马提亚沿海地区和岛屿将不设防，同时意大利还将拥有通过克罗地亚领土运兵的权利。当希特勒和墨索里尼6月2日在勃伦纳会晤时，德方同意这些安排，里宾特洛甫甚至表示希望，属于轴心国的克罗地亚能在意大利加入三同公约；6月15日，即在威尼斯进一步举行了正式的仪式。齐亚诺私下对希特勒的这次过分慷慨的态度表示怀疑——这完全是可能的——因为希特勒似乎已经同意，意大利人在政治上可以对克罗地亚进行全面控制。

事实上，德国军队依然占领着那里，指挥官是那个以反对意大利而闻名的格拉斯·霍尔斯特瑙将军，同时，里宾特洛甫门下的一个名叫卡舍的人，则以德国公使的身分到达萨格勒布，以党卫队的名义——或者至少是为了党卫队的利益——同那位将军争吵。在意大利参战一周年纪念日，墨索里尼向他的女婿表示，他对整个克罗地亚的事感到心酸。只有一件事可以安慰他，即在几天之前，他至少能够得意地告诉巴尔多希，阜姆之于马扎尔人，正如热那亚之于瑞士人一样。另外还应当提一下，匈牙利人除去占领了原属南斯拉夫的巴兰尼亚和巴奇卡（伏伊伏丁那西部三分之二的地方）之外，还占领了原属斯洛文尼亚的普雷克穆尔耶和原属克罗地亚的梅久穆尔那，这两小块地方分别位于穆尔河的北面和南面。

当里宾特洛甫和齐亚诺于4月21日会谈时，门的内哥罗问题似乎是所有问题中最简单和最不重要的一个问题；里宾特洛甫同意它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通过宪法和政治的纽带与意大利联合起来”〔原文如此〕。可是，突然出现了意料不到的复杂情况。原未，意大利的王后是门的内哥罗未并入南斯拉夫之前的末代国王尼古拉斯的女儿。她劝说她的丈夫复辟佩特罗维奇王朝，好让她的那些贫穷而又被人怠慢的亲属在门的内哥罗相继为王。可是，她的这些亲属谁也不愿意干。5月21日，暂时担任361意大利高级专员的马佐利尼带回一个消息，说策蒂涅的人要王后自己去当国王。齐亚诺欣赏这个意见，部分的理由是他认为，如果门的内哥罗有了自己的王朝，阿尔巴尼亚将会猜忌——由于传说要恢复1914年的门的内哥罗，阿尔巴尼亚的领土已经受到了威胁。但是，维克多·艾曼努尔却反对他的妻子想凭她本人的头衔去执政的计划，在这以后，曾谈到过采用摄政的办法。5月26日，齐亚诺对解决门的内哥罗问题竟然要花这样长的时间，表示惊讶，看来，此事已经陷入僵局。同年早些时候，当局势已经发展到非对门的内哥罗用兵加以征服不可时，皮齐奥·比罗利将军就奉派到那里去担任意大利军事总督；他将有许多事情要干。

就在这样情况下，南斯拉夫被分割为几个组成部分。划分时未经周密考虑，而且对它的敌人的利益考虑得过多，对它原来的居民的利益考虑得太少，以致新问题发生得多，而老问题解决得少。另外，德意两国对在南斯拉夫分赃的问题以及对南斯拉夫游击队应采取什么政策的问题，一直争吵不休，这种争吵比什么都更破坏了它们之间的关系。

第四节 战败和占领希腊

1941年4月6日，清晨5时15分，驻在保加利亚的德国军队进攻了希腊。7日，由于南斯拉夫在南部的军队撤退，希腊的侧翼暴露了出来，德军向萨洛尼卡方向突破，次日占领该地。这一次，他们的宣传是属于和解性质

的；他们几乎是斯文文地敦促希腊人投降，因为他们（德国人）来此的目的，只是为了把英国人赶走。1941年1月底的时候，梅塔克萨斯已去世，继承他为希腊首相的科里济斯并不象他那么担心英国的援助会给德国一个理想的借口来进行干涉。2月8日，科里济斯重申梅塔克萨斯在1月18日所发表的声明，说希腊将抵抗德国的进攻；3月4日，艾登和迪尔将军（帝国参谋总长）在雅典同希腊首相商定，英国将派出援军——一个英国装甲旅、两个澳大利亚师、一个新西兰师和一些英国炮兵部队。到3月中旬，这些数目并不够用的军队开始陆续到达，但是，英帝国的军队进驻希腊大陆一事，却到4月6日才被公开承认。在德国进攻南斯拉夫的时候，希腊人本身362必然在各方面已经筋疲力尽，而当西莫维奇于4月17日到达雅典时，希腊人也不得不放弃了希望。在那位南斯拉夫领导人到达的后一天，科里济斯自杀了；4月20日，埃皮鲁斯和马其顿的希腊将领表示愿意投降。21日，希腊人通知英国人，他们已无法继续作战；22日，英帝国的军队开始撤退。23日，希腊国王和他的大臣们一起撤退到克里特岛。24日，保加利亚人入侵希腊，从德国人手里接管了马其顿东部；25日，德国军队占领利姆诺斯岛；27日，德军进入雅典。

在这期间，齐亚诺于4月21日在维也纳会见了里宾特洛甫，他要求把爱奥尼亚群岛并入意大利，把希腊西北部从弗洛里纳到普雷维扎的那一片地方（或称察穆里亚）并入阿尔巴尼亚；其余地方以后再作决定。次日，里宾特洛甫说，德国元首已表同意。在这以前，4月19日博里斯已提出对萨洛尼卡的领土要求，并得到希特勒的同意。只是由于这件事要公布出来，齐亚诺提出的要求才连带获得了批准。

希腊从4月20日开始向德国人投降，使意大利人十分丢脸的是，投降的地点恰恰是在希腊的西北部，而签订投降书的时间也恰恰是在4月21日，即齐亚诺与里宾特洛甫在维也纳举行第一次会谈的那一天。德国人把此事通知了意大利人，接着约德尔就和意大利的费尔雷罗将军飞往萨洛尼卡，去接受那个在埃皮鲁斯首先要求投降的希腊将军特索拉科格罗的投降。4月23日签订的这一投降书中，第一条确定希腊人是无条件投降，但是第二条却史无前例地提到希腊人的勇敢，说他们以这种精神“维护了他们的军人荣誉”。有几个星期之久，德国人的态度一直是钦佩希腊人的勇猛精神的，希特勒在5月4日的一次演说中就曾加以赞许。的确，德国人的表现，仿佛他们前去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希腊人既不受英国人也不受意大利人的侵犯；因而德国军队和意大利军队之间发生了一些冲突。

4月26—27日的夜间，当德军准备进入雅典时，德国驻罗马大使马肯森通知齐亚诺，特索拉科格罗已准备好成立一个政府，以代表希腊来签署投降书。4月27日，363安富索奉命去拉里萨会见利斯特（驻巴尔干地区德军总司令）和特索拉科格罗；到29日，一切安排妥当，以特索拉科格罗为那个在轴心国保护下的政权的头子。

除了爱奥尼亚群岛割给意大利，察穆里亚割给阿尔巴尼亚，马其顿东部和色雷斯西部割给保加利亚之外，在名义上，希腊被判定在战争期间要由意大利实行全面的、“至高无上”的占领。在特索拉科格罗的统治下，塞萨利和伯罗奔尼撒半岛在轴心国驻雅典代表的监督之下，保留着些许的自治权。1941年7月2日，墨索里尼发布了一个公告，任命一名对最高司令部负责的意大利高级专员来管理意大利占领下的希腊。一位叫吉季的干练的外交家，

担任了这个职务。他竭尽全力去改善那里的水深火热的处境。保加利亚人在色雷斯推行一种斩尽杀绝的政策，在希腊所有被敌人占领的区域内，那里的情况大概是最恶劣的；在马其顿东部，情况也好不了多少。

在实际做的时候，德国人总是在他们认为重要的地方驻扎下来，尤其是在萨洛尼卡、比雷埃夫斯和利姆诺斯岛。他们从未有过足够的舰艇在漫长的希腊海岸线和岛屿间进行巡逻，因此在西部和帕罗奔尼撒半岛周围就不得不依靠意大利人；在爱琴海，他们利用了保加利亚人，可是一面仍保持了控制权。5月底占领克里特岛后，他们的地位当然大大地加强了。此后，德国人就对根据对俄国作战的需要或希腊人的反抗情况，调整他们驻在希腊的兵力。

第六编德国和苏联的破裂

第一章 364 德苏关系的恶化 1939 年 8 月 23 日至 1941 年 6 月 22 日

第一节是无法抑制的冲突吗？

1939 年 8 月 23 日的德苏协定，在签订后二十二个月，因 1941 年 6 月 22 日德国进攻苏联而遭破坏。从一种意义上看，这种破裂是容易解释的。当协定还在谈判时，希特勒就已经打算在适合他需要的时候加以破坏；俄国人那方面，也料到迟早会破坏这个协定。

取得对苏联辽阔领土和巨大资源的控制，是希特勒先后一切侵略行动的终极目标，因为只有这样他才可能实现他的野心，把德国建成一个象美国那样规模的超级大国。要做到这一点，不能只靠实现他的那些比较近期的目标，诸如：把所有邻近的操德语居民都合并第三帝国的疆土内；把德国的霸权强加于它东西两面的欧洲邻国；以及牺牲受它之害的西欧国家，为德国在非洲或许也在印度尼西亚取得热带的属地。如果德国要按照美国在十九世纪中提高其地位的程度，来提高它在二十世纪中的地位，那就必须在苏联现有的领土中发现未开发的大陆，并象美国的拓荒者对待美洲印第安人那样来处置当地的居民，把这块土地据为己有。然而在俄国人那方面，他们一定会奋起战斗，如果遭到挫败，也会继续战斗下去，而不会乖乖地屈服，扮演北美印第安人那样的角色，让德国获利。至少五百年来，俄国人由于一直对自己的命运具有信心而受到鼓舞。作为基督教徒，他们一直认为，自己在土耳其夺得君士但丁堡，从而完成了征服安纳托利亚和东南欧信奉东正教各民族的大业以后，他们就是上帝特选的东正教的受托人和守护者。再者，自 1917 年以来，俄国人民中当权的少数共产党人也自命为全肚界马克思主义正统学说的受托人和守护者，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苏联是以共产主义为正式信仰的第一个大国。结果，65 俄国的共产党人和俄国的基督教徒，在抵抗纳粹德国侵略者、保卫对各种信仰的俄国人来说都是神圣的俄国领土方面，是齐心协力的。

在这种意义上，1941 年 6 月 22 日爆发的俄德冲突是无法抑制的。可是，希特勒为什么在这一天破坏他 1939 年 8 月 23 日同斯大林签订的协定，却引起了两个疑问。第一，为什么希特勒在他追求俄国这个目标方面，决定放弃蟒蛇的策略，改用老虎的战术呢？第二，即使在他已经得出结论，单靠压力决不能把苏联完全置于他的权力之下的时候，为什么他要在英国还没有屈服以前，就对苏联作战呢？

第一个疑问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希特勒从 1939 年 8 月 23 日以来对苏联运用蟒蛇策略，得到了不少的好比。

显然苏联政府十分畏惧德国，决不敢梦想进攻它。苏联政府不会动手打仗，除非德国象它在 1941 年 6 月 22 日那样对苏联直接攻击；苏联政府一再以事实表明，它多么想要避免给希特勒以任何对苏作战的借口。它曾表明这一态度，即在苏联与轴心国之间对东欧的逐步瓜分中，凡是双方利益冲突的地方，它都对德国让步。它又通过下列事实再次表明了这一态度，即苏联政府愿意以宝贵的物资供应德国，并于德国已经证实不能或者不愿以同等价值的交换物品供给苏联时，还继续这样做。在那二十二个月中，苏联政府在绥靖德国方面所做的事情，大大超过了英法两国政府在希特勒上台后到 1939 年 3 月 15 日这段时期中所做的。难道希特勒不能采取精心策划的步骤，继续推动苏联沿着这条致命的路线再走下去，而将其完全置于掌握之中吗？希特勒过去曾证明自己是一位能手，长于计算他的受害者会忍气吞声地经受多么大和多少次屈辱而不至于奋起反击。看来，希特勒在用他的惯常手法对付苏

联政府时，也许在那二十二个月中的某一阶段已经认识到，如越过了一定的界限，苏联政府就不愿意为了避免战争而再迁就了。苏联与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不一样，不会不经过战斗就让他完全控制。因此他必须用武力取得对它的控制，就象他已经取得对波兰、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法国、南斯拉夫和希腊的控制那样。

没有疑问，希特勒在 1941 年，和张伯伦在 1939 年—

366 样，严重地低估了苏联的战斗能力。到那时为止，外国政府领略过苏联战斗能力真正分量的，只有前不久在战场上同红军直接较量过的那两个政府。日本军队 1939 年 8 月在诺门坎的惨败给了日本一次教训，使得它不敢跟着德国一起进攻苏联，即使苏联在德苏战争中处境最不佳的时候。芬兰军队在 1939—1940 年冬季战役中挫败了第一批进攻的俄军，取得了辉煌胜利，但这种胜利并没有使芬兰政府盲目到看不出一旦红军开始全力攻打曼纳海姆防线，他们就必须投降。缺乏这种经验的外国政府往往会从俄国在冬季战役第一阶段的失利中得出一种不那么清醒和不现实的结论。它们会过高地估计 1936 年“大清洗”对红军造成的损害，并低估苏联政府在本国疆土上打一场防御战所拥有的两项特殊有利条件的价值。它们体会不到，面对凶暴的侵略者，大俄罗斯民族以及苏联的其他许多民族会以何等爱国主义的精神团结在苏联政府的周围；它们也不能体会红军在本国领土内有辽阔的用武之地，使苏联不成其为闪电战的理想目标。德国武装部队曾证明，它们的机械化和装甲的进攻部队，能干一夜之间侵吞丹麦，三个星期内占领波兰，一个月内打垮法国；可是这些弱小的欧洲国家与苏维埃巨人之间的大小不同，使得要给苏联“致命一击”的军事问题，不仅在程度上而且在实质上有所不同。毫无疑问，这种极其重要的区别，希特勒的一些最有才干的军事顾问是知道的。可是希特勒本人不知道；因此后来他大大地低估了苏联的抵抗能力，以致当他一旦认识到没有战争的压力，便不能使苏联完全归于自己的权力之下，就决定用武力去取得对它的控制。

如果这是对第一个问题的答案，第二个问题仍然存在。为什么希特勒在英国还没有被征服的时候就发动对苏联的战争呢？假如他在法国覆灭以后马上就动手进攻苏联，在这种情况下，反而比较容易理解。因为，德国人和法国人一样，曾认为法国的覆灭等于西欧的战争结束。他们不相信，英国在失去主要的盟友和军队被赶出 367 大陆以后，还想继续战斗；并且，当英国竟然在它的历史上又一次荒唐到不知道自己已经被打败的时候，德国人却不相信它还能招架得住德国对它的攻击。然而，到了希特勒发动对苏联的进攻时，距离德国空军在“不列颠之战”中遭受决定性的挫败已经九个月了，而这九个月并不是“西线无变化”的阶段。法国覆灭的震动和“不列颠之战”胜利的喜悦使英国从失败主义法国的一个萎靡不振的盟友，一跃而成为一个敢于和巨人斗争的大卫。再则，这同样的两种经历合在一起发挥作用，又把美国从新世界一个孤立主义的局外人改变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美国的战争潜力是当时世界上决定性的军事因素；因此，从长远观点看，1941 年 6 月 22 日这个时候，由于英国人在他们的岛上坚持不屈，又有美国为后盾，希特勒的西线比 1940 年 5 月 9—10 日夜间他对低地国家发动攻势时要难以对付。英国这时已经变成美国的航空母舰，停泊在可以轰击希特勒的欧罗巴要塞的西面围墙的射程以内，它在 1941 年对希特勒的威力以及甚至对他的继续存在构成的威胁，超过十三个月前的法国，那时候法国蜷缩在马其诺防线背后，其

西端只须横越阿登就可以绕过。没有疑问，希特勒在 1941 年不知道——他始终都不知道——美国能左右战争的结果这一明显的事实，因而他在美国还没有正式成为一个交战国的战争阶段，未能察觉英美联合的危险。另一方面，希特勒的基本原则之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由于让自己同时在两面作战而招致失败，所以避免重犯这一根本性的战略错误，是德国第二次企图用武力取得世界霸权能够成功的一项必要条件。希特勒对这条原则如此坚信不疑，所以于 1939 年 8 月同苏联和解，以确保在他进攻波兰时不致既在东线和一个大国交战，又在西线和另外两个大国交战。事态证明了这一迫不得已的决定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因为，即使苏联是一个友好的非交战国，第三帝国这时的军事力量在 1939 年的秋季战役中，也仅仅能够打倒 368 波兰，同时又守住齐格菲防线。假如法国人没有那么全盘失败主义的心理，波兰人不是那么缺乏装备，德国在波兰的闪电战，也许由于英法进行突破，越过莱茵河进入鲁尔区，而会突然停止。

那么，不管希特勒怎样低估了英美的力量，为什么他在 1941 年不顾他自己的战略政治原则，经过深思熟虑以后，竟采取了他在 1939 年经过考虑而不敢采取的行动，甘冒两面作战的危险呢？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是，他错误地估计了英国对德国进攻苏联的反应。不管希特勒对赫斯的出走是否知情，他可能和赫斯一样地猜想，英国对待苏联，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暗暗高兴地袖手旁观，听任希特勒对苏联作战，犹如 1939 年苏联曾袖手旁观，听任他对波兰、法国和英国作战那样。希特勒可能也曾想象，当轮到苏联遭受波兰和法国的命运，当这最后的一次打击已经实际上使欧亚大陆掌握在德国和三国公约的两个伙伴手里的时候，英国将终于认识到大势已去，而同他媾和，条件是保全他的面子，而使英国永远受他的支配。假如英国政府和人民走的是这条路线，而不是采取丘吉尔在得到德国进攻俄国的消息后几小时内所决定的方针，那么，从此以后希特勒就有理由不把美国的力量当一回事。因为，这个“民主国家的兵工厂”当时只能帮助那些愿意自助而充分利用美国工业所能供应的武器的人；如果由于英国人民斗志涣散，以致美国失去它在英国的根据地，那就很难看出它怎样能继续抗拒三国公约的三个缔约国在旧世界的霸权。然而，如果这是希特勒指望他进攻俄国对英美共同体的士气会产生的影响，那么，英美两国实际上对这一消息的反应却完全不是如此，这就立即使他的指望落了空。希特勒进攻苏联，事实上使自己卷入一场同时在两线作战的主力战；由于这样地违反了他自己的战略原则，他已经使第三帝国和他本人注定灭亡，因为他这时不得不既同美国无比强大的战争潜力作战，又要在苏联广阔无垠的国土上作战。

同时，如果希特勒因估计错误而产生致命后果的话，369 苏联政府也同样地估计错误，只是没有遭到同样致命的下场而已。诚然，当苏联政府在 1939 年和希特勒谈判条约时，毫无疑问他们已看出一旦此项条约对他不方便，他就不想继续遵守。可是苏联政府大大地高估了苏联在此期间可以得到的好处。这确实对苏联政府有利，它不必马上受到后来在 1941 年 6 月 22 日才受到的考验，即不必马上就对德国作战，而在当时的情况下进攻者几乎可以倾其全部陆空力量来对付苏联。1939 年秋天，当德国和其他方面交战时，苏联却与德国保持和好。苏联政府估计错了两点。它假定，德国在卷入与两个西欧大国的战争中，无论它是胜是负，都会耗尽它的力量。苏联政府又假定可

以采取一项有效的保险政策，以防止德国可能进攻苏联这一经常存在的危险。苏联政府指靠的这种保险，是苏联辽阔的疆土这一主要的战略资产，再加上一些别的因素。它很重视在两次大战之间的苏联西部边境以西建立一条缓冲地带的策略。但是，这两点苏联后来都未能实现。

德国早期的一些军事突击行动，对苏联领导方面来说，不是不受欢迎的。德国对波兰的闪电战之迅速成功，使苏联除了在芬兰以外，兵不血刃就能捞进一份谈妥归它的在东北欧的战利品；苏联取得了在两次大战之间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在波兰居住的领土以及取得了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在这个阶段苏联只是占领而没有正式兼并），确实使自己在苏联和德国的势力范围之间，沿着新边界的北段有了一条宽阔的缓冲地带。再则，1940年4月德国占领丹麦和挪威，虽然也许曾使苏联大吃一惊，但俄国人对此也不讨厌，因为这解除了他们以往受英法军事干预的威胁，这两个国家可能跨过斯堪的纳维亚，帮助芬兰抗拒苏联从列宁格勒郊外越过卡累利阿地峡向西北面扩张其缓冲地带。相反地，1940年6月，德国武装部队轻而易举地就使法国倾覆，这不仅出乎意料，而且还使苏联政府深为忧虑。因为，没有疑问，在这个阶段，俄国人同意德国人和法国人的看法，认为法国的沦陷意味着德国在欧洲的战争实际上已经结束——并且，如果是这样370的话，苏联政府以前的打算就严重地错误，因为，如果这是事实，德国就已经胜利地赢了这场战争而未耗尽自己的力量。欧洲大陆的战场上已经没有与它对抗的敌手，而德国的庞大军队仍然完整无损。从此以后，德国可以随时用这些军队全力对付苏联；并且，事实上希特勒已经在制订这方面的计划。因此，对苏联来说，1939年8月由于签订俄德协定而暂时避开的危险，这时在1940年6月底又一次即将来临了。

苏联政府的第二个错误打算，是他们高估了自己在东南欧取得足够缓冲地带的能力，这时德国已可腾出手来使苏联政府的野心不能得逞。缓冲地带的北段和南段都很重要。北段横跨从德国到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通道；南段横跨到乌克兰和高加索的通道，并且这两个新近开发的地区——其中有苏联当时的主要工业区和主要油田——对苏联关系之重大，都超过那两个做过首都的城市。苏联在南面谋求的，是要把包括保加利亚在内的东南欧一片地区置于它的控制之下。这将使它能填补喀尔巴阡山脉东坡和黑海西北岸之间的空隙，又能从保加利亚境内的空军基地控制从地中海经过海峡进入黑海的通道。1939年8月23日俄德协定附属秘密议定书第三款给予苏联政府通往这个方向的权利。该条款规定，在东南欧方面，苏联要求对方注意它在比萨拉比亚的利益。德方声称，它对这些地区毫无政治兴趣。尽管如此，在这一地带的南段，苏联政府想要达到其目的而作的努力，不象在北段那样顺利。

在北面，苏联在法国沦陷以前，就牺牲芬兰，把它的北冰洋海岸线向西扩展；把最靠近铁路线的那一段俄芬边界向西推进若干距离，使从列宁格勒到不冻港摩尔曼斯克的一段铁路得到更多的防护；使卡累利阿地峡的俄芬边界后退到大致沿着1700—1721年大北方战争以后缔结的和约中划定的那条界线；也使列宁格勒恢复了在彼得大帝时代的掩护，当时彼得大帝在建立这个城市并命名为圣彼得堡时，由于在1701—1710年征服了爱沙兰和利夫兰这两个波罗的海沿岸省，使之在南面获得了掩护；以及最后使列宁格勒和莫斯科重新得到了掩护，十八世纪最后三十年中，由于俄罗斯帝国于1772年、1793年和1795年先后兼并了波兰—立陶宛联合王国的领土而获得过这

种掩护。当法国濒于沦陷时，苏联在没有受到德国方面反对的情况下，加紧对波罗的海三个国家的控制，公然把它们兼并，就象它以前并吞两次大战之间波兰所拥有的为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居住的领土那样。然而，正当在法国沦陷的时刻，苏联继续为扩展它的缓冲地带的南段采取第一个步骤，并吞布科维纳北部和比萨拉比亚时，希特勒对苏联以牺牲罗马尼亚为代价向前推进的这两步行动，没有进行直接挑战，而是迅速采取对抗措施，挫败了苏联的计谋。

希特勒的第一着反攻，是使保加利亚和匈牙利对他负有义务，去强迫罗马尼亚满足保加利亚收回多布罗加南部的要求，并在很大程度上满足匈牙利收回特兰西瓦尼亚的要求。可是，在俄德争夺对东南欧的控制中，372 他的绝招是向罗马尼亚保证，在它新近失地给苏联、匈牙利和保加利亚以后，剩下的领土可以保持完整。这种保证使东南欧的关键掌握在希特勒的手里；因为，罗马尼亚即使在新疆界的范围以内，仍然从匈牙利的东境连亘不断地延伸到多布罗加北部的黑海西岸；德国在罗马尼亚的新界线以内确立了支配权，大大抵消了俄国在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北部获得一条狭窄的缓冲地带所得到的好处。俄国恢复了它在多瑙河三角洲最北端的北岸一带的地盘，但徒劳无益。它仍然由于多布罗加北部的一长条罗马尼亚领土而和保加利亚隔绝，这一地带此时受到德国的担保，这意味着整个东南欧，喀尔巴阡山脉和普鲁特河一线的西南，这时可以由德国和意大利支配，而苏联不能干预。再则，罗马尼亚的剩余部分一落到德国手里，就能够而且后来确实在德国进攻苏联时起了战略上的作用，就象斯洛伐克 1939 年在德国进攻波兰中所起的作用一样。它为德军提供一个作战的基地，从那里德军能够迂回对方的南翼，然后插入对方的要害。

这样，1940 年 9 月 1 日——这一天德国政府通知苏联政府，在罗马尼亚满足了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的领土要求以后，轴心国家联合保证罗马尼亚拥有余下的领土——标志着 1939 年 8 月 23 日至 1941 年 6 月 22 日间俄德关系史上的转折点。苏联政府虽然没有力量取消轴心国家已经做了的事，但也没有隐讳它的关注和不悦，苏联政府的心情和语气中这种急剧的变化，使得希特勒那方面更加凶狠。到 1940 年 9 月，德国就开始在德俄两国控制范围的分界线对面的一侧把芬兰变成德国的军事根据地，以备将来德国进攻苏联时发挥战略作用，如同东普鲁士在 1939 年德国进攻波兰时所起的作用一样。这时已很明显，希特勒正在策划以武力使苏联屈服。可是决定性的日期不是 1940 年 9 月 21 日，即德国把德军开进芬兰一事通知苏联的那一天；而是 9 月 1 日，即德国通知苏联说轴心国家保证罗马尼亚领土完整的那一天。

第二节 俄—德的政治关系

1939 年 8 月 23 日至 1940 年 9 月 1 日

俄德谅解始于 1939 年 8 月 23 日希特勒和斯大林之间进行的一项交易，起初情况很好，直到隔了十个月法国 373 沦陷以后才开始出毛病，尽管这两位独裁者在政策上的这种突然的、出人意外的和惊人的变化使两国人民都惊慌不解。1939 年 9 月 6 日，德国驻莫斯科大使舒伦堡报告说，在苏联，人们对这个消息“一般地感到宽慰和喜悦”，虽然政府政策的改变“还不大为人民理解”，并且官方的宣传很难使他们相信德国毕竟不是一个侵略者，很难使他们相信，毋须害怕德国在解决波兰以后马上就进攻苏联。然而，舒伦堡表示他相信，苏联政府能够按照自己的愿望制造舆论；而德国国内的舆论在

纳粹政权下也是同样易于控制的。

从短时期来看，俄国人老是害怕德国，证明是没有根据的。德国政府完全没有表现得急于要把德国军队推进到两次大战之间属于波兰，而根据 8 月 23 日协定已划归苏联统治范围的那一部分领土，而是请苏联政府不要拖延，快派军队占领那些划归它的原属波兰的领土。而且，在德国军队为了追逐战败的波兰人而越过俄德分界线以后，里宾特洛甫于 9 月 19 日指示舒伦堡请斯大林放心，德国方面将严格执行各项协议。再则，斯大林于 9 月 20 日建议在莫斯科谈判如何确定对两次大战之间的波兰进行瓜分，又于 9 月 25 日建议修改 8 月 23 日商妥的领土条款，对此德国政府都没有留难；1939 年 9 月 28 日在莫斯科，由里宾特洛甫和莫洛托夫签订一项新的分界协议，连同一项“机密的”和两项秘密的议定书，其中满足了斯大林的愿望，把立陶宛从德国统治范围转移到苏联统治范围，其交换条件是把原来协议中划归苏联的波兰人在人口中占少数的大部分领土转移给德国。

此后德国没有制造困难以阻碍苏联对波罗的海三国的占领；而且它在苏联政府和芬兰发生麻烦时给予积极的帮助，断然拒绝了芬兰和瑞典派去试探德国是否支持芬兰抗拒苏联的两国代表，并规劝甚至阻挠意大利方面想要援助芬兰的企图。10 月 19 日，斯大林在他那方面显示他对德国的诚意，答应里宾特洛甫的请求，让他在一 374 次反对英国的公开讲话中引用斯大林在导致 8 月 23 日俄德协定签字的谈判中对他讲的一段话。斯大林允许里宾特洛甫引用的这段话如下：

德国在谢绝军事援助方面的态度令人敬佩。但是，一个强大的德国是维持欧洲和平绝对需要的先决条件，所以苏联对于一个强大德国的存在是有兴趣的。因此苏联不能赞成西方国家造成会削弱德国并使德国处境困难的情况。这是德国和苏联之间的共同利益所在。

里宾特洛甫 1940 年 3 月 28 日曾向舒伦堡建议，邀请莫洛托夫，或许还邀清斯大林，访问柏林；由于这位大使提醒他的上司，苏联领导人大概不会接受邀请，因为害怕这对他们和西欧国家的关系可能有不利的影响，这一建议当时就取消了。一段时期以来，舒伦堡已注意到，苏联政府的态度有一种很清楚的对德国不利的转变，他认为这一点以及苏联 3 月 12 日与芬兰媾和一事，都是由于害怕苏联可能卷入对西欧国家的战争。舒伦堡曾感到非常不安，于 4 月 8 日要求会见莫洛托夫。在这次会见中，他也根据柏林的指示，把德国将入侵丹麦和挪威通知莫洛托夫，同时向他保证，瑞典和芬兰不会受攻击：这个消息使得莫洛托夫的态度发生了激变。他“声明苏联政府谅解德国不得不采取的那些措施”，并且最后说：“我们祝愿德国在它的防御措施方面完全成功。”不仅如此，他还立即和舒伦堡解决了许多问题，使德方满意，这些问题原先是德国政府从德方观点认为德苏关系中有些别扭而提出的。他甚至一反常规，主动提出并解决一些德国政府未曾提出的其他问题，也使德国满意。舒伦堡推测，苏联政府已经得到情报，知道英法计划占领挪威和瑞典并打算重新谈判芬兰问题，所以苏联看到德国先下手占领丹麦和挪威，阻止了这种威胁，感到十分安心。苏联政府 375 府面对着德国在北欧统治范围内这样突然大大扩张的形势，所采取的唯一预防措施是于 4 月 13 日向舒伦堡声明，苏联关心要保持瑞典的中立。里宾特洛甫在 4 月 15 日的答复中重申他以前关于瑞典的保证。5 月 10 日，莫洛托夫听到德国入侵荷兰、卢森堡和比利时的消息时和他上次听到入侵丹麦和挪威的消息时一样，反应温和。舒伦堡

报告说，“莫洛托夫欣赏这个消息，并且说他了解德国必须保护自己不受英法的攻击。他对我们的胜利没有疑问。”

在1939年8月23日协定签订后俄德关系的整个第一阶段中，苏联对德国大体上扮演了一个友好的非交战国的角色。苏联拒绝在封锁问题上给英国利用，以这种消极方式帮助德国，所以舒伦堡在听到克里姆林宫同意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任英国驻莫斯科大使的消息时并不惊慌，是有道理的。苏联向德国运送物资，以这种积极的方式在经济上帮助德国，在运交这些物资时尽管有一些暂时的周折，但对德国的战争力量肯定是有价值的。苏联把全世界共产主义宣传的火力转向德国的对手，在政治上帮助德国。1940年5月29日，舒伦堡从莫斯科写信给德国外交部讲到克里普斯使团时说：“没有理由要怀疑苏联对我们的忠实态度。这里没有任何迹象使人相信德国最近的一些胜利在苏联政府中引起了惊慌或者畏惧。”并且，只要法兰西之战还在进行，德国政府那方面就继续煞费苦心装出一副忠于对苏关系的样子。

例如，6月8日柏林的外交部告诉它的驻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代表说，柏林方面重视“使大德意志范围内的乌克兰人的各个组织不要进行任何政治活动”。又如，6月中旬苏联政府开始行动，把波罗的海三国并入苏联时，德国采取了苏方认为是正确的做法。6月17日，魏茨泽克对所有驻外德国使团发出通电，告诉它们俄国的这些行动是“俄国和波罗的海国家之间的事情”，因此，鉴于德国“和苏联之间的友好关系不变”，德国方面没有理由要紧张不安，它的驻外代表在谈话中应避免发表任何可能被理解为有所偏袒的言论。莫洛托夫6月18日把苏联对波罗的海国家的行动通知舒伦堡时，“对德国武装部队取得的辉煌胜利表示最热烈的祝贺”。然而，正是因为这种胜利当时已经大得出人意外，成为国际形势中一种新的因素，因而促使苏联政府如此慌忙地把这些波罗的海小卒从棋盘上吃掉。苏联的缓冲地带的北段这时已处于切实可行的最好的防御状态。南段的防务还有待设置；眼看着德国即将征服法国，或许还将征服英国，苏联必须争取时间。假如苏联早己知道它对希特勒的居心叵测作最坏的猜疑是正确的，而且知道希特勒心里已经有了进攻苏联的计划，它一定会更加慌忙地建成它西面的缓冲地带。

早在6月4日莫洛托夫就向舒伦堡提出询问，透露了苏方对于轴心国在东南欧的意图很不放心。6月16日，里宾特洛甫指示舒伦堡答复莫洛托夫：德国政府感到满意，因为战争没有蔓延到巴尔干地区：原则上，德国在那里对领土没有兴趣，而只有商业上的关系；并且，德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对苏联的态度是始终坚定不移地以“明确的莫斯科协议”为根据。但是，苏联政府对东南欧的忧虑并未消除。6月23日，在舒伦堡得到关于苏联对波罗的海国家采取行动的通知以后五天，莫洛托夫告诉他，“比萨拉比亚问题的解决不容许再拖延”，苏联的领土要求也要扩大到布科维纳，因为那里有乌克兰居民。于是舒伦堡表示担心，由于罗马尼亚这时正在供应德国“大量重要的军用和民用原料，罗马尼亚对外关系中的困难，将会造成对德国利益的严重损害”。他请莫洛托夫暂时不要采取行动，先让德国政府有时间研究苏联政府关于罗马尼亚的意图再说。莫洛托夫向他保证，说苏联政府将尽一切可能保障德国在罗马尼亚的利益，可是他再一次说明事情非常急迫，并说希望德国不要妨碍而要支持苏联政府的行动。

6月26日，苏联政府采取两个步骤抚慰轴心国。莫洛托夫告诉舒伦堡，苏联政府已经决定把它向罗马尼亚提出的关于布科维纳的要求只限于该省的

北部。同一天，377 他告诉意大利驻莫斯科大使，在地中海方面苏联政府打算承认意大利的霸权，条件是意大利承认苏联政府在黑海的霸权。然而，就在这次谈话中，莫洛托夫说，如果罗马尼亚不肯让步，苏联将用武力收复比萨拉比亚，6月27日他通知舒伦堡，他已于当天把苏联的最后通牒交给了罗马尼亚驻莫斯科公使。苏联这一行动所引起的一系列有关罗马尼亚的事件，本书另有记述。这一系列事件中的倒数第二件，是里宾特洛甫8月31日指示舒伦堡把轴心国就匈牙利对罗马尼亚的领土要求所作的维也纳议定书通知莫洛托夫，同时再通知他，既然匈牙利对罗马尼亚的要求以及苏联对罗马尼亚的要求都已经得到满足，而保加利亚的要求也即将解决，所以轴心国家，因同罗马尼亚的经济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已承担义务保证罗马尼亚的领土，“以便一劳永逸地防止在这种领土和种族情况复杂的地区再发生很容易发生的种种分歧”。当舒伦堡于9月1日把此信递交莫洛托夫时，莫洛托夫请他提醒德国政府注意，“德国的行动，已违反了互不侵犯公约的第三款，该款规定应进行协商”。这次舒伦堡和莫洛托夫的会晤使德苏关系急剧趋向恶化，始终未能好转。从那天起两国关系每况愈下。假如苏联政府已经知道，自从1940年6月25日法国覆灭以及6月27日苏联给罗马尼亚最后通牒以来，希特勒一直在制定进攻苏联的计划，则德苏关系还要恶化得更快。

希特勒在西线战事还未结束以前，就告诉约德尔，“他已基本决定，一俟军事形势许可，就采取步骤对付这种危险〔指来自苏联的危险〕。”法国覆灭后，他和法国人以及俄国人一样，曾预料英国会步法国的后尘，早日和德国媾和。当英国没有这样做的时候，德国人感到诧异；希特勒以及他的一些军事顾问开始怀疑，英国这种古怪的坚决态度的主要原因，是否是暗暗抱有某种希望，期待克里姆林宫改变政策。

1940年7月21日，希特勒在一次有他的主要军事378顾问们参加的会议上，讨论了英国的继续作战，德国即将作出入侵英国的决定，以及在1940年秋天进攻苏联的计划。犹如拿破仑在得到特拉法尔加战败的消息以后，拆除了他设在布洛涅的兵营，挥兵东向乌尔姆和奥斯特里支那样，希特勒也从打算入侵英国改变为进攻俄国，其眼前的目的不是为德国人民取得生存空间，而更多地是要通过征服整个欧洲大陆，以冲垮英国的抵抗。同样的策略曾促使拿破仑于1812年入侵俄国，并招致同样的惨败。

在国际军事法庭的文件中，在（最高统帅部作战参谋部防务处负责人）瓦尔利蒙特的口供书里，都说约德尔于1940年7月29日该处在巴特莱兴瑞召开会议时讲，希特勒打算在1941年春天进攻苏联。7月31日，在伯格霍夫开了一次决定性的会议。希特勒、凯特尔、约德尔、雷德尔、勃劳希契、哈尔德和冯·普特卡默尔（希特勒总部的海军副官）都出席了。希特勒对于入侵英国完全不热心。会议决定，入侵英国以德国空军的成功为条件。如果空袭失败，入侵应推迟到1941年5月。希特勒断言，俄国是英国最依赖的一个因素，俄国被击溃，英国的最后希望就破灭，德国就会成为欧洲和巴尔干地区的主人。于是决定对俄国的进攻将于1941年5月开始，在这时发动进攻，就可以有五个月的时间来完成任务。

德国的军事力量应重新部署如下：

7个师留驻挪威 50个师自驻法国 3个师留驻荷兰和比利时 120个师准备用于东线 总共180个师在政治领域里，应建议在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之间作出一种安排，并贯彻执行，接着给予罗马尼亚保证。最终，乌克兰、白俄罗斯

以及波罗的海国家将由德国占领，而芬兰的领土则向东扩展到白海。

379 温伯格有理由指出，从此以后希特勒的政策就固定不变了。共产主义和这一决定完全没有关系，这个决定也不受以后多瑙河流域或者别处发生的事件的影响，更与 11 月间莫洛托夫的访问无关。希特勒在此以前已经拿定主意，并且对武装部队下达了命令。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很少有人知道，而且甚至很少有人猜测到这件事，然而 1940 年 6 月 27 日，在那次决定命运的伯格霍夫会议以前五个星期，丘吉尔写给陆军元帅史未资的信里就说：“如果希特勒不能在这里打败我们，他大概就要掉首东进。当然，他也可以无需进攻不列颠而径自采取这一行动，以便为他的军队觅得用武之地，同时又可减轻即将到来的冬季对他的压力。”

1940 年 8 月 9 日下达了第一道命令，为在东线作战制定运输和给养计划，代号为“东方建设”。大约在同时还作了部署，准备在东普鲁士设立一个总管一切的陆军总部。8 月和 9 月间，军队不断地从西往东调动。8 月 14 日戈林和国防经济与军备局局长托马斯将军讨论必要的新的军备计划，并通知他元首希望按期对俄国人运交物资只继续到 1941 年春季为止。

9 月 6 日，约德尔向国外的德国反间谍组织发布一项陆军命令（绝密），宣布东面领土内的德军阵形正在加强。“这些重新部署不得在俄国造成印象，以为我们准备在东方发动攻势。另一方面，俄国……应得出这种结论，认为我们能随时以强大的部队保护我们的利益——特别是在巴尔干〔原文如此〕——防止俄国攫取。”

根据当时驻莫斯科德国大使馆的陆军武官克斯特林将军向国际军事法庭提交的口供书，他曾奉召参加 1940 年 8 月在枫丹白露举行的陆军武官年会。在那里，他于 8 月 6 日或 8 日被叫进去见参谋总长哈尔德将军，哈尔德亲自告诉他，希特勒已经决定要对苏联作战。哈尔德告诉克斯特林，“知道这件事的人很少，他是其中之 380 一”；他知道这件事已经记录在案；如果他泄漏一点消息的活，“即使是泄漏给他的上司”（例如舒伦堡），他应该明白会有怎么样的后果。

让我们丢开军事首脑，来看看文职人员怎么说吧。魏茨泽克告诉我们，1940 年 6 月和 7 月，希特勒指望着和英国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希特勒一再推迟他久已考虑的国会演说，以便使英国可以有时间和机会进行所指望的接触。当英国不理睬他的时候，他断定丘吉尔一定是在依仗老的或者新的朋友，即依仗美国或者依仗苏联。魏茨泽克说，军队向东调动在 7 月中旬开始，8 月初人们开始听到关于东线将有战争的窃窃私语。这些谣言受到官方的严同驳斥。据丘吉尔说，希特勒在 1940 年 9 月底的时候下定了决心；可是后来的情报说明，他在两三个月以前就已经决定了。丘吉尔又说，斯大林在尽最大的努力忠诚地和希特勒合作的同时，聚集苏联的一切力量，作最坏的打算。斯大林为了要同德国保持友好，牺牲了许多利益，冒了许多风险。“更令人惊奇的是，他对于即将临头的大难作出了许多错误的估计，表现得愚昧无知。

从 1940 年 9 月到 1941 年 6 月希特勒发动进攻的时候为止，他真是一个既冷酷无情，又诡计多端，又孤陋寡闻的巨人。”

里宾特洛甫曾经说，大约自 1938 年以来，希特勒一直深信不疑，英国和美国一旦武装起来，就会进攻德国，而且苏联可能会参加。对他的这番辩解，当然可以有保留地看待。据里宾特洛甫说，在 1940 年，即在法国覆灭后，希特勒看出英国将拒绝他的和平建议的时候，这种忧虑又复活了。因此“他决

定进攻，希望在几个月内解决苏联的威胁。……摆脱受两面夹攻的威胁，唯一的办法是首先吃掉苏联”；因为希特勒预见到，三个大国合力进攻，一定会使他失败。

据里宾特洛甫说，走向战争的趋势于1940年6月中旬开始，当时苏联事先不打招呼就突然占领整个立陶宛，包括在德国势力范围内的那条狭长地带。接着苏联政府381又事先未和德国政府磋商，就于6月27日向罗马尼亚发出最后通牒，这种“快速行动”又使希特勒大吃一惊。苏联对布科维纳的要求，使希特勒特别感到吃惊。里宾特洛甫又说，1940年秋初希特勒开始接到苏联军队在俄国西部边境集中的消息；8月间他对苏联的意图已越来越不能安心；并且他受到“包括党员在内的某些方面人士”的煽动。里宾特洛甫说希特勒特别重视罗马尼亚石油问题，他断言“如果俄国在那里动手，我们就不得不依靠斯大林的善心来进行战争了”。

里宾特洛甫的“秘书处”埃里希·科尔特和里宾特洛甫意见相同，认为是1940年6月27日俄国致罗马尼亚的最后通牒引起了走向战争的趋势。从7月初起，希特勒改变了对苏联的态度，已可看得很清楚。在这以前，他曾下过指示，劝告意大利人改善和苏联的关系，可是现在他竭力阻止他的盟友这样做。不过，据科尔特说，1940年8月30日轴心国根据维也纳议定书给予罗马尼亚的保证，才是希特勒直接针对苏联采取的第一个确有故意的措施。

第三节 俄—德的政治关系

1940年9月1日至1941年6月22日

前节结尾处所举的证据似乎说明，自1940年6月27日苏联政府向罗马尼亚发出最后通牒，至8月30日轴心国作出决定，在罗马尼亚满足了俄国、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对它的要求以后，决心要保证它的剩余领土的完整，在这两个月期间，希特勒已经决定尽可能早地进攻苏联。

对罗马尼亚的保证是德国政府给苏联政府造成的一系列不愉快的意外事件中的第一件。第二件意外的事件是9月21日宣布，德国军队将于次日在芬兰登陆。第三件是9月26日宣布即将签订德、意、日三国公约，这个公约实际上于9月27日就签字了。关于三国公约的谈判是由德国倡议的，它在将近8月底时采取了第一个382步骤。当时德国正处在向罗马尼亚提供保证的前夕，两个日期的巧合说明苏联政府很有理由要怀疑德国这些行动都是针对苏联的。然而德国政府竭力向苏联政府解释，德国有必要同罗马尼亚、芬兰以及日本和好，同时尽可能消除这些行动中的每一次行动必然要在克里姆林宫里引起的不安。舒伦堡9月1日报告，莫洛托夫听到宣布轴心国对罗马尼亚的保证时，反应强烈；于是里宾特洛甫发来一件为德国辩解的备忘录，对莫洛托夫指责德国政府事先不和苏联政府商量而违犯了德苏协定第三条进行驳斥。这个文件根据舒伦堡的意见作了一些修改以后，于9月10日递交莫洛托夫。再则，在德国对苏联政府的声明中，把正在运往芬兰的德国军队说成是路过芬兰前往挪威的，以加强德军在那里的防务，对付英国从空中袭击。第三，三国公约被说成是“完全针对美国的战争贩子”，甚至对美国也不追求任何侵略目标。公约的唯一目的，说得更恰当一点，是使那些竭力主张美国参战的人清醒过来，明确地向他们表示，如果他们卷入目前的斗争，就必然要同三个大国对敌。……从谈判一开始，这三个缔约国就完全意见一致，认

为该联盟决不影响其盟员各自和苏联的关系。为了同时也清除外界对这一点的任何怀疑，条约中特别加进一条，规定各缔约国和苏联之间现有的政治关系（状况）不受本条约的影响。因此，这一附加条款意味着，不仅三个国家和苏联之间签订的条约，特别是 1939 年秋季缔结的各项德苏条约，将继续完全有效和充分履行，而且这一条款普遍适用于对苏联的全部政治关系。

在同一文件中，里宾特洛甫告诉莫洛托夫，他不久将邀请莫洛托夫回访柏林，“就确立未来的政治目标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磋商”。

希特勒参与了这种继续抚慰苏联政府让它放心的政策，就这一点而言，毫无疑问他是不诚心的，因为事情似乎很清楚，这时候他已经决定要进攻苏联了。另一方面，事情似乎也很明白，舒伦堡不知道希特勒的意图，他仍一心一意地想尽自己的力量保持这两个大国之间的良好关系；看来，同样可能的是，里宾特洛甫的意图和舒伦堡一样，虽然他对希特勒的意图不会不知情。里宾特洛甫在《回忆录》中声言，他曾警告希特勒不可发动一场预防战，当时希特勒表现出“明显的困恼和激动”；里宾特洛甫还提到，他于 1940 年 10 月 13 日写信给斯大林，在信中提出，邀请莫洛托夫访问柏林，他的动机就是希望避免战争。这可能是实话。因为 1939 年 8 月 23 日俄德协定的签订是里宾特洛甫到那时为止的外交经历中最大的成就，因此他使德苏谅解获得成功有一种个人的既得利益，尽管这种谅解对希特勒来说是一帖苦药。

苏联政府方面却不是那么容易就感到宽慰或者放心的。9 月 10 日，莫洛托夫收到舒伦堡交来里宾特洛甫备忘录的最后文本时，他仅仅说将用书面答复，并说“苏联政府仍然认为德国政府在维也纳的行为不完全守信用，因为〔德国政府〕不可能不清楚苏联政府在罗马尼亚和匈牙利有利害关系”。9 月 21 日，莫洛托夫交给舒伦堡一件备忘录，答复舒伦堡 9 月 10 日交去的里宾特洛甫的备忘录。莫洛托夫的备忘录和里宾特洛甫的备忘录一样，进行辩解，而篇幅只有它的一半。在他所提的各点之中，有一点是反对里宾特洛甫的如下论点：苏联政府在对比萨拉比亚的要求得到满足以后，已含蓄地表示它对罗马尼亚的其余部分不感兴趣，从而解除了德国按俄德协定第三条规定应承担的义务，即德国如对普鲁特河西南的罗马尼亚领土采取行动，应先和苏联政府商量。莫洛托夫又提出，6 月 23 日舒伦堡曾请他在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不要采取行动，让德国政府有充分时间了解苏联政府的这些要求，当时舒伦堡承认，“根据条约第三条双方互相打招呼 and 商量的义务”，也“适用于东南欧和巴尔干 384 干的国家”。莫洛托夫的最后这一招是击中要害的；可是这种备忘录的来往，象 1923 年寇松—普安卡雷的来往信件那样，除了弄得关系更坏而外，不可能有其他的效果。莫洛托夫在最后一段写道：“如果德国政府认为互不侵犯条约第三条〔该条规定在涉及双方共同利益的问题上应互相协商〕有某些不方便和受限制的地方，苏联政府准备就修改或删除这一条的问题进行谈判”。他在拜会舒伦堡递交备忘录时，又在口头上把这一点重复了若干次。

9 月 27 日德国驻莫斯科的代办向莫洛托夫宣读里宾特洛甫关于即将签订德意日三国公约的声明时，莫洛托夫提出要求说，根据 1939 年 8 月 23 日的俄德协定第三条和第四条的规定，苏联政府有权在三国公约签署以前看到它的文本，以便表示意见，而且也有权秘密地获知附于该公约的任何秘密议定书和协议。在这次会见中，他要求得到关于德军从芬兰过境的德芬协议，包

括其密约部分。“他要求知道该协议的宗旨、针对什么国家、以及为什么目的的服务。”这项要求也是以俄德协定的第三和第四两条为根据的。同时，莫洛托夫对于里宾特洛甫将致函斯大林并邀请莫洛托夫访问柏林的消息，表示满意。10月2日，里宾特洛甫指示德国驻莫斯科代办告诉莫洛托夫，德芬协议是针对英国的，如有需要的话，可让他得到协议的文本。关于三国公约，代办告诉莫洛托夫，没有秘密议定书，也没有任何秘密协议，并说，他可以从这时已经公布的公约的条艾看出，它的条款明确地排除了俄德协定第三条和第四条能够适用的一切情况。

10月4日，莫洛托夫要求德国代办对德芬协议提供更为详细的资料。假如他看到了德国外交部1940年10月8日的一项备忘录的话，他对德芬关系将更加关注，385 该备忘录提到德国政府已经从芬兰政府方面取得一项特许权，让它开采芬兰北冰洋海岸线上佩特萨莫的镍矿，作为德国对芬兰供应武器的报酬；备忘录还提到，鉴于镍的价值和佩特萨莫的地理位置靠近挪威的基尔克内斯，而那里有德国驻军，芬兰人这时一定被迫要抗拒苏联政府提出的开采镍矿的要求。10月10日德国代办通知（他根据柏林的指示，显然敷衍了事地这样通知一下）莫洛托夫，说英国报纸上报道的所谓有相当多的德国武装部队调往罗马尼亚，是不确实的，但确实有“一个德国军事代表团，连同德国陆军派出的一些教导队”，应罗马尼亚政府根据德国对罗马尼亚的保证而提出的要求，被派往罗马尼亚。莫洛托夫询问在罗马尼亚的德军兵力有多少。这是1940年10月13日里宾特洛甫写信给斯大林时俄德关系发展的情况。

在这封信里，里宾特洛甫在所谓英国的计划上大做文章，他说英国既要

把苏联拖进战争和英国妙在一边。又要轰炸巴库和巴统。尽管这些说法互相矛盾，却适合里宾特洛甫的需要；因为他接下去就把1940年夏天以来所有不合苏联政府口味的德国举动，都说成不是针对苏联的安全，而是针对英国继续想要扩大战争范围的企图（他说，英国拒绝希特勒1940年7月19日的和平建议。

就注定了最终要彻底被打垮）。里宾特洛甫借口德国需要对抗英国方面这样的举动，为德国同瑞典和芬兰缔结军队过境协议，签订解决罗马尼亚和匈牙利问题的维也纳议定书，以及派遣“附有德军教导队”的德国军事代表团到罗马尼亚等进行辩解。至于三国公约，他说其目的是阻止美国不要因英国求援而介入战争，站在英国一边。

此项公约“完全不是针对苏联的”。相反地，它是促使四国协商谅解的序曲，四国中的第四个伙伴就是苏联自己。

“总而言之，我可以说，元首的意见也是如此——看来四大国——苏联、意大利、日本和德国——的历史使命，是要采取一种长期的政策，在世界范围内划分它们的利益范围，从而引导它们民族的未来发展走上正确的途径。”

不知莫洛托夫是否能来柏林谈谈这个问题？

这封信由舒伦堡于10月18日递交，不是交给斯大林本人，而是交给了莫洛托夫；斯大林于10月22日用私人情答复说，莫洛托夫接受德国的邀请。然而，里宾特洛甫的这一行动虽在乌云中拨开了缝隙，但在莫洛托夫抵达柏林以前，天色又变得暗淡了；因为，俄国人于11月2日提出抗议，抱怨德国不愿意把战争物资运给苏联，却运给其他国家，包括芬兰在内。

莫洛托夫按时于1940年11月12—13日在柏林和希特勒及里宾特洛甫会

谈。莫洛托夫尽让德国人说话，他自己的一些简短插话，则十分尖锐。

11月12日会谈了两次，第一次希特勒不在场；里宾特洛甫一开场就吹嘘德国当时的实力。“英国被打垮了”，“美国即使卷入战争，对德国也完全无关重要”，因为“德意两国决不再容许一个盎格鲁-撒克逊人登上欧洲大陆”，因为德国海军将保证使美国运来的物资能够到达英国的为数极少极少。德国没有受到什么重大的损失，非常强大。“因此，轴心国家现在考虑的不是怎样可以打赢战争，而是如何能够更快地结束这场已经赢了的战争。”

里宾特洛甫如此描绘了到英国不得不投降时希特勒仍然可以随意动用的德国军事力量以后，提出他希望和莫洛托夫做的交易。“元首现在认为……按极其概括的线条在俄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之间……划定……势力范围，是有好处的”。三国公约的三个签字国都在转向南面。里宾特洛甫“不知道是否俄国早晚也会转向南面，取得对俄国非常重要的通往公海的天然出口”。这时候莫洛托夫问里宾特洛甫指的是哪个海，引诱他说出他的意思不是指爱琴海和东地中海。里宾特洛甫问，难道不能在波斯湾和阿拉伯海那个方向找到对俄国最有利的出海口吗？难道俄国在亚洲这一部分的某些其他希望也不能实现吗？里宾特洛甫顺便指出，在亚洲的这一部分“德国完全没有利害关系”；在1940年11月12日，这句话莫洛托夫听上去一定会感到预兆不祥，想起1939年8月23日俄德协定附加秘密议定书的第三条中，德国也曾声明它在381东南欧完全没有政治上的利害关系。在纳粹的嘴里，这句话或许预示着恰恰相反的意思。无论如何，德国还没有利害关系的那一部分亚洲地区，这时显然不包括土耳其。莫洛托夫的发问把土耳其这个题目提上了里宾特洛甫的议事日程。里宾特洛甫说，他相信在俄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采取了共同的立场以后，应该逐步地引导土耳其靠拢这四个国家。他主动他说，俄国有权使它的军舰和商船比以前更为自由地进入地中海；可是，显而易见，在政治方面，他心目中苏联在土耳其的地位至多是参加共管罢了。

在里宾特洛甫扼要地重述了要点以后，莫洛托夫请对方作了一些说明并提出一些他自己迫切需要的东西。在三国公约中居于显著地位的日本的“大东亚圈”是什么？他需要知道其精确的定义；于是里宾特洛甫不得不承认，他并不确切知道与他一同签署该约的日本同僚所用的这个名词是什么意思，虽然他曾表示赞成。莫洛托夫接下去就说：

在划分德苏势力范围方面，需要特别小心。去年对这些势力范围的确定只是一种局部的解决办法，最近发生的情况和事件已经使得这种解决办法不合时宜和没有意义，只有芬兰问题是个例外，这个问题他以后将详细讨论。需要一些时间，才能作出永久的解决。在这方面，苏联首先想和德国达成谅解，然后，在对三国公约的意义、性质和目的获得准确的资料以后，才能和日意两国达成谅解。莫洛托夫的这些话结束了11月12日的第一次会议。

在12日的第二次会议和13日的第一次会议上，德国的发言人是希特勒自己。在第二次会议上，他讨论问题的方法和昨天里宾特洛甫一样。他说，对英战争的继续，使德国不得不对一些它在平时没有永久性利益的地区进行军事干涉——换句话说，无论如何，德国在这些地区只有经济利益，而不是政治利益。当时的问题是怎样安排使德国、俄国和意大利“取得自由进入大洋的通道”，在这个问题上“不致彼此发生矛盾”。这时莫洛托夫提到，他需要说的话都是完全根据斯大林的指示，于是他又问了一些问题。希特勒在萨洛尼卡觉察到什么是来自英国的危险？希特勒是不是认为俄德协定在有关

芬兰的范围内仍然有效？欧洲和亚洲的新秩序是什么意思，让苏联政府在 88 其中起什么作用？在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土耳其方面，有关苏联在巴尔干和黑海的利益问题需要澄清；这样苏联政府对欧洲的新秩序才会有兴趣，特别是对于新秩序推行的速度和它的形式。再则（这是第二次发问）苏联政府想要知道所谓“大东亚圈”的范围。“俄国参加三国公约，他〔莫洛托夫〕觉得在原则上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其条件是俄国应作为一个同伙来合作，而不是仅仅作为一个对象。”在这紧要关头，“由于可能有空袭警报”，会谈中断。

在 13 日的第一次会议上，希特勒讲到莫洛托夫提出的关于芬兰的问题，这引起一场冗长的讨论，其间双方都比以前说话较为坦率。例如，希特勒告诉莫洛托夫，德国政府在俄芬战争中对苏联的支持，曾使德国人恼火——言外之意是在德国，以及在斯堪的纳维亚和全世界，公众同情芬兰人。希特勒着眼于东南欧，他说：苏联必须体会到，在两国进行任何更广泛合作的格局中所应谋取的利益，其范围完全不同于目前正在讨论的这些无关紧要的修修改改。只要俄国目前不在德国在战争期间有利害关系的那些地方谋取成就，当可获得更大的成功。

莫洛托夫则说：

为了使〔德俄〕关系具有持久的基础，有些问题也必须澄清，这些问题虽为次要，却要损害德俄关系的气氛。芬兰就是这些问题之一。如果俄国和德国充分谅解，这个问题不经战争就能解决，但必须在芬兰没有德国军队，也没有针对苏俄政府的政治示威运动。

希特勒费了很长时间才摆脱莫洛托夫提出的芬兰问题，转入他自己的题目。

英国被征服以后，英帝国这份幅员四千万平方公里、范围遍及全世界的、庞大的破了产的产业将被瓜分。在这份破了产的产业中，俄国会分得可以进入不冻的和真正的公海的通道。到现在为止，占人口少数的四千五百万英国人一直统治着附属于英帝国的六亿居民。他即将打垮这部分少数人。……所有同这份破了产的产业可能有关系的国家，都必须停止它们本身之间的一切争执，一心参与对英帝国的瓜分。这运用于德国、法国、意大利、俄国和日本。

389 莫洛托夫的回答是重新提出土耳其问题以及轴心国对罗马尼亚和海峡的保证，并就这一点突然向希特勒提出建议，说苏联将对保加利亚给予保证。关于轴心国对罗马尼亚的保证，他说：

苏联政府已经两次说明它的立场，认为这种保证旨在反对苏联的利益，“如果我们可以说得这样坦率的话”。因此，发生了取消这种保证的问题。对此，德国元首已经声明在一定时期以内这种保证是必要的，因此不可能取消。这就影响了作为一个黑海国家的苏联。

然后莫洛托夫学希特勒的样子，说明这些海峡是英国对苏联进攻的历史上的门户。由于英国人现今在希腊取得了据点，形势对苏联更加危险。为了安全，苏联和其他黑海国家的关系非常重要。在这一点上，莫洛托夫询问德国元首，如果苏联对距离海峡最近的独立国保加利亚给予一种保证，其条件和德意两国给罗马尼亚的保证完全一样，德国会有什么意见。

当莫洛托夫紧逼对方接受他的由苏联给予保加利亚保证的建议时，希特

勒提出了保加利亚本身有否要求保证的问题（因为罗马尼亚无论如何名义上曾要求过这种保证），并且说他必须和意大利商量。莫洛托夫说，苏联“要消除从海峡这条路受到袭击的危险，并想和土耳其解决这个问题；给了保加利亚保证，会缓和这种局势。作为一个黑海国家，俄国有权取得这种安全，并相信它能够和土耳其对此达成谅解。”莫洛托夫和希特勒在保加利亚问题上唇枪舌剑，反复辩论，最后由希特勒提议中止会谈，“因为英国方面可能来空袭”。

390 这一系列会议中的最后一次会议于 11 月 13 日晚间在里宾特洛甫的防空洞里举行，因为有空袭警报。希特勒未参加，由里宾特洛甫又一次代表德国；他在关于划定势力范围这个问题上重新谈到土耳其问题：“只有苏联、土耳其、意大利和德国对于解决海峡问题有利害关系。……意大利、苏联和德国之间进行的方法，是按照三国的愿望对土耳其施加影响。”换句话说，对土耳其的共管将由苏联和两个轴心国家共同担任。里宾特洛甫然后向莫洛托夫扼要陈述他草拟的一项三国公约的三方和苏联之间的协定。这种草案大纲采用的是一般性的措辞，可是里宾特洛甫暗示，或许还要有一个附加的秘密协议，“确定四国对领土要求的焦点”。在公开协定的草案中，最紧要的地方是规定这四个国家将“保证不参加和不支持任何旨在反对这四国之一的国家集团”。然而，并没有规定四个签字国中的三个国家不得联合起来对付第四个国家。

里宾特洛甫讲完以后，莫洛托夫说道，苏联政府认为必须首先和土耳其就海峡问题达成谅解，可是它也在保加利亚有利害关系——关于保加利亚他已经和希特勒详细地谈过了——并且，此外在罗马尼亚和匈牙利也有利害关系。再则，他想知道轴心国对南斯拉夫和希腊有什么打算，德国对波兰又有什么意图。然后还有瑞典的中立以及通波罗的海的出口问题。他不需要再谈芬兰问题，因为在他前次和希特勒的谈话中，这个问题已经谈得十分清楚了。在其他问题上，他希望听听里宾特洛甫的意见。里宾特洛甫抱怨莫洛托夫“追问得太紧”，他在答复中只是重弹了老调。他说，来自英国的军事威胁使德国不得不在巴尔干地区进行军事干涉。“决定性的问题是苏联是否准备……在对英帝国的大清算中……合作”。莫洛托夫仅仅回答说“所有这些明天的重大问题和今天的问题以及现有各项协定的履行都是分不开的”。希尔格记录道：“谈到这里，莫洛托夫先生热诚地向德国外交部长告辞，加重语气他说他不怨空袭警报，因为这使他有和德国外交部长进行一次这样详尽的谈话。”

在莫斯科，11 月 25 日莫洛托夫告诉舒伦堡，苏联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同意里宾特洛甫 11 月 13 日向他扼要说明的关于苏联和目前三国公约的三方之间签订一项协定的草案。后来在莫斯科的德国大使馆的档案里发现一份未注明日期的里宾特洛甫草案大纲的正式文本，附有一项关于势力范围的秘密议定书和一项关于土耳其的秘密议定书；这一文件，在舒伦堡于 11 月 25 日和莫洛托夫会晤以前，也许已经在他手里，可是莫洛托夫本人显然是根据里宾特洛甫口头说明的草案大纲在谈话。莫洛托夫告诉舒伦堡，苏联政府准备同意里宾特洛甫的草案大纲，但以下列各点为条件：

（1）规定德国军队立即从芬兰撤退，根据 1939 年的条约，芬兰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同时苏联保证对芬兰维持和平的关系，并保护德国在芬兰的经济利益（木材和镍的输出）。

(2)规定在最近几个月内,通过由苏联和保加利亚签订一项互助协定(保加利亚在地理上位于苏联黑海边境的安全区以内),并通过长期租借办法在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的范围以内为苏联的陆海军建立一处基地,使苏联在海峡的安全得到保证。

(3)规定承认以波斯湾为总方向的巴统和巴库以南 392 的地区为苏联渴望达到的日标的中心。

(4)规定日本放弃它在萨哈林岛北部开采煤和石油的权利。

莫洛托夫接下去指出,德国方面如果接受这些条件,就需要修改里宾特洛甫所说明的关于划定势力范围和关于土耳其的议定书草案大纲,还需要附加关于芬兰、萨哈林岛北部和保加利亚的三个议定书。

可以看出,莫洛托夫所提这些条件的结果一定会修改德国的建议,在两个重要方面对苏联有利。苏联势力范围的西部界限将向西推移到包括波斯、土耳其东部和伊拉克,以及阿富汗和印度,后面两个地方在德国建议中是指定划给苏联的;海峡地区和保加利亚实际上都将完全归苏联控制。这两种变化合在一起,结果一定会消除轴心国在整个土耳其以及在保加利亚的势力,并因此使苏联不仅在印度洋和波斯湾,而且也在东地中海和爱琴海获得出海口。

莫洛托夫最后对舒伦堡说,关于他的反建议,“希望德方说明他们的意见”,但是德国始终没有认真地再进行这些谈判。相反,希特勒一直在搞他的讨价,这些计划在7月和8月间已经开始进行,想用武力把他的意志强加于苏联政府。11月12日,正是他和莫洛托夫举行第一次会谈的那天,他已经给他的陆军将领们发出第十八号指令(绝密):“政治讨论已经开始,目的在于澄清俄国目前的态度。不管这些讨论的结果怎样,以前口头上发出的关于在东线作好准备工作的命令应继续执行。关于这方面的指示,一俟陆军作战计划大纲呈交给我并经我批准,即另行通知。”

为了此项军事目的而采取的第一批外交步骤,在1940年11月13日至26日之间办理完毕。11月18日,保加利亚国王博里斯应希特勒的邀请到达柏林。他之被召,是要他归附三国公约,可是他设法暂时避免从命。他回到索非亚时,已经有苏联外交部长索波列夫向他传达了苏联政府的不悦,其时索波列夫正路过那里前往93布加勒斯特参加关于多瑙河组织的会议。索波列夫向国王提出由苏联保证保加利亚的领土完整,博里斯又一次设法避免了同意一项使他为难的提议。匈牙利于11月20日加入三国公约,罗马尼亚于23日,斯洛伐克于24日也都加入了。轴心国确立它们对保加利亚的控制以及征服南斯拉夫和希腊的经过,本书的另一部分已有记述,芬兰与德国之间和解的经过也已有记述。在这里还需要叙说从1940年11月底到1941年6月22日为止,在德国为进攻苏联作政治和军事准备的阴影下俄德关系发展的情况。

12月5日,参谋总长哈尔德将军就将来对苏联作战的计划向希特勒汇报。希特勒批准了这些计划,并补充说:

最重要的目标是阻止〔俄国人〕从一条封锁线上撤退,向东推进应该继续到俄国空军不能袭击德国领土为止,另一方面,应使德国空军能够进行空袭来破坏俄国的战争工业地区。这样我们应该能够做到歼灭俄国陆军并防止其重振旗鼓。……为整个战役所计划动用的一百三十至一百四十个师的兵力

已足够了。

12月18日，希特勒发出他关于巴巴罗萨行动的指令。这个文件一开头就宣布了生死攸关的决定，要再一次把战争扩大到第二条战线，它设想苏联和波兰一样，也可以通过闪电战来征服：“德国武装部队必须准备在一次快速的战役（巴巴罗萨行动）中击溃苏联，甚至在对英战争还未结束以前就打垮它。为了这个目的，陆军必须使用一切可以动用的部队，但须留一部分兵力以保卫已被占领的地区，以防突然袭击。”

芬兰和罗马尼亚可接纳为德国武装部队的盟友，通知两国可指望使用瑞典的公路和铁路，时间“最晚从作战行动开始”。主要的打击应对准普里皮亚特沼泽地的北面，应使列宁格勒在莫斯科之前陷落。利用芬兰军队的辅助，并假道瑞典，以夺取佩特萨莫，切断列宁格勒—摩尔曼斯克铁路。为执行这项指令而采取的措施，目前应伪装为仅仅是“预防性的”；参与这项准备工作的人员，尽可能越少越好。

394 从那时候起，苏联受到的军事威胁不断增加，从西部边境的一端到另一端都是如此。到1940年12月31日，驻柏林的芬兰公使告诉魏茨泽克，芬兰人指望在下次对俄战争中能得到德国的援助。1941年1月7日，里宾特洛甫对德国驻苏联、土耳其、南斯拉夫和希腊的使节发出通报，告诉他们强大的德国部队正通过匈牙利前往罗马尼亚，准备可能在希腊对英国作战。如果被问到关于这些军队调动的问题，他们的回答必须不着边际。同一天，里宾特洛甫把同样的信息通知德国驻日大使，让他转达日本政府。1月8日舒伦堡报告，莫斯科流传着德军进入罗马尼亚的谣言，请予指示；里宾特洛甫于10日又嘱咐他要回避苏联政府成员也许会向他提出的任何质问。1月初，苏联驻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公使被召回莫斯科磋商；12日，塔斯社发表公报，要人们注意外国报刊上谣传德国军队在苏联政府知情的情况下，正在进入保加利亚。公报接下去说，如果那里有德国军队，这是在苏联既不知道也不同意情况下发生的，德国和保加利亚都没有和苏联政府商量过。1月17日，俄国驻柏林大使杰卡诺佐夫，根据来自莫斯科的备忘录，向魏茨泽克作了一项声明，提到那些谣传并回溯道：

苏联政府曾一再向德国政府声明，苏联认为保加利亚的领土和海峡地区是苏联的安全区，对于威胁苏联安全利益的事件不能漠不关心。鉴于这一切，苏联政府认为有责任预先警告，任何外国武装部队如在保加利亚领土和海峡地区出现，苏联政府将认为是侵犯苏联的安全利益。

同一天在莫斯科，莫洛托夫对舒伦堡发出同样的警告，在此之前，他并表示诧异，因为他于1940年11月25日曾声明，苏联政府准备参加11月13日里宾特洛甫所提出并扼要说明的苏联和三国公约三方缔结协定的条件，尚未得到任何答复。舒伦堡解释了延迟的原因，是由于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之间需要进行详尽的初步讨论。

1月22日在柏林和23日在莫斯科，杰卡诺佐夫和395莫洛托夫分别收到一份关于德国意向的说明，这份说明是以里宾特洛甫对魏茨泽克和舒伦堡的指示为根据的。德国无意于占领海峡地区。它将尊重土耳其的领土完整，除非土耳其对德国军队作出敌对的行为。另一方面，德国军队将“穿过保加利亚领土，如果要对希腊采取某种军事行动的话”，“德国政府决不改变的宗旨”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绝不允许英国的武装力量在希腊领土上立足”。德国“在政治上对海峡问题不感兴趣”，在完成了巴尔干地区的行动后将撤

退它的军队。德国政府仍然坚持 1940 年 11 月 12—13 日在柏林对莫洛托夫说明的那些主张。它就莫洛托夫提出的反建议和意、日两国政府进行了接触。它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和苏联政府恢复政治讨论。在答复中，杰卡诺佐夫和莫洛托夫都请对方注意苏联政府以前的声明，即它认为保加利亚属于苏联的安全范围以内。杰卡诺佐夫比莫洛托夫更进一步。他问道，派遣德国军队经过保加利亚到希腊去的决定是否已经确定，如果已经确定的话，最快于何时执行。

2 月 22 日舒伦堡接到通知，告诉他这时有六十八万德国军队在罗马尼亚，装备精良，还有“无穷的后备力量”支援。德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成员这时应该将此情况透露出去，甚至还要夸大这个数字。2 月 27 日，里宾特洛甫指示舒伦堡于 28 日告诉莫洛托夫，保加利亚将于 3 月 1 日依附三国公约，并于 3 月 1 日告诉他，德国军队正在开进保加利亚。莫洛托夫“以明显的关注”接受第一项消息，而“以非常严肃的神气”接受第二项。舒伦堡报告了他两次和莫洛托夫会晤的情况，有关第二次会晤的记载如下：莫洛托夫当着我的面亲手草拟了一项简略的备忘录，说明苏联政府的立场，让别人抄好，然后递交给我。其内容如下：（1）苏联方百感到遗憾，尽管苏联政府在 1940 年 11 月 25 日采取的步骤中含有告戒之意，德国政府仍然认为可能采取一种会损害苏联的安全利益的行动，并已决定对保加利亚进行军事占领。（2）由于苏联政府保持它在 11 月 25 日的步骤中的同样基本立场，德国政府必须了解它不能指望苏联对它在保加利亚的行为给予支持。

3 月 1 日，保加利亚实际上加入了三国公约，3 月 23 日，德军从罗马尼亚渡过多瑙河进入保加利亚。这意味着德国从此以后是在保加利亚占支配地位的大国，这种行为等于对苏联的蔑视。苏联政府毫无举动；可是 3 月 3 日莫斯科外交部发表一项正式公报说，为了答复保加利亚关于事态发展的照会，下列文件已经交给保加利亚驻莫斯科公使：

苏联政府不能同意保加利亚政府认为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态度是正确的看法，因为这种态度，无论保加利亚政府是否愿意，结果不是巩固和平，而是扩大战争的范围，并使保加利亚卷入战争。苏联政府忠于自己的和平政策，对保加利亚政府在执行它目前的政策方面，不能给予任何支持。苏联政府认为有必要作此项声明，特别是因为保加利亚报刊上谣言泛滥，根本歪曲了苏联政府的真实态度。

1940 年 9 月 1 日舒伦堡把轴心国对罗马尼亚的保证告知莫洛托夫以后，苏联和德国之间已经出现裂口，此时这个裂口正在扩大。1941 年 3 月 1 日，自从 1939 年 8 月 23 日俄德协定签订以来，苏联政府第一次向德国政府公开表示它对德国的举动极端不快并打算对抗。显然，苏联政府不会把这种对抗发展到和德国打仗的地步。苏联不想和德国打仗，除非它受到德国攻击，德国政府也一直了解并仗恃这一点。可是，恰恰因为这一点，德国才能够使苏联受到头等的政治挫折，并且是在对苏联的安全确实有重大关系的方面如此，正象苏联政府一直在指责的那样。轴心国对罗马尼亚的保证这时已经产生了苏联政府当时所担心的后果。首先是罗马尼亚本身，然后是保加利亚，已被德军强行占领；在空战时代，这使得德国可以控制乌克兰和高加索的西南通道。这两个地区是苏联的粮仓、工场和发电厂所在。德国之所以没有动手占领土耳其的领土，因为无此必要。德国武装部队占领了保加利亚，其空军就能从空中控制海峡地区。

在此期间，德国进攻苏联的准备工作仍在继续进行。3972月3日，希特勒开了一次陆军将领会议，在会上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作了敌方力量和德军力量对比的报告，并说明入侵俄国的全面作战计划，其主要目的是占领波罗的海国家和列宁格勒，希特勒批准了这个计划。为了“巴巴罗萨行动”而作的战略集中，应伪装得象是为了“海狮行动”（入侵英国）及其辅助措施“马里塔行动”（入侵希腊）而采取的一种策略，以便声东击西。

3月13日凯特尔签署了一项对“巴巴罗萨”原计划的补充行动指示。这项命令显示，到那个时候计划的详细内容——关于军事行动以及对征服地区的政治控制——已经多么完备。根据这项命令，德国元首的党卫队（指希姆莱）将“负责关于行政管理筹备工作的特殊任务”；这些在军队后方的行政管理将包括北区（波罗的海国家）、中区（白俄罗斯）和南区（乌克兰），各区由一名德国专员管理，直接对希特勒负责。“巴巴罗萨”原计划规定的进攻日期为1941年5月15日前后。根据海军最高指挥部战争日记中4月3日的一项记录，“巴尔干的行动起初使‘巴巴罗萨’计划延迟了大约五个星期”，就是到6月中旬。4月30日一次陆军会议的报告明确他说，希特勒已经决定“巴巴罗萨行动”将于6月22日开始，“最大量的军队调动”将从5月23日开始。

舒伦堡从4月14日到30日是在柏林，他一定曾竭力劝希特勒不要走一条他认为会把德国引向灾难的道路。当时德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中普遍存在的思想，被罗马尼亚政治家加芬库说得很清楚。大使馆人员明确地反对这场战争。不象大多数本国同胞那样，他们不相信这场战争会是短期的和决定性的。固然，根据纯粹军事的理由，他们不得不相信德国武装部队的优势，而且他们或许由于看到红军在对芬兰的冬季战争中的失策，看到俄国日常生活中种种明显的困难和缺陷，以致得出错误的印象。可是大使一定曾指出，德国入侵苏联可能取得的物资，甚至不及这时根据经济协定的条件所能得到的一小部分。4月28日舒伦堡由希特勒接见时，实际上曾表示他相信斯大林甚至准备再向德国作一些让步，并且相信苏联在下一年供应德国的谷物可能多达五百万吨。同一天，魏茨泽克草拟了一件备忘录给里宾特洛甫：支持舒伦堡关于俄德关系的备忘录。

我能用一句话总括我关于德俄冲突的意见：如果每一个化为灰烬的俄国城市象一艘被击沉的英国军舰一样地对我们有价值，我应该鼓吹这场德俄战争在今年夏天进行：可是我相信，我们将叔仅在军事意义上战胜俄国，而另一方面，在经济的意义上却有损失。或许人们认为给共产主义制度以致命的打击是一种引人入胜的前景，并且也可以说在事理上应该集合欧亚大陆的力量来对付盎格鲁-撒克逊族的王国及其附庸。可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是这种计划是否会加速英国的崩溃。……我认为我们必然会胜利地进军到莫斯科以及更远的地方。然而，我十分怀疑，在斯拉夫民族有名的守势面前，我们是否能从胜利中得到利益。我在俄国这个国家里看不到任何有实力的反对派能够接替共产主义制度，和我们联合起来，对我们有用。因此，我们大概将不得不估计斯大林的体系将在俄国东部和西伯利亚继续下去，并估计到1942年春天战事会重新爆发。朝太平洋那边的窗户将仍然关闭着。德国进攻俄国，将徒然使英国获得新的精神力量。这种进攻，在英国将被理解为德国自己对于战胜英国已经没有把握。这一来，我们不仅是承认战争还将长期继续下去，而

且我们也许实际上正是使战争延长，而不是缩短。

在此期间，苏联政府正在采取步骤阻止德国完全建立它对东南欧的统治，又设法保护苏联在远东的后方并加强它在国内的地位。在这一点上，苏联并不十分努力；因为在这个阶段，只有通过战争，苏联才有希望遏制德国在东南欧再向前推进，而苏联政府的政策是几乎不惜任何代价力求同德国保持和平，除了万一德国进攻时它不能不抵抗。另一方面，在其他两点上，苏联政府的行动是有效果的。

在东南欧，保加利亚于1941年3月1日依附三国公约以后，仍然保持独立的国家只有土耳其、希腊和南斯拉夫。德国占领保加利亚以后，苏联已经来不及抢救希腊——无论如何苏联政府不可能越过轴心国家在希腊的通道而不被拖进和英国合作，结果是介入战争。因此，苏联的外交手段只限于尽可能大胆地声援土耳其和南斯拉夫。

3月25日莫斯科的外交部发表一项声明，否认“外国报刊上的谣言”，即所谓如果土耳其被迫打仗，苏联就会乘机向它进攻：

相反地，如果土耳其实际上遭受侵略，如果它为了保卫自己的领土，而不得不打仗，它根据俄土互不侵犯条约，可以指望苏联的完全谅解和中立。土耳其政府认识到苏联的这一声明，已经向苏联政府表示了最诚挚的谢意，并相应地声明，万一苏联遇到与土耳其同样的情况时，它也可以指望土耳其的完全谅解和中立。

苏联政府支持南斯拉夫的态度较为冒险，因为到它表明这种态度的时候，南斯拉夫和土耳其不同，已经被德国军队所包围；而且也因为它所支持的这个南斯拉夫政府，是通过革命夺权的，这本身已经是对德国的一种挑战。关于保罗亲王的政府于3月25日签订一项南德协定以及后来南斯拉夫军队于3月27日推翻那个政府的经过，本书其他部分已有记述。4月4日莫洛托夫告诉舒伦堡，苏联政府已经同意南斯拉夫的建议，缔结一项苏南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并将于当日或次日签字。实际上该约是在4月5日签订的。4月6日，舒伦堡根据里宾特洛甫的指示，通知莫洛托夫，德国正在南斯拉夫和希腊采取军事行动。德方所举的理由，和它对以前在东南欧的一切军事侵略的解释一样，就是，英国在英德战400争中的举动迫使德国在军事上有必要这样做；并重弹老调，保证德国在这一地区没有政治的利益或者领土的兴趣，德军“在巴尔干地区的任务完成后”即将撤走。舒伦堡奉命，在向莫洛托夫传递这个不受欢迎的消息时，不必提起莫洛托夫以前关于缔结苏南条约的照会。舒伦堡因此避而不提此事，莫洛托夫也闭口不提。可是莫洛托夫对舒伦堡反复强调说，战争的扩大令人“痛惜”。同一天，4月6日，德国和意大利对南斯拉夫宣战，到4月13日，南斯拉夫的抵抗已经崩溃。然而，苏联在东南欧的这一损失，由于4月13日一项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而得到弥补，足以抵消前者的影响而有余。对苏联政府来说，这是一项头等重要的外交上的成功。苏联政府预先有把握地看到，如果德国真的进攻苏联，则其受害者只需在一面作战，而德国本身却不得不在两面作战，这种情况是以往德国所有想要发动侵略的人所害怕的，尤其是希特勒。

苏联政府认为局势严重，这种看法此时也在国内的阵线方面表现出来。5月7日，斯大林根据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命令接替莫洛托夫任人民委员会主席。这一步骤果断地改变了斯大林以往采取间接控制的政治策略，舒伦堡对此的评论是斯大林“显然觉得，在他认为严重的局势中，他个人不得不为苏

联的命运负起全部责任”。5月9日，莫斯科通令派驻国外的苏联使团，要它们非常慎重地探索在万一发生俄德战争时，其他国家会持什么态度。在5月16日以前，苏联驻斯德哥尔摩公使柯伦泰夫人一直说，俄国历史上从未有过象现在这样强大的军队集合在俄国的西部边境。

这样，苏联政府已在摆出一种准备抵抗德国进攻的姿势，可是同时仍在竭尽全力，以求保住和平。它于4月13日——正是它和日本签订日苏中立条约取得外交上的成功的那天——作了一次显示它十分希望避免战争的戏剧性表演。日本的谈判代表们离开莫斯科时在火车站上的情景，舒伦堡作了如下的描绘：

松冈洋右的启程延迟了一小时，然后为他们举行了非常隆重的仪式。显然日本人和俄国人都感到完全出乎意外。4月13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两人一起出现了，以十分友好的态度招呼松冈洋右以及在场的日本人，祝愿他们旅程愉快。然后斯大林公开地询问我在哪里；他看到我时，走上前来，搂住我的肩头，说：“我们一定要始终是朋友，您必须为这个目的尽一切努力！”过了一会，斯大林转向德国的代理武官克雷布斯上校，首先弄清楚他是德国人，然后对他说：“我们愿意始终和你们做朋友——无论怎样！”

舒伦堡以及德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其他成员差不多直到最后都继续争辩说，苏联政府决不会进攻德国，并且会不惜代价以求避免彼德国攻击；他们这种说法显然是真诚的，而且显然也是看清事实的。4月16日，舒伦堡回国期间在莫斯科担任德国临时代办的蒂佩尔兹基尔希对4月13日那天的情景也是这样解释的。4月28日，舒伦堡在柏林晋见希特勒时也据此勇敢地进行争辩。舒伦堡在5月7日和12日从莫斯科发回本国的电报里，把斯大林接替莫洛托夫任人民委员会主席这种引人注目的新方针，解释为是为了维持和平的一种手段。他说斯大林一直有意识地致力于创造和保持德苏关系的亲善，而“莫洛托夫的……自作主张则往往旨在顽固地为个别的一些问题辩护”。在5月12日的电报里，舒伦堡列举下列各事证明斯大林希望缓和苏德之间的紧张关系，如：塔斯社5月8日发表一项公报，正式否认苏军大量集中在苏联西部边境；5月9日，苏联撤销对挪威、比利时和南斯拉夫三个流亡政府在外交上的承认；以及在5月12日当天，苏联和阿里·拉希德在伊拉克成立的反英政权建立了外交关系。5月24日，舒伦堡还在争论说，苏联政府的对外政策掌握在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手里，不是反德的。“这种对外政策的目标首先是避免和德国冲突，其证明是：苏联政府最近几个星期中采取的态度，苏联报刊的语气（它对一切有关德国事件的论调无可非议）以及它遵守对德贸易协定。”

6月14日，在希特勒发动进攻之前八天，苏联政府402以塔斯社电讯的形式向德国作了最后的呼吁，这条电讯表面上是针对英国的，在发表以前由莫洛托夫先转交给舒伦堡。

甚至在英国大使克里普斯回到伦敦以前，但特别是在他回去以后，英国和外国报刊上就广泛地谣传“苏联和德国之间即将发生战争”。……莫斯科的负责方面，鉴于这些谣言沸沸扬扬，认为有必要授权塔斯社声明，这些谣言是和苏德两国敌对的一些势力的一种笨拙的宣传伎俩，这些势力对于战争的蔓延和加剧感到兴趣。

电讯接下去详细地驳斥了这些所谓的谣言。

这是斯大林想要使希特勒满意的最后努力，但没有效果。德国对塔斯社

电讯不置可否。德国报刊甚至不予登载。与此同时，德国即将进攻苏联的预兆迅速发展得更加险恶。4月22日，苏联曾对德国飞机侵犯苏联边境提出正式抗议，德国最高统帅部于4月23日发出一项抗议来抵挡。德国驻莫斯科的海军武官24日报告说，莫斯科流传的所谓德苏之间即将发生战事的谣言，由来自德国途经莫斯科的旅客们加油添料，英国驻莫斯科大使则预言动手的日子将是6月22日，而其他的观察家则把日期预定在5月20日。这位武官头脑简单地补充说，“我正在竭力辟谣，这些谣言显然是荒谬的。”舒伦堡本人以同样的态度于5月2日向柏林方面他的上司提出更强烈的异议：

我和本大使馆所有的高级官员对于所谓德俄在军事上即将摊牌的谣言一直总是给予打击的，因为这类谣言对德苏关系的继续和平发展当然会有重大的危害。然而，请记住，假如这些谣言不断地从德国传来，假如来到莫斯科或者经过莫斯科的每一个旅客不仅带来这些谣言，而且甚至举出一些事实为证的话，那么要在莫斯科抵制这类谣言，其努力必然没有效果。

5月4日舒伦堡接到柏林的指示，把战争谣言归咎于403英国的宣传，同意德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人员对于这些谣言所采取的方针，嘱咐他们继续辟谣。5月15日，舒伦堡奉命告诉苏联政府，有关它指控德国飞机侵犯苏联领空七十一次的问题，德国正在调查研究，可是这将需要一些时间。5月17日，舒伦堡向索波列夫传达此项通知时，后者“严肃地指出德国飞机侵犯边境的行为仍在继续，而且经常出现。”（在柏林，同一天，魏茨泽克在日本大使询问俄德关系现状时，作了一个极其骗人的使人定心的答复。）6月21日，即在德国宣战的前一天，驻柏林的苏联大使向魏茨泽克抗议，德国除了以前侵犯苏联领空八十次以外，从4月18日起又侵犯了一百八十次，并且“德方的飞行已经具有系统的和故意的性质”。有几次德国飞机曾深入苏联境内达一百公里或者甚至一百五十公里。在莫斯科，同一天下午9时15分，莫洛托夫召见舒伦堡，把杰卡诺佐夫在柏林提出的关于德国侵犯苏联领空的抗议通知了他。据舒伦堡报告，莫洛托夫接下去说：

有一系列迹象说明德国政府对苏联政府不满。甚至谣传德国和苏联之间即将发生战争。……苏联政府不能理解德国所以不满意的原因。如果南斯拉夫问题在当时曾引起这种不满，他——莫洛托夫——认为他早先说的一些话已经澄清了这个问题，再则，这已是过去的事。如果我能告诉他是什么原因造成德苏关系中目前的局面，他将表示感激。我回答说，我无法答复他的问题，因为我缺乏有关的资料；但是我将把他的话转报柏林。

404 仅仅过了两小时，有关的资料终于送给了这位不幸的大使，若干月以来，他的上司们一直并不把他作为亲信的代表使用（按职务本应当是亲信），而是利用他打掩护，因为他们愚弄他，就不知不觉地为他们扮演了这个角色。

6月初德国进攻苏联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德国最高统帅部能够颁发一份详细的时间表，规定陆军、海军和空军的部署和任务。6月9日，希特勒下令，要求于6月14日提出关于“巴巴罗萨行动”的最后报告。苏联政府方面这时正采取切实的预防措施，同时不放弃力求避免这场即将临头的大祸。早在5月7日，各国驻莫斯科的外交使团就接到通知，告诫它们的成员不要在苏联的边境地区旅行，就是说要前往芬兰、黑海港口、巴库、克里米亚以及西伯利亚的某些地区。在西部，特别是在基辅、敖德萨和列宁格勒周围举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波罗的海舰队正在动员。所有通往罗马尼亚的公路都布了地雷。立陶宛

边境的桥梁被破坏，整个整个的村庄被疏散。红军休假全部取消。6月初，莫斯科各博物馆的珍贵文物开始疏散。6月7日，克里普斯从莫斯科被召回伦敦商量问题。到这时候，大家都知道在波兰和罗马尼亚的德国部队共计大约一百三十个师。罗马尼亚军队的总动员令是在6月5日颁发的。到6月中旬，德军和它的盟军大约共有一百六十五个师集结在苏联边境一带。看上去好象德国又将攻其邻人于不备，而且柏林对其进攻的结果一定很有把握。谣传德国向苏联政府提出一些要求：乌克兰在德国的保护下自治，那里的重工业由德国控制；红军复员；苏联向德国供应军火和原料；苏联在波罗的海地区所有的造船厂以及太平洋的苏联舰队归德国控制；比萨拉比亚归还罗马尼亚。可是正式文件中没有证据说明这些所谓德国的要求曾经真的提出过。6月18日，土耳其被德国在希腊本土以及在克里特岛的胜利所惑，和德国缔结了一项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同一天，英国宣布封锁芬兰，因为它是敌方控制的地区。6月20日，芬兰军队动员。

在此期间，6月15日，里宾特洛甫曾告诫匈牙利首相，要采取步骤保全匈牙利的边界，因为“最迟到7月初”

希特勒大概不得不对苏联政府提出一些要求，其结果难以预料。这样，在发动进攻以前，纳粹政府已经动员了两个卫星国家的军队，并对另一个国家的政府首脑稍微透露了一点自己的意图，而同时仍然故意把自己驻莫斯科的大使馆蒙在鼓里。舒伦堡在莫斯科于6月21—22日的午夜收到德国对苏联宣战的文本，柏林指示他立即把文本递交莫洛托夫。在柏林，此项宣战文本于6月22日上午4时由里宾特洛甫交给杰卡诺佐夫。而在6月21—22日的夜间德军已在全线发动进攻了。

里宾特洛甫对杰卡诺佐夫说，“他对于德苏关系中这一发展十分遗憾，因为他特别作了一切努力想使两国之间的关系较好一些。但不幸的是，事态表明两国之间意识形态冲突的势力超过了常识，而他这个德国外交部长却是把希望寄托在常识方面。”他说这番话的时候，也许并不是表里不一。另一方面，希特勒在表示感到宽慰时，也许是同样地心口如一——象他在6月21日写给墨索里尼的一封私信里以及在6月22日上午的广播声明中都表示的那样。在给墨索里尼的信中，他写道：

自从我经过思想斗争作出这个决定以后，我又感到精神舒畅了。和苏联的合伙关系，尽管我完全有诚意要努力实现最后的和解，却还是常常使我非常厌烦，因为我总觉得这样做有些违背我的全部历史，我的思想和我以前的义务。我很愉快，现在解除了这些精神上的痛苦。后来他在广播中宣称：

直到现在为止，我为环境所迫，不得不一再保持缄默。现在已经到时候了，继续坐视不动，不仅是一种无所作为的罪过，而且是对德国人民甚至对整个欧洲的犯罪行为。今406天大约有苏军一百六十个师面对着我们的边境。几个星期以来，侵犯我们边境的事件经常发生。……这使我们到了必须采取行动的时刻，来对付象犹太人似的盎格鲁-撒克逊战争贩子，以及在莫斯科这个布尔什维克中心的同样象犹太人似的那些统治者所策划的这一阴谋。

但是，宣战声明的语调——和写给墨索里尼的信一样，是一种诉状式的自我辩解——显示出希特勒的宽慰感中含有焦虑的成分，在为这一大规模的新侵略行为的道义基础担忧。苏联政府在道义上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据加芬库说，莫洛托夫问舒伦堡，大使在6月22日黎明时对他宣读的柏林文件是不是宣战；舒伦堡回答说，他知道的就是这些，没有什么好多说的，于是莫

洛托夫说，这就是战争。德国飞机刚刚轰炸了大约十个不设防的村庄。难道舒伦堡认为俄国人应该挨炸吗？

莫洛托夫的公开声明，和希特勒的一样，在 6 月 22 日上午采取了广播的方式。他宣告德国军队已经越过边境，德国空军轰炸了日托米尔、基辅、塞瓦斯托波尔和考纳斯四个城市，炸死和炸伤二百多人。他又宣布有来自罗马尼亚和芬兰境内的空袭和炮击。他谴责这种“无比的背信弃义”，但又小心地指出应该对此负责的人不是“德国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而是“德国残暴的法西斯统治集团”。他讲到俄国人具有抵抗拿破仑的光荣历史。“苏联政府号召你们，苏联的公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我们光荣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周围，团结在斯大林政府的周围，团结在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同志斯大林的周围。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敌人必败，我们必胜。”

附录 1：俄一德的经济交易

1939 年 3 月 23 日至 1941 年 6 月 22 日

1938—1939 年俄德的经济谈判以及两国于 1939 年 8 月 19 日（在它们签订政治协定前四天）达成经济协议的经过，在本丛书的另一卷中已有记述。这些谈判一开始就是谨慎从事的，并在 1939 年 3 月 11 日曾根据德 407 方的提议中断过，一部分是因为这些谈判在波兰和西欧引起的政治反响，一部分是因为德国人觉得俄国的要求太多，不合他们的口味。然而，1939 年 8 月 19 日的经济协议终于达成。因为到那时候政治局面已经有了迅疾的和激烈的变化。希特勒和斯大林一经拿定主意，认为一项以波兰和西欧国家为牺牲的政治交易对德苏两国都有利，他们就准备不顾世界上其余的人怎样看法，而且要使他们各自的迫切经济需要服从一种高于一切的“生存的理由”。然而，一些利害攸关的经济问题，对双方来说，却一点没有因此而失去其内在的重要性：并且，由于 1939 年 8 月 19 日达成的经济协议没有解决这些问题，而是仅仅一笔带过，所以它们立刻又重新出现了。

结果是一番拖得很久很久的激烈的讨价还价，在谈判过程中，俄国和德国的经济专家不得不把一些最困难的问题交还给他们上级去解决。这种强盗之间讨价还价的记录，读起来比通常高尚体面或者半高尚体面的政府与政府之间经济交易的故事更有趣味。在 1939 年 8 月 19 日的协议以后的俄德经济谈判中，双方彼此完全不信任——这是有理由的，因为彼此都决心要尽可能胜过对方，并且准确地估计到对方也同样地心怀叵测。

德国人可以进行欺骗的机会大于俄国人，因为整个交易的基础必然是以俄国的粮食和原料交换德国的工业品，俄国的货物一经收割或者开采出来马上就可交货，而德国的货物则必须经过一定的程序进行生产，即使在乎时，也可能需要几年，在战时就必然需要更长的时间。结果，苏联政府在原则上承认德国的交货应迟于俄国，还将双方分期交货的日期在 1940 年 2 月 11 日达成的协议中作了详细规定。俄国的交货应于十八个月内完成，德国在二十七个月内完成；到 1941 年 5 月 11 日，苏联将不仅完成它头十二个月的全部交货额，而且要完成后六个月交货额的半数，另一方面，到同一日期，德国的交货将只是刚刚抵过苏方头十二个月的交货，还没有开始抵销苏方后六个月的交货。换一句话说，在 1941 年 5 月 11 日，德国对苏联交货在时间上的间隔将最大。因此，在将近 1940 年 7 月底希特勒决定进攻苏联，从而破坏 1939 年 8 月 23 日的俄德政治协定时，他把进攻的日期定在 1941 年 5 月，一

定不是偶然的。在希特勒于 1940 年 12 月 18 日发出的关于“巴巴罗萨行动”的指令里，进攻的日期规定为 5 月 15 日，就是比 1940 年 2 月 11 日俄德经济协议中那个有重大意义的日期晚四天。没有疑问，希特勒选择这个日期时，主要地是从俄国的气候着想，可是似乎他所定的时间可能也受了这样的影响，那就是他希望自己答应给俄国人的东西尽可能少交出一些，以换取尽可能多的俄国人曾经答应给他的东西。

没有疑问，俄国人预见到德国人会用这样或那样的方法欺骗他们；也没有疑问，他们不是那么天真，会幻想只须狠狠地讨价还价或者非常小心地起草协议条文，就能保证自己不受欺骗。虽然他们迫切需要获得德国的资本货物，特别是需要德国的武器（包括“技术”在内），他们自始至终一定曾想到，如果对自己和德国人做交易的最后帐口作严格的经济核算，他们将是损失重大的一方。然而，德国的工厂设备和武器还不是苏联政府千方百计要买的那种对苏联最有价值的货物。苏联政府最关心的是买时间和买领土——领土，在他们看来，是空间形式的时间，因为，他们计算，为苏联在西面取得一条缓冲地带，其效果会使德国入侵者的出征季节缩短至少几个星期。当然，在德国人那方面，他们除了向苏联购买粮食和原料外，还要买一种政治上有价值的东西，即买它的友好中立，以保证德国不至于冒两线对大国作战的风险，并为它保持一条横贯西伯利亚的输入货物的畅通无阻的路线，这条路线几乎完全不受英国封锁的影响。但是希特勒要避免和苏联交战的愿望，在任何阶段都不及斯大林要避免和德国交战的愿望那样强烈；而且希特勒要维持对苏和平的主要动机已在 1940 年 6 月间由于法国覆灭而消失了。这样，从俄德之间进行交易的政治方面来看，自 1940 年 6 月起，形势对德国越来越有利。因此，苏联为了弥补它在政治上的缺陷，不得不交付经济货物，而且 409 尽管有协议的规定，它所交付的货物却得不到经济上的报答。

1939 年 8 月 19 日俄德经济协议的条款，在本丛书的另一卷中已有扼要记述。要点是俄国的原料应立即开始交货，而德国对应的工业品交货将以较慢的速度进行，这些工业品用德国给苏联的商品贷款为周转资金，然后以俄国的交货清偿债务，但在此期间，俄国人须按名义上百分之五（实际上是百分之四点五）的利率付息。9 月 2 日，德方负责俄德经济交易的官员施努雷向里宾特洛甫呈交一项“〔德国〕对俄工作计划”。在这个阶段，德国武装部队对德国工业的要求还不太高，戈林赞成尽快地扩大德国和苏联的经济关系；9 月 7 日，苏联政府接到通知说，德国政府拟派遣施努雷到莫斯科来讨论经济协议的执行情况和经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克里姆林宫同意了，日期暂定为 9 月 15 日。施努雷于 9 月 14—15 日和里宾特洛甫作了初步的商讨。德国政府的希望是既要扩大交易的规模，又要延长德方在完成相应交货方面时间上的间隔。在施努雷本人的笔记里，下面这段话颇能说明问题：

在纯粹经济谈判的框框以内，俄国实际存在的困难无法克服，特别是因为我们要求俄国人在我们之前履行义务。只有由俄国最高当局本着它对我们的政治态度的精神，发出适当的指示，才能指望取得积极的成就。在这方面，谈判将是一种考验，从中可以看出斯大林是否准备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准备从新的政治趋势中作出切合实际的结论。由于俄国国内供应情况不佳，我们所要求交付的原料，只有牺牲俄国自己的消费，才能办到。

里宾特洛甫推迟了施努雷的莫斯科之行，以便有充分时间考虑，怎样才能最好地克服这一困难。这是不容易的，因为“以增加交付工作母机的方式

来补偿”是“绝对做不到的”。9月20日，自始至终诚心诚意为保持俄德协商而努力的舒伦堡，向他的上司们指出，苏联供应德国410物资的能力受到物资短缺和运输工具不足两者的限制。然而，在9月28日俄德补充政治协定签订的那天，苏联政府同意谈判一项新的经济计划，包含德国人所希望的德方相应交货在时间上的间隔问题。到10月6日，施努雷已经拟定这些谈判的时间表，谈判将在莫斯科进行。由里特尔和施努雷率领的一个阵容坚强的德国代表团于10月7日按时到达那里，代表团10月11日关于谈判进展的第一次报告，表明不是没有希望的。但是，到10月15日，德国人已经觉得俄国的谈判代表很难对付，里特尔回柏林去向德国政府陈说，他们这方面必须认真地努力提供苏联政府向德方要求的東西，特别是制造俄方清单上各项产品所需要的全部铁矿砂。同时，苏联政府派往柏林的一个代表团比在莫斯科的德国代表团实力更强。其中有苏联三军的代表，并带有一份俄方所需各项物资的清单。这个代表团于10月26日抵达，它纠缠不休，强索硬讨，很快就叫德国三军受不了。“如果，在俄国的无数愿望中，不是一切都按照时间表进行，这种情况往往应归咎于俄国人不断地改变他们的计划，使德国机关面对一些往往无法解决的问题。”苏联代表仓猝回莫斯科汇报后于11月30日提出的第一份向德国订货的清单，确实吓人；施努雷认为，“或许需要由元首决定。”这个意见被1939年12月2日在柏林举行的一次俄德会谈的结果证实了。12月5日，魏茨泽克记录道：“凯特尔陆军上将今天打电话给我，说俄国要求德国产品交货的清单越来越多，越来越不合理”。

德国经济谈判代表的工作，由于德国武装部队方面的迫切需要，也由于苏联代表团方面的迫切需要，深感困难。虽然在不久前，即在11月16日那个时候，戈林还宣称“鉴于目前形势，和俄国人的谈判显然必须取得积极411的结果”，里特尔却于12月6日接到通知说“……戈林和……丰克〔经济部长〕已经决定，由于武装部队新近宣布的需要，不可能由于对俄交易而对铁矿砂的分配作出特别安排。”里特尔的结论是德国政府有三种选择：修改戈林—丰克的决定；放弃德俄经济交易；“或者另想办法，设法把整个同俄国的交易放在一种和9月28日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换文中的规定完全不同的基础上，就是说，不是双方相互交易，而是由苏联单方面交货——换句话说，是一种由一方补助另一方的条约。这需要为谈判制订一种新的政治方案。”

里宾特洛甫于12月11日向柏林的苏联大使提出告诫，同一天里特尔叙述苏联的要求如下：

经几个星期的考察旅行后，这里的苏联代表团于几天前终于提出了一项军事订货清单。此项清单在这里引起了极大的惊愕。据粗略估计，订货价值达十亿马克以上。其中包括德国武装部队已经采用的或者正在研制的一切最新式的武器。此外，苏联考察团全部保留以前提出的工业订货清单，其价值大约三亿马克，并要求这两次的订货单，在可能情况下，均于1940年底以前准时交货。再则，该考察团还想订购一些大的工业设备，其价值也高达几亿马克。结果是，苏联代表团在德国的订货，总共价值已达十五亿马克。

德国代表团曾指出，1939年8月19日的协议所规定的，不是为了完成军事订货，而只是为了分期在一段较长时间的工业交货。但是，俄国的谈判代表仍然得以强使德国代表对“军事订货作了适当的许诺，数目大约为六亿六千万马克”。里特尔评论道：“苏联专家们的行径常常使我们想起战后年代中盟国间裁军管理委员会的行为。”

德国人于12月19日在莫斯科向米高扬（对外贸易人民委员）呼吁，结果无效，可是12月22日舒伦堡和莫洛托夫的一次谈话，效果却较好。莫洛托夫坚持说，“工业交货”一词确是包括军事订货在内，并回忆道：“在1912月28日的谈话过程中，冯·里宾特洛甫先生曾说过，德国对于它的朋友苏联希望德国提供的一切东西都要交货。苏联政府当时曾以特别满意的心情注意到这一点。”然而，他说服米高扬，并于12月31日在莫斯科举行了一次隆重的会议，出席者苏联方面有斯大林、莫洛托夫、米高扬、捷沃扬和巴巴林，德国方面有舒伦堡、里特尔、施努雷和希尔格。斯大林和德国人就一些问题讨论了三小时，谈得非常详细。“苏联要向德国学习，特别是在军备方面”；并且，在谈话过程中，斯大林明白他说，他本人已经学到不少。可是他确曾提出一份经过修改和削减了的苏联所需物资的详细清单，并经过舒伦堡和莫洛托夫于1940年1月7日又谈了一次，达成协议更有希望了，在这次会谈中舒伦堡要求苏方同意德方交货时间的间隔，作为希特勒在军事上援助苏联的报酬。1月13日，希特勒亲自把他就苏联要求德国提供武器和机器而引起的五个问题所作的决定交给里宾特洛甫，这些决定主要是赞成提供的。可是在1月28日，舒伦堡和施努雷从莫斯科报告说，俄国人“抱怨向德国订货越来越困难”，以及“猜疑越来越多，认为我们不愿意并且不能够按议定的数量交货”。1月29日在莫斯科开了第二次会议，参加者仍然是12月31日两国出席会议的那些代表，在讨论中斯大林又一次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2月3日，里宾特洛甫以个人名义写信向斯大林呼吁。里宾特洛甫的态度是和解的。德国已经开始根据1939年8月19日的经济协议为俄国的订货进行生产，价值达九千万马克以上；它现在也声明愿意作范围广泛的军事交货，虽然9月28日的协议只提到工业交货。“我们同意交付战争物资，尽管我们自己在作战。”里宾特洛甫的这一着棋产生了效果。2月8日上午1时至2时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第三次会议上，斯大林说里宾特洛甫的来信改变了局面；他接着就提出重要的日期问题。据他了解，拟议中的新的经济协议将规定，除1939年8月19413日的协议已经规定的相互交货以外，应增加相互交货；根据新的协议，苏联应于协议签订后十八个月内完成交货，德国应于二十七个月内完成交货。在这个基础上一项新的经济协议果然于2月11日签订了。

在2月26日有关此项协议的一份备忘录里，施努雷说，多亏里宾特洛甫写给斯大林的私信，德国要求交货时间的间隔问题达到了目的——但须按协议的第九条和第十条的规定，从第十六个月月初到第二十七个月月底，每三个月结帐一次，如果，在以每三个月为一期的任何一期中，有一方（即德国）不保持第九条所规定的双方交货的比例关系，另一方（即苏联）将有权暂停交货，直到规定的交货比例恢复为止。斯大林本人在2月8日的会议上坚持要附有这一条件。施努雷接下去指出后来发生困难的两个可能的来源。苏联“答应的交货远远超过从纯粹经济观点看来可以自保的程度”，而且“在许多情况下，苏联的薄弱环节和德国的薄弱环节是相同的”。果然，到3月15日，苏联驻柏林的贸易代表团成员巴巴林已在向里特尔抱怨说，他在使德国交付苏联的订货方面遇到了种种困难。1940年9月12日，谈判休会，俄国人暂时停止交货。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是根据2月11日的协议中规定的权利行事的；到1941年1月10日，根据2月11日协议所规定的第二期相互交货再达成协议以后，交货又开始。

在此期间，俄德政治关系已有转趋恶化的预兆，其经过情况上文已有叙述。希特勒所想的是军事和政治方面，而不是经济方面；在他看来，法国的覆灭使他可以腾出手来实现他在1939年8月只是推迟而不是放弃的野心——牺牲苏联，为德国征服一片辽阔的生存空间。然而，德国政府机关的负责人员中有一些人认识到，只要德国在打仗，即使只和英国一个国家交战，也不可丢掉它根据俄德经济协议一直在取得的物资。他们又看到，如果德国失去这些物资是由于它和供应这些物资的苏联开战，从而使自己陷入在两条战线上对大国作战，那它就将受到双重的打击。

虽然这些协议的谈判经历了不少困难，德国所得到的利益却很大。苏联政府不仅以苏联本国出产的食品和原料供应德国，还从第三方面的一些国家买进物品供应德国，而且主要以苏联政府自己筹得的外汇去买；这些供应品要经过符拉迪沃斯托克和西伯利亚大铁路运往德国，这条路线是英国海军力量无法封锁的。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以他自己的行为断绝了这一供应来源以前，德国从苏联以及经过苏联从别处取得的物资数量，在本丛书的另一卷中已作了估计。在1941年4月5日和5月15日先后两次关于当时苏联交货情况的备忘录中，施努雷对于俄国人在履行他们的义务方面的成绩，以及德国因此而在经济上的受益，都作了赞许的评论。5月15日，他写道：

我认为我们可以对莫斯科提出一些经济要求，其范围甚至超出1941年1月10日条约的规定，这些要求的目的，在于为德国取得超过现今约定范围的粮食和原料。现今约定的原料数量，俄国人正在按期完成交货，尽管这对他们是沉重的负担；这种情况，特别是在谷物方面，是值得注意的成绩。

然而，施努雷期望的办法已不必进行实验，因为他签呈这份备忘录的那天，正是希特勒曾选为对苏联进攻的日期；

虽然由于需要对南斯拉夫采取预备性的行动而造成意外的迟延，使德国经济获得三十八天缓期的机会，再收到一些俄国的供应品，但在6月21—22日的夜间终于结束了俄德经济交易，德国始终从这方面受益，直到战争中那个决定命运的转折点为止。

附录：共产国际及其在各国的支部采取的有利于德国的行动

1939年8月23日至1941年6月22日

苏联对德国致力于战争之最显著的援助，是通过共产国际的世界政策发挥作用的。到1939年8月23日为415止，全世界的共产主义一直是强烈反对纳粹的。从这一天起它突然改变为采取一种反对战争的政策，谴责英国和法国为战争贩子，并且从此以后就把德国作为由于英法好战而受害的牺牲者，对它同情。

新的方针在莫洛托夫1939年8月31日的讲话和10月31日的讲话中，在1939年10月份《诅咒》上发表

的季米特洛夫的文章里，以及在11月6日纪念十月革命二十二周年之际发表的共产国际宣言里都谈到了。

10月31日，莫洛托夫赞美德国想要结束战争，谴责英法想要延长战争。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其中许多人在莫斯科避难——同样起劲地谴责英法而赞美德苏协定。甚至在德国的内政方面，纳粹党人和共产主义者的合作这时也十分密切。

在英国，共产党议员加拉赫要求立即进行和平谈判。在法国，共产党人迟疑了几天。在加布里埃尔·佩里埃的影响下，他们在国民议会1939年9

月2日的会议上投票赞成军事贷款。可是在以后两个月内,季米特洛夫在《诅咒》上发表的文章(上文已提到),多列士和《工人日报》记者的谈话,以及安德烈·马尔蒂致莱翁·勃鲁姆的公开信,已经把共产党的新方针确定下来。共产党领导人的行动,他们在议会中的发言以及在前线和全国各地的宣传,有效地助长了招致1940年法国崩溃的失败主义。从1月起组织了秘密的出版活动,怂恿法国士兵“结束战争”、“停止流血”以及“和德国士兵友好”。德国人进入巴黎时,共产党领导人认为自己帮了德国人不少的忙,应该可以要求德方正式允许《人道报》复刊,并鼓励该报“揭发英国间谍的活动”,“支持缔结法苏协定,作为德苏协定的补充”。

在比利时,从1939年10月起,共产党就斥责英国想要把比利时拖进战争的企图,并促使政府和苏联合作。在捷克斯洛伐克,逃亡在莫斯科的共产党领导人(斯默拉尔德和戈特瓦尔德),经德国当局允许于1939年12月回到布拉格。他们发表谈话赞成德苏协定,赞成国社党的主张,认为它很接近于国家社会主义;并且他们斥责战争贩子达拉第和张伯伦以及他们的仆从贝奈斯。他们预言苏联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将始终保持中立,这场战争将以世界革命结束。

在美国,共产党反对以军火供给盟国并反对罗斯福总统的政策。甚至德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人也拥护“和平”的事业,也就是拥护希特勒的和平事业;他们这种态度是无法理解的,假如不是因为有了德苏协定以及苏联政府因此而支持德国政策的话。

第二章德国进攻苏联 1941年6月22日至12月31日

意大利、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于1941年6月22日，芬兰于6月25日，匈牙利于6月27日，先后对苏联宣战，丹麦于6月26日，维希法国政府于6月28日，相继和苏联断绝关系。和苏联对立的这个大联盟不是空架子。它代表两亿四千二百五十万人口，而苏联的人口却不超过两亿。德国和它的卫星国家的战争潜力比苏联大得多。它的军事组织质量较高。在1941年6月战争爆发时，苏联能免于灭亡的机会似乎很小。确实，假如日本推迟它在东南亚的冒险，而发动它的满洲军队进攻西伯利亚，假如英国记住1939年8月的事，坐观纳粹与苏联搏斗而不偏袒一方，那末，毫无疑问苏联会被征服，希特勒会在拿破仑失败的地方获得成功。可是日本在当时或者在以后都没有对苏联动手；英国的态度则由丘吉尔在俄德战争开始的那天晚间的广播讲话中说得非常清楚。我们只有一个目标〔英国首相说〕和一个不能改变的目的。我们决心消灭希特勒和纳粹政权的一切痕迹。……

任何人或任何国家，只要和纳粹主义战斗，都会得到我们的援助。任何人或任何国家，若和希特勒一路走，都是我们的敌人。……因此，我们将尽我们的能力帮助俄国和俄国人民。……因此俄国的危险就是我们的危险和美国的危险，正如俄国人为了保卫家园而战斗的事业就是世界各地的自由人和自由民族的事业。

这样，丘吉尔就及时地、毫不含糊地表示英国支持俄国的抗战，而且还呼吁尚未参战的美国帮助俄国。翌日（6月23日），美国政府就由助理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在广播中作出响应。他指出纳粹政府和苏联政府都不给人民宗教自由，这一点以及共产主义独裁政治的其他原则和理论，从美国的信仰来看，同纳粹主义独裁政治的原则和理论同样是异端邪说，同样是不能容忍的。但是，他418宣告，“对希特勒主义的任何抵抗，不管来自什么方面，都会加速目前德国统治者的最后灭亡，因此就会有利于我们的防务和安全”。

6月23日，驻伦敦的苏联大使迈斯基会见艾登，表示他的政府愉快地接受丘吉尔答应给予的帮助。6月24日英国政府就这个问题向下院汇报，并说明政府打算派一个军事和经济代表团到俄国去“协调我们在现今毫无疑问是一项共同任务——打败德国——中的努力”。6月27日，克里普斯回到他在莫斯科的任所，同行者有一个由陆军中将梅森·麦克法兰、空军副元帅科利尔和海军少将迈尔斯率领的军事代表团。同一天，驻华盛顿的苏联大使奥乌曼斯基会见萨姆纳·韦尔斯；7月10日，他同韦尔斯和总统商谈。7月8日，一个由戈利科夫将军率领的苏联陆军和海军代表团已经到达伦敦。12日，克里普斯和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签署一项互助协定，规定：“两国政府相互保证，在目前对希特勒德国的战争中，彼此给予各种援助和支持。两国政府进一步保证，在这场战争期间，除经双方同意外，决不谈判或者签订停战协议或者和平条约。”戈利科夫在伦敦和美国大使怀南特会商，又和租借物资管理局督办哈里·霍普金斯会商。到8月1日，霍普金斯抵达莫斯科，在那里他收到斯大林一份关于苏联的储备、生产和预计需要物资的详尽报告。8月2日，在韦尔斯和奥乌曼斯基的交换函件中，美国政府同意给予苏联“优先援助”和从美国输出物资到苏联的“无限制特许证”；使之享受和英国同样的优先待遇；并给予“一切可行的经济援助，以加强苏联在抗击武装侵略的斗争中的力量”。

这样，在德国进攻俄国以后六个星期，在日本袭击珍珠港结果导致美国作为交战国参加第二次大战以前四个月，英同和苏联之间的军事同盟以及苏联和美国之间的 419 经济同盟的道路已经铺好。这两个英语国家给苏联实际援助的各项安排，必然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实行；从 1941 年 6 月 22 日德国进攻苏联到 1944 年 6 月 5—6 日在欧洲大陆西部开辟第二战场，其间总共只经过三年。然而，英美两国政府宣布它们准备帮助俄国，并动手把声明变为行动，在俄德战争生死存亡的第一阶段，两国政府这种迅速及时的行动，一定有助于俄国政府和人民振作精神，因为红军当时不得不首当其冲，抵抗德国庞大的地面军事力量，并正在遭受惨重的挫折。俄国人从遭受严酷考验的第一天起，就知道在这场考验中他们不是孤立无援的。

俄国的士气需要加强，因为俄国人民对于他们的德国盟友大举向他们发动武装进攻的消息是没有直接思想准备的。然而事态的发展说明，这种打击既不是完全出乎意外，人民在精神上也不是完全没有准备。俄国人的心里是非常爱国的。即使在不信神的苏维埃时代，俄国领土却是神圣的土地；俄罗斯人那种鞑靼人的慄悍本性似乎仍然没有改变。

间接他说，由于一段时期以来流行着一种对民族英雄主义的狂热崇拜，人民也有一些思想准备。俄国的历史在苏联已经不再禁读。伊凡雷帝、彼得大帝和叶卡特林娜一世使俄国成为伟大的和受人尊敬的国家；他们几乎是名誉共产党员；他们应该被认为具有一些斯大林的本质，是这位苏维埃救世主在历史上的先驱。格林卡的歌剧《为皇效命》以原来的剧名《伊凡·苏萨宁》在莫斯科的“大剧院”重新上演。

1936 年的宪法（第一百三十三节）规定，“保卫祖国是苏联每个公民的神圣义务”。1939 年 1 月 3 日规定的新的军人誓同保证战士要学好打仗的本领，忠于苏维埃国家，忠于工人与农民的政府，并勇敢地保卫它们。1918 年的老誓词曾说到保卫“社会主义和各民族之间的兄弟情谊”。这一句在 1939 年删掉了。所以对这场即将到来的严酷考验，苏联的士气，不是毫无准备；苏维埃国家（或者联盟国家）在初期的挫折和最后的胜利中始终团结在一起。

7 月 1 日——战争爆发后九天——成立了一个国防委员会，实际上是一个小型的“战时内阁”。委员会成员有：斯大林（主席）、莫洛托夫（副主席）、伏罗希洛夫元帅、420 马林科夫（共产党书记）和贝利亚（内务人民委员兼政治警察的头领）。沙波什尼科夫元帅是斯大林的首席军事顾问。至于这个委员会的职责，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下令规定：（1）一切权力应由国防委员会掌握；（2）全体公民，一切党、政、军和共青团组织部必须坚决执行委员会的命令。

7 月 3 日，斯大林在广播中向苏联人民发表了他第一次重要的战争演说。他说明德国由于出人意料地和极其背信弃义地进攻，已经占得一些便宜；他陈述了所以签订德苏之间各项协定的原因以及从中得到的利益，这些他不作辩解。他说：如果红军不得不退却（那是很可能的），铁路车辆必须全部撤走，谷物和牲畜必须全部转移，不能转移的东西必须销毁。在敌人的后方必须进行破坏；桥梁和公路必须炸毁；电话和电报通讯必须破坏；森林、仓库和列车必须放火烧掉。“有必要在被入侵的地区造成使敌人难以忍受的种种情况。”他宣告，这是一场“帮助整个……欧洲”的战争。他欢迎来自国外的支援。“在这场解放战争中，我们是不会孤立的。……我们将有欧洲和美洲的人民做我们的忠实盟友。……在这方面，英国首相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讲

话……以及美国政府表示准备援助我国的声明，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和具有预兆性的。”

7月11日，国防委员会任命三位元帅领导抗战：伏罗希洛夫（西北部），铁木辛哥（西部），布琼尼（南部）。7月17日下达一道命令，重新在陆军和海军里设置政治委员。他们的职务是代表政府和党并协助指挥的将领工作。

7月20日，最高苏维埃任命斯大林为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元帅为助理，还有其他几名副人民委员如下：沙金柯、费多连科将军（坦克军团）、日加列夫将军（空军）、茹利耶夫将军（军械部）。贝利亚主管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内务部，从此以后这两个机构就合并了。

苏联全体人民以自发的爱国主义精神响应了祖国的421号召。在乌克兰，由于存在地方民族主义观念，加强了人们对以前受勒索、压迫和清算富农的回忆，起初曾有一些迹象说明，有一种欢迎德国入侵者的倾向；而德国人则扶植了一个名叫赫特曼·斯柯罗帕茨基的本地人，作为乌克兰的统治者。可是德国人肆无忌惮的残暴行为，不久甚至也把乌克兰人逼得在后方进行反抗和破坏。在伏尔加河流域，古比雪夫附近，有一片德意志移民的侨居地，自叶卡特林娜大帝时代以来，他们就在那里生聚繁衍，此时约有六十万人。这个社会集团是否忠诚可靠，自然有疑问；根据9月8日发布的一项命令，其成员全部被迁移到苏联的阿尔泰地区（东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地区。一般说来，苏联的非俄罗斯民族始终非常忠诚。克里米亚的鞑靼人是例外，投靠了入侵者；他们和乌克兰人不同，人数既不多，地位也不重要。

大体上，1941年苏联全国各地的收成似乎都很好，收获期也比较早，例如，在乌克兰，收获日期比1940年提前十四天；在南方（库班、东南地区、阿塞拜疆、克里米亚、扎波罗热），收割工作在8月间就差不多完成了一半以上。有关方面绝对否认征兵入伍曾严重地妨害收割。城市中的男女居民都到乡村地区去帮忙。当时的各种报道都强调妇女的工作重要——在 frontline 担任医生和护士，在工厂里代替男工，参加空防工作，以及后来作为游击队的积极成员。十四岁和十五岁的少年儿童受到作战的训练。这确实是一场人民战争。

《真理报》关于10月19日莫斯科宣布戒严的评论，对战时的苏联作了生动的记述：

每一个莫斯科人一定感觉到他是一名战士，正在保卫首都。……来自首都各区的工人战斗队已经在防线上各就岗位。凡是会放枪的人都认为狙击敌人是自己的神圣义务。成千上万的人现在正在构筑莫斯科周围的防御工事。莫斯科周围的每个村镇，首都的每个地区、每条街、422 每所房屋必须成为一座堡垒。……法西斯的轰炸机现在能在战斗机的掩护下出现于这个城市的上空。飞行员、高射炮手以及探照灯人员必须时刻戒备。……对勇敢的战士来说，坦克没有什么可怕。一个有勇气、有决心的人比一辆坦克更坚强有力。敌人的坦克，我们的炮火能摧毁它，手榴弹能炸坏它，战壕里或者窗户里扔出去的汽油瓶能使它着火焚烧。……为了我们亲爱的祖国，为了我们的莫斯科，我们将顽强而凶猛地战斗到最后息。

到那天，局势开始显得对苏联十分险恶；然而，实际上苏联已经赢得战争——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德国人虽然表面上胜利，却采取了一些步骤，最终导致失败。丘吉尔写道：“希特勒入侵俄国，改变了这场战争的意义和

关系。”德国以一百二十个师的兵力进攻，其中有十七个师是装甲师，十二个师是摩托化师。有六个罗马尼亚师包括在他们的南方集团军群之内。作为总后备军的另外二十六个师，已经集结，或者正在集结。这样，到7月初，这支入侵大军可望至少有一百五十个师，由大约二千七百架飞机支援。这是有史以来投入战斗的最庞大的武装部队。

据当时的德国总参谋长哈尔德说，从军事意义上看，希特勒那时候进攻苏联是对的。“俄国正在武装，准备进攻德国……〔可是〕当然要选择对一个德国最不利的时刻——换句话说，要在西方又准备好采取行动的时刻来向德国进攻。”不管怎样，希特勒在进行战争中走错了路。据哈尔德说，他几乎在每个转折点都走错了。莫斯科本身应该列为第一个目标；但是在“巴巴罗萨”计划中（对这个计划，总参谋部包括哈尔德在内和希特勒负有同样的责任），却要从东普鲁士开始行动的北方集团军群首先出击，歼灭在波罗的海地区作战的敌军，然后占领列宁格勒和喀琅施塔得。要在这第一阶段以后才进而占领莫斯科地区，这只有当俄国的抵抗出人意外地迅速崩溃时，才可以证明同时进攻这两个目标是正确的。

423 这样，1941年德国对俄国战役的演变情况，可以概括为下述一系列事件：（1）最初德军跨越边界全面前进；（2）德军沿着波罗的海集中向列宁格勒推进；（3）斯摩棱斯克战役以后，德军向莫斯科的推进暂时停止；（4）德军转变方向，结果在基辅取得损失惨重的胜利；（5）入侵者削弱在列宁格勒的阵线，以抽出力量再向莫斯科进军；

（6）包围莫斯科的德国军队失败；（7）俄国反攻胜利；以及（8）德军第一次退却。

在最初四个月中（1941年6月22日至10月中旬）。看上去似乎“巴巴罗萨”计划将要成功。冯·莱布率领的德军已经征服全部波罗的海国家，同时冯·包克率领的军队已经占领白俄罗斯。在南线，冯·伦斯德率领的军队已经横扫了差不多整个乌克兰。到10月中旬，德军已在列宁格勒—加里宁（特维尔）—莫扎伊斯克—奥廖尔—马里乌普尔—一线建立起一条阵线。他们即将重新向莫斯科进军。但是此刻为时已晚，这一着不能成功了。

“巴巴罗萨”这类计划的毛病是没有考虑敌方可能采取的对策。俄国军队，虽然打打退退，退了再打，却不会轻易被歼灭，还差得远呢。冯·莱布的两支军队已经席卷立陶宛和拉脱维亚，正取道爱沙尼亚进入俄国，于8月20日占领北面的纳尔瓦和南面的普斯科夫、旧罗萨、诺夫哥罗德。到8月26日，它们已达列宁格勒以南九十英里的卢加。26日，爱沙尼亚的首都塔林投降；同一天，芬兰军队占领维堡（维普里），这是卡累利阿地峡的锁钥。从这些阵地，德军和芬军开始围攻列宁格勒；对该城的围攻于9月8日开始。在这里，俄国人第一次表现出非常认真的抵抗，在这里，俄国人以无比的英勇和坚忍不拔的精神继续抗战，直到1944年2月戈沃罗夫和麦列次科夫的军队到达，这个英雄的城市终于解围得救。

列宁格勒、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是苏联抗战的伟大的三位一体的象征；而以列宁格勒方面的抗战最为伟大。列宁格勒是苏联防务的支轴，德国人在一开始进军时未能夺取该城，“巴巴罗萨”计划就输掉了它始终无法挽回424的一着。棋局开始时一着走错，就会打乱以后的全局战略。正如赫尔莫特·冯·毛奇所说，“初期战略部署的错误，在战争的以后阶段中无法纠正”。

可是这一点当时局外人是看不清楚的，他们大多数人都觉得苏联似乎不能幸免。

冯·包克的集团军群沿着当年拿破仑的路线向莫斯科进攻，一开始取得一些胜利，德国人自称7月10日在明斯克打了一个大胜仗，俘虏了三十二万三千人。铁木辛哥被迫于7月17日撤出斯摩棱斯克市区；斯摩棱斯克战役一直继续到8月7日，双方都损失惨重。德国人自称获得大胜，俘虏三十一万人，可是他们为这场胜利，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并且直到10月2日为止始终处于守势。

在二千英里前线的南段，俄国人的情况最糟。冯·伦斯德的集团军群在安东尼斯库将军率领的罗马尼亚军队配合下，于8月8—11日在基辅以南的乌曼周围大战四天，打败布琼尼元帅，摧毁苏军二十五个师并俘虏十五万人。希特勒为这一胜利所惑，于8月21日下令抽调中路集团军群的几个装甲师来加强北线和南线的两个集团军群，以分别夺取列宁格勒和基辅。对基辅的进攻成功了。该城于9月20日陷落。德国人宣布俘虏六十六万五千人，缴获大批战利品。希特勒声称他打胜了“世界史上最伟大的一仗”。他的新闻局宣布俄国已经完蛋。可是他的军事顾问们的想法却不同。

基辅战役在战略上作出错误决定的影响，对那些矢忠竭力的战士要求过高以及彼希特勒断定“完蛋”的俄国人的准确而有力的反攻，所有这一切，加上一个极端严寒的冬天（即使按俄国的标准也算非常严寒），造成了一系列令人痛心的军事挫折。这使陆军总司令〔冯·勃劳希契〕受不了，因为他的健康一个时期以来一直在恶化，他病得很厉害，请求免除他的职务。

希特勒亲自接替勃劳希契的职务指挥德国陆军。他任用凯特尔将军为他的主要军事顾问，此人曾说过“元首不会犯错误”。除了不把莫斯科作为首先进攻的目标以及代价很高的基辅胜利以外，这是德国在对俄战争中的第三个惨重损失。

这个决定和1938年2月4日的决定一样，是致命的，在那天希特勒自己继任了布洛姆贝格的职位。那时希特勒打倒了整个武装部队的首脑，因为在这个部队里他觉察到了反对他的迹象；现在轮到陆军首脑了，陆军首脑那种425负责军人的严肃精神和希特勒那种浮夸空幻的想法形成对照。这意味着陆军最高指挥部，作为一个全体一致代表陆军利益的紧密结合的机构，从此完结。

敖德萨于10月16日沦入德军手中，斯大林诺于10月20日，哈尔科夫于10月24日，库尔斯克于11月2日，也先后沦入德军手中。这些是苏维埃事业很严重的不幸，不仅显示出俄国防务令人遗憾的弱点，而且也暴露出乌克兰居民中有不少人同情德国。德国人这时占据着顿涅茨盆地的几乎全部工业区。关于德军进入乌克兰的情况，在《概览》的另一卷中已有记述。德军非常迅速地侵占了这个共和国。俄国人直到1943年2月在斯大林格勒胜利以后才收复他们失去的一切领土。

“然而德国人始终未能完全控制乌克兰。”起初他们在许多地方受到欢迎，象是“带来面包和盐”的解放者。

可是他们极其残暴的行为和极端的无能，不久就弄得当地人都反对他们，特别是在那个臭名昭著的埃里希·科赫于1941年8月20日被任命力驻乌克兰的德国专员以后。

他和罗森贝格（德国东方占领区事务部部长）争吵的经过，他为德国“招

募”劳工，他和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对立（不管他们对德国多么友好），他对德意志人的“保护”，他对乌克兰教会的态度，以及他在整个 1942 年和 1943 年和德国东方占领区事务部部长的继续争斗，在刚提到的那卷《概览》中有所记述。总而言之，德国人错过了一个可以创立一个独立、友好的乌克兰的大好机会，反而把数以千计的可能拥护德国的乌克兰人变成怨恨的和坚决的敌方游击队。

冯·曼施泰因在 11 月里猛攻彼列科普地峡并侵入克里米亚。11 月 22 日，冯·克莱施特的军队夺得顿河畔的罗斯托夫。24 日，俄国人在罗斯托夫以西展开反攻（第一次），稍获胜利。一方面，9 月 30 日，各个装甲师已被召回中路前线，10 月初，进军莫斯科重新开始。但是为时已经太晚了。俄国在那里的阵地这时已坚固得多。朱可夫元帅已经接替铁木辛哥，担任指挥：铁木辛哥被调去替代在南路惨败的布琼尼。冬季转瞬即到。

10 月 2 日，希特勒在当天发布命令，对莫斯科展开强大的攻势。当天，德军又在维亚兹马周围包围了苏联一个集团军群，并俘虏了（据他们自称）六十万人。3 日，希特勒在他自从对苏战争爆发以来第一次对德国人民的讲话中，宣称已经有二百五十万俄国人被俘（从战事开始以来），并已摧毁或者缴获俄军大炮二万二千门、坦克一万八千辆和飞机一万四千五百架。他说，一切都按照计划进行，俄国人相应的报告则承认在战争的头四个月中有三十五万人阵亡，三十七万八千人失踪和一百零二万人受伤，而据他们说，德国人死伤和被俘者已达四百五十万人。

10 月 16 日，苏联政府把它的总部和外交使团迁移到伏尔加河畔的古比雪夫（以前的萨马拉）。斯大林和国防委员会留在莫斯科，10 月 20 日宣布该市戒严。同时，德军在莫斯科以南和以北展开攻势。到 10 月底，德军已攻占加里宁和莫扎伊斯克（距莫斯科不到六十五英里），并已达到莫斯科海—沃洛科拉姆斯克—纳罗弗明斯克—

塔鲁萨—和图拉的郊外一线。在这一带德军被遏制住了。11 月 16 日，德方投入新的兵力重新发动进攻。德军在北面达到克林—索尔涅奇诺戈尔斯克—罗加契夫—亚赫罗马—德米特罗夫—线，在南面达到图拉—卡希奇拉—

梁赞—科洛姆纳—线。钳形攻势正开始夹击那座伟大的城市。希特勒命令尽早攻陷莫斯科。可是俄国人已经在反攻——在远远的南面。11 月 28 日从德军手中收复了顿河畔的罗斯托夫。在北面，到 12 月 1—5 日，局势也明朗了，德军的进攻已经失败。德军在一条三百五十公里的战线上失败了，而且损失惨重，据苏方报道，德军死亡五万五千人，有七百七十七辆坦克、五百多辆汽车、一百七十八门大炮、一百一十九门迫击炮和二百二十四挺机关枪被摧毁或者丢失。

第一次莫斯科战役，即德国的进攻战，已经以德方失败而结束；紧接着就是第二次莫斯科战役，于 12 月 6 日开始，这是苏联的反攻战。克林和加里宁于 12 月 16 日收复，到年底的时候，德军已被迫从它在莫斯科城下的前沿阵地后撤。1942 年 1 月初，严冬来临。1 月 20 日，俄国人收复莫扎伊斯克；1 月 22 日，德军失去在莫斯科城下的最后一个阵地乌瓦罗沃。到 1942 年 3 月，德军已被迫后退一百英里，第二次莫斯科战役和第一次一样，以俄国胜利而结束。德国对苏联的入侵还要继续再打三年，可是“巴巴罗萨”计划已经完蛋了。

正如丘吉尔所指出的，这是德国的闪电战第一次遭到了完全的失败。莫斯科、列宁格勒和顿河下游牢牢地掌握在俄国人手里。俄国军队打得空前地出色。按俄国标准也算是很冷的严冬已经逼近——纳粹军队对这种严冬没有充分准备。“自动武器失灵：飞机和坦克的发动机无法发动。德军士兵冬季服装不足，冻得半僵。”

附录：英国和美国对苏联的经济援助

1941年6月至12月

在丘吉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三卷中有很多关于英美对苏援助的资料。丘吉尔一方面完全承认苏联的抗战“挫败了德国军队的威力，并使德国国家生命力受到致命的损伤”；另一方面他也指出，有一年多的时间，俄国作为一个盟友，对英国政府来说，似乎是一种负债，而不是资产。

从7月7日开始，丘吉尔在以个人名义发出的电报中，不仅竭力把斯大林作为盟友，而且还作为朋友看待，供给他情报资料并保证立即提供飞机（虽然这意味着严重的牺牲）、长统靴和橡胶。他谈到，作为回报，他得到的是“多次碰钉子和难得的一句客气话”。

对苏联政府来说，它和英美两国合作远不如和纳粹德国合作来得够味。苏联和纳粹在精神上的友爱要亲近得多；可是希特勒本人这时逼得苏联去做的事，恰恰是斯大林在1939年3月不肯做的事，那就是，为西方国家“火中取栗”。为了遏制德国的前进并同时削弱西方的军事力量，斯大林从7月18日起一方面勉强感谢西方的帮助，一方面不断地要求开辟第二战场。为了求得军事和经济的援助，他呼吁西方作出同等的牺牲。英国政府方面，在原则上不反对开辟第二战场。我们知道，最后夺回欧洲已经是英美联盟的长期政策。可是在1941年7月，美国尚未参战；让英国单独承担在法国北部登陆，一定会招致不幸、浪费资源、白白地牺牲生命，徒然使德国造成一次军事上的成功。或许1942年7月8日袭击第厄普而遭到损失是必要的，以此向俄国人证明情况确是这样。然而丘吉尔（第4卷，第459页；美国版，第4卷，第511页）说，袭击第厄普一事对于减轻俄国的压力起了一些作用。

俄国人对于西方之迟迟不开辟第二战场，直到1944年6月为止始终愤愤不平，使这个奇异的同盟又增添了一股说不出的苦味。

1941年底以前，俄国的抗战就已十分受益于英国和美国的支援。关于迅速派遣军事代表团（麦克法兰、迈尔斯和科利尔到莫斯科；戈利科夫到伦敦和华盛顿），上文已经提到。7月8日，驻华盛顿的苏联大使奥乌曼斯基已经向美国政府提出一项所需物资的计划，其中开列三千架驱逐机、三千架轰炸机、二万门高射炮、五万吨甲苯以及大量的航空汽油和润滑油，共计价值大约十八亿五千万美元。连美国也应付不了这样的数量，尽管总统本人渴望给苏联一切可能提供的物资。

租借物资管理局督办哈里·霍普金斯在这个问题上总统的主要顾问。德国入侵苏联的消息于6月21日（北美时间）传到美国时，他在国内。英美两国军事当局的想法是，德国武装部队入侵俄国的战役，最少一个月最多可能三个月就会结束。但至少它转移了英国原来受到的眼前威胁；丘吉尔和罗斯福开始同意帮助俄国抗战。霍普金斯第一次得到关于这次抗战可能真正有效的暗示，是在7月初来自约瑟夫·E·戴维斯；此人曾任美国驻429苏大使，对苏联能力的估计比大多数英美人士为高。7月13日，霍普金斯因一项紧急任务奉派赴英国去会晤丘吉尔。在英美对俄国的情况、它的需要以及它

能否生存下去的前景，未曾更充分了解以前，伦敦会谈显然是不全面的。丘吉尔建议道：“哈里，你为什么不去〔莫斯科〕代表我们大家去看看呢？”7月25日，霍普金斯请总统同意他访问苏联。他于7月27—28日的夜间动身赴苏，7月30日到达莫斯科，当天下午6时30分和斯大林第一次会见。此后两天中，他和这位苏联独裁者——整个俄国政府中只有他愿意提供任何重要的情况——作了亲密的个人会谈。

霍普金斯本人是一位对盟国事业贡献很大的杰出人物，他取得了这场战争中一项最重大的突破。他突破了俄国人层层设防的保密措施，从一切资料的最终源泉取得一份对苏联的情况和前景的详细说明。霍普金斯这次访问的重要性，不管怎么强调也不为过份。他说服了斯大林这个多疑的人相信美国（和英国）愿意帮助，他还须说服英美两国政府相信俄国有决心并且有能力打胜，尽管英美政府仍然先入为主地认为俄国的抵抗不久就会崩溃。这是赢得了这次战争的英俄美同盟的基础。

在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中，霍普金斯得到了关于俄国军队的兵力和装备的详细资料。斯大林说红军虽然起初冷不防遭到袭击，但还能阻遏德军前进。据斯大林说，战争开始时，俄国人已经有一百八十个师准备就绪，可是其中很多都在远离阵地的后方。德国人用了一百七十五个师进攻。到7月底，他们大概已经投入二百三十二个师，并且最后能动员三百个师。相应地，俄国人在7月底有二百四十个师在前线，二十个师作后备。斯大林相信，到1942年5月，他能动员三百五十个师。他的第一需要是轻型高射炮；第二需要是制造飞机所要用的铝；第三需要是机关枪；第四需要是步枪。他也希望在开展春季战役以前尽可能多买进坦克。他不相信已在交通和崎岖道路上遇到严重困难的德国军队，在9月1日雨季开始以后还能长久采取攻势。他认为在冬季几个月中，战线将在莫斯科、基辅和列宁格勒前面，距离此刻的战线不过六十英里左右。斯大林的预测在细节上过于乐观，可是实质上是正确的。他说，假如美国肯宣布准备和德国交战，也许不放一枪就可能使希特勒战败。霍普金斯于8月1日离开莫斯科——“疲惫不堪”，象丘吉尔4日在发给罗斯福的电报里说的那样。他回国后，也为在俄国所看到的那种独裁统治的性质而闷闷不乐。

霍普金斯访问的直接结果是派遣哈里·比弗布鲁克代表团前往莫斯科（1941年9月28日至10月6日）。可是在这以前，作为罗斯福—丘吉尔在纽芬兰附近海面上会晤的结果，“体现战争目的的大西洋宪章”于8月14日已向全世界广播了。这两位操英语的政治家联名打电报给斯大林，建议举行一次关于物资分配的会议。8月16日，克里普斯和米高扬（对外贸易人民委员）在莫斯科签订了一项贸易和贷款协定。9月4日，英国政府提供第一笔一千万英镑的贷款，利息百分之三点五，期限五年。9月24日，苏联驻英大使迈斯基在圣詹姆斯宫中举行的盟国间会议上宣布，苏联政府“同意大西洋宪章的基本原则”。

〔他说〕苏联的对外政策过去和现在都以民族自决原则为 431 指导方针……〔并〕保障各民族的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权利，保障它们有权利建立它们自己认为合宜的和必要的那种社会秩序和政府组织，以便更好地促进其经济和文化的繁荣。

丘吉尔在启程会晤总统之前，已经决定让他的亲密朋友比弗布鲁克勋爵

主持英国方面关于美国对苏援助问题的谈判。8月底，丘吉尔从纽芬兰回来以后，比弗布鲁克奉派和艾夫里尔·哈里曼同赴莫斯科，安排关于长期物资供应的事。那时英国还不能从它自己的资源中供应多少物资，无论如何，在1942年年中或年底以前是这样。主要计划不得不是关于1943年的物资供应。

斯大林在感谢西方的这些友好表示时，并未忘记要求开辟第二战场。他建议英国可以不担风险地在阿尔汉格爾登陆二十五个到三十个师，不然就把这些军队运过波斯到苏联的南部地区。没有疑问，在9月初，苏联的形势显得十分危急。9月4日，斯大林电告丘吉尔，俄国人已经失去半个乌克兰，德军正在威胁列宁格勒。在乌克兰丧失领土，意味着也丧失了原料和很多工业设备，这些东西差不多在一年以内都无法从别处补充。俄国处境非常危险，他认为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在巴尔干地区或者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并大量增加对苏联的铝、飞机和坦克的供应。斯大林接下去说，“没有这两种方式的援助，苏联将不是战败，就是被大大削弱，以致在长时期内没有任何能力对盟友有所帮助。……我深知这封信将使阁下感到沮丧。”

确实是令人沮丧的！毫无疑问，在1941年秋天，俄国的抗战已奄奄一息。到1941年11月，总生产不及6月份的一半；同时也不能指望，来自英美两国的补给品可弥补这样的亏损。1941年11—12月，莫斯科前线的军事好转是战争中第一次明显的转机；这件事实际上是有决定意义的，虽然其决定性作用在当时还不显著。关于1941—1942年下半年六个月中的俄国形势，《概览》的另一卷中有全面的评述。

在此期间，哈里曼—比弗布鲁克代表团于9月28日到达莫斯科。比弗布鲁克携有丘吉尔以个人名义写给斯大林的信；哈里曼本来也准备带一封罗斯福写的有点类似的信。据丘吉尔记述，他们受到的接待很冷淡，商谈完全不亲切友好，可是舍伍德的评论却说，这次在莫斯科进行的第一次会谈为后来的一些主要会谈树立了一个样板，那就是，一开始极其热诚；接着是不愉快，甚至发脾气、有敌意；然后融洽协调，意见一致；最后举行一次庆祝成功的宴会，不断地相互祝酒。

会议从9月28日开到30日，李维诺夫又一次充当翻译。苏联代表提出他们需要物资的清单，其中大部分要求都获得满足。会议于9月30日晚间结束。10月1日，比弗布鲁克、哈里曼和莫洛托夫签署了第一件“秘密议定书”，其中包含主要物品七十多项和医药用品八十项。根据此项协议，到1942年6月30日为止的九个月期间，英国和美国要供应苏联各项物资一百五十万吨，价值大约十亿美元，其中包括每月四百架飞机和每月五百辆坦克，还包括一千二百五十六门反坦克炮，五千辆吉普车等等。斯大林表示非常满意，并请美国代表向罗斯福总统转达他个人的谢忱。斯大林还提出其他一些问题，希望和比弗布鲁克讨论，例如：派遣英国军队到俄国，补充1941年7月12日的协议条款，包括战后时期的同盟、战争目的、将来如何对待德国、赔偿，等等。可是这些问题比弗布鲁克部无权处理。

43310月6日，丘吉尔打电报给斯大林说，他很高兴听到比弗布鲁克汇报会议成功。他通知斯大林，英国政府打算川流不息地派出护航队。每隔十大将开出一队，并且实际上有一些船队已在途中。这些船队将于10月12日和29日以及11月6日先后到达阿尔汉格爾，运去坦克、飞机、轻机关枪支架、反坦克步枪以及发射两磅重炮弹的反坦克炮——这些正是苏军非常迫切需要的东西。

德军对莫斯科的攻势已开始（10月2日）：这些援助，正象丘吉尔本人打电报给斯大林所说的，“速给不啻倍给”。

丘吉尔已于10月2日（秘密议定书刚签字以后）听说，在1942年7月和1943年1月之间，美国将每月拨给英苏两国总共一千二百辆坦克，此后每月两千辆；还有，对前线飞机的供应，在1942年7月1日和1943年7月1日之间，俄国将得到三千六百架，已经答应供给的那些除外。

莫斯科会议结束后，德军对俄国首都的强大攻势已经开始。10月15日，政府机关和外交使团迁往古比雪夫，俄国关于开辟第二战场的要求更加强烈；可是在这个战略问题上，丘吉尔不为所动。与此同时，在另一个关系重大的物资补给问题上，比弗布鲁克—哈里曼代表团活动的结果，是使苏联也可以得到租借法的援助。10月30日，罗斯福通知斯大林，价值十亿美元的租借法援助物资立即可以动用——作为一项无息贷款，分期十年偿还，于战争结束后五年开始。11月7日，罗斯福说，他已经看出苏联的防务对美国的防务有重大关系。美国代表团在莫斯科坚持的唯一条件是苏联政府应该准许它的人民有较多的信教自由。美国的舆论，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舆论都一样，在是否应该对这些自称为无神论者并确实在迫害基督教会的人们给予这样大规模的援助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很大影响。苏联当局答复说，根据1936年的宪法，宗教活动在苏联是自由的；9月30日，它取缔了《无神者》杂志，以满足美国的要求。

也许，援助的事答应容易做到难。英美两国的工厂，434 特别是美国的工厂开工不足，并且运输极为困难，不管是走北角这条路线，或者取道符拉迪沃斯托克（这条路线即将被日本人封锁），还是经过波斯，那里的南北铁路还没有为运输军用物资开放。由海道运输的物品，很大一部分在去苏联港口的途中被袭击沉没。

附录：苏联与英美以外其他国家的关系

1941年6月至12月

提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和波斯，就引起苏联与英美以外其他国家的关系问题。到1945年为止，苏联与日本保持着和平关系。在此期间，1941年签订的苏日中立条约仍然有效。日本政府即将开始征服东南亚的战争。它不想在满洲边境上也投入战争，以抵消东南亚这方面的重大努力。至于俄国进攻日本，那是不能想象的。斯大林倚仗这种彼此都需要相安无事的形势，从驻西伯利亚的苏联部队中调走了若干师的兵力；没有疑问，这些训练有素的军队及时到达，在莫斯科的防务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日本实际上促成德国的失败——以及它自己的失败——的做法之一。

苏联政府于1941年7月19日恢复和南斯拉夫流亡政府的外交关系（铁托的名字人们还没有听说过）；8月5日，莫斯科宣布1941年4月5日的苏南友好协定仍然有效。一项和捷克斯洛伐克重新建立外交关系的协议于7月18日签字。这个协议也规定在苏联领土内建立一支捷克军队。苏挪关系于8月5日恢复。比利时与苏联之间也作了互派代表的安排；9月26日，苏联政府承认戴高乐将军为全体自由法国人的领袖。

8月12日，英国和苏联会同向土耳其保证，它们固然完全理解土耳其不希望卷入战争，但还是准备在土耳其万一受到欧洲一个大国进攻时给予各种帮助和支援。435 英国政府希望，当然苏联政府也希望，土耳其——拥有五十个师英勇顽强的战士——迟早会参加同盟，帮助把德国人赶出巴尔干地

区。

苏联政府与波兰流亡政府的关系产生了一个困难重重的问题。流亡的波兰人关心的，当然是要打败德国，恢复波兰 1939 年的边界，以及救出关在德国和苏联两国集中营里的波兰人。波兰总理西科尔斯基将军和苏联驻英大使迈斯基于 7 月 5 日开始谈判。丘吉尔承认英国从一开始就左右为难。他说，谈判在“冷淡的气氛中”继续进行，可是，经过多次激烈的讨论，终于在 7 月 30 日达成一项协议，根据协议，两国恢复外交关系，并将在俄国领土上组织一支波兰军队。苏德之间 1939 年签订的有关改变波兰领土的条约，被宣告“无效”。此外没有提到边界问题。英国政府对于波兰和苏联将来的疆界问题不表示任何意见。

436 苏联和波斯的关系变得非常重要起来，因为波斯具有可以运送物资到苏联去的主要路线之一，而且这是一条安全的路线。可是德国的影响在德黑兰根深蒂固，很有力量；1941 年 7 月 17 日，韦维尔将军从印度电告，为了印度的防务，有必要立即把德国人从波斯清除出去，否则伊拉克的危机可能在那里重演。他认为英国人有必要通过波斯“同俄国携手”。苏联政府已经作好准备要采取军事行动，但只能和英国一起干。8 月 17 日，两国政府要求波斯驱逐纳粹的政治和商业代理人，这些人已经在那里活动了几年。波斯政府置之不理。于是，8 月 25 日，英苏两国军队进入波斯。英军在阿巴丹登陆，占领了炼油厂，前进到油田区。在山区有一些战斗，可是 8 月 28 日波斯人就投降了。31 日，英军和俄军在卡兹文会师，9 月 17 日共同占领德黑兰。国王已于 9 月 16 日退位，由王子继承；亲德的首相也去职，换了一位赞成盟国的首相。

德黑兰继续处于军事占领下，直到 1941 年 10 月 18 日两国入侵军都撤退为止。盟国和波斯于 1942 年 1 月 29 日达成的协议是战争的一个转折点。它不仅终于使德国的势力无法向东扩张，而且提供了一条安全的路线，通过这条路线在四年半的时期中将五百万吨补给品运到苏联。为了这个目的，扩大了波斯的港口，延长了内河航线，修筑了公路，改建了铁路。这些工程在 1941 年 9 月着手进行，虽然当时协议尚未签字。

将近 1941 年底时，在 11 月和 12 月，英国和苏联之间的两项主要争议是对协商军事问题的办法不满意，以及苏联政府要求英国和芬兰、匈牙利及罗马尼亚断绝关系。

为了解决前一个问题，丘吉尔于 11 月 4 日提出拟派韦维尔将军（他能讲俄语）和佩吉特将军前往斯大林选定的任何地点同他会晤，以“确切地”告诉他“我们的现状怎样，什么事是做得到的以及我们认为什么是明智的”。斯大林于 11 月 8 日的答复被丘吉尔评为“冷淡和闪烁的”。斯大林说，他们的相互关系之所以不明确，是由于两个原因：对于战争的目标或者对于战后的计划没有明确的谅解，以及关于在欧洲对希特勒共同作战没有一项军事协定。斯大林比先前更急于要开辟第二战场，他的作风越来越粗卤了。他说，他没有时间和两位将军谈话，除非他们来时准备就这两个根本问题缔结协定。他又责怪英国不对芬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宣战。

斯大林还希望劝诱他新交的西方朋友承认他根据 1939 年 8 月 23 日俄德协定得到的好处，就是，承认苏联吞并波罗的海沿岸三个国家、两次大战之间波兰的东部各省、布科维纳北部和比萨拉比亚，这就使同盟国的关系更加紧张了，因为这样的承认会不符合大西洋宪章，而这个宪章苏联政府本身在

1941年9月也是同意的。实际情况是，苏联政府从来就不相信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同盟能长期保持，而在英国却有许多人确实相信这种友谊会持久，美国政府则表现得仿佛它真的相信这种友谊会持久，至少在雅尔塔会议上是如此。

11月21日，丘吉尔提议，他拟派外交大臣艾登，由高级军事专家和其他专家陪同，访问苏联政府。艾登将有权讨论有关战争的各种问题，包括军事部署在内。关于战争目标，丘吉尔指出，英国的首要意图是在和斯大林“经常协商”的情况下进行战争并缔结和约；和平的第一目标必须是“防止德国，特别是普鲁士，第三次向我们突然袭击”。他认为苏联和英语国家之间意识形态色彩的不同，不一定会妨碍它们为彼此的利益“制订良好的计划”。斯大林11月23日的答复几乎是热诚的。他欢迎对方所提议的艾登来访。丘吉尔同意于12月5日对芬兰宣战，但是他向苏联政府作这一让步是勉强的，因为他仍然希望芬兰人也许会退出战争。

艾登正在因弗戈登准备登上巡洋舰的时候，接到丘吉尔亲自打来的电话，告诉他日本人于1941年12月8日袭击珍珠港的消息。艾登最初的反应是想取消此行，返438回伦敦；可是丘吉尔反对这样做，因为他认为美国的参战将加强艾登在和斯大林及莫洛托夫会谈中的地位。丘吉尔说，“我随时把消息告诉他。要讲的事很多。”12月10日，丘吉尔打电报把美国在珍珠港损失惨重的消息，以及意大利和德国实际上肯定将对美国宣战的情况告诉了他。另一方面，他能报道俄国对德军的一些显著胜利。

艾登在航海途中收到的第二份电报是告诉他，“威尔士亲王”号和“击退”号两舰的损失，使得日本人实际上控制着太平洋。“另一方面，美国的参战抵补了一切，时间和耐心一定会带来胜利。”艾登带着这些消息到达莫斯科，从12月16日起同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举行了五次长时间的会谈。到12月29日，他已回到英国。

在第一次会议上，斯大林一开始就讨论战争的目标。

他提议把奥地利恢复为一个独立国家，把莱茵兰从普鲁士分出来，使之成为一个独立国家或者保护国，并可能把巴伐利亚建立为一个独立国家。他又建议把东普鲁士划给波兰，把苏台德归还捷克斯洛伐克：重建南斯拉夫，并给它增加一些领土，这一部分领土目前在意大利手里；使阿尔巴尼亚恢复独立；使土耳其得到多德卡尼群岛（同时在爱琴海方面作一些有利于希腊的调整），可能还使它在保加利亚得到一些领土。斯大林将支持在西欧给英国一些基地——例如在法国、比利时、荷兰、挪威和丹麦。他代表苏联，要求在波罗的海三个国家、芬兰和比萨拉比亚方面恢复1941年的疆界，并使苏联在波兰方面恢复寇松线：他需要取得在罗马尼亚设置基地的便利（同时让罗马尼亚在轴心国分给匈牙利的领土方面得到补偿）。他反对索取金钱赔款，但赞成由德国用实物赔偿的原则。他表示对战后“民主国家”之间的军事同盟有兴趣，他也不反对某些欧洲国家彼此结成联邦，如果它们愿意这样做的话。

丘吉尔对斯大林想要重新兼并波罗的海三个国家的439提议极为反感；他（12月20日在赴美途中从船上）打电报给当时代理首相职务的掌玺大臣艾德礼，指出斯大林对芬兰、波罗的海三个国家和罗马尼亚的要求，直接违反大西洋宪章的第一、第二和第三条，而此项宪章是斯大林自己曾经赞同的。

丘吉尔又说，不先取得美国的同意，根本谈不到达成这样的协议，无论是“秘密的或公开的，明白的或默契的”；而且，不管怎样，在召开和会以前解决疆界问题，时机还未成熟。同一天，他也打电报给仍然在莫斯科的艾登，内容相同，但加上：“你自然不会对斯大林鲁莽行事。”艾登在圣诞节当天或者节后不久“在十分友好的气氛中”离开莫斯科。他认为他已经说服斯大林相信英国还无力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理由。

艾登回到英国时，丘吉尔已经抵达华盛顿（12月22日），参加在珍珠港遭到袭击和美国参战以后盟国间的第一次重要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起草了“联合国宣言”。

苏联政府派李维诺夫到华盛顿出席会议，赞同这一文件（虽然不是没有相当的保留，因为苏联自己和日本不处于交战状态）。“宣言”于1942年1月1日由二十六个国家签字。根据其中的条文，苏联政府及其他签字国政府重申赞成大西洋宪章的各项原则：声明它们现在从事于“在各地共同保卫人类的尊严。反抗那种妄图征服世界的野蛮、残暴的武力”；并接下去宣称它们将动用全部资源反抗轴心国的军队，直到敌人被打败为止：它们将使自己的军事努力和盟友的军事努力协调一致；决不单独媾和。

从俄德的角度来看，现在正好可以结束这段有关1939—1941年事件的记载。在1941年的后七个月中，一切已经发生变化，除了表面上德国还在胜利地朝着统治全世界的目标进军。但是实际上，对希特勒来说，胜利的局面这时已是日薄西山，德国的上空已经覆盖着危险的乌云。它的对手已经不是一个俯首听命的法国和一个显然无力的英国。它在同美国和苏联交战，这是两个虽然无法估计却是强大的国家。诚然，它的盟友日本已经加入战争，可是日本的动机既是要根除美国和英国在东亚的势力，同样也是要预防德国可能进犯那里。再说，日本虽然避免和苏联交战，而它的行动却把德国卷入对美国交战。诚然，德军已经席卷了半个俄国；但俄国的抗战并未崩溃，没有发生反对苏维埃政府的叛变，而且苏联的人力无穷无尽。苏联的生产——虽然受了损害——不是不能恢复，它已获得牢靠的保证，可以从英国以及从美国的巨大资源中得到重要的补给，并已获得一条安全的路线，可以通过波斯把这些物资运到手。

到1941年底，盟国距离打赢这场战争还远，可是德国已经输定了。

第七编美国和欧洲战争 1939 年 9 月至 1941 年 12 月 康斯坦斯·霍华德

第一章 441 法国沦陷前

第一节 友好的中立

(一) 美国宣布中立

1939年9月3日晚间，罗斯福在一次著名的炉边谈话中，对美国人民广播了一项特别通告，简略地论述了美国在一个战乱的世界中的立场。他说，美国将保守中立，可是他不能要求每一个美国人在思想上也保持中立。“即使中立者也有权利考虑事实。即使对一个中立者，人们也不能要求他闭塞自己的思想或良心。”他预告他的同胞们，他们将受到战争的重大影响。“只要有什么地方和平遭到破坏，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和平都受到威胁。”美国必须行动起来，维护它的安全；美国的安全和西半球以及邻近海域的安全有密切关系。同时，他再一次说他希望并相信有可能不卷入战争，并且保证“只要我力所能及还能防止战争，在美国和平之光决不会熄灭”。

两天后，总统正式向全世界宣布美国中立。第一次公告笼统地讲中立，四小时后接着发布第二次公告，宣布禁止对交战国输出武器。同时国务院指出，人们应注意两次公告的区别。它说，第一次公告是谈我们根据国际法的准则和程序以及本国法令中和国际法一致的准则和程序，作为一个中立国的活动。即使法典上没有1937年5月1日的立法，这一公告也会按照442习惯法予以宣布；它同美国在以往国际冲突中所发布的中立声明大体上是一致的。

第二次公告以1937年的中立法令为根据，这一法令，可望国会不久将加以修改。9月6日，罗斯福宣布联邦调查局将负责调查间谍活动、怠工破坏和违犯中立条例的行为。8日，总统宣布全国处于有限的紧急状态。他深知这种公告对爱好和平的公众可能产生的影响，因而在记者招待会上极力说明这并不意味着使美国立足于战争，无论在防务上或者在国内经济上都不是这样。然而，这可以使总统实行几项简单的紧急措施。公告的标题——全国紧急状态公告（关于遵守、保护、执行中立以及在和平时期的权力范围内加强国防的公告）——确切他说明了它的范围。实行第一项紧急措施的总统命令立即颁发。命令规定增加陆军和海军部队，提供遣送海外美侨回国的经费，以及增添反间谍和反破坏机构的工作人员。这些措施的根据是1939年7月陆海军联合委员会通过的联合基本“陆海军作战计划虹1号”，这个委员会是战争爆发后经罗斯福正式批准的。

政府一方面采取这些步骤以保持美国本身的中立，另一方面也采取一些步骤来巩固整个西半球的中立。在布宜诺斯艾利斯（1936年）和利马（1938年）召开的美洲国家间会议上，各国曾一致同意，如果别处发生战争，威胁到美洲国家的和平与安全时，美洲国家应共同商量。因此1939年9月5日向二十一个国家的外交部长发出邀请，定期于9月21日在巴拿马城集会商讨。会议议程先由泛美联盟管理委员会于9月12日批准，分为三443个部分，包括中立、保护和平与经济合作。外长会议于9月23日开始，25日举行第一次全体大会，10月3日休会；

会议批准了一项内容广泛的计划，包括十六项决议案，以维护美洲的中立。内容包括：重申美洲国家间的团结，一般地声明中立并规定中立国的权利与义务，对违禁品的规定，以及防止颠覆活动的措施。成立了一个美洲国家间财政与经济咨询委员会，负责考虑如何稳定美洲各共和国之间的货币和

商务关系，并就如何应付由于战争而发生的美洲各国的贸易失调提供意见；并成立了一个美洲国家间中立委员会。中立宣言里虽然再次强调美洲各国继续保持和平的决心，可是对其中规定的中立国的义务，却以偏袒英国和法国的态度作了总的说明。会议最受人注意的结果是第十四号决议案——“巴拿马宣言”，它创立一个“安全区”，目的在于使西半球周围的海域免于战争，加拿大以及那些毫无疑问属于欧洲国家的殖民地和领地”除外。这一宣言是罗斯福亲自倡议的，它声明美洲各共和国，只要保持中立，就有“天赋权利”要求交战国不使美洲附近的水域发生任何敌对行动。

这种安全区又称中立区，将由各共和国进行巡逻。

（二）修订中立法

罗斯福面临的问题是怎样说服孤立主义思想仍然很浓厚的全国人民接受那些对美国安全十分重要的措施，其中最主要的是要使英法两国能从美国获得武器的措施，因为根据中立法的规定，这两个国家这时是不能从美国取得武器供应的。而美国和西半球的安全有赖于英法两国和法国的继续存在，这一信念却是美国战略思想的一项公认的原则。这是陆海军最高统帅部在“陆海军作战计划虹1号”中提出的建议所根据的主题思想，也是战争爆发后影响美国外交和国防政策的一个基本因素。然而，这些都是假定英国和法国单凭本身的海军和空军就能抵抗得住德国的进攻，美国毋须考虑直接参战（不论作为交战国，或者甚至作为非交战国），便可摧毁纳粹在欧洲的统治，这种统治会造成轴心国对西半球的直接威胁。

美国的舆论几乎是普遍地反对纳粹而同情英法。但是，这种舆论在决心使美国置身战争之外这一点上，甚至更坚决地一致；人们经常争论，只有这样做，民主的传统——它在战争的紧急关头一定会消灭——才能保全，西方文明才能最后在世界上复兴。美国人必须保持和平，可见，只要这个和平不受到威胁，他们这时准备放宽中立法令，以使英法在美国购买武器——或者说，情况看来是这样，如果报纸和民意测验充分地反映了公众意见的话。1939年7月间，国会最后拒绝取消武器禁运令以后，罗斯福曾表示，如果在1940年1月下届例会召开以前战争爆发，他要召集一次特别会议来重新考虑这个问题。战争爆发后立刻进行的一次国会议员调查，使他相信国会终于准备对修订武器禁运法令作有利的考虑。

于是，9月13日他发出公告，将于9月21日召开国会特别会议。这项公告是一个信号，表明战争爆发后重新提起的关于废除中立法斗争即将加剧。9月14日，参议员博拉在广播讲话中指责废除该项法令就是干涉；16日，参议员范登堡说，美国不可能成为一方的兵工厂而不成为另一方的攻击目标。孤立主义集团的领袖们已经定下了在国会辩论中应该采取的方针，认为投票赞成废除该项法令，就是投票赞成战争。

445 同时政府也在策划它的战役。国会开会的前一天，罗斯福邀请两党领袖参加白宫的一次会议。会上讨论了修改中立法的方法与手段，罗斯福呼吁两党在紧急关头一致行动，在场的共和党人表示同意。9月21日国会开会时，罗斯福亲自出席，向两院议员发表演说。政府认为不宜明白宣布它希望取消禁运的真正理由，即援助英法符合美国的利益。任何情况，如果可能被理解为和某一些外国站在一边对抗另一些外国，一定会起一种信号作用。

促使孤立主义者纠合在一起。因此，罗斯福在演说中提出取消禁运的理

由是：恢复按国际法行事是保全美国中立与和平的最好方法。总统说，任何一个集团都没有权利自称为“和平派”；他和他的政府，在决心使国家不介入战争这一点上，和参众两院全体议员是一致的。几天后参议员皮特曼提出一项修订中立法案，由对外关系委员会研究处理，该委员会于9月28日向参议院汇报，表示赞成。此项法案保自了布卢姆法案的大多数条款，后者是以5月27日赫尔对修订中立法案的六点计划为根据的。这样，武器与弹药输出的禁运就会取消，而代之以对各种货物的“现购自运”条例。此外，指定一些地方为作战地区，禁止美国船只在这些地区行驶。这些规定如果通过，必然会给美国船运和贸易以及与美国进行贸易的其他国家带来重大困难。政府建议对航运的禁令应限于欧洲地区，皮特曼不同意；他说，他将不能使参议院同意取消武器禁运，除非也采取严厉的措施使美国不致卷入挑衅性的事件。

参议院的辩论于10月2日开始，最初几天主要讨论什么是“真正”的中立，多少有点学究气。主张取消禁运的人认为禁运是不中立的，因为它有利于交战国的一方，446而牺牲另一方；反对取消禁运的人则争辩说，在比赛的中途更改规则，这本身就是一种不中立的行为，等于偏袒某一方。赫尔在他9月21日发表的一项声明中竭力为这点辩护。然而，当发言的人转而谈到真正的问题，即援助英法时，辩论也跟着变得比较切合现实。孤立主义者之中只有少数人相信，不论哪一方战胜，对美国都无关重要。更多人同意参议员洛奇10月10日表示的看法。洛奇认为，英国和法国不大可能战败，可是，即使未必能打赢的德国竟然战胜，美国也不会受到危害。他说：“幸而我们的国家安全没有危险”。

不久情况就清楚了，议员们一般都同意“现购自运”的规定是有好处的。他们所建议的对美国商业和航运的严格限制，当然受到航运界的反对，由于航运界提出了意见，10月24日通过了修正条款，使美国船舶可以和加拿大、南非以及远东非直接危险区进行贸易。主要的争执是在取消武器输出禁令方面。孤立主义者想要对武器以外的其他输出采用“现购自运”规定，而保留对武器的禁运。他们为要达到这一目的而作的一切努力都被挫败了。此项法案，包括取消禁运在内，于10月27日在参议院以六十三票对三十票获得通过，又于11月2日在众议院以二百四十三票对一百八十一票获得通过。

11月4日，总统签署了这项使英法两国可以利用美国资源的法案；当天就发布使法案各项规定生效的必要公告。在此期间，德国政府——对它来说，取消禁运是严重的打击——在对待美国方面一直小心地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被认为不正确或者可能助长反德情绪的行动。它毕竟从禁止美国商船进入战争地区的规定中得到了很大的好处，因为此项禁令使盟国失去了全部中立国船只中很大一部分力量。

（三）做一个中立国的麻烦

在1935年至1939年的各项中立法令中，美国自动地放弃了国际法赋予一个中立国的许多权利。自由航行权的原则，美国先后于1798年、1812年和1917年为它447战斗过，现在却把它暂时抛弃了。对交战国的贸易已经加以限制。美国船舶已经从交战国周围的水域撤退。

美国人一直愿意作出这些牺牲以保持美国的和平。因此，似乎完全有理由要求西半球中立国家之间的和平交通不应受到交战国活动的危害。安全区或中立区意味着美国有权使美洲和欧洲的战事隔离这一信念的表现。著名的美国横渡大西洋的飞行家林白上校10月1日在一次演讲中把这种观点发挥得

过了分，他谴责加拿大宣战，因此连累了美洲。国会内外的孤立主义者都提议美国应没收英国和法国在西半球的财产，作为偿还战争债务的一部分，并因此消除可能危及美国中立的一个祸根。这些“和平主义”煽动者的意见固然受到国内大多数人的反对，但有许多美国人确实觉得，既然他们对欧洲战争的爆发完全没有责任，他们有理由要求交战国在它们自己家里打仗，而不要在邻近美洲的水域里打仗。

虽然美国政府曾在巴拿马会议上主张采用安全区计划，但有许多人，包括赫尔在内，却怀疑它的实际价值。它在国际法上没有效力，并且极难实施。事实上，作为最后的手段，只能由美国的船只来执行，采取一些会和它们的中立地位不相容的办法，引起和交战国的海军交锋。10月4日，赫尔明确表示，美国不打算为了保持安全区而卷入敌对行动。他说，对安全区进行巡逻，目的只是了解情况。美国船只不会干涉侵犯安全区的交战国船舶，但要把一切侵犯的行为向上面汇报，然后通过适当的外交级别来予以处理。

巴拿马宣言的起草人希望交战国会为了它们自身的448利益而同意接受宣言中的条件。实际上这些条件始终没有被正式接受；虽然盟国和德国都表示准备同意设立这种中立区，如果它们的敌方也同意，但提出种种保留条件以适合它们自己的需要。发生了许多侵犯中立区的事件，其中最惊人的是1939年12月13日在乌拉圭海岸边的普拉特河口几艘英国巡洋舰和“斯比伯爵”号的战斗。12月23日，美洲各共和国向交战国政府提出联合抗议。在这个照会里，它们抱怨说，“斯比伯爵”号的开火以及中立区内其他类似战争的事件危害了巴拿马宣言的目的——本洲的自卫，并扬言要对进犯国家实行制裁。然而，不久情况就清楚，美洲各国对于采取激烈行动来强求别国尊重中立区这种做法是否明智或者相宜，意见并不一致。问题于是提交巴拿马会议所设置的“美洲国家中立委员会”。委员会随着进行了详尽的讨论，提出了一些实施措施的建议，提交有关美洲各共和国政府，可是随后并未采取明确的行动。

在美国，公众对普拉特河交战的消息的反应，说明人们对侵犯中立区的担忧已经消失，因为这一事件证明了英国海军仍然保持着昔日的力量和战斗精神，使人感到高兴和自豪。三艘英国巡洋舰战胜强敌正是时候，可以恢复美国对英国海军战略的信心，在过去几个星期中，英国海军的战略曾被严厉地指责为只守不攻和保守的。

中立区是美国政策中的一项新事物，英国侵犯这个中立区并不使普通美国人太担心。中立国和交战国在公海上种种互相冲突的权利中孕育着其他争论大得多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发生，会扰乱英美的关系。从战争开始起，显然这种困难一定会出现。美国政府牢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英争执的严重性质，决心尽可能避免同样的摩擦。

英国宣战后次日，赫尔和英国驻华盛顿大使洛西恩勋爵就讨论了怎样才能最好地避免英国航运政策和违禁品政策可能引起的麻烦。他们议定于9月12日举行一次美英专家会议；在这次以及此后的几次会议上制订了处理这种问题的计划。结果两国之间的意见分歧始终没有变得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那样尖锐。

11月间，英国宣布决定没收中立国船上装载的德国出口货，作为对非法布雷的报复，并于12月1日采用中立国船舶特准运照制度；这一决定的最初反应是冷静的。对英国干涉德国出口货，美国于12月8日向英国政府提出正

式抗议，声明美国的海上权利，可是人们一般地认为这只是“备案”而已。

随着时间的消逝，西线没有任何活动的迹象，于是美国人对于这种“假战”越来越感到讨厌和不耐烦；“假战”这个词是参议员博拉创造出来的，后被人们广泛使用。由于没有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在进行——只有俄国和芬兰之间有一些战斗，而这两个国家在当时的主要斗争中表面上都是中立国——大多数美国人还看不出，英国和法国正在为了生存而斗争。因此，盟国——特别是英国——强加于美国商业的种种限制越来越使人恼火。1939年最后几个星期和1940年最初两个月中，美国同英国在海上中立权利方面的意见分歧，在美国引起不少公众的愤怒，并使政府气恼和焦虑，感到左右为难，不知怎样才能最好地维护美国的权利和利益，而又不过分妨碍英国的战争力量或者加深公众的反英情绪。美国政府对英国采取的一些措施曾提出正式抗议，英国人在答复中不承认检查中立国邮件中是否有违禁品是违反国际法，450并指出信件和邮包中都有货币和其他贵重物品寄到德国公众虽然对这一点没有疑问，但他们对一些封锁事件所表示的愤慨情绪却在继续，并于1940年2月达到高潮，当时《纽约时报》和其他一些亲盟国的报纸都发表了美联社的一则报道，指责英国人在百慕大用武力从美国民航飞机上取走邮件。在同一个星期中，一向同英国友好的参议员皮特曼，在广播演讲中扬言要对英国侵犯美国权利的行为进行经济报复。

美英两国政府对于这种日益高涨的反盟国情绪可能会影响战局，深感不安。赫尔和洛西恩多次商谈后，盟国政府决定派遣经济专家到华盛顿去协助英国和法国的驻美大使研究整个局势。除了实行封锁所造成的一些事件以外，盟国经济政策的其他各方面在美国也引起了麻烦。美国南部和中西部的一些州，由于英国对购买烟叶和其他农产品的限制而受到了严重打击，正在迫使国务院采取行动。在国会里，英国被指责为歧视美国的出口货，并有人提出质询，英国的战时贸易政策是否违背它1938年同美国签订的贸易协定。美国政府当局特别担心英国对进口的限制可能影响它争取延长贸易协定的期限。反对赫尔的贸易政策的人，包括来自一些农业州的议员，认为战争的结果已使商业陷于混乱，贸易协定延长也无

济于事。赫尔担心，如果英国不肯放松它对农产品的禁令，经济孤立主义者可能有获得胜利的大好机会。对党派的影响也须考虑到，因为法案如不能通过，有关方面怨恨政府不能保护农业州利益的情绪，可能会断送民主党在1940年选举中的前途。

英国政府担心有不少重要物资通过毗邻的中立国家由美国辗转运到德国。英国人要美国在原有的“战略物资”禁运单上增加若干种物品，并加上“不得再输出”的条款，以加强禁运。

英国和法国的专使，F·T·A·艾什顿-格沃特金和夏尔·里斯特教授于3月5日到达华盛顿。在此后七个星期中，由经济战而产生的这类问题由盟国代表、美国国务院以及美国其他有关部门商谈研讨。艾什顿-格沃特金和里斯特一面说明继续封锁德国是必要的，一面保证施行的限制办法只是暂时性的，一定要尽快恢复自由贸易政策。英国代表还重申了张伯伦1月31日已经作过的保证，英国不想永久利用战时管制使贸易渠道离开美国，象美国商业界常常指责的那样。同时，作出种种努力来抚慰美国特别不满意的某些方面。英国代表作出让步，同意美国可以自由输入某些在别处买不到的德国货。在邮件检查方面也作了一些让步，英国人还同意将来不把美国船押送

到战斗地区的港口。

所争论的各项问题不久就失去了意义，因为希特勒 1940 年 4 月入侵挪威和丹麦以后的胜利进军，使美国看清楚了自己面临的危险以及支援英国作为“美国第一道防线”的重要意义。

第二节 和平倡议与战后计划

上节讨论的各种中立措施，主要是为了避免美国被拖进战争的危险。当然，政府和人民都同样希望避免战争；可是，广大公众还没有认识到任何其他的美利坚利益受到威胁，而政府却早已相信美国政策的积极目的必须是确保西半球的安全不受侵略的危害。当局已经下定决心，认定这一目标对美国利害关系非常重大，它与保持和平相比，最后必须占优先地位，假如形势使这两个目标不再能两全的话。根据这种情况，罗斯福预料到在纳粹的侵略面前，美国也许不可能无限期地保持和平。因此，他谋求加强美国和整个西半球的防务，同时在与美国的中立地位以及全国的孤立主义情绪不相抵触的范围内帮助欧洲的民主国家。在国外，美国政府致力于防止战争扩大，以及使战争尽早结束。当局的长期目标是在健全和持久的基础上建立和平。

（一）对 1939 年 10 月间德国和平倡议的反应

虽然美国政府不久就开始认识到最后这两个目标——眼前的和平与公正而持久的和平——是矛盾的，可是美国公众却不是看得那么清楚。尽管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暴露了德国种种野心的真正性质，有许多美国人——象许多英国人在 1938 年那样——仍然执拗地相信，也许进行一些较小的领土调整，就有可能在此基础上和希特勒谈妥条件。由于这种信念，德国在战胜波兰以后发出的和平试探在美国有相当大的反应。德国报纸提出了一些含糊的建议，说罗斯福不妨出面调停；美国国会议员以及部分报界和公众都作出了响应。10 月 4 日，参议员埃德温·约翰逊已在国会里提过一项议案，主张总统和其他中立国家合作，提出恢复和平的倡议。在 10 月 6 日希特勒的演说和德国报纸的宣传以后，由美国出面调停的主张得到更多人的拥护。10 月 9 日又有人提出建议：参议院应暂时停止关于中立法法的讨论，并体会三不，同时由罗斯福进行谈判。一次民意测验显示，有百分之六十九的人盼望和平谈判。

罗斯福和赫尔都极力抑制这种不合时的热衷于和平谈判的情绪，并否认曾接到任何交战国提出任何正式请求。虽然确实没有接到正式请求，德国却通过美国驻柏林代办亚历山大·柯克作了非正式的接触。10 月 7 日，柯克电告，德国已向他建议，罗斯福可以利用希特勒的演说作为提出和平倡议的基础，两天后他又说，据告希特勒将欢迎美国主张休战与和平谈判的提议。罗马尼亚、比利时和芬兰政府也通过美国驻布加勒斯特、布鲁塞尔和赫尔辛基的代表，建议罗斯福提出和平倡议。美国政府讨论了这个问题以后，确认在当时提出任何这种建议都是不合时宜的。显然，希特勒准备接受的只能是让他保有一切征服成果的和平。因此，在这种时刻举行和平谈判，只能有利于德国，因为，如果盟国拒绝考虑希特勒的条件，继续战争的责任将落在它们身上。在比较有利的时机到来之前，美国政府不愿强求和平。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却在多方考虑，怎样在战争结束时建立稳定而持久的和平。

（二）战后计划

罗斯福在 9 月 3 日的广播演说中曾表示，在讲和的时机到来时，美国将是一个有利害关系的国家。赫尔在元旦发表的声明中，以及罗斯福于 1940 年 1 月 3 日在他一年一度致国会的新年祝词中，都大大强调，美国政府相信，

在建立稳定而持久的世界秩序中尽一分力量，对美国来说十分重要。国会议事日程上的主要议案中，有一项是主张贸易协定法再延长三年。罗斯福和赫尔都相信，自由贸易政策是奠定持久的世界和平基础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美国的限制贸易政策是造成目前这场战争的一个原因。因此贸易协定法的延长是必要的，它使美国政府对战后经济建设和国际福利能作出充分贡献。争取延长期限的运动，已经由赫尔于1939年12月5日在芝加哥对美国农场事务局联合会发表演说时开始，罗斯福在他一年一度对国会的演说中对此给予有力的支持。在委员会举行多次听证会以及两院长期辩论以后，国会同意授权总统再签订贸易协定三年。

1月8日，赫尔宣布，国务院已成立了一个以韦尔斯为主席的顾问委员会，负责研究海外战时措施的影响以及和平时期调整的种种问题。

美国政府一方面在国内为美国参加缔造和平做这些准备工作，一方面也努力和其他希望和平的中立国家建立有效的合作。罗斯福在国外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和梵蒂冈取得联系。和教廷建立关系的打算在1939年夏季454已经开始，美国驻罗马大使威廉·菲利普斯曾奉令探询教皇是否欢迎这样做。当菲利普斯汇报说梵蒂冈将乐于接待美国代表时，罗斯福决定任命迈伦·C·泰勒担负此项使命。12月23日，总统致函教皇，正式通知派遣他的私人代表，“为了有助于我们双方并行不悖地谋求和平的努力以及减轻世人的苦难”。总统写道：“虽然现在不能预言将采取什么行动或者在什么时候行动，但是，我们促进世界各地具有共同目标的人们——宗教界和政界的人们——之间更密切的联系，还是合适的。”在迈伦·泰勒2月16日启程赴罗马以前，总统对泰勒说，他一直在考虑和平赖以建立的一些基础，就是，宗教自由、通讯自由、贸易自由和裁减军备。罗斯福还嘱咐泰勒探测早日结束战争的可能性。

2月9日，赫尔宣布，美国政府已开始和其他中立国政府就建立健全的国际经济制度和在世界范围内裁减军备的和平问题，进行非正式的对话。在他的声明中，赫尔要求人们注意讨论的范围：战时问题不包括在内，讨论只涉及战后的安排。这些暗示表明政府正在准备在拟定和平解决的办法中起一种积极的作用，大多数美国人欢迎这些暗示，虽然有少数人反对任何对欧洲事务的介入。

他们的意见由《芝加哥论坛报》（1940年1月14日）简单明了地表达出来：“战争不插手，和平不染指。”

（三）韦尔斯赴欧洲的使命

至于在这个时候提出和平倡议是否明智，人们的意见更不一致，官方和非官方的圈子里都是这样。赫尔坚信1939年10月政府曾同意的那些反对和平倡议的理由在1940年1月同样有效，罗斯福和韦尔斯却不是那么确信无疑。虽然罗斯福并不真正相信，在纳粹未打败以前就可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和平，但是他也觉得，不可忽视即使是最微小的机会，以说服交战国进行谈判，以免战争发展到更激烈的局面，引起仇恨，而使公正合理的和平不可能实现。这个时候似乎已经不远，因为来自欧洲的信息455预示，德国将在春季发动攻势。1月初，罗斯福决定派韦尔斯为特使，前往德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就达成一种合理和平的可能性探询四国政府的意见。罗斯福2月9日关于派遣使团的声明中说，韦尔斯仅仅去了解情况，他没有受权代表美国政府提出建议或者承担义务。

尽管发表了这个声明，韦尔斯的欧洲之行在国内和同外都引起大量的谣

言。3月间，继俄芬和谈和里宾特洛甫访问罗马之后，紧接着就是韦尔斯第二次访问意大利首都，当时盛传韦尔斯此行的结果将是罗斯福提出和平倡议。3月10日，参议员皮特曼发表广播谈话，呼吁休战三十天，以便进行调解。盟国担心美国或许会施加它的影响，不惜任何代价来求得和平。它们又担心，拒绝考虑和平计划可能使美国人对它们不满，从而减少美国人对它们的事业的同情和支持。为了辟谣，罗斯福于3月16日发表演说，申述他认为公正的和平所必须具备的道义基础，一方面赫尔和韦尔斯向报界发表声明，重申代表团的使命纯粹是了解事实。

韦尔斯于3月28日返抵国内，次日交给罗斯福和赫尔一份关于欧洲之行的详细报告，这个报告表明，眼前没有希望取得以合理条件为基础的和平。他和希特勒、里宾特洛甫及戈林的会谈，使他相信，除了根据纳粹的条件，没有媾和的可能。这些条件就是德国在东欧和中欧的霸权，以及交还德国以前的殖民地。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部对他说，盟国一心要摧毁德国，不到这种意志本身被摧毁，他们看不出有和平的希望；只有通过德国取得彻底而全面的胜利，才能做到这一点。韦尔斯认为，这时没有什么能制止德国人，也许除非他们相信美国将加入民主国家一边。

韦尔斯说，虽然法英两国政府都向他保证，在德国被打败之前，它们的抗战决不会动摇，可是他从伦敦和巴黎带回的印象大不相同。法国的政治家是失败主义者，被德国的武力所慑服，另一方面，他觉得英国人意志坚定，决心对希特勒抵抗到底。

他对罗马的两次访问令人失望。他和罗斯福原来都希望墨索里尼仍然可能受到美国的影响而改变主意，特别是如果他认识到合作和非交战的状态会给意大利带来经济上的利益。韦尔斯说，墨索里尼未尝不愿意看到经过谈判来实现和平，可是，如果战争继续下去，他大概会把意大利卷入战争。意大利人民绝大多数反对卷入战争，但可惜决定权掌握在墨索里尼一个人手中。韦尔斯于3月16日第二次访问罗马期间，墨索里尼和齐亚诺都对他说，他们相信德国人很快就要发动一次全力以赴的军事攻势。

罗斯福接到韦尔斯的报告以后，发表一项声明说，虽然没有“在欧洲立即建立一种公正、稳定而持久的和平的希望”，但韦尔斯获得的资料，在建立这种和平的时机到来时，将有很大的价值。同时他指示美国最高统帅部重新研究世界局势以及美国介入战争的前景。4月9日，陆海军联合计划委员会提出报告，此项报告成为以后几个月中扩大西半球防务措施的行动基础。

第三节 同中立国和非交战国的关系

美国政府在这一时期奉行的对中立国和非交战国的各项政策，旨在推进同一个目的，即防止战争扩大。因此，它注意避免采取任何可能促使苏联、日本或意大利同德国结成更密切联盟的行动。

（一）苏联

因此，1939年9月17日俄国入侵波兰时，罗斯福未曾宣布俄国为交战国并执行中立法。官方的行动只限于1939年10月2日发表了一项声明，表示美国不承认这种对波兰的重新瓜分，将继续视流亡的波兰政府为合法政府。俄国在随后几个星期中同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所订的协议，仍然让这些国家的政府表面上掌权，所以不发生美国采取外交行动的问题。到了芬兰的独立显然也受到威胁，而芬兰——不象波罗的海三个国家——准备抗拒俄国要求的时候，罗斯福接到芬兰和瑞典两国政府的请求，要他运用

他的力量，劝使苏联政府不要在波罗的海地区再进行侵略。虽然罗斯福回答说他没有这种力量，但他最后还是同意于10月11日向加里宁主席发出呼吁，并和美洲的其他共和国一起致电参加斯德哥尔摩会议的斯堪的纳维亚各国政府，表示支持。

10月16日，罗斯福收到加里宁的答复，其中所提条件说明俄国不肯改变它的方针。

在此期间，美国因它自身的问题正和苏联政府发生纠葛。问题起因于一艘美国货轮“弗林特市”号被扣留在摩尔曼斯克。“弗林特市”号于10月9日被德国人捕获，押到特罗姆塞。当挪威当局命令该轮立即离开时，德国的押船员把船驶往俄国港口摩尔曼斯克躲避，在那里停泊了将近一星期。美国政府指出，扣留该轮是违反海上战争条例的。按照规定，被捕获的船只有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才可以押送到一个中立国的港口，如果在这些情况已经不存在时，该船仍未离开，就应将船归还给它原来的船员，对押送的船员必须扣留。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斯坦哈特提出抗议，苏方置之不理，也不让他和美国船员会面。

经过美方施加了很大压力，直到10月28日，苏联当局才命令该船离开摩尔曼斯克，但仍由德国的押送人员控制。

国务院要求苏联政府说明它这种行为的理由，但只得到不能令人满意的和托辞推委的答复。虽然十分明显，苏联政府始终和德国串通一气，美国政府认为最明智的做法是不再追究这个问题。

458 俄芬谈判在莫斯科破裂以及俄国于11月28日宣布废除它和芬兰的互不侵犯条约以后，美国政府向莫斯科和赫尔辛基提出，它愿意居间调解。芬兰接受这一建议，可是俄国置之不理，并于11月30日开始战争行动，对赫尔辛基进行猛烈的轰炸。12月1日，罗斯福发表声明，谴责“这种用武力解决国际争端的新行动”，并于同日向苏联政府和芬兰政府发出呼吁，敦促双方避免轰炸平民。12月2日，禁止对犯了轰炸平民之罪的国家输出飞机的道义封锁——此项禁令已经对日本实行——开始对俄国实行。制造飞机所需原料也列入禁运物资之内，12月15日，禁运物资又增加钨和铝两项。

此外，召回在俄国飞机工业中工作的美国工程师，以示对俄国不满。

最后一次要使苏联政府赞成温和政策的努力，是在1940年3月间在莫斯科开始和谈以后。斯坦哈特于3月间同莫洛托夫进行的一次会谈中明白表示，美国能否继续供应苏联一些十分需要的商品，或许要决定于俄国向芬兰提出的媾和条件的性质。

美国政府对俄国采取外柔内刚的策略，不大受美国公众欢迎。苏联政府在美国向来极其不受欢迎，除了在战前一段比较短的时期以外，当时那一小批鼓吹苏联的共产主义者曾受到大多数自由主义和左翼舆论的支持。8月23日的俄德协定，使后者大为震惊和困窘，虽然有些左派分子仍力图为俄国的行径辩解，说英国和法国逼得它没有其他办法。9月间入侵和瓜分波兰，接着又威胁波罗的海三国和企图任意践踏芬兰，增加了美国对俄国的敌意。“弗林特市”号事件以及莫洛托夫在10月31日的演说中攻击美国的政策，更是火上加油。莫洛托夫批评罗斯福干涉俄芬关系和批评取消武器禁运法案，在459 美国引起严重的不满。对取消禁运的非难，被认为是企图影响美国国会议员，使他们反对取消禁运。一个不受欢迎的外国政府竟然想要影响美国人，这种笨拙的做法，没有疑问是造成最后有很多票数赞成取消禁运的主要原

因。

一个月后俄国进攻芬兰，使美国国内的反俄情绪越发高涨；俄国几乎受到普遍的谴责，只有很少为它辩护的人，敢于委婉地说俄国的行动是出于战略需要。强烈主张政府和俄国断绝外交关系的一片呼声立时掀起。当政府不肯听从这种意见时，1月间，美国国会复会后，就有人提议不批准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经费。2月间，一项这样的提案仅仅以三票之差未得通过。

美国人对俄国的愤怒十分激烈，同时对受到俄国之害的国家的同情也十分深切。这种同情第一次的具体表现是罗斯福12月5日宣布的决定：把芬兰每年应该摊还的债款转入暂记帐，俟以后归还。在这一姿态之后，又于12月10日宣布对芬兰贷款一千万美元，以购买农产品和其他民用供应品。美国各地举行群众大会和游艺会，为前任总统胡佛所设立的芬兰救济基金筹集款项。

美国红十字会送去医药用品和救护车，芬兰退伍军人协会为芬兰前线招募志愿军。一时盛传即将给予芬兰一笔贷款，使它能购买军用物资；国会于1940年1月3日开会时，议员们提出几项议案来实现这种援助。然而，到了这个时候，公众已有充分时间考虑过由官方给予贷款购买武器对美国中立地位的种种关系。美国人虽然对芬兰的苦境仍然深切关注，却不准备使他们的中立受到危害。最后决定再给芬兰一笔贷款，只供购买非军用物资。

1月16日，罗斯福写信给参议院议长和众议院议长，要求460增加“进出口银行”的贷款周转资金，以便帮助芬兰购买剩余农产品和工业品，但不包括武器。可是，甚至这种温和的援助办法还受到孤立主义者的严厉攻击，他们争辩说，芬兰即使并未宣战，事实上却是一个交战国，因此贷款将违反中立立法的精神和意向。他们也怕这笔贷款可能被视为先例，并贷款给盟国。

辩论持续了六个星期，直到2月28日——俄国和芬兰签订和约前十天——国会才最后通过再贷款二千万美元的议案。

（二）日本

在战争的最初七个月中，美国和日本的关系没有出现任何引人注目的大事。美国政府和先前一样，力图避免任何可能助长日本国内好战派气焰的行动，同时继续致力于维护西方在中国的权利并支援中国政府抵抗日本。

由于英法两国陷入欧洲战争，在中国维护西方权利的重担几乎完全落在美国身上。日本人在1939年9月想利用当时的局势把西方国家撵出日本在中国的占领区，这一企图遭到美国政府的坚决反对。它告诉日本政府，日方意欲强迫法国和英国武装部队撤退的任何行动，在美国将被认为是走向消灭西方势力的具体步骤，并因此而产生对日美关系不利的后果。赫尔又明白表示，在任何情况下美国军队决不会撤退。

幸而，日本由于未能使它在中国的战争胜利结束以及由于德国同俄国和好，因而不能充分利用欧洲战争给它提供的机会。日本的处境还有一个弱点，就是，它依靠从美国输入重要原料。这样，美国虽然在物质上和心理上461都不准备用武力约束日本，却掌握着一种强有力的经济武器。必要时动用这一武器的准备工作，已经在1939年7月间做好，当时美国政府曾通知将废除1911年的贸易条约。到1940年1月25日条约满期时，美国可以采用两种经济战的方法。它可以对输入的日本货征收差别性关税，或者对出口到日本去的物资实行禁运。

美国政府指望，日本急切希望避免这些惩罚，也许会缓和它企图在东亚

强制推行“新秩序”的步骤。然而，到12月中旬，情况已经明显，日本政府虽然亟望缔结新的贸易协议，可是只愿或者只能作出微小的让步以应付美国的要求。因此，赫尔于12月20日指示格鲁通知日本外相，在日本未能明确地证实它愿意承认美国的权利以前，决不就新的贸易协议进行谈判。他并要格鲁附带说明，目前暂不对日本货征收差别性关税。贸易关系仍按照以前的办法继续下去，但只是过一天算一天。未来的关系变幻无常，犹如达摩克里斯的利剑悬挂在日本的头顶上，使它不敢肆无忌惮地任意作恶。

因为采取这种政策，国务院切望国会不要制定禁止对日输出的法令。但在11月初，参议员皮特曼就说，除非和日本的关系有所改善，他相信国会将通过他在7月间所提的议案，授权总统对输往日本的美出口货实行禁运。11月26日，他重申他要催促实行禁运：“在代表美国同日本打交道时，我认为没有任何理由要采取绥靖的行动，甚或作绥靖的表示。我们甚至现在就会被指责为一直在犯绥靖的错误。”

皮特曼的提议在国会和在全国都得到不少人的支持。1940年1月10日，美国不参与日本侵略委员会主席史汀生写了一封措辞强硬的信给《纽约时报》，敦促国会通过这种悬而未决的议案中的一项。主张禁运的报纸462中，包括这样一些同床异梦者，象亲盟国的《纽约先驱论坛报》和竭力反对美国支持欧洲民主国家的《纽约每日新闻》。2月间公布了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的结果，它表明一般公众中有三对一的多数赞成停止向日本输出战争物资。当然，有这样多的人赞成禁运，并不意味着美国人愿意和日本打仗。假如他们曾想到实行禁运意味着冒战争的风险，那么赞成禁运的大多数一定会缩减到很小的少数。这大多数人也没有认真考虑到，既须有一种相当坚决的对日政策，又须避免那些可能加强日本国内好战分子的地位而不利于温和派的行为，要在这两者之间保持平衡，必然在外交谈判上有微妙为难之处。

那些认为实行禁运可能导致战争或者至少可能使日本扩大侵略的人，以及商界人士，都反对禁运。商界自然不愿意遭受损失，再加上害怕英国商人将由于美国竞争者被迫退出对日贸易而获得利益，这种不愿意的心情就更加强烈了。

当参议员皮特曼和施韦伦巴赫所提的议案于2月间送交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时，显然委员会里对禁运的利弊意见不一，正反两派势均力敌。在这种情况下，委员会就把政府的希望作为决定性因素，并无限期地推迟对这些议案的进一步讨论。

虽然政府认为不宜在这个时候绝对不许日本在美国购买战争物资，然而通过道义禁运而不卖给日本的货物品种还是增加了。1939年12月15日宣布对飞机和飞机零件的道义禁运扩大范围，把制造飞机所需要的原料包括在内，这是针对俄国和日本两国的。但12月20日的扩大禁运范围，包括用于生产高级航空汽油的一切设备，则是特别针对日本的。日本意识到美国的这种用意，这从它在1月6日致美国政府的抗议照会中可以看出。

美国政府决心继续抵制日本人想要统治中国的企463图，这表现在3月间它对国成立汪精卫傀儡政府的反应，以及3月7日由联邦贷款管理局宣布的再给蒋介石贷款二千万美元的决定。

美日关系中这段比较平静的时期已经将近结束。不久，德国在欧洲的胜利，给日本提供了一个好机会，重新开始它的侵略行程；日本为了取得对荷属东印度的控制而采取的头几个行动，使得美日关系在1940年4月和5月间

又紧张起来。关于荷属东印度的地位问题，是 1940 年 6 月为了设法制止日美关系急剧恶化而在东京开始的一系列会谈中格鲁和日本外相讨论的内容之一。

（三）意大利

在战争的最初六个月中，美国政府希望意大利政府不会改变它声明过的意向，不介入欧洲战争。美国政府也觉得，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加上意大利可以从保持和美国的良好关系中获得的经济利益，使美国政府有可能影响意大利的政策。因此，罗斯福在 1940 年 1 月接见意大利大使科洛纳亲王时，强调美国对于意大利决定保持中立感到满意，并表示殷切希望这种政策继续下去。

2 月间韦尔斯动身赴欧时，罗斯福仍然认为有可能说服墨索里尼相信，意大利的最大利益在于继续中立。韦尔斯的访问会格外有意义，因为墨索里尼已经同意亲自接待他，虽然他已有一年以上不肯接见美国驻罗马大使菲利普斯。韦尔斯 3 月间和墨索里尼的会晤，使他相信墨索里尼不打算放弃扩张意大利领土的野心，而且如果只有通过站在德国一边去获得胜利，才可能实现这些野心的话，那么一旦出现有利的时机，他就会强使他那些不愿这样做的同胞加入战争。

4 月间德国攻势的开始，标志着意大利的“非交战状态”之最后阶段的开始。随着德国的胜利日益扩大，问题已经不是墨索里尼是否会介入，而是他将于什么时候介入。

4 月 12 日，在希特勒入侵挪威成功以后，非利普斯报 464 号说罗马的气氛“动荡不安”。一星期后，罗斯福收到他派赴梵蒂冈的特使迈伦·泰勒两次来电。泰勒说，梵蒂冈切望罗斯福设法劝墨索里尼不要参加战争。教皇准备作同样的努力。英国政府也发来电报，建议罗斯福可以尝试劝墨索里尼置身于战争之外，即使仅仅目前能这样也好。罗斯福犹豫一番以后，接受了教皇的建议，于 4 月 29 日打电报给墨索里尼，指出战争的任何扩大一定会给全世界带来影响深远的后果。他说，没有人能预言结局如何，或者还有一些什么国家——不管它们怎样爱好和平——会为了自卫而不得不参加战争。

墨索里尼的答复不能使人高兴。他说，在意大利和德国的要求得到满足以前，和平是不可能的。他还说，既然意大利不在美洲多管闲事，因此希望美国也不要干涉欧洲的事务。

罗斯福接到非利普斯来电，说齐亚诺这时估计意大利不加入战争的可能性已经大大减少；他于 5 月 14 日又向墨索里尼作第二次呼吁。墨索里尼迟至 5 月 18 日才答复，第一次明确地承认他打算参战。他说，意大利是德国的盟友，并准备继续保持这种关系。欧洲的命运还在未定之天，意大利不能离开它的岗位。

随着德军所向无敌地席卷低地国家并横扫法国，希望罗斯福采取行动的提议越来越多，而且是各式各样的。美国大使布利特从巴黎转来人们的种种建议：有的要美国总统请教皇以逐出教会来吓唬墨索里尼；有的要美国派遣大西洋舰队访问希腊；有的要美国在发生战争时禁止意大利移民从美国汇款到意大利去。达拉第建议美洲所有的共和国联名发出呼吁；英国政府提出，美国应对运往意大利的战略物资实行禁运。美国政府不准备派一部分舰队去地中海，因为它认为有必要把全部海军力量留在太平洋，以防备日本。同时

它不相信，没有武力为后盾的虚声恫吓能使墨索里尼改变方针。

5月25日，丘吉尔和达拉第提出一种更为切实可行的办法。即由罗斯福请墨索里尼把意大利对英法两国在领土问题上有什么不满之处通知他。如果墨索里尼同意465保持和平，盟国政府愿意考虑任何合理的要求，准备于战争结束时加以解决。意大利将被接纳参加和平会议，和交战国处于同等的地位。罗斯福同意，并于26日根据这些方针又打电报给墨索里尼。他许诺，如果意大利政府同意讨论条件，他将要求英国和法国保证它们忠实地执行所达成的任何协议，只要意大利也保证不加入战争。墨索里尼连谈判也拒绝考虑，他说，这种谈判不“符合法西斯主义的精神”。

罗斯福于5月30日给墨索里尼发去最后的电报。这一次他说，意大利一旦参战，美国将加速它自己重整军备的计划并加借致力于供应盟国可能需要的一切商品和战争物资。他还提醒墨索里尼注意美国在地中海的利益。墨索里尼在他的毫不妥协的答复中最后声明，任何进一步的压力只会使他的态度更加强硬。6月10日，意大利政府对英法两国宣战。向理智的呼吁以及所谓美国可能在某个时候参战那种含糊的恫吓又失败了。只有美国肯定进行干涉，才有可能使墨索里尼不加入战争。

同一天，6月10日，罗斯福在夏洛茨维尔的弗吉尼亚大学演讲时，回顾他为了劝墨索里尼不要介入战争所作的努力，并严厉谴责意大利政府的行动是“手持匕首朝邻居的背上戳进去。”

第四节国防和对盟国的援助

（一）国会对防务议案的态度

战争爆发后几天之内宣布的全国处于有限紧急状态，使得罗斯福能够立即增加海军、正规陆军以及国民警卫队的编制实力，尽管增加得不多。

在年度预算于1940年1月4日提交国会时，罗斯福要求增加对陆军和海军的拨款。在附带的咨文中，总统说，防务预算（刚好不足二十亿美元）是“发展和维持我们466正常的防务准备工作所需要的费用。鉴于当前的世界形势，防务预算也包括陆军部与海军部、海岸警卫队、司法部以及巴拿马运河所需要的紧急费用。”

虽然这种防务预算在当时的情况下是非常有节制的，但在美国的和平时期历史上却是最高的，而国会和全国人民仍然具有和平时期的心理。还必须记住，1940年是选举年。增加支出，就必须征收新捐税或者提高联邦公债的限额。许多国会议员不准备在他们的选举人投票以前采取这些不受欢迎的措施。因此他们决定要节约，而防务预算正是最方便的目标。它是国家预算中最大的项目，不受公众欢迎，并且没有一个强大的压力集团作为后盾。结果，海军和军事拨款议案经委员会审查后，原来的预算数字被大大削减。尽管马歇尔将军和三军的其他主要代表根据事实加以说明，但是巴拿马运河新建一座船闸、在阿拉斯加建设一个空军基地以及改进关岛港口等工程提供经费的一些项目，还是从预算议案中被取消了。众议院拨款委员会2月29日声称，它认为巴拿马运河船闸不是“一项迫切的防务需要”。马歇尔后来在提起这一段时期时，写道：“希望进一步加强美国武装力量的要求，竟被许多方面认为完全是贩卖战争。”

除了对海军的固定拨款以外，政府还请国会批准进一步扩充海军力量。1940年1月8日，海军作战部部长斯塔克海军上将在致众议院海军事务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主张海军力量增加百分之二十五，并立即计划和着手执行。

此项增加，还有 1938—1939 年度业已获准增加的部分，主要是为了使太平洋上美国舰队和日本舰队的力量对比恢复到五对三的比率，同时留有余地，使一部分海军力量可以用于加勒比海和西大西洋。提议增加海军力量，显然是根据这样的假设，即英法两国的舰队 467 能控制东大西洋和地中海。斯塔克知道这种情况可能不是长久不变的，也许有必要再增加力量。然而，1940 年美国的造船设备不是立刻可用，也无法取得国会的同意；3 月 12 日众议院通过一项修正案，只批准增加百分之十一，可以说明这一点。

扩大海军的议案和军事供应的议案都到德国的春季攻势开始以后才在参议院展开讨论，那时支持这两项议案的人希望这些议案能比较顺利地获得通过。这种希望仅仅实现了一部分。4 月间，在斯堪的纳维亚遭到入侵以后，关于建造巴拿马运河船闸的措施恢复了，海军拨款议案也于 19 日由参议院通过。但是，最后通过的拨款仍然比原来预算中要求的少得多。斯塔克未能说服参议院把众议院所批准的增加实力百分之十一提高到海军原先提出的百分之二十五，尽管他提醒参议员们这样的扩充是必要的因为日本正在大造军舰，将使两国海军的力量对比“令人不安地接近”平衡。反对派争论说，不必要再提高，因为已经批准的计划还没有完成。政府在 1 月间已试图解决这方面的困难，当时海军部长要求国会授予他特别权力，以控制工厂、原料和船舶，从而加速造船计划的进度。此项建议遭到多方反对，海军部不得不把它收回。于是，4 月间，斯塔克告诉参议院海军事务委员会，他准备接受 1940 年批准的只增加百分之十一的拨款，因为这是到 1941 年 6 月 30 日为止可能动工建造的最大限度。然而，他暗示在这个限期以前还会要求进一步大大增加拨款，并暗示在一年内造船能力一定要提高到需要的程度。

直到 5 月间德国发动了闪电战，国会和全国人民才真正看清他们面临的危险。以往决心对外部世界保持孤立的那些美国人，突然发现这个世界正在从四面八方来包围他们了。荷属西印度、格陵兰以及西半球的法属领地——对美国防务有重大关系的地区——这时由于它们的宗主国已经沦陷或者即将沦陷而得不到保护。假如 468 法国瓦解，英国能否单独支持下去还很难说。假如英国舰队溃败，美国就不得不面对艰巨的任务，以“一个洋”的海军保护其大西洋和太平洋两面的战线。

在此后那些闹哄哄的日子里，许多美国人认识到，不仅他们在西半球未必能免于袭击，而且，如果受到袭击，他们的防御手段也不足。三军领导人在国会委员会紧急防务立法的听证会上作证时，向国会清楚地说明了美国武装部队的弱点。类似的作证以前也有过，可是没有被重视。这时共和党和民主党的议员联合起来要求立即采取行动。这一次，总统为美国重整军备而要求的拨款，毫无异议地全部获得通过，并且在某些方面，国会甚至增加了原来要求的拨款数目。

5 月 16 日，罗斯福又要求额外拨款，为数共计将近十亿美元，用于购置为增强陆军和空军实力而必需的配备，以及使原有的配备现代化，并增加生产设备。5 月 17 日，已由参众两院通过的海军拨款议案在会上被收回，把 16 日罗斯福要求的款项加进去。5 月 23 日，这项修正的议案在参议院获得通过，没有一票反对。军事拨款议案，也经过修正进而包括了罗斯福所有的要求以后，同样地一致通过。这些议案很快获得众议院同意后，分别于 6 月 11 日和 13 日成为法律。

两星期后，5 月 31 日，罗斯福再一次要求拨款十亿美元以上，用于“根

据防务需要迅速扩大装备和训练的计划”。他说欧洲冲突两星期以来一些几乎难以置信的事态发展，使得有必要再扩大美国的军事计划。没有人能预言未来的情况，可是，只要存在各大洲都卷入一场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就必须使美国的防务更加可靠。6月22日，国会完成了关于一项追加防务拨款议案的手续。到6月23日国会因为共和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而休会一星期时，已经通过的防务拨款（包括批准的合同在内）达五十亿美元以上。6月22日通过了一项为应付额外支出469的防务财政议案。该议案规定可以征收新税并把国家公债的限额从四百五十亿美元提高到四百九十亿美元。在这些措施以外，又计划大大扩大海军舰艇的建造。海军力量增加百分之十一，曾是2月和4月间长期辩论的问题。到6月份，国会已经准备建立一支巨大的舰队。6月17日，由于法国舰队可能投降而受到刺激，众议员文森提出一项议案，要求规定美国海军力量再增加百分之二十四。这一议案第二天就被一项更雄心勃勃的计划所取代。原来，斯塔克向海军事务委员会提出一项计划，要使美国海上力量增加百分之七十，以提供一支“两洋”海军。此项建议，加上先前的一些海军造船议案，使1921—1922年华盛顿会议给美国海军规定的力量差不多增加了一倍。这个计划旨在使美国舰队具有充分的实力，可以单独应付潜在的敌对海军国家在各地海洋上可能结成的任何联盟。到1946年，美国将拥有任何强国从未有过的最大的海军。它将由七百五十艘战斗舰艇组成，总共约有三百七十六万吨。

批准这一庞大的新计划的议案于6月22日由众议院接受处理。两小时以后就一致通过，并转送参议院采取行动。

此后总统提出的为美国防务增加经费的要求，国会都是以同样的随时准备接受的精神予以同意。

（二）对盟国的援助

虽然罗斯福和其他有远见的美国人认识到使美国的资源用于援助英法的重要性，美国政府的手脚却被孤立主义占上风的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时所制定的立法捆得牢牢的，以致在战争的最初几年，美国不得不花很大的气力来摆脱这些枷锁。

对盟国援助的第一个障碍于1939年11月4日被消除，那天罗斯福签署了修正的中立法，取消了输出军火给交战国的禁令。这样就打开了一条通道，起初是少量供应的涓涓细流，在以后几年中却汇成了一股洪流。

在战争的头两个月中，为英法制造飞机和武器的美国厂商，在国会禁运采取行动以前，已根据盟国原先的订货单继续生产。禁运一经取消，马上就恢复交货。1939年11月19日，洛克希德公司制造的五架轰炸机用人力推过毗连加拿大的边境，因为，根据当时的法律，美国和交战国的飞行员都不准驾驶飞机越过美国国境运往交战国。以后还有许多飞机由这条路线交货。一个月后美国派第一批飞机专家到英国，协助装配英国政府购买的飞机。

修正的中立法通过后三天，一个由阿瑟·珀维斯领导的英国采购委员会在美国成立。法国的一些采购代理机构合并成为一个单一的代表团，由让·F·布洛赫—莱内负责。12月6日，罗斯福任命一个联络委员会，帮助执行外国的采购计划。这个委员会由陆军部和海军部以及财政部采购司的代表组成，归财政部长摩根索领导。

1940年1月，作为盟国各采购代表团之间的协调机构而建立的“英法采

购委员会”，得到罗斯福和摩根索的承认，同时美国政府各部门都奉命在它们的职权范围内给予一切协助。

法国沦陷以前，美国对盟国的援助规模比较小。美国工业还没有调整得可以进行大规模生产；直到1940年3月，英国政府本身也避免大量定货，因为它首先注意要节约自己的美元储备。3月份以后，才有数量大得多的定单：1940年上半年，英国和法国订购了八千多架飞机和一万三千多只引擎，而两国从1939年1月1日到1940年6月30日订购的飞机总共为一万零八百架。1940年的头四个月中，实际上只有一百零四架飞机运往英国和五百五十七架运往法国，可是，对于增加美国的生产能力，这已经是一个有益的开端。英国和法国为在美国建立新工厂和购置设备，以及举办训练学校培训美国工人方面，花了很多钱。

盟国的定货单在促进美国工厂生产能力方面的重要意义，在美国不为人们所普遍了解。很多人认为盟国的采购会妨碍美国自己的防务计划。所以政府于3月间决定让471英国和法国购买P40型新式柯蒂斯战斗机——在这以前一直是保留给美国武装部队专用的——在国会里曾引起一场小风波。参众两院中都有人要求对政府的出口政策进行调查。反对出售飞机和其他武器的人所根据的三点理由是：外国购买武器会延迟美国武装部队有效地装备起来；会泄露军事秘密；以及外国购买武器会提高美国政府在本国军备方面必须支付的价格。罗斯福在3月19日的记者招待会上为政府的政策进行有力的辩护。他指出，国防的基本要素之一是生产飞机的能力，并强调盟国的定货单在增进这种能力方面的重要意义。同时他保证飞机装配方面某些应该保密的技术决不让外国客户知道。陆军部长以及马歇尔将军和阿诺德将军在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军事委员会作证时也持同样的论点。在听了陆军部的证词以后，委员会的成员同意政府对飞机解禁的政策是符合国家利益的，因此不需要进行调查。也有人试图以修正防务法案的方式阻止对盟国出售武器；可是这些都被轻而易举地挫败了。

4月，陆军部同意对更多种类的新式战斗机和轰炸机解禁，让盟国购买。

德国在欧洲的节节胜利，固然使得美国实际上全国一致地拥护政府的重整军备计划，但是没有结束美国国内在援助盟国这一问题上的争论。相反地，德国的胜利对这种争论的影响，是使它愈演愈烈。除了那些认为欧洲的事与美国无关的孤立主义者顽固派以外，还有另一些人，他们惧于这场灾难发展之快和范围之广，这时觉得已经来不及挽救英法了。象美国驻伦敦大使那样，他们认为如果美国必须为自己的生存而打仗，那还是在自己的后院里打为妙。因此，他们争辩说，比较明智的办法是不要再把武器送到英国和法国去，而留着一切东西保卫美国。幸亏罗斯福的看法不同。由于他深信盟国的继续存在对美国的安全关系重大，所以他决心在力所能及的472范围内采取一切办法鼓励它们继续斗争。也幸亏时间对总统有利，因为，孤立主义者的争论尽管一时更加喧嚣和激烈，最后注定会被事态的发展压下去。

在此期间，罗斯福的力量也有限，无法给盟国充分的援助，以满足它们当时非常急迫的需要。在德军于5月13—14日突破色当以后，法国政府向罗斯福作了多次令人心碎的呼吁，请求支援。雷诺说，法国或许还可能挽救，如果罗斯福对德宣战，把大西洋舰队和美国所能出动的飞机都调到欧洲去。罗斯福不得不拒绝。他无权宣战，即使他当时愿意这样做也不行，因为只有国会才能作出宣战的决定。美国舰队的主力在太平洋，以控制日本，至于那

小得多的大西洋舰队，又需要用来保卫美洲的东线。美国“没有大批的飞机”可以派往欧洲。英国政府也来电要求美国帮助，其语气虽不象法国那样急不可待，却几乎同样的迫切。5月15日，丘吉尔要求罗斯福宣布非交战状态，他说这种非交战状态就是“除了不实际派出武装部队参战外，将尽一切力量帮助我们。”他要求的援助包括借用四、五十艘驱逐舰、最新式的飞机和其他军需品——弹药和原料。他还建议美国派军舰访问爱尔兰的港口和新加坡。一个月后，为了避免法国政府投降，丘吉尔要求罗斯福“尽量使美国进行最大限度的干涉”。丘吉尔和雷诺两人都指出美国本身处境的危险，如果法国和英国竟然瓦解的话。

罗斯福本人对于在那种情况下美国将面临的危险是完全了解的，所以他担心法英两国舰队的命运，并极力使

盟国领导人保证他们的舰队在任何情况下决不会交给德国。可惜在这紧要关头，他无能为力，因为在1940年夏天，美国在物质上和心理上都还没有作好打仗的准备或者冒打仗的危险。凡是可能做的事都做到了。罗斯福公开地和秘密地都请英法两国政府放心，美国政府一定尽一切可能加速运交物资。同时他决定搜集美国所有可以动用的武器，立即运往欧洲。当时唯一可以动用的武器是美国陆军和海军的库存，可是，根据国际法，中立国政府不得向交战国政府出售武器。然而，由于私人这样做是合法的，政府就把剩余的武器卖给厂商，由它们转卖给盟国，这样就能克服困难。主管部门造具了库存的武器和弹药清单，由马歇尔将军于6月3日批准。这笔物资将售予美国钢铁公司，再由该公司转卖给英国采购委员会；有关的谈判以最快的速度进行。最后的合同于6月11日签字。这时物资已经从美国全国各地的陆军仓库和军火库集中起来，堆积在驳船上和格雷夫森德湾的码头上，有英国船等在那里装货。第一艘满载的船于6月13日由该湾开出，23日到达英国。除了这些步枪、大炮和弹药的供应以外，陆军还让出九十三架攻击型轻轰炸机，海军也让出五十架柯蒂斯·赖特轰炸机，这些轰炸机经作价卖给厂商，用以抵偿当时尚在生产中的新式飞机的部分价款，然后由厂商再卖给盟国。可惜这些飞机很少能有幸到达目的地。大多数（一百零六架）被装上了停泊在哈利法克斯的法国航空母舰“贝尔恩”号，于6月17日开出，这正是法国投降的那天。“贝尔恩”号奉达尔朗的命令驶往马提尼克岛，在那里该舰及其所载货物注定将停泊三年之久。美国人不让英国人夺取或者破坏“贝尔恩”号以及停泊在马提尼克的其他法国军舰，德国人则不许法国人同意美国的建议，把飞机交给英国和把船只送到美国去扣留在那里。

法国在美国的军需资产，由于英法采购代表团的团长们及时采取行动，得免于同样的命运。6月16日，珀维斯签署了文件，承受法国在美国的军火合同，价值共达474亿美元。

6月间运给英国的剩余武器，其价值不能仅仅从物质方面来衡量。这些东西虽然在数量和质量方面都受到限制，但是对一个在法兰西战役中耗尽了武器的英国来说，却是如饥得食。这也是美国政府决心帮助英国打下去的一个具体证明。罗斯福准备这样做的心意，于6月10日在夏洛茨维尔的一次演说中向全世界宣布了：“我们将实行两项明显的和齐头并进的方针；我们将把本国的资源援助那些反抗暴力的人们；同时，我们将适当使用和迅速利用这些资源，以便我们自己在美洲可以有充分的装备和训练，能够应付任何事变和各项防务的要求。”

第二章从法国沦陷到罗斯福重新当选

罗斯福 6 月 10 日的政策声明，被许多评论家正确地理解为标志着美国同战争的关系中的一个新阶段。它表明美国迈出了第一步，从善意的中立转变到同那些仍然在抵抗轴心国侵略的国家站在一起，成为它们的一个非交战国盟友。它已经走上了这条路，以后自会慢慢地而且是必然地进入完全交战状态，还会使它不得不担任它至今力求避免担任的角色，即起主导作用的世界强国。

这些结果，事后可以看出是无可避免的，但在 1940 年夏天，大多数美国人对之还不十分了然。然而，他们确实感觉到美国有危险，必须迅速而彻底地重整军备。1940 年 5 月和 6 月国会的行动，证明了举国上下都已承认有重整军备的需要。在这两个月中，国会和全国人民已经猛然觉醒，看出他们处境的危险。在某种程度上，美国政府和全国人民一样，也抱有安全的幻想。在德军席卷低地国家以前，它曾假定战争发展的方向将不外乎三者之一。结局可能是盟国胜利，或者双方僵持不下，通过谈判媾和。华盛顿政府曾经估计过的第三种可能性是，德国由于战争准备比较好，可能取得一些初期的胜利，但法国和 475 英国，在马其诺防线和实力没有遭到损伤的英国舰队的保护下，将能坚持下去，直到受到美国工业的支援，能够扭转局势为止。因此美国政府假定，当西欧民主国家在军事上作出努力以阻止德意志第三帝国强行统治欧洲，从而构成轴心国对西半球的直接威胁时，美国毋须考虑直接参战，或采取非交战立场，更不需要进入交战状态。

但从 5 月 14 日起，在华盛顿情况变得越来越清楚，自从战争爆发以来支配着美国政策和防务战略的这一假定是站不住脚的。德军在色当突破以后，欧洲战局的演变已经要求美国政府必须迅速改变计划和政策。美国政府在法国覆灭以前那几个星期乱纷纷的日子里所采取的行动，即在上一节里所谈到的罗斯福提交给国会的防务咨文，提出两洋海军计划以及运送武器到英国，这一切都说明了美国政策和防务战略中的新趋势和新行动。政府政策的主要宗旨——使美国为一切突然的事变作好准备，以及对反抗暴力者以非交战国的身份给予援助——已经由罗斯福在夏洛茨维尔说出。修订防务战略的计划，体现在 1940 年 6 月批准的关于扩大西半球防务的一项新的联合“陆海军作战计划虹 4 号”中。

为了实施这些政策，美国的武装部队和生产设备都需要大量增加。

第一节战备计划：重整国家军备

（一）武装部队

1940 年 5 月和 6 月间，罗斯福、陆海空三军以及新任命的国防顾问委员会拼命地研究美国面临的危险和因德国采用新的作战方法而有必要加以修订的各项计划。

德国在欧洲的闪电战，证明了飞机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性。总统在他 5 月 16 日致国会的咨文中和在后来的一些建议中，特别强调必须发展一支占压倒优势的强大的美国空军。他提出美国当时的飞机产量应增加二十倍，以便满足英国及其盟友的需要，并使美国自己的空军 476 力量增加十倍。这就要求每年制造至少五万架战斗机，以及日后使美国的空军力量发展到至少有五万架飞机的战斗力。

飞机专家立即被召集到华盛顿，研究这项庞大计划的可能性以及它可能

对美国工业的影响。1940年5月25日，柯蒂斯·赖特公司的副总经理T·R·赖特报告，五万架飞机的计划需要五年左右才能完成，并需要将飞机工业扩充大约百分之四百。赖特建议，鉴于需要大大扩充，此项计划应分三个阶段进行，可能第一阶段以海军空中力量五千架飞机和陆军空中力量两万架飞机为目标。

7月10日商妥的全部飞机计划是陆海军总共二万九千四百八十二架，其中将近四千架已经定了货。最后的交货日期预定为1942年7月1日。

1940年6月中旬由陆军部决定采用的经过修订的陆军计划，要求按照在二十一个月内充分动员一支四百万人的军队的规模进行生产。计划交给总统新任命的原料和工业生产顾问E·R·斯退丁纽斯和W·S·克努森，要477他们根据工业生产能力对此项计划是否可行提出意见。

造飞机八万二千八百九十架。其中有二千九百二十九架当时已经交货。其余七万九千多架中，四万二千一百二十五架分配给陆军，一万零五百九十架分配给海军，二万五千八百三十一架提供给英国政府。余下的包括商用和军用飞机，分给美国、拉丁美洲各共和国以及其他国家（同上书，第47—50页）。

克努森和斯退丁纽斯报告说，军火工业不可能扩充得这样快。于是决定集中力量在这个时期内装备一支二百万人的军队，一方面扩充生产设备以适应更多的要求。6月28日，白宫举行一次会议后，商定的计划要求如下：

（1）军需品中各项基本供应项目必须足以装备经过修订后的防御性动员计划的兵力（编制部队八十万，外加预备部队四十万），并保持这支军队处于战斗状态；

（2）库存应急的（非商业性的）物品，足以装备一支增加到二百万人的地面部队，并保持其处于战斗状态；

（3）制造各项设备，使生产能赶上军队以后每三个月再增加一百万人的速度；

（4）制造飞机一万八千架（减去已经拨款的二千一百八十一架），并创造额外的生产能力，供陆军使用。

8月间马歇尔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作证时，说这支地面部队——有“适当的空军并有海军支援”——是对北美和加勒比海地区防务的一种合理的最低限度的要求。他说，这支部队不足以“为我们在南美洲可能不得不做的事情提供力量”，但他也说不出最终可能需要什么样的力量，因为美国肩负着许多方面和在遥远地方的义务，以致必须考虑在广阔的范围内采取行动的可能性。

1940年7月10日，罗斯福要求国会再拨款约五十亿美元，以适应修订后的陆军和空军计划的需要，并执行于6月18日提交国会的扩充海军的计划。

（二）工业动员

政府在说服美国人相信需要重整军备或者从国会取得必要的经费以满足重整军备的要求方面，没有遇到困难。对政府来说，要把这些“纸上的”军备变成实际的军舰和枪炮，却是一个困难得多的任务。和平时期的工业动员会引起巨大的困难，在法国沦陷和美国参战之间流逝的一年半中的情况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如果美国准备毫不迟延地以战争的规模重整军备，那

么很显然，就需要建立某种组织，使工业能适应防务计划的需要。至于什么类型的组织是可取的或者适宜的，则不是那么清楚。在两次大战之间的那些年中拟订的“军事工业动员计划”，曾设想了一个主要的应急机构——军用物资管理局——

负责协调一切经济职能，并于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之后立即成立。然而，很明显，即使总统一向愿意按照这些方针采取行动，在一个既不处于交战状态而多数人又仍然抱有孤立主义情绪的国家中，建立一个这种性质的机构，是非常不策略的。1939年8月成立军用物资委员会引起的种种反应，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1939年8月危机期中成立了军用物资委员会，并暗示一旦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时，这个委员会将改为军用物资管理局，这件事曾引起许多批评。委员会建立的时候，消息灵通方面认为美国可能在六个星期内参战。在德苏协定签字以及日本因此受了挫折以后，美国卷入战争的危险减少了。眼前的危机已经消失，公众和罗斯福都不热中于成立军用物资管理局的计划。因此，当战争在欧洲开始时，罗斯福立即采取行动把控制权掌握在他自己手里。1939年9月8日，他宣告全国处于有限的紧急状态，同时又宣布总统办公室改组，规定“一旦国家出现紧急情况或有出现紧急情况的危险时，即应由总统决定设置适当的机构，实行紧急管理”。关于工业动员的组织计划，由军用物资委员会在1939年11月该委员会解散以前提交总统。构成此项计划的一些主张，大体上和罗斯福的主张是一致的；这个计划他以后实行了。例如，该委员会主张不要把权力集中于一个超级机构，并建议“设立少数几个机构，每个机构行使一项委托给它的战时权力，但规定各机构之间必须协调，只有在彼此之间意见不一致时，才把问题提交给总统作出决定”。该委员会479建议，一些主要的计划，暂时应该在陆海军军需委员会的主持下，由政府的其他部门合作，予以推行。

1940年夏初，由于需要大幅度增加生产，罗斯福首先采取了一些尝试性的工业动员步骤。5月25日成立了紧急战备局，作为总统办公室的一种代理机构。5月28日，罗斯福宣布重新建立一个国防顾问委员会，隶属于国防会议。根据1917年制定的立法，国防会议仍然作为一个内阁委员会而存在，总统可以放手把他认为合适的任何任务交给该委员会负责。同时宣布顾问委员会的七名委员名单及职权范围，新任命的紧急战备局的联络官被指定为该委员会的秘书。

形式上，国防顾问委员会是国防会议的咨询机构。国防会议由六名内阁成员组成，“为国家的安全和福利而协调工业和物资”；可是，实际上，由于国防会议暂时不出面活动，该委员会就成为总统的咨询机构。该委员会不设主席（除了总统本人），并不作为一个机构行使职权。“顾问”们各自对总统负责（通过紧急战备局），就各自专职范围内的问题提供意见。这个组织后来又得到扩充，6月27日唐纳德·M·纳尔逊被任命为国防采购协调委员，10月21日在国防顾问委员会下面设置了一个“优先配给局”，由纳尔逊任局长；该局应与陆海军军需委员会的优先配给小组委员会合作。各方商定，这样建立起来的一些防务机构，在它们的计划和行动中，应把英国、中国以及已对侵略国进行军事抵抗的其他国家的军事需要考虑在内。

从政府的观点来看，国防顾问委员会比拟议中的其他480个组织具有很多优点。因为它已经由法令规定，所以罗斯福不需要请国会通过立法就可以设

立。在法律上，它仅仅是一个没有行政权力的顾问小组，一开始不至于会犯什么重大错误而使以后难以纠正。既然法令没有规定要为这个委员会设一名主席，罗斯福就无须在大选的年头做这种招人嫉妒的工作，去物色一个适当的人选；并且，他作为总统兼总司令，可以把对防务的控制权掌握在他自己手里。

和平时期的工业动员是一个困难问题：罗斯福必须谨慎行事，以便保持政府各部之间以及企业和劳工之间的融洽无间，它们对于各自的本位利益都是非常重视，唯恐丧失的。再则，即将到来的大选使得他有必要避免同任何一部分美国人不和。共和党人和企业家们担心政府里的新政派也许会利用紧急状态在整个工业范围内实行一种计划经济。另一方面，很多人说，征兵入伍而不同时强迫工业提供必要的武器，这是不公平的。关于“征用”工业的争论，在对“征兵制法案”进行辩论中达到严重关头，这时候有人提出修正，使陆军部和海军部两部的部长有权强迫不听话的厂商就范。最后通过的选兵法令有一条（第九节）规定，上述两部有权征用工厂，如果它拒绝优先生产政府定货或者拒绝按上述两部规定的价格执行定货命令的话。总统下令，不得征得国防顾问委员会的同意和意见，不得采取强制行动。

然而，这个委员会主要是由企业界人士组成的，它体会到取得企业界心甘情愿的合作是重要的。企业家自然不愿意花大笔钱去建造新工厂，因为非常时期一过，这类厂就会没有用。主要由于国防顾问委员会做了说服工作，国会才通过立法，暂停实施限制特别利润的1934年的文森—特拉梅尔法令，并在超额利润法案中附加了宽大的分期偿还条款，该法案于1940年10月8日通过，成为法令。此外，由政府出钱买下一些工厂，租给私营企收。又使制造商能够向银行或者向金融复兴公司取得贷481款。

同时，确保劳工在防务计划方面合作，显然是同样重要的。任命西德尼·希尔曼主持国防顾问委员会劳工部，就是保证劳工的利益不被忽视。希尔曼的任务是设法做到有足够的熟练劳动力来满足防务计划的需要，同时要保持工业部门太平无事——这可不是件容易事，因为企业和劳工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同时有组织的劳工队伍本身也有分歧。为了实现这些目的，希尔曼在7月间成立了两个小组委员会。一个是劳力补给协调小组委员会，由政府有关就业和训练机构的代表组成；另一个是劳工政策顾问小组委员会，由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和美国铁路员工协会这三大劳工组织的代表组成。对合用的劳工技术作了调查登记，并征用职业学校以进行短期训练。还开展了在工厂中进行培训的计划。

10月间批准了一项九千一百万美元的特别拨款，作为训练计划的经费。

1940年还采取了步骤，准备必要的原料供应。7月2日通过一项立法，授权总统削减或者禁止输出“任何军事设备或者军火……或者为制造、修理或使用这种设备和军火所必需的机器、工具、原料或物品”。同一天，罗斯福宣布任命一位出口管制专员，并发出通告，明确规定某些货物和物资非持有政府特许证不得输出。实行对输出品的禁运是为了达到两个目的：除了保护防务计划必需的物资供应外，禁运也可以用作一种对其他国家施加经济压力的手段。随着战争的进展，禁运越来越被用作进行经济战的一种武器。

1939年6月7日通过的战略物资条例，为贮存物资的计划奠定了基础；这个计划现在已经扩大并且更加紧迫了。

（三）人力：征兵制法案

不仅仅在生产领域里把防务计划变成现实产生了迟延和困难。为建立新的军队提供必要的人力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国会议员们热心于投票赞成拨出巨额款项供重整军备之用，但却不那么愿意冒招怨选民的风险，通过立法以确保他们投票赞成制造的武器有人来使用。总统5月间要求国会批准召集国民警卫队，国会没有同意，正可以说明国会不愿承担这个问题的责任。在和平时期征兵是一种激烈得多的办法，然而，要建立一支具有建议中的那样规模的军队，显然非采取这种办法不可。罗斯福也不准备在这个问题上直接有所行动。由政府倡议的议案会受到国会的反对，国会总是唯恐失去它的权利。再则，在总统竞选运动即将开始以前，罗斯福也不切望承担提出一项征兵法案的责任。人们之所以设想他同意征兵的主张，也许是因为他任命亨利·L·史汀生为陆军部长，而史汀生是公开主张征兵的。史汀生在被邀请参加内阁的前一天，即6月18日，曾在耶鲁大学发表了一篇直率的演说，表示他坚信美国必须运用除了直接宣战以外的一切手段，来抵抗轴心国的侵略。他的抵抗计划包括实行普遍的强迫军事训练制度。

国会之所以提出一项征兵议案，主要是由于格伦维尔·克拉克和军训营协会会员们的倡议。5月间，该协会设置了一个全国应急委员会，由克拉克主持，提倡实行全国皆兵。由民主党参议员E·R·伯克和共和党众议员J·W·沃兹沃斯分别于6月20日和21日提出的征兵制法案初稿，就是由克拉克起草的。它得到陆军部的支持，483票和罗斯福的默认。所提出的议案要求从十八岁到六十五岁的男子全部登记，其中从二十一岁到四十五岁的人应该受军事训练和服兵役，其他的人应从事国内防务。议案提出后，在全国引起一场激烈的辩论。各种意见超越了党派和地区的界线。许多新政派人士同那些顽固的孤立主义者一起站到了反对派的阵营里去。劳工大体上是反对这个议案的，而且，在这个问题上，对抗的两大劳工组织的领导人格林和刘易斯第一次意见一致。但是，这个议案受到某些有势力的工会的支持。

反对强迫服兵役的人争辩说，这是不民主和不合美国方式的，它具有法西斯主义气味，结果会使自由的人民“军事化”。他们又说时机不适当；不是太早便是太晚——

后者的含义是假定英国即将溃败。许多人不愿放弃自愿的募兵制，他们认为这种制度还没有机会受到公正的考验。

史汀生、马歇尔和其他主张强迫服兵役的人都驳斥说，这些说法没有根据，他们坚决认为实行自愿募兵制度，不能及时地招募到足够的兵员。即使可能招满名额，自愿募兵制度还是不便进行选择并且不经济，结果会在产业界造成混乱。

就这项议案展开的辩论拖延了整个夏季，尽管马歇尔将军于8月5日警告说，在召集国民警卫队和实行强迫兵役方面如再迟延，就会严重妨害国家的防务计划。8月27日，国会同意了政府6月29日要求通过的立法。授权罗斯福召集国民警卫队在美国或者西半球服役十二个月，但国会仍然对征兵制议案有所争论。罗斯福断定已经到了必须行使他的权力来直接支持此项议案的时候了。8月23日，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同意马歇尔的警告，并且说他正在要求国会于最近两星期内通过此项议案。9月6日他再一次说，拖延正在严重地影响政府484的重整军备计划。四天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温德尔·威尔基也催促国会立即通过议案，实行征兵。

议案的最后文本于 1940 年 9 月 14 日经两院批准。规定从二十一岁到三十六岁的男子应全部登记。除了战时外，一次同时召集入伍的人数不得超过九十万，调度的范围限于西半球以及美国的海外领土和属地，包括菲律宾在内。对于征兵对象的选择有所规定，以便延期征集那些从事国家重要工作的人员。服役期限是入伍一年，退伍后编入预备役。两天后，罗斯福签署了此项法案并发布了一项关于在美国集中人力的公告。10 月 16 日，年龄在二十一岁到三十六岁的男子共有一千六百多万人作了兵役登记。同时，设立了六千五百多处地方委员会，负责甄别和挑选征兵的对象。10 月 29 日，在罗斯福的主持下举行了一次全国性的抽签，抽出号码以排定先后次序，然后顺序召集应征的人向征选委员会报到。

提出防务计划的人们原来希望征兵制法案不迟于 8 月 1 日就可通过，使新兵能在天气还温暖可以住帐篷的情况下开始训练。由于长期拖延，第一批应征士兵直到晚秋才召集。冬天就要来临，必须建造临时营房给这批新兵住宿，因此在 1941 年春天以前不可能大规模地开展训练。同时军需供应仍然十分短少，以致根据军事顾问们于 1940 年 9 月 23 日向罗斯福提出的一份可信的报告（斯特朗备忘录），当时陆军部要在战场上维持一支即使只有五万五千人的各个兵种均衡的部队，也会感到困难。尽管有这些困难和迟误，马歇尔将军还是报告说，到 1941 年 7 月，陆军已经增加八倍，拥有的兵力大约为一百四十万人。

第二节 门罗主义和西半球防务概念 485

（一）对西半球的威胁

直到 1940 年 6 月为止，美国政府批准的防务政策以及根据这些政策而制定的战略计划（例如，陆海军作战计划虹 1—5 号），除了维护门罗主义和美洲半球的防务以外，只是一般地为可能在远离本国的地区实际作战做准备，战场一面是西太平洋，另一面是欧洲和非洲。法国的沦陷以及美国担心英国可能战败或者向希特勒妥协求和，使得美国必须澄清自己的政策和战略。例如，1940 年 6 月制定的“作战计划虹 4 号”，要求于必要时派遣美国陆、空、海军部队到南美洲的任何地方，如果那里可能受到轴心国的袭击，或者发生由轴心国支持的当地运动的颠覆行为。

出”部分以南采取有效行动。经国会投票决定增加陆军和空军的实力，以及计划中的从太平洋抽调海军舰只，是为了尽可能快地（并不是希望多快就能多快）提供可能需要的额外部队，使美国当时的计划在海军和其他军种方面可以全部实现。这个计划假定轴心国针对南美的行动也许会在英国战败六个月后开始，或者在英德妥协媾和使轴心国家可以在大西洋放手行动以后。1940 年 5 月，关于德国将攫取乌拉圭的传说引起了恐慌，结果美国于 6 月间派遣两艘驱逐舰到蒙得维的亚。

罗斯福在 1940 年 5 月 16 日第一次向国会提交的紧急防务咨文中，号召要保护整个美洲半球，使其不受非美洲国家的侵略、控制或者统治。一年多以前，他在 1939 年 4 月 14 日对泛美联盟的一次演说中宣告：“美洲的和平 486 中……没有虚弱的性质。我们准备维持和平，竭尽全力保卫和平，以暴力对付暴力，如果有人企图颠覆我们的制度或者侵害我们集团中任何一个成员的独立。”在这两次讲话中，他都重申门罗主义的原则适用于整个西半球的防务，可是在 1939 年 4 月至 1940 年 5 月之间，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1940年4月19日，阿根廷政府在德国入侵丹麦和挪威的刺激下，提议美洲各共和国应该从保持中立改变为处于非交战状态，以便它们自己可以比较放手地行动。这一提议在华盛顿不受欢迎；虽然美洲各共和国，由于乌拉圭建议它们应该对于德国侵入低地国家提出集体抗议，曾于5月19日有所行动，但这只是一种无用的姿态。到1940年5月的时候，看来美国大概确实不得不“以暴力对付暴力”了，如果它要维护门罗主义原则的话。

原先在1823年宣布门罗主义时，不过是陈述美国的希望罢了。门罗总统说得很清楚，外界如对美洲大陆进行干涉，将被认为是不友好的行为，可是他没有作出实际的保证来保护美洲各共和国的独立。而且美国当时所处的地位也无法给予这样的保证。门罗主义的各项要求之所以能得到一般的遵守，主要是由于欧洲国家首先要关心欧洲本身的均势，以及由于英国海军的力量和情谊。1940年夏初，似乎这两项条件可能不久都不再适用了。欧洲也许不久就在德国的霸权之下统一起来，英国的舰队也许会投降或被击沉。在那种情况下，西半球的防务势必要靠美洲各共和国本身的力量，而且主要地要靠美国；美国潜力虽大，可是还处于重整军备的初期阶段。在拉丁美洲各共和国中，拥有陆军和海军，能够对本半球的防务贡献一点力量的国家，唯有ABC国家（阿根廷、巴西和智利），而它们是否赞成泛美集体安全政策，却完全不能肯定。虽然巴西的东北部突出地带显然是德国方面企图在美洲取得军事据点的第一目标，但是巴西在这方面处境的危险，意识也不强烈，甚至不足以消除它保卫自己的主权和独立、提防美国可能侵略的戒心。智利和阿根廷戒心更强，因为这两个共和国距离危险地点都比巴西更487远，同时阿根廷还怀有野心想谋取本地区的霸权，同美国的泛美政策竞争。

美洲防务政策的协调一致，意味着外交、经济、政治以及军事方面的合作，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这些共和国的经济利益各各不同，而且在拉丁美洲存在着害怕受美国统治的心理，甚至那些由于本身利益和亲善情谊而同美国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国家也是如此。泛美体系主要是一种理想，还不是既成事实，虽然自从华盛顿开始了“睦邻政策”以来，迭次的美洲国家间会议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增进各共和国之间的合作。随着日本和德国两国政策的侵略性越来越明显，美国政府也日益关注美洲的防务问题。所以，1936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和1938年在利马，都规定一旦西半球受到威胁时各国应进行协商，但并不承担一致行动的义务。美洲各共和国愿意讨论合作的问题，可是不愿意接受会限制它们独立行动的任何形式的政治一体化。在1939年9月的巴拿马会议上，达成一项共同执行中立政策的协议还相当容易，因为所有这些共和国在决心保守中立方面是一致的。然而，当发生要对侵犯安全区的交战国实行制裁的问题时，泛美团结的表面就出现了裂痕。由于德国在欧洲的胜利，结果对美洲的安全与完整造成威胁，美国政府面临着一项更艰巨的任务，需要立即协调美洲各国的防务政策。7月间在哈瓦那开会时，应邀出席会议的外长们需要考虑的就是这个问题。

德国想要在美洲大陆上取得立足点，有两个主要的途径。第一，它可能通过经济压力以及使用第五纵队设法在拉丁美洲某些共和国中成立亲纳粹的政府，第二，它也可能设法占领或者控制欧洲国家在西半球的领土。

（二）欧洲国家在西半球的领土和“不转让主义”

欧洲国家在西半球的领土问题，在1939年9月23日至10月3日巴拿马会议的第十六项决议中已经预见到，并且于4月间德国占领丹麦以后，对格

格陵兰和冰岛的 488 地位问题已经实际出现了。格陵兰几乎全部在西半球范围以内，冰岛则有一部分在西半球。由于冰岛议会 4 月 9 日决议行使原来赋予丹麦国王的行政权并管理冰岛的外交事务，冰岛问题的政治部分得到解决。4 月 16 日，美国政府同意和冰岛政府建立直接的外交和领事关系。冰岛安全问题的解决则是由于英国决定派遣军队到冰岛，防止它沦入希特勒手中。英国保证它的军队于战争结束后撤出，美国政府认为满意。而格陵兰和冰岛不同，位于习惯上划分的西半球范围以内，属于门罗主义的范围，因此，格陵兰的防务问题，华盛顿觉得只应由美国来处理。

同时美国政府不愿接手对格陵兰的军事保护，因为国务院担心，这可能造成一个先例，在万一荷兰被德国占领时，日本也可以攫取荷属东印度。因此，格陵兰当局请美国派遣保护性部队的建议就遭到拒绝，虽然美国政府也答应派一些海岸警卫队的小汽艇和提供一门轻炮，以保卫伊维图特的冰晶石矿，防备侵掠的船只。对于华盛顿的这种消极态度，伦敦完全同意，可是渥太华比较勉强。美国的部队直到第二年才派到格陵兰去。德国入侵荷兰以后，法国和英国派军队占领荷属西印度的阿鲁巴和库腊索，以保护它们的范围很广的炼油厂时，又一次发生了困难。美国政府向英国政府提出外交抗议。赫尔在 5 月 10 日会见洛西恩勋爵时，说英国的行动可能被认为是违犯门罗主义；他还提醒英国注意为日本在荷属东印度采取行动造成先例的危险。罗斯福通过英国大使要求英国政府证实英国没有在荷属东印度进行干涉的意图；要求荷兰政府证实荷兰没有要求英国在海外援助的意图；并 489 声明英国和法国的军队将尽早撤出荷属西印度。英国人同意这样做，哈利法克斯于 5 月 12 日就这一点作了公开的声明。美国政府还担心，一个交战国占领一块地方将会引起敌对的交战国的袭击。两个月后，英国军舰和维希政权控制下的法国军舰在马提尼克可能发生冲突的危险，使得美国政府十分关注。

到 1940 年 6 月，欧洲国家在美洲的属地已经严重威胁到美洲的安全。荷兰已经陷落，法国败局已定，英国的命运也岌岌可危。即使德国不想用武力夺取西欧国家的海外属地，屈从德国的法、荷两国政府可能利用它们在加勒比海地区的属地来危害美国 and 整个西半球的安全，而不必把这些属地的主权确实转让给德国。在这些情况下，美国政府感到必须双管齐下，一方面采取秘密的军事预防措施，作最坏的打算，另一方面采用政治预防手段，尽可能防止这些可能出现的事态的发展。

1940 年 6 月，美国同英国政府以及拉丁美洲一些共和国商量以后，根据新的“陆海军作战计划虹 4 号”的基本内容，起草了陆海军联合作战计划草案，其中包括由美国军队（如果可能的话，和美洲其他共和国以及加拿大的军队一起）占领欧洲盟国在西半球所有的属地（英国的属地以及法国、荷兰和丹麦的属地）。上述计划还包括太平洋中经线 180 度以东地区的属地。此外还准备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赤道以南的地区联合行动。后来采取的外交和政治行动（下文将要谈到），是为了进行必要的制裁以及达成各种协议，为美国军队也许不得不采取可能的军事行动作好准备。

华盛顿政府首先采取的的第一个政治行动是公开地重申门罗主义的“不转让”条款。政府这样做，得到美国公众的全力支持，他们认为门罗主义是美国对外政策中一项——实际上是唯一的——永远不变的原则。国会和报刊已经提出建议，主张美国应收买英国、法国和荷兰在西半球的属地，或者对这些属地实行保护性的占领。

4906月3日，国务院起草的一项决议案在国会里提出。这项决议案重申美国不承认一个非美洲国家对另一个非美洲国家转让其在西半球的任何领土，也不默认任何转让领土的企图。它又说，如果有可能出现这种转让的话，美国除了采取其他措施以外，还将和美洲其他共和国商量，采取步骤，保卫共同利益。决议案于6月17日经参议院一致通过，次日由众议院以三百八十票对八票通过。

决议案第一部分的基本内容于6月18日通知德国和意大利两国政府。在德国7月1日发出的答复中，里宾特洛甫说美国的照会是“无的放矢”，因为没有理由假定德国想在西半球取得属地。然而他指出，美国政府对门罗主义的解释，显然会使某些国家有权利占有领土，而另一些国家则没有这种权利。德国不能接受这种解释。再则，美洲国家要求外界不干涉西半球的事务，只有在这些国家不干涉欧洲大陆事务的条件下，这种要求才可能被认为是正当的。赫尔立即发表声明，否认门罗主义和轴心国新秩序之间有任何相似之处。他说，所谓的新秩序以征服为目的，而门罗主义则完全为了自卫而存在，决不含美国称霸的意思。美国政府在6月18日的照会中已经通知德国，它准备于必要时采取单方面的行动。下一步是根据在本半球防务方面保持共同阵线的政策，取得美洲其他共和国的合作和同意。美国也急于要避免美洲各共和国之间争夺某些殖民地。赫尔担心德国可能会设法讨好美洲某些共和国，把欧洲人在新大陆拥有的领土送给它们，换取它们“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服从”，这样也许会破坏美国正在力图建立的团结一致的泛美阵线。

（三）哈瓦那决议和相互保证的声明 491

因此，决定对欧洲国家在西半球的属地采取行动的共同政策，是1940年7月21日在哈瓦那开幕的美洲国家代表会议议程上最重要的议题。美国代表团团长赫尔被选为研究这个问题的那个主要委员会的主席。他在7月22日首次开会的致辞中，略述了美国的建议，这些建议是开会以前在华盛顿草拟的，并于7月11日以公约草案和决议草案的形式分发给参加会议的国家。美洲各共和国，一方面不允许欧洲国家将其在西半球的属地转让给其他非美洲国家，另一方面它们自己也反对把这些领土归并给这个或者那个美洲共和国的任何主张。

必要时，它们打算在非常时期内通过一种集体托管办法来治理这些领土。一俟条件许可，各处领土将归还原主或者使其独立。美洲各共和国原有的对其中某些领土的权利将不受影响。7月23日，赫尔提出一项决议案，体现了他的托管主张。

美国的决议案遭到阿根廷代表梅洛博士的反对，他只准备以发表一项“不转让”的声明为限。他散发了一份相反的草案，建议解决欧洲国家在西半球属地的办法是让这些属地独立。阿根廷的态度部分地是基于它同美国对抗的传统政策，以及它不愿对大国盲从。阿根廷作为泛美集团中的第二号强国，不愿在影响整个美洲大陆的问题上接受美国的领导。再说，阿根廷政府不准备冒集体对德国作战的风险，特别是它根本还不相信美国会有能力或者愿意在军事或经济方面保护南美。这些疑提供武器和财政援助的先后顺序，使拉美国家能建立它们的防务。巴西和虑，由于美国海军和陆军领导人在国会听证会上的作证，492以及美国国内关于美国应该承担防卫的地区范围的公开辩论，得到了证实。在哈瓦那会议期间，主张“四分之一地球”防务的文章，仍然在美国报纸上出现。

僵局终于打破，赫尔越过阿根廷政府而直接向阿根廷共和国总统呼吁，因为梅洛原先接到的指示是由政府发出的。奥尔蒂斯总统同意梅洛应按照赫尔建议的方针同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代表团合作。4月27日达成协议，并具体体现在哈瓦那决议与公约中。决议与公约的条款大体上符合美国的决议案，虽然用“临时管理”这几个字代替了“集体托管”。在公约尚未批准以前，决议立即生效；决议规定建立一个非常时期委员会，授权该委员会接管西半球中受到威胁的一切欧洲国家的属地。如果在采取行动以前，来不及召开委员会，某个共和国，单独地或者会同另一个共和国，有权立即采取行动以应付危机。此项决议使美国获得它所要的东西——作为一个受托管理国有权代表拉丁美洲各共和国采取行动，因为也许有必要迅速行动——但有关领土的前途则应通过协商决定。

朝着泛美共同防务的合作方面迈出的另一个重要步骤，是在哈瓦那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各国防务的相互保证巴西“突出地带”以北各共和国列入最优先的一类（见兰格与格利森：《对孤立的挑战》，第620—621页）。

就是仅仅防卫北美和加勒比海地区。

见1940年7月26日《纽约时报》上阿瑟·克罗克的文章。

赫尔：《回忆录》，第1卷，第826页。

和合作的宣言”。同以前的一些宣言一样，它规定遇有危险时各国进行协商，但另外又说，“一个非美洲国家想要危害任何一个美洲国家的领土完整或者不可侵犯性，危害其主权或者政治独立的企图，都将被认为是对本宣言所有签字国的一种侵略行为”。宣言还允许缔结双边协定，以在防务和援助方面进行合作。在1940—1941年间，493美国和一些拉美国家缔结了双边协定。1941年3月5日，巴拿马同意让美国使用运河区以外的防务基地；1941年4月1日，美国和墨西哥签订条约，使彼此过境的飞机可以使用对方的机场和基地。一般说来，拉美国家不愿意让美国在自己国土上占有基地的权利，尽管美国政府坚持说——例如，在1940年11月13日萨默纳·韦尔斯的公开声明中——它所要求的设施不是为了美国独用，而是为了泛美组织一切成员国共同使用。然而，到1940年底，美国已经和南美洲每一个共和国签订了防务协定，只有阿根廷除外。

（四）重整军备和经济防务

哈瓦那会议在政治方面的成功远远超出预料，因为美国国内对于会议的结果曾有过不少悲观的看法。经济领域的结果比较不那么引人注目。西半球的经济防务对美国是另一个困难问题。北美和南温带拉美国家的经济不是相辅相成的，在和平时期这些共和国满足于各行其是：只有在战时才真正发生经济合作以及经济政策协调一致的问题。虽然经济合作在历次泛美会议上是一个经常谈到的议题，但在南美共和国中不能引起多大兴趣，因为它们担心这样做的后果会使自己在经济生活中依赖美国。在和平时期，拉美国家是和欧洲国家建立主要贸易关系的。战前几年，德国在拉丁美洲的经济渗透越来越成功，曾引起美国的重大关注，并促使它重新致力于创立一个泛美共同经济阵线。战争爆发后，通过巴拿马会议建立起来的美洲国家间财政经济委员会，曾拟定种种方案，谋求增加美洲国家之间的贸易。曾讨论过开设一家美洲国家间银行，并设置了一个美洲国家间发展委员494会，负责考虑在拉美国家中如何发展原有的产品或者新产品。然而，这些都是长期的计划，而1940年6月间西半球在德国的威胁下却要求采取更加及时的行动。由于盟国实行

封锁，德国又占领了一些中立国家，拉美各共和国已因失去欧洲市场而遭受损失；对它们来说，结果是积存了大量的剩余出口货物。假如德国取得对欧洲经济的完全控制，南美各共和国就不得不面对这一问题：是和希特勒妥协呢，还是积压巨额存货，除非它们能大大地增

加对美国的输出，而美国的关税壁垒一直把它们的产品排斥在门外。

为了应付这个问题，罗斯福和他的经济顾问拟订了设立一个美洲国家公司的计划，这是一个庞大的卡特尔，由它来处理整个西半球的剩余货物。这个卡特尔计划，由罗斯福于1940年6月21日向美国人民作了详细说明，在美国国内和许多拉美共和国中都有很多人反对。在美国，一般的批评是认为费用太大，批评得特别厉害的是那些唯恐损失自身利益的农业界和工商界人士。拉美各共和国反对这个计划。是因为它们照例担心这会导致美国对西半球的经济统治。既然美国不得不承担主要的财政风险，它就必须坚持要有一个中心的销售组织，而这样做又势必要控制许多国家的生产。在哈瓦那会议召开以前，美国放弃了原来的计划，代之以一些比较温和的建议，旨在实现原来计划的应急目的。1940年7月22日，罗斯福要求国会通过立法，将进出口银行的资金从两亿美元增加到七亿美元，并取消对贷款用途的种种限制，“目的要使该银行对格朗德河以南我们的邻国能有更大的援助，包括供给资金，用于经营和有组织地销售它们的一部分剩余货物”。

哈瓦那会议决定要加强和扩大美洲国家间财政经济委员会的活动，并指示该委员会就如何处理剩余出口物品问题进行考虑和提出意见。结果，没有订出能得到大家一致同意的使美洲各国经济一体化的全面计划。几个月过去以后，英国可以继续存在的希望增大了，于是拉美国国家乃越来越准备和美国合作；同时美国方面，由于1940年8月16日在华盛顿设立了一个“商务与文化关系协调局”（属国防顾问委员会）和一个“美洲国家间事务部际委员会”，进行合作比较便利。重整军备计划使得拉美国国家对美国的贸易大大增加，因而拉美国国家出口剩余产品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解决。1941年头四个月，美国从拉美国国家购买的货物比1940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五十，比1939年增加百分之一百。1941年间，美国和墨西哥、秘鲁、智利、阿根廷作出安排，购买它们多余的某些重要战略原料。还安排了由美国以不大高的价格向拉美国国家供应一些产品，代替这时已经买不到的欧洲货。

第三节 “除参战外”对英国的援助

美国政府1940年6月间同意的政策，要求美国一面迅速建立起自己的武装部队，以便为西半球提供适当的防务，一面以非交战国的身分对英国进行援助。在1940年夏天，考虑到当时所能利用的微薄的美国资源，不容易看出怎样可以协调这两种目标，使其都能实现。当时所有能够动用的武器都已搜集起来，准备运往英国。再说，罗斯福及其顾问们虽然认识到英国作为美国第一道防线的重要性，但这第一道防线能坚持多久，则颇有疑问。在夏季几个月中，对于英国在夏季是否能维持下去，军方的看法是悲观的，虽然到1940年10月的时候，美国参谋总部希望并预期英伦三岛能够守住，以作为中心堡垒，从那里最后发动一个战役，解放那些被征服的大陆国家。同时美国政府不打算采取任何行动，以致把它卷入一场美国军队和人民都没有作好准备的战争。因此它拒绝接受英国政府在法国投降以前和以后向它提过的采取这类行动的建议。这类建议是以丘吉尔个人给罗斯福函电的496方式提出的，也通过一般的外交途径提出，内容包括修改中立法，让美国商船载运军需品到

英国；召开联席会议，讨论英美舰队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行动，以及协调在远东的行动。6月27—28日洛西恩问赫尔，美国政府是否愿意参加坚决的行动以抑制日本，或者由美国派遣舰队到新加坡，或者由美国对原料输往日本实行禁运。赫尔告诉这位英国大使，美国政府不参加英国政府提出的供其选择的抑制政策或绥靖政策。另一方面，美国已着手采取一些措施，使总统能履行他的诺言，给英国提供物资援助，并以非交战国的身分对英国进行援助，诸如修改飞机和军火计划，以及制订立法，让他可以控制战略物资和补给品的输出。

英国所要求的物资援助是飞机、驱逐舰、轻型海军舰艇、军事装备、食品和原料。英国需要物品的清单开列在洛西恩于6月27日和7月3日先后递交的两件长篇备忘录里，内容包括当前的急需物品，以及英国第一批估计希望从美国得到的长期需要。德国在西欧胜利以后，丘吉尔战时内阁决定彻底修改英国早先的经济政策，因而对武器和补给品产生了巨额需要。自从战争爆发以来削减英国向外购货的那种支付平衡政策这时已被放弃了。丘吉尔和洛西恩告诉美国政府，英国为所需要的物资支付现款的能力是有限度的。

在1940年11月罗斯福再度当选以前，对英国防务作出的最显著也是宣传得最广泛的一项贡献，是9月间把五十艘“超龄”的美国驱逐舰转让给英国海军。关于此项转让的协议于9月2日达成，这是罗斯福和丘吉尔长期谈判的成果。丘吉尔在其5月15日致罗斯福的信中第一次提到英国需要补充驱逐舰。5月16日，罗斯福定美国是否能出让这些舰只。6月间，意大利参战以后，丘吉尔又催促罗斯福派出这些驱逐舰，7月31日他再一次表示，英国对驱逐舰的需要十分迫切。

在此期间，罗斯福一直在考虑怎样才能妥善解决这个问题。他不愿要求国会批准、因为这样做必然会在国会里引起长期的和激烈的辩论。6月以来的公开讨论，表明在让出驱逐舰是否明智这个问题上，意见分歧得很厉害。

主张帮助英国的人对于政府的迟延感到焦急，7月31日援助盟国委员会发动了一个全国范围的运动，极力主张这些驱逐舰应该卖给英国。罗斯福相信，如果用这些驱逐舰去交换西半球英属领土上的基地（美国由于战略原因急于要取得这些基地），美国的舆论一定会满意，阻碍出售驱逐舰的法律上的困难就会解决。法律上对驱逐舰转让的主要障碍之一是1940年6月28日国防条例第十四条，其中规定属于美国各武装部队的物资不得转移给外国，除非海军或者陆军的领导人能证明这种物资的使用“对美国防务无关重要”。司法部长于8月27日就所提的以舰只交换基地的合法性提出意见，他向总统建议说，一项能加强美国总的防务地位的交易，会使海军作战部长证明这些驱逐舰无关重要。他还查明，在宪法上总统有权实行此项转让，作为一种行政协定，不需要由参议院批准。

用驱逐舰交换西半球英属领土上战略据点租借权的方案，7月间在华盛顿拟出；8月初通过洛西恩向英国政府提出关于这件事的正式建议。虽然罗斯福的交换方案解决了美国方面的困难，可是却不合英国政府的口味。丘吉尔希望这两项交易采取相互赠送的方式。如果作为相互交换来处理，英国人民可能认为这种交换是不适当的。

最后达成了一种折衷办法，把纽芬兰和百慕大一些地点的租借权作为英国赠送美国的礼物，而用加勒比海地区498的一些地点来交换驱逐舰。

还有另一点困难。美国政府在同意转让驱逐舰以前要英国政府正式保

证，英国舰队无论如何不会投降或者凿沉，而是于必要时驶过大西洋到联合王国以外的英联邦领土上的港口。丘吉尔表示异议，理由是这种性质的声明将限制英国的行动自由，并促使轴心国相信英国认为自己可能战败。最后丘吉尔同意公布一件电报，在电报里他证实 1940 年 6 月 4 日他在议会里的声明代表他的政府的政策，即舰队决不会投降或者凿沉。他还说：“不过，我认为这种假设的意外事情，似乎更可能落到德国舰队或其残余舰只的头上，而不会落到我们舰队的头上。”

妨碍达成协议的最后一项困难这样克服了以后，所商妥的办法在 1940 年 9 月之日洛西恩和赫尔互换照会中正式规定了下来。次日即由罗斯福在致国会的咨文中宣布了此项协议。罗斯福在咨文中强调美国可以得到的好处。他说，取得这些基地是“自从购买路易斯安那州以后在加强国防方面所采取的最重要的行动。……这些安全前哨对西半球的价值是无法计算的。”29 月 6 日，赫尔通知拉美各共和国政府，这些从英国得来的基地将“同样可以供所有的美洲共和国使用”。

虽然这笔驱逐舰—基地交易是美国政府摆脱中立并在英美防务政策上走向更密切的合作以来所跨出的最大的一步，但是同样的过程也以其他不那么轰动一时的方式在同时进行。在军需方面，两个国家在计划防务生产、决定优先供应以及分配制成品方面，已经作了开端。8 月 4 日设立了一个英美联合飞机委员会，其成员包括美国陆军和海军、英国飞机委员会、总统的联络委员会以及国防顾问委员会的代表。接着又建立了一些关于坦克和其他军火的联合委员会。

妨碍美国政府接受英国大量定货的各种困难之一，在于美国部队和英国部队使用的武器型式不同。美国政府和军事部门当然不愿意看到大量的美国工业资源固定地用于生产一种对它们本国军队用途有限的武器。8 月和 9 月，各类联合委员会采取了一些步骤，使飞机以及其他型式的武器标准化。武器标准化的问题，由英国军需部特使沃尔特·莱顿爵士于 1940 年秋天访问华盛顿期间与美国官员进行了讨论。英国谈判代表同意用标准式的美国武器装备英国即将建立的十个师，这些师将在中东服役，美国方面则答应尽力满足英国的这一要求。这为英国同意普遍接受美式装备铺平道路。双方还就武器情报资料的集中使用，以及互换军事装备供美英两国军队试用这两项问题，作出了安排。10 月 25 日，英国采购委员会向总统的部际委员会提出要求，在已经商定的数量以外，增加一万二千多架飞机，并提供大量武器，供已经建成的部队使用，并为上面提到的十个师提供美式装备。英国这种范围广泛的和巨大数量的要求，由罗斯福和史汀生于 10 月 29 日认可，条件是所供应的装备全是美式；政府中负责生产的人员奉令修改他们的生产计划，提高产量，以适应这些新任务。10 月 30 日，罗斯福在波士顿发表的一篇历史上有名的竞选演说中，宣告将扩充美国的生产设备，以满足英国的要求和美国武装部队的需要。美国政府请英国人提供关于英方需要的详细计划。

1940 年初秋，美国、英国和加拿大之间也开始了联合战略计划。7 月间，罗斯福接受丘吉尔的邀请，派遣美国陆海军高级将领到伦敦去参加秘密参谋工作会谈。海军 500 少将戈姆利（海军作战部副部长）被任命为特派海军观察员，陆军准将 G·L·V·斯特朗（参谋总部战争计划司副司长）和陆军少将 D·C·埃蒙斯（空军总部总指挥）被任命为特派陆军观察员。这个代表团

于8月16日到达伦敦，它的直接目的是确定英国抵抗入侵的能力，可是它的任务不久就扩大了范围。9月，戈姆利受权和英国海军部的参谋开始讨论如何使美国在西半球水域的海空行动和英国在大西洋的作战行动协调一致；讨论如何增加美国对大西洋中这种作战的支援问题；以及讨论一旦美国“迫不得已”作为英联邦的盟友“参加战争”时，美英在大西洋中联合海空作战的问题。

埃蒙斯和斯特朗于9月下半月回到华盛顿（戈姆利留在伦敦），满怀希望地向马歇尔汇报说，英国能继续抗战。在伦敦进行的这些初步的参谋工作会谈，结果达成了一项协议，约定于罗斯福再度当选后，在华盛顿举行扩大的参谋工作会谈。

美国和加拿大之间同时并进地恢复了友好关系。7月间，美国和加拿大两国的军事专家在华盛顿会谈。8月17日，罗斯福和麦肯齐·金在纽约州的奥格登斯堡会晤，讨论两国的共同防务。8月18日，他们签订了一项联合防务协定，并成立一个“常设联合防务委员会”。委员会由两国各派四人或五人组成——除两位主席外，均从现役军队中选派——于8月26日在渥太华举行第一次会议。到1940年底，这个委员会已经产生了丰硕的成果。

第四节 选举中的对外政策问题

美国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都是在1940年，这大大地增加了在战争第一年中制定和执行一项前后一贯的对外政策的困难。各项问题不能仅仅根据其本身的利弊来判断；政府和反对党双方的领导人都必须时刻考虑他们的行动和谈话在国内的政治影响。如上文所述；罗斯福在努力为美国重整军备以及援助英国和法国时不得不谨慎从事。

（一）共和党 501

同样的国内政治竞争促使共和党比通常更加猛烈地反对罗斯福主张的政策，这使得它采取了一种孤立主义色彩浓厚得多的立场，否则它也许不会这样。在“假战”时期，大多数美国人对这场战争曾感到讨厌和烦躁，并急于要料理他们自己的国内问题。再则，美国大多数人在这个阶段根本不认为盟国有战败的危险。因此共和党的主要领导人和总统候选人的语气越来越表现出孤立主义，甚至在德军入侵斯堪的纳维亚以后还继续采取这种方针。

5月间德军人侵低地国家和法国以后，世界形势急转直下，使得共和党左右为难。它认识到必须确保美国的安全，不得不同意罗斯福的重整军备计划，而只能说罗斯福不是执行这种计划的合适人选。因为两党在防务需要问题是意见一致的，所以这时候进行了许多讨论，研究是否可能组成一个联合政府或者两党会议来主持重整军备。然而，罗斯福可能一直在考虑的这种方案却失败了，因为共和党领导人准备考虑这种性质的建议，除非罗斯福答应不当连任第三任总统的候选人。可是，虽然不可能建立任何方式的两党联盟，由于6月间有两个又能干又爱国的共和党人参加内阁而使政府大大地加强了。6月20日，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前四大，罗斯福宣布他已经邀请史汀生和富兰克林·诺克斯上校分别接任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这两人都认为盟国的胜利对美洲的安全极其重要，美国在支持盟国方面应该比以往走得更远。共和党立即否认史汀生和诺克斯与党的关系。孤立主义者宣称，这两人的任命明显地表示罗斯福的意向，因为他们都是“很起劲的战争吹鼓手”。可是在5月和6月，休·约翰逊将军在1940年6月21日《纽约世界电讯报》上的话。诺克斯和史汀生的任命和法国的投降在时间上巧合，这使得美

国国内孤立主义的意见又暂时抬头。

月间，共和党内“当权的保守派”所主张的色彩浓厚的孤立主义政策，正受到全国越来越多的共和党人的反对。摆脱孤立的一般倾向，表现在公众对“局外人”温德尔·威尔基的支持越来越多；在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中，只有他一个拥护罗斯福的对外政策并主张美国对盟国“除参战外”，实行全面援助。

共和党代表大会的结果，大体上是该党的非孤立主义派的一次胜利。党的政策宣言是一个折衷两派意见的方案；它当然要宣告反对参加外国的战争，并号召保卫美国和保卫门罗主义。它一方面表示拥护罗斯福的重整军备计划，另一方面却表示遗憾，认为政府的言行会把国家引向战争。关于援助盟国的问题，宣言声明：“我们赞成这种援助，只要它不违反国际法并且和我们自己的防务需要不相矛盾。”提名威尔基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意味着一旦共和党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获胜，就可对这项声明作出任意的解释。

（二）民主党

直到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7月15日在芝加哥开会的那一天，民主党内争论的主要问题是罗斯福是否要参加竞选，争取第三次连任总统。连任三次总统在美国历史上没有先例，连任的可能性以及是否相宜，已经由公众热烈地辩论了两年多。德国在西方发动攻势以后，美国人对罗斯福的需要增加了，随着欧洲局势的恶化，这种需要越来越显著。党的领导机构和领导人需要罗斯福，因为他们相信只有他的声望能确保民主党的胜利。随着美国受到的危险增长，关于新政的争论——新政曾使得党内一些保守分子不满——越来越不重要了。最重要的是，人民觉得罗斯福是在危机时期领导他们的最佳人选。

罗斯福在第三次连任这个问题上曾拒绝作肯定的表示，在日益增长的公众要求面前，他保持缄默。人们不知503道他决定接受总统提名的确切日期，但估计大概在5月半前后。他虽然同意党代表大会把他的名字提出来，但他的条件却是必须在不经过他正式允许的情况下这样做。

7月18日，出席民主党大会的代表们以压倒多数再次提名罗斯福为总统候选人。第二天，罗斯福在接受提名的讲话中说，危险当头，没有人有权利逃避服役的号召。他说，他可不能号召别人到军队或者到工厂去服役，而当人民召唤他时，他自己却不肯应召。

罗斯福对于删除党纲中对外政策纲领的做法曾不得不默然同意，以便同民主党内的孤立主义分子和解。原来语气坚定得多，表示党决心要援助英国的一段话，被改为保证“在不同本国防务相矛盾的情况下，给予我们所能动用的一切物资援助”。门罗主义是应该保卫的，可是美国不应参加外国的战争，或者派遣武装部队到美洲以外的外国土地上去作战，除非自身遭到进攻。

（三）竞选运动

这样，两党纲领中所宣布的对外政策差别就很小：两者都主张重整军备，不干涉欧洲战争，以及在不妨害美国自身防务的范围内援助侵略行为的受害者。一切取决于对有利美国防务这一点作怎样的解释：实际上，取决于对援英政策和美国防务是相互抵触还是相辅相成这一问题如何回答。这个问题，罗斯福和威尔基的意见大致相同，因此，对外政策似乎不至于成为竞选运动中的争焦点。在竞选运动的大部分过程中，可以看出在这方面有一种非正式的谅解。当罗斯福开始就驱逐舰转让给英国事进行谈判时，曾通过援助

盟国委员会将此事告诉威尔基（该委员会在两个相互竞争的阵营之间起一种非正式联络机构的作用），威尔基同意不把此项转让用作政治资本。威尔基的主要攻击是以他所指责的民主党政府的无能和浪费为根据。他谴责的是美国防务处于不充足的 504 状态。他坚决主张，只有共和党政府才能有效地实施重整军备的计划，并以生产迟缓的事实作为提出这种主张的理由。可惜，随着大选日期的临近和紧张气氛的增加，在对外事务方面的休战状态被打破了。

罗斯福在他 7 月 19 日接受提名的演说中，曾说他工作太忙，不能出去搞竞选活动，但是他又加了一句：“我将毫不犹豫地提请全国注意各种有意识的或者无意识的对事实的歪曲。” 10 月 18 日，由于民主党迫切要求他出来斗争，罗斯福宣布将发表五次竞选演说。

罗斯福的出场以及 10 月 23 日他在费城第一次竞选演说的成功，使共和党的政治家们感到惊恐；他们劝告威尔基必须放弃那种两党一致的对外政策的主张，并且要把罗斯福作为战争贩子来攻击，才可能避免失败。这一手果然立即收效——竟弄得全国各地纷纷来信，连珠炮似地抨击罗斯福，同时民主党总部也提出紧急请求，要罗斯福向美国的母亲们保证，她们的儿子不会在外国的战争中牺牲。拥护他的人说，如果他不这样做，民主党就会输掉这场选举。罗斯福让了步。10 月 28 日在麦迪逊广场公园演说时，他尽量利用他以往在维护中立方面作出的成绩；两天后，在波士顿，他明确地保证不会派遣美国男儿在外国的战争中打仗。另一方面，在波士顿的这次演说中，他宣布了上文已经提到的一点，即英国的防务需要将包括在美国今后增加生产的计划以内。

1940 年 11 月 5 日，罗斯福再度当选为美国总统，同时民主党在国会选举和各州选举中也重新执政。罗斯福的空前胜利大大地提高了他的声望以及他在对外事务方面的威信。选举的结果显示了全国人民绝大多数赞成帮助英国，可是也说明了还有一个顽固的孤立主义核心需要慎重对待。

第三章非交战状态的后期

第一节甘冒战争风险去援助英国

1940年秋季，美国人民的精力集中在选举上。选举过后，罗斯福再掌权四年，于是人们焦躁地等待着新的行动。其实，美国的公众和外部世界并不需要久等。在11月8日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罗斯福宣布将增加对英国的援助。美国工厂里生产的军火，美国和英国将按对半的原则进行分配。12月16日，总统就租借法发表第一次声明，12月20日，他宣布彻底改组防务机构。

罗斯福公开宣布的行动和计划，显示了美国政策和战略在年底的演变。政府这时展望的，不仅是在“不参战”时期内和英国进行更密切得多的合作，而且是美国可能作为一个完全的交战国加入战争，和英联邦并肩作战，只是参战的时日还未决定而已。1940年11月12日，海军上将斯塔克，在马歇尔、诺克斯和史汀生的同意下，就未来的防务政策和战略向罗斯福提出一些新的建议。斯塔克在评论了世界形势以后，陈述了四种他认为美国可行的行动方针。他主张采用第四种（D计划，或称“多格”

计划），在这个计划里他建议采取积极措施——包括必要时采取军事行动——使英国免于战败，并且主张如果美国终于进入交战状态，作为英国的盟友，就应该在大西洋使海军和陆军采取攻势行动，而在太平洋则采取守势。斯塔克主张，美国在决定全力参加战争以前，应该加速努力建立本半球的防务并加强美国海军和陆军的力量。如果采用D计划，美国应该一方面把自己的力量增加到最大程度，同时也应该对英国及其盟友给予最大程度的援助。

美英两国的海军和陆军当局应该立即进行全面的参谋工作会谈。

斯塔克海军上将的这些建议经摘要后于11月20日电告丘吉尔。英国首相表示这些建议使他“受到很大鼓舞”。他写道，“据我看，斯塔克海军上将的意见是对的，D计划从战略上说是正确的，同时也非常符合我们的需要。因此，一有机会，我们即应用一切办法来使斯塔克海军上将的策略更坚强有力，而不应再发表与这个计划相矛盾的议论。”罗斯福默认了斯塔克的计划，然后于12月2日离开华盛顿，乘坐“图斯卡露莎”号军舰在加勒比海作两星期的巡航。同一天，斯塔克打电报给在伦敦的戈姆利海军上将，邀请英国的三军参谋长派代表到华盛顿参加参谋工作会议，这是英国首相和参谋长们以前一再提议要召开的。

（一）租借计划

美国政府早已了解英国在美国的资产不久就会用光，必须想出一种办法使英国能得到对它自己的防务和美国的防务都有必要的物资。早在5月间，丘吉尔就提醒罗斯福，英国即将缺少美元。首相的这种说法，被一位应摩根索邀请访问华盛顿的英国财政部官员于7月间向摩根索提供的数字所证实。夏秋两季中，美国财政部一直在努力找出解决的办法，可是在选举未结束以前，政府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有所举动。

到11月，情况已经清楚，美国人大多数相信继续帮助英国的重要意义，并且他们会准备提供财政援助，只要他们确实知道英国已经真正耗尽可以变为现金的资财。前两个月中，报纸上已经在讨论对英国的财政援助。9月30日，参议员金曾经在国会里提起这个问题，他提出一项议案，要求暂时解除约翰逊法令和中立法对信用贷款的限制，以便给英国一笔贷款。然而，直接贷款有许多缺点。如果金的议案交付讨论，一定会在国会里引起一场冗长而

剧烈的辩论，一定会使人们回想起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未能还债所造成的复杂情况和恶感。同时，在这方面采取行动显然也不能迟延过久。英国的美元储备到这时已经减少到大约二十亿美元，其中大部分已经划为抵偿早先定购货物的款项。英国一定无力获得所需要的美元以支付正在谈判中的更多的飞机、船舶和 507 军备计划的费用。

11 月 23 日，洛西恩从英国休假回来，把这个问题公开提出来。他告诉新闻记者，英国的现金储备已经差不多用完，需要从美国得到一些财政援助。12 月 8 日，丘吉尔部分地根据斯塔克建议中所提供的线索，写了一封长信给罗斯福，向他全面说明了英国的处境和对 1941 年的展望，并列举了它对美国的要求。他说，他确信英国能坚持下去，如果它能维持稳定的粮食供应和武器供应并育足够的船舶运输粮食和武器。不幸，英国的船舶损失惨重。丘吉尔建议美国可以这样来帮忙，即恢复以往的海上自由通航政策，根据这种政策，美国商船可以自由在海外进行合法贸易，并由美国海军给予保护。如果美国不准备这样做，它可以把美国军舰（特别是驱逐舰）赠给或者借给英国，并扩大美国海军在大西洋巡逻的区域。丘吉尔敦促美国加速它的工业生产，以便以更多的船舶和武器供给英国。他最后表示相信，美国政府和人民不会一定非要英国先用光它的全部美元资源，而后他们才继续给它帮助，因为这也是为他们自己打算，正如为英国打算一样。

罗斯福接到首相的信时，正在和他的密友哈里·霍普金斯一起巡航。选举以后，对英国进行财政援助的方法一直是罗斯福和他的内阁认真讨论的主题。在这些讨论中，在未来的租借法中要体现出来的一些主张已经逐渐成形。罗斯福对这些主张在“图斯卡露莎”号上已作了仔细的考虑。12 月 10 日他回到华盛顿时，已经拿定主意，准备采取行动。第二天，罗斯福在他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对租借法的原则作了一般的说明。他说，这一主张就是美国政府应该负责完成并资助英国的战争物资定货，其后并应作出某种安排，使这些物资能为英国人用 608 上，因为这才是保卫美国最好的办法。战争结束后，美国将在某个时候让对方用实物来偿还。总统把他建议的武器租借办法，比作一个人借出自己花园里的水龙头带去扑灭邻居屋里的火灾。

12 月 29 日，在一次炉边谈话中，罗斯福进一步阐述了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已经扼要谈过的主张。他如叙家常地强调了美国面临的危险和支持英国的必要。他说：“我们爬到床上去，用被单把头蒙起来……是不能逃脱危险的。”如果英国垮掉，美国人“就会生活在枪口之下——一支装着炸裂弹的枪口之下，军事上以及经济上都是这样”。总统抨击美国那些对纳粹搞绥靖的人们，他说：“谁也不能靠持顺毛就把老虎驯成猫”；他还大大地嘲笑所谓“谈判和平”的想法，因为当时有些方面又在鼓吹这种主张。英国和英帝国是抵抗纳粹征服世界的矛头。还来得及加以援助。美国的防务正在非常迫切地筹划之中，而英国的战时需要，作为美国防务的一部分，必须成为一体。目前在生产方面所作的努力还不够。工业必须扩充，产品的分配必须最有利于美国的防务。美国必须是伟大的“民主国家的兵工厂”。

1941 年 1 月 3 日，罗斯福宣布美国政府已经采取了初步措施，准备开始一项大规模的商船建造计划，并且他即将派遣哈里·霍普金斯作为他的私人代表去英国，和英国政府建立更密切的接触。

三天后，罗斯福在提交给新国会的年度国情咨文中，重申政府通过援助

反抗侵略的各国人民以保卫美国的政策，并扼要说明租借法的原则。一项旨在使租借法生效

的议案于1月10日在国会中提出。

这个议案被称为“增强美国防御的一项法令”，它规定制造“总统认为对美国防务有重大关系的任何一国政府所需要的一切防务物品”，并规定用出售、交换、租或借的办法来处理这种物品。将来用“实物或财产、或者总统认为满意的任何其他直接的或间接的利益”偿还。议509案中的其他条款准许英国军舰在美国港口维修和准许提供防务情报。此项议案有几样好处：第一也是最明显的好处是这时可以继续向英国供应武器和货物，尽管英国缺少美元。另一个重要的特点是所有的定货单都集中在美国政府手里，使它能协调生产计划，并有效地控制美国生产的武器的分配。

关于租借法案的辩论在国会的一些委员会里，在两院的议员席上以及在全国各地展开，不久就具有一种正式的对外政策辩论的性质。1939年和1940年间为了修订中立法而展开辩论时援引的一些理由，又到处在谈论。

反对派援引的两个主要理由，是此项法案增加了美国卷入战争的危险，它赋予总统的权力大得可怕。所谓英国打败不会危及美国那种孤立主义的老调又在重弹，同时还提出新的论点，认为进一步援助英国，会造成一旦德国得胜，美国自己反而国防空虚。反对派还提出其他一些论点，既然英国无论得到多少援助也不能取胜，那就

不应该鼓励它再作这种没有希望的挣扎，即应该要它立即同德国讲和；认为此项法案是违反国际法的；认为它也违背1939年的巴拿马宣言。有人提出，既然英国将来不会有能力偿还，就应该要它提供实物担保，例如以它在拉丁美洲的投资来担保；还听到这样的建议，认为英国应该让出它在西半球的殖民地，作为抵偿美国援助的代价。

使国会议员们大伤脑筋的两项需要考虑的问题，一是害怕政府也许会把美国海军的舰艇转让给英国，一是害怕罗斯福用美国海军护航可能使美国卷入战争。曾有人提过一些修正案，规定非经国会同意不得转让海军舰艇，但未获通过；不过另有一项修正案却通过了，它为已在手头可以转让的物资规定了一个价值限额，这多少消除了他们对第一个问题感到的忧虑。在第二个问题上，反对派成功地通过了一项修正案，声明“本法令中任何部分不得被解释为授权或者允许授权把美国海军舰艇用作护航船舶”。作证支持此项法案的主要阁员是赫尔、史汀生、诺克斯和摩根索。有关的委员会还听取了海军和陆军领导人、大使、政界人士、国际法专家以及和平主义者和狂谈怪论者的证词。

辩论仍然在进行的时候，哈里·霍普金斯作了非常重要的访问英国之行。在他于1941年1月9日到达至2月10日离去这一个月中，他和丘吉尔及其政府成员建立

了密切联系，安排了罗斯福和丘吉尔于春季会晤。英国政治家和英国三军负责人就他们的处境和需要给霍普金斯作了坦率的和充分的说明。霍普金斯在一系列的电报中向罗斯福报告了英国具体要求的详情，并就如何满足这些要求提出他自己的意见。英国的要求中包括更多的驱逐舰、更多的商船、更多的飞机、更多的飞行员训练学校以及由美国提供船只运送飞机到英国。霍普金斯于2月16日回到纽约时，告诉记者们说，英国人决心争取胜利，并说他相信，有了美国的物资援助，英国人能够取胜。另一个到英国去访问的

重要人物是温德尔·威尔基。他回国后立即于2月11日向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作证，再一次敦促全国一致给予英国最充分的援助，并敦促通过租借法案。

1941年3月8日，此项法案以六十票对三十一票在参议院获得通过——早在2月8日，它就以二百六十票对一百六十五票在众议院获得通过——3月11日由罗斯福签署。另一项为执行租借法条款提供七十亿美元的议案，于次日提交国会，迅即通过。监督租借计划的任务，由罗斯福委托给霍普金斯。又派艾夫里尔·哈里曼前往伦敦，以公使衔在“租借”干线的另一端保持接触。

租借法标志着美国在实行“除参战外给予全面援助”

的既定政策方面迈出的一大步。大多数美国人还不准备让他们的商船不受限制地从事贸易，或者让海军担当在大西洋上护航的责任，从而冒可能卷入战争的危险。但是，到1941年春天的时候，美国已经和英国为进行战争而多方合作。美国不仅供应武器和弹药，而且美国科学家正在和英国科学家交换资料，美国陆军和海军已经开始集中使用军事情报，而美国联邦调查局和英国保安组511织也已建立了密切的合作。许多美国军事专家和其他方面的专家已经到了英国，英国军舰正在美国船厂修理，英国飞行员和空勤、地勤人员正在美国墙训。在外交和经济领域，两国的合作也越来越多。

（二）英美参谋工作会议

当然，美国的公众大多不知道美国 and 英国这种不成文的“联盟”的范围。因此，在华盛顿举行的英美参谋工作会议，从1月29日第一天开会起，直到1941年3月27日，始终非常秘密地进行。在这两个月中制定了美国在大西洋方面“除参战外”的援助计划，并且准备了一项战略合作的计划，以供万一美国“不得已而诉诸战争”时之用。双方商定的基本联合战略是斯塔克的D计划，这个计划已被接受为参谋工作会议上讨论的基础。既然德国被认为是“轴心国家的主要成员”，大西洋和欧洲地区就被认定是决定性的战场。在太平洋地区的政策和战略应该是采取守势，美国的主要军事力量将用于对付德国，即使日本决定介入也罢。1941年初，美国国务院和英国外交部仍然希望能劝阻日本不作进一步的侵略。虽然这些希望终于落空，但是参谋工作会议所商定的战略计划在珍珠港受到袭击后稍作修改，仍继续采用，作为基本的联合战略，指导美英两国部队未来的作战行动。

会议商定应作出安排，立即在华盛顿设置一个英国参谋代表团和在伦敦设置一个美国参谋代表团。会议还建议尽可能早日采取步骤，确立一种处理事务的方法，以保证在美国参战以前和以后对军用物资的分配，使能最适合于满足军事形势的需要。

参谋工作会议的报告（ABC—1）包括一项说明一般战略概念的主要报告和五项附录，这些附录详细地论述了一般的概念以及同盟国家之间进行合作的技术性方法：

（I）军事代表团的组织。

（ ）对军事力量作战略指导的责任。512（ ）美国和英联邦的基本作战计划。

（IX）交通联络。

（V）船舶运输的管理和保护。

美国和英国的代表商定，如果美国参战，他们将在大西洋采取攻势战略，而在太平洋采取守势战略，但是他们对于如何实行这种守势战略却未能达成协议，只是商定由驻远东各军的司令在新加坡会晤，准备协调守军的计划。于是美国、英国和荷兰的军队司令于1941年4月21—27日在新加坡开会，制定在远东指挥军事行动的讨划。他们把自己的建议拟了一份报告（ADB），但在7月3日被斯塔克和马歇尔否决。这个计划是美国最高统帅部认为不能接受的，出于两个原因，一个是政治原因，另一个是战略原因。如果采用这个计划，万一发生某种情况，包括日本进攻或者扬言要进攻英国或荷兰的属地时，美国就得承担义务，参加对抗日本的集体军事行动。战略上的缺点主要是因为这个计划规定有些基地，特别是新加坡，必须不惜一切牺牲保住。

ABC-1报告于5月28日获得海军部长的同意，6月2日获得陆军部长的同意。虽然罗斯福尚未正式批准，但是他已经默许了。经过修改的基本作战计划是根据这个报告制定的，而海军的部署也是按照报告中的规定作出的。

第二节 民主国家的兵工厂

（一）生产问题

延误生产计划的执行，然后再对组织生产的机构进行批评，是共和党竞选运动的一个主要特征。而且，对这个问题的批评不仅来自共和党人。生产的进展慢得厉害。克努森和其他一些人曾强调必须彻底检查防务组织。12月13日，克努森说，飞机生产落后于计划百分之三十。如果美国要起到它作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的作用，显然生产的速度必须大大地加快，而且，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由一个更强有力和更有权威的机构来替代原来的顾问委员会。许多人认为管理工业动员的机构必须集中由一个负责的首脑主持，这个人要有类似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伯纳德·巴鲁克那样的地位。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都坚持这种意见。12月18日，他们向罗斯福建议任命克努森承担这项工作。然而，罗斯福不准备接受这种建议，因为1940年5月间曾使他不赞成设立一个超级机构的许多理由仍然适用。

1940年12月20日，罗斯福举行一次特别记者招待会，说明他的改组计划。他说，由于生产涉及许多方面，不可能找到一个“沙皇”或者“普巴”来总揽一切。因此，他决定设立一个生产修理局，由四人掌管：局长，克努森，总管一切；副局长，希尔曼，负责劳工；以及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以使用所生产武器的军方领导人身份参加。

1941年1月7日，生产管理局根据行政命令成立。因为它属于紧急战备局，所以不需要国会批准。

生产管理局既是顾问机构又是执行机构，它的权限虽比国防顾问委员会的权限范围较广和力量较大，但这个新成立的局仍然主要是一个设计和咨询的机构。布置生产的权力是分散的，生产管理局对工业实行控制的权力受到严格的限制。防务计划的其他部分掌握在军队和政府其他常设部门以及许多为应急而设立的机构手里，这类机构在这个时期中象雨后春笋般地纷纷出现。各部门和各机构当中常常就管辖范围发生争执，特别是在军事部门和非军事机构之间。

3月间生产管理局的生产计划委员会和调查统计局编造的一份美英两国所需物资的粗略概要，显示出这514

些需要中某些项目竟超过估计生产能力达百分之五十。

为了适应防务计划的需要，必须大大地加速生产，必须增添设备，必须训练和动用更多的劳动力。凡已感到严重缺乏的原料必须增加供应，而民用消费则不得不削减。

1941 年春天和夏天，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在美国扩大重要原料的生产，并积聚进口物资的储备。4 月 20 日，罗斯福和麦肯齐·金在纽约海德公园会晤，并发表一项声明说，正在作出安排，以动员北美洲的经济资源。双方同意“两国应以本国最擅长生产的防务用品供给对方……并为达到此目的而协调生产计划”。

在秋天以前，削减民用消费方面的工作进展得非常缓慢。对于必须削减的程度以及实现这种削减的方法，各防务机构意见分歧。生产管理局用来削减民用企业物资供应的优先配给权，受到严格的限制。另外，各机构之间在民用物资的优先配给方面也有矛盾。

国会和报纸对防务工作的批评，由于 1941 年 1 月间的改组曾暂时平息，夏季又重新开始。6 月 28 日，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向全院提出一份非难防务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报告说，“人们痛心地看着……我们目前在整条线上所遭受到的生产不足……主要是由于缺乏协调和没有一个负责的领导人来明确职责”。

虽然国会对于政府指导防务工作的情况提出批评，但是它却不愿通过立法来增加总统的权力，使之能强行规定优先配给、实行物价管制以及征用资产。陆军部于 5 月 2 日提出一项议案，建议授权总统为国防而征用所需要的资产；国会和报纸对此表示非常敌视的态度。极端分子说它是“独裁议案”，比较温和的批评者则一致认为它给予政府太大的权力。这项议案经过修改，于 6 月 23 日提交国会；经过进一步的修改，最后于 1941 年 10 月 16 日通过。

国会一方面不愿通过增加总统权力的立法，一方面在对劳工强加控制方面却准备走得远远超过政府认为明智的程度。1941 年国防工业方面的罢工在全国引起很大的愤慨。要求制定镇压性反劳工立法的喧嚣，由于 3 月 19 日罗斯福宣布成立国防调解委员会，才暂时平静下来。虽然这个委员会没有强制的权力，只依靠舆论来展开工作，但它也成功地解决了不少争端。6 月间，由于防务需要越来越迫切，政府不得不在劳工纠纷中采取比较强硬的政策。就在那个时候，当宣布全国无限期地处于紧急状态以后，罗斯福命令军队接管加利福尼亚州罢工不休的北美飞机制造厂。同时征兵局局长发出指示：凡因从事重要工作而延缓服役的人，当他不再从事这项工作时，其缓役即应取消。但是，政府继续发挥它的影

响，反对把限制性的立法强加于人。各种反罢工的议案一再在国会提出，可是都未能获得通过，列入法典。

1941 年的夏季渐渐地过去了，情况越来越明显，美国生产能力的提高赶不上需求的增长。1941 年 3 月制定的计划，到 4 月就作了第一次扩充。在阿诺德将军访问英国以后，美国政府同意加速重轰炸机的生产计划。同时欧洲战局的发展以及日本向南亚的挺进，也要求美国自己的重整军备计划必须扩充。海军要求加快造船计划，陆军部要求增加兵员和装备。商船运输计划也扩大和加快了。再则，1941 年 6 月 22 日德军入侵俄国后，对 516 美国的资源又增加了要求。丘吉尔和罗斯福答应给俄国援助，7 月 28 日，霍普金斯奉派赴莫斯科，同斯大林取得联系，并了解俄国主要的需求。

在华盛顿，对防务机构再次进行了仔细检查。8 月 28 日，罗斯福建立了

一个“供应、优先权和分配委员会”。打算以这个委员会作为整个防务计划的决策和协调的中心，并以再度经过改组的生产管理局作为它的执行机构。委员会由生产管理局原有的负责成员克努森、希尔曼、史汀生和诺克斯，外加三名官员亨德森、霍普金斯和华莱士组成。纳尔逊被任命为这个新设委员会的执行委员。这个委员会的成立，被新闻界人士称为“实质上是美国经济制度的一场革命”，也被伯纳德·巴鲁克称为“畏畏缩缩地向前走了一步”。从8月间成立这个委员会到珍珠港遭到袭击以后美国参战这一段时期中，民用消费方面实行了第一批大量的削减，优先配给制度也经过了仔细的517检查和修改。

（二）胜利计划

1941年间对美国军火和各项供应的需求剧增，加上美国陆军和海军以及那些已经和德国交战的国家对美国工业提出的相互矛盾的要求，使得下述两种情况越来越明显。必须加速生产，必须确立一种标准，以便对竞相要求供应的各方进行分配。

为了给工业规定生产目标，首先要对那些必须满足的需求有比较精确的了解。这就要求不仅估计美国本国军队的长期需要，而且也要估计可以指望从美国的未来盟友那里取得的贡献——这种盟友当然主要是英联邦的成员国。

显然，首先需要对美国军队的长期需求有较清楚的估计。负责生产工作的人员曾几次试图从军队领导方面获得这种估计，但都未能办到。许多原因造成了军队领导方面的这种拖延。没有疑问，部分地是由于他们一心想要为自己的军种取得尽可能多的份额。以陆军来说，由于长期以来不受重视，它的压倒一切的需要是立即取得装备来武装已经列入计划的兵力，也许因此而使得马歇尔不愿考虑未来进一步扩充兵力的需要。再则，在更高当局对国家的战争政策还没有作出明确决定的时候，要精确估计长期的需要，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有困难。

这是1941年4月的局面，当时陆军部次长帕特森法官提出一项备忘录，迅即得到史汀生的同意。帕特森要求对于陆军部究竟需要生产多少军火作出一个决定，并说他确信必须尽快地决定，为了取得胜利，需要在生产上作多大努力，这种决定的基础应根据明智的设想，谁可能是敌人，谁可能是朋友，哪里可能是战场。6月30日，史汀生分别致函生产管理局的克努森、海军部长、海运委员会主席以及英国供应委员会主席琅维斯，提议需要有一种英美生产方面的全面的贷借对照表。对于英美两国工业计划需要更密切的协调这一点，大西洋两边的有识之士早已认识到。最初促使根据战略计划和英美两国518的工业能力编制一份英美两国各项需要的统一对照表的人，也许是法国人让·莫内，此人在法国溃败以前曾任英法协调委员会主席，以后就一直为英国供应委员会工作。

7月9日罗斯福采取行动。他指示陆军部长、海军部长、生产管理局和哈里·霍普金斯——代表租借物资管理局——修订美国的战略计划和生产计划，使之扩充到可能需要的最大限度，以确保打败美国的潜在敌人。霍普金斯在大西洋会议以前访问伦敦期间，曾和丘吉尔讨论了各项计划，7月25日丘吉尔致电罗斯福。他说，为了取得胜利，“我们应不失时机，立即（一）就我们共同需要的主要作战武器作出意见一致的估计……（二）然后考虑如

何由我们联合生产以满足这些需要”。

“胜利计划”由两国的军事首脑在 1941 年 8 月的大西洋会议上讨论研究，同时也考虑了对俄国的援助。8 月 30 日，罗斯福请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立即拟订一项直到 1942 年 6 月 30 日为止的美国生产的军火在美国、英国和俄国之间的分配计划。

同时，生产管理局调查统计处处长斯塔西·梅奉派前往伦敦，和英国军需主管部门一同作出估计。作为第一步，编成一份直到 1942 年底为止的英国、加拿大和美国的生产和库存的统一对照表。对已有的产品根据战略需要进行分配，以及为了实现胜利而需要增加的数量，先由英美高级参谋将领和官员在伦敦开会讨论，然后英美代表团于 9 月底动身前往莫斯科，和斯大林讨论俄国所需要的供应。

这些估计显示出当时的生产和长期的战略需要之间有很大的距离。既然英国的军工生产不可能再增加多少，供与求之间大得可怕的差额就必须由大大地扩充美国的军工生产来补足。在华盛顿，在估计出美国的陆军、海军和运输需要以后，再加上根据租借法估计要向英、俄两国提供的物资数量，就可能编制出美国总共必须 519 对“胜利计划”贡献多少力量的计划。12 月 4 日，斯塔西·梅把对“胜利计划”所作的最后分析，以及根据美国工业潜力来看此项计划能否实现的一份报告交给了纳尔逊。报告清楚地说明，只要美国人民准备接受一种全面的战时经济，“胜利计划”的目标是能够达到的。1940—1941 年间经历的许多迟延和困难，都是由于美国人不准备经受各种管制和束缚而造成的：一个自由的民族除非在发现自己真正处于交战状态而受到激励的时候，通常是不肯接受这类管束的。不论是政府，还是工厂主，或是劳工，对于要把国家的生产彻底转变为以战争为基础，都没有准备。产量始终未能赶上迅速增长的需要，虽然通过尝试和摸索也应付和解决了许多问题，朝着工业动员迈进了一大步。1940 年第三季度只生产了飞机一千六百十二架、海军舰艇十四艘和商船十四艘，而 1941 年第四季度的相应数字是飞机六千八百八十四架、舰艇三百四十四艘和商船二十九艘。

能否把“胜利计划”所要求采取的管制和束缚强加在处于和平状态的国民身上，这个问题事实上并没有成为一个实际的争端。在此项最后的分析报告提出后三天，日本就动手打起来，次日美国就参加到交战国的行列中去了。

虽然以上各页已经把美国的生产问题一直叙说到它参战的时候，但是还有必要回溯一下 1941 年春天的情况，以进一步阐述美国在作为反轴心国家的一个非交战“盟友”的后期阶段中主要的政治发展情况。

第三节 大西洋战役

1941 年 3 月至 12 月租借法的通过是一种明显的证据，说明大多数美国人同意有必要对英国“除参战外”给予一切援助。问题的关键在于“除参战外”这几个字。美国国内在应该冒多大风险以确保美国物资安全到达英国这个问题上，意见分歧得很厉害。这种分歧甚至在内阁里也存在。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要求采取更直接的行动，而国务院则主张谨慎行事。

直接援助的方法可以把更多的海军舰艇转让给英国，或者让美国海军在大西洋参加护航。其中第二点是 1941 年全国范围内争论的主题。反对租借法的人已认识到对英国租借战争物资的必然结果是要采取行动以确保 520 这些物资的安全交货。他们已经争取到通过了一项修正案，说明租借法不能被解

释为允许美国海军护航，可是未能达到他们的主要目的：明确地禁止使用海军。该议案通过后，辩论继续进行下去。援助盟国委员会发动了一个赞成护航的运动，得到了主要的报纸、作家和演说家的支持。

3月15日，罗斯福在对全国的广播演说中说道，美国决心履行它要做民主国家的兵工厂的诺言，并讲到需要维持“跨越大洋的十分重要的桥梁——替那些为正义而战的人们运送武器和食物的船舶之桥”。至于用什么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则没有说明，实际上也没有决定。

史汀生和诺克斯、斯塔克和马歇尔都相信，由于英国船只损失惨重，英国要保护大西洋的通道，必须有美国海军帮助。美国海军在大西洋护航的计划，已由海军部拟定，并在1941年1月至3月的英美参谋工作会议中经过审查。史汀生在他的日记中记载说，3月24日他和诺克斯都认为紧要关头即将到来，护航是唯一的解决方法，应该立即实行。在华盛顿的英国高级将领明确他说，他们可以动用的海军力量不足以确保运输军需品到英国的船队安全通过。3月25日，德国政府把它的北大西洋作战区域向西扩展到格陵兰海岸。

罗斯福显然曾打算于4月间实行海军的护航计划，可是这时他犹豫不决了。他和赫尔都相信要求国会授权实行护航是不明智的，因为这方面的任何决议案几乎肯定不会通过。赫尔反对任何具有对德交战性质的行动，因为他恐怕这会导致日本根据1940年9月27日的三国公约对美国宣战。他的这种担心由于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和其他日本领导人气势汹汹的言论而显得确有根据；他521们表示，如果美国在大西洋卷入对德国的战争行动，日本将感到有责任履行它根据该条约而承担的义务。4月13日苏日中立协定宣布以后，美国海军在西大西洋采取积极行动的计划推迟执行，而代之以一项扩大海军巡逻的计划。美国请英国人把他们护航队的行动秘密地通知美国海军当局。西半球的安全区扩大到包括西经26度以西所有的北大西洋水域——大致占大西洋的一半。美国海军奉令尾随在这个界线以西发现的轴心国家的船只和飞机，并“播送出……它们的行动，每隔四小时播送一次，或者必要时增加次数”。美国海军又奉令防止对美国航运的干扰，但须注意“避免介入或者干涉交战国的武装交战”。4月25日，罗斯福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扩大巡逻的范围，并且说，巡逻将进行到“为了保护本半球而必须深入的七大海洋的水域”。5月间，美国在太平洋的舰队大约四分之一的力量转移到了大西洋。

罗斯福原定于5月14日就美国的政策发表一篇重要的演说，后来延期到5月27日。在发表这篇演说以前，内阁内外支持和反对采取强硬行动的人都加倍努力，想说服罗斯福采纳各自的观点。结果，大家热切等待的这篇演说却折衷了两派的观点。罗斯福指出，美国的海军巡逻有助于确保援英物资可以运到，又说“将采取为安全交货所必需的一切其他措施”。他最后宣布全国处于无限期的紧急状态。但是，第二天罗斯福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他的讲话并不意味着海军将承担护航的任务。

罗斯福还没有准备采取这一步骤，或者请国会修改中立法以使美国商船可以武装起来，运输物资到英国，这种办法是史汀生和诺克斯在5月间公开主张的。罗斯福希望，政府除了把美国的海上边界伸展到西经26度这一步骤以外，正在采取的一些其他办法，可能加强“船舶之侨”。美国已经开始的宏伟的建造商船计划仍然处在初期阶段，可是同时也在试行其他办法，以增加船舶来源。4月10日，罗斯福已要求国会授权征用美国港口中闲着不用的

外国船只。航运路线业经重新组织，以便抽出更多的运输力量用于大西洋。总统于 1940 年 6 月 11 日宣布的作战区域经过修改，使美国船只能进入红海，向驻在埃及的英国军队运送给养。4 月 11 日商定，可以允许那些仅为防御而配备有战斗机的英国商船进入美国港口。

在华盛顿，春季和夏初，另外又采取了两项重要的措施，以加强西半球的防务，并在大西洋的战斗中帮助英国。

第一项是决定承担对格陵兰的保护。若干月来，英国和加拿大一直在敦促美国政府在格陵兰修建机场，以便利输送飞机到英国，或者让它们两国来建造。3 月间，美国政府同意为此目的派遣一个测量队到格陵兰。4 月 9 日，驻华盛顿的丹麦公使考夫曼签署了一项协议，根据协议，美国政府承担在格陵兰建造和保护防务设施的责任。丹麦政府后来否认考夫曼的行动，并要求将他撤职，当然这是出于德国的压力，所以美国政府置之不理。

在 1941 年 4 月 19 日致丹麦国王的一份电报中（电文由罗斯福帮助起草），美国政府说，在当前的情况下，美国不得不把它自己看作是受丹麦的委托来代管格陵兰的，直到丹麦政府不受胁迫，丹麦对格陵兰的控制能完全恢复为止。

第二项措施是有关冰岛的。6 月间，罗斯福和丘吉尔商定，将冰岛包括在美国的防务范围以内。罗斯福在 7 月 7 日致国会的一项咨文中宣布，根据和冰岛政府达成 523 的协议，“美国海军部队已于今日到达冰岛，补充并最后替代迄今驻守冰岛的英国部队，以确保该国有充分的防务”。总统说，美国不能容许德国占领大西洋中的战略前哨，用来向西半球进攻。德国如攫取冰岛，就会构成三重威胁：（1）威胁北美大陆的安全，（2）威胁北大西洋所有的航运，（3）威胁对英国源源不绝的军火运输。罗斯福又说，他已经指示美国海军采取一切必要步骤“以确保冰岛和美国之间的交通安全，以及美国和其他一切战略前哨之间的海上交通”。海军奉命要保证冰岛的充分防务，保卫挂着美国国旗或者冰岛国旗的船舶，使其不会受到敌人的袭击或遭受袭击的威胁，并预先通知西半球国家提防可能即将发生的危险。到作好必要的准备时，海军对冰岛航线上的保护范围将扩大到对其他国家的船舶进行保护。美国军队派往冰岛的时候，事实上已经和英国海军部商定，马上由美国海军护送哈利法克斯和冰岛之间的英国船队。可是由于远东出现了新的威胁，这些计划推迟执行。美国政府从截获到的日本电讯中了解到日本人企图占领印度支那南部的计划，以及 7 月 2 日日本御前会议的一些决议。不过驶往冰岛的英国船只仍获准参加由美国海军护航的船队。

到 7 月的时候，情况已经清楚，不仅美国海军不久将不得不在大西洋承担更多的责任，而且中立法必须修改，以便让美国商船在运送物资到英国方面发挥作用。德国人仍在使英国航运遭受重大损失，而向苏联政府提供军火的决定，更给任务紧张的英国海军带来额外的工作，要 524 在驶往摩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爾这条危险的路线上护送运载物资的船只。不幸的是，在 1941 年夏天，美国人民的心理是踌躇不定的。美国所处的尴尬地位——在和与战之间犹豫不决——造成一种混乱和灰心丧气的气氛。在这种情况下，义务兵役期再延长一年的议案，于 12 月 8 日在华盛顿仅以一票之多获得众议院通过，也许是不足为奇的。当国会在国内辩论这个十分重要的议案时，英美两国海军将领正在大西洋会议上拟订完成美国海军在大西洋参加护航工作的计划。正当这些计划（“西半球防务计划”第 4 号）准备实施的过程中，恰巧

德国袭击了美国的驱逐舰“格利尔”号，给了罗斯福一个必要的借口来正式实行这些计划。9月4日，在美国的安全区域和德国的作战区域交界的地方，“格利尔”号遭到一艘德国潜艇的攻击，当时它正在跟踪这艘潜艇，并将其所在地点发信号告知英国空军巡逻机队。9月11日，罗斯福通过电台对全国同胞讲话：

现在是需要积极防卫的时候了。……我们的巡逻舰艇和飞机将保护在我们防守的水域里从事商务活动的一切商船——不仅是美国船而且是悬挂任何国旗的船。……从现在开始，如果德国军舰或者意大利军舰进入为美国防务所必须保卫的水域，一切后果要由它们自己负责。我作为总司令已经向美国陆军和海军发出命令，执行这个政策——立即执行。

总统下达的“一看到就开炮”的命令，结束了美国海军在这以前一直面临的那种尴尬的情况。今后它有权攻击在其执勤地区以内的轴心国的船只，而不必等待对方先进攻。从9月16日起，美国海军正式承担它事实上自从8月20日以来一直在执行的任务，直接保护在这些水域中航行的英国北大西洋船队。

虽然罗斯福于9月11日已明白表示正在向海军发出开炮的命令，美国人民似乎还没有完全领会他讲话的重大意义。所以，10月17日驱逐舰“卡尼”号中了鱼雷并死亡十一人时，人们这才发觉该舰是在执行护航任务，从525而引起了国会中孤立主义派议员愤怒的抗议。10月27日——海军节——罗斯福发表了一篇激动人心的讲话。他说，美国人决不会被德国的进攻所吓倒。海军已经接到“一看到就开炮”的命令。他又说，美国决定抵抗轴心国家，这也要求取消中立法中一些妨碍行动的规定。

10月9日，罗斯福已请求国会修改中立法第六条禁止商船武装的规定。他在前言里说，取消这一条，完全不会使美国中立的程度比当时有所降低，而会使它有可能更成功地保卫美洲和更有效地提供援助。他说：“到时候了，我们国家决不能再让希特勒得手，决不能再束缚我们自己的手脚了。”10月25日，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提出要取消中立法中的第六条以及第二条和第三条，后面这两条规定，禁止美国商船进入指定的作战区域以及载运物资到交战国家的港口。尽管孤立主义集团坚决反对，但是规定全部取消所有上述三条的修正法案于11月7日以五十票对三十七票由参议院通过，接着又于11月13日以二百十二票对一百九十四票在众议院通过。从此以后，美国商船既可以武装，又可以载运物资到英国了。

第四节大西洋会议

1941年8月9—12日，罗斯福和丘吉尔会见，举行他们的第一次会议。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乘军舰到达，停泊在纽芬兰阿根夏外面的海湾里——英国政府于1940年9月让与美国的基地之一。陪同他们前往的有双方的主要军事和外交顾问。罗斯福身边有陆军上将马歇尔和阿诺德、海军上将斯塔克和金以及武装部队的其他代表，还有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和哈里·霍普金斯。丘吉尔的顾问们包括英国三军的参谋长庞德海军上将和迪尔陆军上将、空军元帅弗里曼以及外交次官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8月11日，英国方面又来了军需大臣比弗布鲁克勋爵。

会议的主题是英美两国在进行战争和处理战后世界526种种问题时双方的合作。在大西洋会议以前的几个月中，美国的私人 and 官方团体都越来越注意和平日标这个问题。媾和时机到来时美国应该起什么作用，这早在“假战”

期间就已经有人在讨论了。法国沦陷以前，美国国内在考虑媾和条件时，是以假定盟国会战胜为根据的。法国沦陷以后，关于西半球的防务以及对英援助这些更迫切的问题，使得和平解决这个问题已不处于显著的地位。然而，到了年底，由于美国人越来越确信英国力量坚持下去，他们又想起了未来的和平。这种重新唤起的时和平目标的兴趣，由于1940—1941年之交的那个冬季孤立主义者争取谈判和平的运动而受到了鼓励。人们纷纷公开议论英国和美国应该创造什么样的和平条件与环境，并且议论一旦重建和平以后，应该采取什么方法使之保持下去。

1940年12月27日，参议员范登堡曾说过：“如果我们准备赞同英国的作战目标，现在是应该由权威方面来宣布这些目标的时候了。宣布我们自己的目标的时候也到了。”租借法案提出以前，罗斯福在1941年1月6日对国会的演说中也扼要地讲了政府的想法。“让我对民主国家说：‘我们美国人非常关心你们保卫自由的斗争。

我们正在拿出我们的力量、我们的资源和我们的组织能力，使你们能有力量恢复和保持一个自由世界。’”他说，美国正在设法巩固这个自由世界，它必须建立在四项根本自由的基础上：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以及免于恐怖的自由。官方对和平目标的态度，先后由赫尔于5月18日、韦尔斯于7月22日以及伯利于8月8日作了进一步的说明。这些讲话中所阐述的原则有：小国和大国同样享有独立自主之权，在国际监督下裁减军备以及各国经济机会均等。韦尔斯说，必须设置一种“适当的工具”——类似威尔逊所设想的国际联盟——用以实现这些目标。虽然罗斯福同意需要有一个国际组织，但是他认为，在这个组织可能有效地建立起来以前，势必要有一个过渡时期，在这个过渡时期中，美国和英国将作527为世界警察发挥作用。

大西洋会议第一天晚上，罗斯福向丘吉尔建议，由他们发表一项联合宣言，次日丘吉尔提出一份草稿，这是他和霍普金斯已经在航程中讨论过的。原稿说，总统和首相“认为应该阐明某些原则，他们都同意以此为指导来制定政策，并以此为基础希望世界能有一个较好的前途”，接着将这些原则列为五条。丘吉尔的草稿中，头两条没有引起争议，最后一字不改地写进了大西洋宪章。第三条略加修改后罗斯福即同意。第四条远远达不到美国政府在经济方面的和平目标。韦尔斯认为它完全没有意义，只是重复“无数的经济会议所表示的虔诚希望”。它没有保证英国准备废除渥太华协定以及它的帝国特惠权的政策，这种政策是美国人非常厌恶的。据韦尔斯说，第五条美国人也觉得不适当。

罗斯福和韦尔斯另拟了一个草稿，于8月11日同丘吉尔和卡多根讨论。对丘吉尔原稿中的措辞作了部分改动，以表示此项宣言是说明两个友好国家意见一致的共同原则，而不是说明两个盟国协同商定的政策。有关“国际组织”的内容被删掉，因为罗斯福说，这会在美国引起猜疑和反对。后来他同意写进这样的词句：“建立一个更广泛的和更持久的普遍安全体系”。这样讲也许听起来两样，实际并无区别，可是他们觉得这样对敏感的美人会比较中听。原稿中含糊不清的第四条，改得措词有力得多，表明了宗旨：“两国力求使各国人民在不受歧视和平等的条件下，在全世界范围内获得它们的经济繁荣所需要的市场和原料。”然而，这修正的条款立刻遭到英国方面的反对。丘吉尔说，由于它影响到渥太华协定，他没有征求自治领的意见，不

能同意。必须和各自治领政府商量；既然在一个星期内不能指望得到各自治领的答复，宣言的发表就不得不延迟。韦尔斯激烈反对作任何让步以迁就英国的观点；霍普金斯则主张罗斯福接受英方的修改，他的理由是联合宣言应该在宣布大西洋会议的消息时一起发表，认为这样做是要紧的。罗斯福决定不采纳韦尔斯的意见而接受丘吉尔的修改，包括删除“不受歧视”这几个字，并加上“适当地照顾它们现有的义务”这种保留意见。到8月12日，双方就宣言全文取得一致意见，14日罗斯福和丘吉尔宣布，除了正在讨论物资供应问题以及为了对付轴心国侵略而准备采取的步骤以外，他们同意发表下列联合宣言：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和代表联合王国国王陛下政府的首相丘吉尔先生举行会谈，认为应当公布某些为双方接受的原则，作为两国制定国策的共同原则，并据此希望世界有一个更好的前途。

第一，他们的国家不谋求领土或其他方面的扩张；

第二，两国反对不符合有关民族自由表达愿望的领土变更；

第三，两国尊重各国人民选择他们在其管辖下生活的政府形式的权利；两国主张凡是被强制剥夺主权和自治权的民族恢复这些权利；

第四，两国在适当照顾到它们现有的义务的条件下，力求使一切国家，不论大国或小国，战胜国或战败国，在平等条件下，为其经济繁荣所必需，在全世界进行贸易和获得原料；

第五，两国愿意在经济领域内促成一切国家之间最充分的合作，目的在于使所有国家改善劳动标准，发展经济，享有社会安全；

第六，在最终摧毁纳粹暴政以后，两国希望见到建立这样一种和平，以使一切国家的人民得以在自己的国境以内安居乐业，保证一切地方的所有居民都可以终身过无所恐惧、不虞匮乏的生活；

第七，这样的一种和平应当使所有的人能够不受阻碍地航行在公共海洋上；

第八，两国认为，世界上一切国家，基于精神上的和实际的原因，必须放弃使用武力。如果有的国家继续使用陆、海、空军武器，在自己的国境以外进行侵略威胁或者可能进行侵略威胁，那就不能保持未来的和平。有鉴于此，两国认为，在尚未建立更为广泛而持久的普遍安全体系以前，必须解除这类国家的武装。两国也将赞助和提倡其他一切切实可行的措施，为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减轻沉重的军备负担。

在比较迫切的英美合作进行战争方面，讨论范围比会后发表的声明中所涉及的内容更为广泛。讨论的内容涉及美国海军在大西洋的支援、亚速尔群岛受到的威胁、对俄国的援助、物资分配以及抵抗日本侵略的方法。拟定了美国海军护送英国船队从哈利法克斯横渡半个大西洋的计划，这些计划拟于8月间实行，9月间公开。美国的军事首脑还讨论了英国三军参谋长们的一份“全面战略研究报告”，报告建议对英美的作战计划作进一步的改进并付诸实行。丘吉尔和他的军事顾问们显然希望，这次会议的结果会使美国和英国之间有限的合伙关系扩大为更明确的同盟，并使美国早日参加战争。然而，罗斯福和美国的三军参谋长们都不愿签订任何协议而使美国进入完全的交战状态。

因此，美国的参谋长们通知他们的英国同行，虽然他们准备讨论英国的

计划，但不能承担任何实行这些计划的义务。此外，美国人还对“报告”中的许多战略性结论——例如，认为单凭空中轰炸就可以征服德国，而用不着大规模的地面作战——提出了批评，他们很希望有较多的时间来进行研究和分析。美国陆军和海军制订计划的人员回华盛顿以后，对该“报告”作了进一步的研究，他们对英国人提出的许多战略性建议是否明智或适当，更有疑问。他们也不相信“报告”中推断的结论，所谓“美国介入，不仅使胜利有把握，而且会使胜利迅速实现”，认为这种说法不符合事实。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觉得，美国最好还是作为一个非交战国来提供军火和在大西洋进行海军支援，等到它的武装部队发展到一定的规模，能在战争策略的执行和指导方面发挥有效作用的时候再说。

因此，在他们看来，大西洋会议上最紧要的事是根据“胜利计划”从事军火的生产和分配，以执行联合战略。在530这方面，对俄援助问题是一项重要的必须考虑的事。

霍普金斯就访问莫斯科以及在那里得到的结论向罗斯福和丘吉尔提出一份详细报告。斯大林向他提供的情况，使他相信军事形势不是象人们担心的那样无可救药，而且俄国的抵抗力量比英美军事当局所想象的强得多。霍普金斯建议在10月初派一个特别代表团去莫斯科——届时莫斯科前哨的战役大概已见分晓——和斯大林本人讨论整个对俄援助问题。他的亲身经历已经使他明白，苏联政府中没有人愿意向外国人提供任何重要情况，除了斯大林本人。他曾和斯大林讨论到有无可能在莫斯科举行一次会议，斯大林明白表示欢迎。罗斯福和丘吉尔同意应立即准备在莫斯科举行一次会议。丘吉尔说，他将提名比弗布鲁克为英国的代表。人们预料罗斯福将派遣霍普金斯，可是后来，由于霍普金斯的健康状况不佳，就任命哈里曼为美国代表团团长。在阿根廷拟就的一份罗斯福和丘吉尔联名的电报，于8月15日发给英美两国驻莫斯科的大使，由他们递交斯大林。电报中提出一项正式建议，拟在莫斯科开会研究俄国的需要。罗斯福和丘吉尔说，“在这个会议作出决定以前，我们将继续尽快地运送给养和物资”。

大西洋会议上讨论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是日本咄咄逼人的态度。罗斯福和丘吉尔之间就上述这些问题讨论的过程和结果，将在本书的另一编中加以论述。

第五节和日本的关系

1941年春季和夏初，在华盛顿举行了几次详尽的会谈，研究美国和日本之间是否还可能就那些使两国分歧的根本问题达成协议。虽然日本人大谈其争取和平的愿望，但是他们一次接一次提出的建议，却显示他们不准备在有争论的主要问题作出任何真正的让步，这些问题是，继续在中国的战争、日本对它根据三国公约承担之义务所作的解释以及在国际贸易中实行不歧视的原则。

此外，日本的行动以及美国通过截获日本政府发给驻外使节和军事代表的电讯而了解的情况，证实了美国的印象，认为日本领导人不准备错过欧洲战争带来的机会，他们要乘机扩张日本对东亚的统治。美国政府则不准备在援助中国和在欧洲抵抗轴心国家的政策上有所让步——这种政策需要日益增多对英国的援助，并可能需要美国加入这场战争，同德国和意大利对抗。美国政府也不愿意放松对输往日本的重要物资实行禁运，除非它得到某种证明，可以相信日本准备放弃侵略政策。自从1940年7月2日出口统制法通过

以来，这一年美国对日输出受到越来越严格的限制。但是，美国政府亟欲避免和日本打仗，只要还有可能避免的话；另一方面，它正在改建自记的武装部队，并加强英国的兵力。在 1941 年上半年，仍有一点希望（尽管是微弱的希望），指望日本国内那些希望用和平手段达到其目的的比较温和的人士，也许能占好战分子的上风。这种希望，由于 7 月间日本的行动，实际上已经消失了。7 月 2 日在东京召开御前会议以后，接着就在日本动员一百万至二百万人，并采取了其他一些似乎显示大规模备战的步骤。截获到的一份从东京发给日本驻外大使的电讯说：

1. 日本帝国将坚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以对世界和平作出贡献的政策，不管世界形势可能发生什么变化。

2. 帝国政府将继续致力于解决中国事件，并采取措施，谋求南进，以坚固地奠定自存和自保的基础。

5327 月 21 日，日本军队进犯印度支那南部——从这里可以进攻英属马来业、荷属东印度或者菲律宾。美国对这些挑战的回答和日本对美国行动的反应，在本书的另一编中有所记述。

到 1941 年 11 月第一周的时候，虽然罗斯福和他的顾问们已觉察到日本不久就要动手，但是他们却没有预料到日本会直接进攻美国。罗斯福对霍普金斯说，他相信日本会设法尽可能推迟和美国的冲突。在美国以及在英国，人们都以为最初一定是对一个英属殖民地或荷属殖民地发动进攻，或者可能进攻俄国。华盛顿政府所面临的问题是：在这些预料的日本挑战之中，美国应该把哪一种挑战作为“宣战的理由”。

在 11 月 5 日交给总统的一项备忘录里，马歇尔和斯塔克列举了几种可能发生的情况，在这些情况下，他们认为，美国必须对日本采取军事行动，同时他们也说明了所以得出这些结论的总的战略根据。这些都是以英美参谋工作会谈中商定的军事政策和战略为根据的。两国的第一目标是打败德国。而美国如不从大西洋撤回它的大部分航运设备，就不能在远东成功地展开攻势行动，而这些航运设备又是大西洋迫切需要的。因此当时美国的打算是，万一对日开战，暂取守势，同英国和荷兰合作。美国的部队正在菲律宾集结，一方面英国政府则在加强新加坡的驻军。准备到 1942 年 2 月或 3 月时，使在南方对抗日本的西方国家防御力量达到“令人注目的规模”。

备忘录体现了陆海军联合委员会 11 月 3 日一次会议上作出的决议，当时曾讨论了美国对于蒋介石将军请求援助抗日应如何答复的问题。这位委员长吁请美国和英国给予空中支援，以便击退日军可能对云南的入侵；他 533 还呼吁美英发出联合警告，指出这种进攻会损害它们两国的利益。美国军事当局的意见强烈反对提出最后通牒。他们认为，在尚未建立起充分的防御力量以前，应竭力设法和日本达成暂时的协议，即使是对它作出一些经济上的让步也罢。

在截获的另一份 11 月 5 日的日本电讯中，东乡给日本驻美大使野村规定 11 月 25 日为完成在华盛顿的谈判并签订协议的最后限期。随着这个限期越来越接近，危险的迹象大大地增多了。11 月 20 日，野村和新来的日本特使来栖在华盛顿提出一项谋取达成暂时协定的六点建议。罗斯福、赫尔以及政府中的其他高级官员根据截获的电讯，知道这是日本的最后建议，实际上也就是一份最后通牒。

21 日，华盛顿接到消息，说有一支日本军队已经到了帕劳——日本受托

代管的岛屿中距离荷属东印度最近的地点——还说印度支那方面的日军正在加强。被截获的一份东乡 22 日给野村的电讯，把谈判的最后限期从 11 月 25 日推迟到 29 日，可是预兆不祥他说：“限期过后事情会自动地发生。”

日本 11 月 20 日的建议显然是美国不能同意的。这些建议将使日本可以放手继续征服中国和进攻俄国，并使它处于一种居高临下的地位，以后可以重新南进。但是，美国政府也不想断然拒绝这些建议，从而使自己成为造成谈判破裂的一方。再则，参谋长们仍然急于要争取较多的时间以改善防备。因此，在这以后的五天中，罗斯福和他的顾问们考虑了是否可以另向日本提出一个建议，谋取暂时休战或者签订暂时协议，并附带地重申美国在今后谈判中将采取的态度。暂时协议的条款经过总统和他的主要顾问们研究，并提交英国、澳大利亚，荷兰和中国政府考虑。11 月 25 日在华盛顿商定的最后草案，规定休战三个月。它要日本承诺不采取进一步的侵略行动并退出印度支那南部，一方面作为交换条件，将对日本作 534 出一些经济上的让步，包括数量有限的石油供应。

在此期间，蒋介石对于所建议的暂时协议表示强烈反对。他说美国的建议结果会使中国的士气完全涣散。丘吉尔在 11 月 26 日上午送达罗斯福的一份电报里也表示，这样做恐怕对中国的继续抗战可能有不利的影响。罗斯福和赫尔不得不权衡得失，一方面是日本接受美国建议的可能性甚微，另一方面是美国迁就日本会在中国产生不良的后果，并在较小的程度上也在英国和其他有关国家产生不良的后果，同时对美国国内的舆论影响也不好。因此，罗斯福于 11 月 26 日同意赫尔的意见，取消签订暂时协议的建议，只向日本政府提出一些关于太平洋地区全面解决办法的建议，后面的这些建议原来只是打算附带提出的。

这些建议由赫尔于 26 日下午交给野村，建议是根据一向左右美国远东政策的那些根本原则提出的。内容包括日本军队退出中国和印度支那，并暗示日本应放弃和德意两国的联盟。

虽然要日本政府接受美国关于暂时协议的条件，本来就没有多少指望，但是美国政府决定不再努力争取达成这种协议，却使美国的陆军和海军当局大为失望，因为事先没有告诉他们。鉴于有此决定以及前一天接到报告说日本的远征军已离开上海向印度支那方向调动，陆海军当局一致认为应该立即向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陆、海军指挥官发出“战争警报”的信息。27 日，在总统的同意下，发了电报给各前哨指挥官，通知他们谈判已经失败，日本可能随时发动攻势。海军部的电报进一步具体地指出，有迹象表明进攻的目标将是菲律宾群岛，泰国或克拉半岛，也有可能是婆罗洲”。同一天（27 日），斯塔克和马歇尔匆匆忙忙地完成了他们一直在草拟的一份联名备忘录，作了一些修改以适应新的形势，提交总统。这两位军事首脑主张，“只要符合国家的政策，应避免由我们 535 这方面轻率地采取军事行动”。在加强菲律宾美国驻军的计划尚未完成以前，只有在发生他们 11 月 5 日的备忘录里已经陈述的那些意外事故时，才应该采取军事行动。

他们还建议。

如果日军进入泰国，美、英、荷三国政府即须警告日本，越过规定的界线可能导致战争；在发出这种警告以前，不进行联合的军事对抗；立即采取步骤同英国和荷兰取得一致意见，以便发出这种警告。

第二天，即11月28日，华盛顿的军事会议开会，再度研究在即将到来的危机中应采取什么样的政治行动和军事行动时，对这份备忘录进行了讨论。会上一致认为，如果容许日本远征军到达印度支那的南端一带，那不久就会出现一种形势，使得美国必须采取军事行动。史汀生主张争取主动，抢先进攻。但是，罗斯福已经向美国人民保证过，除非美国先受到攻击，否则不会发生战争。即使一旦日本进攻英国属地或者荷兰属地时国会同意宣战，美国也不会举国一致地投入战争。因此，在美国和日本的战争中，最好是由日本人首先采取公开行动。会上商定应警告日本，如果它逾越一定的限度，美国就要与之战斗。同时决定，应起草一份由总统致国会的咨文，把局势告知国会，并准备向日本天皇发出最后的呼吁。

同一天，11月28日，美国政府截获到一份从东京发给驻华盛顿的野村和来栖的电报，通知他们日本政府将于两三天内中断谈判，但日方即将采取的这一行动不可让美国政府知道，因此日本的使节必须保持在华盛顿的讨论照常进行。

12月1日，罗斯福和赫尔讨论了致国会咨文和致裕仁天皇的电报草稿。他们两人一致认为，总统致国会的咨文应该等到向日本大皇作了最后一分钟的呼吁以后再提出。赫尔说，把任何新的情况告诉国会，不可能不使日本领导人捞到稻草，来煽动日本人民的反美情绪，而且在美国国内，国会里面以及全国的孤立主义者也一定会在所建议的警告中找到新的弹药。罗斯福和赫尔还都认为，军事会议28日讨论过的给日本的那个警告（丘吉尔在11月30日给罗斯福的电报中对这份警告极力赞成）是否要发出，也应该取决于日本对罗斯福向裕仁天皇呼吁的反应如何。12月2日，韦尔斯以代理国务卿的身份向野村递交一件照会，要求日本政府解释日军在印度支那的行动。

12月6日（星期六）收到的报告说，一支包括三十五艘运输舰的日本舰队正从印度支那驶向克拉地峡，这预示发动进攻的时刻已经逼近。当天傍晚，罗斯福向日本天皇发出最后呼吁，争取维护和平。同一天，罗斯福通知澳大利亚驻在华盛顿的公使R·G·凯塞说，如果到12月8日（星期一）晚间还未收到天皇的答复，他将于次日对日本发出警告。英联邦各国政府将于星期三上午采取同样的行动。

然而，这个经过长时间辩论的联合对日警告注定了不会发出。就在12月6日当晚较迟的时候，截获并破译了东乡给野村的一份内容很长的电报。内容包括日本政府答复美国11月26日照会的开头十三条，这个复照将由野村递交美国政府。美国的建议被傲慢无礼地拒绝了，日本政府明确表示，它无意放弃在亚洲的好战计划。它谴责美国政府同英国和荷兰勾结起来危害日本帝国的安全，并策划干预欧洲战争，反对轴心国家。把这个电报送给罗斯福的一位海军部官员证实，总统看了电报以后转身对霍普金斯说，实际上“这就是战争。”

复照的第十四条——中断谈判的一条——直到12月7日清晨才截获，大约和截获另外两份非常重要的537给野村和来栖的电报在同一时间。这两位日本使节奉令于当天下午1时（华盛顿时间）递交日本复照，并销毁其余所有的密码本和秘密文件。和早先的一些电报结合起来看，要在1时递交的这个信息正是暗示了日本可能动手的确切时间，但是当然没有说在什么地方动手。这个消息一送到马歇尔那里（星期日上午大约11时30分）。他马上就

发出警告，通知各前哨指挥官。不幸，由于一系列的贻误，马歇尔的通知直到日本人对珍珠港发动突然袭击以后才到达在夏威夷的肖特和金梅尔那里，袭击发生在华盛顿时间下午 1 时 25 分（在檀香山是上午 7 时 55 分）。大约在下午 1 时 40 分，诺克斯打电话给罗斯福说，据来自檀香山的无线电报告，它正在受到空袭。四十分钟后，日本的两位使节来到国务院递交日本的答复。他们解释说，因为翻译电报遇到困难，所以未能按照约定的时间于 1 时到达。

12 月 8 日下午 12 时 30 分，罗斯福到国会要求宣战。他只用了几句话告诉参加联席会议的两院议员，在两国还是处于和平状态的时候，日本背信弃义地进攻了美国。美国的海军和陆军部队遭受了严重的损失。日军还对马来亚、香港、关岛、菲律宾、威克岛和中途岛发动了进攻。两院仅仅以一票反对，立即通过决议，正式对日本宣战，并保证将全国所有的资源用于进行战争。

三天后，12 月 11 日，德国和意大利对美国宣战。

虽然由于明显的理由，当时没有发表美国舰艇和飞机损失的数目，但所公布的消息已足以说明美国受到了很大的挫折。这一挫折对美国人的自尊心是严重的打击。这个被人瞧不起的矮小的黄种人，固然是凭借背信弃义（如同 1904 年在旅顺口一样），但也是由于美国人的疏忽大意和过分自信，在战争一开始就使美国舰队的 538 很大一部分失去战斗力。然而，同时也使整个美国团结起来，以压倒一切的决心尽可能迅速而彻底地报仇雪耻。

人民终于体会到罗斯福一再告诫的真理，就是，美国不可能使自己离开其余的人们而孤立，不能在一个被匪徒行为的原则所支配的世界上祈求和平。

第八编日本 F·C·琼斯

第一章 539 日本“不卷入”欧洲战事 1939 年 9 月至 1940 年 7 月

第一节 对德苏协定的反应和对欧洲战事爆发的反应

日本政府派驻柏林的代表如果不是大岛将军，而是一个比他机敏的人，那么，德苏互不侵犯协定在 1939 年 8 月 23 日签订时，日本人就不至于那样的震惊，那样的感到丢人了。事先曾有很多方面反复向东京提出警告说，如果认为德苏两国因在意识形态上存在着鸿沟就不可能达成任何协定，那是不明智的。日本驻意大利大使白鸟后来说过，他早就认为，东京方面如果继续对拟议中的德一苏公约的条款争论不休，德国将谋求同苏联言归于好，他在 1939 年 2 月，后来又于 3 月，一再提醒东京有这种可能性。他在这件事上的证词，为水井的证词所证实，水井在 1939 年是驻罗马大使馆的秘书之一，同时又是白鸟的私人秘书。后来，在 1939 年 4 月 20 日，里宾特洛甫果然预先通知大岛和白鸟，如果日本继续在签订公约上找麻烦，德国也许会迫不得已去同苏联打交道，其目的是与之缔结一项互不侵犯协定。这位德国外交部长接着说，德国还没有在这方面采取步骤。6 月 16 日，里宾特洛甫再次会见白鸟，告诉他说，由于日本还没有同德国缔结公约，德国将同苏联缔结互不侵犯协定。

但是大岛“是个军人，对这类事一窍不通”（象白鸟向 540 德国驻罗马大使馆参赞普勒森抱怨的那样），他不相信里宾特洛甫的话是当真的。他认为德国外交部长仅仅是虚声恫吓，目的在把东京吓唬得不敢再反对，转而按照柏林希望的方式同轴心国缔结公约。据白鸟说，大岛一再地讲，德苏协定是不可能缔结的。

在东京方面，日本外相有田持同样的看法，因此他只听大岛而不听白鸟的话，对于白鸟的动机，他可能有所怀疑。有田的自信心也不为其他方面的警告所动摇。英国驻东京大使罗伯特·克莱琪爵士说，在这件事发生之前几个月，他就警告过有田，有理由认为德国已在认真地考虑采取这样一个步骤。6 月 7 日，波兰驻东京大使在与有田会谈时，告诉他波兰政府从德国和苏联两方面得到确凿的证据，说明德国和苏联正在积极地详细讨论怎样言归于好。有田在这两个场合都表示不能轻信，不过英国大使后来听说，有田曾发电报向日本驻柏林大使和驻莫斯科大使了解情况，大岛答复说，德苏不可能达成谅解，克莱琪的警告纯粹是英国的宣传。

显然，大岛和有田都不相信，德国会蓄意违背反共产国际公约附属秘密议定书，按照该议定书规定，德国负有义务不得做任何事来改善俄国在远东的军事形势，不得背着日本和不经日本同意便与苏联在政治上达成协议。可是纳粹政府偏偏这样做了。它小心翼翼地把 1939 年 6 月至 7 月在柏林和莫斯科举行的谈判瞒过了日本人，而且这样做是很有理由的，因为它告诉俄国人说，1926 年的柏林条约仍然有效，德国后来并未缔结过任何条约将其废除，德日之间的关系也不是针对苏联的。

到 7 月份较晚的时候，日本政府对于甚嚣尘上的德苏即将修好的谣言显然感到了不安。7 月 19 日，日本驻柏林大使馆参赞宇佐美拜会了德国外交部中职位与之相当的韦尔曼，“十分执拗”地询问了德国同苏联的关系。宇佐美特别提到《新闻纪事报》上的一篇报道，说德苏互不侵犯协定正在谈判中，德国将派遣重要官员去莫斯科。韦 541 尔曼回答说，这个消息“纯属捏造”，他说，柏林和莫斯科之间的会谈只不过是为了促进经济关系罢了。宇佐美表示有点担心，唯恐德国会把它已公开声称无法供应日本的某些类型的机器转

而供应苏联。但是宇佐美显然相信对方所说的并未举行任何政治谈判，并且建议，应由德国驻东京大使馆作出否认，以支持日本驻柏林大使馆已经发出的报告。

直到初步谈判已告结束，里宾特洛甫即将赴莫斯科时，这层帷幕方才揭开。大岛说，“在8月20日或20日前后”，里宾特洛甫打电话通知他，德苏协定即将缔结。

大岛讲，他回答说，这样做是违背反共产国际公约的，是极端背信弃义的行为。但据当时担任里宾特洛甫的机要代表与大岛打交道的海因里希·施塔默尔说，是他“在事情谈妥后”奉里宾特洛甫的命令将消息透露给大岛的，并说，大岛显得极为恼火。

对于日本政府来说，这个消息宛如晴天霹雳，东京方面没有作出什么努力来掩饰其惊慌和痛苦。德苏协定缔结之日，正是日苏两国军队在诺门坎激烈战斗之时，这个协定看来能使苏联在这个关键时刻腾出手来倾其全力对付日本。这个令人惊恐的可能发生的事虽然没有真正发生，但是这个协定无疑是使日本人忍气吞声并承认在争议的地区战败的一个因素。日本人认识到，德国使他们丢了脸，把他们出卖了。木户侯爵（当时担任日本内相）在8月23日听到了这个协定，他在日记中记下了他对这桩他认为是极端背叛的行为所感到的惊讶。

在德苏互不侵犯协定公布以后，日本外务省人士说，这件事并不特别令人感到意外，因为当日本先前表示不愿同轴心国结成军事同盟时，德国就已扬言要采取这样一个行动。但这只不过是企图保全面子罢了。因为，日本的公众固然不知道德国已经违反了特定的条约义务，可是在他们看来，反共产国际公约意味着德日进行合作反对共产国际的老家苏联。然而这时德国甚至不屑于费点口舌同日本商量一下——象日本首相承认的那样——542 就同苏联缔结了协定。因此十分明显，德国已抛弃了日本，使日本在世人的眼中显得滑稽可笑。德国曾反复谈论要“加强反共产国际公约”，而这时那个公约实质上却变成了毫无价值的一纸具文。

因此，日本报刊的评论是非常激烈的。它谴责德国背信弃义，破坏了“反共产国际公约的基本精神”。《都新闻》（8月27日）说，“根本不必再讨论与德国结成军事同盟是否可取了。”对日本来说，假如它能一直坚持这种主张，那倒未始不是好事。

与此同时，德国人一直在试图抚慰日本人被伤害的感情。8月25日，德国驻东京大使奥特拜会了有田，向他解说德国同苏联缔结这个协定的理由。奥特根据指示，着重表明了德国想同日本保持友好关系的愿望，并强调德苏和解对日本的好处，因为这将使德国在帮助稳定俄日关系时发挥有力的影响。有田不愿讨论这件事，他把当天发给大岛的一项指示的复本给了奥特。这项指示命令大岛“通知德国政府，日本政府认为德苏互不侵犯协定的缔结，最终中止了日德之间目前就与意大利缔结三国公约而举行的谈判”。大岛还进一步宣称，德国的行为严重地违背了德日反共产国际公约附属秘密协定，日本政府对此提出严重抗议。

日本的抗议有一段奇怪的经过。白鸟听到这件事后，打电话给日本驻柏林大使馆，劝大岛不要交出这份抗议照会，同时却要求有田通过奥特去提出抗议，“因为我觉得要大岛君这样喝下滚烫的开水，未免太残忍了。”

但是大岛在8月26日已经拜会了德国的国务秘书魏茨泽克，后者拒绝接

受这份抗议照会，劝大岛暂时把它收回。9月初，里宾特洛甫就德日关系的前途问题同大岛作了一次长谈，声称德国准备为日本和苏联调停，并说，此举如获成功，将能导致德日苏三国之间全面和解，这对543日本将十分有利，使日本能腾出手来进一步向南扩张。据里宾特洛甫说，大岛表示完全同意这种观点。

但是，这位倒霉的日本使节未能说服其政府撤销抗议，9月18日，他再次将抗议照会递交给魏茨泽克，说明他是被迫奉命行事，并且说他一直等到波兰危机结束，这一步骤不再使德国政府那样为难时才这样做的。同时，他还把东京抗议的“语气缓和了一些”。魏茨泽克说，他只能以个人名义接下来作为参考之用，而不能以官方的身分接受，但是他愿意帮助大岛了结这件事。据魏茨泽克说，大岛暗示他并不要德国政府作正式答复，日本政府似乎也从未接到过答复。

在大岛和白鸟似乎都准备接受德国方面的解释和建议时，日本的舆论却不是那样。8月27日，日本军部发表了正式声明，宣称日本人民对于德国这个反共产国际公约的签字国和“直至昨天还是日本的友邦”的国家，居然同俄国修好，感到失望。不管欧洲的局势怎样变化，日本反对共产国际的根本原则仍然不变。军部预料日本将成为各方施展“诱惑和阴谋”的对象；但是它将不予理会，坚决执行其对华政策。

军部的声明，用意显然在表明军事当局反对德国的建议，要日本效法德国，也同苏联缔结一个类似的协定。日本的报刊也驳斥了任何这样的想法。反对英国的宣传鼓动在很大的程度上只是摆摆样子，但苏联却被普遍认为是日本最危险的敌人，日本这时事实上正在同苏联交战。日本的报刊甚至发表了汪精卫（蒋介石在中国的亲日的政敌）的一篇文章，文章建议，既然德国已失信于日本，而英法两国也为苏联所出卖，因此这受害的三方可以达成协议，并可以共同向蒋介石呼吁与日本媾和。住在天津的长期受苦的英国侨民，看到德国侨民被日本哨兵打耳光，看到先前一直飘扬在德国汽车上的卐字旗顿时被拔掉，莫不称快。

544 德苏协定对日本国内政治的影响，是使平沼内阁倒台。这是由于平沼曾劝说天皇赞成同德国结成军事同盟以对抗苏联。德苏协定使这项政策变得毫无意义，平沼政府不得不承担责任。因此，平沼内阁于8月28日辞职，组织新政府的任务委托给阿部信行大将。阿部是一个退役的将领，以前服役时间不长，在政界的经历就更短了。实际上他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他之所以被选为首相，是因为别人弄不清他究竟属于日本寡头统治集团中的亲轴心派还是反轴心派。阿部大将暂时还兼任外相，并以烟大将任陆相，吉田海相大将任海相。

阿部政府是一个军阀官僚政府，其中没有各主要政党的代表。正如《泰晤士报》记者所说（1939年8月30日），它是“一个看守内阁”。日本人对之并不热情，事实也证明，在1937—1941年间所有那些短命的日本政府中，它是最最软弱无能的。然而，这个政府的被任命，却是日本外交政策史上的一个里程碑。8月28日，阿部告诉木户侯爵，天皇已训示他竭力执行与英美合作的政策；从下述篇幅中可以看出，他也试图这样做。奥特亲身体验到，德苏协定缔结以后，德日关系明显地冷淡下来，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40年初夏。东京方面的亲轴心派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奥特在1939年10月

报告说，日本政府一直在把外务省和陆军省中一些知名的同情德国的官员调往国外任职，以削弱他们的势力。在欧洲，白鸟于9月初被从罗马召回，大岛在下一个半月也被召回，尽管德国曾作出努力，想要他留任驻柏林的使节。

8月31日，阿部大将发表了一篇广播声明，声称他的内阁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执行日本对华“始终不渝的政策”。政府同外国交往时，将奉行独立的方针。日本将同那些愿意同它合作的人合作，也将“坚定不移地反抗那些阻挠它完成使命的人”。政府将集中力量提高工业生产能力并加强国防。

日本决定奉行“独立”的政策，是出于别无选择的余地。它实际上完全陷于孤立，既被它的反共产国际的伙伴所抛弃，同苏联的关系又濒于战争的边缘，而在天津问题上则同英法两国发生了争执。这时爆发了欧洲战争。9月4日，在内阁会议后，阿部大将发表了下述声明：“面临刚爆发的欧洲战争，日本无意卷入。它将集中力量处理中国事件。”我们将可看到，他之所以小心地避而不用“中立”一词，是暗示日本的“不卷入”态度是以日本的对华政策不受干涉为条件的。政府的这一决定受到了日本人民的普遍欢迎，他们不想再打一场新的战争，而且他们因受到德国的侮辱，这时仍然痛心疾首。

从政治观点来看，欧洲战事的爆发，起初被认为是对日本的一大宽慰。日本希望，无论英国还是法国，这时都不能再对日本的对华政策进行任何有效的干涉。此外，事态不久就变得很明显，苏联一心想把它在东欧的一份战利品捞到手，无心在远东恋战，因此在9月16日商定了诺门坎的停战。但是随后并没有达成里宾特洛甫所希望的全面的俄日协定。日本驻莫斯科大使东乡，对德国提出的为此进行调停的建议很冷淡。大岛和白鸟却渴望这件事能成功，但是他们在日本的影响已经明显地下降了。继任大岛驻节柏林的是来栖三郎，据说他是一个沉默寡言而小心谨慎的人。1940年2月，当那个在“里宾特洛甫官署”中负责远东事务的海因里希·施塔默尔即将同德国红十字会会长科堡公爵担负着友好亲善的使命前往日本时，来栖警告德国外交部政治司司长克诺尔说，施塔默尔和公爵还是不要同大岛和白鸟过分接近为妙，否则效果将适得其反。他也劝德国不要侵犯荷兰和比利时，而是应当尽快把欧洲的战事结束。他暗示，日本也许愿意调停，以便实行停战，届时德国也可为中日冲突进行调停。来栖声称，他和有田是介于大岛—白鸟集团与亲英派之间的中间人物。来栖暗示，想要日本同苏联和解，眼前是没有什么希望的。

这一番话使里宾特洛甫听了很伤脑筋。使他更为恼火的是，两个轴心国在对日政策上一时不能协调起来。墨索里尼对苏联进军波兰，对波兰的瓜分以及接着发生的芬兰战事，感到心烦意乱。他派往东京的大使奥里蒂一直劝日本人避免与苏联缔结任何同盟，而谋求与美国修好。德国向罗马提出了抗议，结果奥里蒂被召回。

可是，俄国人虽然准备和平解决满洲国与外蒙古之间的边界问题以及同日本之间其他悬而未决的问题，但是没有迹象要放弃对重庆的中国合法政府在外交上的支持，从而使日本人大失所望。因此，直到1940年夏天，希特勒同苏联的真真假假的同盟，继续受到东京的敌视，而走“中间道路”的阿部和米内两届内阁，则在全神贯注企图解决一直没完没了的“中国事件”时，逐渐把欧洲的战事看作一种障碍，因为它束缚了德国对付苏联的手脚，又使

日本在抵制美国时陷入了孤立的境地。

在经济上，欧洲的战事为日本制造了新的伤脑筋的问题。1936年时，日本军事首领曾制定了一个扩充军备的六年计划和一个为作战目的而提高工业生产能力的五年计划。这两个计划于1937年起执行，日本的膨胀的预算开支大部分都用在上面；用于中国事件的只是一小部分。在同一年，即1937年，满洲国开始执行工业发展五年计划，以把这个傀儡国家建成一个“大陆上的战争基地”。这个十分艰巨的三管齐下的规划，正在大量地消耗掉日本的资源，使它不能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那样，夺取其对手不得已而放弃的市场，尤其是纺织品市场。此外，为日本和满洲国的发展计划而大量进口原料和建筑材料，正在造成日本对外贸易的严重逆差，耗尽它的外汇储备。为了缓和这些危险的倾向，日本政府曾努力加强547德国、日本和满洲国三方的贸易关系，由德国用其对日贸易的顺差，来支付它进口的满洲大豆。1936年4月底，根据上述原则，缔结了满一德贸易协定，最初为期一年。该协定于1937年延期，1938年9月经过修改后再度延期。

1937年，随后又在1939年，德国的奥托·沃尔夫商行一再向满洲国提供信用贷款，用以购买德国的机器。结果是德日满之间的贸易大大发展了。纳粹政权的重要人物，或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或是显然希望得到私人利益，纷纷准备促进同日本的这种金融上和经济上的合作。

对于日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发展。日本尽管自1930年以来在工业技术上有了显著的进步，但是仍然要从欧洲和美国获取新的工艺知识和某些类型的生产资料，尤其是机床，在这些方面，尽管日本官方对本国的制造商进行了鼓励，但是还远远不能达到自给自足的程度。日本进口的机器主要来自美国、德国和英国。美国是主要的供应者，并有继续获得进展的趋势，因为德国和英国已专注于自身的军备生产。不过德国仍然是一个重要的供应来源，特别在生产合成燃料的专用设备方面。日本要在本土和满洲生产合成燃油的雄心勃勃的计划，能否获得成功，要取决于德国在技术指导和设备方面给予的帮助。

欧洲的战事，加上日德之间在政治上的相互冷淡，严重地限制了两国在经济上的合作。1939年7月28日，在柏林草签了一项新的德日贸易协定。这个协定要等到10月1日正式签署生效，但是日本政府在9月8日宣告，鉴于欧洲的战事，这个协定正式签署和执行的时间必须推迟。德国外交部经济政策司司长维尔不久就大发牢骚说，日本正在“顺从地遵行”英国的海运贸易管制措施，并且不提出严重抗议就接受了英国的禁运货物表。他说，日本也没有协助德国从中国或从荷属东印度获得原料。

1940年3月2日，奥特极力主张柏林在经济方面向日本作出一些让步。但是经济政策司的副司长克洛迪乌548斯在8日答复说，德国无法这样做。即使德国放宽了付款或提供信用贷款的条件，也没有货物可以交付。他还说，里宾特洛甫认为没有必要给予日本任何经济上的优惠，因为过去的经验表明，日本一向是来而不往的。

第二节汪精卫政权在南京建立

阿部内阁公开宣称的要致力于处理中国事件的政策，并没有什么新的内容。日本前几届内阁也说过同样的话，但是这场不宣而战的仗仍然拖了下去。欧洲的战事却激起了日本各阶层的希望，欲将这场令人厌烦的对华战争了结掉。各个沙文主义集团希望日本能从这场战争中脱出身来，以便顺着欧洲事

件的演变过程，朝最方便和最有利的方向放手进行新的冒险。比较稳健和谨慎的人则认为，只要同中国的冲突继续下去，就没有希望真正地改善日本同各民主国家，尤其是同美国的关系。

因此，普遍同意需要同中国媾和，但是，对于取得怎样的和平和用什么方法来取得和平，却有明显的意见分歧。在媾和的条件上，主要的分歧在于，有些人满足于日本在内蒙和华北确立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的统治地位，而另一些人却希望把这种统治扩大到全中国。前者是从日本对付苏联的战略地位来考虑的；他们还希望，如果日本撤出华南和华中，并把那里的重要水道向各国的航运和贸易重新开放，英美可能对东亚新秩序采取比较友善的态度。较为激进的一派则希望保留并扩大日本人在所有被占领的中国地区已经建立的对交通和贸易的垄断；同时，考虑到将来有可能同民主国家发生冲突，这一派还反对日本从华南的作战基地——包括海南岛——

撤军。日本驻中国的陆军，在一定程度上还有驻在那里的海军，均持后一种观点，因为他们从出卖许可证和通行证给中国人和外国人而拥有既得利益，也因为日本军队 549 及其随军的文职人员通过经济上的垄断而获得了利益。

日本政界和军界领袖大多在内心里已逐渐认识到，只有蒋介石将军本人，才是值得与之媾和的人，因为，即使签订一个仅能满足日本最低要求的和约，也只有他具备足够的力量可使中国人接受。所以，尽管日本人对于使重庆政权垮台和由日本扶持成立一个新的“国民政府”

议论纷纷，但是迄今还迟迟没有采取过这样的步骤。他们在华北和华中建立的地方政权，起用了一些资格虽老然而庸庸碌碌的食客，倘若同重庆的问题解决了，这些人是很容易被一脚踢开的。

汪精卫及其党羽的变节，是国民党队伍的第一次分裂。他们被接到了上海，并在日本的武力保护下安置在那里。1939 年 8 月，他们召开了所谓的“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并自命为“正统国民党”。他们的和平宣传特别着重争取住在上海租界内以及住在香港和南洋的金融界和商界有影响的华人。倘若他们此举成功，他们的行动将朝着实现日本的希望迈进一大步，但是他们取得的进展是有限的。

欧洲的全面战事爆发，对中国有不利之处。中国政府本来希望日本将会卷入，但是日本却没有卷入。英法两国自此以后发现难以象先前那样继续在道义上和物质上对中国进行援助，而美国的主要注意力则将比以往更加集中在欧洲的事务上。德苏协定的缔结也在重庆造成了一些不安，这种不安情绪更因德苏瓜分波兰而加剧了。

倘若苏联同日本达成协议，中国会遭到象波兰那样的命运吗？或者，苏联是否要国民党向中国共产党让步，才肯继续支持和援助中国呢？日本人以及投靠他们的中国人大肆散布谣言说，苏联正打算采取这种或那种行动。但是事实上在这个关头，苏联并没有采取这些行动。1939 年秋季，莫斯科和重庆都否认了俄国在新疆和内蒙方面向中国提出领土要求的报道。此外，俄国人还根据中苏贸易协定，增加了对中国的信用贷款。1940 年 1 月 18 日，斯大林在答谢蒋介石祝贺他的六十寿辰时，希望中国能战胜“一切敌人”，这句话虽然有些含糊，可是东京方面听了很不受用。

俄华贸易主要沿着通过新疆的漫长道路进行，因此在数量上必然是有限的，但是，苏联的友好保证，是对重庆的一种鼓励，同时又使日本人和汪精

卫正在制造的谰言不攻自破。俄国驻在重庆的军人暗示，尽管有诺门坎的停战协定，苏联与日本仍可能因为两国之间存在很多有争论的问题而重启战端。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以及其他一些原因，日本向重庆提出的和议，在 1939 年间没有产生明显的结果。

因此，日本政府乃乞灵于这样的计划，即以汪精卫为首，成立一个分庭抗礼的中国“国民政府”。1939 年 6 月，汪精卫赴东京，平沼内阁保证给予支持。但在平沼下台以前，这件事没有明确的着落。1939 年 9 月 13 日，阿部内阁发表了一个国策声明，其中特别谈到，“有鉴于蒋介石政权的势力日见衰微，考虑到中国新的中央政府不久即将成立，本政府将积极帮助这个新政权成立，并将进一步努力，通过适当的和及时的措施，使中国事件得以完全解决”。

但是，不久就变得很明显，在成立拟议中的新政权方面，存在严重的困难。首先，华北的日本军事当局反对在日本的保护下成立一个新的中央政权的主张，同时也反对汪精卫本人。它希望把日本的控制范围限制在以黄河为界的一片地区，并使这片地区脱离中国其余的地区而独立。汪是广东人，在北方华人中没有重要的追随者，而北京的日本当局则一直在努力说服从前的吴佩孚大帅东山再起，来领导“临时政府”。吴是一个武夫，他的名望一度很有号召力，但是他始终拒绝替日本人当傀儡。他在 1940 年 2 月去世，日本人想利用他的希望落了空，同时也可能由于这个缘故，华北的日本当局无可奈何地默认了汪政权。

而且，还有一个比华北日军当局的“地方主义”甚至更大的困难。这是由于日本政府与汪精卫“国民政府”

之间将要商定的媾和条件的性质而产生的。这些媾和条件实际上是要作为引蒋介石上钩的诱饵。东京方面希望这位大元帅能设法接受这些条件，如果他仍然顽固不化，那末他的追随者中就将有许多人转变立场，使他势单力薄。东京政府的支那事务局局长柳川将军明白地表示了这一意图。1940 年 2 月，他告诉日本国会说，一旦重庆政府或是要求议和，或是同意并入（汪的）新政权，或是愿意同新政权合作，日本同中国之间的和平就来临了。

但是，日本政府如果想要得到其中的任何一个结果，媾和的条件就必须有所节制。日本政府尤其需要认真地履行近卫亲王在 1938 年许下的诺言，中日经济合作将在平等基础上进行。这意味着，日本军队将不得不放弃它对中国的经济资源、工业和交通实行垄断管制的政策。阿部大将本人似乎是理解这一点的。在当临时首相之前，他曾经声称，日本的错误在于要求中国对它效忠，而不是要求中国进行“真诚的合作”；他还把西方国家对待中国的“诡计多端的慷慨大方”，同日本对待中国的“度量狭窄、吝啬小气”作了对比。

汪精卫及其同伙，尤其是汤良礼和周佛海，他们在上海办的报刊上，偶尔也在日本的报刊上发表文章，表示了大致相同的意见。例如，汪在他办的《华中日报》1939 年 11 月 23 日的社论中，断言日本卑靠自己不能成立一个新的中央政府，断言日本在东亚确立其领导地位的前景，取决于它能否以英法同中国进行合作的那种精神来同中国合作。他还说，除了在蒙古的驻军外，日本军队应全部从中国撤走，中国的经济权利应保持完整独立。由于汪已死心塌地投靠了日本，他个人的意见对日本人起不了多大的影响，而人们却认为，他是受到日本政府的怂恿才这样写，以间接地对驻华日军施加

压力。意味深长的是，日军在上海的发言人对汪的文章进行了严厉的抨击，并且清楚地表明，汪的要求超过了日本军方准备作出的让步。

驻华日军总司令是西尾大将，他的参谋长是先前在平沼内阁中担任陆相的板垣将军。另一个权势人物是影佐中将，他领导着驻南京日军的“特别课”，是当时南京傀儡政权的真正主子。1939年11月24日，据说东京政府曾派一个密使到南京见西尾和板垣，向他们传达了政府对于媾和条件的看法。在东京方面，陆相说明了即将采取的对华政策已于11月1日由支那事务局决定。18日，首相说，在中国成立新的中央政府的准备工作已接近完成。但是，此后在外表上没有进一步的发展，直到12月24日，阿部大将告诉新闻记者，汪精卫同日本政府的谈判这时已告完成，并再次说新的中国政权不久就将成立。

1940年1月4日，驻华日军代表据称已带着他们的“基本媾和条件”到了东京。据说，日本内阁会议在第二天对此取得了一致意见，并将意见告诉了支那事务局，由该局在7日通过。1月8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提到先前在1938年11月3日和12月23日对日本在中国的目标所作的解释，说汪精卫的目标“同日本的明显意图是完全一致的”，日本政府将“尽一切力量来帮助成立和扩大拟议中的中国新政府”。但是虚弱的阿部内阁已在摇摇欲坠553了。它在1940年1月15日倒台；新任首相是海军大将

米内，他在1939年间曾坚决反对板垣的与轴心国结盟的政策。据说两个人因此而互不理睬。

与此同时，汪精卫的两个追随者陶希圣和高宗武背弃了他，于1月13日从上海逃到香港。1月21日，他们在香港版《大公报》上公布了一个协定，说这个协定是汪精卫和影佐中将在1939年12月30日缔结的。他们还发表了汪同日本人来往信件的抄件，汪在信中要求从关税收入中提取四千万美元，把长江重新向各国航运开放。日本人对后一个要求表示反对。1月23日，中国政府的发言人说，陶、高两人已把协定的影印本送到了重庆。两人说，汪把他同日本人达成的初步协定给他们看了以后，他们这才认清跟随汪是多么错误，于是就把协定书影印下来送到了重庆。协定条款规定，中国将承认满洲国和参加反共产国际公约。日本将在两年内从华中和华南撤军，条件是新政权要对这些地区取得有效的控制。但是在内蒙和华北，日本将常驻军队；在内蒙将成立中日联合行政机构；华北将成为半自治区。海南岛将由日本永久占领，同时在全中国，日本人将在开发矿产、发展工业和经营交通方面拥有特权。

上述条款公布以后，在自由中国掀起了一场愤怒的风暴。汪和日本人显然都很为难。支持汪的人说，陶、高两人透露的协定文本开小是最后的止式协定，只不过是日本人提出的初步要求；汪已经拒绝了这些要求，并已获得修改。但是，陶、高这两个以前支持过汪的人却断言，最后的协定除了在这两项条款上稍有更改之外，和他们公布的那个协定完全相同。

不管这件事的真相如何，风声泄露以后，其后果是坚定了重庆政府不同日本媾和的决心，使许多动摇不定的554中国人决意继续忠于合法的政府。汪在1月16日曾再度向那位大元帅呼吁，要求他在近卫声明的基础上同日本媾和。蒋介石在向全国军民发表的声明中作了答复，他痛斥汪是叛徒，声称同日本达成的这个协定要比1915年5月的二十一条“十倍地致人于死命”。

2月1日，米内海军大将告诉日本国会，处理中国事件的“基本政策”

仍然不变，一个以汪精卫为首的新的中央政府不久即将成立。新内阁的外相有田说了同样的话，他还说日本以及中国的新政权都无意消灭第三国在中国的权利和利益。2月2日，国会会议由于改进党领导人斋藤隆夫对军方在华政策展开了毫无隐讳的抨击而活跃起来。他的发言记录有些部分虽被禁止发表，但是泄露出来的内容已足以说明他的主张。他问道，中国事件还要持续多久，假定近卫所作的日本不强要中国割地赔款的诺言实现了，那么日本的流血牺牲和财富损失将得到什么报偿。他说，在欧洲，“建设新秩序”一词实际上意味着征服和破坏，他问，近卫的几项原则是否真正表达了政府对华的全部意图。他发言的用意是指军方事实上正在试图使中国屈服，而不善于认真玩味近卫声明中那些中听的话。

日本政界和外交界有相当多的人与斋藤有同样的看法。其中有些人在同英国大使及其美国同僚约瑟夫·C·格鲁私下会晤时曾表达了他们的看法。克莱琪和格鲁都希望，这种情绪能增强到足以使日本政府结束对外国在华权益所作的军事干涉，并向中国提出媾和的条件，这些条件就是放弃以建立东亚新秩序而体现出来的全部政策，放弃组织一个经济集团观念。这样一种发展，将结束西方民主国家与日本的对抗，从而可能使日本不致渐渐投入德国阵营。

美英两国的使节竭尽所能促进日本方面在政策上作出这样的改变，自然是一种稳妥明智的做法，但是，阻力非常大，或许竟是无法克服的。日本参谋本部认为，在内蒙古和华北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占有统治地位，是同苏联作斗争的一个必要的预备措施，因此，一项解决办法如果连这一点都不给日本，是不会为日本军界中任何一个部分的意见所容忍的。日本在1937年之所以同中国开战，正是为了取得这个统治地位，如果得不到这种统治地位，军方在国内就将威信扫地。另一方面，自由中国政府不会默许这些地区被永远分离出去而成为日本的保护国。于是，在华北开始的这场斗争，就扩大到了全中国，因而从日本的立场来看，那些鼓吹日本通过一个卑躬屈膝的中国政权来实行对全中国控制的人们，不无一定的道理。如果日本只占有华北，而把中国其余的地方留给一个独立的中国政府，一旦日本与第三国之间发生冲突，这个政府将会采取怎样的行动呢？

此外，尽管日本的某些金融和政治集团在私下可能表示如何不满，它们却不敢公然站在反对军方的立场。这种情况已屡见不鲜，而在斋藤事件的结局中再度得到证实。斋藤只不过是行使言论自由的权利，军方却非要他受到惩罚不可；同往常一样，军方得到了胜利。斋藤被迫退出改进党，3月7日，又被逐出国会。陆相畑大将重申了在华建立新秩序的意向，他说，为此目的，已经有十万名日军献出了生命。3月9日，日本众议院通过决议，宣称日本已经坚决而明确地制定了处理中国事件的政策，并保证众议院将坚定不移地支持“圣战”

的目标。

与此同时，在青岛正举行着冗长的会议，处理拟议中的“国民政府”与中国沦陷区已由日本扶植起来的政权之间的关系。结果是，汪的政府虽然把所谓的南京维新政府的班底并了进来，但是他对华北的傀儡政府却只取得了完全是有名无实的管辖权，尽管后者的名称从华北临时政府改为华北政务委员会。他同蒙疆（内蒙）政权的关系甚至更加微妙，“满洲帝国”则仍然完全独立，不受他的管辖。而且，青岛会议作出的决定并没有缓和华北的

傀儡及操纵他们的日本人正在显示的对汪所怀的敌意。

在3月12日孙中山逝世纪念日，汪精卫正式宣布他打算建立一个新政权，日本首相在第二天就保证日本给予支持。3月16日，选任前任首相阿部大将为驻汪政府的大使和特使。汪政府于3月30日在南京举行就职典礼。当天日本政府再次发表声明，重申对汪精卫和对建立新秩序的支持，但否认要排斥“第三国从事那种符合东亚新形势的和平经济活动”，并提出这些国家应当承认新政权。

中国的合法政府发表了一个声明作为答复，痛斥汪及其党羽是卖国贼和日本人的奴才。中国政府预先发出通知，不论在法律上还是在事实上承认南京政府，都将被视作不友好的行为，是违反国际法和违反已经缔结的条约的。合法的政府重申它将继续抗战，直至把日本人全部赶出中国领土。

然而，蒋介石实际上却大为惊恐，他这时一再要求美国对日本进行制裁，对重庆给予财政援助。但是，制裁在当时根本不可能，而财政上的援助也只能很有限。3月7日，美国进出口银行给予中国政府二千万美元的信用贷款，规定以中国出口的锡偿还。日本外务省发言人称此为“不友好和不受欢迎的行动”。3月30日，科德尔·赫尔发表一项声明，指出汪政权的成立是日本在中国建立政治和经济霸权计划中的另一个阶段，并宣布美国将继续承认重庆政府是合法的政府。但是，在这个阶段，美国除了口头抗议以外，不能再有什么举动。

1940年上半年，英日关系有明显的改善，这在英国557和自由中国引起某些忧虑，担心英国政府对其在华政策要作某些变更。英国驻东京大使3月28日在日英协会发表的演说中，有几段话使人更为担心，他谈到了英日相互疏远的后果，然后表明，两国最终都致力于持久的和平，而使两国的政策目标达到完全一致，肯定是那些有建设性的政治家们力所能及的。可是，4月3日哈利法克斯勋爵在答复议会的质询时，却保证英国的政策不会改变，保证罗伯特·克莱琪爵士也不曾想暗示有这样的改变。这位外交大臣又说，英国继续承认重庆，并不妨碍它同日本交好。从这些话和从克莱琪在回忆录中所说的来看，似乎英国政府仍在希望日本的政策有所改变。东京的报刊评论表明，日本人并不把英国大使的话理解为英国打算承认汪精卫政权。

事实上，日本自己也缩了回去，直至11月30日，才把它一手包办的事确定下来，公布了同汪精卫政权缔结的正式协定，尽管有迹象表明，该协定及其附属议定书在几个月前就已起草。南京政府的成立决没有结束日本两派意见的争论，一派赞成直接同重庆谈判，另一派却认为，到一定的时候，汪会在中国人中间得到足够的支持，而使他的政权真正起作用。在1940年的夏天和秋天，日本继续提出建议，倘若重庆方面在其间任何时候作出响应的話，要结束掉分散的汪政权是不会有困难的。

的确，1940年春天和夏天，德国在欧洲的胜利所造成的新形势，增强了日本想迅速同中国媾和的希望，并指望通过与重庆直接打交道来达到这一目的。可是，这样做的动机，却与当年早些时候显示出来的那些动机大不相同。过激派是想甩掉日本“脚上的镣铐”，以便“对欧洲的战局采取更积极的政策”。主战派的愿望固然是要加558紧支援德国征服者，但在这之外，也还存在一种潜伏的忧虑，不知道德国如果大获全胜之后，会在远东采取怎样的政策。德国至今依旧承认重庆政府，对东印度和太平洋也可能有野心。另外，这些人还指望，如果从预期日本能在东南亚征服的成果中分出一份给蒋介石作为

钓饵，也许能诱使他听从东京方面的建议， 第三节流产的格鲁—野村会谈

1939年9月23日，阿部大将辞去外相后，由海军大将野村吉三郎继任，谷正之任外务次官。新任外相对外交缺乏经验，他喜欢自称是一个单纯的水手。他以前当过驻华盛顿的日本海军武官，在美国海军界很受欢迎。任命他的用意，是向美国作出友好姿态，表示日本新政府渴望两国弃嫌修好。1911年签订的商务协定即将满期，美国主张禁止对日贸易的情绪日益增强，使日本政治家中那些比较谨慎和头脑冷静的人以及企业界和商界人士大为惊慌。因此，他们急于要在新的协定谈成之前，达成一个暂时的通商办法，以维持已有的贸易关系。

至于美国政府，它也不愿使事情走向极端。美国驻东京大使于1939年夏天和秋天正在国内休假，他同总统和国务卿经过深入磋商，认为经济制裁不能迫使日本从中国撤军，并担心这样做会导致战争。他和他的英国同僚都希望，日本既然未能使中国屈服，最终将被迫重新制定政策，并放弃在新秩序中所包藏的垄断野心。同时他认为，美国如果坚决反对日本的军国主义企图，并使日本的舆论界认识到美国决不会同意日本统治远东，这样就有可能加速促使日本改变主意。

因此，格鲁返回东京后不久，就于1939年10月19日在日美协会发表了一篇经过仔细推敲的演说，目的是要使尽可能多的有权势的日本人了解，美国对日本的舆论变得强硬到什么程度，以及为什么会这样强硬的原因。他告诉听众说，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都对新秩序有清楚的了解，知道这意味着“一种闭塞排外的经济体系”，美国决心维护通商机会平等的原则，对于日本军事当局侵犯美国根据条约在中国享有的权益越来越恼火。这篇坦率的讲话用意是要向日本政府表示，日本如想在商务协定满期之后继续维持正常的贸易关系，明智的做法就是取消对在华美侨的活动所设的障碍和限制。美国政府一面这样向日本表明它仍然坚定不移地反对日本的对华政策，一面仍不采取任何公开反对日本的措施。在欧洲战事爆发前不久，蒋介石在致罗斯福总统的信中曾建议，召开一次会议来解决远东的冲突，假如日本拒不同意，就开始对它进行经济制裁。这个建议于1939年11月2日正式提出，但彼对方拒绝了，理由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要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一冲突，就只得承认日本在其军队已经征服的东西中，有合法的权利占有其一部分，同时鉴于当时的世界形势，要召开会议来考虑对日本采取经济制裁，也行不通。

格鲁希望首先解决由于日本轰炸和其他军事行动而使美侨受到伤害和美国在华财产遭损失的三百多起赔偿问题。此外，他还想使长江重新向各国贸易开放。当时，除了从上海到江阴这短短的一段航道以外，这条大江仍然不向第三国的航运和商业开放，尽管日本在这个地区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早已停止了。日本的商船表面上出租作为军用，实际上垄断了长江的航运业务，这已是公开的秘密。由于日本商船不够用，中国人又不愿意用日本般运货，长江以往的巨大贸易额减少得可怜，结果不利于日本商业利益，正象不利于其他国家的商业利益一样。但是，日本军方那些主张垄断的人及其随军人员却不愿意放松对长江航运的控制；英美两国政府虽一再抗议，迄今仍未收到明显的效果。

1939年10月2日，野村海军大将声明，新秩序并不要消灭外国在华权益，他还说，他认为日本必须举出具体的事例，来说明它无意于这样排外。格鲁对日美协会发表演说以后，取得的间接结果是美国大使和日本外相举行

了一系列会谈。11月4日,在第一次会谈中,格鲁提交野村“一份详细清单”,列举了从1937年以来美国在华利益受到侵犯的情况,还附了一份日本曾答应赔偿的清单。他提出警告,日本当局必须表明,他们将停止轰炸美国产业,不侮辱美国侨民,不侵犯美国在华商业利益。他指出,若不如此,也许就不能顶住美国公众要求禁止同日本贸易的压力,他还提议,重新把长江向美国商业开放。野村在答复时表明,日本无意把美国的利益排挤出中国,但是他指出,美国如继续支持重庆,将为解决美国的要求造成障碍。

第二次会谈隔了一个月才举行,在这期间,谣传苏日即将达成政治协议,东京方面还暗示,将同莫斯科在商业上达成协议。12月4日,在第二次会谈中,野村重弹老调,保证从未存心使美国财产遭受损失,他说,日本采取的各种限制和垄断办法,纯然属于战时措施,一俟和平恢复就可取消。他举例说,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来促进日军占领下的一些地方对美国的出口,并说,美国提出的赔偿要求,其中有三十九项具体要求已经解决或即将得到解决。其他要求也将尽快地处理。

直到此时,会谈进行得很顺利,但是,正如美国国务院所说,这还仅仅接触到问题的边缘。在华盛顿,赫尔于11月24日告诉日本大使,美国政府认为自己没有义务要提出改善两国关系的措施。这清楚地表明了,如果561日本想在同美国的商务关系上采用它所希望的暂行办法,那就得作出某些实质性的让步。

12月18日,举行了第三次会谈,这一次,野村宣布日本政府打算再过大约两个月将长江向各国航运开放。

但是他又说,由于在中国的军事行动,暂时很可能不得不强加某些限制。在经济垄断和日本在华发行通货的问题上,野村含糊其词;显然,在这些问题上,军方将不会让步。与此同时,野村提出一个暂行办法,以指导1940年1月26日以后的日美商务关系,他极力主张,为此而举行的谈判应毫不迟延地立即开始。日本已经作出了让步,这时想要美国投桃报李。日本报刊评论说,日本已经送了美国“一份圣诞厚礼”,美国这时总该将商务条约展期作为报答吧。日本有些民族主义色彩较浓的报刊对于日本作出让步感到不快,宣称外国在内河的航行权乃是旧秩序的残余,同日本要建立的新秩序是根本不相容的。

这些报刊还预兆不祥地说,假如美国的反应不象预期的那样,野村将招致严重后果。在上海,日本军方发言人宣称,外国人的“挖苦、怀疑态度”,将激怒日本的公众舆论,妨碍日本作出更多的让步。

但是,当日本人在大谈特谈他们的“慷慨大度”时,有关的外国商界却倾向于认为这份“圣诞礼品”是过分菲薄了。长江将只开放到南京为止,这意味着富有的中游一段,包括芜湖、汉口这些重要的销售中心,将仍然被日本人垄断。而且,这种受到约束的外国航运业务,甚至也要受到日本军方的限制,外国商界有长期令人痛心的经验,知道这可能会要承受多么大的负担。因此,外国航运界对日本的声明显然缺乏热情。

美国国务院在12月11日决定,等1911年的条约满期以后,暂时不对日本的货物或商船征收差别进口税或吨位税。国务院提出要利用格兰特总统原先在1872年发表而后来一直没有废除的一项声明,来达到暂不这样征税的目的。格鲁在2月18日接到了这样的通知,但同时又接到指示说,美国政府认为,在商业往来中,包括562美国同第三国的贸易在内,应一视同仁,对此

事先取得谅解，乃是谈判新商约的必要前提。

同一天，格鲁大概在同野村会谈之后，向国务卿建议，由美国政府提出一个暂行办法，或是提出举行谈判订立新约，新约的批准应以日本履行它已经作出的诺言为条件。他认为，这样一个步骤将能支持日本政府顶住军方批评政府的人，因为倘若野村的建议遭到断然拒绝，那些人将更加振振有辞。赫尔不同意。他认为，日本政府同日本军方没有重大的意见分歧，他还认为，无论如何，要是军方不赞成政府，没有一个日本政府能够长期维持下去。因此，在罗斯福总统的同意下，赫尔在12月20日答复说，美国政府不准备就缔结新约举行谈判，同时在目前也宁愿把采取暂行办法的问题搁置起来暂不解决。

不过，美国通知野村说，原有条约的满期，不会造成中断商业往来或改变吨位税和关税。华盛顿在这些问题上将保持行动的自由。

同一天，12月20日，对输出炼制优质航空燃油的资料和设备，实行了“道义上的禁运”，这些东西，日本有关方面一直在想方设法从一家美国厂商弄到手。日本在1940年1月6日提出了抗议，结果赫尔和日本驻华盛顿大使堀内相互进行了尖锐的指责。

12月22日在东京进行第四次会谈时，野村向格鲁表明，他对美国的反应感到失望，他再次催促要与对方协商一个暂行办法，该办法的草案已发给堀内，准备在适当时候送交美国国务院。格鲁在答复时显然说得很明白，希望日本多多尊重美国根据条约在中国享有的权利和利益。12月27日的日本报纸《报知新闻》和《读卖新闻》说，美国正在要求开放南京上游的长江，取消日本在华中和华北实行的汇兑管制，改组华北开发公司和华中振兴公司。

但是，野村已经作出了军方所能允许的最大让步，而563且，他正遭到他的对手们日益强烈的反对，说他在“绥靖”美国。12月27日，军界和政界有五百多知名人士在东京集会，通过决议，特别反对再向英美作任何让步。这些人中间，有曾在平沼内阁担任外相的有田。面对着这场酝酿中的风暴，阿部和野村都无法取得进展。格鲁和野村此后似乎都没有再举行过会谈，1940年1月中旬，阿部内阁倒台。接着上台的是以海军大将米内为首的内阁，有田再度出任外相。

1月18日，有田通知格鲁，他已指示日本驻华盛顿大使同美国国务院继续研究原有商约满期后的商务关系问题。第二天，有田宣布，新内阁将履行其前任对开放长江所作的保证。但是，两个国家的观点如此分歧，无法弥合，有田未再继续格鲁和野村先前一直在进行的会谈，他后来告诉格鲁，因为他觉得要在这时候谈判新的商约是白费劲。在华盛顿，美国通知日本大使，不能议定一个暂行办法。因此，在1月26日以后，美日两国之间的商务关系就不再遵守任何条约规定，而是过一天算一天了。

2月1日，有田在日本国会第七十五届会议开幕之际发表的外交政策演说中，宣布日本无意排除美国和其他国家在华的合法权益，但是这些权益不免要受到军事行动的影响。他宣称，日本政府已竭力避免损及外国的利益，甚至不惜造成日军在战略上的不利地位。他声称，没有商约的局面是不稳定的，为相互的关系普遍地带来了困难，这是不合乎日美两国需要的，日本将再作进一步的努力，争取缔结一项新的商约。

在此期间，日本报刊对美国一直在进行谴责。连一向观点稳健的《中外

商业》也在2月9日说，美国正在推行一种故意敌视日本的政策，而同一天的《朝日新闻》则极力主张全国要防备出现“最坏的情况”，声称日本一定不能屈服于美国的压力，说美国的目的是要使日本无法建立东亚新秩序。

564 由于野村虽答应开放长江却没有得到他所希望的暂行办法，也由于他胆小懦弱，在对方是否会作出相应让步尚无把握之际就单方面作出让步而遭到了严厉的抨击，因此米内内阁的语气比较强硬。2月17日，有田在国会说，日本政府不受其前任发表过的声明的约束，3月4日，陆相畑大将在国会宣称，长江是否开放以及何时开放，决定权掌握在军方。反对重新开放长江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势力，在日本《改造》杂志二月号刊载的一篇异常坦率的文章中表露了出来。文章的作者指出，恢复他国商行在长江的自由竞争，将毁掉许多已经创办的日本企业。其中包括华中缫丝公司，由于上海的中国缫丝业已经被迫暂时停工，这家公司在当时几乎完全垄断了丝的原料。日本的棉纺和航运公司也将受到损失，而别国具有外汇价值的货币进入中国市场流通，将对日本的军用票产生有害的影响。

日本驻华军官中大多数人的看法是，宁可打仗也不向美国让步，日本至多只能准许美国以日本控制的工商机构为媒介与中国通商，象在满洲国那样。而这种办法恰恰是美国——以及英国——一再提出抗议表示反对的，因为它否定了通商机会均等的原则。但是，日本政府不会也不能在这件事上让步，就连野村已经答应的在长江问题上作出非常有限的让步，也仍然不能兑现。

反之，美国对日本的态度也强硬起来。赫尔认为，日本竭力要使欧洲的战交国家撤走军队和军舰，以及日本扶持汪精卫政权，进一步证明了日本军方和政府都决心要把中国变成第二个满洲国。1940年4月和5月，当日本开始表明关心荷属东印度的前途时，华盛顿认为，这是它对那个地区也怀有侵略野心的证明。这些事态的发展加强了赫尔的决心，只要日本仍准备谈判，就继续同它谈下去，但是不向它作实质性的让步，“使它猜不透”美国的意图。

4月26日，有田向格鲁提出建议，这预示会谈将565在东京恢复，但在上述情况下，不能期望谈判会有什么结果。6月初，日本外相和美国大使开始商谈，范围涉及两国之间的一切争论。在会谈中，有田再度建议商定一个临时的商务暂行办法，并提出美国停止援助重庆政府以及同中国的新秩序合作等问题以供讨论。他还建议把整个太平洋划分为日本势力范围和美国势力范围，由两国采取一致行动予以维持。

这些建议等于要美国承认日本在东亚和西太平洋的霸权。赫尔不赞同这些建议，他一如既往仍然坚决反对任何这样的发展，并想使日本放弃它的帝国主义打算。但要为此目的而对东京增加压力，则时机尚未成熟。当务之急是要阻止日本和德国合作。因此，会谈乃继续下去，目的在故意拖延时间，而不是希望真正达成协议。会谈隔一段时间举行一次，没有任何具体的结果，直至米内政府下台为止。实际上，野村在上年11月倡议的商谈，已足以表明日美两国观点的根本分歧，要解决这一分歧，不是一方改变立场向对方让步，便是诉诸战争。双方这时都还不希望发生后一种情况，因为双方都在注视着欧洲局势的发展，等待着事态演变的结果。

第四节 英日关系

1939年9月至1940年7月

在欧洲战争爆发的头几个月中，日本的舆论在对待各交战国的态度上是有分歧的，但在支持日本政府推行的不卷入欧洲战争的政策上，却完全一致。亲轴心派仍然畅言无忌，渴望同德国缔结军事条约，由于当时对德苏协定群情愤慨，使他们不能取得多少进展。波兰迅速被德国击溃，英法按兵不动，都被德国的对日宣传以及崇拜德国的日本人大加利用，反之，盟国海军所确立的全面的566制海权，未尝不对日本海军界产生了影响。甚至对德国征服波兰一事，也有不同的看法；因为有些日本人同情波兰，认为日本同波兰的关系一贯友好，特别因为日本一向把波兰看作西方防御苏联的堡垒。在大多数日本人的心目中，对苏联的畏惧和猜疑仍然居于支配地位，再加上还有些惊恐，生怕在这场战事中，苏联在欧洲的几个对手也许都会打得筋疲力竭，而使苏联成为主要的得益者。此外，日本人还正在为可能发生其他的情况而担忧。一种情况是欧洲战争可能陷入僵持的和局而很快结束。在“假战”期间，这种情况似乎很有可能出现。另一桩使日本人焦虑的事是，预期德国在欧洲得胜之后，将要进而觊觎远东，同日本的意图发生冲突。在1940年春天和夏天德国似乎快要获得全胜的时候，这种忧虑对日本的政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上述种种相互矛盾的期望和忧虑。

所产生的总的影晌是促使人们支持阿部和米内两届内阁所奉行的政策，即不卷入欧洲战争，力图在欧洲战争结束之前结束同中国的冲突，以免日本可能面临一个敌对的联盟。

至于英国，它因正在与德国交战，故而不愿日本也起来反对它。英国政府希望尽量避免采取任何行动来激怒日本的舆论，迫使日本投入德国的怀抱。因此，英国在运用其海上威力以切断德国与日本的贸易，以及在处理因中日冲突而发生的问题时，都持慎重态度，看来这是明智的。而日本呢，自跻身于大国以来，当一个中立国还是第一遭，因此对作为一个中立国应有的权利就很敏感。它很有理由抱怨德国不分对象地进行潜艇战和水雷战，使日本的航运也同其他中立国的航运一样遭受了损失。但是，由于英国在海上占上风，英国对付德国进口的措施，以及在1939年11月27日的报复令实施后，英国对付德国产品输出所采取的措施，最引起日本的关注，也最激起日本的恼怒。

英国政府在坚持其切断德国海外贸易的总的权利时，作出了相当大的让步来抚慰日本人的感情。在许多567情况下，甚至在报复令实施以后，日本政府向德国购买的商品中，凡是日本迫切需要的，都获准通过英国海军封锁线海运到日本。英国一面又开始同日本政府商谈，目的在缔结一项协议，规定日本出口到德国的物品，以期在发货地点就对禁运品拒绝接纳，但是商谈没有得出具体的结果。这样一种办法同英国与其他中立国商定的办法类似，将是合乎需要的，因为日本取道符拉迪沃斯托克和西伯利亚铁路继续同德国进行贸易，包括输出铜和禁运单上的其他原料。不过，也许由于日本害怕英国会把其海军控制范围扩大到日本沿海，这项贸易后来逐渐地减少了。

战争爆发时，有许多德国商船正停泊在美国港口，不敢再冒险出航。英国政府获悉，德国政府正在出钱要船员取道日本和苏联回国，这些船员正在订购日本船票。德国政府显然打算把这些海员编入德国海军，包括潜艇兵种，英国政府乃决定予以阻止。第一批大约五十名德国海员登上了日本班船“浅间”丸，一艘英国巡洋舰奉命前往拦截。原打算在离日本海岸很远的地方进

行拦截，不料遇到暴风雨，直至日本船已经到达离日本海岸只有三十五海里的地方，这艘巡洋舰才完成任务。1940年1月21日，英国巡洋舰在这里截获并强行登上了这条日本船，从五十名德国旅客中，带走了十三个军官和八个技术兵，其余的人虽是受过训练的海员，却不具备上述那些人的资格，因而获准继续航行。

这件事使日本报刊勃然大怒，出言不逊。“浅间”丸虽在日本领海之外的公海上被截获，日本报刊却说这是在“靠近富士山”和“皇宫附近”发生的；是故意侮辱日本；日本政府必须强烈要求对方立即赔偿损失。日本政 568 府在 1 月 22 日提出的最初抗议中，宣称英国的行为不符合国际惯例，指出按照惯例，一个交战国在公海上固然可以要求交出另一个交战国的国民，但仅限于实际上已编入军队的人员，而这些德国人的情况却并非如此。它诬蔑英国的举动是“严重的、不友好的反对日本的行为”，并提出警告，这种行为如再发生，对日本全国的反英情绪，将更是火上加油。

英国政府在 1 月 27 日答复说，它绝不是存心要蔑视日本的荣誉或尊严，并对“离首都如此近的地方发生”的这一事件在日本引起的轩然大波表示遗憾。英国照会驳斥了日本认为英国的举动为非法的说法，声称带走那些准备回国入伍的德国人，完全有法律和先例可援，而且符合 1939 年德国捕获敌船条例的规定。毫无疑问，从“浅间”丸被带走的那些德国人，是要编入军队的，而且几乎可以肯定，其中有些人将在德国潜艇上服役，而这些潜艇的非法活动，正在使英国也使中立国的人员和航运遭受损失，英国政府坚持其举动有国际法和惯例为根据，并对盟国也对中立国的利益作出了贡献。

日本政府在 2 月 1 日的复照中，对英国的道歉表示非常高兴，但是坚持日本原来的论点，认为英国的举动是非法的。它引证了“特伦特”号的实例和其他的先例，力图说明，不经捕获敌船的程序而把交战国的国民从中立国的船上架走，是不符合国际惯例的。因此，日本政府要求交还从“浅间”丸带走的德国人。

不过，尽管日本民情激愤，两国政府却都不愿为此事决裂。因此，在克莱琪和有田会谈后，达成了个折衷的协议。根据协议条款规定，英国政府一面仍坚持其行为的合法性，一面则同意把被俘的德国人释放九名，交给日本方面，这九个人经查明“比较不适合”服兵役。日本政府则保证，命令日本的航运公司不准那些已经入伍或有 569 此嫌疑的交战国国民乘船。

这个妥协方案是英国在外交上的重大胜利，因为日本政府作出的保证，意味着流落在北美和南美的大批德国后备役军人和技术人员将无法回到德国，英国则不必为了进行拦截而在太平洋上布置巡洋舰，毋需冒同日本发生严重纠纷的风险，就达到了这个目的。罗伯特·克莱滇爵士说，该协议为“东京的日本政府十分忠实地遵守，但是驻在北美和南美的日本领事馆官员却不是那样”。有些德国人经过乔装打扮，或巧立名目混了过去，不过为数不多。

在达成这项协议时，米内政府表现了值得赞扬的坚定意志和克制态度，它没有顺从公众的喧嚣，要日本行使其交战国的全部权力，反对英国在中国水域的航运，以对英国进行报复。日本政府不得不面临着日本的极端民族主义集团对这项协议的强烈批评以及德国的不满。日本政府同意达成这项协议，表明了海军大将米内决心不要卷入战争，也表明了英国称雄海上的实力这时对日本海军界产生的影响。

阿部大将在 1939 年 8 月 31 日和 9 月 4 日所作的政策声明，表明日本欲

利用欧洲战争来促进它在中国的目标，表明日本继续保持中立——或是象它津津乐道的所谓不卷入——用作进行交易的筹码，以使欧洲的民主国家抛弃中国的合法政府。在执行这项政策时，日本政府立刻对外国在中国的租界和租借地增加压力。9月5日，日本外务省向英国、法国、德国和波兰这些交战国驻东京的代表递交照会，宣称欧洲各交战国的军舰和军队驻在中国，可能造成“不幸的事件”，“这种局面也许会迫使日本放弃其不卷入的政策”。因此，日本劝各交战国自动撤走军队。如果上述国家这样做了，日本将乐于对其570侨民的生命财产加以保护。这份照会的抄本也交给了美国代表作为参考之用。

由于德国在中国没有驻扎军队，显然日本对这一措施公开声称的理由只是一个幌子，只是日本想使外国管辖的地区听其摆布所施展的计谋中的又一行动。这样做既要降低西方国家在中国的威望，又将大大增强日本的实力来对付中国的合法政府。但是，日本照会中潜在的威胁，却向英法两国政府提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英法完全有权利拒绝日本的要求，但是如果它们这样做了，结局将会怎样呢？英法两国深知德国人正在竭尽全力诱使日本人与苏联消除分歧，作为日本站在希特勒一边参加战争的第一步，而日本的亲轴心派则赞成这样的做法。更加直接的严重危险是，横行无阻的驻华日军可能与外国驻军发生冲突，欲借此来加速战争的爆发。天津危机的高潮虽然已经过去，但是日本军队仍然封锁着那里的英租界和法租界，并可随时发动进攻。如果西方国家的驻军进行抵抗，日本人流了血，那末日本全国的情绪就会很容易地被煽动起来，达到开战的程度。鉴于驻华日军制造的一连串“事件”，它非常可能采取这样一种做法。

赫尔在他的《回忆录》中记道，早在8月29日，他就接到英国政府的备忘录，说英国驻华军队已接到通知，要避免同日本人发生冲突的一切可能性。英国政府询问，万一英日开战，美国政府是否愿同日本政府交涉以照料在华英侨的生计，如果驻华英军放下武器的话，美国政府是否能使其在美国的保护下被拘留。赫尔在9月4日答复说，美国政府不能预先保证，万一发生这类战争，它将采取什么措施，不过它大概会愿意同日本政府交涉，以保障英国侨民的生计，以及在美国的保护下拘留或撤走英国军队。美国军队将留在中国，以保护那些不能撤退或不愿撤退的美国侨民。

赫尔：《回忆录》，第1卷，第717—718页。

9月6日，赫尔指示美国驻东京代办杜曼告诉日本政府，日本的要求将彼理解为是要排除西方在华势力的671直接步骤，而对美日关系产生不利的影 响。第二天，赫尔告诉日本大使堀内说，日本的意图看来是要把西方国家一个一个地赶出中国。他宣称，美国不会让人家赶出去，同时又暗示，日本如坚持推行这样一种政策，美国将在金融和经济方面进行报复。9月11日，他向英国大使洛西恩勋爵建议，英国政府根本不必答复日本人。显然，英国政府并不想做任何事来降低它在中国的地位和威望，并同美国在那里的政策不协调，但是，看来同样清楚的是，英国政府认为，除非美国作出可靠的保证，万一爆发战争，将给予支持，否则它就不能公然与日本对抗。9月19日，赫尔接到英国的第二份备忘录，说英国希望避免同日本发生摩擦，意欲在不久的将来无论如何撤退在天津的驻军。但是，如果美国采取与西方国家一致的态度，而英军的撤退将会使之变得软弱时，英国将重新考虑自己的态度。

赫尔在答复时详细叙述了他在9月15日同堀内再度会谈的内容，并在9月27日的备忘录中重申了美国要在中国保留驻军。

美国国务院不象英国那样担心日本会同苏联达成协议，从而腾出手来在远东向英国进攻。在这一点上，赫尔当时是正确的。但是，对这种事情显然是不能十拿九稳的，而英国政府则显然认为，美国在中国所能给予英国一点有限的支持，不足以保证使英国冒风险完全拒绝日本的要求。10月3日，英国宣布它在长江的炮舰有五艘将撤走。采取这一措施的官方理由是，这些舰只和舰上受过高级训练的官兵，调到别处将更能发挥作用。10月20日，赫尔接到通知，说英国政府已决定把它在北平和天津的驻军撤走大部分，但不从上海撤军。赫尔显然不赞成这样做，却拒绝加以评论。他只是说，美国在华的军队将留在那里。他提到美国可能再向中国提供贷款，并询问滇缅公路是否继续开放，对此洛西恩作了肯定的回答。11月12日，英国陆军部宣布，为了军事上的便利，572 将把驻在华北的英国军队撤走大部分。在东京，克莱琪把这件事通知了野村，野村听到这个消息“相当满意”。法国政府采取了类似的措施。两个国家都保留了少量象征性的兵力，以维护它们根据1901年辛丑条约所拥有的权利。

11月6日，苏联大使康斯坦丁·斯麦塔宁亲自赴东京；十六个月以来，苏联在日本一直只驻有一个代办。这位大使到任不久，就宣布将开始苏日商约谈判。在英法政府看来，这可能是莫斯科与东京达成政治和解的先声。它们害怕，果真如此，日本将会向英法在远东的利益发动猛攻。因此它们认为，还是设法同日本和解为妙，否则一旦发生战争，就无法自卫。但是，直接对日本让步，会引起英国一部分舆论和美国公众的不满。因此英国政府希望日本与中国恢复和平，这样将能消除英国与日本发生争吵的直接原因。英国政府希望，这样一种和平，如要英国、法国和美国都可能赞成，就必须建立在双方相互作出让步的和解基础上。

洛西恩在11月21日同美国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会晤时，阐述了这样的打算。可是韦尔斯根本不赞成。他不相信苏联与日本有可能达成政治协议，他声明，凡是答应日本在中国拥有任何军事特权或经济特权的媾和条件，美国决不会同意。美国政府也不会放弃其不承认满洲国的政策。他在12月初给英法大使的一份备忘录中，重申并强调了这些观点。但是，这些保证未能消除英法的恐惧。12月15日，洛西恩告诉赫尔，英国政府担心，日本会同苏联达成协议，或对英国在远东的利益造成某些损害。因此英国政府认为，不应错过任何缓和亚洲局势的机会。但是赫尔的答复同韦尔斯先前所说的一样。

苏日之间的政治和解没有实现，但是一种新的因素却以苏芬冲突的形式而产生了。苏芬冲突一度似乎很有可能把英法卷入对苏作战。有鉴于此，英国政府首先要考虑的，就是无论如何要使日本保持中立。1939年12月和1940年1月间，英国驻东京大使和日本外务次官举行了非正式的商谈，讨论仍然悬而未决的日本封锁天津英租界和法租界的问题，但是没有取得什么进展。

在伦敦，日本大使重光和英国外交次官 R·A·巴特勒也不时举行会谈。3月23日，重光向有田报告了3月21日举行的一次会谈情况。重光说，他在这次会谈中向对方说明了中国的局势，并说新的（汪精卫）政府将在3月30日成立。他说明日本的政策是要在中国建立和平与秩序，除了共产党分子

以外，不排除其他任何人。他还说，“如果新的中央政府与重庆政府之间能够达成某些妥协，那一定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据重光说（必须着重指出的是，这只是他个人的说法），巴特勒回答说，英国政府不能改变承认重庆政府为正式的中国政府的政策，“但是他理解我的说明，并希望新政府能够成立。”巴特勒还说，他在当天已发出有关解决天津问题的指示。对于苏联，巴特勒说，工党希望避免采取敌对行动，但是赞成采取这种行动的舆论却越来越强烈。他谈到在扩大反对德国的战争中，必需用封锁或其他办法打击苏联。重光说，日英两国可能在未来达成进一步的谅解，这有多方面的理由，巴特勒表示同意。

英国政策的全部真相至今仍然藏在档案馆内秘而未宣。不过，情况似乎是，鉴于美国的态度，英国政府不能倡议中日之间达成任何妥协的和平，但是英国仍希望这样一种和局能够拼凑起来。这将为英日和解作好准备，并能消除英法在远东的忧虑。克莱琪于3月28日在东京公开发表演说，他在讲那些话时，未始不想到有上述的可能性。

但是，国际形势已经在变化。苏联和芬兰的媾和，排除了英国和苏联立即开战的可能。随后，在4月间，德国征服了挪威，接着在5月和6月间，低地国家遭到蹂躏，法国则土崩瓦解。

这些巨大的变动在日本产生了强烈的反应。亲轴心派兴高采烈。“军队、反动分子和南进‘扩张论者’再一次扬眉吐气。不久，这些集团就公开地为它们的朋友德国兵横扫法国击败盟国而欢欣鼓舞。”但是，日本政府并不把这件事简单地看作是见风使舵附和德国的问题。海军大将米内和日本海军界普遍关心这样的警告，认为希特勒不会轻而易举地压倒英国的制海权，认为胜负尚未定局。他们还接到驻伦敦的重光等人的警告，说英国人民正在丘吉尔政府的领导下团结起来。此外，美国和苏联这两个中立大国的态度，也需加以考虑。

而且，德国如果获得全胜，对日本是否纯然是幸事呢？日本政府不安地意识到，它对拟议中的1939年三国公约所持的阻挠态度，以及它事实上默许英国在海上行使交战国权利一事，象在“浅间”丸协议中所表明的那样，都不可能赢得希特勒的好感。希特勒如在欧洲得胜，会默认日本的东亚新秩序吗？他会不会对被征服的那些欧洲国家在亚洲的属地扩张德国的统治权呢？东京方面认为，显然日本必须立刻坚持它对这些地区的权利，以排斥一切后来者，必要时也把德国排除出去。重光凭着一个老练的外交家所具有的自由权，正在极力要求有田采取这个步骤。

为了腾出手来对付可能对西欧国家在南洋的遗产发生的争夺，日本就更应结束同中国的冲突。法国的投降和英国遭到的极端危险，给了日本极好的机会，来迫使这两个国家撤走它们在中国的驻军和封闭它们所控制的道路（供给重庆的物资，就是通过这些道路输送的）。东京希望，英法这样撒手不管之后，将迫使蒋介石屈服，或者促使更多的人背叛他去投奔汪精卫。

6月19日，英国议会宣布，已在东京就天津英租界的银元和警务问题缔结了一项协定。十分之一的银元将予出售，以售得的款项用于赈济1939年间天津地区遭遇洪水的中国灾民。其余的银元将由有关各方的领事盖印，封存在英租界中国交通银行的保管库内，留待以后决定最终如何处置。法币（中国国家发行的纸币）将在英租界内继续流通，但将采取严厉的措施，以防其被滥用于投机或走私。（日本人发行的）准备票与法币同时流通。警务

方面的安排，则为英租界当局和日本地方当局之间在与后者有利害关系的刑事案件上提供了比较密切的合作。着重指出，这类案件一般由英租界警方采取必要的行动。英租界在行政管理上的完整性全部得到了维护。

英国政府在谈判银元问题的“所有重要的阶段”，都同中国政府磋商，并就天津协定中有关银元处置的条款取得中国政府的同意。由于中国政府曾声称，所有在流通的银元，都是它发行通货的准备金之一部分，可想而知，要取得它的同意是颇不容易的，这一点能够说明，为何一直拖延到欧洲局势的发展迫使英国必须同日本解决这个长期争持不下而且危险的问题时，才缔结这个协定。在货币和警务的安排方面，中国政府向英国提出了抗议。

由于缔结了这项协定，日本军队结束了长期以来对英租界的封锁，华北的日本当局同意“在其控制的地区竭尽全力镇压一切反英活动”。

日本人至少在天津得到了他们想要得到的一些东西之后，接着就施加压力，迫使欧洲国家的驻军撤离外国人管辖的地区，包括上海的公共租界在内。6月11日，即意大利参加欧洲战事的次日，日本政府就通知英国、法国和意大利驻东京的代表，说它“迫切希望”欧洲各交战国应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在中国造成不幸事件的行动。意大利在上海只有很少驻军，不想引起麻烦，6月13日，据宣布业已达成协议防止在上海发生敌对行动。这当然不会使576日本人满意，于是汪精卫傀儡政权就继续要求各交战国的军队从中国撤走，并声明它将拒绝承认交战国把其权益移交给别国的做法。这表明日本人唯恐在欧洲军队撤走的那些地方，美国会承担其防务，这种行动决不是日本所中意的。

6月24日，日本政府要求英国政府采取措施，停止通过滇缅公路把战争物资和某些其他种类的货物运到中国，同时对香港方面也提出了类似的要求。日本政府声称，如继续让这些物资过境运输，将对英日关系产生严重的影响。为了加重这种威胁的份量，在毗连九龙租借地的边界上集结了五千名日军。局势一度变得非常危急，香港的英军当局下令毁坏了深圳河上的边境铁路桥和公路桥，香港政府则发出指示，强行把英国的妇女和儿童疏散到马尼拉和澳大利亚去。

英国正在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同德意作战，这时又受到了日本的威胁，于是就向美国求援。6月27日，洛西恩由澳大利亚驻美公使R·G·凯西陪同，拜会了美国国务卿，他说，法国的崩溃迫使英国政府重新考虑它先前执行的政策，尽力在一些小问题上——例如天津问题——同日本达成协议，但对日本在中国建立新秩序的计划，则要同美国联合起来加以抵制。日本这时又要求英国军队撤出上海，封闭滇缅公路和香港边界。洛西恩说，英国政府理解到，向日本让步的结果，徒然使它提出更多的要求，而且，如果英国再让步下去，最后还将危及英联邦的安全和美国在远东的利益。这位大使接着说，不过要英国既在欧洲又在远东反抗侵略，那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认为，只有两条路可供选择。首先的一条是美国通过全面禁运对日出口物资，以增加对日本的压力，否则就派遣美国军舰到新加坡（英国将为此提供方便）。如果美国采取前一种（禁运）措施，英国将乐意予以配合。不然的话，美国是否愿意同英国联合提出解决远东问题的建议？这些建议将以让中国单于为基础；使西方在远东的权益得到尊重；使日本在欧洲战争中保持中立。如果日本准备同意这些条件，那么美国和英国就可向它提供金融和经济援助，只要日本对盟国政府的要求作出保证，不把供应日本的任何物

资重新出口到轴心国就行。外国人在中国境内管辖区的前途问题，待欧洲和亚洲恢复和平以后再解决。这些就是英国政府要洛西恩转达，并在一份备忘录中提出的建议的内容。

第二天，6月28日，赫尔回答说，美国不能派舰队到新加坡，因为这样做将使美国在大西洋的海岸线可能受到攻击。接着他给洛西恩和凯西看了格鲁—有田会谈的摘要，并说，这些会谈在法国投降之前曾经进行得很有希望，但在法国投降后，日本的军人集团一直在朝着希特勒和希特勒主义的方向转变，没有什么希望能使他们改弦易辙。美国本身在远东并无什么实质的东西可以奉献给日本，同时它也不愿意牺牲第三国的利益来向日本作出让步。

于是洛西恩问道，假如英澳作出努力使日中媾和，美国是否会反对？赫尔答复说，倘若英澳共同商定，能向日本作出什么让步，然后再同日本和中国接触，了解双方各自准备作出什么让步来媾和，那么美国是不会反对的。但是他又说，在任何这样的谈判中，对于日本推行新秩序的原则，必须予以抵制，至少也要大加修改，同时不得以牺牲中国的利益来作让步。末了他说，他认为的上策是，既不向日本作重大的让步，也不采取任何反对它的行动，惹它发动战争。他认为，日本向不准备打仗，只要英国继续顶住德国，美国舰队留在太平洋，日本将继续“蚕食它所能吃掉的东西”，而不致冒发动一场大战的风险。578 这个答复等于是拒绝了英国的两项建议，因为显而易见，任何媾和的建议，如果不让日本得到它拼命想在中国攫取的那些东西，它是不会接受的。赫尔在要英国坚定地抵制日本的要求时，是假定日本人以战争相威胁只是虚声恫吓。但是，如果日本人断定，他们能够袭击英国在远东的那些实质上是不设防的属地，而不致引起美国干涉的严重危险时，那又怎么办呢？英国政府不得不担心的是，轴心国可能（它们最后果然这样做了）答应支持日本统治中国和东南亚，以换取日本帮助它们对付英国。米内政府也许会抵制这样做，但是这个政府已经被恢复了活力的军国主义分子逐渐削弱了。因此，赫尔是在他无法答应英国万一遭到日本进攻就给予真正有效的援助时，要求英国去冒非常大的风险。

不过，英国政府并未立刻接受日本的要求。7月8日，日本外务省发表公报说，有田已通知克莱琪，英国关于滇缅公路的答复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日本外相要求英国立即重新考虑其态度，日本报刊则充满了战争威胁。面临这样的危机，英国政府的确让了步。7月12日，洛西恩告诉赫尔，除非英国政府封闭滇缅公路，日本随时可能向英国宣战。他说，英国政府准备这样做，或是封锁滇缅公路三个月，不让超过上一年货运量的任何货物通过这条公路运输，或是停止一切战争物资的过境运输，为期三个月，并利用这段时间，作出努力来解决中日冲突。赫尔不能赞同这个建议，并说明了他的态度。

7月14日，据悉已在东京达成协议，在滇缅公路问题上，英国政府采取了洛西恩所提的第二种办法。16日，赫尔发表声明，强调美国政府“拥有合法的权利使世界各地的通商要道保持畅通，并且认为如果有人采取了这类行动，采取了象新近对印度支那铁路采取的那种行动，那么将对世界贸易造成毫无理由的干涉和障碍”。这使伦敦方面有些惊慌，但是赫尔要洛西恩放心，他的主要目的是要人们注意日本的不法行为。

7月18日，英日协定的条款由外相在上院和首相在 579 下院向英国议会作了报告。首相谈到：

6月24日，日本政府要求英王陛下政府采取措施停止经由缅甸向中国运

送战争物资和其他一些物品。对香港也提出了类似的要求。日本政府提出，如继续让这些物资过境运输，将对英日关系产生严重的影响。兹同日本政府达成协定如下：

香港——从 1939 年 1 月起禁止从香港输出武器和弹药，事实上迄今未尝输出过日本政府认为具有重要意义的战争物资。

缅甸——缅甸政府已同意在三个月内暂停向中国运送武器和弹药以及下列物资：汽油、卡车和铁路器材。

缅甸禁运的几类货物，香港也将禁运。

虽然这项协定无疑地使中国人泄气，但是它在限制向中国输送供应品上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却很小，因为在实施这项措施期间，正值缅甸和云南的雨季，雨季期间滇缅公路的运输量总要比正常时候大为减少。对英国来说，这项阶定的主要价值是使它度过了又一次危险的英日危机，防止了立即发生战争的危险。英国赢得了时间，在这关键的三个月中，进行着不列颠之战，战争的结果表明，希特勒不能取得迅速的、全面的胜利。丘吉尔在答复有关这项协定是否会得到日本好感的询问时，说到了问题的本质，他说：“我认为，我们在远东所遭到的一切，很可能深受此间发生的事态的影响。”

8 月 9 日，据宣布剩下的英国军队将从华北和从上海公共租界撤走。在上海的英军一向驻防在租界中心的 B 区和西边越界筑路的 D 区。指挥上海的日本海军登陆部队的日本少将想把原来这两个英军驻防区都接管过去，这样日本就将控制整个公共租界。为了阻止这件事，美国派亚洲舰队总司令哈特海军上将到上海。在上海，他的地位比日本将军高。8 月 15 日，在外国驻防军陆海军 580 指挥官的会议上，以多数票决定由美国海军陆战队驻防十分重要的 B 区，而把 D 区交给日方。但是日方不接受这一决定，乃将此事提交日美两国政府谈判解决。在此期间，B 区交托给上海的万国商团。这是一种临时安排，一直持续列太平洋战争爆发为止。

第二章日本不由自主地陷入轴心国阵营 1940年6月至9月

第一节日本、德国和南洋

1940年4月15日，日本外相告诉日本报界，日本同南洋地区，尤其同荷属东印度有密切的经济关系。如果欧洲的战事把荷兰及荷属东印度卷了进去，它将对这些经济联系产生不利的影晌。因此，日本深切地关注可能影响荷属东印度现状的任何演变。这天的《朝日新闻》说，如果荷兰卷入战争，结果不是英国企图控制东印度，就是荷兰政府可能避难到那里，并吁请美国给予保护。日本的报刊普遍以好战的口吻谈论着，说如果发生这类情况，日本将怎么办？4月16日，日本驻海牙公使向荷兰外交大臣提出这一问题，后者回答说，荷兰政府过去未曾请求过，今后也不会请求任何国家保护东印度，并将拒绝任何一种形式的保护或进行干涉的建议。4月18日，荷兰驻东京公使又向日本外相作了同样的保证。

日本的这些举动引起了国外的猜测，认为可能是日本自己在谋划夺取东印度。4月16日，美国驻巴黎大使向华盛顿报告了法国外交部提出的一个建议，认为英国、法国和美国可在东京采取共同措施，提醒日本人，在缔结1921年的四国条约时，各签字国曾保证尊重荷兰在太平洋的权利。可是，赫尔却宁愿单独行动，他采取的方式是在4月17日向美国报界发表了一个声明。赫尔在声明中对日本人所谓的荷属东印度的命运与他们有特殊利害关系表示异议，并声称，采用非和平手段来改变那里现状的任何做法，都将损害整个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赫尔在4月20日同日本大使会谈时，对日本报刊主张在东亚和南洋实行日本式的“门罗主义”，作了相当尖锐的抨击。

事态未再发展，直至5月10日德国入侵荷兰。赫尔在当天向英国大使建议，英国应保证不干涉东印度。他担心，如果盟国派军队到那里去，日本将以之为借口行动起来。第二天，有田把他4月15日声明的抄件交给英国、法国和德国大使，声称欧洲的事变使日本政府更加深切地关注东印度的情况。他也向荷兰公使表示，希望荷兰政府坚持其维持原状的态度。赫尔担心这可能预示日本将采取某些军事行动，于是在5月11日又在报上发表一个声明，提到了先前对尊重东印度现状所承担的义务，并说，这些义务需要不厌其烦地经常重申。5月11日，英法两国都派军队到荷属西印度的库腊索岛和阿鲁巴岛，这一行动使日本对东印度的前途又产生了新的紧张和怀疑。罗斯福和赫尔立刻劝说英国政府声明没有占领东印度的任何意图，一面劝说荷兰政府否认有要求这种援助的打算。

5月16日，赫尔同日本大使堀内进行了长时间的严峻的会谈，堀内向他详细地询问了有关荷属西印度的情况。赫尔确信日本政府正在试图寻找借口，对东印度进行干涉，他认为，如果美国政府不是从一开始就采取坚定的立场，如果它不是立刻就向英法两国施加压力，强使它们否认有进军荷属东印度的意图，那么日本人非常可能在1940年夏天就已向东印度进军了。

不过，看来赫尔是夸大了日本想立刻进行侵略的意图。日本当然是觊觎东印度的，并且希望有朝一日占有这些地方，但是它尚未准备好作如此冒险，因为这样做几乎肯定会同英国打起来。1940年8月10日，木户在日记中写道，海军军令部长伏见亲王说，海军希望目前避免对荷属东印度和新加坡用兵，另外，即使作出这样进攻的决定，至少也需要八个月的时间进行准备，因此仗越迟打越好。同时，看来军方虽然不喜欢米内内阁努力想与英

美达成和解的做法，并且正在策划推翻这个内阁，但是在中国事件获得解决和苏联的意图变得更加明确之前，它并不希望日本卷入战争。日本人其实是色厉内荏：日本政府在 1940 年春天正为了海外供应的原料，尤其是石油、橡胶和锡而担忧。英国和法国的战时需要，使这两个国家限制从它们的殖民地输出原料到日本，而日本同美国的经济关系则仍然处在不稳定的状态，美国随时可能禁运石油和其他出口品到日本。假如荷属东印度受到英国或美国的控制，则该地区对日本的供应也可能受到限制。

日本希望在它尚未准备好进入东印度之前，不让任何人进去。因此，它一方面坚持要维持那里的现状，另一方面又不喜欢美国提出的建议，要日本和美国互换照会，来保证欧洲各交战国在太平洋上所辖领土的现状。

随着德国在欧洲的节节胜利，先是低地国家，随后是法国，都被希特勒的军队打垮，东京又为德国在远东和太平洋的意图发愁。德国如获全胜，是否会强逼战败国割让它们在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地，而不顾日本在那里的权益呢？由于日本没有参加轴心国，德国对它不负有义务，甚至可能不能忘怀它曾努力同英美保持友好关系而怀恨在心。德国政府并不急于对日本在 5 月 11 日采取的措施作出答复。直至日本方面通过它驻柏林的大使提醒此事以后，德国政府才指示驻东京的奥特，要他说明，德国政府对“荷属东印度问题不感兴趣”。奥特在 5 月 20 日 583 照办了。但未能消除日本对东印度的忧虑，它对东南亚和整个太平洋根本不放心。

法国的崩溃使法属印度支那的问题突出了。6 月 19 日，日本政府要求暂时封锁印度支那与中国的边界，禁止过往交通，要求法国当局同意日本派去检查员，以保证永远禁止任何可能助长重庆作战能力的过境运输。法国政府于 6 月 20 日答复说：它在 6 月 17 日就已封闭了边界，不让供应的汽油和卡车通过；将把禁运的范围扩大到包括许多其他物资；不反对日本派检查员。29 日，由西原将军率领的一个日本代表团到达河内，着手在海防、河江、老街、高平、谅山、贝亚尔堡建立检查站。但是，日本人的欲望远远不止这些。6 月 19 日，日本外务省欧洲司司长告诉奥特说，已指示日本驻柏林大使来栖强调指出法属印度支那的前途对日本有特殊利害关系。他向奥特解释，这意味着日本想要德国让它在印度支那放手行动，并且可能还想要德国为此而向维希政府施加压力。

在柏林，来栖 6 月 19 日谈到日本的一位前任外相佐藤尚武将去访问，又对欧洲新秩序和亚洲新秩序在战后的经济合作大肆吹嘘了一番。6 月 24 日，奥特报告，日本陆军省中央课课长武藤彰将军告诉德国驻东京的武官说，日本军队欢迎德国进行调停，以结束中国战事，同时为了这个缘故，日本对印度支那也非常感兴趣。日本拓务相小矶将军还就印度支那问题向奥特本人进行了试探。

武藤和小矶还向对方详细论述了缔结俄日互不侵犯协定的可能性。他们的想法显然是，日本若同苏联达成协议，同时又占领了印度支那，那么蒋介石在发现自己陷于孤立之后，可能会同意缔结日本所希望的那种和约，特别是如果让他在印度支那分得一杯羹以进行收买的话。但是，柏林对日本的这些建议很冷淡。奥特在 6 月 19 日的电报中，表示对米内和有田不信任。他认为这两个人想同英美搞妥协。他建议德国不要立刻发表声明把印度支那 584 那交给日本，这样也许能导致米内内阁垮台，而由一个“亲我们”的内阁取而代之。6 月 24 日，奥特答复小矶说，德国大概不会反对日本在印度支那采取

行动，只要日本保证在太平洋牵制美国，也许还应当允诺，万一美国干涉欧洲战事，日本就向菲律宾和夏威夷进攻。

德国外交部对于奥特的建议很容易地就接受了，特别是因为它对日本默许英法封锁德国的做法怀恨在心。经济司司长维尔说，日本直到不久以前才让少量的原料如锡和钨经过其领土运至德国。他还说，日本在 1940 年 1 月不通知德国就同满洲国缔结了一项独家经售满洲大豆的协定；而且，它不顾德国的抗议，迄今只向德国输送了七万吨大豆。他认为，德国为了停止供应中国战争物资而得不到宝贵的中国原料，日本却恩将仇报。德国外交部的另一个官员克诺尔在 6 月 20 日的备忘录中说，最好告诉佐藤，在从东亚获得原料供应方面，德国希望日本有比较恳切的态度。

7 月 8 日，佐藤同里宾特洛甫会晤（在座的还有来栖和里宾特洛甫的私人代理施塔默尔）。佐藤声称，由于日本在远东的行动转移了英、法、美三国政府的注意力，使德国的任务执行得更加顺利。他说，日本正努力在亚洲建立新秩序，象德国在欧洲所做的那样，他说，今后两国应密切合作，尤其是在美国干涉欧洲或远东事务的时候。日本正在设法结束中国战事，以腾出手来为上述目标奋斗。然后佐藤提到，法属印度支那和荷属东印度的前途使日本忧虑不安。里宾特洛甫在答话中没有许诺什么。他提到 1939 年三国公约谈判的失败。他说，谈判之所以失败，“正如日本一些政治家最近在讲话中再次表明的那样”，是由于日本对欧洲事务不感兴趣，因此这时根本不明白，日本说要加强德日合作是什么意思。

有田急切地向佐藤了解，德国究竟是对法国和荷兰 585 在远东的殖民地有野心呢，还是要利用这些地方作为诱饵使日本参战？佐藤回答说，他猜想这两种念头德国都没有；德国这时似乎并不怎么在乎日本参战。但是里宾特洛甫却告诉来栖，传说德国对日本态度冷淡，纯是无稽之谈，他对日本所提的两国之间应就合作问题更明确地交换意见的建议，反应也很良好。

佐藤未能使德国在印度支那和荷属东印度问题上作出更明确的保证，里宾特洛甫暗示，希望日本提出更具体的办法，结果日本外务省草拟了一份德日协定的大纲，并同陆海军的代表进行了讨论。草案提出德国应承认南洋地区，包括法属印度支那和荷属东印度在内，是日本势力范围的一部分，并应支持日本在这一地区的霸权。德国还应帮助日本处理中国事件，给予日本与欧非集团通商的優惠待遇。作为报答，日本应承认德国在欧洲和非洲的霸权，日本虽不参战，但应采用各种手段协助德国迫使英国投降，并给予德国与大东亚通商的優惠待遇。两国应共同合作维护同苏联的和平，但如其中一国受到苏联的威胁，两国应共同协商采取措施；如果其中一国同苏联开战，另一国不得给予苏联援助。德国和日本还应共同合作来防止美国干涉它们各自在欧洲和亚洲推行的政策。同意大利也要商谈一个大致相同的协定。

7 月 12 日和 16 日在东京讨论这些建议时，参加会议的外务省和军方的人员都对德国未来的政策表现出忧虑不安。他们怀疑德国谋划使东印度纳粹化，或在和平解 586 决时并吞其中的一部分。他们对德苏关系的前景也有疑问，并表示出有些担心，日本若不经德国的同意就向南进军，可能会遭到俄国的敌对行动，这种行动或许还是德国怂恿的。因此，大家一致同意按照所建议的方针同德国和意大利接触。但是，米内内阁的倒台，使这些计划未能立刻开展。

第二节日苏关系 1939 年 9 月至 1940 年 7 月

1939 年下半年，诺门坎停战以后，日苏关系稍有改善。10 月 27 日，两国达成协议，互相释放因偷捕鱼罪而被扣押的渔船。11 月 6 日，斯麦塔宁以苏联驻日大使的身分赴任，标志着两国紧张关系的进一步缓和。在莫斯科，日本大使东乡同苏联副外长洛佐夫斯基会谈的结果，达成一项协议，组织一个俄日联合委员会，来解决外蒙古与满洲国之间以及满洲国与苏联之间的边界问题。该委员会于 12 月 7 日在赤塔举行第一次会议，此后又经过七次会议，于 12 月 25 日在程序问题上达成了协议。然后委员会迁往哈尔滨，着手进行划定边界的实际工作。

东乡开始了为缔结长期捕鱼协定和通商条约而进行谈判，在这两方面也都取得了进展。缔结商约的初步商谈结果，于 11 月 19 日在原则上达成协议，随后再由东乡及驻瑞典公使松岛和外务省商业局的一位前任局长与莫洛托夫和苏联外贸人民委员米高扬在莫斯科继续举行会谈。12 月 31 日，苏日达成了一项暂时解决办法，规定在缔结长期条约之前，把原有的捕鱼协定延长一年，还规定购买中东铁路的最后一次分期付款必须交齐。但是，587 这些很有希望的进展，在 1940 年春天却受到了阻碍。苏日边界委员会于 1 月 5 日至 30 日在哈尔滨举行了八次会议以后，在诺门坎地区的问题上完全陷入了僵局，因为任何一方都不愿接受对方出示的地图，1 月 31 日，宣告该委员会认为无法达成协议，准备解散。2 月 10 日，有田告诉日本议会，同莫斯科的谈判已经中断，但是他又说，谈判将要恢复。他说，对于成功地重新调整俄日关系固然没有乐观的余地，但是过分悲观也是毫无理由的。3 月中，贸易会谈中断，4 月 7 日，宣布松岛将返回瑞典。与此同时，缔结新捕鱼协定的谈判据传也陷于停顿。莫洛托夫于 1940 年 3 月 29 日在最高苏维埃发表外交演说时，虽然提到已在 1939 年底“经过周折”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是声称苏联对它同日本的关系不能表示非常满意。

他谴责日本议会要苏联把萨哈林岛北部和滨海省卖给日本的建议，并说，恰恰相反，日本人应考虑把萨哈林岛南部卖给苏联。在重揭疮疤的背后，存在着两国之间总的政治关系的问题。自从缔结德苏互不侵犯协定以来，德国政府正如上文已经说过的那样，一直极力主张日本人跟它走。这样日本人就可以牺牲英国为代价，方便地向南进军，并使德、日、满三国取道苏联的贸易顺利地发展。里宾特洛甫强烈要求大岛缔结苏日协定，大岛心悦诚服地改变初衷而相信了他的意见。里宾特洛甫又趁寺内伯爵将军 1939 年 9 月到波兰前线的机会，极力怂恿他赞成此事。9 月 20 日在索波特设宴欢迎寺内时，里宾特洛甫说，他在 8 月份访问莫斯科时，曾同斯大林谈到俄日关系，斯大林说：“日本人要是想打仗，那么就打吧；他们要是想和解，那么也就和解吧。”在东京，奥特接到指示，要他促成俄日协定，1940 年 2 月，他又得到施塔默尔的支援。大岛和白鸟回东京后，成了俄日协定的热烈鼓吹者，并得到了一些拥护者。但是，日本人对德国与俄国达成协议的忿恨不满，对共产主义的畏惧，对苏联的猜疑，都是难以克服的障碍。

在莫斯科，东乡也是苏日协定的鼓吹者，尽管他的动 588 机并不是偏爱轴心国，至少他本人的表现以及他使馆中的部属的表现都证明是这样。据当时担任日本驻莫斯科大使馆三等秘书的太田三郎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上作证说，东乡“在 1939 年底或 1940 年初”派日本大使馆的另一名秘书斋藤到东京，极力要求允许他开始苏日协定的谈判，最后有田指示他着手进行。但是

无论太田还是东乡在作证时都说不出接到这些指示的确切日期，东乡只是说，指示“终于”下达了，很可能直到1940年春末或夏初他才接到指示。施塔默尔和奥特在给里宾特洛甫的报告中，说明了日本舆论的影响，尤其在宫廷派和内阁中间，对苏联是有故意的。有田于1940年1月31日在日本国会的演说中，声称日本将继续执行同反共产国际公约的所有签字国保持密切关系的政策。他还说，苏联“应停止干涉在萨哈林岛北部办工业的特许权，应修改其支持中国抗日政权的政策，应进行合作以实现东亚的普遍和平”。3月22日，他再次提到反共产国际公约继续有效。俄国对重庆的援助以及苏联报刊对于日本对华政策的敌视态度，是两国不能言归于好的主要障碍，特别是由于英法卷入欧洲战争以后，苏联对中国的援助变得比以往更为重要了。俄芬战争以及英法有可能——在3月初几乎成为事实——为了芬兰而出面干涉，使日本政府有了新的指望。倘若西方盟国卷入对苏联的战争，那么它们为了取得日本的支援，也许会同日本在中国问题上达成协议。日本对苏联的态度之所以强硬起来，以及日本参谋本部之所以制定对苏作战计划并在3月间得到天皇批准，也许都同这样的期望有关。

但是，如上所述，俄国与芬兰缔结和约以及德国在西欧发起进攻，使局势发生了变化。苏联既摆脱了与芬兰的纠纷，避免了与盟国开战的危险，与日本相比，其地位相应地增强了。另一方面，法国的瓦解和预期德国将获全胜的前景，也未尝不使莫斯科担忧害怕，因此苏联政府并不怎么想冒险卷入远东的纠纷。而日本却仍然在中国不能自拔，使日本继续陷于这种境地，对苏联是有利的。

另外，日本想要俄国人给予保证，假若日本开始向南进行冒险活动，苏联不会向它进攻。因此，总的说来，日本在外交上处于较弱的地位，所以在诺门坎问题上不得不停步。1910年3月，东乡恢复了对有争议的满洲国—外蒙古边界问题的谈判，经过长时期的商谈，于6月9日由东乡和莫洛托夫达成一项协定，按照苏联提出的要求划定了诺门坎地区的边界。7月18日，商定设立一个联合边界委员会。据那个替东乡和莫洛托夫当译员的野口喜雄说，东乡在7月初建议缔结一项政治协定。建议的内容是两国确认以（1925年）的基本条约继续指导双方之间的关系；如果其中一方受到一个或几个第三国的进攻，另一方应在冲突中始终保持中立，这个协定的有效期应为五年。几天以后，莫洛托夫在原则上同意了，到8月中旬，他宣称，如果日本人放弃他们在萨哈林岛北部的特许权，苏联准备同意接受这项协定。东乡建议日本政府接受这个条件，以缔结中立协定。但是这时米内内阁已经垮台，接替的是以近卫公爵为首的内阁，由松冈担任外相。8月29日，东乡被召回国，并奉命在继任者未到任之前，暂停谈判。

第三节第二次近卫内阁 1940年7月

德国在欧洲的胜利注定了米内内阁的命运。这个政府既未能与英美达成协议，以促进它所渴望的“对中国事件的处理”，这时又受到指责，说它下错了赌注。日本希望同德国达成协议，商定英国一旦被打败后——看来不过是时间问题——如何分赃。但是如上所述，德国政府对日本的建议，反应却有些冷淡，并表露不准备同一个素来与它疏远的日本政府合作。因此日本军界领袖决意踢开米内内阁，由一个能同轴心国进行所希望的合作的内阁取而代之。从1940年5月31日起担任掌玺大臣，同时又是日本政界中颇能左右天皇意见的木户侯爵，在日记中透露，他已为任命近卫接替米内而活动

了一些时候。7月8日，陆军次官阿南将军拜会了木户，谈到米内内阁根本不合同德意谈判，改组内阁已不可避免，陆军准备支持近卫。16日，陆相畑大将经授意提出辞职；由于军方不准备推荐任何人接替他，因而米内和他的内阁只得在当晚全体辞职。天皇不愿看到内阁被推翻，表示有些不满，但也不敢站在公然反对军方的立场。7月17日，召开了包括木户和几个前任首相的重臣会议，会上一致推荐近卫当首相，当天晚上，他奉天皇的谕旨组阁。宫廷派和军方之所以一致推选近卫，是由于宫廷派认为，让近卫担任首相，并让他担任那个正在形成可取代议会派的新的政治组织的领袖，他就能制止在国内走向极权主义和在国外走向同轴心国合作，而军方则估计，近卫是出名的懦弱和优柔寡断，这样他们就能牵着他沿着他们所希望的道路走下去。结果证明军方的估计较正确，近卫正象他的主子天皇一样，没有能力阻止日本致命地陷入战争。在组织新内阁时，近卫即使不愿任东条当陆相也办不到，因为决定此事之权掌握在军方。不过，如果木户的话可以相信，军方把选择外相之权留给了近卫，而天皇则劝他物色人选时要慎重。鉴于军方反对任命任何一个不赞成同轴心国更密切联系的外交家担任此职，近卫的选择权是有限的。他选中了松冈洋右，也许是因为他591认为松冈不会去逢迎军方；也可能是因为他轻信了松冈，松冈自称懂得怎样同美国打交道。事态发展证明，近卫选中的人是再糟糕也没有了。

在对外事务中，松冈以为他既能利用两个轴心国，又不致对它们承担过多的义务。他告诉重光说，意大利今后将从属于德国，但是日本因所处的地理位置，却能保持独立。日本应当奉行他所谓的“类似苏联那种独立的等距离政策”。他说，日本应当利用德国在欧洲战胜的机会，对法国、荷兰、葡萄牙在远东的领土发动突然袭击，据他估计，这样做可以最少地冒卷入战争的风险，而获得最大的利益。松冈还认为，英国也将被希特勒打垮，届时日本就可攫取英国在远东的属地了。他估计，如果以日本站在另一方积极进行干涉相威胁，将可阻止美国去帮助英国。他基于这些错误的想法，推行了终于使日本两面极不讨好的政策。轴心国家怀疑日本，而且有充分理由，它们对它从未完全信任，而民主国家则把日本看成只在伺机向它们发动进攻的敌人。于是，在松冈任职的那致命的一年中，日本陷入了这样的境地，只得蒙受耻辱或孤注一掷投入战争，否则就无法脱身。

第四节 1940年9月27日的三国公约

8月1日，松冈在东京、来栖在柏林再度试探了德国对大东亚势力圈的态度。他们两人都暗示，日本同轴心国的关系将取决于德国对这一问题的反应。两人还询问了德国同苏联的关系。松冈后来说，他曾催促奥特弄清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但是奥特表示有些不愿意这样做。松冈的建议比他的前任有田的建议得到了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较好的反应。这不仅由于柏林对日本的新内阁比对米内内阁满意，而且因为希592特勒在6月19日的演说中向英国试探和平失败以后，德国要迅速结束欧洲冲突的希望正在消失。这意味着，德国将面临长期作战的前景，而且不能完全排除美国参战的可能性。此外，德苏的伙伴关系正开始出现裂痕，希特勒已在考虑进攻苏联。因此，柏林方面认为，必须使日本依附轴心国，并为此而对日本付出代价。于是，在将近8月底时，里宾特洛甫再次派施塔默尔赴东京，指示他要试探出日本政府的真正意图，因为奥特的报告与来栖提供的消息有些出入。如果日本人确实准备缔结一项协定，施塔默尔将偕同奥特为此开始谈判，

并在谈判过程中将一应细节报告柏林批准。施塔默尔于8月23日离开柏林，9月7日抵达东京。与此同时，日本核心内阁在9月4日决定了谈判的条件。这些条件是，轴心国与日本应进行政治和经济合作，以一面在欧洲和非洲建立新秩序，一面在大东亚建立新秩序，为了便于谈判起见，大东亚势力圈的范围将包括“缅甸迄东和新喀里多尼亚迤北的地区”。这个地区最后将扩大到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不过，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同意印度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倘若为了诱使苏联与三个伙伴国的政策相一致，而有必要这样做的话。日本除不参加战争外，可采取一切办法来帮助轴心国打败英国和阻止美国“干涉”。如果中国事件可望渐趋结束，或者国际形势发生变化，不容许再拖延，那么日本也可以只向英国开战，或向英美一齐开战。

9月9日，施塔默尔到松冈府拜会了松冈，把里宾特洛甫对时局的看法告诉了他，即德国不希望欧洲战争演变成世界大战，而是希望尽快地把战事结束。德国尤其希望不要使美国参战，里宾特洛甫认为，美国虽然未必可能参战，但是也说不定。里宾特洛甫当时似乎觉得，比较可能的是，美国会采取行动反对日本，因此他认为，德日如593果缔结协定，将使美国不敢干涉欧洲或远东的冲突，从而对双方都有好处。施塔默尔说，德国此时并不要日本进行军事援助来对英作战，而只是希望日本协助遏制美国。他向松冈保证，德国准备承认日本在大东亚的领导地位，只要求在经济上享受优惠和要求日本帮助弄到战略物资。

德国愿意充当忠诚的中间人使日本和苏联弃嫌修好，不过它认为，最好在同苏联接触之前，先同日本取得一致意见，施塔默尔说，德国尚未就此事同苏联交换过意见。9月10日和11日，以施塔默尔和奥特为一方，松冈为另一方，又举行了两次会谈，在后一次会谈中，双方对条约草案取得了一致意见。谈判进行得非常机密，在拟就草案之前，日本外务省一般对此都一无所知。

按照三国公约第一条和第二条规定，日本将承认并尊重德国和意大利在欧洲建立新秩序中的领导地位，而这两个轴心国家也将同样承认日本在大东亚的领导地位。松冈解释说，德国在谈判中没有提到非洲，所以《轴心国》新秩序的范围只限于欧洲。他说，“目前”，大东亚被理解为包括法属印度支那、暹罗、缅甸、马来亚、荷属东印度和新喀里多尼亚。他告诉施塔默尔，大东亚的范围将“逐渐扩大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施塔默尔表示同意，他没有询问细节问题，也没有提到印度。

第五条确认该公约毫不影响“缔约国中的每一方与苏联之间目前存在的政治状态”。松冈告诉联络会议说，第三条中提及的那个国家（见下文）是指美国，但是由于苏联没有卷入战争，所以添上了第五条，以解除莫斯科可能对该公约的疑虑，阻止美苏言归于好：松冈说，德国和意大利正在试图劝使苏联“与该公约的主旨相协调”，并且正在帮助调整苏日关系。

594 三国公约的要点在于第三条，这一条的最后定稿并经一致同意的内容，规定德、意、日三国有义务在“缔约的三方中有一方受到一个目前未卷入欧洲战争或中日冲突的国家进攻时，以一切政治、经济、军事手段相互援助”。当时担任外务省条约处处长的松本俊一（他以这个身份协助松冈制订该约），在战后向国际军事法庭详细叙述了就第三条进行商谈和发生争执的情形。他说，日本原先拟就的第三条草案用语含糊，于是施塔默尔另外提出一个草案，它与最后的文本实际上是相同的。施塔默尔的措词在9月11日被

暂时接受，然后呈交给里宾特洛甫。但是里宾特洛甫不同意，建议缔约国中如有一国受到一个没有卷入欧洲或亚洲冲突的国家“公开的或以隐蔽的方式进攻”时，该公约所规定的军事义务就应予以履行。当这份经过修改的德国草案于9月14日送交松冈时，他问，这是指哪些情况。施塔默尔回答说，将包括这样一些情况，例如英国准许美国占领地中海上的一个基地，或英美缔结密约让美同舰队使用新加坡。松冈反对这样提法。他不愿使日本承担条约义务，在美国尚未以正式参战的方式支援英国时，就去帮助德国。他执拗地坚持这一点，结果里宾特洛甫同意删去“公开的或以隐蔽的方式”这几个字。可是，这位德国外交部长作了另外一次尝试来加重日本根据该公约所承担的义务。9月19日，里宾特洛甫前往罗马，把即将缔结这个公约的消息透露给墨索里尼和齐亚诺。也许是同他们商谈的结果，他把再经过修改的第三条草案发到东京，由施塔默尔于9月21日交给了松冈。这个草案规定，如果一个没有卷入欧洲或远东冲突的国家对缔约国中的一方“犯下侵略的行为”，日、德、意“保证向该侵略国宣战，并以一切政治、经济、军事手段相互援助”。里宾特洛甫和施塔默尔宣称，这样的措词将有效地阻止美国参加反对轴心国或反对日本的战争。但日本海军反对承担任何明确的宣战义务，于是德国人再次让步。因此第三条仍然采用了施塔默尔和松冈在9月11日商定的内容。

9月23日，对三国公约的全文及其附属秘密协议书取得了一致意见。接着，里宾特洛甫表示希望该公约在595柏林正式签署，这使松冈大为不快。这位德国外交部长同松冈一样喜欢出风头要面子，坚持要这样做。不过他同意，作为报答，秘密协议书可在东京互换，公约的英文本可作为正式的文本。

在日本，这个公约于9月26日的内阁与枢密院调查委员会联席会议上获得最后的同意。尽管松冈、东条、近卫都作出了保证，枢密院有些官员仍然对这次会谈表示相当怀疑，尤其是对于这个公约对日美关系的影响，对于日本如根据公约第三条卷入战争时能够指望得到德国多少帮助，以及对于日苏弃嫌修好的前景这几方面，更为怀疑。9月27日，公约的正式签字仪式在柏林举行，两天以后予以公布，日本政府对这个公约在国内会引起什么反应忐忑不安——事实上反应是不热烈的——它采取了不同一般的措施，把该约公布在一道诏书中。

随着公约的签字，奥托和松冈于9月27日在东京又互换了几项秘密协议书。在第一项协议书中，德国同意，缔约国中的一方是否受到了第三条所说的进攻，这个问题应由三国磋商决定。如果日本受到这样的进攻，德国答应全力给予经济和军事援助，同时德国将预先尽量给予日本技术和物质援助，协助日本作好准备以应付这样的事变。德国还答应竭尽全力，促进日本与苏联之间的友好谅解。互换的第二项协议书包含一项协议，规定如果日本同英国作战，德国将尽量援助日本。第三项协议596书是关于德国从前在太平洋上的殖民地问题。双方一致同意，以前属于德国而这时由日本受托管理的一些岛屿，仍由日本统治，但鉴于德国最后正式放弃了这些岛屿，日本将给予一些补偿作为报答。其他这时由日本占领的德国从前的属地，则待欧洲战事结束后归还德国，不过，届时德国可举行谈判，将这些属地卖给日本。

这就是三国公约及其必然的结果。松冈尽管先前夸口说，与意大利的从属地位相比较，日本将不依附于德国，这时却准备放弃这种独立地位，因为他深信德国将击败英国，而成为欧洲战争的胜利者。他生怕德国那时将试图卷土重回远东和太平洋，假如没有一个协议予以防止的活。再则，他认为，

只要日本继续努力统治中国，日美关系就不可能根本改善。他告诉枢密院官员说，美国认为由于中日冲突的持续，日本的实力正在削弱。因此，如果日本继续保持孤立，美国可能会对它增加压力。

因此日本同轴心国结盟乃是上策。他同里宾特洛甫一样，认为这个公约将使美国不敢在欧洲或亚洲进行干涉，从而使日本能腾出手来进攻法国、荷兰、英国在远东的殖民地。最后，他相信，三国公约将导致苏联与日本缔结协定，使苏联保证停止支持中国。根据松冈在 1941 年的行为来判断，他似乎并不认为公约第三条的措词使日本有了同美国讨价还价的机会，尽管近卫可能有过这种想法。松冈后来在回忆录中声称，他是要把这个公约作为和平的工具，而事实上他心目中的和平只是牺牲欧洲的 597 民主国家来进行征服罢了。他似乎指望，这样征服的结果，他将成为一个极权主义日本的独裁者。

第三章日本——有条件的轴心国伙伴 1940年9月至1941年12月

第一节日本同苏联的关系 1940年9月至1941年7月

1940年9月26日，德国驻莫斯科代办通知莫洛托夫，三国公约即将签署，并告知该公约的要旨。莫洛托夫说，苏联驻东京大使馆已报告，这样一项协定正在谈判中。他对德国代办说：按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第三条和第四条规定，苏联政府有权预先看到该公约的文本，包括附属各项秘密议定书，并有权提出意见。里宾特洛甫拖延到10月2日，即该公约公布以后，才作答复。这时他宣称，鉴于该公约已明确规定，三国公约签署国与苏联的关系保持不变，因此也就不存在事先同莫斯科商量的问题。另外，他还否认有任何秘密协定。

莫洛托夫心里也许非常清楚，最后的这段话是不真实的。自1938年以来，他一直通过一个名叫理查德·佐尔格的德国人，获得有关日本内阁和联络会议决议的一些机密情报。这个德国人表面上是个纳粹新闻记者，实际上却是共产党的间谍，他的日本同谋者之中，有一个是近卫本人的朋友和他几个私人秘书的朋友。莫洛托夫如果确实知道订有秘密协定，那么，里宾特洛甫的否认和遁词可能会更加引起他的猜疑。他所不知道的只是：德国人和日本人打算如何使苏联配合他们的政策，或者莫斯科如果表示不随和的话，他们将作何打算。在欧洲，由于维也纳裁决和意德两国给予罗马尼亚保证，德苏关系已经开始恶化了。在远东，东乡突然被召回，又重新引起了苏联对日本的怀疑，莫洛托夫说，这件事正好发生在一次重要的谈判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令人不解。东乡的后任建川美次将军当过乃木将军的副官，乃木就是那位在日俄战争中攻克旅顺港的征服者。这是一个不祥之兆，再者，建川在新京发表声明，说苏日关系“应当重新开始”，也不是个好预兆。

598 尽管如此，建川的意图却不怀敌意。他奉松冈之命赴莫斯科，谋求缔结一项苏日互不侵犯条约。他希望能使苏联政府承认满洲国并停止援助蒋介石。就象他告诉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那样，作为交换条件，日本准备承认苏联对外蒙古的控制权和在新疆的特殊利益。但是，当建川在10月底到达莫斯科，向莫洛托夫提出这些建议时，这位苏联外长却搪塞说，同日本缔结协定的问题正在研究中。

莫洛托夫应邀访问了柏林。他想看看希特勒将有什么表示。英国政府也在向莫斯科献殷勤，美国政府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因此，苏联政府认为自处于极其优越的讨价还价地位。在柏林，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于11月12—13日两天试图以瓜分旧大陆这种令人眩目的前景来诱惑莫洛托夫，即在英帝国不出所料地崩溃后，旧大陆将划分为几个势力范围，届时，划给苏联的势力范围将包括波斯和印度。里宾特洛甫告诉莫洛托夫说，日本渴望同苏联缔结一项互不侵犯条约，德国如受邀请，愿意为此事充当中间人。里宾特洛甫又说，如果能首先签订这项条约，日本政府将承认外蒙古和新疆划入苏联的势力范围，同时关于萨哈林岛的煤和石油的开采权问题，日本也将“迎合苏联的愿望”。预先签订这项条约，有助于日本政府消除由于放弃这些开采权而引起的公众不满情绪。但是，莫洛托夫回答说，这项条约的谈判“是不能与其余一些复杂问题分割开来的”。其次，他对大东亚圈也非常怀疑，要求知道其确切界限，对这件事，里宾特洛甫宁愿不闻不问有关中日媾和的问题，莫洛托夫声称，俄国和德国当然有责任关心解决中日关系，但是，“一定要向中国保证是体面的解决，特别是因为日本现在有攫取印度尼西亚的可

能”。

很显然，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无意抛弃重庆，无意赞同日本在东亚的新秩序，虽说他们也准备在获得一定代价的情况下，同日本缔结一项条约，使日本能任意向南方扩展势力，而在那里同英国和美国发生冲突。

599 里宾特洛甫在同莫洛托夫进行最后一次谈话时，曾建议缔结一项条约，包含三项条款。根据条约，苏联将宣布同意三国公约的目标，愿意在政治上同德、意、日三国进行合作。这四个国家须尊重彼此的势力范围，不得参加对四国中的任何一国怀有敌意的国家集团。有关四国的势力范围，或者说“有关四国在领土愿望方面的焦点”，将写入拟议中的公开协定的各项附属秘密议定书中。

11月26日，即在莫洛托夫返回莫斯科后十天，苏联对德国的建议作了这样的答复，只要苏联的某些条件能够被对方接受，苏联政府对里宾特洛甫拟订的四国公约草案将表示同意。苏联的条件包括：德国军队从芬兰撤出，苏联与保加利亚签订一项互助条约，苏联在波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附近建立一个陆军和海军基地。

在中东，巴统和巴库以南的地区，朝着波斯湾的总方向，应被承认为苏联的领土愿望的中心。在远东，日本须放弃在萨哈林岛北部的煤和石油的开采特许权。

这一答复说明，俄国人的主要兴趣是在巴尔干地区，而这个地区希特勒是坚决不让俄国人插手的。希特勒与里宾特洛甫不一样，他对同苏联签订协定的结果从来不怀希望，也不特别渴望同苏联签订协定。他不信任斯大林，认为那位苏联领袖将伺机撕毁任何协定，对德国进行袭击。希特勒决心先发制人；12月18日，他下达了“巴巴罗萨行动”第21号指令。1941年1月17日，正当莫洛托夫为他11月26日的去函一直未获答复而感到奇怪时，他接到通知，说他所提的问题需要经过德、意、日三国讨论，德国希望不久将恢复德苏之间的谈判。这不过是一种搪塞。因此，在三国公约签署还不满三个月的时间内，从日本人的观点来说，公约的一个主要的未来利益已经消失了。可是，日本人还没有警觉到这一点。

不过，松冈马上就意识到，事情这样发展下去，对日本大大不利。苏联政府在签订条约方面漫天讨价；要日本放弃在萨哈林岛的采矿特许权，显然还想收回萨哈林岛南部和千岛群岛的一部分，并且还想要满洲国牺牲其利益来调整边界。这使东京确实太难堪了，看来谈判已经没有回旋余地了。1940年11月15日，塔斯社否认一家外国报纸的报道，说苏联与日本已就它们在亚洲的势力范围问题达成协议，以及苏联已同意不再继续给中国援助。

三国公约也不能促使蒋介石接受日本提出的媾和条件。松冈曾经向蒋委员长公开呼吁，敦促他接受这些条件并同三国公约签署国站在一起。这位日本外相还曾派遣两名代表赴香港同重庆方面进行接触。据木户在战后的证词说，开始，这件事似乎很有希望，可是，最后，谈判仍归失败。在柏林，里宾特洛甫于1940年11月间尽其所能帮助他的盟邦日本，他对中国大使说，要是中国不抓住里宾特洛甫称之为它的最后机会的话，那么，日本将同汪精卫正式签订条约，德意两国接着将承认汪的政府。反之，如果中国愿意接受日本提出的媾和条件，德国将为这些条件作保证。

至于这些条件的内容是什么，一直没有透露过，但是，显而易见，蒋是无法接受这些条件的。再说，日本的政策又表现出它一贯白相矛盾的特征。阿部与汪精卫在南京谈判的结果是，10月10日，日本和汪精卫政府签订了一份草约。11月初，一位满洲国特使来到南京，8日，对日本—满洲国—中国三国宣言草案达成一致意见。11月13日，日本同汪签订的条约及其附属文件在东京获得御前会议的正式批准。不过在这次会议上，还是决定要作最后一分钟的努力，争取与蒋达成协议，以使重庆和南京两个政府合为一体。结果，一事无成。于是，日汪条约及其附属议定书和文件于11月27日经日本枢密院批准后，11月30日在南京正式签署。

《中国、日本基本关系条约》共有九条。第一条和第二条规定：中日双方互相尊重主权并在政治、文化和经济方面进行合作。另一条规定，在恢复和平之后，日本将从中国撤出全部军队（第四条）。但是，为了共同防御共602产主义，日本需在华北和内蒙古驻扎军队（第三条）。同时，还容许日本军舰在中国的水域内活动（第五条）。第六条规定，按照两国应当相辅相成、互通有无和照顾对方需要的原则，双方实行“密切的经济合作”。这一条特别适用于华北和内蒙古地区的矿物资源，但是也适用于“其他地区为国防所需要的特殊资源”。在华北、内蒙古和长江下游地区，在商业方面实行“特别密切的合作”。第七条规定，日本同意放弃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和租界，以换取日本人在整个中国境内的贸易自由和居住自由的权利。具体细则将由随后的一些协定来决定（第八条），这项基本条约于签字后立即生效。

该条约所附的一份议定书规定，南京政府应同意日本所采取的一切旨在加强与重庆战斗的措施。日本答应在战事结束后两年之内，按照第三条的规定，完成撤退军队的工作。此外，还有一个名为“谅解条件”的文件，说明日本答应把在中国境内属于日本军管的则政机构和工矿企业移交给南京政府。

这些安排都是公诸于世的。除此之外，还有两个秘密附件，一个是双方互换的照会，另一个是汪致阿部的一封信。第一个秘密附件规定：“为了促进两国的共同利益和确保东亚的和平，采取外交行动必须基于互相赞同的原则，对其他第三国采取的任何措施，不得与这一原则相违背。”汪事先已经同意，将对驻扎在“防共地区”的日本军队提供一切方便。

第二个秘密附件规定，为日本军舰在长江和华南沿海活动提供种种方便。为了“维持和保证中国海的航线安全”，中日两国将“在华南沿海一些指定的岛屿以及与之有关的地点”进行“密切的军事合作”。两国还将“亲密合作”以开发厦门（海南岛和附近其他岛屿上“为国防所需要的资源”。

按照秘密照会，汪将承认（日本扶植的）内蒙政府管2辖的范围为自治区，并给予华北政务委员会（其前身是华北临时政府）和日本在上海扶植的那个行政机构以广泛的权力。特别是在同日本打交道方面。最后，汪在致阿部的密信中答应全力与日本合作来搞垮重庆政府。

这些条款将使日本享有在整个中国的政治和经济霸权。这些条款似乎证明了，在日本统治集团内部，激进派战胜了温和派，甚至连其中一些知名的主和人士也抛弃了同重庆和解的一切希望。要是条件能更宽一些，其结果可能会有所不同。滇缅公路虽然自10月17日起又重新开放，但是蒋却感觉自己的处境越来越困窘。10月18日，他对美国大使说，自由中国已濒于经

济崩溃，而中国的共产党人正在利用重庆的困境来扩大他们的势力，他们有可能直接从莫斯科获得援助，自滇缅公路封锁以来，莫斯科一直没有向国民政府输送物资。蒋请求美国提供一笔巨额贷款和提供飞机，如果可能的话，还提供志愿空军人员。接着，他又向伦敦和华盛顿提出建议，发表一个三国声明，反对日本的新秩序，并签订中英同盟条约，他希望美国无论如何同意这样做。蒋的目的是要对付三国公约：可是，在那个时期，无论美国还是英国都还不能考虑这样做，唯一的具体收获是美英两国答应再给中国贷款。但是，这已使蒋大为振奋，他公开地向日本挑战。合法的中国政府在12月30日发表的外交部声明中，谴责汪精卫为“头号卖国贼”，不承认汪同日本缔结的条约，告诫第三方面不要承认汪政权，并重申中国政府决心继续作战，直到取得胜利。

由于松冈未能促使重庆同意他的和平建议，无疑他早已预料到重庆方面要这样答复，因而也不当它一回事。可是，一个更大的挫折在等着他。12月5日，塔斯社报道说，日本曾向苏联政府保证，它与南京签订的条约中的反共条款不是针对苏联的，这项条约并不妨碍日本欲与莫斯科改善关系的愿望。塔斯社的消息说，斯麦塔宁已经作了答复，关于同中国的关系，苏联的政策丝毫没有改变。

在这一声明之后，中苏贸易协定于1940年12月和1941年1月相继签订，并且还建成了从西伯利亚铁路沿线的乌兰乌德通往外蒙古乌兰巴托的汽车公路。从此，物资可以从乌兰巴托用骆驼运到自由中国。1月15日，苏联驻美国大使告诉美国副国务卿说，苏联政府打算向蒋介石提供更多的军火，就他所知，莫斯科与东京之间的谈判没有新的进展。

这意味着三国公约并没有给日本带来松冈确信不疑地预言会得到的那种主要利益，即同苏联进行一笔政治交易，包括促使苏联停止向重庆提供援助。使日本更为沮丧的是，万一苏日发生冲突，德国可以援引三国公约的第五条以及它与苏联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不来援助日本。总之，除非苏联向日本保证中立，日本既无能力向中国增派军队来消灭蒋，又无能力响应德国的倡议，对东南亚的英国属地发动猛攻。

在1940年9月三国公约签署的时候，里宾特洛甫曾邀请松冈日后访问柏林。12月19日，奥特汇报说，松冈曾经提到此事。松冈强调必须打开同苏联谈判的僵局，并表示希望访问柏林、罗马和莫斯科。12月24日，奥特又向他发出邀请，松冈宣称他将向内阁和军部申请必需的许可，以便访问欧洲，不过，他要等到大岛抵达柏林，递交国书之后，再进行此事。大岛是再度被任命为日本驻柏林大使，接替来栖。1941年2月3日，东京的一次联络会议同意松冈的申请；但是会议着重指出，松冈出访的重点是莫斯科，希望能签订一个苏日条约。访问柏林和罗马是次要的；日本驻莫斯科大使对他的美国同僚说，访问柏林和罗马只不过是一个幌子而已。松冈于1941年3月23日抵达莫斯科后，在同美国大使进行的一次谈话中仍然保持原来的主张。他说，日本只希望结束同中国的冲突，毫无意图要去占领太平洋地区英国、荷兰或美国的任何领土。

3月24日，松冈同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进行了一次讨论。按松冈自己说，一开始他就给这两位苏联领导人上了一堂日本式的“道义共产主义”课；他声称，“道义共产主义”是反对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是德国、日本和苏联的共同敌人。

作了这一开场白后，他就开始认真地谈论苏日关系中的“一些根本问题”。但是他发现俄国人只愿意讨论一个中立条约，而不提他所期望的那个范围更广泛的互不侵犯条约，甚至对签订中立条约，还要漫天讨价。因此，他决定将这一问题留到他访问柏林和罗马回来后再解决。

松冈于3月26日到达柏林，在随后三天中他同里宾特洛甫和希特勒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然后，他去罗马作了一次短暂的访问；回到柏林后，在4月4日和5日两天，又同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进一步商谈。从纳粹的观点来说，会谈的主要目的是要说服日本对新加坡立即进行袭击。他们已向大岛提起过这事，但是后来听到大岛暗示说必须先同苏联签订条约以及同中国媾和之后，才能采取任何这类行动，于是他们大为失望。里宾特洛甫对松冈说，德国从来不想邀请苏联成为三国公约的一个正式伙伴，甚至连缔结一个单独的联盟条约的谈判工作，这时也暂时搁置起来了。里宾特洛甫告诉松冈说，这是因为苏联对于缔结这个条约所提出的条件是德国不能接受的。里宾特洛甫说，总的说来，苏德关系还是正常的，但是并不友好，两国关系将来如何演变，难以断定。如果苏联要在欧洲采取任何敌对行动，德国就打倒它。德国已经集结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准备随时应付这种突然事变。苏联如进攻日本，德国将立即援助日本。希特勒本人曾对松冈说（3月27日），美国和英国正在设法说服苏联，要它干预德国。他认为这种情况不会发生，不过，他如察觉到有这种危机，他将立即采取行动。他已集结了一百五十个师的兵力，严阵以待。希特勒认为，德国已在苏联西部边境部署了这样强大的兵力，日本如向南挺进攻打英国的属地，谅苏联也不敢对日本进行干预。

这并不是松冈所盼望的目标。松冈的主要目标一直是想同苏联缔结一个互不侵犯条约（根据代表团成员加濑俊一所说），该条约将包含这样一项协议，即日本承认605苏联在外蒙古和新疆的特殊地位，相应地苏联要承认日本在华北和内蒙古的特殊地位。松冈还想要苏联保证不再支持重庆。如果可能的话，他希望能够购买属于苏联的那一半萨哈林岛；或者获得保证，由那个地区供应石油，为期十年，作为交换条件，日本方面愿意在五年之后放弃在那里的开采特许权。到此时为止，在同莫斯科进行会谈中，他未能为达到这些目标取得进展，他这才明白了，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决不肯为他出力对斯大林施加影响，因为他们不希望他同苏联缔结一个条约，他也明白了，四国联盟这一宏伟计划已被放弃。当松冈提出缔结苏日条约的问题时，里宾特洛甫就劝他不必进行了，“因为这或许完全不适合当前的形势”。里宾特洛甫又说，缔结苏日捕鱼协定和贸易协定还是可以的。可是，这并不合松冈的胃口；3月29日，他回答说，他不得不同莫斯科商讨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问题，因为是他原来提出这个建议的。他还提到想购买萨哈林岛北部一事，同时又说他对此事不抱乐观。里宾特洛甫说，“对于这件事，只有采取纯然形式上的和表面化的处理方法，才是可取的”，至于萨哈林岛问题，也可以在日后进行解决。他的话题又转到苏德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他声称：

如果俄国人竟然推行一种愚蠢的政策，逼得德国动手的话，届时驻在中国的日本军队（他了解他们的心情）倘若不能参加对俄国的进攻，他认为，这是合乎情理的。如果日本能够集中精力去攻打新加坡，这将对共同事业的更大贡献。有了共同的胜利，可以说，上述的各种愿望[即松冈所提出的]就会象熟了的果子那样落入日本的怀抱。

这是里宾特洛甫就德苏战争即将发生能够有权作出的最露骨的暗示。3月5日，希特勒曾向德国最高统帅部发布一项有关与日本合作的指令，命令不准提到“巴巴罗萨行动”。18日，雷德尔海军上将劝希特勒向松冈透露这一行动计划，以促使他马上去进攻新加坡。但是，希特勒由于对任何日本人评价都不高，显然认为松冈也许会把这一行动计划泄露给莫斯科，作为谋取他所盼望的日苏条约的手段。当希特勒于4月4日又会见那位刚从罗马回来的日本外相时，他宣称，苏联不会受到攻击，只要它能保持友好，继续遵守同德国缔结的条约。对苏日条约的谈判，他还持默许态度。4月20日，希特勒告诉雷德尔说，他这样做是为了阻止日本进攻符拉迪沃斯托克，并诱使它去进攻新加坡。

4月5日，松冈离开柏林，次晨当他抵达德苏两国势力范围的交界线时，他知道了德国进攻南斯拉夫的消息。他听到这个消息，感到很高兴。据说，他曾声称，老天爷已经把日苏条约放进了他的衣兜。可是，对这件事，他毕竟有点过分乐观了。苏联政府无意帮助南斯拉夫，虽然在3月间，美国政府根据可靠的情报曾警告苏联政府说，希特勒打算进攻苏联，苏联政府却不相信。因此，当松冈于4月7日又回到莫斯科，同莫洛托夫再开始商谈互不侵犯条约时，他感到谈判仍然象先前一样难以开展。次日，他对美国大使斯坦哈特说，苏联政府向日本提出的要求之高，简直使人们完全有理由怀疑它是否真正想要缔结这样一个条约。他不能想象，如何能在“领土方面作重大让步”。俄国人显然要求日本割让萨哈林岛南部，但是松冈却不敢在这一点上让步，他如这样做，一定会受到国内狂风暴雨般的愤怒谴责。他对莫洛托夫说，他既不愿意又无权作这种让步。

在这样情况下，松冈不得不勉强地放弃了同苏联缔结一个总的政治协定的希望，因为苏联政府或许并不希望有这样的协定。于是，他就转而谋求缔结一个范围较小的日苏条约，在条约中声明：两国互相友好；尊重彼此的领土；如果任何一方同第三国交战，另一方愿保持中立。莫洛托夫表示同意，并放弃了他要日本割让萨哈林岛南部的要求！但是，他又象在上年同东乡谈判时那样，再度要求日本让出在萨哈林岛北部的石油和煤的开采特许权。松冈那时候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他先前之所以要召回东乡，就是为了东乡建议要花这种代价的缘故。这时他本人也陷于同样尴尬的处境。他不能答应，于是，4月11日休会一天，他去列宁格勒访问，希望莫洛托夫经过深思熟虑后，或许会有所节制。但是，4月12日，他感到莫洛托夫仍然那样顽固。看来，谈判将告失败，因为松冈预定次日离开莫斯科，他决心宁可空手而归，却不能答应苏联的要求。可是，12日那天的早些时候松冈去向斯大林辞行时，斯大林本人却又重新提起这个问题，同意不要求日本立即让出萨哈林岛煤和石油的开采特许权，而松冈则答应，将说服本国政府在几个月之后作这种让步。他还给莫洛托夫一个书面保证，表示他愿意这样做，在这样的谅解基础上，日苏中立条约于4月13日正式签字。签字仪式之后，还举行了香槟酒会，斯大林并亲自到车站给松冈送行。当时，斯大林对松冈说：“日本和俄国之间既然解决了问题，日本可以整顿远东了；俄国和德国将经营欧洲，然后，大家再联合起来对付美国。”

中立条约规定，日本和苏联应保持和平与友好关系，互相尊重领土完整。如果缔约一方同一个或几个第三国家交战，另一方保证在整个战争时期保持中立。该条约自签署日起生效，有效期为五年。还附有一份边界声明。声明

说，苏联同意尊重满洲国领土的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也就蒙古人民共和国问题对苏联作了类似的保证。

缔结中立条约实际上是苏联外交的一次胜利，也是松冈的一次挫败。斯大林已得到日本的保证，万一希特勒进攻苏联，日本当保持中立，而他自己仍可自由地继续给重庆以外交上的支持。鉴于德苏战争即将爆发，松冈根本就不需要考虑缔结日苏条约的问题。这样，当希特勒发动进攻时，松冈就可以或是站在德国一边进行干预去打击苏联，或是要求苏联政府割让萨哈林岛北部和抛弃重庆的中国国民政府，作为日本保持中立的代价。

战后，苏联检察官在东京法庭上指控，松冈曾企图欺 608 骗苏联，说他要缔结这项条约的目的，是希望苏联政府相信这个条约，将其驻在远东的军队调往欧洲，抵御德国的侵略，然后，日本将趁机占领一无防备的苏联远东地区。苏联检察官又说，可是事实上苏联政府并没有疏忽大意而撤走其远东地区的驻军。

固然，在德苏战争爆发之后，松冈不顾日苏订有中立条约，确曾敦促日本政府去进攻苏联。但是，在签订该条约的时候，他的动机或许并不象后来苏联起诉时所断言的那样居心叵测。下面这一事实最能令人信服他说明他的行为。虽然他相信，在英国迟早被打败之后，德苏终将发生冲突，但是他认为，不会马上就发生这种冲突。他相信希特勒对他说的话：德国不会进攻苏联，除非苏联政府本身有联合英国的迹象而引起德国进攻；尽管俄德之间在巴尔干问题上存在着芥蒂，他认为，斯大林不会采取任何这类行动。他已看出，斯大林是敌视“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亟欲避免冒犯希特勒。因此，当松冈不愿以接受苏联提出的无所不包的要求为代价来换取一个互不侵犯条约时，他就急切想签订一个中立条约。他之所以要这样做，一个原因是他不想双手空空返回东京，另一于原因是他知道，不会由于希特勒向他作了口头保证，说什么要是苏联进攻日本，他就进攻苏联，日本人的疑虑就会减少了。缔结日苏中立条约，在当时的确等于是获得了一种保证，当日本向南挺进时，在背后不致受到苏联的袭击。

松冈第二次逗留在莫斯科的时候，再度同美国大使斯坦哈特谈话，并告诉他说，德国人不会进攻苏联，除非苏联政府把提供德国的物资数量大大削减。在他看来，德国人故意散布进攻的谣言，其目的是为了吓唬俄国人，使他们继续提供物资。据木户在日记中记载，这是松冈的由衷之言。1941年6月6日，木户记道，近卫打电话给他说，大岛在伯希特斯加登见到了希特勒，并获悉德国已决定进攻苏联。听到这一消息后，近卫召开了一次联络会议进行讨论。会上，松冈宣称，不管大岛的报告怎么 609 说，德苏之间和解的可能性占百分之六十，开战的可能性只占百分之四十。他坚持这种看法直到战争真正爆发为止。

日本政府在公布中立条约时虽然大吹大擂，但是它表里并不如一。在内阁中，松冈的同僚对他非常恼火，因为他未经授权竟作了保证，表示日本将放弃萨哈林岛的煤和石油的开采特许权。5月31日，建川通知苏联政府，日本将于六个月内交还这些特许权，但后来因德苏战争爆发，日本无须履行这一诺言。日本的报界和公众曾指望，继签订中立条约之后，苏联将不再承认重庆政府，并停止对重庆的援助。起先，中国政府感到惊慌，生怕这将成为事实。它对苏联政府默认满洲国一事也大为恼火。

可是，不久情况就清楚了，苏联对重庆政府的政策将保持不变（如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宣称的那样）。事实上，莫洛托夫于4月16日已经告诉过中国驻莫斯科大使，在苏日两国谈判过程中，没有讨论过中国问题，只要中国坚持抗日，苏联的政策将保持不变。

6月11日，签订了一个为期五年的苏日贸易协定，与此同时，还就德日贸易取道西伯利亚铁路问题达成协议。5月和6月间，满洲国和外蒙古的代表在赤塔会谈，恢复了一度中断了的苏联—满洲国在有争议的诺门坎地区划定边界的谈判。6月14日，双方达成了协议；27日起，在现场开始边界的实际勘定工作；8月17日，勘定工作结束，专员们草拟了一份包括勘定结果的议定书。10月15日，该议定书在哈尔滨签字，但是一直到1942年5月15日才被正式批准。

苏日关系方面的这些改善，本身是件可喜的事，但是，较之松冈使日本人对中立条约所抱的期望，特别是对10月结束中日战争所抱的期望，这些改善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在他刚从欧洲回来的时候，他的声望虽然曾经扶摇直上，但是在随后几个月里，就遭到严重的打击。

6月22日，大岛发回电报，报告了德苏之间爆发战争的消息。这使日本政府突然面临危机。在这以前，近卫、平沼和木户已经商定一旦德苏爆发战争时他们将采取的政策，即在俄德战争中日本应保持中立，并为本身利益继续向南推进。木户已将这个决定启奏天皇。但是松冈却持不同的看法。5月6日，他对奥特说，“如果德苏之间发生战争，没有一个日本首相或外相能使日本保持中立。形势将迫使日本站在德国一边去进攻苏联，任何中立条约都不能改变这种情况。”于是，他这时就越过近卫去觐见天皇，极力主张日本除南进外，也应参加对苏进攻。在天皇接见松冈之后，木户也觐见了天皇，发现天皇惊恐不安。天皇将松冈所说的话告诉了木户。天皇本人认为，就日本的资源看，这一政策过头了，希望内阁或者甚至军方不要支持这种政策。木户将松冈所做的事马上告诉了近卫和平沼，接着，首相要求松冈对此作出解释。松冈说，他并没有主张立即对苏联采取行动，这种说法当然不能使近卫满意，两人之间的关系就此紧张起来。松冈尽管这样说，一面却继续策划，想要日本进行干预，进攻苏联。6月22日，他又一次向奥特保证说，日本将不会继续保持中立；24日，松冈在回答苏联大使斯麦塔宁的询问时说，日本的政策尚未确定，将主要取决于战争的责任由哪一方来负。他又说，三因公约仍然是日本外交政策的基础，如果日苏中立条约证明同三国公约不能并存的话，那么，这个中立条约将失效。

德国政府也在敦促东京进行干预，去进攻苏联。6月28日，里宾特洛甫通知奥特，大岛已经同意朝那个方向去影响他的政府，里宾特洛甫指示奥特作同样的努力。他要奥特这样说，由于日本似乎还没有准备好去进攻新加坡，这时还是先同德国一起去消灭苏联为好，以便以后腾出手来向南挺进。东京有权势的人士反对这种政策。前任首相平沼也强烈反对，并对松冈深怀敌意。据木户本人说，他也跟平沼一样，他说，他在6月23日曾向近卫指出，由于德国已经完全改变了同苏联改善关系的政策——这项政策曾经是促使日本参加三国公约的一个重要因素——近卫应该考虑废除那个公约。近卫显然表示同意，但是这一建议没有获得全体内阁的支持。另一方面，在6月23日至6月30日之间召开的六次联络会议上，显然多数意见是反对日本对苏联

发动进攻。6月28日，东条对木户说，军方认为对德苏战争应当采取“沉着和慎重的”态度。同一天，奥特向里宾特洛甫报告说，近卫和大部分内阁阁员反对进行干预，因为这样做有可能危害日本在中国的军事地位。

6月30日的联络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这项决议于7月2日由御前会议正式批准。日本决定执行向印度支那和暹罗进军的计划，甚至准备冒同英国和美国作战的危险。关于德苏战争，日本将正式通知苏联，日本将继续遵守日苏中立条约。实际上，德国如在战争中得手，则日本最后将进行干预，“以确保北方地区的安定”。7月2日，松冈口头通知斯麦塔宁，日本会尊重中立条约。次日，松冈向奥特保证说，这个声明只是为了欺骗俄国人，事实上，日本正在为进攻他们完成军事上的准备工作。

可是，这并不能使里宾特洛甫满意；7月5日，他通知奥特提醒松冈他本人在5月6日所说的日本将站在德国一边进行干预。可是，松冈无能为力。他本人的地位这时岌岌可危，因为日本国内已经对他有反感，认为既然他缔结了中立条约把日本的双手束缚住，他就该引咎辞职。在日本，还出现了一种对德国愤愤不满的情绪，抱怨德国又一次使日本成为全世界的笑柄。同时又由于日军在诺门坎的倒霉遭遇，而产生了这样一种指望，期待希特勒不能象他想象的那样轻而易举地击败苏军。那些相信苏联能够坚持作战的人们中间，有建川将军。因此在东京，总的倾向是抱观望态度，看看德国人打得怎样再说。

美国政府由于看到日本在满洲国的军事准备而感到惊恐，这时出来进行干预了。7月6日，罗斯福总统给了近卫一封私人信，希望报道中所提到的关于日本打算进攻苏联一事传闻失实，他要求日本政府就此事提出保证。7月8日，松冈代表近卫回答道，日本政府迄今尚未考虑到同苏联开战的可能性，他还把日本在7月2日向斯麦塔宁所作声明的抄本给了美国大使。松冈还说，日本的政策主要取决于未来的形势发展。当对方问他，这个声明究竟是什么意思时，他列举了一些可能发生的事，例如，英国同苏联结盟，美国企图取道符拉迪沃斯托克向苏联输送军需品，认为这些将是日本宣战的理由。

的确，美国外交方针的这一改变，似乎已引起东京很大的不安，生怕苏美有可能进行合作。松冈询问，美国是否真正打算干预欧洲战争，对此，赫尔于7月16日答复道，美国对付德国征服全球计划的政策纯属自卫性质，但是人们不能指望美国会让德国取得直接威胁美国安全的战略利益。7月17日，松冈也作了答复。他驳斥了美国对德国的指责，并宣称，没有一个政府能够老是乞灵于所谓的自卫权利。可是，这不过是松冈临下台前的最后一招，因为近卫内阁已于7月16日辞职，其目的显然是为了要甩掉松冈，然后于7月18日重新组阁，由海军大将丰田贞次郎出任外相。但是，日本政府仍对苏美关系感到惊恐不安，8月15日，丰田通知大岛，斯麦塔宁又在探询日本的意图。丰田已告诉他，日本是打算遵守中立条约的，但是，苏联如把它在东亚的任何一部分领土割让或租与第三国，或者向这样一个国家提供方便，以建立军事基地，或者同这个国家缔结同盟条约来反对日本，那么日本不会忽视这种威胁。斯麦塔宁宣称，苏联政府无意于任何这类事情，并说苏联政府将会严格地遵守中立条约的各项条款。这一答复似乎减轻了日本的忧虑，也似乎使日本政府甚至比以前更不愿听从德国的建议参加对苏作战。9月4日，奥特汇报说，日本参谋本部由于对诺门坎战役的惨败记忆犹新，认

为只要有苏联的远东军存在，就反对进攻苏联。

因此，希特勒也许不无理由后悔，觉得他本人和里宾特洛甫在4月间不该向松冈夸下海口。那时候，他们曾宣称，苏联如果与德国交战，在几个月之内就会被消灭掉，德国可以不需要日本帮助就能达到这个目的。这时日本人咬定这句话，在实际行动上拒绝进行干预。因此，在1941年，如同在1939年那样，德国与日本之间在政策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分歧，这时世界斗争未来的演变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苏联政府通过佐尔格的渠道了解了日本人的真正想法之后，撤走了一部分远东军，抽走的这部分兵力，对1941年12月间苏军坚守莫斯科帮了大忙。

第二节 日本向南进军

（一）印度支那和暹罗

上文曾谈到，1940年6月间，日本人曾迫使印度支那的法国当局停止取道海防和广州湾向重庆输送物资。印度支那联邦总督贾德鲁将军要求法国驻华盛顿大使弄清楚，能否指望从美国得到军事援助。回答是毫无办法；韦尔斯似乎已经劝告他接受日本的要求。因此，贾德鲁自己作主向日本人让了步。由于这件事，贝当元帅领导的波尔多政府（后迁维希）于6月25日决定召回贾德鲁；在海军上将达尔朗的推荐下，任命法国驻远东海军总司令德古海军上将接替贾德鲁。但是，贾德鲁却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一度拒绝让位。当西原将军于7月中提出要在印度支那建立空军基地以及日本军队在印度支那享有过境权的问题时，贾德鲁表示，在防止中国军队进入印度支那和在贸易事务方面，愿意同日本进行合作。但是，他宣称，凡涉及日本军事占领性质的事必须经过法日两国政府协商。他试图拖延，希望自己或许会得到来自某些方面的援军。可是，7月20日那天，维希政府强制他向德古办移交。

在此期间，第二次近卫内阁已在日本就职，决定通过法国驻东京大使阿尔塞纳·亨利同维希政府进行谈判。8月1日，松冈向亨利提出在印度支那建立军事基地和日本军队的过境权问题。亨利犹豫不决，并说这等于是法国同中国交战，松冈扬言，维希若不迅速答应下来，日本将诉诸武力。在河内，那个暂时接替西原的日本华南派遣军参谋长佐藤谦良大佐也向德古递交了一份类似的最后通牒。维希政府经其外交部长保罗·博杜安（印度支那银行前董事长）的提议，于8月3日决定拒绝日本的最后通牒，但又表示愿意同日本达成协议，使日本在中日战争期间可在印度支那享受军事上的方便，作为报答，日本应承认法国在印度支那的主权。博杜安将法国政府的决定转达给泽田（日本驻维希公使），但泽田说，他对东京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德古接到命令，要他抵制日本华南派遣军进入印度支那的任何企图。博杜安还指示法国驻华盛顿大使圣—康坦伯爵将日本提出的要求告知美国政府；并且确实需要非常清楚地指出，我们的抵抗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美国政府在这方面最后所能给与的支持的性质和效能”。美国政府在8月6日给予明确的答复，暂时不能提供任何军事援助。但是，国务院确也指示格鲁通知松冈，美国政府对日本再三提出的要求感到非常不安，指出美国在4月和5月间发表的反对干预东印度的声明，应当同样适用于印度支那。松冈于8月7日同格鲁会谈时，不肯如实透露日本究竟提出过什么要求，可是，他告诉格鲁说，维希政府在原则上已经接受了这些要求。不过，松冈的确向亨利表明，日本的外交备忘录不能看作是最后通牒；松冈的这个举动，意味着615同意继续

谈判。8月9日，日本外务次官大桥递交亨利一份日本建议的关于印度支那政治和军事互换照会的草案。亨利马上表示反对，指出这份草案的措辞实在太含糊，简直意味着，日本人可以任意使用印度支那的各个飞机场和在印度支那的任何地方驻扎军队，因此，他拒绝了这份草案。次日，大桥又给他一份经过修正的草案，该草案规定东京省为提供这些设备和方便的地区。可是，亨利仍然认为这种提法范围太广。他说，日本所需要的飞机场应当规定下来。但是，大桥以军事上要保密为理由不肯这样做，并坚持要法国迅速签订协议。8月12日，泽田通知博杜安，日本政府希望法国全面而迅速地接受它的各项要求。

博杜安不打算接受日本所坚持的各项要求，尽管如此，他认为，法国必须向日本作一些让步，因为在他看来，印度支那本身没有力量抵御日本的进攻。可是，他遭到了魏刚将军、殖民地总参谋长比雷将军和殖民部长莱默里的反对。但是，博杜安不为所动，并反驳了比雷对印度支那法军力量的估计太乐观。他得到了陆军部长和空军部长勉强的支持；8月15日，维希政府对他所起草的答复表示赞同。这个答复虽然拒绝了日本8月10日的建议，但却同意日本取道印度支那向对华作战的日本军队运送武器、弹药和给养。作为交换条件，日本要尊重印度支那的领土完整，同时法国也要承认日本在远东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利益。法国的这个答复并不能满足日本的要求，松冈在接到这个答复时，扬言要派日军进入印度支那。8月16日，亨利报告说，日本人不肯降低要求，要是维希政府不同意让日本军队开进去，日军将强行侵入。由于博杜安相信，进行抵抗将意味着丧失整个印度支那，于是，他决定让步；当天，他说服内阁同意他的主张。亨利接到指示：维希政府将命令驻印度支那的法国军事当局签订一项协定，以向日本军队提供方便；作为交换条件，日本必须保证尊重法国对印度支那的主权。8月17日，博杜安把印度支那发生的情况告诉了美国驻维希的代办，请求华盛顿警告东京，法国在印度支那将要提供给日本的军事方便，必须随着中日战争的结束而终止。可616是，美国国务院却拒绝采取这一外交行动，理由是，这样做反而是默认日本可暂时占领印度支那。

日本外务省同军方磋商之后，在8月21日夜间接告诉亨利说，日本暂时只需要河内、朗商和富寿的三个空军基地，驻扎在这些基地的日军不会超过五、六千人。日本军队将取道海防—河内—老街和河内—凉山这两条铁路线运兵，但是日本不能透露经过这些铁路输送的军队人数。日本同意，这些特权是暂时性的，但是对明确承认法国在印度支那的主权一事，却保持缄默。8月21日，法国驻华盛顿大使报告说，萨姆纳·韦尔斯对他讲，既然美国政府不能帮助维希政府来反对日本，那么，美国政府也不能谴责维希政府向日本提供军事方便。8月17日，中国驻维希大使对博杜安说，德国不赞成印度支那被肢解。但是德国人不准备给维希以公开的支持。松冈曾两次要求柏林向维希政府施加影响以使其让步。里宾特洛甫要奥特回答说，德国对法国政策能起的影响是有限的。事实上，德国人不想帮助任何一方。

博杜安坚持日本必须保证法国在印度支那的主权。

8月27日，亨利通知他，松冈已经同意了。于是，博杜安不顾莱默里的进一步反对，指示亨利签订协定。8月30日，亨利与松冈在东京互换照会。法国承认日本在远东的经济和政治上居于支配地位，并同意给予日本优于其

他国家在印度支那享有的经济特权。法日双方达成谅解，日本所要的军事特权，其目的只是为了加速结束中日战争，因此这些军事特权的性质是有限的和暂时的。根据这种谅解，法国政府表示，准备命令驻印度支那的法军司令官在河内同日军司令官解决具体细则问题。如果由于给予日本军队方便的缘故，中日战火蔓延到印度支那的话，法国毋须承担任何费用，还将获得补偿。反过来，日本保证尊重法国在远东的权利和利益，尤其是尊重法国在印度支那的主权和印度支那的领土完整。日本对法国拟订的在 617 印度支那向其提供军事方便的几项条款，也表示同意。

在河内，德古海军上将不愿向日本人屈服。印度支那法军总司令马丁将军确信，他能够击退日本的进攻。

因此，德古在 8 月 24 日劝维希政府不要屈服。8 月 31 日，维希政府指示他去签订协定，但是如果日本人使用武力的话，则应进行抵抗。万一中国人如象重庆所威胁的那样入侵印度支那，德古可以按照指示让日本军队开入。

但是，德古和马丁仍然拒不听命。西原威胁说要使用武力，泽田则向博杜安呼吁；博杜安告诉泽田说，他已给德古发出指示。德古拒绝了西原的最后通牒，西原则扬言，日本军队将于 9 月 5 日发动攻击。博杜安支持德古拒绝日本最后通牒的行动，并向东京呼吁，日本政府不承认它知道西原这样做，收回了那份最后通牒。此举卒使马丁和西原在 9 月 4 日签订了一份初步协定。协定规定，驻扎在印度支那境内指定给日本使用的基地上的日军人数，包括非战斗人员在内，绝对不得超过日本所要求的通过东京省运送的二万五千人总数中的三分之二。日本军队要等到载有具体细则的正式协定签订之后，才可开入印度支那。任何违反这一条款的行为，将被看作是破坏协定，从而给予法国恢复行动自由的权利。西原希望这项具体协定能在 9 月 6 日签订就绪，可是未能如愿。

就在那天，有一营日军在谅山附近越过边界；不管西原如何解释，说这一行动是未经授命的，德古还是宣布，这是破坏 9 月 4 日的协定，突然停止了谈判。另外，由于东京不愿意在拟议中的新闻公报上公布日本保证尊重印度支那的领土完整一事，博杜安指示德古，在日本政府对这一点作出让步之前，不要签订军事协定。法国人同时也在抱怨暹罗人的侵略行为，尽管大桥保证日本未在幕后策划，法国人却不相信。不过，法国人怀疑这件事有日本插手，倒确实是冤枉了日本。

9 月 5 日，博杜安把有关亨利—松冈协定和印度支 618 那的情况告诉了美国驻维希代办。赫尔对法国向日本屈服和给日本在印度支那的特权一事表示激烈反对。但是他除了提抗议和采取一些经济上的报复手段之外，不愿采取进一步行动。当英国大使洛西恩在 9 月 16 日建议向印度支那联合提供军事援助时，赫尔表示反对，而且还警告洛西恩说，美国如卷入太平洋战争，势必要大大削减提供给英国的物资数量。德古希望从美国获得武器，包括飞机在内，但由于华盛顿没有什么多余的武器，最后决定不卖任何武器给法国。9 月 13 日，博杜安指示德古同日本人恢复谈判。与此同时，他向德国呼吁，要求德国劝日本适可而止，但是毫无效果，他还拒绝了中国政府提供的帮助，理由是中国派一师没有配备飞机的军队，敌不过日本军队。

9 月 17 日，西原在河内提出要使用六个飞机场和向东京省开入二万五千名日军。维希政府指示德古拒绝这些要求。19 日，日本人下了最后通牒，在

东京，由大桥递交亨利，在河内，由西原递交德古。这时，日本人进而要求有权在东京省驻扎三万二千名日军，并宣布，不管具体协定签订与否，日军将于9月22日进入印度支那。维希政府一面再次向东京呼吁，一面指示德古拒绝这个最后通牒，即使这样做会引起战争。结果，日本政府又一次退缩，撤销了最后通牒，并同意日本在印度支那的驻军不超过六千名。这样，那项具体协定终于在9月22日签订了。该协定规定，日本人获准使用在东京省的三个飞机场，有权在这些地方驻扎六千名日军，并有权取道东京省输送二万五千名以内的日军去进攻云南的中国军队。另有一项协定规定，准许日本华南派遣军的一个师从谅山附近取道东京省转移到广东。但是，那支一直好象上了嚼子焦躁不安的日本华南派遣军，这时仿佛脱缰之马向谅山法军发动了进攻。征集来的安南兵逃跑了，外籍军团中有相当人数的德国兵似乎也叛变了。结果呢，法国人遭到了一次惨败。这说明了博杜安对军事形势的估计一直要比比雷和马丁正确。德古和博杜安又向日本呼619吁，天皇以个人名义发布一道命令，要日本军队停止推进。这道命令发生了效果。日本陆相东条接着把应对此事负责的司令官安藤将军及其参谋人员一起撤职，把安藤部下的一些军官送交军事法庭。日本人向法国人道歉，交还战俘，还从谅山撤出军队。那个肇事的日本师取道海防撤走。西原由于没有能力控制日本华南派遣军，于10月2日由澄田将军接替。

在此期间，印度支那出现了一个新的危机。自1938年以来，暹罗一直由那个实际上的独裁者銮披汶元帅统治。他一直鼓励泛泰运动的发展，这个运动的目的，是想把暹罗王国扩大到包括所有泰族血统的人民在内。这种泛泰政策表现在銮披汶元帅的一道政令上，这道政令规定，暹罗此后改称“泰国”。暹罗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希望收复他们历代国王行使过宗主权的所有地方，不管这些地方现在有无泰族人民居住。可是，到这时为止，暹罗一直谨慎小心，避免卷入纠纷。1940年6月12日，暹罗同英国和同法国分别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这些条约规定，缔约国必须尊重彼此的领土完整，不得向可能同另一个缔约国进行战争的任何第三国提供援助。暹罗同日本也签订了类似的条约，但是日本由于急欲扩大它在暹罗的势力，增添了一项条款，规定对于那些彼此有利害关系的事务，应当互通情报，共同商议。

有一段时期，暹罗政府曾企图改变暹罗与印度支那之间的湄公河边界，以使暹罗获得位于暹罗一侧的深水道中的那些岛屿。而根据原有的一些条约，河道中的所有岛屿都属于法国。由于这一问题尚待解决，法暹条约一直未经正式批准。法国沦陷之后，维希政府听从法国驻曼谷公使莱皮西埃的意见，同意作此变更，并建议成立一个混合边界委员会。但是德古不愿意屈从暹罗人，再说，事先也没有人跟他商量过此事，因此他感到非常恼火。日本对法国提出的关于印度支那的种种要求，显然怂恿了暹罗人在这时提出进一步的要求。曼谷出现了要620求归还老挝和柬埔寨的小册子。对这几起事件，法国公使及时地提出了抗议，美英两国公使则采取主张维持原状的立场。博杜安要求日本政府采取同样的做法，但是日本政府不愿进行干预。9月17日，暹罗驻维希公使正式提出，要求先把湄公河右岸的法国领土的转让手续办好，然后再批准互不侵犯条约。他还要求法国预先作出保证，在放弃对印度支那的主权时，要把老挝和柬埔寨交还给暹罗。博杜安回答说，这些要求简直毫无考虑余地。暹罗公使于9月30日又一次提出要求时，博杜安重申了这一点。这时，暹罗军队与印度支那的法军之间不时发生零星的冲突。

暹罗政府显然指望日本对印度支那发动全面进攻，使法国在那里的统治垮台。可是，法国人反而同日本达成了协议，这时，暹罗人觉得自己处于困境。德古向老挝和柬埔寨增派援军，暹罗单独没有力量来把自己的要求强加于人。于是，銮披汶决定向东京呼吁，请求帮助。根据后来从日本外务省档案中找到的有关随后几次谈判的记载看来，出乎法国的意料，东京方面并未煽动过曼谷提出对印度支那的要求。暹罗当时的举动的确使日本为难，因为它希望法国人乖乖地接受自己的要求。事实上日本人确是有一个计划，想趁某个突然事变的机会来瓜分印度支那。他们准备将东京省给中国，如果这能诱使蒋介石媾和的话。其次，他们打算把柬埔寨割让给暹罗。

印度支那的其余部分将成为一个安南国，表面上独立，实际上置于日本的政治和经济控制之下。但是，这是一个后备计划，按照当时的情况来看，日本宁愿让法国继续统治下去，只要它肯唯命是听。

另一方面，松冈出于政治和经济上的考虑，想把暹罗纳入大东亚圈。可是，他也担心，除非他采取行动支持銮披汶，否则銮披汶也许会通过英美两国的援助获得他所期望的东西，这样，暹罗就有可能同伦敦和华盛顿结盟。

事实上，英国驻曼谷公使乔赛亚·克罗斯比爵士这时的确主张，应当劝使法国人向暹罗让步，以防止暹罗同日本站在一边。德古相信，莱比西埃是赞成这一方针的；可是，莱比西埃在1940年11月被召回，他的继任人加罗与621他看法不同。

罗的行动。值得注意的是，暹罗人于9月下半月派遣一个由銮蓬裕滴率领的亲善代表团赴日本，该代表团途经印度支那时，团长向德古建议说，法国只要肯把暹罗想要的领土让给它，就有可能取得暹罗人的帮助来反对日本。德古对这一建议表示不屑一顾。

9月20日，这个亲善代表团抵达东京，起初日本人对它的建议抱冷淡态度，对暹罗与印度支那的争端表示采取中立态度。可是，当10月间美国政府以停止向暹罗输出美国飞机来表示不赞成暹罗的做法，而维希政府又于10月15日再次拒绝暹罗人的领土要求时，日本改变了态度。东京方面这时显然感到机会来了。11月5日，日本核心内阁会议决定支持暹罗实现其领土愿望，只要暹罗同意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同日本合作建设大东亚。11月21日，核心内阁第二次会议一致同意，日本将支持暹罗，只要暹罗将其领土要求限制在湄公河西岸地区和巴色地区。对此，銮披汶不得不表示同意。于是，松冈在11月28日向维希政府提出建议，表示愿意“和平仲裁”法国与暹罗之间的争执。次日，维希政府答复说，对日本政府的好意表示感谢，但是不愿将任何领土让与暹罗。松冈劝维希政府对这种态度再行考虑。他说，这种态度“有损法国的利益”。德古已经估计到日本会提出新的要求，并决心抵制暹罗人，因此，他曾一再向华盛顿呼吁请求供给武器，但无结果。他也曾请求维希政府增援。但是，德国人却不让维希政府从马提尼克调动飞机到印度支那去，英国政府也不让一艘载有四营塞内加尔军队的运输船从吉布提驶往印度支那。在这种形势下，法国地面部队于1941年1月中旬企图在柬埔寨夺取一些较好的掩护阵地时，被暹罗人击败。但是，法国海军却于1月17日在阁昌附近的海面上赢得一次胜利，击沉了暹罗海军最精脱的几艘舰艇。

在法国与暹罗之间发生了这些战斗之后，日本驻印622度支那的司令官紧接着就向法国提出一份实际上的最后通牒，要求法国必须同暹罗签订停战协定。1月22日，维希政府同意日本进行调解。停战谈判从1月28日起在

一艘停泊在西贡港年的“名取”丸日本巡洋舰上举行，30日双方达成一项协议，规定双方应从停火时各自的阵地后撤十公里。与此同时，日本向海防和河内增派军队，并清楚地表明，如果法国不接受日本人的调解，他们将使用武力。

法暹谈判自1941年2月7日起在日本东京举行，但是不久即完全陷于僵局。停战期限将于2月25日终止，法国人宁愿再同暹罗交战，却不愿屈从对方的要求。但是松冈坚决主张把停战期限延长到3月7日。他提出了一份山他自己拟订的和解方案。对此，暹罗人不得不勉强表示同意。松冈威吓法国人，要是他们不同意，后果将不堪设想。此外，松冈还劝说柏林向维希政府施加压力。他向德国人透露了他的和解建议，请求他们施加影响，迫使维希政府接受这些建议。后来，德国政府的确做到了这一点。这可以由日本人在3月12日感谢德国政府给与他们“非常宝贵和有效的支持”一事来证明。维希政府在作出让步时非常不服气，并说，它不是向暹罗屈服，而是对日本让步。3月6日，这三个有关国家发表联合公报，宣布对主要的争执问题已经达成协定。11日，它们草签了该协定并公布了协定的条款。根据协定，法国把以下两个地区割让给暹罗：一是位于湄公河西岸的那一部分老挝地方；一是下述部分的柬埔寨地方，即以湄公河为界，直到上丁，再从该处开始直到洞里萨湖（大湖），然后向西南延伸直达退罗湾。让出的地区将成为非军事区。在迁入、居住和就业方面，暹罗人和印度支那人享受同等待遇。湄公河上的分界线沿着该河的主航道划定，但是孔埠和坤埠这两个岛屿则由法暹联合管理。暹罗政府同意尊重琅勃拉邦国王的陵墓和皇宫。这次裁决使暹罗获得了柬埔寨王国大约三分之一的地方和湄公河西岸的那一部分老挝地方。

这项协定附有日本政府与暹罗政府之间交换的信件以及日本政府与法国政府之间交换的另一些信件。在这些信件中，日本保证这次解决在性质上是“决定性的和不容违反的”，同时，暹罗政府和印度支那的法国当局双方623都同意，不同任何第三国签订协定，以导致它们同该国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政治、经济或军事合作来反对日本。包含这些协议的最后正式条约，于1941年5月9日在东京签署。

（二）威胁新加坡

1940年8月和9月，日本在印度支那采取了行动，紧接着又参加了三国公约。这在伦敦和华盛顿都引起了猜疑，认为这是日本要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进行进一步侵略活动的预兆。1940年9月12日，格鲁向美国国务院发出他的“绿灯电报”，提出美国应想尽一切办法维持太平洋地区的现状，直到欧洲战争结束。他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只有采取坚定的政策，而不能光靠表示反对。

如果能够把日本制止住，直到形势表明，德国不可能在欧洲取胜，到那时，也许有可能按照美国所定的方针，用外交手段来解决远东的争端。

在华盛顿，对日本行动的初步反应是把出口许可证制度的适用范围扩展到所有各种废钢铁。美国总统于9月30日宣布了这一措施，规定自10月16日起开始执行。

这给日本一个沉重打击，因为日本的钢铁工业要靠大量从美国进口废钢铁为原料。这些废钢铁的来源这时已被切断，这方面的许可证只签发给向西半球和英国的出口。10月8日，日本驻华盛顿大使递交了一份来自东京的严重抗议，提出美国对日本的输出如再有新的限制，将使两国的未来关系不堪

设想。赫尔极其愤怒地对此作了答复。不过，日本的这种警告还是产生了一些影响。总统内阁中的几个成员，包括陆军部长、海军部长和财政部长，一段时期以来一直要求对日本禁运石油，10月初，他们又提出这种要求，但是，罗斯福和赫尔却表示反对，理由是，这将迫使日本人去攻打东印度。两位参谋长马歇尔将军和斯塔克海军上将提出警告说，美国还没有作好开战的准备，如果可能的话，无论如何要避免同日本交战，因为美国首先要关心的是保证击败希特勒。

在这期间，英国政府一直在强烈要求美国派舰队去 624 新加坡，以阻止日本进行新的侵略活动。1940 年 10 月，丘吉尔结合英国重新开放滇缅公路的决定，再次迫切要求美国舰队——“越大越好”——访问新加坡。美国政府最后还是决定不接受英国的这种要求。但是，美国舰队，按照总司令理查森海军上将的意见，没有返回美国本土的太平洋海岸，而是停泊在珍珠港，结果遭到了悲惨的下场。

事情暂时平静下来了。但是，后来由于日本对暹罗与印度支那之间的纠纷进行了强制性的“调解”，又引起了人们的恐惧，怕日本在印度支那南部和暹罗攫取军事基地，作为伙同德国攻打英国的前奏。伦敦从东京收到了有关此事的一些报告，并转给了华盛顿。1941 年 2 月 7 日，艾登对日本驻伦敦大使重光说，他对日本声称缔结三国公约为为了和平事业这种说法表示怀疑。他要那位日本大使注意松冈所作的那些好战演说，以及日本想要扩大东亚势力范围的种种要求。艾登宣称，英国政府不能同意日本自称有权调解远东的各种冲突；英国政府认为，日本这样做的目的，只不过是借调解为名，想从暹罗和印度支那获取军事和政治方面的特权。驻东京的罗伯特·克莱琪爵士这时发来一份报告说，在两三个星期之内，远东似有可能发生危机。艾登想知道，这是否指英国根据这一点应当假设，它在远东的领土有受到日本进攻的危险。他说，如果这样的话，就应当竭尽全力保卫这些地方。他又补充说，日本大概不会忘记，它的全盛时代是在它同英美两国和睦相处的时候。

克莱琪和艾登两人的忧虑不是毫无根据的。1 月 31 日，奥特曾向柏林报告，日本“主张积极行动的人士”正在要求对新加坡发动突然袭击，以排除美国军队使用新加坡的一切可能性。奥特说，日本将采取的这种行动对德国究竟有利还是不利，他已就这个问题同德国驻日本的陆海军武官进行了磋商。他们认为，一方面，这将给英国以沉重的打击；另一方面，几乎可以肯定，这将促使美国参战，并在太平洋开辟一个新的战场，对这个战场，德国是鞭长莫及。再说，日本虽能获得马夹亚和东印度的富饶土地，而这些地区的资源将被日本自己用于战争，而不会再供给德国使用。因此，奥特请示上级，对日本计划的这次进攻，他应抱什么态度。奥特在 2 月 10 日发 625 出的另一份电报中汇报了同松冈谈话的情况，这位日本外相说，他已经指示野村海军大将（已被任命为日本驻美国大使），要他强调日本忠于三国公约的态度，并劝告罗斯福，美国参战将是无意义的，因为这样做不可能挽救英国免于战败。松冈又说，可是如果看来美国即将进行这种干预的话，那么，日本为了防止美国在西太平洋发动战争，就要考虑进攻新加坡。日本要同德国取得完全一致意见后，才采取这种行动。与此同时，日本军队正在进行各项准备，以防万一。

艾登在告诉霍普金斯（他当时在伦敦从事租借法方面的工作）2 月 7 日

他同重光会谈一事时，认为日本在德国的煽动下，打算切断英国与澳大利亚之间的海路交通，包括取道好望角以及苏伊士运河的海路。哈利法克斯（接替洛西恩为英国驻华盛顿大使）主张英国和美国联合发表声明，警告日本如对英国或荷兰在远东的属地发动进攻，就意味着同英美两国交战。这一点没有能够做到，于是他又建议，罗斯福应向野村提出严肃的警告，并且派美国军舰去新加坡。但是，华盛顿不准备采取任何这类措施，虽说罗斯福在2月14日接见野村时，的确向他提出了比较温和的警告。恰巧就在同一天，美国驻东京大使馆的参赞杜曼未经授权也对日本外务次官提出了内容直率得多的警告。杜曼对大桥说，“有人认为，美国人在向英国大量输出军火的时候，对英国与英国自治领和海外殖民地之间的海路被切断一事将抱无动于衷的态度，这种想法是荒谬的。因此，日本或任何其他国家如对这些交通线的安全进行破坏……势必同美国发生冲突。”

大桥直截了当地问杜曼，如果日本进攻新加坡，是否意味着同美国交战。杜曼回答道，“事态发展的必然结果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这个问题”。大桥说，他已一再告诉克莱琪，日本毫无意图向新加坡和荷属东印度进军，除非其他国家通过美国对日本实行禁运，或向新加坡派遣美国舰队，“逼得”日本非这样干不可。

松冈已经指示重光，要他称克莱琪的报告为“一种荒谬的幻想”，并否认日本有同英国找麻烦的意图。2月15日，他也对克莱琪否认有此事，并说，日本不想从调626暹罗与印度支那之间的纠纷中索取报酬。但是，他承认，在日本，他称之为“极端分子”的那批人正在这样要求。克莱琪警告他说，英国对日军在印度支那的人数激增，不会熟视无睹。松冈还交给艾登一份备忘录，否认有对英国进行任何侵犯的意图，并又一次声明，三国公约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欧洲战争蔓延开来。他再度重申，日本在暹罗与印度支那之间进行斡旋，目的不是为了从中渔利。他的结束语是：“日本由于对早日恢复和平深表关注，因此不仅在大东亚，而且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完全愿意居间调解，或者采取旨在恢复正常状况的任何行动。”最后一句话也许只不过是毫无意义的花言巧语。

可是，英国政府却将其理解为在德国授意下的建议，想为英德两国进行斡旋。这个被英国人信以为真的调解提议，由于情报局代理发言人石井工作上的疏忽——显然是故意的——将该备忘录的一部分内容泄漏给报界之后，在东京公开了。德国人一听到这种含蓄的提议，说德国需要讲和，大为恼火。2月25日，大岛从柏林汇报说，里宾特洛甫开始时曾认为这是对三国公约的一种背叛行为，但是后来，是他（大岛）设法把里宾特洛甫的怒火平息下来。日本的亲德派也起来反对，于是，松冈不得不赶快否认，说轴心国从未建议过要别人调解；接着又说，他只不过表示了一种个人的看法。

丘吉尔得到了消息，知道侨居伦敦的日本人已经有些紧张，并且可能已作离开的准备，他于2月15日告诉罗斯福说，虽然看来日本人不象会直接进攻新加坡，但要提防他们或许会攫取荷属东印度的一些据点，更坏的是，他们将会袭击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海岸，还将扰乱印度洋和太平洋上的英国贸易航线。如果英国必须予以对付的话，势必严重地削弱它在欧洲和中东的作战力量。因此，丘吉尔向罗斯福呼吁，请求他尽一切力量“来促使日本人害怕两面作战”，那就是要使他们害怕既要同英国作战，又要同美国作战。可

是，2月20日，丘吉尔谈了关于日627本的一则较好的消息。他说，松冈即将访问欧洲一事“很可能是用以掩饰不对英国采取行动的一种外交伎俩。”

2月24日，丘吉尔同重光进行了一次谈话。这位英国首相回顾了先前的英日同盟和他本人对日本的友好感情。他否认英国有进攻日本的意图，但是又说，如果日本在同中国打仗的同时，又同英国和美国进行战争，那将是十分遗憾的。重光回答说，日本没有进攻英国或美国的意图；他并且否认对新加坡、荷属东印度或澳大利亚抱有任何野心。丘吉尔向重光提醒三国公约一事，并指出，“对德国如此有利而对日本几乎一无好处的”公约不包括一些秘密条款，那真是太奇怪了。他还说，从日本同美国的关系这一观点看来，缔结这个公约是日本一个极大的错误，它已成为促使英美两国联合起来的一个重要因素。此外，丘吉尔还交给了重光一份备忘录，以答复松冈2月17日的信件。这份备忘录拒绝接受同轴心国进行和谈的任何建议。它声明，如果日本和我国竟然打起来，这将是英王陛下政府最感遗憾的事，不仅因为两国会回忆起以往那些愉快结盟的年代，而且因为这一令人伤感的事件将使这场战争扩大和延长，尽管在英王陛下政府看来，战争的结局并不会因此而改变。

2月27日，松冈作了答复。他否认日本有提议正式担任调解的意图，并重申了三国公约的和平宗旨，但是他宣称，日本将毫不犹豫地履行根据该公约所承担的义务。3月4日，重光将这一答复的要旨转达给丘吉尔。在这个场合，丘吉尔向重光指出，在三国公约中，没有一条规定日本有参战的义务，那位日本大使“默认了”这一点。据此丘吉尔推测，“除非等到日本确知我们将战败的时候，它是不至于向我们进攻的”。

看来，事情的真相确是这样。日本人对希特勒决定进攻苏联一事一无所知，而且仍然在指望德国进攻英国，并正在等待那个突然事件发生，然后采取行动。不过，1941年2月间外交上的意见交换也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些意见的交换似乎已使日本人确信，他们不能对新加坡或荷属东印度发动进攻，否则就会同美国交628战。德国企图说服日本人采取相反的方针而发动攻击，但是日本人置若罔闻。这就形成了德日两国之间在政策方面的另一分歧。

德国人希望通过日本立即进攻新加坡，作为迫使英国求和的一种手段。2月23日，里宾特洛甫在富歇尔对大岛说，“一定要以闪电的速度，如果可能的话，做到在不宣战的和平气氛中”去占领新加坡。他说，这样将使英国丧失战斗力，并阻止美国参战。大岛回答道，占领新加坡的各项准备工作正在进行，将于5月底准备就绪。但是，他又说，日本认为，为了谨慎起见，在做这些准备工作时，一定要预计到，不仅将同英国打仗，还有同美国交战的可能性。根据判断，光靠从海上去攻打新加坡是极其困难的，一定也要从陆上去进攻。这项作战计划包括占领香港，必要时，还需要占领菲律宾，这一战役必须同欧洲战争的进展协调起来。但是，这一点却丝毫不合里宾特洛甫的胃口，他再次坚决主张，日本只要对新加坡立即进行突然袭击就可以了。大岛也许出于礼貌，表示同意，并说，近卫和松冈也赞成早日攻打新加坡。里宾特洛甫答道，他希望松冈从速把进攻新加坡的最后决议带来，具体细则可以在柏林拟定。这位德国外长迫切要求日德两国之间应有最密切的合作，特别是在公开发表意见方面，联系到这一问题时，他提到了松冈在调解问题上的失言，对这件事，柏林显然还在恼火。

2月27日，里宾特洛甫指示奥特，“采用一切可能办法，使日本尽快以突然袭击方式去占领新加坡”。希特勒于3月5日向德国武装部队发布了一道关于与日本合作的指令，指出德国的目的是要诱使日本在远东采取积极行为，以牵制那里的英国军队并把美国的注意力引向太平洋。他说，德日两国作战的共同目标是要打垮英国，使美国不加入战争。

但是，日本人却不想为德国打仗。3月18日，雷德尔告诉希特勒说，虽然日本应该马上进攻新加坡，但是日本的军官们曾表示，只有当德国军队在英国登陆时，日本才能这样做。魏茨泽克在3月24日给里宾特洛甫的备忘录中，也作了几乎同样的结论。他指出，虽然德国可以以给日本一些甜头，例如，德国放弃对荷属东印度和对太平洋地区前德国属地的所有领土要求，对中日冲突进行调解，或者承认汪精卫政权，但是他认为，这些甜头不会产生什么效果。在他看来，日本参加对英作战，取决于德国今后能否取得新的胜利。当时正被召回柏林参加同松冈会谈的奥特汇报说，日本陆军参谋总长和海军军令部长都说，他们正在为进攻新加坡作准备。但是海军担心，倘若仍然放过菲律宾不去占领的活，美国的潜艇和空军将对日本的交通线进行破坏。其次，他们还担心，英国海军将从地中海调到太平洋。至于日本陆军，则希望能够确切肯定，苏联不会采取敌对行动；陆军不愿意在没有这种保证的情况下就向英国开战。

这是3月底以及4月4日和4月5日德日两国在柏林进行会谈时的背景。在这些会谈中，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两人都竭力要使松冈相信，对英国的战争实际上已经打赢了（上文已谈到他们在苏联问题上所作的保证）。关于英国问题，希特勒断言，它已经被牵制在欧洲，轴心国当前的目标是要摧毁整个英帝国。他坚决认为，美国还没有准备好进行干预，所以，在他看来，这正是日本动手的最好时机，为消灭英国的力量而出力。他又说，要是错过这个良机，欧洲战争将以一种妥协的形式来结束，这样，法国和英国几年后将重整旗鼓，并与美国结成三国同盟，共同对付日本。希特勒接着说，从另一方面看，德国和意大利对东亚是没有利害关系的，因此，对日本想在那个地区实现自己的目标，不会进行反对。所以，日本应该同德国和意大利联合起来，将英国完全击败。里宾特洛甫附和德国元首的意见，特别起劲地赞成日本迅速进攻新加坡。

松冈的回答，言如其人，他夸夸其谈，言过其实。他说，远在欧洲战争爆发之前，他就主张同轴心国联盟。当欧战开始时，他曾经极力主张立即进攻新加坡，“因为他不赞成那种想法，即日本既要参加轴心国的联盟，又不肯作些贡献，以促使英国崩溃”。但是，他一直受制于上面。630他同意，日本必须尽快占领新加坡。然而，他说，“日本，也同其他国家一样，有这样一些知识界人士，只有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才能把他们牢牢地掌握住。他的意思是指这种人想得虎子而又不肯入虎穴。”这些人中，有的有权有势，地位烜赫，他必须说服他们接受他的观点。在这一点上，他相信自己最后一定会成功。“但是，目前，在这些情况下，他还不能代表日本帝国保证采取行动。……他不能作出明确的许诺，但是，他答应，他本人将竭尽全力，以达到所说的目的。”

对德国领导人说来，这些话不很中听。在后来一次会谈中，里宾特洛甫又论述到英国即将崩溃，并指出，大好时机摆在日本面前，只要它肯断然采取行动。他还尽力使松冈相信，美国进行干预的危险很小。松冈对此表示同

意，并说，“他的策略是根据这样一种可靠的假设，即一旦突然进攻新加坡，日本全国将会一下子团结起来。”他宣称，在新加坡问题上，他正在想一切办法来安抚英国人。他表现得仿佛日本对英国在东方的这一重要据点不抱任何野心。因此，无论在口头上，还是在行动上，他都对英国装出一副友好的样子。不过，德国切不要被这种假象所迷惑。他之所以要这样做，不仅是为了安抚英国人，也是为了迷惑日本国内那些亲英和亲美的人士，直到有朝一日他对新加坡发动突然袭击为止。

他要求德国对这次袭击提供援助。里宾特洛甫回答道，他已经要求大岛提供有关新加坡的各种地图，“以便德国元首，无疑他应是当代最伟大的军事专家，为日本进攻新加坡提供最佳的战略方案”。松冈说，“他在下级海军军官中间有几个知己朋友，他们都是这方面的专家。他们认为，需要三个月的时间才能把新加坡攻下”，然而，“作为一个谨慎的外相，他已经把时间放宽了一倍”。

松冈在同希特勒进行最后一次会谈时，再次请求“德国帮忙，提供最先进的作战经验以及最新的技术发展和发明”。希特勒答应提供这方面的情报；在谈到美国可能进行干预的问题时，他说，虽然德国希望避免同美国打仗，但还是为此做了一切准备。

〔他接着说〕如果日本同美国发生冲突，德国将立即采取必要的措施。至于美国先同谁发生冲突，不管先同德国还是先同日本发生冲突，那没有什么关系。美国总是一心想把一个国家先干掉，接下来，决不是想同另一个国家达成协议，而是想在下一步再把它干掉。因此，一旦日本与美国之间发生战争，德国……将立即参加进去，因为三国公约同盟国的力量就在于它们的一致行动，它们的弱点就是让敌人把它们各个击败。

松冈回答说，他一直表示，如果日本沿着目前的道路走下去，总有一天势必要同美国打仗，这一仗与其迟打，还不如早打。可是，许多人不肯这样看问题，反倒认为他是“一个具有危险思想的危险人物”。因此，他必须让希特勒知道这种令人遗憾的情况〔原文如此〕就是，他〔松冈〕虽然身为日本外相，在日本国内却一点不敢提到他向德国元首和德国外长提出的那些计划。在政界和金融界，谈到这些计划对他很不利。……而且……，他也说不出，什么时候他才能有机会与日本首相或天皇举行一次会议，就他们已经讨论过的这些问题进行研究。首先，他将日本的形势发展作深入细致的研究，以便寻找一个适当机会向近卫亲王和天皇禀明他的实际计划的真相。

同时，如果人家问到他关于新加坡的问题，他将说，这一问题只是从假想出发进行过讨论；为了保守秘密，他要求德国在发给东京的文电中不要提及此事。他说，他相信德国人的审慎态度，但不幸的是，他对日本人是否能够缄口不言，却不那么深信不疑。

这是德国方面所作的会谈记录，没有理由去怀疑它的正确性，即使后来松冈否认自己在这个场合对新加坡问题说过一些话。还可以看到，他并没有代表他的政府作出任何肯定的许诺，而且在强调日本国内反战派的力量时，他已经为背弃他个人的许诺埋下了伏笔。希特勒对松冈显然一点都不信任。如上所述，他不肯向松冈透露“巴巴罗萨行动”计划，他的确（虚伪地）说过，只要俄国人的行动不引起德国的不满，德国不会进攻俄国。希特勒曾保证，如果美国进攻日本，德国就进攻美国。他这么说，无疑是想激励东京去进攻新加坡。但是，除了潜艇战之外，德国能在海上帮助日本去打击美国的

力量是微乎其微的，这件事是日本海军界一直极为关心的。希特勒对这次会谈得出的结论似乎是，只要日本人不能消除对苏联的疑虑，德国对日本就不能抱多大的希望。6月21日，希特勒在写信告诉墨索里尼德国即将猛攻苏联时，谈632到为什么要采取这一行动的种种理由。他说，俄国的消灭将意味着“日本在东亚能够大大地松一口气，这样，日本的干预将有可能对美国的活动构成更大的威胁。”

英国政府希望松冈访问伦敦，因此曾同华盛顿商量向他发出邀请的问题。但是，美国人采取这样的方针，要是松冈想去美国，他将受到欢迎，但是美国不准备发出邀请。于是，丘吉尔决定不亲自会见松冈，而是发给他一份公函，函件的全文先给美国政府看过。信是以提问题的形式写成的，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是东京应该好好考虑的”。事实上，在丘吉尔看来，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不言而喻的，等于是在直截了当地警告松冈，如果日本参加轴心国一边作战，它们将同归于尽，因此，日本最好还是等着看一看，欧洲将发生些什么。松冈曾要日本驻伦敦大使重光参加他在柏林举行的谈判，因此，丘吉尔原来打算请重光把英国政府的信件带去。但是，最后重光决定不去柏林，于是那封信只得发给英国驻莫斯科的大使，因为松冈将到那里访问。4月12日，克里普斯在莫斯科艺术剧院遇见松冈，就将那封信件交给了他。松冈没有把信拆开，只是放入他的口袋。直到他返回东京之后，于4月22日才作答复。他回答说，日本的外交政策是在不偏不倚地审查一切事实并非常审慎地权衡了各种形势之后制定的，这一政策一经制定之后，就将极其审慎而坚决地贯彻执行。

暂时说来，事情到此为止。然而，松冈使伦敦和华盛顿紧张不安，有一个反应是，英联邦、荷兰和美国的作战部队的代表们在新加坡参加了一次会议。会议从1941年4月21日开到27日，制定了一个联合行动方案，规定一旦任何一个与会国遭到日本攻击时将要共同采取的对策。可是，美国的陆、海军参谋长对这个已经通过的方案33却表示不能接受，并说，无论如何不能指望美国会采取行动来实施这一方案，除非日本直接进攻美国。但是，日本人却密切注视着这些情况，并从中看出了旨在包围日本的计划。结果，日本海军界越来越明白，如果日本进攻新加坡或荷属东印度，就不能不考虑美国将进行干预。

（三）日本对荷属东印度施加压力 1940年5月至1941年6月

到1941年4月，日本已如愿以偿地使法属印度支那纳入大东亚圈，并且还在采取一种长远手段，以使暹罗也遭到同样的命运。但是，日本在努力使荷属东印度纳入其新秩序范围时，却受到了挫折。这是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不仅是因为众所周知荷兰人有顽强的性格，这往往典型地表现在谈判过程中，而且还因为日本要对东印度用兵，在地理上不如对印度支那和暹罗那样方便。虽则荷兰本土已经被希特勒的军队占领，但是荷兰政府并没有投降。荷兰仍然作为英国的盟邦继续在斗争，因此，日本如对荷兰的远东地区发动直接进攻，就很可能要陷进同英国作战。再说，美国在荷属东印度拥有大量的经济利益；而且如上所述，1940年4月和5月间美国对日本发表的关于那里现状的声明，曾经作了迅速的反应。因此，日本政府不得不估计到，它如占领荷属东印度，实际上就必然要同英国交战，也有可能会同美国打起来。此外，荷兰在东印度已经部署了相当的兵力，有力量打一场阻滞战，这样，就有充分时间来破坏贮存的石油和油井设备。这恰恰是日本海军当局特别想

避免的。因此，1940年8月间，东京决定暂时不对荷属东印度直接发动进攻，准备等到德国入侵英国，或者德国迫使英国投降之后再说。这将是日本占领马来亚和新加坡的信号；此后，日本再迫使荷属东印度成为它的保护地。在日本外务省1940年10月4日一份题为“对南方地区暂定政策计划”的文件中提出这一计划。该文件谈到要防止东印度的自然资源被荷兰人的“焦土”政策破坏。日本必须先占领新加坡，然后一定要胁迫荷属东印度宣告独立，必须成立一个管理委员会，其成员包括荷兰人、印度尼西亚土著、华人和日本人。荷兰人占少数。下一步则把荷兰人清除出去，使这个“独立国”和日本缔结一项同盟条约，规定任用日本“顾问”担任重要职务，把陆、海军基地租借给日本使用。

在这期间，日本为了替这个计划铺平道路，使用了威胁和利诱的手段，力图把荷属东印度纳入它的政治和经济轨道。早在1940年2月2日，这项工作已经开始了，当时日本政府通过其驻海牙公使向荷兰政府提出一份照会，要求废除或修改日本在荷属东印度从事进出口贸易方面所受到的限制，并且要求对那里的日本企业，无论是原有的企业还是计划中的企业，给予更大的方便。当荷兰政府还在考虑怎样答复时，德国人大举进攻荷兰。

日本政府立即逼荷兰迅速答复。5月20日，有田向荷兰驻东京公使提出一份照会，要求东印度每年向日本提供规定数量的某些原材料，其中包括一百万吨矿物油。5月28日，他要求荷兰政府马上答复，并且采取了一种含蓄的恫吓手段。在这种形势下，荷兰政府决定不直截了当地拒绝日本的要求，而是准备尽量少作让步，以便拖延时间。因此，6月6日，荷兰政府作了一个庄严而又谨慎的答复，强调指出，荷兰对在东印度的一切外国居民、外国企业和贸易，总的采取一视同仁的政策；它拒绝了日本提出的有关优惠经济地位的要求。但是，也同意了日本提出的有关原材料出口的一些比较合理的要求，并建议，具体问题将在巴达维亚由日本驻那里的总领事与当地荷兰当局谈判协商。

635 日本政府想要举行更全面的谈判。在这以前，它故意不让日本驻荷兰公使跟荷兰流亡政府一起去英国，这时又希望在巴达维亚不但进行经济谈判，而且进行政治谈判，从而削弱在伦敦的荷兰政府的影响。荷兰政府反对这种做法，坚决主张，一切谈判只能局限于经济事务；

对近卫内阁起先提名小矶将军为日本代表团团长也表示反对。最后在8月27日，日本政府宣布，已经任命日本内阁通商产业相小林一三为派往荷属东印度的特使。荷兰政府方面则任命经济事务局长H·J·范·穆克博士为首席代表。但是，这次日本政府对荷兰政府的任命表示剧烈反对。日本坚决要求荷兰政府授予荷属东印度总督以特权，由他同小林一三进行谈判。很明显，日本政府的目的是想使荷属东印度政府尽量脱离在伦敦的荷兰政府，小林一三代表团的主要用意不在经济方面而在政治方面。可是，荷兰政府识破了日本耍的这一花招，在回答日本提出的反对意见时，的确将范·穆克的级别晋升到全权公使，并且还同意，小林一三与荷属东印度总督之间可以举行一般性质的会谈。但是这位总督却拒绝参加政治方面的谈判，这使小林一三相当恼火。

小林一三和他的一大群随员，包括陆、海军军官，于1940年9月12日到达东印度。他受到了一切应有礼节的欢迎，但是他鼓吹的要荷兰同日本进行全面“合作”的提议，却遭到了有礼貌的、然而坚决的拒绝。荷兰人告诉

他说，只有在日本对东印度不怀任何敌意、不打算在那里称霸时，荷兰才继续进行谈判。小林一三在 10 月 16 日的联合声明中，只得对这一条勉强表示同意。

在经济方面，日本人对他们自己究竟要些什么，胸中无数。他们一开始提出一些荒谬的要求，要荷属东印度政府保证每年向他们提供石油，可是，最后他们降低了要求，不需要什么保证了。事实上，日本人的主要兴趣不在购买石油。他们真正想要的是获得租借地以便开采石油，并对荷兰的几家石油公司进行控制。10 月 22 日，小林离开巴达维亚返回日本，表面上是因为通商产业省需要他回去，实际上是因为他没有完成他的主要任务，把荷属东印度纳入“共荣圈”。他让他的部下继续进行谈判，但是谈判仍然处于僵持局面，而代表团中的大批日本“专家”则忙于刺探各种情报，为未来的进攻作准备。鉴于这些活动，荷兰政府于 11 月 15 日通知日本政府，由于缺乏谈判的主题，会谈已经结束，并建议，谈判应当正式终止。但是，11 月 20 日，东京回答说，将另派一位特使。他是日本贵族院议员、前外相芳泽谦吉。12 月 28 日，芳泽抵达巴达维亚。

这位新任特使与他的前任不一样，是一个富有经验而又机敏的外交家。可是，他的任务也是要把荷属东印度纳入大东亚的经济和政治轨道。10 月 25 日，日本内阁已制定了一项对付东印度的方案，内容包括：日本控制荷兰的外汇和商业政策；日本参加沿岸贸易；日本左右陆、海、空交通管理。在这些迫切的需要中，有的已经列入了 1941 年 1 月 16 日芳泽提出的一连串要求之内。这些要求如果真的被接受了，就将大大帮助日本在经济上扼住东印度的命脉。然而，荷兰人不肯放弃这些权利；在这方面，他们有英国和美国政府撑腰。可是，由于这些朋友只能给予一些道义上的支持，荷兰人必须小心翼翼，避免激怒日本向他们发动进攻。因此，他们还是继续讨论日本提出的建议，希望拖延时间；在这一点上，松冈本人却不知不觉地帮了他们的忙。1 月 21 日，松冈对日本国会说，荷属东印度已经加入了大东亚圈。

一星期后，他命令芳泽不要作任何的暗示，表明这个地区将来不归日本统治。这使芳泽感到为难，因为他已经作了很大努力，一直在安抚荷兰人，使他们不再怀疑日本别有用心。1 月 31 日，荷兰驻东京公使宣称，荷兰政府不承认任何这样的提法，说什么东印度将成为日本新秩序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位日本官方发言人于是宣称，在伦敦的荷兰政府没有合法地位，它只不过是英国人的傀儡而已。接着，荷兰人宣布停止谈判，以示抗议。谈判就此停顿下来，一直到 2 月底，日本人表示道歉后才再继续。

荷兰人的顽固立场使芳泽感到沮丧。他报告东京说，除非日本采取果断措施，否则将一事无成。可是，日本还不准备这样做，因此，当谈判重新开始时，日本代表降低了他们的要求。但是，对于任何给予日本在东印度一种优惠经济地位的建议，荷兰人仍然一概拒绝；荷兰人也不同意向日本出售日本代表团所要求的那种数量的石油、锡和橡胶，甚至在日本人保证不把橡胶和锡转让给德国以后，荷兰人还是不肯。6 月 6 日，荷兰人给芳泽作了最后的答复，表示愿意作些次要的让步，但是拒绝了日本提出的所有主要的要求。因此，6 月 17 日，芳泽与荷兰总督会晤，告诉他说，除非荷兰人对 6 月 6 日的答复重新考虑，否则谈判将中止。总督答道，对这个问题，没有重新考虑的可能，于是，谈判终于结束。由于东京还不准备正式决裂，芳泽宣称，日本政府希望保持一般的贸易和经济关系。因此，双方同意发表一份联合公报。

公报声称：“荷兰代表团和日本代表团都为它们之间举行的经济谈判不幸未能取得圆满结果而深表遗憾。然而，毋须赘言，这次谈判的中止将不会影响荷属东印度与日本之间的正常关系。”

638 这次谈判破裂是松冈的又一次严重挫折。他曾希望通过和平渗透的过程，把荷属东印度的资源加以控制。他不主张使用武力，因为就象他在访问柏林时对里宾特洛甫所说的那样，“他担心，如果日本进攻那些地区，那里的油田会被放火烧掉。这样，一两年内不能恢复生产。”可是，这时日本人却估计不得不使用武力。在日本政府看来，有两个理由需要这样做。第一，日本海军参谋人员确信，如果他们对马来亚和新加坡采取任何行动，那就势必同美国交战。第二，美国迟早会对日本禁运石油，作为对日本的对华政策的报复。罗斯福和赫尔一直不赞成石油禁运，但是美国政府中一些成员，以及国会中和美国公众中越来越多的舆论却赞成这样做。1940年9月对日本强行实施废钢铁禁运之后，其他一些矿物和金属也陆续列入需要有许可证才能出口的范围之内，这意味着，这些物资中，有的完全禁止有的部分禁止向日本输出。在1941年2月和3月间，油桶、储油罐、钻井设备和炼油设备都停止向日本出口。美国控制下的油轮不得开往日本。6月20日，美国政府以国内供应不足为理由，除向英帝国、埃及和西半球输出外，禁止从东海岸各港口输出石油。罗斯福和赫尔对于向日本实行石油完全禁运一事，仍然表示反对，因为他们两人都希望避免采取任何行动而导致日本进一步的侵略。但是，日本陆、海军当局鉴于美国实行石油完全禁运有可能成为事实，于是就越发坚决地要保证能取得一个新的供应来源。

第三节 美日会谈

（一）准备阶段

1940年11月至1941年7月上文已经谈到，日本政府和枢密院是在顾虑重重和意见分歧的情况下接受三国公约的。这种分歧不仅存在于军人与文官之间，或者稳健派与过激派之间（假定这两个通用的名称能够适用的话）。在文官和海军中间，都有一些有势力的集团厌恶三国公约，它们——正确地——看出这一点：日本同轴心国结盟并赞同所谓的欧洲新秩序，会毫无必要地惹起美国对日本的敌视，并且促639使美国由于中国问题而产生的反日情绪同美国反对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情绪合为一体，而不是把这两种情绪区分开来。在日本国内，由于以下几个原因显然使这种见解更加有力。一是美国由于日本参加三国公约而反对日本的舆论日益激烈；二是美国公众一致拥护政府对日禁运废金属；三是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主张对日禁运石油。其次，在日本，不论陆军或海军中间，也都有相当多的意见一直反对德苏互不侵犯条约，而且，即使日本与苏联缔结了条约，他们也不相信苏联政府就会遵守条约。这些意见终于证明是正确的。另一方面，松冈和许多鼓吹三国公约的人却深信，美国并不真想以武装干预的形式来帮助英国或中国，而只要美国不站在这两个国家一边进行干预，它们是注定要战败的。按照将近1940年底的形势来说，这种看法是有所依据的。因此，持这种见解的人们认为，只要能使用美国政府确信以下两点，就有可能使它不进行干预。第一，三国公约不附有任何秘密协定，规定三个缔约国最后无论如何要对美国发动进攻；第二，可是该公约确实规定，如果美国干预它们之中的任何一国，它们将联合起来对付美国。这种概念也不是一无根据的，因为罗斯福政府中的有些成员相信，三国公约还包含一些在字面上看不见的东西，虽然其他人认为它只不过

是吓唬人罢了。

日本的这些集团虽然在其他方面意见不一致，但是在同意向美国提出建议这一点上却有共同之处。这是因为：反对松冈的一派希望这个建议有助于事态的演变而破坏松冈一手策划的事；拥护松冈的一派则认为这一建议将有利于达到三国公约的目标。在 1940 年 11 月到 1941 年 1 月这三个月内，东京出现了几起不可思议的怪事，上述情况至少似乎可以合理地解释所以会发生这些怪事的原因。

在这几件怪事中，第一件是任命海军大将野村吉三郎接替堀内为驻美大使。人们还记得，野村曾经是阿部内阁的外相，后来由于在长江下游的问题上提出让步的建议，曾引起陆军的愤慨。此后，他退出政界，一直过着隐居生活。人们知道，他是不赞成签订三国公约的。但是，这时有人却敦促他出来担任驻华盛顿大使，他谢绝了 640 两次，最后仍然同意了，一部分原因是出于他自己的责任感，另一部分原因是军方的高级官员保证支持他进行努力，以同美国改善关系。

1940 年 12 月，纽约马里诺尔天主教对外传教协会总会长沃尔什主教和该会行政干事德劳特神父为传教事去东京。日本合作银行的高级职员三河和日本陆军省军事局的岩仓大佐（局长是武藤将军）同他们进行了接触，目的是想说服这两位高级宗教界人士将一份非正式的信件转交华盛顿当局。这样做原是近卫本人的主张。这两位宗教界人士同近卫、武藤、松冈和其他一些人交谈了几次。

在与近卫、武藤和岩仓的谈话中，他们得到的印象是，日本准备废除三国公约，即使不是正式废除，也是使其名存实亡，同时日本还准备恢复中国以前的状态。1941 年 1 月，沃尔什主教和德劳特神父携带近卫的这份机密备忘录返回美国。他们请教邮政管理局局长弗兰克·C·沃克——一位知名的天主教徒——如何处理此事。后来，通过沃克的安排，他们于 1 月 23 日得到美国总统和国务卿接见。日本政府的秘密建议是，日本虽仍承担三国公约的义务，但是，德国如进攻美国，日本同意支持美国。作为交换条件，美国必须协同日本，促使中日战争结束，并阻止任何其他国家改变东南亚的形势。

与此同时，日本在华盛顿还有一个非官方的秘密使者。此人是桥本铁马；在这之前，他在东京曾经同格鲁和杜曼会晤过。桥本声称，近卫、木户、平沼、三河、东条都信任和支持他。他虽不亲美，但是反苏。很显然，他代表了那些反对松冈的日本人的意见，这些人对松冈鼓吹的谈判日苏条约的政策是不以为然的。桥本的任务，实际上是想探听美国人的意见，并想为解决太平洋地区的问题提出一些可能进行谈判的基础。桥本虽然同美国国务院官员已经谈过几次，但是他的活动并无具体结果。

赫尔对沃尔什和德劳特转来的建议书，抱不信任态度。他认为，日本政府的心意丝毫没有改变，只不过是希 641 望摆脱在中国的困境，以便放手在东南亚进一步冒险。再说，他除了通过正规的往来渠道外，不想通过其他渠道同日本政府进行任何谈判。因此，他劝告美国总统暂时观望，看看野村来了以后谈些什么。罗斯福表示同意。2 月 14 日，野村递交了国书，但是他并没有接到特别指示，而且在那时，他显然还不知道沃尔什和德劳特带来的建议信。与此同时，三河已经以近卫的秘密使者的身分到达美国。他同德劳特进行了几次会谈，这些会谈的内容通过邮政管理局局长的关系传达给赫尔。

到3月17日，三河和德劳特已经草拟了一份方案，作为解决美日分歧的基础。但是，近卫如欲瞒过日本外务省而同美国政府缔结某种协定，他将感到失望。3月8日，赫尔告诉野村说，虽然他对某些“好心人”为改善关系所作出的努力表示感激，但是他只能通过委派的大使正式同日本政府打交道。野村在会谈中说，岩仓大佐即将来美国给他做顾问，因为岩仓对日中之间的和谈建议非常熟悉。接近3月底的时候，岩仓抵达美国。他同野村一起参加了对德劳特—三河建议草案的修改工作。4月9日，沃克将这些建议转达给赫尔。修正建议的主要内容包括：欧洲战争、中日战事以及太平洋地区的形势。

关于第一点，日本政府将声明：三国公约的目的在于防卫，只有在其中一国遭到目前尚未卷入欧洲战争的国家侵犯时，才履行该公约规定的军事义务。美国政府将声明：它无意缔结任何“侵略同盟”去帮助一个国家反对另一个国家，美国对欧洲战争的态度将“完全出于保护本国的福利和安全的考虑”。

关于中日冲突问题，建议美国总统向蒋介石建议在642如下基础上同日本媾和，即中国承认满洲国；日本承认中国的其余部分独立；根据日中两国将达成的协定从中国撤退日本军队；日本放弃对中国的任何领土要求，放弃向中国索取赔款的任何要求，放弃向中国大规模移民的任何要求；中国对外贸易重新“门户开放”，条件是，将来在适当的时候，美日两国对解释和应用这一原则达成协议；重庆政府和南京政府合并。蒋如拒绝这些条件，美国应停止对他的一切援助。关于整个太平洋地区问题，建议美日两国达成协议，今后这个地区内如有任何领土让与任何一个欧洲国家，两国都不得予以默认。两国政府将保证菲律宾群岛独立，如果菲律宾群岛遭到任何第三国的进攻，两国将考虑如何给予帮助。日本政府请求“美国给予友好的和外交上的帮助……使香港和新加坡不再成为英国在远东进行新的政治侵略的门户”。此外，日本向美国和西南太平洋地区的移民，将在平等和一视同仁的基础上受到友好的照顾。

除上述各点外，还有：恢复美日之间的正常贸易关系；美国向日本提供黄金贷款；日本保证不在西南太平洋地区使用武力。作为交换条件，美国方面保证向日本供应石油、橡胶、锡和镍。最后，建议在火奴鲁鲁召开一次会议，由罗斯福总统代表美国和近卫亲王代表日本主持开幕式，各方出席的代表人数不得超过五人。这个会议的任务是签订总的协定，然后据以制订具体的协议，任何外国（指第三国）观察员不得在场。

这些建议同赫尔原来估计日本会提出的建议距离很大。日本并不打算废除三国公约；它只不过重申一下该公约是防卫性质的论点，它要求美国保证在欧洲战争中保持中立，这意味着抛弃英国。它要求美国倡议日本同中国在这样的条件下媾和，使日本可以继续在中国驻扎军队作为“反共”之用，并保留某些优惠的经济权利。关于西太平洋地区的建议，更大大有利于日本在那个地区建立经济和政治霸权。然而，赫尔认为，如果完全拒绝日本的这一方案，可能会使日美关系陷入危机，这样做是不明智的。这个方案的某些部分似乎是可以接受的；其他部643分可以把调子降低或者全部去掉；究竟怎么办，主要决定于对提出的几点如何正确解释。因此，赫尔于4月14日同野村举行了初步会谈，以弄清这位大使对4月9日赫尔：《回忆录》，第2卷，第991—994页。

的建议究竟是否熟悉。当赫尔发现他的确熟悉时，便向他指出，美国政府希望日本政府同意某些总的原则作为开端。

那个基础上把它搁置起来，直到出现一个真正能够达成协议的前景时才继续谈下去，那么，情况也许会好一些。

野村将建议草案发给东京，东京在4月17日夜收到，次日就交给近卫。近卫立即召开一次核心内阁与最高统帅部的联络会议。会上决定同意把这些建议作为谈判的基础，但是，为了强调日本忠于三国公约和东亚新秩序，表示这些建议需要加以修改。当时担任日本外务省美洲局局长的寺崎要求外务省通知野村，日本原则上已同意这些建议；但是，外务次官大桥则坚决认为，不需要作答复，等到松冈从欧洲回来之后再说。

4月20日，松冈抵达大连，近卫在电话中告诉他华盛顿发来建议草案的事。起初，松冈认为，由于他本人曾同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斯坦哈特会谈的缘故，美国果然向日本提出了这些建议，因为松冈当时曾警告斯坦哈特，如果美国进行干预反对日本，日本将在军事上支持德国。松冈两天后回到东京时，发现自己猜测错了，并知道在他出访期间，日本已同华盛顿有过几次非正式的会谈，因此，在第二次联络会议上，他大发脾气，激烈反对继续会谈。然后，他借口有病，回家休息去了。不过，在他头脑清醒之后，他把4月9日的建议同4月21日由陆军省、海军省、外务省的代表拟订的修正草案作了比较，并且按照自己的意见作了进一步修改。在5月3日举行的第三次联络会议上，松冈修改的部分获得通过。然而，他坚决主张，在向美国递交这份经过两次修改的草案之前，应当要求美国同日本签订一个互不侵犯条约，来考验他所谓的美国的“诚意”。他还要求，关于是否要把拟议中的会谈通知德国，这个伤脑筋的问题应当由他来作决定。在这两点上，松冈自行其是。

于是松冈向野村发出两点指示。一是建议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二是向赫尔传达松冈的一个口头声明，大意是：德意两国领袖对胜利抱有信心，美国参战徒然延长战争和毁灭文化，日本在任何情况下不会干有损于轴心国盟邦利益的事情。野村于5月7日拜会赫尔时，这位美国国务卿对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一口拒绝。野村接着出示松冈的口头声明，他说，这里面有许多东西是“错”

的。赫尔对这份声明看了一眼，当即要野村把声明收回，因为这一声明如正式提出，只能为以后会谈造成障碍。野村对此欣然表示同意。赫尔于是告诫野村，继续会谈不要645再延误了。他还明确表示，美国决心要阻止德国控制海洋。

赫尔的话促使野村敦促日本政府抓紧时机，他还告诫日本政府，在这种关键时刻，如果日本要求美国和日本一同斡旋欧洲战争，或者要求美国承认东亚新秩序，结果将是得不偿失，日本驻华盛顿陆海军武官对他们称之为松冈的“姿态外交”也表示反对。但是，5月4日，松冈已经把拟议的日美会谈以及他的口头声明和他提出签订一个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等通知了德国和意大利。在其他两个轴心国对拟议中的日美会谈作出反应之前，他不想把5月3日联络会议上通过的那份修正的建议草案发给野村。5月8日，他觐见天皇，并奏告天皇，如果美国同德国交战，日本必须站在德国一边。他说，必须坚持这个立场，不得优柔寡断，并以辞职相威胁。两天后，近卫也觐见天皇，他说，并非全体阁员都同意松冈的意见。近卫向天皇保证说，尽管政府内部意见分歧，他愿尽一切力量去同美国达成协议。5月12日，松冈不再

等待轴心国的意见，不得不将5月3日的修正草案发给了野村，当天（华盛顿时间）野村就交给了赫尔。

这份新的文件与4月9日的建议有几点显著的不同。例如第二节是关于这两个国家对欧洲战争态度的，日本政府宣称，三国公约的目的是要阻止那些没有直接受到欧洲战争影响的国家加入战争，并说，如果局势发展到该公约第三条所设想的那种情况，日本政府将向其盟邦提供军事援助。日本要求美国政府声明，无论是目前还是将来，都无意在这场欧洲战争中袒护任何一方。两个大国应当进行合作，“以迅速恢复欧洲的和平”。松冈不顾野村的告诫，坚持己见，认为可以威吓美国，使之抛弃英国，并使之倡议“调解”，从而让德国在欧洲称霸。又如第三节关于中国问题，日本提出美国应要求蒋介石立即与日本媾和，媾和的基础是：近卫于1938年阐明的三项原则；1940年11月30日的日本—南京和平条约和同一天发表的日本—满洲国—中国联合宣言，该宣言明确地体现了上述原则。日本在这份修正草案所附的说明中要求与美国在口头上或书面上达成秘密协议，如果蒋介石拒绝在上述基础上媾和，美国就停止对他的援助。另一个不同之处是，日本政府要取消有关美国总统同日本首相举行会晤的建议。在会谈的这一阶段，日本政府打算先把一项协定签下，而把以后是否可能举行正式会谈的事暂时搁置起来。

事实上，在赫尔和罗斯福看来，日本提出的草案难以变成一项协定，但是他们希望能劝使日本人改变立场。因此，接着在5月份剩下的一段时间内，赫尔、野村和各自的助手之间进行了一系列非正式的会谈。在此期间，德国政府向松冈作了答复。德国建议，日本应向美国明确表示：美国军舰在大西洋进行巡逻和护航活动是蓄意要挑起战争；如果美国与德国因此而发生了战争，日本将进行干预；日本愿否同美国进行谈判以达成和解，取决于美国是否停止这些海军活动。德国政府显然怀疑日本的意图，因为它要求日本在对所谓的美国提议作出答复之前，先同德国磋商。意大利政府表示赞同德国的这些意见。

当里宾特洛甫获悉日本政府未征求他的意见就向华盛顿作了答复，怒不可遏。奥特奉命表示德国政府对此事“深感遗憾”，并要求日本把美国的答复立即转告德国，⁶⁴⁷并让德国正式参加今后日美之间的一切谈判。松冈在回答德国时，再次表示他对三国公约的忠诚。他宣称，他对这种谈判不抱成功的希望，并认为美国将参加欧洲的战争。他表明，他只不过试图把这件事推迟，从而拖延美国对英国已经增加的援助。但是，他不同意德国提出的要正式参加日美会谈的要求，虽然他答应向柏林报道会谈的情况。奥特告诉里宾特洛甫说，在他看来，松冈已经被迫向敌视三国公约的势力屈服了。

从大岛那里也传来了强烈的抗议声。5月3日，大岛从里宾特洛甫口中才第一次听到日美会谈的消息，里宾特洛甫对大岛说，显然日本国政府是故意瞒着不让他知道此事，这样，大岛当然感到愤怒。5月9日，里宾特洛甫给大岛看了奥特5月6日的报告和松冈要求同美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临时建议的摘要。里宾特洛甫说，松冈在柏林时曾经说过日本要进攻新加坡，而他现在似乎已经改变主张了。这位德国外长认为，日本如同美国签订协定，三国公约实际上就丧失了意义，不管日本会用什么花言巧语为不履行自己的两项义务自圆其说。因此里宾特洛甫表示，希望日本不要签订这种协定。大

岛提出，日本可以同美国缔结一个条约，在条约中规定，美国对欧洲战争应保持严格的中立态度。里宾特洛甫对此建议犹豫不决，他说，他需要同希特勒商量。5月10日，大岛赴罗马，去探听意大利人的态度。5月12日，德国大使俾斯麦在罗马给大岛看了德国发给奥特关于如何答复松冈的指示，并且告诉他，意大利政府对此已表示同意。从这些指示的大意中，大岛推测，希特勒同里宾特洛甫意见不一致，他愿意让日美会谈继续下去，只要会谈能起到阻止美国帮助英国的作用。5月13日，里宾特洛甫飞往罗马，当天，拜会了墨索里尼和齐亚诺。次日，大岛会见里宾特洛甫，并从他那里听到，日本政府不等接到其盟邦的意见就已向华盛顿做了答复。里宾特洛甫对此大为不满。显然，他事先已将情况告诉了齐亚诺，因此，齐亚诺也有同感。

5月17日，大岛返回柏林，见到魏茨泽克。魏茨泽克648给他看了一份日本在5月12日给美国的复文概要，这份材料在14日由奥特用电报发给柏林。魏茨泽克说，德国政府极其重视松冈的声明：苏联如同德国开敌，日本将进攻苏联。他问大岛，松冈在柏林时是否已经了解德苏之间的真实情况（即德国打算进攻苏联）。大岛答道，他相信松冈确实知道此事。从这一点可以推测，希特勒已断定他既不能指望日本人进攻新加坡，也不能指望他们履行三国公约的义务。不过由于苏联一直是日本主要的敌视对象，希特勒显然认为，在他所策划的进攻俄国的战争中，德国能比较容易地得到日本的合作。或许，希特勒还估计，在苏联崩溃后，日本有可能壮起胆来，敢同英国作战，如有必要的话，还敢同美国打仗。

大岛本人苦劝松冈。他告诫说，松冈所谓的“两面外交”，将使日本遭到欧洲战争中双方的蔑视和憎恨，到头来使日本自己处于孤立的地位。如果日本同美国签订协定，同意美国虽不正式参战，却可以向英国提供援助，这样做或许会影响战争的结局；如果这场战争以德国战败告终，往后美国将会把矛头对准日本，日本“或许会遭到意想不到的灾难”。因此，大岛认为，日本必须坚持要美国停止援助英国，保持中立。大岛将他5月20日的电报抄本发给日本驻柏林的陆海军武官，要他们转送给东京的陆海军首领。就松冈来说，大岛仿佛是在向他传道，要他改变信仰。但是，来自柏林和罗马的劝告，却使这位日本外相更加反对同美国谈判。他埋怨野村，指责（虽然指责得不对）野村不该进行这种会谈。在联席会议上、在同格鲁交谈时和在公开声明中，松冈都强调日本忠于三国公约，并宣称，如果美国海军在大西洋的巡逻和护航活动导致同德国冲突，日本将履行三国公约中的第三条。

松冈这种好战的声明，对在华盛顿举行的会谈起着不良的影响。6月2日，赫尔问野村，日本究竟是真诚地希望和平，还是想摆脱对华战争的困境，以腾出力量在其他地方发动进攻。野村尽力使赫尔安心，但是赫尔仍然不相信。5月31日，赫尔交给野村一份经过修改的建议草案。其中加了这样一句：“显然，〔三国〕公约的条款不适用于因自卫行动而引起的卷入事件。”在这之前，赫尔已经向野村明白表示过，鉴于轴心国如果获胜将对美国构成威胁，美国认为，它正在采取的援助英国的各种措施是防卫性质的。但在6月15日，日本人提出了一份反建议草案，删去了这条有关自卫的条款。于是，在对三国公约第三条的解释这一关键性问题上，出现了僵局。

在中国问题上，双方也越来越分歧。显而易见，日本政府要美国政府向中国建议媾和，但又希望媾和条件由东京和重庆直接决定。按照日本的愿望，

这些条件包括：

日本军队永久驻扎在内蒙古和华北部分地区，以促进中日合作“防御共产党的活动”。岩仓尤其坚决地表示，不管中国问题怎样解决，这一条绝对要做到。他说，驻在中国其他地区的日本军队将在两三年之内撤退。但是，赫尔认为，如果在华的全部日军不撤退，日中两国之间的持久和平就建立不起来。野村表示，他个人同意这个看法，但是暗示，东京不会同意。美国5月31日的那份经过修改的草案规定，日本须按照日中两国签订的协定，尽快从中国撤出陆、海军。关于中日合作防御共产党的问题，以后再行商谈。

6月2日，野村说，他和他的助手们对5月31日的650美国建议草案，“除了有些措辞之外”，都表示同意。但是，赫尔觉得，日本人在6月4日提出要在文字上作修改，其用意是要使日本能够按自己的需要来解释协定的了野村，在这篇演说里，他称英国为美国安全必不可少的因素（同上书，第430—432页）。

同上书，第475页。

同上书，第445页。岩仓直言不讳地说，提出这个要求是顶料日苏将来要开战。

同上书，第442页。

同上书，第447页。

同上书，第454页。

条文；他还觉得，日本正在逐步缩小它原来答应的让步。

在6月6日给野村的那份非正式的口头声明中，赫尔指出，日本人正在强调同轴心国结盟的意义，而对在永久和平的基础上同中国媾和一事却丝毫不作明确的表示，对于贸易往来一视同仁这个问题也避而不作明确的许诺。6月21日，赫尔把拟议中的美日协定草案，经过再度修改后送交野村。在这份草案中，没有提到要共同努力以恢复欧洲的和平，但再度试图通过互换照会，使三国公约不适用于美国出于自卫行动而卷入战争的情况。草案还把中日合作以防御共产主义这一伤脑筋的问题留待日后解决。可是，草案的一个附录中确实概括地写明了日中两国媾和的大体条件，以便将来美国总统可能建议以此作为中国同日本进行和谈的基础。这份经过修改的草案另附有一个声明，赫尔在声明中说，固然他并不怀疑，在促进日美之间谅解和建立太平洋地区和平方面，许多日本领导人同野村和他的助手们都抱着同样的愿望，但是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说明日本有一些担任政府要职的领导人坚持执行支持纳粹德国及其征服政策的方针。而他们赞成同美国取得的唯一谅解是，如果美国由于执行它目前的自卫政策而卷入欧

洲战争，日本就可帮助希特勒作战。

赫尔说，如果这种态度保持不变，想使会谈产生圆满结果就是一种幻想。就象赫尔6月22日向野村指出的那样，这番话是针对松冈而说的。赫尔还暗示说，德国进攻苏联，为日本提供了摆脱三国公约约束的机会；但是野村回答说，日本不能抛弃三国公约。美国人于7月2日截获的日本电文表明，日本打算利用新的形势来从中渔利，尤其是想进一步南进。

7月10日和12日，东京举行联络会议对美国6月65121日的建议草案进行了辩论。松冈对赫尔的最后声明大为恼火。他说得很对，这简直是要他下台。于是他要求拒绝这个声明，并中止会谈。然而，在这一问题上，他的主张被压了下去，一个折衷方案拟订了出来。关于三国公约问题，这个方案

说，万一欧洲战争蔓延开来，日本政府将完全根据本国的福利和安全来决定自己的态度。但是，松冈仍然顽固不化；他向德国人透露了日本的新建议，并且不管近卫怎样反对，于7月14日向驻华盛顿的使馆发出指示，指责赫尔的声明是“不全面和不适当的”，他还说，除非美国收回这个声明，否则日本将中止会谈。这样做终于导致了松冈的下台，7月16日，近卫内阁辞职，两天以后再重新组阁，由海军大将丰田担任外相。

松冈在日本外务省的这段预兆不祥的任期，就这样结束了。但是，他的下台并不能刹住他已经启动的那股走向灾难的冲力。近卫的第三任内阁仍然受到7月2日的御前会议决议的束缚；不管松冈的免职会带来什么好处，这些好处都因日本占领印度支那南部而失去其价值。

（二）日本占领印度支那南部

日本最高统帅部认为，作为进攻荷属东印度的第一步必须先得到印度支那南部的海、空军基地，以便给远征军提供足够的掩护。日本如果要对马来亚和新加坡发动进攻，也需要考虑这一点。尽管里宾特洛甫和希特勒曾经建议松冈发动突然袭击，可是，日本的战略家们认为在没有作好初步准备的情况下，不能采取这样的打法。

6月21日，松冈对奥特说，日本不准备同荷属东印度652恢复谈判。日本将使用武力，为此，必须首先得到印度支那南部的一些基地。于是，他命令大岛请求德国政府说服维希政府同意日本得到这样一些据点。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德苏战争爆发之前，已经作了进军东印度的决定。战后，东条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上供称，这一决定是在6月13日，即芳泽的使命失败的消息传到以后不久作出的。德国进攻苏联的消息一度确实使日本的政策陷于混乱，但是，如前所述，7月2日的御前会议决定，反对立即向苏联进攻，而赞成向东南亚进军。7月3日，松冈通知奥特，日本一定要拿到印度支那南部的一些基地。7月4日，德国驻曼谷公使汇报了德国驻该地的武官同日本大使馆秘书的一次谈话。那位日本秘书说，由于同东印度荷兰当局的谈判失败了，日本非夺取那里的石油资源不可，要不然，日本海军将会丧失活动能力。在采取这一行动之前，日本必须以武力占领印度支那南部的一些据点。那位秘书又补充说，日本不打算占领暹罗，印度支那战役一切必要的准备工作 and 实际作战指挥，将由牛卞仁将军率领的驻广州日本南亚派遣军参谋部来执行。起初，德国政府对东京的提议似乎抱冷漠的态度。

毫无疑问，德国对日本拒绝同它一起进攻苏联一事表示不满，而且对日本同美国打交道，或者至少对日本不愿意让德国参与日美会谈一事，也在生气。德国政府明确地告诉大岛说，由德国出面来调解东京与维希之间关于印度支那的纠纷是不适当的。这样交换了意见之后，日本通过奥特再度请求德国居间斡旋。

7月初，澄田将军预先通知河内的法国当局，日本即将提出要在印度支那南部获得一些基地的要求。德古向维希汇报了这个情况，同时，也通知了法国驻东京大使。

德古准备拒绝这些要求，并且坚持要按1940年9月的协653定办事。可是，这次日本政府决心同维希政府直接打交道。日本人认为（但是他们估计错了），阿尔塞纳·亨利是戴高乐派，认为此人一直让他的美英同僚知道前一时关于印度支那谈判的经过。根据过去的经验，日本人还估计到，德古将不会轻易让步。

7月12日，日本驻维希公使加藤接到命令，要他开始谈判，命令他同贝当元帅直接会谈，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无论如何也要同海军上将达尔朗会谈。命令加藤要使法国同意以下几点：日本向印度支那南部派遣“必要数量的陆军”、海军和空军；日军占领柬埔寨和交趾支那的八个空军基地；租借金兰湾和西贡的两个海军基地。日本军队享有完全的行动自由。废除西原—马丁协定对旅行、演习、军队驻屯所作的种种限制。命令加藤说明，如果维希政府同意日本的要求，东京将继续保证印度支那的领土完整和法国的主权，但如果拒绝的话，“印度支那的局势或许会发生严重的变化”。还命令他说明，为了防止美国人或英国人先发制人，日军将在7月20日开始行动。这是一份最后通牒。

7月14日，加藤提出了这些苛刻的要求，另外还附了一封近卫以私人名义写给贝当的信。信写得比较友好。

近卫声称，采取这一行动，是出于日本的防卫需要，并为了维护它在大东亚的地位。按照近卫的说法，英国和戴高乐派正在阴谋策划对之进行威胁。近卫还重申，日本保证尊重法国对殖民地的主权和尊重这些殖民地的领土完整；他敦促法国接受日本当前的要求。但是，贝当和达尔朗却不肯同意。他们把此事通知了英国大使李海海军上将，并试图采取拖延办法。达尔朗答复日本人说，如果法国接受了日本的要求，日本切不可把这件事理解为法国敌视英国和美国的行径。他又说，他首先必须同德国政府商量。松冈则要求德国人不要给法国人任何支持，相反，应当劝告他们接受日本人的要求。柏林显然照办不误。总之，达尔朗得不到德国的支持。甚至松冈垮台之后，日本人想要在印度支那达到其目标的决心依然丝毫不减。达尔朗所得到的，只不过是宽放了两天的期限。日本方面警告他，东京要他在7月22日下午6时之前答复，限期一到，不管法国同意与否，日本军队将开进去。英国或美国都不肯帮助维希政府；因此，7月21日，达尔朗只得屈服，接受了日本提出的要求。7月29日，法日议定书在维希签字，议定书内并附有加藤与达尔朗之间的来往信件，其中加藤保证尊重法国在印度支那的主权，达尔朗则同意日本的占领。

尽管东京一再否认日本有占领的意图，伦敦和华盛顿却知道事实的真相。英美既有来自维希的预先通知。

又有美国海军情报局破译出的日本外交和军事密电，因此消息相当灵通。通过这种方法，他们截获了日本7月2日御前会议的讨论摘要，7月14日，又截获了驻广州的日军司令部发出的一份电报。这些情报提供了有关日军即将占领印度支那南部的具体情况，并且还透露出日本之所以要这样做，是为进攻荷属东印度和新加坡铺平道路。

7月10日，美国代理国务卿韦尔斯在华盛顿对哈利法克斯说，要是日本在远东采取任何侵略行动，美国将立即对之实行禁运，并在经济和财政方面采取措施。对这类措施，美国考虑已久。英日政府立即响应说，要是日本占领印度支那南部，英国决心废除与日本所签订的贸易协定，并限制同日本的贸易。继这个答复之后，英美两国官员就在华盛顿进行磋商，考虑将要采取的制裁措施。美国内阁官员也在讨论这个问题，打算冻结日本在美国的资产，并且无论如何要进一步限制向日本输出石油。可是，在7月24日之前，他们还没有作出坚定的决议，一个原因是国务院内部意见不统一，另一个原因是海军部提出警告说，采取制裁措施可能意味着同日本开战，而美国海军尚未

做好这种准备。

可是，当维希政府接受日本建议的消息传来时，罗斯福本人坚决主张，要冻结日本的资产，所有同日本的贸易一定要领有许可证。装运石油的许可证签发与否，将根据 655 情况来决定。看来，美国总统仍然希望日本会克制自己。

7月23日，韦尔斯接见了野村，驳斥了野村所谓日本的行动是为了自卫的论点，告诉野村，美国“只能认为……日本政府打算推行武力政策和征服政策”，日本人“通过在南洋地区攫取更多的领土之后，……马上就会在该地区开始推行极权主义的扩张政策”。韦尔斯接着说，因此，国务卿“认为，他和日本大使所举行的会谈，目前已失去了继续进行的基础”。韦尔斯于7月24日向报界发表了一个声明，指控日本的行动，并断言这种行动危害了美国采购必需物资的工作，并使邻近的太平洋地区（包括菲律宾群岛）的安全受到了威胁。

7月23日，英国外交大臣在下议院说，日本指责英国在策划侵略印度支那和暹罗的报道，都是毫无根据的。两天后，他宣称，日本在印度支那的行动是对英国领土的公然威胁，马来亚正在采取防卫措施，英国政府正在同各自治领政府和美国政府商量报复的办法。7月23日，英国政府通知华盛顿，英国已向各自治领政府、荷兰政府和自由法国提出了冻结日本资产的建议。7月24日下午，罗斯福作出了采取这种措施的决定，该决定于26日上午开始生效。25日晚间，向报界宣布了即将采取这个行动的消息。

7月26日，美国、英国和英联邦各自治领都公布了冻结日本在这些国家的资产的命令。英国还废除了1911年同日本签订的贸易与航运协定、1924年同日本签订的关于印度的贸易协定、1937年签订的有关日本与缅甸的贸易协定。这些措施本身并不意味着完全禁止与日本进行贸易，而只意味着从这时起所有的贸易都要经过官方的许可，批准与否由政府来决定。荷兰政府由于不知道对日贸易是否完全禁止，因此向华盛顿提出询问，但是没有656得到明确的答复。荷兰政府觉得左右为难，因为，如果跟着英美那样做的话，日本或许会来侵犯。如果日本真的发动进攻，荷兰人势必要依赖英国帮助，但是英国本身也力不从心，至于美国会不会给予军事援助，荷兰人也心中无数。7月28日，荷属东印度当局终于决定向日本输出各种物资，并与日本国民进行一切金融往来，但是需要获得许可。锡和橡胶则全部禁止出口。荷兰政府警告日本人，如果他们再找麻烦的话，这种禁运将扩大到所有的对日贸易项目。

7月24日晚间，罗斯福在批准了冻结命令之后，接见了野村，并对他说，如果日本停止在军事上占领印度支那，或完全改变军事占领印度支那的政策，他将尽其所能促使所有有关国家保证印度支那中立。他还将努力取得保证，使印度支那的法国当局将来不会受到自由法国的干预。倘若日本人当时同意了这个建议，美国也许会许可对日本输出某些物资，包括石油在内。但是，7月28日，日本政府批准了同维希政府签订的协定，同时还着手冻结美国、英国和荷兰在日本的资产。与此同时，曼谷发出报道，说日本人正在对退罗提出军事基地要求。奎披位本人把这个情况通知了英国政府，并请求援助。7月31日，美国总统把他有关印度支那中立化建议的范围扩大到适用于退罗。日本虽然不承认有侵犯暹罗的意图，但是，它却不肯作直截了当的答复。

8月1日，在财政部和国务院的官员们进行了讨论以后，美国总统发布了一道行政命令，禁止向日本出口若干种物资，包括所有可作为飞机燃料使用的石油产品在内。低级燃料和原油仍然准许出口，不过须经批准。有人建议，对这类物资，可以让日本得到相当于它在1935—1936年间购买的数量。还可以允许日本购买棉花和粮食。但是，美国公众一开始就认为，这种冻结命令等于是禁止同日本进行贸易；他们对此一致表示赞同。在英国和英联邦各自治领，公众舆论也是这样。结果，对日贸易的许可证实际上没有签发过，贸易陷于停顿。

（三）拟议中的近卫—罗斯福会谈

由于德苏战争爆发和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国际形势起了急剧变化，对日本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希特勒对苏联发动进攻，使日本参加三国公约的一个主要动机——希望与苏联协调——未能得逞。固然，如果希特勒能够迅速获胜，日本或许可以通过另一途径达到同样目的。可是，由于人们对日军在诺门坎遭到的惨痛失败记忆犹新，日本军界大多能正确地预料到，俄国人是不易击败的，希特勒已经使德国陷入了旷日持久的消耗战。这种前景使得德国指望的击败英国一事变得无足轻重了。在1941年6月22日之前，东京一直认为，英国已经输掉，除非美国能予以全面的援助，否则就不可能挽救它战败的命运。

因此，日本人在华盛顿进行会谈时，力图诱使美国保证在欧洲战争中保持中立，同时他们不同意美国人说的对英援助是一种自卫行为。这时，形势发生了变化。战争的重担已不压在英国的肩上；不管东欧那场大规模战争的结局如何，英国势必会得到美国租借物资的援助，而能坚守下去。此外，还有这种可能性，即美国也许会壮起胆来加入战争，甚至也许会与苏联缔结条约共同反对日本，这使东京忧心忡忡。

在1941年7月以前，远东的局势，就象东京估计的那样，蒋介石没有希望把日本军队逐出，同时又面临着日益严重的财政和经济困难，因此，他为了挽救其摇摇欲坠的政权，不久势必要向日本求和。日本这样估计形势，不是没有道理的。从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形势来看，日本政府希望得到美国赞助而同中国达成的那种和平，也不是没有根据的。德苏战争的爆发，使俄国在当时立即援助蒋介石的可能性消失了。这一点对日本至少是有利的。可是，这个有利因素远远不能抵销美国、英联邦和荷属东印度当局对日本实行物资禁运，特别是在石油输出方面所造成的损失。日本没有其他适当的供应来源，因此，随着石油库存量的减少，它的武装部队的作战能力将变得越来越弱。这一前景鼓舞了中国的士气。同样使中国人感到鼓舞的是，重庆政府这时收到的各种美国援助日益增加。因此，远东的形势也正在变得不利于日本。在1941年上半年，日本人显然觉得，在华盛顿会谈时，自己是占上风，这时形势颠倒过来了；因为一旦禁运完全发生作用，日本的作战力量将大大削弱，而且，正如美国报界一部分人高兴地预言的那样，日本将被迫接受美国提出的中日和谈条件。但是，美国比较清醒的舆论却意识到，日本与其这样屈服，宁愿采用武力手段来夺取因禁运而丧失的那些必不可少的物资，尤其是石油。赫尔是这些抱悲观态度的美国人之一，虽则他仍然希望避免同日本开战。他也许会觉得更加烦恼，如果他当时意识到，日本人已面临着这样的抉择，要么同美国在外交上达成令人满意的解决，要么对美国作战，因为日本的战略家们认为，如果他们想夺取英国和荷兰在东南亚的属地，就势必要遭到美

国的积极抵抗。

日美会谈的破裂和经济制裁的实施，给了近卫当头一击，打得他晕头转向。他把这种出人意料的严重后果归咎于野村。第二次近卫内阁的最后行动之一，是向野村发了日本对美国6月21日建议的复照，但是这位海军大将并没有把它交给国务院，一个原因是东京发生了政治变化，另一个原因是他认为这个复照不会被接受。近卫还说，东条筹备把帝国大本营设在皇宫里面，并且得到许可，联络会议也将在那里召开。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联络会议作出的决议将因此而具有更大的影响，将会得到日本各方面的重视。但是，据近卫说，野村没有理解到这一行动的重大意义，也未能向美国人解释这一点。可是，很可能即使野村对美国人讲清其中缘故，也不会改变美国人的态度。同时，近卫承认，这种策略也未能制止日本国内的派别斗争。症结在于联络会议作出的各项决议，本身就是各种对立意见的折衷，这一类折衷意见会使日本落得个两面不讨好。日本既不能坚定地与其轴心国伙伴结盟（这种政策至少贯彻始终，这是其优点），又不能跟它们一刀两断，同美国妥协。无论政府的改组，或者体制的改革，都不能使日本纠正这种基本上游移不定的政策。正如大岛曾经警告他自己的同胞那样，这种政策将使日本到处失去信任并受到谴责。

东京的意见继续分歧下去。8月4日，在联络会议659又召开了四次以后，日本起草了准备向美国提出的另一份折衷建议。这份建议对罗斯福关于印度支那的提议，避而不作直接答复，如近卫所说，只是想借此恢复一般性的会谈。新建议的要点如下：日本同意不向印度支那范围之外进军，还同意在中国事件解决以后从中国撤军，并保证菲律宾的中立地位。作为交换条件，美国应停止它在西南太平洋地区的战备工作，应撤销对日本的各项经济限制措施，为日中两国调停议和，并承认日本在印度支那的特殊地位。8月6日，野村向赫尔递交了这份建议，附带一份口头声明，声明说，日本在印度支那采取的行动都是自卫性质的。赫尔对此表示失望。8月8日，他给野村一个正式答复，扼要地重述了罗斯福的中立方案，并指出，日本的建议“没有对美国提出的建议作出反应”。近卫显然估计到，美国的答复不会令日本满意，因为在8月4日，他曾向日本陆相和海相建议，他要亲自同罗斯福举行会谈。在表明要尽一切可能避免战争之后，他重述了日本的最低要求，他说，鉴于德苏战争的发展情况，他必须同美国总统举行会谈，尽早同美国达成一项协议。

日本海相及川后来同意了近卫的看法，并希望他成功。陆相东条作了书面答复，说陆军认为这种会谈不但不会成功，反而会削弱三国公约的力量，并会导致日本国内的动乱。但是，陆军准备同意首相的计划，不过要达成明确的谅解，如果日本同美国会谈失败，就要进行战争，而且这场战争应由近卫来领导。8月6日，这项计划经660联络会议批准。次日，天皇敦促近卫尽快同罗斯福举行会谈。接着，就向野村发出指示；8月8日，野村把建议交给赫尔，可是，他发觉赫尔不愿讨论这一问题。美国内阁的其他成员也同样持消极态度，并且对野村说，所建议的会谈不会有成功的希望，因此就不必多此一举了。

8月9日至12日之间，丘吉尔和罗斯福在纽芬兰的阿金夏举行秘密会议。在这之前，荷兰政府曾向英国政府提出，如果日本进攻荷属东印度，它请求英国给予援助，英国政府曾答应将尽力给予援助，但是，英国政府又向

付兰人表明，至于它能帮助些什么，要取决于美国是否提供援助。澳大利亚政府正在敦促丘吉尔要罗斯福同意请美国国会批准在军事上援助英国，如果英国为荷属东印度而同日本开战的话。但是，英国就此事向华盛顿征求意见，一直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罗斯福不愿意预先请求国会授予这种权力，以免遭到断然拒绝。因此，在阿金夏，丘吉尔起初建议由英、美、苏三国联合向日本提出最后通牒，威胁日本，如果它进攻英属马来亚或荷属东印度，三国就要向它开战。可是，罗斯福反对这一建议。他说，虽然日本8月6日的建议不能接受，他仍准备同日本恢复谈判，只要它不再进行新的侵略。他希望赢得时间。即使一个月也好。丘吉尔对此表示怀疑，但不得不同意。不过，他还是说服罗斯福，通过野村给了日本一个严厉的警告。警告的初稿是由丘吉尔亲自起草的。

初稿是这样写的：“日本在西南太平洋区域任何进一步的进犯行为，将会造成一种局势，使美国不得不采取反抗措施，即使由此导致美日之间的战争也在所不计。”同时还加进一些话，大意是说，如果日本把任何第三国——指苏联——卷入进去，美国将采取同样的行动。

661 罗斯福担心，这种生硬的措词或许会促使日本挺而走险。8月10日和11日，他们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罗斯福坚持要同日本恢复会谈，丘吉尔虽然认为日本8月6日的建议完全不能接受，但还是同意了罗斯福的意见。丘吉尔和罗斯福对给日本的那份警告在措词上取得一致意见之后，丘吉尔就电告艾德礼（他正以掌玺大臣的身分在伦敦代理首相职务）说，他担忧，美国国务院或许会设法把警告的语调降低，不过总统已答应保留这些“强硬的措词”。他还把英美双方取得一致意见的各点通知了澳大利亚总理，并说，英国必须明确表示，在今后的任何行动中，英国都将支持美国。

丘吉尔对美国国务院的估计，最后证明是正确的。美国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把那份警告的草稿从阿金夏带到华盛顿。8月15日，赫尔看了之后，认为语气太咄咄逼人，容易导致一场战争，而美国对此尚无准备。所以，他就把结束语作了如下的修改：

本政府兹认为有必要通知日本政府，如日本政府采取任何进一步行动来推行以武力或以武力威胁手段对邻国实行军事统治的政策或计划，美国政府将不得不立即采取它认为必要的任何措施或一切措施，以维护美国和美国国民的合法权利和利益，确保美国的安全。

警告以这样的措词于8月17日交给了野村。8月底，英国驻华盛顿代办对赫尔说，按照阿金夏会谈的安排，英国政府正打算给日本一个警告。他拿出了警告的草稿，结尾使用了丘吉尔在阿金夏说的那些话。赫尔看了大吃一惊，他说，要是这样的最后通牒非发不可的话，那就应当秘密地去发。这番话似乎使英国政府下定决心不提出警告。

8月16日，野村拜会赫尔，想使他相信日本是希望维护和平的，重新提出了罗斯福和近卫会晤的问题，并且问他日美会谈是否无论如何不能再恢复。赫尔对这些并不表态，而是驳斥了野村所谓日本占领印度支那不是为了军事目的，而是为了经济目的的借口。但是，赫尔实际662上却希望日美会谈能继续进行，野村的建议不仅使赫尔有了更多的理由去敦促罗斯福朝这个方向行动起来（罗斯福本人是一向赞成会谈的），而且还有更多的理由降低美国对日本警告的语调。毫无疑问，罗斯福和赫尔避免采取任何最后通牒性

质的措施，是正确的。而丘吉尔的方案，却肯定不会得到斯大林的赞同，相反，它很可能会使日本政府改而主张立即采取军事行动。

8月17日，罗斯福应野村大使的请求会见了。野村声称，近卫渴望和平，希望能够在美国至日本中途的某个地方与罗斯福会晤。罗斯福说，他必须就美国政府的立场发表一些意见。接着，他就读了一份口头声明，简短地回顾了过去几次会谈的情况以及有关印度支那的事件。高明接着说，美国政府对日本政府要求为建立亲善和友好关系提供新的基础这一愿望，完全抱有同感，但是美国政府感到，“根据各方面的证据和迹象判断，日本方面只有表现出无比坦率的诚意，才能在这个时刻有助于实现所追求的目标”。接下来他读了经过赫尔修改的那个警告的结尾部分。在停顿了片刻让这个警告深深地印入对方的脑海之后，罗斯福开始读第二个声明。这个声明谈到了野村提出的近卫与罗斯福会谈的建议，也谈到了野村询问的在华盛顿举行的非正式会谈是否可以恢复的问题。

声明还谈到了赫尔8月16日的临时答复和中止会谈的一些理由。美国在声明中宣称，如要继续进行这种会谈，应当讨论如何把贸易机会和贸易待遇的平等原则应用于整个太平洋区域。其设想是，“太平洋地区各国将在自愿与和平的基础上进行合作，利用现有的一切资金、专门技术和先进的经济领导方法，其目的是不仅要建设各自的经济，而且还要建设其余地区的经济，以提高这些地区的生产能力”。这将使日本能够获得它公开表示希望得到的一切东西。但是，这“不会使任何国家有可能对其他国家的人民进行军事控制或政治控制，或者取得显然是垄断性质或特惠性质的经济权利”。如果日本政府认为能够使自己的扩张主义行动停止下来，并且“愿意按照美国保证实行的计划和原则，开始执行太平洋区域和平方案”，美国政府准备考虑恢复这种“非正式的、探索性的会谈”。但是，在此之前，日本政府要发表声明，比以往更清楚地说明自己的态度与计划。罗斯福向野村表示，日本政府如同意这一要求，他愿与近卫会谈，并提议会谈可于10月15日前后在阿拉斯加的朱诺举行。

8月18日，丰田在东京会见格鲁，他在一篇冗长的口头声明中，把日本要求罗斯福与近卫会谈的建议通知了格鲁。丰田宣称，近卫不顾日本国内强烈的反对，仍然准备参加这种会谈，并将尽一切力量来维护和平。丰田相信，“由于双方领导人都能表现出最高度的政治家才能和远大的胸怀，因此，对日美关系的一般性问题达成一个公平合理的协议”是可能的。丰田暗示，日本准备比它8月6日的建议迈进一步。另一方面，为了使日本看来不象是在美国压力之下被迫提出这个建议，他希望在举行会谈之前，美国无论如何要先停止其经济制裁措施，或者至少先把这些措施加以修改。格鲁深为这番话所打动，极力劝说华盛顿，鉴于日美之间爆发“一场全然无益的战争之可能性显然正在日益增加”，为了避免这场战事，美国对日本的这次建议不要“未经深思熟虑”就贸然拒绝。

在8月19日的另一份电报中，格鲁说，近卫的建议反映了他高度的勇气，因为，如果这个建议泄露出去，或者遭到失败的话，他就有可能被暗杀。格鲁又说，近卫在提出这个建议时，明明知道除非日本政府准备作出一些实质性的让步，会谈一定会失败。这表明了，日本政府决心想摆脱过激分子的控制。格鲁还说，他认为日本准备脱离轴心国，还准备在中国和印度支那方面承担“广泛的义务”。他告诫他的上司说，要是不能举行拟议中的会谈，“日

本别无抉择，要么改组现在的政府，要么组织一个新政府，以把日本未来的命运交给武装部队，为确立日本在整个大东亚的霸权而进行一次全面的殊死战斗，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势必要同美国开战”。在野村那方面，也正在敦促东京迁就美国的观点，作出一些实质性的让步。东京指示他要求美国同意在 10 月份之前举行罗斯福与近卫的会谈，这样可使日美会谈赶在预定将于莫斯科举行的英美苏三国会议之前举行。但是，野村在 8 月 23 日提出这点要求时，赫尔并没有给他满意的答复。另外，野村还向美国提出，由于美国正在向苏联供应石油，而对日本则禁运石油，此事已在日本激起普遍愤慨，故而日本要求美国召回两艘满载石油正在驶往苏联的美国油轮，或者至少要改走一条远离日本北方的海路。可是，他又遭到美国断然的拒绝。

8 月 28 日，野村向罗斯福递交了一封近卫的私人信。在信中，日本首相宣称，他认为日美关系之所以恶化，是由于缺乏了解，这一情况已导致互相之间的猜疑和误会，也助长了第三方面一些国家去玩弄种种阴谋诡计。他说，继续举行非正式会谈并把会谈的结论呈交两国政府首脑批准的做法，“不符合当前形势的需要，因为目前形势正在迅速变化，有可能会发生出人意料外的事故”。为了这个缘故，近卫认为当务之急是他首先应该同罗斯福会晤，“以远大的胸怀来讨论日美之间，包括整个太平洋区域在内的一切重大问题”。次要的问题可留到以后由低一级的会谈来讨论。最后，近卫要求尽早举行这种会晤。

与此同时，野村把日本政府对美国 8 月 17 日的口头声明的复文交给了罗斯福。复文中有一些意味深长的字句。它宣称，“当一个国家在其自然而和平的发展道路上受到阻挡时，或者当其生存条件受到威胁时，这个国家不仅需要采取种种防御措施，而且为了维护公正的和平，也有必要这样做。”复文又说，美国政府反对日本的政策和做法，其实这些政策和做法是“出于自卫的考虑，目的在满足国家的需要，或者排除对国家安全有害的环境方面和政治方面的障碍”。复文指出，美国政府似乎没有意识到美国的目的和政策，是“不知不觉地凭借着”美国拥有无穷的资源 and 潜力，换句话说，其他一些没有这么得天独厚的国家，也许会因此而觉得受到美国的威胁。日本政府阐明了这几点之后，接着声称，日本希望和平解决，并且象美国政府一样，准备为此而作出牺牲。日本政府表示，一俟中国事件得到解决，或者在东亚建立起公正的和平，日本就立刻从印度支那撤出军队。同时，日本政府重申，它在印度支那的行动不是为进犯邻国（包括暹罗在内）做准备。日本政府还保证，只要苏联遵守苏日中立条约，日本就不对苏联采取军事行动。日本政府希望美国政府“在同苏联合作中”，要避免采取“任何可能使日本感到受威胁的行动”。它说，日本政府“只要不受到挑衅，无意对任何一个邻国使用武力”。日本政府自称它与美国政府提出的基本原则有一致的看法。它认为，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于太平洋区域，而且还适用于全世界。

罗斯福对日本表白的好意虽然有些将信将疑，但是他待野村却很亲切。他宣称，他很有兴趣同近卫进行会晤，并再次建议会晤地点在朱诺。但是，赫尔不希望举行这种会晤，因为他担心，如果罗斯福同近卫进行会谈，就有可能产生“远东的慕尼黑事件”。后来在 8 月 28 日，赫尔又会见野村。这位日本大使对罗斯福接见他一事感到兴奋。他说，他相信近卫将欣然乘军舰赴朱诺，随带二十名工作人员，其中陆军、海军、外务省和驻华盛顿大使馆的人员各占五名。他建议日期以 9 月 21 日至 25 日为宜。可是，赫尔对野村的

这股热情大泼冷水。他宣称，对美日之间存在的争端，双方首先必须在原则上达成协议。日方提议的会谈所要做的工作只不过批准这种协议。野村答道，三个主要问题是：日本同轴心国的关系；日本在华北和内蒙古保留驻军的问题；在国际贸易方面实行一视同仁的原则。在他看来，只有在第二个问题上会出现严重的困难。野村暗示，中国问题或许可以不列入会议的日程，但是，赫尔却回答说，这是“决定美日关系的关键问题”之一，除非这一问题能够“皆大欢喜地解决，否则将为未来留下不安定和麻烦的根子”。

在这期间，野村曾告诉美国报界说，他已经把近卫的一封私人信交给罗斯福，不过没有透露信的内容。他的这一举动引起了美日两国报界的猜测。日本政府不得不在8月29日宣布，近卫曾向罗斯福表示过“日本对日美之间悬而未决的太平洋区域问题的看法”。就在那天，日本外务省美洲局局长寺崎把那封信的全文给格鲁看了，寺崎说，日本的亲轴心国派一听到近卫提出建议的668消息，怒不可遏，已使首相的生命受到了威胁，并且使和解的政策更难实现。寺崎极力要求，立即举行会谈，勿再拖延；在此期间，勿再派美国油轮横渡太平洋驶往符拉迪沃斯托克；暂停冻结日本在美国的资产。9月3日（东京时间），寺崎再次请求早日举行会谈，他说，如果能把既成事实马上摆在亲轴心派的面前，就可以制止想要动员这些人来反对日本政府的企图。

可是，这些呼吁全是徒然。就在9月3日这天，罗斯福把他给近卫的复信交给了野村。罗斯福在信中声称，他不能“不注意到有一些迹象，表明日本有一部分人抱有这样的观念，如果大家普遍都有这种观念的话，就有可能妨碍顺利地进行合作”。因此，“为了确保我们所提议的会晤获得成功，看来我们极其需要谨慎行事，对我们谋求达成协议的那些基本的和主要的问题，设法马上进行初步讨论”。这样，罗斯福已经接受了赫尔的观点，举行会议的希望开始消失。显然，近卫一直在指望达成一个相互让步的协议，这个协议将在实际上，即使不是在形式上废除三国公约，而换来的是使他能为日本在中国和东南亚获得一些利益，以平息国内亲轴心派的反对情绪。另一方面，赫尔决心要迫使近卫预先接受一项同中国媾和的方案，使日本得不到任何政治、军事或经济方面的特权。可是，这无异是要日本承认失败。在中国打了四年多仗之后，无论是近卫，还是任何别的日本首相，谁要是答应这个要求，就会牺牲掉自己的职位和性命。

罗斯福的答复决定了形势将要象格鲁所担心的那样发生转变：以后发生的情况，这里不详细阐述了。尽管格鲁一再提出警告，华盛顿似乎没有意识到这种危险的程度。9月4日，赫尔会见中国大使胡适，告诉他说，同日本举行的探索性的会谈正在进行，但是还没有就谈判的共同基础取得一致意见。赫尔再次保证，在同日本开始明确的谈判之前，一定先同中国以及其他有关国家进行讨论。胡适似乎认为，日本的军事力量正在变弱，不久即将求和。赫尔提出，形势的发展有如下四种可能：日本走667向崩溃；日本改变政策以迎合美国的需要；日本设法签订一个“两面讨好”的协定；反对日本的各国政府拒绝在当前与日本缔结任何协定。值得注意的是，赫尔却没有谈到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日本决定开战。赫尔还向中国政府保证以下各点：凡是允许日本在中国继续进行侵略的任何协议，美国过去不考虑，将来也不考虑；美国决不会出卖原则；美国将继续帮助反抗侵略的国家。

9月3日，东京又举行了一次联络会议，起草了新的建议，并于9月4

日由丰田交给格鲁，9月6日由野村交给赫尔。日本这时同意以下各点：不从法属印度支那派遣军队去进攻任何邻近地区，也不无故向日本以南的任何地区进军；对于如何解释和履行三国公约，日本将自己作主；日本将按照它同中国经过谈判达成的协议，努力同中国恢复正常关系，随后尽快撤出军队；日本不限制美国在中国的经济活动，“只要这些活动是建立在公平的基础上”；日本遵循在西南太平洋地区的“门户开放”原则，并帮助美国在这个地区生产主要的原材料。作为交换条件，日本向美国要求：美国不得采取不利于解决中国事件的各种措施；停止在远东和西南太平洋地区的军事措施；

在达成协议之后应“解冻”日本在美国的资产。9月6日，格鲁与近卫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谈，据格鲁的记载，日本首相说，日本政府“真心诚意地”同意赫尔阐明的四项基本原则。近卫说，他意识到华盛顿怀疑他面临日本过激派的反对，是否有能力来执行和平解决的条款。可是，他有陆海军首脑的支持，同罗斯福进行会谈时，随行人员中668有一名陆军大将和一名海军大将以及陆海军的副参谋长。有这些将领参加会谈将使他能够抑制军内亲轴心派的反对。他再次敦促美国从速安排这种会议，勿再拖延。

近卫之所以焦急，是因为他心里明白，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在日本，反对向美国作任何让步的激动情绪正在高涨，同时，在陆军和海军界，有越来越多的人要求停止日美会谈，发动战争，理由是，美国政府只是在拖延时间，以便完成它自己的各项准备工作，并使经济方面的禁运起着削弱日本力量的作用。形势越来越逼着近卫必须采取某种方法迅速作出一个决定。经过反复讨论，草拟了一份“御前会议国策执行大纲”，9月6日，该大纲在一次扩大的御前会议上批准通过。这就进一步确定了7月2日御前会议作出的各项决议，并规定，同美国、英国、荷兰作战的准备工作在10月底之前完成。在这期间，外交谈判工作仍继续进行，可是，“到10月初，还没有理由能指望对方会同意我们的要求……我们就立即下决心，准备同美国（还有英国和荷兰）打仗”。那份“国策大纲”附有一张表，上面写着日本的最低要求和能作出的最大让步。总的说来，这些条件与日本以前提出的建议一样，但在语气上比以前生硬，显示出日本对中国和东南亚的政策有强硬起来的迹象。

在这期间，野村于9月6日向赫尔递交了日本的建议，赫尔用不以为然的眼光看了一下。他认为，日本这时正在缩小它原来打算作出的让步。他对日本关于三国公约的措词不满意。他特别反对日本在中国永久驻军。9月11日，野村告诉丰田说，美国政府惮于美国公众的舆论和预计中国会作出的反应，不会支持这样的中日媾和条件，即规定日本军队驻扎在中国的某些地方，象日本与汪精卫政府之间签订的条约那样。野村指出，美国人在同中国人进行了会谈之后，在这一点上态度已经比以前强硬了。赫尔建议，日本必须同意在缔结和约后两年之内，全部撤出在中国的军队。野村认为（虽然他的想法错了），双方已有希望在其他问题上达成协议，因此，他竭力劝说东京同意美国提出的从中国撤出日本军队的建议，因为在他看来，如果不作这一让步，就没有达成协议的希望。但是，日本陆军首脑却顽固地坚持，日军决不能从一些特定地区撤出。如近卫后来指出的，有一部分内阁成员支持他们这样做。9月18日，杜曼与近卫的私人秘书牛场在东京进行了一次会谈，在会谈过程中弄清楚了，是野村9月4日那种不合宜的举动把事情搞糟了，因此，在9月20日，又召开了一次联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又草拟了一份

总的协定草案，包括中日媾和的具体条款。日本对华媾和的主要条件于9月23日由野村递交赫尔，其余部分在10月1日交出。

有关美日协定的一般性建议于9月25日交给格鲁，两天后，又由野村交给赫尔。这份新的方案以9月6日御前会议通过的那个方案为蓝本。中日情和条件包括这样一条，即“根据现有的协定和惯例……在必要的一段时期内，日本的陆军和海军留驻在中国的某些地区。”9月27日，丰田在与格鲁会晤时，再次催促近卫与罗斯福的会谈应从速举行，时间最好是在10月10日至15日前后。他暗示说，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近卫内阁有可能倒台，这样，日美两国缔结协定的最后机会将就此消失。

格鲁向罗斯福和赫尔发出类似的警告。9月29日，他670向国务院发了一份长电，指出日本政府之所以不敢事前作出明确的保证，特别是关于三国公约的保证，是唯恐松冈的支持者把这件事透露给德国和透露给日本的亲德分子，因为在日本外务省内，仍然留任着一些支持松冈的人。格鲁认为，近卫会给罗斯福一些保证，使三国公约实际上成为一纸具文。格鲁还认为，近卫亲王是真心实意想逐步履行赫尔提出的、并且经他本人同意的四项基本原则，从而使日本总的政策能够与美国的政策协调起来。格鲁明白表示，有人认为日本人无论如何不敢冒险同美国打仗，他不同意这种看法。他提醒说，如果近卫内阁倒台，继任者将是一个军事独裁政权，这个政权将“缺乏那种能避免同美国发生正面冲突的性情或气质”。因此，格鲁坚决认为，罗斯福—近卫会晤是值得举行的，即使这次会晤不能达成一项完全令人满意的协定。

赫尔的看法却相反，因为他既不信任近卫，也不信任任何日本人。他认为，日本人需要的只是一个笼统的协定，之后，他们自己就可以随心所欲来加以解释。赫尔对总统说，自从美国在原则上同意近卫关于召开这种会议建议以来，日本人已经逐渐赖掉近卫8月28日所作出的那些比较大方的保证。赫尔这时建议，在重新强调美国总统希望举行一次会谈的同时，美国政府应当向日本政府指出这一点，并要求对方恢复原来的态度，重新开始讨论一项原则性的协定。9月28日，罗斯福同意了赫尔的意见。

10月1日，赫尔对胡适说，同日本进入正式谈判阶段的希望一直是微乎其微的。他再度向胡适保证说，如果有朝一日能进入这个阶段，美国会同中国全面地磋商一切有关的问题。10月2日，赫尔把美国答复日本9月6日建议的复文交给野村。美国宣称，这些建议是使华盛顿感到“‘失望的根源’”，因为它们似乎在“缩小和限制……”

〔四项〕原则的应用范围。”复文指出，对这四原则的应671用，不能有任何限制或例外。复文还对日本建议中所使用的某些限定性字句提出质问，并且要求进一步加以澄清。

这一答复确实把召开会议或签订协定的希望一扫而光，并且决定了近卫内阁的命运。东条领导的陆军这时提出，如果到10月15日仍不能达成一项协议，就应当执行9月6日通过的那项决议，并且决定开战。海军方面意见分歧。显然，及川想收回赞成开战的决议；但是，他既然在御前会议上已经默然同意过这个主张，就不敢公开表示要收回，因此，他提议由近卫作最后决定。近卫打算向美国让步，因为他觉得，日本能否战胜美国，这是值得怀疑的。在他看来，日本最好还是迁就美国的要求，特别是从中国撤出日本军队的要求，并且避免开战，保持自己的海军力量完整无损，再看一看欧洲战

争的结果究竟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但是，东条顽固地拒不同意从整个中国撤出日本军队。他宣称，日本在中国事件中牺牲巨大，有权并吞中国的领土；但是，这样做违背近卫的原则，必然行不通。所以，对日本说来，至少一定要在中国的某些地方获得驻扎军队的权利。再则，东条认为，美国本身渴望在远东称霸，日本越是迁就，向它让步，它就越傲慢专横。因此，东条的结论是，日本如被逼得无路可走，就非打不可。东条认为，近卫对日本赢得胜利的希望抱着过分消极的态度；东条说，要是说日本存在种种弱点，那么美国也是一样。

因此，日本内部在商量国事方面出现了僵持不下的局面。东条有权否决任何倾向于让步的决议，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由于海军方面抱着不冷不热、半心半意的态度，他没有力量来通过一项明确的、主张开战的决议。所以，他在10月14日提出，近卫内阁应全体辞职，然后由东久迩亲王来组织新阁，新年阁将不受9月6日决议的约束，并且有权作出新的决议。10月15日，近卫先同木户商量，随后又同天皇本人计议。天皇说，他赞成和平，如果真的由亲王担任首相，他一定下诏令亲王奉行和平的政策。但是天皇诘问，在那种情况下，陆军能同意这种决定吗？东条被问到这一问题时，答道，他不能保证陆军会听话，但是，无论如何，除了皇室的成员之外，任何其他人肯定做不到这一点。木户认为，这样的回答带有威胁的性质，于是，宫廷方面决定，东久迩不宜担任首相。木户想让及川担任首相，但是近卫担心，如果这样做，陆军将会哗变。近卫认为，最好让东条本人任首相。这将使责任全部落在陆军肩上。此外，倘若东条终于决定继续同美国会谈的话，由他出任首相或许有助于会谈获得成功，因为这将为签订任何协定排除掉华盛顿指出的那种障碍，华盛顿一直说，由一个文官出身的日本首相作出的任何保证是一无用处的，因为日本陆军会阻止他遵守这种保证。木户同意近卫的意见，几位前任首相举行了秘密会议，最后也表示同意。于是，近卫内阁于10月16日宣布辞职，次日，东条将军就当上了首相。

第四节东条内阁和日本决定开战

东条在担任首相的同时，不仅保留了他以前陆相的职务，而且还接管了内务省。把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里，而这个人又是一个现役的陆军大将，这种做法是存心向日本国内和向全世界表明，不管过去人们对近卫抱有过什么怀疑，新任的首相是拥有足够的权力来贯彻任何将要决定的政策的，不论这是为了和平还是为了战争。选择东乡茂德担任外相也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他始终如一地致力于改善日苏关系，他被任命为外相显然是为了向苏联表示和解的姿态，也是日本不打算联合德国去进攻苏联的迹象（德日联合进攻苏联的可能性，曾经使华盛顿感到惊恐）。外务次官西春彦也是一个日苏问题专家。

他是东乡的朋友，又和东乡在莫斯科同过事。

东条被任命为首相的时候，通过木户的关系得到天 73 皇的一个手谕，授权他可不必受9月6日御前会议决议的约束，从而使他能够继续同美国进行会谈。因此，新任外相东乡就能够向那位曾经两次请求召回的野村大使说明，“新内阁同前任内阁一样，也是真诚希望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调整日美关系的”。但是，接下去他又预兆不祥地说：“我国在表示态度和阐明立场方面，实际上已经尽所欲言。我们觉得，现在我们已经到了无法采取进一步积极行动的地步，只好敦促美国重新考虑其意见。”

野村对美国重新考虑其意见一事不抱希望，10月22日，他又可怜地恳求免除自己的职务。他声称，美国政府虽然了解他的诚意，但也了解他在日本国内是何等缺乏影响。他又悲痛地说，“我不愿意这样伪善地干下去，欺骗别人”，这句话的意思是指欺骗日本人民，使他们相信日美两国达成协议是可能的。但是，东乡的回答却是极力劝他坚守岗位。11月2日，东乡又通知野村，联络会议已开了好几天，讨论日美关系问题，11月5日将召开御前会议，作出最后决定。他接着又说，“这将是我国政府在改善外交关系方面的最后一次努力。……当我们恢复谈判时，形势迫使我们一定要立即达成一项决议”。两天后，东乡又电告野村说，日本政府已经决定提出最后一次反建议，这一建议如果遭到拒绝，会谈将会就此决裂。“于是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确实将濒临混乱的边缘”。东乡接着说，日本为了和平，对美国已经作了太多的让步。他说，这是日本“可能进行的最后一次廉价交易”，再要杀价，日本就不干了。不过，东京还是力劝野村继续竭尽所能严格执行东乡的指示，一俟接到御前会议作出决议的消息，就得使罗斯福和赫尔明白日本决心无论如何要达成一项最后决议。与此同时，东京还向野村发出两份电报。一份把日本反建议的内容告诉他，另一份通知他，674东京已派来栖三郎（前任驻柏林大使）前去协助他。

11月5日的御前会议正式决定，如果到11月25日日美会谈还不能取得成就，日本就同美国和英国开战。

在那种情况下，日本将把自己准备开战的决定告诉德国和意大利，要求它们同日本一起打美国，并要求它们同意不单独媾和。但是，如果德国要求日本进攻苏联，则日本将答复它，眼下还不可能这样做，并将坚持这个立场，即使这样做会使德国暂缓参与对美国作战也罢。的确，御前会议曾作了这样的决定，万一日美之间发生战争，日本将努力为德苏两国进行调解，罢兵言和，以期恢复日本与德国之间的交通。

御前会议还通过了其他一些决议，准备在战争爆发之后执行，其中有一项是要同暹罗签订一项协定，规定暹罗应同意日本军队通过其领土，作为交换条件，日本保证暹罗独立并同意暹罗在缅甸和马来亚得到一部分领土。对重庆的中国国民政府，日本不打算正式宣战，但是，日本将占领外园在中国的租界和租借地，并以可能交还外国管辖的这些地区为诱饵，向蒋介石再作一次和平试探。

那份被东乡称为建议A的最后和解建议，授权野村代表日本政府保证在整个太平洋地区，包括中国在内，在贸易上实行一视同仁的原则，条件是，这个原则同时也应当适用于全世界。关于三国公约，野村将向美国政府清楚地说明，日本不打算扩充它的自卫势力圈，并且向美国重申，日本的意图是要防止欧洲战争扩大到太平洋地区。一旦中日和约缔结以后，原来驻在中国的日本军队，一部分在一段“适当时期”内继续驻在华北、内蒙古和海南岛。

如果对方问起“适当时期”的含义时，野村奉命只“含糊地”答复说，大约二十五年。驻在中国其他地区的日本军队将在和约签订后两年之内撤走。野村还奉命声明，日本政府尊重法属印度支那的领土完整，当中日两国恢复675和平时，或者当中国事件圆满结束时（指重庆政府崩溃），日本军队将从印度支那撤出。然而，东京方面告诉野村，日本政府有一个原则，切望不要把这种保证写进同美国签订的任何正式协定中。

东乡在对这些建议的条件作解释性的说明时声称，虽然其中提出要在世

界范围内在贸易上实行一视同仁原则的问题，但是，实际上日本政府所需要的只是一项区域性的协定。东乡认为，要在这一点上达成谅解并不难。在看了野村的汇报之后，他还相信，有关如何解释三国公约的问题，将很快能达成协议。他认为，在争论的三个主要问题中，建议 A 已经完全同意了美国对其中两个问题的要求。但是，他也说清楚，第三个要求，即从中国全部撤出日本军队的问题，是无法接受的。他说，对这个问题，日本这时正在提出它可能作出的最后让步。

万一日本不能按照建议 A 立即同美国达成协议，东乡还准备好所谓建议 B 的第二套条件，作为代替，以“防止发生什么事情”。根据第二套条件，两国政府将同意：

任何一方不得侵入东南亚或南洋的任何地方，但法属印度支那除外；两国在从荷属东印度获取它们所需要的原料中，互相合作；两国关系应恢复到彼此采取冻结措施之前的状况。建议 B 还要求美国同意供应日本所需要的石油，并且保证不从事任何妨碍日本谋求同中国媾和的活动。如果需要的话，建议 B 可以包含建议 A 的头两点，以及日本同意在实现和平之后从中国撤军这一笼统的诺言。

11 月 5 日，东乡通知野村把建议 A 递交美国政府，并告诉他，未经与东京磋商，不得拿出建议 B。东京再次提醒野村，时间非常短促，形势极其危急，但是向他指出，676 不得造成这种印象，使美国认为日本是在发出最后通牒。另外又指示他不要以条约的形式来起草协定，因为如果是条约的话，那就需要美国参议院批准。东乡相信，美国政府也希望避免这样做，而是赞成缔结一个“行政协定”。日本外相在另一份电报中告诉野村说，“由于种种情况，签订这项协定的所有准备工作无论如何必须在本月 26 日之前完成”。与此同时，华盛顿一直在讨论美国政府将采取何种方针。罗斯福政府内部也有“稳健派”和“行动派”两种人。有些人认为，与其让日本在远东继续牵制住美国、英国和俄国的大量军队，还不如干脆同日本开战。这些人相信，如果向日本提出一份最后通牒，警告它不得再有任何进一步的军事行动，日本很可能会让步，它要是还不让步的话，就将轻而易举地被击败。其他人，包括美国国务卿和罗斯福本人，则比较谨慎小心。

11 月初，蒋介石担心日军会进攻昆明以切断经过滇缅公路通往中国的补给线，向伦敦和华盛顿发出了万分激动的呼吁，这件事促使局势发展到严重关头。蒋介石预言，如果听任日本人这样干，中国的抗战势必崩溃。暹罗政府看到越来越多的日本军队集结在印度支那而感到惊慌，也发出了呼吁。苏联政府也担忧东条可能会进攻符拉迪沃斯托克，因此请求伦敦和华盛顿针对这一点向日本提出警告。在伦敦，丘吉尔渴望英美两国能以最严厉的措词，向日本提出一份联合警告。他已通过克莱琪单独向日本提出警告，说明如果日本向印度支那范围之外进军，英国将采取有力的措施，但是，他估计，美国若不参加，这个办法是制止不了日本的。而美国陆海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和斯塔克海军上将却反对发出任何这种最后通牒。11 月 5 日，陆海军联合委员会向总统提出一份备忘录，其中写道，对日本采取军事行动只限于在发生下述一种〔或两种〕意外事故的情况下：（1）日本武装部队对美国的领土或托管地，对英联邦或对荷属东印度采取直接战争行为；

（2）日本军队开入东经 100 度以西或北纬 10 度以南的泰国领土〔即马

来半岛中属于暹罗的部分）；或者开入葡属帝汶、新喀里多尼亚或者洛亚尔提群岛。

陆海军联合委员会明确声称，当务之急是击败德国，日军向昆明进击或开入暹罗（除上述特定地区之外），甚至对苏联发动袭击，都不能成为美国参战的正当理由。如果对日战争是不能避免的活，美国应继续采取战略防御方针，直到德国打败为止。这种政策不能使支持中国的美国人满意；可是，美国总统表示赞同，11月7日，他通知丘吉尔说，他认为所提议的那种警告不会产生良好的效果。尽管如此，丘吉尔于11月10日在伦敦市政厅发表演说时却宣称，如果日美之间发生战争，“英国将在一小时内接着宣战”。

日本报刊这时充满着好战的言论。东乡给野村的指示，全被美国海军的密码专家截获和破译。根据最新截获的这些情报的要旨，赫尔在11月7日华盛顿内阁会议上发出了警告说，日本有可能“随时随地”发动军事进攻。当天晚上，野村拜访赫尔，交给他日本建议A的那些条款。野村要求迅速答复，同时还要求美国总统接见。三天后，野村拜会总统，向他宣读了日本建议的一个说明，接着，又要求迅速答复。罗斯福回答时，言语中对任何过于仓促的草率行动都表示不以为然，同时也不作出明确的答复。11月11日，东乡抱怨说，美国政府显然还没有完全意识到当前局势已发展到何等危急的地步；他再次提醒野村，11月25日是最后限期，并催促他要再作努力使美国马上答复。在东京方面，东乡于11月10日会见格鲁。他向格鲁提出警告说，时间越来越紧迫了，并敦促他尽力去加快会谈的速度。总的说来，东乡谈话的语气是生硬的。他清楚地表明，日本决不会自愿地放弃它从1937年7月以来就为之而战的一切目标。次日，他对克莱琪说，日美谈判这时决不能说还处在预备阶段，而是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他批评丘吉尔只知道用战争来威胁，而不知道日美会谈中正在发生的情况。

从11月12日到15日，日美双方在华盛顿接着进行的会谈，只是表明，美日两国政府仍然象以前那样各执己见，而东乡则已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赫尔认为，就解决问题来说，日本11月7日向他提出的那些建议，比其以前提出的条件并没有真正的进展。他又一次声明，东条政府对自己的和平意图一定要作出明确的保证，应当无条件赞成贸易机会平等的原则，并且应该使三国公约成为一纸具文。他坚持说，当时的谈判仅仅是初步的对话，然而，对日本人来说，这些会谈已经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谈判的最后阶段了。

11月14日，野村向东乡汇报说：“我相信，我一定能够在谈判中克服困难，最后取得成功”；可是，他又告诫东乡说，美国将以武力来对付日本向任何方向的进一步军事行动。野村说，虽然美国人对是否向德国开战的问题意见不一致，但是他们对“在太平洋地区进行战争的问题，没有丝毫异议”。与他最初预料的相反，美国并没有想同日本妥协的倾向。他说，日本有可能同美国、英国和苏联交战，哪一方能坚持得最长久，就能获得最后胜利。他极力主张，日本政府应当“耐心地等待一两个月，以认清世界形势”。这是一次直率的警告，要日本政府切不可指望在建议A的基础上与美国和解。但是，尽管如此，日本政府明智的做法是不要轻举妄动，姑且等待，以观望欧洲战争的演变。可是，东乡在11月16日给野村的复电中却说，野村建议采取观望的做法是完全不可能的，结束日美谈判的原定期限不得改变。他催促野村要美国从速解决，不要“让美国转移我们的议题，把谈判再拖延

下去”。东乡这时已准备好把建议B提出去，但是，为了尊重那个刚679到达华盛顿的来栖的愿望，他把有关此事的指示暂时压下不发，好让来栖有机会施展他的口才说服对方。

可是，来栖的官运并不比野村好。赫尔既不喜欢他，也不信任他，并且认为，他也没有什么新的建议可以向美国提出。再说，他到达华盛顿的时候，恰巧是东条向日本国会发表一篇好战演说的时候。东条在演说中宣称，日本打算向印度支那增派军队，这一姿态看来与日本使节在华盛顿所作的和平声明不相一致。11月17日，来栖拜会了罗斯福，并告诉他，日本不能公开废除三国公约，但是它无意成为德国的工具，也不准备等到美国深深地卷入大西洋战役之后，冷不防地在美国的背后捅上一刀。

如果日美两国能够就太平洋地区问题达成一项协议，就会使三国公约“相形失色”。但是，来栖能够做的仅此而已。11月18日，他同赫尔又举行了一次会谈，他对赫尔说，照当时的情况，日本想要废除三国公约，或者使它不起作用，是不可能的。赫尔回答说，只要日本仍然同希特勒结盟，美国公众舆论就继续反对同日本达成任何协议。就这样，谈判陷入僵局。

与此同时，来栖仍向东乡表示，他相信美国总统有诚意想同日本达成协议，他说，在他看来，最主要的是日本应该尽一切可能来满足美国对三国公约的愿望，从而促使它更深地卷入大西洋战争。他认为，这样做不仅会使日本在解决中国事件方面处于更有利的地位，而且还会使日本在欧战结束之后处于较强的地位未应付国际局势。

他说，他已经告诉罗斯福，日本担心的是，在欧战结束之后，英美两国会联合起来对付日本，罗斯福回答说，正在考虑的这个协定将包括所有这些问题。

11月18日的会谈清楚地表明，没有可能立即达成680协议。于是，来栖和野村就开始向赫尔试探，有无可能在经济方面商定一种暂时的解决办法来渡过危机，并提出作为签订此项暂定办法的交换条件，即日本从印度支那南部撤退军队。但是，赫尔说，单纯恢复到冻结令实施前的状况，他不愿加以考虑，因为日本可能会把撤离印度支那的那一部分军队，用来“在其他地区再进行同样令人讨厌的活动”。虽然赫尔还是同意向英国和荷兰两国政府探听对于在经济方面商定一种暂行解决办法的意见，不过，他认为，日本政府必须提出一些具体的事实来证明它的所谓和平意图。野村和来栖两人都劝告东京不要把建议B全部提出去，并且建议，日本倒是应该集中精力设法使冻结令撤销。野村汇报说，一位（没有说出姓名的）美国内阁官员曾经告诉他们，美国总统愿意同日本达成协议，除了两位阁员之外，全体内阁在原则上也对此表示赞同。如果日本能够作出一些实质性的让步，例如从印度支那撤出军队，那就会为恢复石油供应开辟道路，也许还会导致恢复正常的贸易关系。

11月19日，东乡在答复野村时，指责他不应当未同东京商量就提出了暂行解决办法的建议。他说，日本国内情况不容许日本政府只是为了换取美国撤销冻结令，就同意从印度支那南部撤军。这样的撤军只能在美国政府接受了建议B的情况下，才能答应；东京这时指示野村把建议B提出去。东乡告诉野村，如果这项建议遭到拒绝，日美会谈将就此破裂。东乡在同一天的另一份急电中，指示野村和来栖向美国政府讲清楚，要是美国参加欧洲战争，

美国的这种行动是否构成三国公约第三条规定的日本宣战的理由，对这一问题，日本将独立地作出决 681 定。他还授权他们声明，三国公约不包含任何秘密条款。

但是，东乡又告诉他们，除非他们看到有希望在建议 B 的基础上达成协议，否则就不要作这些解释。在同一天的另一份急电中，东京事先通知其驻美使节，要他们天天收听日本的短波新闻广播，以注意预示有紧急情况的密码警报，一听到这种信号，他们必须把大使馆内的密码本和机密文件统统销毁。

就在东京向他们发出这些指示的同时，野村也向本国发出一份电报，恳求政府不要在中国事件业已持续了四年之后，又发动一场新战争，他再次建议，“以互让精神”来谋求暂时和解。他要求把这些意见转达给东条。可是，他得到的答复是，不接受他的建议，重申了命令他提出建议日的指示，并通知他说，东条完全同意这些指示。

于是，在 11 月 20 日——美国感恩节那天——野村和来栖向赫尔递交了建议 B。野村汇报说，赫尔对第六点，即要求美国停止对华援助这一点，感到“极为诧异”。

赫尔对两位日本使节说，美国援助中国的目的，同美国援助英国的目的——一样，并说，只要日本仍然同希特勒结盟和坚持在东亚推行新秩序，美国就继续援助中国。11 月 22 日，东乡答称，如果美国愿意接受日本提出的建议 B，东京不会反对罗斯福为中日和谈从中斡旋。东乡又说，一旦中日实现停战，美国就无需继续援助重庆了。在同 682 一天早些时间的一份急电中，东乡已经把最后限期从原定的 11 月 25 日延迟到 11 月 29 日，假如到那一天日本能够同美国、英国和荷兰达成协议的话。“在这之后”——

就是说，如果还没有达成协议的话——“自然而然会发生一些情况。”

赫尔在他的《回忆录》中虽然把日本人提出的建议称为“荒谬绝伦”，但是他在当时是否觉得如此，倒是值得怀疑的。诚然，这些建议作为一种暂时的协议，无疑尚须作一定的修改，却也不是一无可取的。日本人表示愿意消除由于日军出现在印度支那南部而对暹罗、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构成的直接威胁。回顾美国之所以于 1941 年 7 月对日本采取财政和经济方面的制裁措施，就是由于这种威胁的缘故。倘若日本人这时完全改变了这种政策，反过来要求把他们在美国和其他地方的资产“解冻”，这也并不是没有理由的。从下面可以看到，他们并不要求撤销 1941 年 7 月以前美国对日本输出物资所实施的许可证措施和其他限制。可是，他们要求美国供应“所需要”数量的石油此时也难以被接受。11 月 26 日，东乡告诉野村说，日本每年想从美国进口四百万吨石油，从荷属东印度进口一百万吨；他说，这相当于禁运之前日本一直进口的数量。但是，他有思想准备，可能得不到这么多；如果说，日美协定的成败决定于这一点的话，他或许会大大减少进口数量，以求达成协议。毋庸置疑，如上所述，即使能按这些条件达成协议，对于这个协议应当如何解释，双方仍有可能发生争论。但是，这样就不至于听任战争迅速爆发，再加上德国于 1941 年至 1942 年之交的那个冬天在俄国的挫败对东京产生的影响，或许已经使形势起了决定性的变化。再说，如上所述，罗斯福本人曾经提议要同日本签订一项暂行解决办法或者临时协定，美国国务院远东司的官员们也正在为此准备草案。此外，他们还在草拟一份全面解决计划的最后草案，打算同暂行解决办法一齐提出去。

11月22日，赫尔同澳大利亚、英国、中国、荷兰的外交代表们会晤，给他们看了日本11月20日的建议B以及国务院拟定的暂行解决办法的草案。后一文件包括的683条款概括如下：

1. 日本和美国同意，除非受到攻击，它们不得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从拥有军事设施的各自据点越过太平洋地区的任何国际边境进军。

2. 日本“立即”从印度支那南部撤出军队，不在那里修建任何新的军事设施，并把在印度支那北部的兵力限制在最多二万五千人。

3. 美国和日本政府撤销各自的冻结措施。一方向另一方的出口“仍然按照各自根据国防需要而制定的出口管理措施办理。”

4. 美国政府立即同英国和荷兰政府联系以期促使两国政府同日本签订一项类似的协定。

5. 美国政府对日中进行和谈，或者对日中在和谈期间安排休战，“不表示反对”。“美国政府对于这类谈判主要关心的，只是使之以构成日美两国政府当前会谈的主要精神的基本和平原则作为基础和范例。”如果日本和中国一致同意，和谈可以在菲律宾举行。

6. 暂行解决办法是一种临时措施，其有效期不超过三个月，必须经过共同协议才能延期。

澳大利亚、英国和荷兰的使节对美国打算给日本的这一答复都表示赞同。甚至连中国大使对此也不表示“严重关切”。这四个国家的使节都同意就美国的建议向各自的政府请示。11月22日晚些时间，赫尔会见野村和来栖，告诉他们说，他已经同其他有关国家的政府代表们讨论了日本的建议，他们必须得到上级的指示，因此，他在11月24日之前不能作出明确的答复。同时，他又暗示说，无论如何，对日输出的限制，包括石油在内，只能逐步地放宽，其速度将随着日本方面实际表现的和平诚意而定。他建议，日本人应从整个印度支那撤军。这一建议激怒了来栖，他反驳说，正象东乡曾对格鲁所说的那样，看来，美国是在指望日本单方面作出一切让步。

11月24日，赫尔又同上述四个国家的外交使节会晤。但是他发现，只有荷兰使节已接到政府的指示。荷兰政府的方针，总的说来，是赞成美国提议的暂行解决办法。中国大使已接到了重庆发来的电报，大意是说美国似乎依然倾向于以牺牲中国来抚慰日本的做法。因此，胡适提出异议，反对拟议中的那项容许日本在印度支那北部留驻二万五千名日军的协定。他说，这支军队可能用来进攻昆明。赫尔对这种冷淡的反应相当恼火。他重申，向日本建议这项协定的目的，完全是为了赢得时间，他又对这四位客人说，他们的国家似乎只关心自己有关地区的防务，而不以大局为重，他说他这时不能肯定，究竟是否要把这个暂行解决办法提交日本人。

在此期间，这份暂行解决办法的草案已经作了一些修改，主要是关于一旦冻结限制撤销以后，日本可以得到什么物资的问题。这些物资将包括石油，“在准许出口的一般物资范围之内，按月根据民用需要供应”。11月24日的晚些时候，根据赫尔的建议，罗斯福向丘吉尔发了一封电报，概述了拟议中的暂行解决办法的内容。他在电报中说：“在我看来，对日本人来说，这是一项公平合理的建议，然而同意还是拒绝，实际上是日本的国内政治问题。我不抱很大希望，我们大家都必须有真正会出乱子的思想准备，说不定很快就会出乱子”。

11月25日，英国大使递交了一份由英国外交大臣发出的备忘录。艾登

在备忘录中建议，应该要求日本从印度支那撤出所有的陆军和空军，他还反对向日本恢复供应任何数量的石油，因为，如他所说，“我们知道，日本人除了军事上的需要之外，并不缺乏石油”。显然他断定，日本人尽管在口头上恫吓威胁，但是决不敢动手。因为他说，“我们可以肯定……日本人想通过夸大拖延谈判所产生的危险性，设法强行通过一项草率的决定”。但是，他又补充说，英国政府对赫尔处理谈判一事完全信任，因 685 为赫尔处于最有利的位置，能够判断情况随机应变。赫尔向哈利法克斯指出，英国政府提议的一些更改是不切实际的；英国政府得到这一答复以后，大概不致于坚持自己的建议。荷兰政府总的说来虽然仍然赞成暂行解决办法，但是这时建议，要根据日本军队从印度支那撤出的速度，逐步放宽对日本的经济制裁，日本的撤军一定要达到使荷属东印度、英属马来亚和滇缅公路完全不受威胁的程度。蒋介石则仍然深信日本打算进攻昆明，并担心自己将被抛弃，所以就作出了最强烈的反应。他对他的政治顾问欧文·拉铁摩尔说，“现在同中国〔原文如此，应为日本〕签订的任何‘暂行解决办法’将严重地损害中国人对美国的信任，情形同封锁滇缅公路一样，此事已经使得英国的威望永远受到损害”。他指示胡适对拟议中的暂行解决办法要表示坚决反对；他还通过当时在华盛顿的宋子文向陆军部长史汀生和海军部长诺克斯发出同样意思的呼吁，说任何容许日本军队留驻在中国的暂行解决办法必然会使中国的抗战瓦解。

赫尔在会见胡适时，有点粗暴地指出，拟议中的暂行解决办法将保护蒋介石，使滇缅公路不受威胁，关于这一点他最近已经发过警告。赫尔说，那位大元帅也忽视了暂行解决办法将使整个南太平洋地区在三个月内不会受到日本威胁这一事实。日本在这段时期内或许会得到的石油，其数量对于增强它的战争潜力来说，是无济于事的。赫尔最后说，如果暂行解决办法的建议作罢，万一日本向南方进击，那就绝对不要责备美国不向印度支那邻近的海域派遣舰队。接着，在 11 月 25-26 日夜间，罗斯福接到了丘吉尔的复电。丘吉尔说：

当然，处理此事全在于你，而且我们的确不需要再多打一场战争。只有一点使我们不安。蒋介石怎样呢？他不是正处于难以维持的境地吗？我们担忧的就是中国。如果中国崩溃，我们的共同危险将大大增加。我们确信，美国对中国事业的关心将支配你的行动。我们认为，日本人对他们自己最最没有信心。

英国政府——中国政府和荷兰政府可能也是如 686 此——并不知道，美国政府打算在提出暂行解决办法的同时，把全面解决的建议也提出去，这份建议将包含日本承认中国国民政府和从中国撤出所有日本军队。丘吉尔在回忆录中写道，要是英国政府当时知道此事的话，对中国问题早就不再忧虑了。至于蒋介石如果知道了美国这一意图之后，是否就不再表示反对，这个问题是值得讨论研究的。总之，蒋有许多理由希望日美之间发生战争。然而，罗斯福和赫尔心里明白，英国人和中国人之所以表示反对，荷兰人之所以半心半意地默认，至少有一部分是出于他们对美国的意图不够了解。因此，罗斯福和赫尔尽可以继续这样干下去；在这样干时，他们可以周到地给他们的准盟国以保证。可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干，而是决定把暂行解决办法这一整个计划放弃。赫尔在回忆录中写道，11 月 25 日下午和晚间，国务院起草了一份备忘录，主张放弃这个暂行解决办法。11 月 26 日上午，赫尔向罗斯

福呈交了这份备忘录。备忘录说：鉴于中国政府的反对，鉴于英国、荷兰、澳大利亚三国政府半心半意的支持，或者实际上是反对，并鉴于人们完全不了解暂行解决办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从而自然而然地使广大舆论界一次又一次地反对这个办法，我十分认真地建议，让我在这时召见两位日本使节，交给他们一份综合的全面和平解决的基本建议的抄本，同时撤销暂行解决办法的建议，尽管我坚持认为，这个办法对于所有反抗觊觎太平洋地区的侵略者的各个国家来说，乃是一个明智而有利的措施。

赫尔记道，罗斯福立刻同意了。

看来，促成美国决定这样做的关键因素，是暂行解决办法遭到广大舆论界反对。据萨姆纳·韦尔斯说，宋子文通过“一位新近在华盛顿开业做律师的前政府官员”的关系，在美国报刊和国会议员之间制造许多指责美国抚慰日本的舆论。中国的这一反击是成功的。那项计划只得束之高阁。正如野村向东京汇报的那样，美国人对参加对德战争的问题意见也许有分歧，但是，在反对日本方687面，他们是团结一致的，而且对美国政府下令禁止与日本进行贸易一事，都衷心地默认同意。罗斯福岂肯冒舆论之大不韪，让别人指责他准备把中国出卖给日本，以便腾出手来集中力量对付德国。这样做就会授人以柄，给罗斯福政府的许多敌人提供再好不过的攻击材料。这就说明了，罗斯福为什么会默许取消那项看来还是他本人发起的计划。赫尔则认为，要日本政府同意美国提议的暂行解决办法，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几乎可以肯定，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正确的。11月24日，东乡告诉来栖和野村说，日本要求美国接受建议B的所有各点，而自己不会再作任何止步。同一天，他又通知他们，他在11月22日的电报中规定的限期按东京时间计算，就是说，东京时间是11月29日，华盛顿时间是11月28日。可是，要是美国把暂行解决办法的草案提交给日本的话，就可能给东京的许多主和派人士提供一些理由（虽说不多），来驳斥东条的论点，东条认为，日本别无抉择，要么打仗，要么听任在经济上被扼杀。

现在我们可以转而谈一谈赫尔一度决定向日本提出的那份全面解决的建议。这份建议是以美国财政部的一个官员哈里·德克斯特·怀特拟订的备忘录为基础的。怀特认为，在解决美日关系问题方面，他胜过国务院的任何官员。战后，怀特被指控倾向共产党，但是，在1941年，他似乎只是作了一次诚实然而方向不对头的努力，其目的在维护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从而使美国腾出手来集中力量对付希特勒。怀特建议，美国方面应该向日本建议缔结一项为期二十年的互不侵犯条约，应该同意明确解决满洲问题，提议把印度支那交给五国托管，放弃美国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劝说英国也这样做，并且劝说英国把香港出售给中国，以美国贷款的形式来支付。美国还要从太平洋撤走其大部分海军，同日本缔结一项新的贸易协定（给予日本实质性的特许权，包括向美国出口生丝时免付关税），取消目前的冻结措施，向日本提供二十亿美元的贷款，为期二十年，并且筹备一笔五亿美元的基金，由美日两国各承担半数，用以稳定美元与日元之间的兑688换率。日本方面则应该从印度支那和中国的长城以南撤出所有的军队；如果苏联从远东撤军，日本也应从满洲撤出其大部分军队。日本在中国不得支持蒋介石政府之外的任何其他政权，并应向蒋介石提供十亿日圆的贷款用于重新建设，并放弃其在中国的治外法权。日本还应同美国、英国、中国和荷兰缔结一项为期十年的互不侵犯条约。此外，日本还应向美国出售本国生产的战争物资，最多不超过百分之

七十五。总而言之，日本应放弃在远东的一切野心，并在实际上成为美国的卫星国。11月18日，财政部长摩根索将这个建议提交罗斯福和赫尔。令人惊奇的是，这份建议竟然得到国务院远东司和赫尔本人的赞赏，尽管赫尔对摩根索的越俎代庖表示不满。怀特备忘录经过国务院修改和重新起草之后，提交参谋长联席会议。11月21日，参谋长联席会议也提出了两条修改意见。关于香港的建议没有被采纳，因为斯塔克海军上将认为，英国应该无偿地把香港归还给中国。有关日本从满洲撤军和苏联从远东撤军的一条也被删除了，因为海军和陆军的代表认为，苏联将不乐意看到这一条，再说，这对美国也无利害关系。经过这样修改之后，财政部的这一备忘录就成为赫尔11月26日交给野村和来栖的那份十点计划的基础。这份标明为“绝密、试探性和不承担义务的”方案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彼此的政策声明，包括赫尔的四项原则和另外五项涉及国际经济关系的一般原则。第二部分的题目是“美国政府和日本政府将采取的措施”，共有十点，概括如下：1.美国和日本应同英帝国、中国、荷兰、暹罗、苏联缔结一项多边的互不侵犯公约。

2.美国和日本应谋求缔结一项六国（美国、日本、英国、689 荷兰、中国、暹罗）协定，尊重法属印度支那的领土完整，协定的条款规定，如印度支那的领土完整受到威胁时，六国应进行协商。六国之中任何一国不得在印度支那享有优惠的经济特权。六国应进行合作以确保在那里得到平等的经济待遇。

3.日本应从印度支那撤出其全部陆、海、空军和警察部队。

4.美国和日本在中国除了支持目前暂在重庆的国民政府外，不得以任何方式支持其他任何政权。

5.两国政府应放弃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包括辛丑条约规定的各项权利，并劝使其他各国政府也照此办理。6.两国政府应通过谈判缔结一项贸易协定，包括给予最惠国待遇和减少贸易壁垒，并把生丝列入美国免税进口物资表内。

7.两国政府应取消各自实施的冻结限制规定。8.两国政府应拟订一个计划，以稳定美元与日元之间的兑换率，实施该计划所需要的基金将由日本和美国各承担半数。

9.两国政府应同意，“任何一方不得把自己同任何第三国家已经缔结的协定解释为与本协定的根本目标——建立和维护整个太平洋地区的和平——相抵触”。10.两国政府应努力促使其他国家遵守本协定规定的基本的政治和经济原则。

显然，这第二部分实质上就是怀特备忘录，只不过删去了其中一些最最荒谬的内容。

当赫尔把这个文件交给两位日本使节时，来栖问道，这个文件是否作为美国对日本提出的暂行解决办法的答复。赫尔答称：

我们不得不象我们所做的那样来对待日本的建议，因为不论在美国还是在日本，社会上都出现了不少的混乱和骚动。他提醒日本人，在美国我们要应付的政治局面，正象日本政府要应付的政治局面一样，他是指不久前在东京出现的那些咄咄逼人的好战言论。他说，这些言论自然而然地已经在美国公众中间激起了反应。

赫尔接着暗示说，倘若日本肯接受美国建议的条件，就有可能从美国得到财政援助，同时美国还可能放宽1924年590美国移民法的规定。来栖答道，

他想象不出本国政府怎能同意第三点和第四点。他提议，由于美国的建议是试探性质的，还不如先对之进行非正式的讨论，然后再递交东京。赫尔说，“对于日本的建议，我们目前所能做到的”只能是提出这项建议。他又说，美国公众舆论如此激烈，“如果他同意把石油自由输往日本，他几乎会被私刑处死”。野村绝望地问道，这时是否已无其他可能，他们能否会见美国总统。来栖警告说，“我们对美国建议的响应，可以说是等于表示已到山穷水尽”。他问道，美国对暂行解决办法是否已经不感兴趣，对此赫尔答称，“他已竭尽所能对此进行了探索”。来栖问赫尔，这是否由于其他大国不同意的缘故；赫尔对此不肯明确地加以否认。

11月27日，野村和来栖会见了罗斯福，赫尔也在座。罗斯福宣称，日本一些领导人发表言论“反对构成会谈主要精神的和平与秩序的基本原则”，为会谈的进展大大增加了困难，不过，他仍然希望以和平方式来解决。他声称，“鉴于本国的舆论出现了这样激烈的情绪，而当今世界上一些存亡攸关的重大问题又变得这样尖锐，因此除非日本对本国明确表示其和平愿望，否则本国就不可能对经济限制措施作出任何大幅度的放宽。”赫尔在其《回忆录》中指出，美国11月26日的建议只不过是将从谈判开始以来美国一直含蓄没有明白讲出的态度在这时清楚地表明了而已。固然，这个照会并不是最后通牒，并不是说，如果日本拒绝这些条件，美国就使用武力进攻日本。然而，赫尔讲得很清楚，不再谈什么暂行解决办法了，提出的这些条件是不能变更的。这意味着，除非日本接受这些条件，否则美国将继续对它施加经济压力。这样，美国就使日本必须作出抉择，要么公开放弃它几年来在远东作战中所获得的一切利益，要么听任在经济上被慢慢地扼杀。正如赫尔常常提到的那样，日本之所以处境困窘，是由于从1931年9月以来它一直不断进行侵略的结果，因此是自作自受。但是，道义上的训诫，即使是正当有理的，也无助于和平；而当这个训诫别国的国家，其本身的道德作风还没有普遍达到它对邻国所要求的水平时，这种训诫就格外令人恼火。再则，美国的经济制裁，旨在教训日本改过自新，给日本人上了一堂实物教学课，使他们认识到需要为自己建立一个经济上自给自足 691 的帝国，如果他们能够做到的话。

罗斯福和赫尔都不相信，日本会接受美国照会中提出的那些条件。既然这样，他们为什么还要提出这份照会呢？有人曾断言，他们是故意策划，以激怒日本进攻美国，他们是别有用心，想“通过邪道”使美国同德国交战。

但是，这种指责是站不住脚的，其中有许多论点都没有说服力。我们只要细想一下，在那时美国政府还不能肯定，倘若日本进攻美国，希特勒是否会以武力支持日本。单凭这一点，就足以断然驳斥上述的指责了。根据三国公约的条文，希特勒并没有义务要这样做；因为，日本对美国的进攻，即使是所谓“被激怒的”进攻，却也不能与美国对日本的进攻相提并论，除非希特勒愿意这样解释。可是，松冈下台之后，日本政府对德国的态度，使希特勒有理由对三国公约不作这样的解释，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要是希特勒当时采取了这种方针，那么即使美日之间发生公开的战争，美德之间在形式上仍然没有交战。要是出现了这样的局面，美国的公众舆论一定会迫使美国政府将其作战力量集中到太平洋战区，而这一点正是罗斯福和陆海军参谋长希望避免的。一直到12月1日，美国截获到大岛（从柏林）发给东京的电报，这才明白，如果日本同美国交战，希特勒并不打算袖手旁观，而是要

对美国宣战。

美国政府之所以要起草和提出 1941 年 11 月 26 日 692 那样一份如此不妥协的照会，其真正的动机似乎是决心驳斥这样的指责，非难美国在姑息日本和准备制造一个“远东慕尼黑事件”，由于中国人大喊大叫，这种谣言在华盛顿正甚嚣尘上。赫尔对中国人的这种宣传公开表示愤怒，反映了他对这件事感到焦虑的程度。这些谣传使得日美谈判无法再保守秘密；11 月 27 日，赫尔向新闻界大略介绍了这方面的情况。

赫尔说，美国起草这些建议的目的，在于使谈判能继续进行下去，从而赢得时间，不管有无暂行解决办法，这些建议总是要提出去的。他还说，如果日本接受这些建议，就有可能使之成为解决全面问题的基础。赫尔的这些话说明了，他认为日本仍有可能继续进行谈判，而且即使到了紧要关头，也不敢打仗，尽管美国截获的从东京发给日本使节的指示，证明了相反的情况。丘吉尔坦率地承认，他不认为日本会如此丧失理性，竟向美国发动进攻，罗斯福在内心里似乎也有同样的想法。的确，在美英两国政府内部，或者在接近两国政府的人们中间，有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看法；显然，这并不是没有理由的。这些会谈毕竟是日本人提议的；他们进行会谈，已有大半年的时间；他们尽管不时进行威胁，但是总不把路走绝。他们的确很想避免同美国交战，同时也表示愿意作出许多让步，以求达成和解。如果美国意识到两国之间实力悬殊——日本一定也意识到这一点——从而坚不让步的话，日本会不会更屈服呢？日本的主和派人士把日本军事当局的力量说得比实际情况还虚弱，同时又把日本的厌战 693 心理以及由于侵华战争引起的经济负担说得言过其实，他们也许助长了国外期待日本继续让步的心理，这样反而损害了他们自己的事业。中国的宣传正在为着同一目标而努力：由于日本人未能迫使中国接受他们提出的媾和条件，因此，日本的军事力量这时就被严重地低估了。

在东京，召开了一次联络会议来讨论美国的建议。出席会议的人，一致认为，美国的条件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东乡外相在国际军事法庭受审时把那次会议上人们的看法概述如下：

我们当时感到，美国对达成一项协议以和平解决争端，显然不抱任何希望，也毫无诚意，因为我们明白，美国人当然更明白，这个文件是要求日本完全屈从于美国的主张，以作为和平的代价。这时，美国不仅要日本放弃几年来不惜牺牲而换来的一切利益，并且还要它放弃作为远东的一个强国所拥有的国际地位。在我们看来，放弃这些东西等于是使国家自趋灭亡。对付这种挑战和保卫我们自己，唯一的办法只有战争。

不过，联络会议议决，在决定进行战争之前，应该先交重臣（几位前任首相）会议讨论，然后再由正式的御前会议批准。

11 月 28 日，东乡通知野村和来栖，不能接受美国的条件；他又说：“我将在两三天内发给你们关于帝国政府意见的正式记录……这个记录表明，谈判事实上将破裂。”同时，他还要这两位日本使节注意，不可让对方看出这个苗头。他还告诉他们说，海相已经驳斥了他们试图在最后一分钟打开僵局的建议，认为这种做法完全不恰 694 当。与此同时，在东京也仍有一批人正在绝望挣扎，作出最后的努力，企图制止迫在眉睫的大祸，这些人之中有米内、近卫和天皇本人。在近卫内阁临近垮台之前举行的几次讨论中，这位亲王曾建议，即使谈判失败，日本最好还是保持和平，忍受经济制裁，并通过

大力开发本国拥有的资源来抵销经济制裁带来的影响。内阁企划厅长官铃木在日本经济状况的考察报告中断言，就其他一切物资来说，日本尚能应付过去，唯有石油真正是个问题。

至于石油，根据铃木估计，在合成石油工业方面，如果投资二十亿日元予以扩建，到1943年底，日本可以年产石油五十万吨，到1944年底可以年产四百万吨，也就是说，这将超过日本占领荷属东印度以后有可能获得的数量。但是，东条反对这个论点，并认为，如果让当时的状况再继续下去，日本的经济将逐渐恶化。在11月29日的重臣会议上，近卫又提出了他的主张，但是东条又给了他同样的回答。东条坚持说，日本必须进行战争，才能突破已经包围着自己的封锁线和得到它所需要的供应，特别是石油。有可能，东条心目中主要考虑的不是经济方面的问题，而是如铃木向近卫所说的那样，要保持军方的威望。但是，后来太平洋战争期间的事实证明，铃木对未来的合成石油生产的估计完全不切合实际。这不仅是资金问题。日本还须依靠德国供应必要的设备和技术指导，而日本同德国的交通线这时已被切断。而且，它也没有多余的煤和铁来满足需要。

在几位前任首相举行的会议上，东条表示有信心——的确不无根据——日本很快就会横扫东南亚，从而获得所需要的石油及其他战略物资。他认为，到那时日本就可同对方达成和解，使日本保留它的一部分既得利益，即使不是全部既得利益。重臣们并没有全部被说服，但是他们缺乏必要的内幕消息来驳斥东条和最高指挥部的说法。因此，他们就不得不同意开战的决议。可是，11月30日，天皇召见东条，告诉他，据高松亲王说，海军方面希望避免战争。东条知道，海相和海军军令部长对联络会议的决议都已表示同意，因此他恳请天皇就此问题同他们两人商议。他还直言不讳地禀明天皇，这个决议不容改变。当天晚上，掌玺大臣木户通知东条，天皇已同意翌日即12月1日召开御前会议。这次会议只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会上，天皇一言未发。正象东条在战后所说的那样，要天皇去反对内阁和最高指挥部的一致建议，这在历史上还从无前例。但是，严格根据法律来说，天皇还是拥有绝对的权力，可以宣告和平。

木户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上说，他们曾经讨论过采取这样的措施，但是，美国11月26日的答复促使他们放弃这个计划。木户认为，当时如真的作了这样的尝试，日本国内可能发生内战。木户所处的地位，使他能看到这一点。御前会议决定12月8日为发动战争的日期。

东京这时向驻在国外的日本军事当局和外交当局不断发出命令，指示它们在即将来临的战争中应起什么样的作用。

与此同时，为了帮助野村和来栖仍然装出一副要与华盛顿继续进行谈判的样子，东乡于11月29日曾通知他们作出最后的尝试去劝说美国重新考虑其态度。即使华盛顿没有从截获的日本电报中了解日本政府的政策，东条为庆祝反共产国际公约签订周年所发表的那篇公开的好战演说本身，也足以败露东乡的意图。两位日本使节通过太平洋海底电缆同日本外务省美洲司司长山本熊一通话时，对这篇演说提出了规劝。由于这篇演说696的发表，罗斯福中止了他在温泉的短期休假。野村奉东京之命把这篇演说以及在日本公开发表的其他好战声明的意义尽量加以缩小，并为日本在印度支那的军事行动进行辩解。

这两位使节仍然规劝东京采取克制态度。12月1日，他们向东京建议，

或许仍有可能安排近卫同美国副总统亨利·华莱士会谈或者同罗斯福的朋友和心腹哈里·霍普金斯会谈。12月2日，他们同韦尔斯会晤，据他们说，韦尔斯讲，“鉴于美国的国内情况，美国必须阐明自己的立场，因此提出了〔11月〕26日的建议。”他们两人把这句话当作一种暗示，表明美国以后或许会改变一些立场。可是，他们对缓和抱有的一线希望很快就化为泡影，因为，12月6日，东乡向他们发出了一份冗长而又充满仇恨的电报，作为日本对美国11月26日的建议的答复。

这份电报开头说，“确保东亚安定，促进世界和平，从而使一切国家能在这个世界上各得其所，是日本政府永远不变的政策。”自从中国事件发生以来，“由于中国方面未能领会日本的真正意图”，日本政府一直在为恢复和平而努力并设法不让战争扩大。为此，日本政府缔结了三国公约。日本政府的复文接着指控美国 and 英国“不择手段支持重庆政府”，并干涉日本“在安定亚洲方面所作的建设性努力”。美英对日本在印度支那的行动蓄意进行曲解，并同日本断绝经济关系。“这些国家在公然采取这种敌视态度的同时，还加强了备战工作，完成了对日本的包围，造成了威胁日本帝国存在的局面。”照会然后扼要地重申了近卫希望同罗斯福会晤的建议，以及日本新近提出的一些建议，其中并引用了11月20日提出的建议B。照会说，在整个谈判过程中，日本一直抱着“公697正而节制的态度”，并且“不管有多大困难，作了一切可能的让步”，然而，美国政府却从未表现出一点点和解精神。

日本政府特别谈到了美国11月26日的备忘录，声称，要想美国立刻采纳其原则，那是“空想”。“只有通过认清实际形势，彼此谅解对方的立场，从而找到一个能为双方共同接受的准则”，才能实现和平。日本政府推测，美国建议的第二部分第九点的用意，是“想在美国参加欧洲战争时，阻止日本履行三国公约的义务；对此，日本政府不能同意”。美国一方面正在设法稳定太平洋地区从而巩固它的后方，一方面又以自卫的名义准备对正在努力建设欧洲新秩序的德国和意大利发动进攻。再者，美国政府固然反对用武力来解决国际争端，但是，它却正在采用经济压力，这种手段应当受到谴责，因为它“有时比军事压力更为残忍”。东京接着又断言，“历史事实证明，在过去几百年或者更长的时期内，东亚一些国家一直被迫遵循英美帝国主义剥削政策控制下的现状，一直在为这两个国家的繁荣而牺牲自己”。美国提出的关于印度支那的建议（第二部分第二点），被诬蔑为“如同九国公约组织那样一种体系”的扩大，而九国公约组织乃是“造成现时东亚困境的主要因素”。美国提出的关于中国问题的一些要求，“例如全部撤军或者在国际贸易方面无条件应用一视同仁的原则，忽视了中国的实际情况”，而且是“蓄意破坏日本作为远东的稳定因素的地位”。特别是美国要求日本只能承认重庆政府这一点，“破坏了当前谈判的根本基础”。美国备忘录中有几点——取消冻结限制、缔结贸易协定、稳定日元与美元之间的兑换率和取消在中国的治外法权——是能够接受的。但是，总的说来，这个备忘录“忽视了日本在中国事件四年期间作出的牺牲，威胁着日本帝国本身的存在，败坏了它的荣誉与威望”。因此，日本不能同意把这个备忘录作为谈判的基础。

日本的答复接着说，日本政府曾建议，在同美国签订协定的同时，日本也应同英国和其他有利害关系的国家698签订协定。但是，“由于美国政府是在同英国、澳大利亚、荷兰和重庆经常进行磋商的情况下提出11月26日

的建议的，推测起来，它在中国问题上迎合了〔原文如此〕重庆政权的愿望，因此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所有这些国家都同美国一致，忽视了日本的立场。”接下来是这样一段预兆不祥的结束语：

显然，美国政府的意图是同英国和其他国家共谋，阻挠日本通过建设东亚新秩序来确立和平的努力，特别是想利用中日战争继续打下去来维护英美两国的权利和利益。这种意图在当前的谈判过程中已经清楚地暴露出来。因此，日本政府……想通过同美国政府合作来维护和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这一真诚的愿望终于化为泡影。日本政府感到遗憾，不得不通知美国政府，鉴于美国政府的姿态，日本政府只能认为，想通过继续谈判来达成一项协议是不可能的。

日本的照会并没有说，谈判破裂以后将发生什么情况，但是，鉴于这个照会字里行间充满着敌意和挑衅，毫无疑问，日本这时已打算使用武力。东乡在战后说，日本外务省当时认为，这一照会等于是宣战书。12月6日，东乡通知野村，要他暂时把这个照会搁下不发，等接到命令告诉他何时发送再说，同时，要他“把照会的文字妥善定稿。”12月7日（日本时间），野村奉命在12月7日下午1时（华盛顿时间）向美国递交日本的照会。事实上，这道命令已经被美国的密码员截获并破译了。

战后，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上，东乡为自己辩护时说，日本海军军令部部长长野海军大将和次官伊藤海军大将曾经对他说，海军想要发动一次突然袭击，并认为，为了保证突然袭击能够成功，无论如何不能给美国任何答复。可是，东乡又说，他曾劝告他们，如果日本采取这种手段，将给自己带来耻辱。于是，他们建议，日本的答复于12月7日下午12时30分（华盛顿时间）递交美国。

可是，到了12月5日，他们又要求东乡把时间改为下午1时。日本海军军令部并不告诉他将于何时发动袭击，只是向他保证，会让他有时间先把日本的答复交出。东乡补充说，后来——在发动袭击以后——伊藤海军大将对699他讲，“很抱歉，我们的时间扣得太紧了。”

与此同时，华盛顿对下一步应作何打算，意见分歧，从而也造成了相当的混乱。人人都估计，日本要在东南亚继续推进，但是，谁也不曾料想到美国会遭到直接攻击。日本向印度支那南部大举增援的消息，再加上日本护航队驶向暹罗湾的报道，表明了暹罗要遭到侵犯，英属马来亚有可能被袭击。上文已提到，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曾提议，如果英属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遭到侵犯，美国应当出兵。可是，美国国会是否会同意呢？国会的意见和公众的舆论仍然都有分歧。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情绪依然强烈。暹罗政府正发出求援的呼吁，倘若得不到援助，就有可能倒向日本。丘吉尔再次敦促罗斯福同意向日本发表一个联合声明，或者至少各自单独发出一个警告。英国政府也想占领暹罗的克拉地峡，以便获得一条良好的防线，以抵御日本侵犯马来亚。这个行动在军事上是得计的，但是在政治上却是冒险的，因为这将使英国受到指责，说它无缘无故侵犯暹罗的领土。日本驻曼谷大使希望英国这样干。但是，驻曼谷的英国公使却劝告本国政府不要这样做。罗斯福对英国提出的一些问题迟迟不作答复；因此，英国政府就起草了一份警告日本的照会，声明如果日本侵入暹罗，英国将采取对策，届时，日本要承担战争的责任。

有一段时间，罗斯福一直在考虑致日本天皇一封私人信。他一度似乎想在这封信中提出在紧急关头签订一个暂行解决办法的建议，可是，后来不知

何故，他打消了这个主意。12月6日，罗斯福决定向日本天皇发出这样的电报；对于日方的答复，他准备一直等到12月8日；如果届时仍无回音，他决定在下一天向国会发表演说，这样做有双重意义，既说明形势的严重，又向日本发出警告。英国也将于12月9日发出警告。罗斯福致天皇的电报于12月6日晚间以明码（非密码）发出，因为罗斯福认为，即使被截获，那也无关紧要。这封电报提到了，自从1851年美国的菲尔莫尔总统写信给当时的日本天皇以来，美日两国一直保持着和平与友好关系。美国总统在1941年的这封电报中提出警告，指出当时的形势已含有发生灾难的可能性，并指出了日本在印度支那那种咄咄逼人的军队集结情况。罗斯福迫切要求日本撤退这些军队，并说，美国不会侵犯印度支那，而且他还要使英国、暹罗和中国作出相应的保证。在电报的结束部分，他说：“我确信，我们两人都有神圣的义务，不仅要为我们两个伟大国家的人民，而且也要为邻国的人民，恢复我们两国之间传统的友好关系，并防止这个世界遭到进一步的屠杀和破坏。”罗斯福的电报，东京日本电报局于12月7日中午（日本时间）就收到了，但是，直到晚上10时30分才送交美国大使馆。12月7日午夜12时15分，格鲁把该电的抄本交给东乡，并且要求天皇接见他。在日本袭击珍珠港以后，东乡告诉格鲁，他已经在8日凌晨3时把该电转呈天皇，日本的备忘录——即野村将向华盛顿递交的那个文件——就是答复。总之，想要在那时仅凭罗斯福的一份电报来扭转局势已为时晚矣；日本军事当局为了确保局势按照日本政府决定的方向发展，已经命令保密检查机构将所有电报扣发十个小时。

12月7日上午，罗斯福和赫尔已从美国的密码员那里得到了日本发给野村的备忘录最后部分的译文，同时，他们也知道了，东京指示野村和来栖于下午1时向美国递交备忘录的全文。日本大使馆人员未能及时地把这份备忘录译解和翻成英文；因此，野村要求把他同赫尔会晤的时间推迟到下午1时45分。事实上，一直等到下午2时20分赫尔才接见这两位日本使节。那时，日本航空母舰上的飞机已对驻在珍珠港的美国舰队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赫尔也已接到了金梅尔海军上将发来的第一份戏剧性的电报抄本，说“珍珠港遭到空袭，这并不是演习。”赫尔问野村为什么他要求在下午1时会晤，野村回答说，他不知道，东京是这样指示他的。接着，赫尔把日本的备忘录看了一遍，当然，一点没有流露出自己早已知道的内容。赫尔对这两个日本使节说：“在我担任公职的整个五十年中，从未见过这样一种文件，满纸无耻谰言，颠倒黑白……恶劣透顶，我从未想到，在这个星球上竟然会有一个国家的政府讲出这种话来。”赫尔后来写道，这两个日本使节听了他的话畏畏缩缩，避不作答地离开了。在东京，12月8日上午7时30分，东乡交给格鲁一份日本备忘录的抄本。上午8时，克莱琪也接到这样一份抄本。这天上午11时左右，这两位使节接到了宣布进入战争状态的正式通知，日本的宣战敕令也颁布了。12月8日正午，罗斯福向国会发表咨文。他在咨文中说，日本已经蓄意地和背信弃义地袭击了美国，他要求国会同意宣战。参众两院立即表示同意宣战，只有一人表示异议。英国政府一直在等待罗斯福向美国国会讲话，于是也在那天发表了宣战声明，英联邦其他国家也在同一天采取了同样的行动。

11月20日，日本参谋本部的冈本少将曾询问德国驻东京武官冯·克雷奇默尔，如果日美之间发生战争，德国是否在军事上支持日本？克雷奇默尔

反问道，这种战争将如何发生？日本是否打算进攻美国的领土？冈本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因此，他又向奥特提出这问题，奥特把日本提出的问题转给了里宾特洛甫。11月21日，里宾特洛甫答应日本，德国将给予支持。两天后，东条对此表示了最衷心的感谢。11月28日，里宾特洛甫告诉大岛，他已得到消息，日美谈判几乎肯定要失败；他还说，如果日本下决心对英美开战，这对日德两国都有利。29日，大岛向东京汇报，里宾特洛甫已保证，德国将给予日本援助；大岛还表示了自己的信念，认为德国实际上已准备好同美国交战，如果需要的活。里宾特洛甫在接见大岛以前，刚同希特勒和其他纳粹领导人开过会。他对大岛说，俄国战场上最重要的军事行动已告结束（希特勒当时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德国军队大部份将从俄国撤出，留下的在1942年春季将把斯大林赶到西伯利亚。他还说，德国还要把英国赶出地中海和近东。但是，现在能够查到的所有证据都表明，德国丝毫未想到，日本竟然要攻打美国。希特勒对局势的判断似乎与英美两国政府的看法相同，即日本将对英国和荷兰在远东的属地发动进攻。希特勒希望日本采取这种行动，他无疑认为，如果美国要对日本进行干预，德国答应给予日本支持，这样的保证会鼓励日本，不顾美国的种种威胁，对东南亚发动攻击。1946年3月30日，里宾特洛甫在纽伦堡作证时说：“那时，我曾试图劝说日本进攻新加坡。……我还设法想使日本进攻俄国。可是，我们希望它去干的两件事，它却一件也不干，而是去……袭击了美国的珍珠港。”希特勒如事先知道日本要这样做，他或许会感到惊恐，可能不会答应日本将给予支持。但是在当时，希特勒认为，他已经肯定地把俄国人打垮，同时邓尼茨海军上将正在强烈要求他批准对美国的海运展开大规模的潜艇战。因此，即使当时希特勒完全了解日本的意图，我们也不能肯定，他会做出另外的反应。

11月30日，东乡指示驻柏林的大岛通知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英美两国持挑衅态度，正在进行军事调动，日本必须采取对策。他要大岛“非常秘密地告诉他们，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与日本之间，存在着极其严重的危机，战争可能通过某些武装冲突而突然爆发，而且，这场战争爆发的时间，可能会比任何人料想的来得快”。另外，东乡又指示大岛，如果对方问到关于苏联的事，他应当说，日本认为暂时还是不对它发动进攻为好。东乡在给大岛的另一份急电中说，华盛顿谈判之所以破裂，是因为日本忠于三国公约，不同意予以废除的缘故。在东京，东乡对奥特也是这样说的。作为报答，奥特重申，如果日本卷入对美战争，德国保证支持日本。11月30日，东乡又指示日本驻柏林和罗马的使节开始谈判签订一项“不单独媾和”的协定。12月2日，大岛从维也纳参加莫扎特音乐节回来后，看到了这个指示在等着他处理。于是他就去见里宾特洛甫，后者表示，他先要同希特勒商量，然后，德国才能作出立即进行干预的明确保证。在这期间，希特勒已经离开他在东普鲁士的大本营，到俄国南方前线去了，因为德军在那里遭到了一次意料不到的挫折。大岛只好等他于12月4日或5日回来。大岛对此并不十分介意；他对里宾特洛甫说，这时还不能肯定，战争一定会爆发，原因是他对东京已经作出的决定一无所知。在罗马，墨索里尼于12月3日对日本作出保证，意大利决定进行干涉以反对美国，但保留同希特勒进行商量的权利。

12月5日，里宾特洛甫通知大岛，德国已经正式接受了日本的要求；他还交给大岛一份拟议的协定草案。草案规定，如果日美之间发生战争，德意两国也将参战，并使用它们所有可以调动的兵力来作战。如果轴心国家与美

国之间爆发战争，日本也将同样参战。这三个国家事先未经三国之间一致同意，不得单独媾和。万一日本与英国发生战争，这一条也同样适用。这个协定的有效期与1940年签订的三国公约相同。从这份草案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德国人对日美之间即将发生战争一事，确实一无所知。当东条接到这一草案时，他提醒大岛说，有可能在协定正式签订之前，战争已经爆发了。他补充说，即使如此，日本也想要轴心国家介入。他认为，最好还是只签订一项“不单独媾和”的协定。

12月7日晚间，大岛从伦敦的广播中听到日本袭击珍珠港的消息。当时，他还没有从东京接到这个消息，因此当里宾特洛甫问他时，他既不能证实，又无法否认。

里宾特洛甫告诉他，如果报道属实，德意两国会立即支持日本。里宾特洛甫还说，这样一来，草拟的协定就过时了。12月8日，大岛接到了东京的正式通知，证实了这一消息。于是他就去见里宾特洛甫；里宾特洛甫对他说，希特勒已经向德国海军发布命令，在任何地方一发现美国船只就进行攻击，同时，他正在同大本营商议，怎样才能把正式的宣战声明起草得最好，给德国人民以良好的印象。里宾特洛甫、大岛和他们的助手起草了一份经过修改的三国协定。这个协定规定：德意日三国共同进行战斗，直到赢得胜利为止；三国未经一致同意，不得单独停战或媾和；战争结束后，三国当密切合作来建设一个公平合理的新秩序。东条不赞成第三点，他说服德国人同意在这个协定里写进1940年的三国公约，用意是使这项新协定的条款局限于1940年三国公约条款的范围之内。12月10日，日本枢密院批准了“不单独媾和”的公约文本；11日，这个公约由三国正式签署。

同一天，即12月11日，德国和意大利对美国宣战。德国在宣战书中没有提到日本，也没有提到三国公约。宣战书只谈了大西洋的形势，并断言，罗斯福实际上已经造成了战争状态。美国已经同日本公开交战，但是尚未同德意两国正式宣战，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这样一宣战，倒为罗斯福解决了这个难题。

